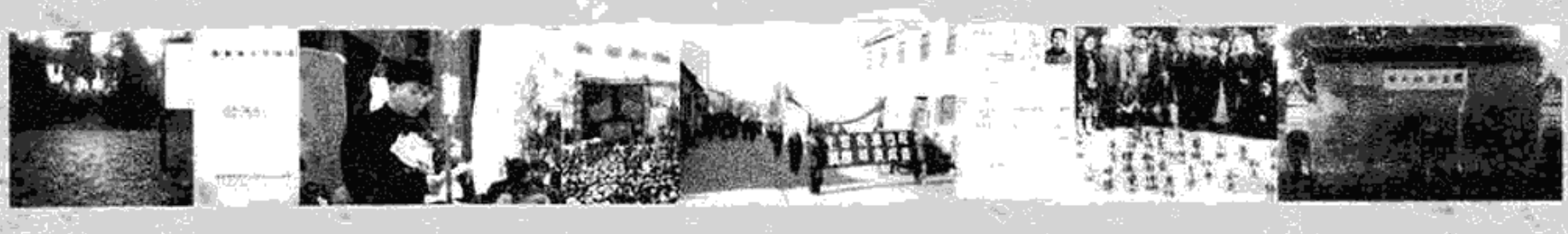
束星北档案

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

SuxingBeidangan

刘海军 著

那一天，是我们的噩梦，没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父亲是平静的，好像一切早有所知，他从房间被一个人『请』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本书，后来我才知道，他拿的那本书是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他曾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

他的理论物理修养（三四十年代）国内难有比肩者。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背影就在眼前晃动，他要做的就是跻身其中。

他的教育才华（三四十年代）也无人可以企及。他启蒙并培育过一批国内外顶尖的物理学家，如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吴健雄，和杨振宁共同荣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中国核武器试验的创始人之一程开甲等。

他又是天赋极高、富有激情的“诗人”，在他身上，有一种学界罕见的“骑士”作派与英雄豪侠的气质。因而，有人认为，他身上最饱满的地方，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最为贫瘠的地方。

风雨如磐，他是为历次运动所伤的“小鸟”们的掩体：

滚滚红色潮流席卷中国大地，他是理智而清醒的智者；愚昧和狂热弥漫开来，知识分子集体失声，他是独步草原的雄狮，用孤独的吼叫，歌唱真理，捍卫尊严。

当阵地的坚守，尊严的捍卫演变为死去还是活着的选择，当灵魂在一次次阉割中不断地被肢解扭曲，当明亮的眼睛和嘹亮的歌喉被蒙蔽系死，他仍用累累伤口发出一个人，一个悲剧英雄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绝唱。

人究竟能不能被改造，灵魂究竟能不能被阉割？一部东方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如一柄尖利无比的探头，扎进时代、社会和我们身体的根部。

《束星北档案》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匆匆踏过去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一部被我们认为早已翻烂了的“历史大书”，其实，还没有真正打开……

ISBN 7-5063-3087-3
9 787506 330879 >

ISBN 7-5063-3087-3　定价：36.00元

刘海军/著

东星北档案

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

那一天，是我们的噩梦，没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有父亲是平静的，好像一切早有所知，
他从房间被一个人“请”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本书，
后来我才知道，
他拿的那本书是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刘海军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11
ISBN 7－5063－3087－3

Ⅰ．束… Ⅱ．刘… Ⅲ．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Ⅳ．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6783 号

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

作者：刘海军

责任编辑：袁　敏

装帧设计：李栋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389299（邮购部）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787×970　1/16

字数：520 千

印张：24.5　　插页：4

印数：001－10000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087－3

定价：36.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深深的皱褶里，不仅仅是岁月沧桑，生命从生成到灭亡也不全是季节的轮回。一双曾经多么明亮炽热的眼睛，它温暖过很多人的灵魂和冰凉的真理，如今却只剩下怎么读也读不尽的苍凉。相信生命与灵魂只有死过数十次的人，才会有这样令人悲伤与不安的面孔。

束星北的命运告诉我们，已被我们认为早翻烂了的"过去"的大书，其实，还没有真正打开……



東星北像

序言

李政道

1972年10月17日，是我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1943年的暑假，我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的化工系，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左右，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在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有好几位教授的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那年8月大部分时间，我常在双修寺。束老师和王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我也常在旁边听。当时我仅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我浙江大学的一年级是在贵州永兴上的，离湄潭约三十里。1943年当我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化工系转为物理系。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课程就并在化工系上。所以事实上，我在浙大一年级上的是化工系的课，惟一的不同，是每一或两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

论。因为这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惟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1944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走。这年秋，束老师被聘去了重庆。

1944年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中停顿。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亦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很快地，我就准备转学。1945年去昆明，转入西南联大。

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Eddingburgh大学，随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束老师的导师Darwin是进化论创立者的孙子)。Jeans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到联大后，托陆祖荫同学送给物理系同仁们。

1944年，和束老师分手后，很遗憾就再没有机会和他相见。1946年我到美国后，又完全和束老师失去了联系。过了几十年后，才陆续知道些他的情况。束老师后半生的遭遇，让我心里很难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追求的目标是真理和真理的普遍性。束老师为了追求真理，争取科学研究和教育年轻人的机会，竟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回忆起来当年在湄潭和永兴与束老师相处的日子，想起他非凡的科学气质和为人品格，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觉。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谨以此文向束老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2004年三九隆冬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目录
Contents

序 言……李政道/001

引 言……/001

那一天，是我们的噩梦，没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父亲是平静的，好像一切早有所知。他从房间被一个人"请"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本书，后来我才知道，他拿的那本书是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追求与理想……/005

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让他徒生无奈，对社会体制与制度的探索和考察为主要目标的游历在德国宣告结束，他按捺住一度被"声音"激得沸沸扬扬的心情，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他不再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劳心费神，他开始心神专注地钻研思考真正属于自己的事情了。

2.东方剑桥……/015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成功的根基便是"求是"。林启创办的"求是学院"的求是倡导，在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已化为一种精神。有了这个精神，浙江大学就有牢固的底气，无论社会怎样动荡，风云怎样迭起，都不会让大学随风偃伏、失去方向。

3.天下第一才子……/027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活跃的代表，他的学生程开甲对老师的评价是：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

目录
C o n t e n t s

4.第三条道路……/039

束星北认为，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还有一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即使到了政治的怠风暴雨时期，所有的人都必须在革命和不革命之间作出惟一选择的时候，他仍坚持"第三条道路"的观点。

5.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055

如果说，华岗的信念与原则坚硬如铁，束星北的信念与原则也是坚不可摧，两个人在大是大非上都不会稍加退让。大学一些对两人的人格和品质深为爱戴敬仰的老教授们，曾多有调解撮合，却不能稍缓两人钢对钢铁对铁的越来越猛的碰撞。

6.遭到驱逐……/073

束星北对日益升温的政治热潮，无力抵挡，却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搭台子唱反调。在华岗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大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他不断地向学生灌输牛顿、爱因斯坦、狄拉克、玻尔等科学家成才成名的故事和经历。

7.改 行……/087

在我们这里，气象主要还是要靠感性的经验积累，这恰恰是束星北不具备的，但前人普通的材料经他总结成点化，立刻就不同凡响了。他过人的才华和高度也就在这里，束星北的学问实力雄厚，聪明灵巧，才能够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8."别矣，淦昌兄"……/097

死虽死，真理仍旧要取胜的！淦昌，记得我最佩服的人是Galileo(伽利略)么？我想绝不会给朋友们丢脸，我也不会给中国人民丢脸，屈服于恶势力之下(的)。

9.英雄束星北……/109

其实，大家在"鸣放"之初已经想到束星北了，有人称赞他是硬骨头，是绅士、君子。这种时候，提他、称赞他，是一种比照，是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离里离霎的气愤和憎恶。这个时候，大家重新再看束星北，觉得他是个英雄。



柬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10.出 山……/117

从"肃反"到"小阳春"，中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几个月，柬星北由冥府而阳间，像是掉进人家精心编织的恶作剧的陷阱里。尽管身上每一处伤口的疼痛都是真的，可事情本身却如此荒谬。

11."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137

大起大伏的经历，使得柬星北的思考与那些一味申冤诉苦的人拉开了距离，他更加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命运背后的东西。在独舔伤口的日子里，柬星北已大致意识到没有或缺乏法制或法制意识，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根源。

12."三座大山"……/153

有人这样来形容"6月"的天空：云霄越积越厚，大地透出雷雨前浓烈呛人的土腥气味。要是你是个敏感的野兔，一定会感觉到猎人早就支在树杈上的枪口。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可是绝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敏感，结果都落到自己掘好的坑里却还在疑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13.月子口没有尊严……/185

月子口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声音，是一种令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声音。那是一种金属链条碰撞的声音，哗啦哗啦的，那种声音只有机械加工厂里才会有。我们纳闷的是，在这荒寂的旷野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声音？

14.较坏的队员……/193

付出了这样的努力竟也被评为"较坏的队员"，原因何在？柬星北想不通，也无法想象，当然他更无法想象的是，12月份的第一次评比，仅仅是他噩梦的开始。

15.四顾无门……/205

柬星北不甘于月子口赋予的"最差"的"角色"，他寻求出路却又苦于无路，当月子口第一批队员"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后，他坐不住了。

目录
Contents

16.饥馑的日子里……/215

与政治压力或"较坏"队员比较起来，饥饿的考验更为严峻。为了饥肠辘辘的肚子，束星北不得不伸出"乞讨"的手来。"宁为人憎，不为人怜"的束星北终于屈服于自己的肚皮，开始靠着亲戚、朋友，或者儿女的"接济"来维持生存。

17."我是一只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啊"/231

有一次公共汽车上太挤，一位解放军战士亲密地把我一路抱着，从夏庄抱到沧口，我心里感愧地说，"您不知道我的身份，不知道我竟是人民的敌人，一只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啊！"这种悲伤感情一直的(地)压在心里。

18.以专长立功，向人民赎罪……/245

脑电图机的起死回生，在青岛医学院引起了轰动，也在青岛医学界引起了轰动。这一年年底总结会上，张秉武代表院领导第一次表扬了束先生，让束先生发言时，他竟叹了口气说：纯属雕虫小技。

19."只有依靠组织 才有我的出路"……/253

这时，我脑子里闪出的是"叛国投敌"，这个词一出现，脑袋立时就大了许多。我从父亲喃喃咕咕的声音里听得出，那个动员他出逃的人自称是他的学生，不知道他用什么打动了父亲。

20.还是立场问题……/261

苦海泅渡，千难万险大风大浪终于挺了过来，人眼看着就爬上海岸了，可突然又被抛到原地，先是让他停止写书，紧跟着又恢复了每周两次的"四类分子"的集中政治学习。

21.孤注一掷……/269

命运又一次将束星北推到"生存与死亡"的十字路口。他意识到这是他改造生涯中的一次机会，也许是惟一的机会。他已经上了跑道并开始起跑，而竞赛对手便是大西北茫茫戈壁滩上的朋友、同仁、学生。

22.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285

束星北拄着拐棍上班了，他一上班就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他来到青岛医学院物理组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个小本挨个让人家提意见。

23.风暴中的"死老虎"……/297

以后看了电影《白毛女》后，他又设想自己是杨白劳，而自己的小女儿就是白毛女。每作一次联想，他就会声泪俱下。很快就有人回过味来，当面对他进行了斥责，束星北这才意识到自己把关系给搞颠倒了。

24. 好人束星北……/307

他将自己与竺可桢、王淦昌等朋友作了对比之后发现：论出身、地位、学识、学历，他们之间都没有太大差异，甚至社会关系和人生经历也都差不太多，可是命运却如此迥然，问题出在哪里？经过思考和分析，束星北找到了关键所在。

25."恳请党领导拉我一把"……/317

父亲在前面，我拿着竹扫帚跟在后面，可没走几步他便把孩子交给我，要过扫帚又折了回去。我以为他又要回去扫雪，却看着他进了"路旁"。这时我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好大一片哪。是父亲的作业吗？

26.李政道来了……/327

李政道受到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见时，就顺势提到了老师束星北的名字。这一次"提携"、对一个"戴枷改造"的"罪人"来说，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27."摘帽"……/335

1972年是束星北绝处逢生的一年。似乎注定是一种宿命，每当无路可走了、只有望天长叹悲号时，冥冥之中必有一只手来给他稍拨迷途。

目录
Contents

28.“人是不可改变的”……/345

吃早饭的时候，两人突然在客厅里“打”了起来，我当时正在厨房里做饭，突然听到父亲和王淦昌的吼叫声。我赶紧跑到客厅，只见父亲锁着眉头，胸口呼哧呼哧喘得像拉风箱，王淦昌扭向一边的脸憋得通红。

尾声 永远的故事……/367

同样作为科学家，王淦昌几乎获得了完美的人生：提出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研制原子弹氢弹……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还有比拥有如此丰富的科学经历更为饱满的人生吗？反观束星北呢？

阁楼上的日子(代后记)……刘海军/374



引言

那一天，是我们的噩梦，没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父亲是平静的，好像一切早有所知。他从房间被一个人"请"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本书，后来我才知道，他拿的那本书是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山东大学党委：

近日，我发现有一个带枪的人，影子一样，出没于我的房前房后，显然对我进行了特殊"保护"，但不知出自何因，不知道党委领导同志，知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请予以关注，并作出解释。

此致 敬礼

报告人 束星北　　1955.10.17

此件抄报青岛市委与山东省委①

王炳辰

（山东某学院党委书记，系当年参与束星北反革命案件调查的成员之一）：

在我印象里　对束星北派专人跟踪监控的时间大致是1952年8月中下旬，此前，山东大学召开的全校肃反运动揭批大会上　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并当众宣布他停职反省。现在看来　所谓的历史反革命　无非是捕风捉影、罗织罪名那一套，束星北自然不认账，反应很强烈。他在大学无言可辩了　就把自己的声音喊到全国一些著名大学和研究院所去。他是全国著名教授，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他这样一吆喝，山东大学就有些吃不住劲了，于是星夜向省市肃反小组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在得到有关领导对他反革命性质的肯定后，学校和青岛市公安局制定出一些相应的措施。如，如果束星北不配合运动　就不能继续任教　就要解聘　公安局要派人对他进行看管。如果态度仍不老实的话，就给予隔离反省。

与此同时，学校保卫部门和青岛市肃反小组一同组织力量深入查对束星北的材料，有关领导明确指示　一旦问题定案　立即呈批法办。②

李开先

（某大学人事处处长，系当年参与束星北反革命案件调查的肃反八人小组成员之一）：

凌晨二时，我们悄悄地溜进青岛鱼山路26号的山东大学第一公舍，包围了束教授的家。第一公舍，是山东大学名教授公寓，最初是日本人为其教员们修建的别墅（日占时期山东大学的物理楼是日本人的子女中学）。对山东大学来说，它是最好的住宅，因而，华岗一上任，就作出规定，只有应聘到山大的第一流的教授，才能住到这里。于是生物学家童第周、教育学家吴富恒、文学家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等，便陆续搬了进来。束教授来得晚些，住到了最里面的一幢小楼，与化学系教授刘遵宪是隔壁邻居。

这次行动的人马本来由市委肃反八人小组、山东大学保卫科的骨干组成。可是行动之前，上面又临时给我们加派了四个受过专门训练的公安干警，所有的人都带上了武器。束教授家的二楼亮着灯，那是他的书房，他还在伏案，从对面的楼洞里，能看到他映在窗上的蓬乱的头。我们在对面的门洞里等着，等到那盏灯熄了半小时后，我们这次行动的总负责人、保卫科武科长才说：行，可以行动了。

行动小组对束教授可能作出的反应作了反复的分析，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是他家里有枪（他五儿子束义新曾告诉同学说，他们家里有枪，同学的母亲知道后，便报告了学校保卫科。后来证明那是一把玩具枪）。根据揭发材料和档案材料，束星北解放前确有一支手枪，至于这支枪是怎么来的，没有调查清楚，一种说法是1944年，日本鬼子已逼近了贵州的独山，流亡到贵州及湄潭一带的浙江大学，已不能再开课读书，浙江大学领到一批枪支，将部分身强力壮的师生武装起来，准备上山同日军打游击，最终日本人没有打过来，游击队便宣告解散，枪支收回，可是束教授却将发给他的手枪私自留了下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束教授在国民党军令部研究军工武器时，国民党发给他的。解放初期，解放军进驻大学，束星北便将这支枪交了上去，进驻大学的解放军在他的复杂分子登记表上填的是"缴械"，惹恼了他，他说明明是上缴，为什么要填"缴械"呢。我是人民，又不是敌人。硬是让那个解放军给他改过来。这事在他的档案材料中都写得清清楚楚。因而，我们都认为他极有可能持枪拒捕。第二，他家藏有电台（这一点，武科长一口咬定。他说他多次在凌晨时躲到束家的窗下侦察，好几次都听到了滴滴答答的发报声。后来证明那是收音机调频发出的声音）。如行动不迅速，他会将情报发送出去。第三，他可能自杀。当时山东大学以束星北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已经确定，上面指示：解决束星北要确保万无一失。束星北一旦出现好歹，就无法顺藤摸瓜了。

束星北大门上贴着他用毛笔书写的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武科长也许就是看了这个告示，认为束教授已觉察到了风声，才决定

智取的。其实，这个告示很早就贴在门上了，我以前就看见过，我觉得束教授贴这则告示的本意是用来逃避会议和政治学习的，不但大门上有，客房门口，楼梯口都有。武科长遣人找来学校的女会计，让她佯称是隔壁刘遵宪教授家的保姆，说先生心脏病犯了，想求点药，束教授的妻子葛楚华不谙其情，将门打开，这时，埋伏在两边的人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进去。③

束义新

（束星北五子，青岛玛钢厂工人，现已退休）：

1955年12月10日的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是我们的噩梦，没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清冷的凌晨，我们全家老小包括两个保姆全被赶到门外花园的甬道上，两个腰上别了手枪的警察一头一个把着。我们甚至连衣服也没有穿好，那时候已经很有些寒意了，我们一个个在寒冷潮湿的晨风里冻得直打哆嗦。大约有六七个人在房屋里上上下下翻腾。乒乒乓乓动静弄得很大。就像电影里的镜头，我们的家眨眼间就狼藉一片了。客厅里仅有的一张沙发被用刀子劈开来，父亲的房间、我们的房间包括阿姨的房间全都翻了个底朝天。可显然他们没有找到所需的东西。于是楼上楼下的地板就像搂地瓜一样，搂了个遍。当仍没有找到他们要的东西时，他们便开始想象东西可能藏在墙壁里或客厅的立柱里，于是楼上楼下的墙壁和客厅的立柱立刻被凿子凿得面目全非了。弟弟和妹妹好长时间才从梦里醒过来，惊吓得哭了起来，母亲一边护着我们，不住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可是没人跟她搭话。只有父亲是平静的，好像一切早有所知。他从房间被一个人"请"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本书，后来我才知道，他拿的那本书是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谁也不看，不停地摇动着那本书。天空开始发白了，他们才停了下来，他们得到惟一的东西是父亲自己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他们大概是拿回去研究一下，看看是不是与电台有关系）。一辆警车停在大院门口，父亲在一些人的簇拥下，向那边走去。临上车了，好像才想起我们，他回过头来朝着我们看了一眼。我感觉他在努力地朝我们微笑。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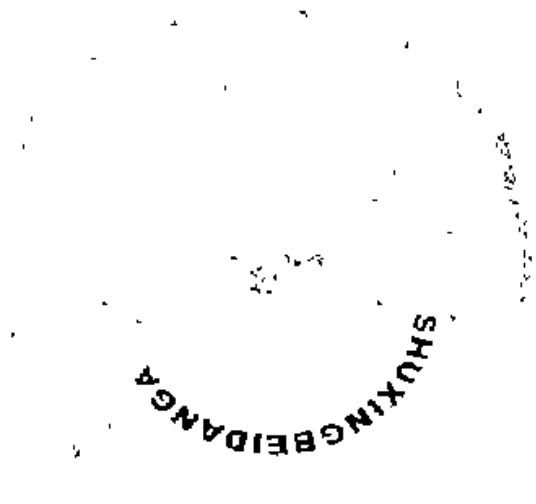
注释

①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②王炳辰采访录，1993年8月26日。

③李开先采访录，1993年8月28日。

④束义新采访录，1995年5月11日。



1.追求与理想

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让他徒生无奈，对社会体制与制度的探索和考察为主要目标的游历在德国宣告结束，他按捺住一度被"声音"激得沸沸扬扬的心情，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他不再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劳心费神，他开始心神专注地钻研思考真正属于自己的事情了。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扬州南乡开沙念四圩，为长江下游的洲渚，其建制，原属江都开沙洲，现为扬州邗江县头桥镇安贴村。头桥镇在古城扬州东南约三十里。安贴村依江而筑，一幢幢青砖灰瓦飞檐翘角的江南民宅，散落在桑林、竹林和水田交织出的波光潋滟的江堤上。“束家老宅，圩中人称束家大瓦房，倚堤朝西，并排四个大门，前后两进，大小三十余间，家塾、书斋单独砌在箍江大岸上。南山头特挑土叠成高地，栽竹种树，蔚成园林。门前是人工开凿的河塘，夏时菱红荷绿，冬则鱼游渊底，清波荡漾。隔河为连片的稻田……宅后，堤旁多树，岸外江滩至水，绿柳红蓼，蒹葭苍苍。屋旁翠竹成林，绿树成荫，最大的那棵皂角树，数人才能合抱，几里以外就能见到四根主干的大园(圆)冠……”①

束氏(家族)为开沙望族之一，据民国七年(1918年)重修的《束氏族谱序》(南通张謇撰)云：“束氏谱系出汉太傅疏广之后。广曾孙孟达居东海沙鹿山南，避新室之乱，去足为束……晋有束混，仕陇西太守。混生龛，为冯翊太守。龛生哲，字广微，博学多才，为晋儒宗……(及宋)振祖始居云阳三城(今丹阳县境)……(及明)海公(建军功，封佥事)游学维扬南新洲(开沙诸小洲之一)，见其山水之胜，卜筑而居，为南新洲开基之祖……”传至星北先生，一十八世。在黄家桥(今邗江县李典镇境)曾建束氏宗祠，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水灾，祠产荡然，嗣是无力复建。②

据《束氏族谱》，星北曾祖履华，住开沙念四圩(又名宦家码头念四圩，即二十四圩)，生四子：长名增熙、次名增煦(又名纶，号渭湟、畏皇)、三名增祥、四名增瑞。增熙、增祥无出。增煦生二子：名曰琯、曰璐。增瑞生二子：名曰琅、曰琪。曰琅承嗣增熙，排行束大，曰琯为束二，曰璐承嗣增祥称束三，曰琪是束四。曰琅生仪保(又名光仪，号赣南)居老宅，曰琯婚张謇女，寓南通，曰璐娶江都嘶马郭氏(人称束三娘)，住老宅，生传保，乳名“大林子”即星北先生。又生佺保乳名“小林子”号淮北(曾任上海《自由论坛》报主编，后往台湾从政)。束三太太晚年寓居江都大桥镇。曰璐又配姜氏，住南通；曰琪娶开沙念三圩胡氏，人称束四娘，住老宅，直至土改，才迁居南通。传保即星北先生，幼年曾聘同邑杨氏女，时年11岁。

星北先生的曾祖父束增煦。婺源江谦的《束公畏皇事略》叙：“公姓束氏，讳纶，字畏皇，江都人。幼颖悟笃学，年十八补学官弟子……公家设花布粮肆于南通之二甲镇，公父履华，从兄锦分主其事。公弱冠往省，遂就该镇授义室……暨花布渐落，奉父回邗，再至

通就馆，佐锦治粮业，兼授从弟经读……粮业旋亦不振，公慨然有四方之志矣……”嗣后，安东令聘为记室，庐江吴武壮公耳公名，辟参戎幕。同幕多名士，有项城袁世凯等。光绪年间病逝，生前著述，散佚未刊。梁启超为其传作赞。③

父亲束曰璐毕业于江南陆师学校，清末曾任官家的参领，辛亥革命后引退。民国时期任全国水利局的主事，与其兄束曰琯(张謇的女婿)一同为张謇办理经营盐业与纺织业。民国初年，两人实际上已成为江南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左膀右臂，兄弟俩经营的盐业与纺织业也成为张氏实业集团的经济台柱子。曰璐的生意生活大都在南通，因性情和生意关系，他极少回家。因而子女和祖上留下来的上百亩水田，都由妻子郭氏一人料理。郭氏又称“江都夫人”，因嘴脚长得奇大，佃户们背地里也称她束大嘴或束大脚。她高大肥硕，性情刚烈。安贴村的村民大都是束家的佃户，他们对这个声若洪钟、高大丰满的女人既敬又畏。束大嘴常常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那些偷懒耍滑的佃户地头上，若是哪个不幸的主儿给她逮住了，可就倒霉了。她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的祖宗八代一一拖出来理论一番。要是哪个不识趣的再敢无理纠缠的话，束大嘴就会扬起她那个让所有佃户都畏惧的手，劈头盖脸地扇下去。可是束大嘴又心慈如佛，若逢灾年，不但主动减租，还会捐资募化，赈济衣食。每到枯冬春荒，束家都要发寒衣、施面粉。圩中人背地里常谈：“束大嘴(束三娘的绰号)心直口快，有慈悲心，肯做好事。”④

童年的生活足滋足味。江边的芦苇滩，划塘(芦苇滩中间的小河)和江中洲渚伴着束星北无忧无虑的童年。八岁那年，束大嘴决意要给耍疯了的小野马套上笼头，她延聘其伯父的同科秀才魏楚翘老夫子为束星北“开蒙”。束星北虽不情愿，却碍于母威，不得不和同乡的几个孩子跟老夫子习书问经。老夫子拴不住不胜其烦的束星北，他常常领着弟弟束佺保和不惧戒尺的小伙伴半路出逃：下滩子，摸虾子，捉螃蟹，掏鸟窝，兴致所至，就将魏楚翘撂到脑后。当两个泥猴发现天时已晚，想偷偷溜回自己的房间时，一声狮吼炸雷一般，坐在太师椅上的老太太手攥着戒尺已恭候多时了。“划塘”，芦苇连片，退潮即为滩涂，涨潮水流湍急，不知不觉间，顿成泽国，每年都有不谙水性的孩子被夺了性命去。“难怪束三老太发现后，火冒三丈，立即罚他兄弟俩，伏在板凳上施打戒尺。大林子(束星北乳名)刚直，知错愿罚，硬铮铮的(地)挨了十下，小林子(束佺保乳名)灵活，连声哀求‘下次不敢了’，却减罚一半。”⑤

任母亲的戒尺打得皮开肉绽，过后还是落不下记性，束星北仍会趁魏楚翘吟诗唱经半痴半醉的时候，招呼伙伴们开溜，若是没有敢响应的，他就从窗户跳出去，独自一人钻进划塘。

衣食无虑、自由自在的日子很快结束。那年夏天的一日，一直在外奔波的父亲带着他的新太太回家了。小火轮停在开沙念四圩的码头上，父亲独自先行下船，试着与妻子商量。结果可想而知，怒气冲冲的束大嘴马上就做出了反应。她一手拎着两个包袱，另一只手牵着束星北走上江堤。安贴村束大嘴的佃户，从此再没见到他们。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尽管丈夫言之凿凿，束大嘴的正房的位置丝毫不变，却不能让一个刚烈的女人回头。束大嘴宁可丢掉眼前拥有和习惯的一切也不能容忍另一个女人走进这个家庭。结果是，一个拥有上百亩滩涂水田的地主一时变成一个寄人篱下的穷亲戚。弟弟束佺保选择了父亲和他的"庶母"，束星北跟着母亲寄居在江都县的大桥镇的姨母家。姨母在江都县开了家规模不小的绸缎铺子，很长一个时期里，束大嘴靠着帮妹妹料理绸缎生意生活。

为了衣食和学费，小小"童工"奔波于茶楼、酒肆或油料作坊，年龄稍长便用打短工赚来的钱买了辆胶轮地排车到瓜洲码头给人家上货下货。突然的变故，让一个衣食无虑的少爷开始了另一种人生。因为年龄小，他不得不时常忍受店主或工头的克扣和欺辱。有一次他向油料作坊讨要工钱时，竟给那人放出的狗咬伤。这种变故和经历使束星北早早地了解了社会与人生："突然的变化，使一个不谙世事、无忧无虑的少爷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不怕困难的人。"⑥束星北认为，早在母亲牵着他的手走在开沙念四圩的江堤上的时候，他就开始懂事了。他再也不会让母亲用戒尺打着读书了。

变故改变了他的生活，同时也给他带来自食其力的勇气和力量，自江都县大桥镇的小学起，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他都是靠着自己的双手解决的。

束星北虽然选择了母亲，父亲却并没有抛弃他。他仍然关注着长子的成长和前途。而走进束家的"庶母"是个毕业于圣约翰教会大学的"洋学生"，她知书达理与人为善。她因自己的介入，弄得束家"妻离子散"而疚愧不安。为了弥补"过失"和安抚自认为有罪的灵魂，她寻找一切机会帮衬束大嘴，也不时地让人将一些钱财和衣物转送到束星北的手里。可是束星北母子在这一点上非常默契，他们拒绝一切同情、施舍。

1926年束星北来到济南齐鲁大学的第二年，先行公派赴美留学的朋友来信约他到美国读书，他不假思索地便答应下来。本来，他曾为如何说服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而颇犯踌躇，没想到，听到这个决定后，母亲竟毫不犹豫地点头应允了。只是父亲百般阻止。在张氏集团，父亲的权限与管理范围不断地扩张，父亲和伯父管理的张氏实业集团也因此而蒸蒸日上，已由原先的盐业、纺织扩大到钱庄、面粉业和教育。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兄弟俩已主管了张氏集团的大部分实业。在束家子女中，束曰璐更看重长子束星北，父亲认为，依长子的个性和经历，在张氏集团里从事实业是再适合不过的。可是儿子的主意已定，不论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了。

在美国，经同学引荐，他考进美国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最初的求学经历似是国内经历的延续，为了生存、读书，他要拿出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来做工助学：洗车，修剪草坪，发送报纸等，他无所不做，却仍有难以果腹的时候。有时，不得已，只好混进做礼拜的基督徒中，偷偷吃上一顿周末免费的圣餐。迫于生计，不久他便从堪萨斯州拜克大学转到三藩市的加州大学，在那里，他可以免费住在三藩市的华人同乡会馆。华人同乡会馆住

满了或避战乱或被贩卖过来的"下等华工"。在美国，这些人只能同黑人一起到铁路和码头从事重体力劳动。这个时期，束星北同他们一起，修建铁路、码头，装卸货物，以此来支付学费，维持生活。

这是个特殊历史的时期，这是个充满无数声音的时代：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五四新文化新知识运动，西方文化的渗透碰撞。这一串串惊雷般冲击着一个幽闭古老的帝国。救亡图存、科学救国在知识分子或士大夫们中成为"潮流"。这个期间出去的知识分子，大都肩负着为中国诊脉、处方的使命感。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有中国第一批工程技术人员：詹天佑(铁路工程师)，邝荣光、陈荣贵(矿业工程师)，程大业(电报专家)等。另外还有中国近代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章太炎，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第一批文化文学大师：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等。

这种神圣使命感的烙印也深深地烙在束星北的身上。最初他几乎不加咀嚼地吞咽着所有能够吃到口里的东西：他先后加入过美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华人政治社团组织)和一个自称是三Q党的组织，也常常出入各种名目名堂繁多的华人社团组织，还同一伙自诩为中国革命先驱者的知识界人士合办过杂志，当杂志办不下去的时候，又和人一起创办了一份名为《玉碎》的报纸。报纸主要介绍中国文化和探索中国未来出路。北大教授胡适到美访问时，他慕名专程前往拜访。可是最初的探索和考察所带给他的只是一些乱哄哄的声音。至于那些党派组织和华人社团，他也是旋进旋出，俱不称意。当这一切都无法满足他的渴求时，他开始了这一生中最长远的跋涉。1927年7月，年仅21岁的束星北离开美国来到日本、朝鲜。在那小驻后，便假道满洲里来到苏联。苏联的革命和新政权给全世界带来了希望和不安，也是他此行考察的重点。他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谋了个文秘的差事，一面工作，一面对一个新政权进行考察。他本期望着从这个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中能获得一些启示和借鉴，可是革命成功后的苏联给他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最初的我从报纸广播中了解到取得新政权的红色苏联在一系列的改革之后，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取得了按劳分配、各取所需、安居乐业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眼前的一切却让我失望，我所看到的几乎到处都是肮脏的黑市、摇摇晃晃的酒鬼、昏昏欲睡的车夫和失去廉耻的妓女。为了巩固政权，几乎天天都有枪杀。"⑦

深感失望的束星北很快就离开了苏联，假道华沙，来到了欧洲的科学中心德国。在"柏林、哈奴佛、汉堡等地混了一阵子"。⑧他的游历与探索生活便告结束。据他自己所称，他之所以在德国结束自己的探索和考察，一是走了十几个国家后，并没有看到自己真正期望的东西。到处似乎都在上演着同样的故事：战争、内乱、饥饿、贫穷。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声音，他不能够从这些乱糟糟的声音中听到他所期望的真理。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让他徒生无奈，对社会体制与制度的探索和考察为主要目标的游历在德国宣告结束，他按捺住一度被"声音"激得沸沸扬扬的心情，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



他不再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劳心费神，他开始心神专注地钻研思考真正属于自己的事情了。

离开德国后，经同学的介绍，他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博士的身边，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基础物理和数学的学习。惠特克(E · T · Whittaker)和达尔文(C · G · Darwin)博士当时已称名世界，特别是惠特克的理论物理更让他心醉神迷。惠特克的分析力学(Analytical Dynamics)被圈内人士奉为经典，以后束星北在浙江大学教学时，常常提到惠特克的分析力学(Analytical Dynamics)。他曾对学生讲，搞理论物理的必须认真读懂惠特克的分析力学(Analytical Dynamics)。他还给研究生专门开过一门高等分析力学。而这门高等分析力学也是与惠特克分不开的。

束星北在两位大师门下受到严格的训练。学业提高速度有如神助，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以一篇《论数学物理的基础》(On the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al Physics)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1930年2月，由惠特克和达尔文博士的引荐，束星北来到狄拉克所在的剑桥大学，从师于著名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爱丁顿毕业于剑桥大学，历任母校教授和天文台台长。曾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天文学会会长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主席。爱丁顿还是恒星内部结构理论和变星脉动理论的创始者，他发现了恒星的质光关系，在恒星大气理论、恒星运动、相对论、量子论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但在多数人眼里，他对人类最突出的贡献是利用日全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1916年，爱因斯坦在他的老同学格罗斯曼的帮助下，完成了广义相对论。在这个被称为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中，引力是最重要的主题。牛顿力学认为，任何物体既有惯性质量，又有引力质量，牛顿第二定律中质量是惯性质量，而万有引力定律中的质量是引力质量。但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是相等的，把它们通称为质量。可是这种相等是偶然的吗?

狭义相对论与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也存在矛盾。在牛顿看来，引力是即时作用，引力场就像一个绝对时空的载体，这当然为时空的相对性观念所不容。爱因斯坦将相对性的原理推广到引力场中，指出引力场就相当于一个非惯性系，人们对一个物体是正被加速还是正处在引力场中无法作出区分，这一点被称为等效原理，而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相等是等效原理的一个自然的推论。广义相对论认为，由于有物质的存在，空间和时间会发生弯曲，而引力场实际上是一个弯曲的时空。

广义相对论首先解释了水星近日点的进动，这个进动曾经被天文学家勒维列用行星摄动方法进行了解释，但谁也没有发现有“火神星”在那里摄动。爱因斯坦用太阳引力使空间弯曲的理论，解释了水星近日点进动中无法解释的43秒。

广义相对论第二个大预言是引力红移，即在强引力场中光谱应向红端移动。20年代，天文学家在天文观测中证实了这一点。

广义相对论的第三大预言是引力场使光线偏转，这一预言最为世人注目，因为它最终

得到了天文验证。最靠近地球的大引力场是太阳引力场。爱因斯坦预言，遥远的星光如果掠过太阳表面，将会发生1.7秒的偏转。这个预言很难验证，因为大白天太阳太亮，看不到星光，晚上能看星光太阳又下山了，惟一的机会是在日全食的时候。为了验证这个为很多人怀疑的预言，1919年，英国政府在爱丁顿鼓动下，派出了两支远征军，一支由爱丁顿率队到非洲西部的普林西比岛，另一支来到南美的索布腊尔。两支队伍带回了很多日全食的太阳照片，经过反复比较核对，最后的结论是星光在太阳附近的确发生了1.7秒的偏转。由



>>>>>>>>>>
1928年，束星北赴美前夕在中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公馆前与全家人合影留念。

于爱丁顿的验证，爱因斯坦的地位才从此确定下来。爱丁顿无愧为"科学英雄时代"的杰出大师，他能凭着自己深邃的目光最早地发现"相对论"那太阳一般的光芒，并预言这个时代乃至下个时代，将是爱因斯坦的时代。在爱丁顿身边，束星北开始系统地接触到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与发明——相对论。他认为，在自己遍访名师的历程中，给他影响最大的便是这个爱丁顿。正是在他身边自己才真正接触到了物理之核。

最初，束星北对相对论的兴趣来源于一本讲四度空间的科普小说，那本只有一百个页码的小说曾激发出他许许多多的奇思妙想。他认为那些奇思妙想尽管只是一个少年的童话故事，却又是他的追求之源。他以后的一切发端，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的。当然真正开始接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在之江大学。那时虽不能究其所因，但大师的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性、质量与能量的统一性、它们既是统一又可以相互转换的观点，让他浮想联翩，激动无比。他不断地让国外的朋友、同学帮助他搜集一切有关的资料和书籍。他曾形容最初接触到相对论时的感觉：就像沙漠中烈日下干渴的跋涉者，突然发现了一眼甘泉。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尽管他对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心仪已久，可是拨开积云，让阳光落下来的还是爱丁顿。作风严谨不苟言笑的英国人爱丁顿不仅是爱因斯坦的好友，最早研究广义相对论的权威，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教育学家，他从来不用条条框框来限定自己的学生，只是对他提出个大致方向或思路，以后的路皆由学生随意地自由地驰骋，走偏了走远了都没关系。爱丁顿会定期坐下来同他交谈。他从不强迫学生做什么，怎样做。有时交谈会变成争论甚至争吵，也没关系，爱丁顿不会因对手只是一个还没有出道的毛头小伙子而在意。爱丁顿喜欢争论，欣赏争吵。多年之后束星北登台讲学时，常说起这个可爱的英格兰老头：好的老师会在恰当的时候，在你的脑门上轻轻一拍，你晦暗不清的脑袋突然就亮了起来。

1928年，也就是束星北在爱丁堡大学学习的这一年，物理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结合起来，提出了电子的相对论运动方程，即著名的狄拉克方程。这一方程后来被物理大师们称为：用最简练的文字概括出的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的方程。这个方程奠定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基础，赋予了真空以新的物理意义并预言了正电子的存在。这个天才的理论很快就引起了世界科学界的轰动，也引起了束星北的导师达尔文的极大的兴趣。达尔文以他敏锐的目光和雄厚的实力最先在科学界取得了对狄拉克方程的严格的解。束星北几乎目睹并学到了导师对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狄拉克方程的提出，不仅受到达尔文的关注，世界上许多有关学者都对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图画"产生了兴趣。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对方程的数学基础和表现形式的完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爱丁顿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在观察琢磨了别人的研究方法后，决定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他试图用黎曼空间度规来表达狄拉克方程，并取得了成效。作为合作者，束星北几乎参与了老师的整个研究过程。

为了继续深造，1930年8月，已渐显才华的束星北被爱丁顿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系助教，师从著名数学家斯特罗克教授(D · J · Struik)。在他的指导下，继续对狄拉克方程进行研究。1931年5月，束星北完成了硕士论文：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Introductory Study of Hypercomlex Number Syst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Geometry》。这篇文章使他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他的这篇文章思路方法独到新颖，实际上已超越了导师爱丁顿。他在描述"最美丽的图画"数学基础和表现形式所使用的方法上，也更富有灵性。他利用广义超复数系，通过黎曼空间度规的线性变化，推导出一些与黎曼几何类似的结果，并在四维情况下，得出了狄拉克方程，使狄拉克相对论电子方程具有更合理的数学基础和更完备的表现形式。就在束星北即将完成他的构想时，发现著名科学家福克(V · A · Fock)和伊凡宁柯(D · Iwanenko)也开始作类似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思路都基本相同，只是运用的方法不同。束星北在这项研究中应用的广义超复数系，其性质已与著名的克里福特(W · K · Cliffod)群类似。显然那时束星北还不知道有克里福特群。克里福特群实际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引入量子场论研究，从而受到科学界

的广泛的关注。30年代狄拉克方程的研究是科学界最前沿的课题，束星北早早就有了克里福特群同样的思路，并将这种方法应用于量子力学中。这说明他的科学感觉和思路是非常敏捷、超常的。⑨

束星北将克里福特群引入量子力学的同时，还对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作了独到的研究。爱因斯坦的引力场几何化成功之后，马上就产生了用类似几何概念来描述电磁场的愿望。华爱尔(H · Weyl)、爱丁顿和爱因斯坦本人都曾经想通过对黎曼几何的修正，把用于引力场的广义相对论推广于电磁场，但都没有成功。束星北也试图探索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考虑到引力场与电磁场的根本差异，他提出了用质量密度 ρ 和虚数电荷 ι δ 之和 ρ + ι δ 代替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能量——动量张量的质量密度 ρ，从而导出一级近似的复数黎曼线元，实数部分正好代表引力场，复数部分正好代表电磁场，由之进一步导出麦克斯韦(J · C · Maxwell)方程组和罗伦兹(H · A · Lorentz)作用力定律。束星北将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物理期刊》上并将它寄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很快就回了信，对他的论文提出了几点意见。束星北在论文的文尾还提到了爱丁顿，显然论文在写作过程中也受到过爱丁顿的帮助。在今天的物理科学家眼中，这篇论文尽管有些地方值得推敲，尽管它不可能解决爱因斯坦终生未能解决的、即使今天也仍未解决的统一场论这个广义相对论的难题，但是束星北能抓住物理本质，巧妙地把引力场与电磁场结合起来，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在当时，不能不算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尝试。⑩

束星北本打算在麻省理工学院多待些日子的，对他来说，很多课题和想法都刚刚开头。可是母亲却让他回家与葛楚华结婚。一封思念而又不失威严的信改变了他的计划，也改变了他的命运。1931年9月，束星北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回到战乱纷扰的国家，从此再没出去。

注释

①张再生：《束星北教授的家世和少年时代》，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122页。

②同上第122－123页。

③同上第123页。

④同上124页。

⑤同上124页。

⑥《束星北自传》，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第12页。

⑦《束星北自传》，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第3页。

⑧《束星北1954履历表》，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⑨据李寿枬：《才华横溢的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三期第61页。李寿枬，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研究员（曾任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40年代留在浙江大学师从于束星北。

⑩同上第64页。



2.东方剑桥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成功的根基便是"求是"。林启创办的"求是学院"的求是倡导，在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已化为一种精神。有了这个精神，浙江大学就有牢固的底气，无论社会怎样动荡，风云怎样迭起，都不会让大学随风偃伏、失去方向。



求是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浙江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缘于两个人，一个是清廷命官林启，另一个是气象学家、教育学家竺可桢。

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学院是变法图存的产物。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国外列强在通商、通关、贸易等各个方面获得的特权越来越多。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却无能为力，只能以一味退让来求江山稳定。外患日亟，国势日衰，深受创痛而不堪其辱的有志之士以挽国家颓势为己任，纷纷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则认为"非变法不足以图存，而启发民智、培养人才，实为根本要图"。于是谭嗣同、梁启超在湖南创办了时务学堂，北京有康有为主持的强学会，上海也出现了强学会分会。深受兴学图强影响的浙江也不甘其后，遂于1897年(清光绪廿年)创立了求是书院。① 求是书院是中国四所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创办人林启，字迪臣(1839—1900年)，早年出任陕西学政时，便以重"学风"著名。后出任京城御史时，曾应诏提出四项改革主张，即：简文法、汰冗员、崇风尚、开利源。其中第三项主张"崇风尚以挽士风"，要求废止以制义词赋小楷取士，主张会试考诸史，廷试考时务，以重实学。以后因抗疏谏请停止营造颐和园以苏民困，触犯了那拉氏，外放浙江衢州知府，1896年调补杭州知府。他守杭三年，以"勤于治理、勇于赴事"著称。在政治上他同情载湉而深恶痛疾那拉氏，曾对学子谈话时自称是属于"保皇党"(光绪派)的……林启在杭州任内，鉴于当时科举弊端，认为要振兴实学、策励图强，必须学习欧美文化和对教育制度有所改革。于是他在这方面推行了三件新政：一是鉴于八股束缚文教，改以策论取士；二是派遣留学生，学习传播新知识；三是兴办学堂。②求是学院成立之初，正是科举未废(戊戌变法曾暂废，政变后即恢复)，林启亲自担任学院的总办，向学生们颁发《明夷待访录》、《天演论》、《求己录》等必读书目，其意在激励志气，养成民族意识，进而灌输欧西新思想，以谋自力更生。在他的带领影响下，一些以科举求名的举贡生监及尚未预试的学子，竟"舍此利禄必由之途而入学堂、学西学，显然为后来接受革命思想之张本"。③在林启的一手缔造下，求是学院逐步形成他所主张的"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讲求实学"的风格。④林启认为培养"讲求实学"的人才，就是培养船学、矿务、种植、制造等"切于时用"的人才。求是学院无疑是全国自创办新式高等学堂最成功的范例。它不但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学家、科学家，如章炳麟、陈独秀、夏元瑮、陈榘、何燏时等，也使"求是学风"有了根基。



图为浙江大学湄潭分部大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竺可桢率领全校师生辗转西迁，初迁江西天目、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

1940年2月迁至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办学七年，直至抗战胜利。西迁历史被称为"文军长征"而载入中国高等教育史册。

林启时代虽然不长，但开办新学，树立求是学风的意义对未来的浙江大学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人称浙江大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浙江大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是由竺可桢一手创造的。自民国以来，中国出了两个为教育界公认的杰出的教育家，一个是蔡元培先生，另一个便是竺可桢先生。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招收女生，首开风气，聘请教授，新旧并蓄，在中国教育界具有开山创基之功；而竺可桢高风亮节，廉洁自守，海纳百川，特别是在内忧外乱的抗战期间，率领流亡大学，颠沛流离，而仍弦歌不断，人才辈出的业绩，更是无人可媲。

竺可桢，字藕舫，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省上虞县，1909年遵从家父之命考入了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的前身)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第二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考录的70人中，竺可桢以第28名的成绩入选。初履异国，竺可桢便放弃了土木工程专业，报读了美

国伊利诺大学，改习农业。他说服自己的理由是："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伊利诺大学毕业后，念及气象与农业的关系，他又转入美国哈佛大学地学系攻读气象学。在世界著名气象学家沃德教授、麦坎迪教授的指导下，竺可桢很快就拿下了硕士学位。为了继续深造，竺可桢申请延长三年研究时间并得到批准后，开始了他的成果收获期。他的《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台风中心之若干新事实》等多篇论文相继问世，并在美国气象学界造成影响。1917年竺可桢被接纳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同年还获得了伊麦荪奖学金。一年后，竺可桢精心研究写成的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通过答辩，被哈佛大学授予博士学位。

回国后，竺可桢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创业梦想。他先是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的前身)任教，待条件稍加成熟后，便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和今天的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地学系，并由他亲自管理教授。这所由他创立的地学系从建制到教育方式都是最好的。它与历史较久的北京大学地质系南北相映，成为培养中国地学人才的两处摇篮。1927年，竺可桢应蔡元培、杨杏佛的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观象台筹备处常务筹备员，此后，他以气象研究所筹备主任、气象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等身份，开始了中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与发展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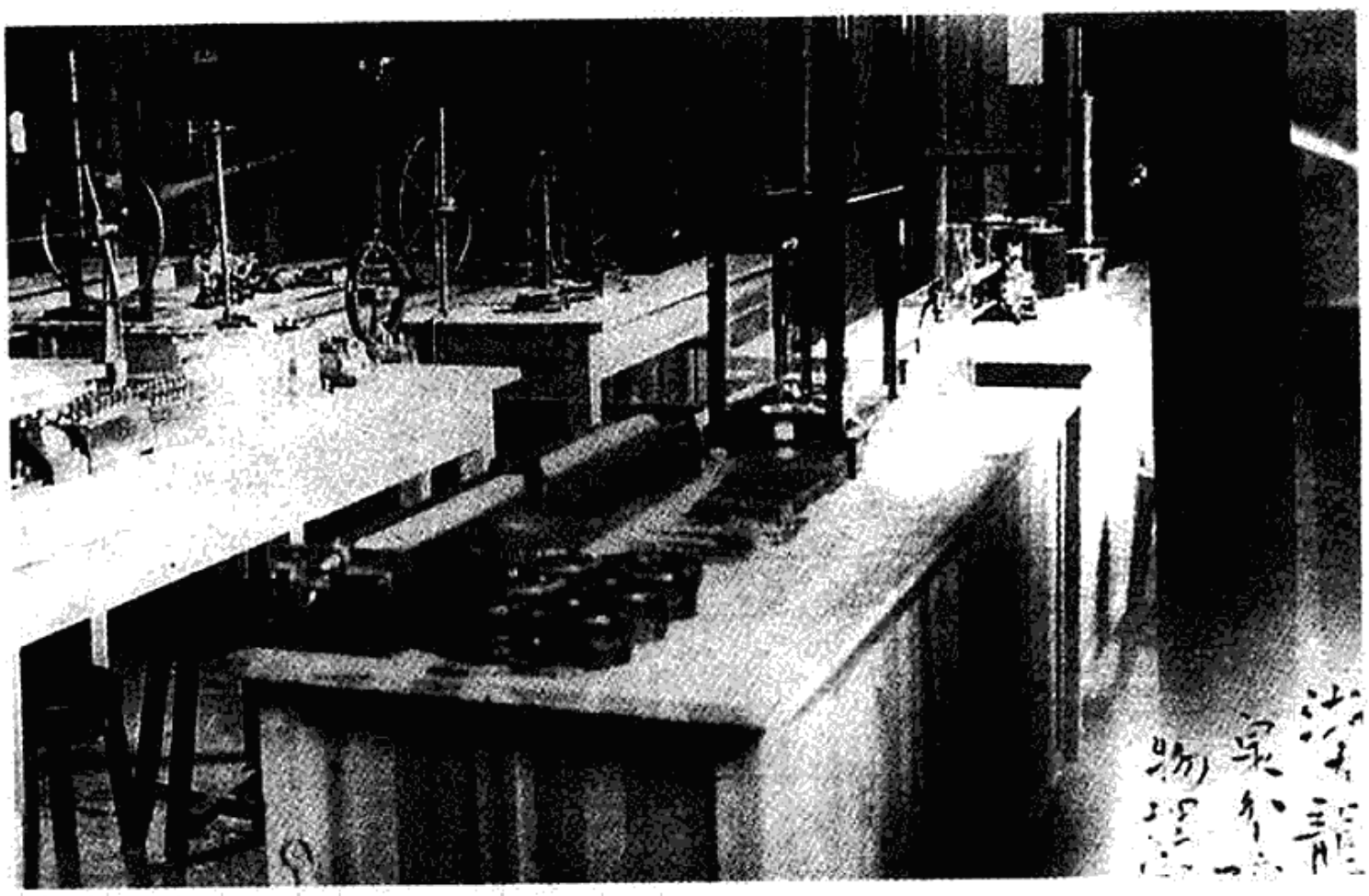
1935年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因在大学强力推行军事化管理、随意开除学生、解聘教授、挪用物理系专用资金等劣行，激怒了学校师生而被驱逐。大学校长的位子第一次出现了空缺。也许因为这个位置太显赫，最初竟没有敢问津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大学对所聘人员就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对所聘教师的要求是：学问好，教学方法好，品行好。对教授要求公认的三个标准是：一要品德高尚；二必须是学识渊博的欧美留学生；三在社会上要有公认的威望和相当的活动能力。这样的标准，使得一些极备才学的人望而生畏，有的即使是最终选上也会因"或兼顾为难，或风裁太峻，或崖岸自高，或资望较浅"⑤而离去。



李政道的物理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图为20世纪40年代湄潭物理实验室。

找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教授人选尚且不易，便何况一校之长了。浙江大学校长的位子最终还是由蒋介石亲自圈定了竺可桢。

竺可桢无意这个"位子"。一是大学校长事务繁忙又要同官场打交道。他不善人际关系，自觉难伺候好部长或委员长，最主要的是，他放不下他的气象研究所。他从事地理、气象教学和研究已有二十多年，已对中国气象学方面的研究下足了功夫，颇有些国际水平的成果，在气象建设方面，如气象广播、天气预测、高空探测等都才开始，许多基本建设刚铺开了摊子，特别是人才的培养还未成熟，这一切都使得他难舍难离。可是亲朋好友大都支持他，特别是他的夫人张侠魂也希望他出任校长一职。



浙江大学龙泉分校物理实验室．设在龙泉县坊下村(1940年)。

最终他虽然决定出任大学校长，却还有所保留，他只是将自己作为一个"桥梁"，一旦学校走上正轨，就自动退出。竺可桢在上任之初，往访陈布雷告以此意(实际上是通过陈布雷转达蒋介石)，并提出三项条件："1.财政须源源接济，2.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3.时间则以半年为限。"⑥在得到委员长的明确承诺后，竺可桢走马上任了。最初只想为下一任作为"桥梁"的竺可桢，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13年，并将浙江大学办成了全国最好的大学。

一所普通的大学，在战争纷扰的环境里，迅速地脱胎换骨，成为中国的第一流大学，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的奇迹。



竺可桢打造浙江大学的形式与手段很多，概括起来可为三点：一、选聘优秀教授；二、增加图书设备；三、奖励优秀学生和贫寒子弟。三点当中，选聘教授最为重要。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教育成功与否，系乎学风的优劣，而教授的人选，为教学质量和转移学风的动力。白鹿书院、鹅湖书院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有朱熹和陆九渊；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有汤姆逊、卢瑟福；哈佛大学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有罗伊斯等。为了让浙江大学也能够跻身世界名校之林，竺可桢"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⑦因抗议郭任远军事管制和挪用物理系设备专款而辞职的教授一一都被请了回来，如陈建功、苏步青、贝时璋、郑晓沧、黄翼、蔡堡等，这样的班底实力已非常雄厚了，但竺可桢仍觉不够，他专门将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原交通大学教授胡刚复请来，并委以文理学院院长重任。化学家王琎、农学家卢守耕、机械工程学家周承佑也陆续被请了进来，远在山东大学任教的王淦昌也是这时候被竺可桢请来的。

教育界素有门户之见，蔡元培难脱此习，浙江大学也不例外，竺可桢却打破了这个大学的积习，不问留美、留日、留欧，也不问南方北方，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委以重任。竺可桢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品格很快在教育界击出波澜，当时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为竺可桢而来。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并认为能够胜任浙江大学的某个位置，尽可以向竺可桢写信或当面陈述。多数情况下希望是不会落空的。

谈家桢

（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遗传学家，前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

我是一个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求学的学生，但是我只信科学，不信迷信的。在东吴大学毕业以后又进燕京大学研究所。到1936年，我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就想回国。那时想早些参加祖国的科学队伍，与全国科学家一起为发展中国科学而努力。后来由于我的美国导师不准我走，结果又多读了一年"博士后"。到1937年，我回国了。在当时，我的母校（东吴大学）要我回去任教，而我又不想回去。因为那里的"洋人味"太浓了。我希望能够进一所我们国家自己办的大学，扎扎实实地为国家，把科学搞上去。可是在那个旧社会里，各校派系林立，学术壁垒森严。一个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要去国立大学教书，可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事也凑巧，我的一位留美同学（即朱元正先生）是东南大学的毕业生，他把我的情况写信给他的老师胡刚复先生。不久竺可桢校长代表浙大给我寄来了聘书，要我去浙大生物系任正教授，并每月给我三百元大洋的工资。我那时才28岁，受到这样高的职位和这样优厚的工资，有点意外。为什么竺先生待我这样优厚？我与他素不相识，既不是亲戚，也不是他的学生。从宗派、体系等等各个方面看都挂不上钩的。从这一点看，在他脑

海中，没有教会学校与国立大学之间这条"鸿沟"，他是一位大公无私、惟才是用的好校长。所以我这个"外来人"也能够进得国立浙江大学任教了。其实竺可桢先生任用教会大学出身的学生任教授还不止我一个。后来听说涂长望教授出身于沪江，谭其骧教授出身于燕京等，也都是教会大学来的。以后浙大搬迁到遵义时，竺先生还聘请了遵义地方的一位牧师方豪先生来教中西交通史。方先生在中西关系史方面很有研究(后来去复旦任历史系主任了)。竺先生就是不管牧师还是神父，只要有才就聘，可见他聘用教会出来的教授决〈绝〉不是我一个人……⑧





竺可桢时代(1936—1949)的浙江大学，被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称誉为"东方剑桥"。

左图：著名地理气象学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

右图：竺可桢和夫人与学生们在一起

苏步青

(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数学家、前浙江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数学系教授)：

竺先生是最爱惜人才的。只要有好教师，他总是毫不犹豫立刻聘请，而且是千方百计地去聘请。所以许多有才干的教授都肯来浙大任教了。谈家桢教授是在1937年从美国回来的。竺先生立刻聘请，他来时才28岁。后来章士钊的儿子章用和曾士炯从德国回来，他知道后也立刻聘请。那时期正在搬迁期中，我们的欢迎会是在警报声中进行的。因为竺先生爱才，所以他们也十分负责。有一次(在建德时)学生问章先生："警报都响了，老百姓都已逃警报去了，我们还上课吗？""怎能不上课。""黑板挂在哪里？""就挂在我的胸前。"这种

精神，就是我们浙大教师特有的精神。章先生他一生从未有用扁担挑过东西，可是他在浙大随校西迁时，就是自己挑着行李与学生们一起步行前进的。他当时还患有肺病，最后他病死在西迁的路上，真是太可惜了。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教授，如罗宗洛、梅光迪、王淦昌、卢鹤绂等等，也都是这样请来的。再以后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来浙大参观，他称我浙大是"东方剑桥"这句话，我是亲耳听到的。当时如无竺校长主校，浙大就不会有这样高的荣誉。⑨

需要说明的是，束星北重回浙大并非一帆风顺。不少浙大元老对竺可桢首批圈定召回束星北表示异议。认为此人个性太强，太冲，难以驾驭。束星北当面责难蒋介石的事被重新提出。

束星北遵母命辞聘回国完婚后，经在国民党蓝衣社任社长的大舅哥恺悌介绍来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他的教学水平和才气，很快就引起了学校的重视。一天，蒋介石来学校视察，按惯例要召见几个军官，束星北有幸给学校点中。在这所由委员长兼任校长的学校，能够得到提名召见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束星北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反而把这次召见变成了"面责"。当时，"一·二八"事变发生不久，国人对国民政府对日政策颇不理解，在束星北看来，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违抗政府不允抵抗日本人的命令是民族英雄的壮举，而国民政府却在十九路军和八十七师与日军血战上海之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是屈辱的卖国行为。束星北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因同恺悌住一幢楼房也知道蒋介石对日寇妥协，对他开起大炮来，把他骂了一顿，但事后出来受到朋友们的抱怨，说我有粗无细，不了解中国情况，后经他们解释，我已变成了蒋介石的崇拜者。"⑩束星北当着众人的面一顿"大炮"，弄得蒋介石很是下不来台，只是说了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蒋介石显然是动怒了。束星北的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据她透露出消息说，蒋介石回到总统官邸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事。束星北也正是因为此事知趣地辞去了物理教官一职，以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两篇文章：《引力与电磁合论》、《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非静力场解》敲开了浙江大学的校门。

但是束星北的"个性"并没有成为竺可桢使用人才的障碍。他被第一批聘回浙江大学，并委以重任。束星北离开浙江大学时还是物理系副教授，重新被竺可桢聘回后不久，便晋为正教授。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的学风、学制显然与他五年哈佛大学的学习与研究经历有关。特别是哈佛大学的前校长埃利奥特，以40年不懈的努力，改进学制，增聘名教授，倡导自由学术研究，将一所普通的学校改造成世界知名学府的经历，给竺可桢的影响颇深。他在教学、学制、学风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他提倡致力于"通才"教育，要求学生既要各有专精，又要文理兼通。他认为学生单学一种技术，并非大学的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大学应该培养的是既有专门知识，又能博学旁通、思想开阔并能担当大任的人才。

他废除了郭任远时期诸种不合理的地方。如强调增加一年级大学生的基础培育，取消了一年级即分别系科、设置专业课程的郭氏"物质主义"的办学方法；在中国高等学府第一次实行了导师制。竺可桢的导师制的目标是培养"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因而，导师不仅要担任专业授课，还要负责指导学生的思想品格。导师一般由各系学识与品行兼优的教授副教授担任。每个导师带五六个学生(最多为十几人)，导师和学生不仅是劝业授课，还要经常接触，包括个别谈话、集体座谈、共餐或一同外出郊游等。通过种种接触，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从近处体验导师为人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⑪保证民主办学，浙江大学除了发挥教授在学术和教育上的主导作用外，还让教授在校务和行政工作方面参与民主管理。为此规定了大学的最高行政机构为校务会议。会议由校长、教务长、总务科长和训导长、各院长、各系主任为当然成员，另由全体教授选举出代表参加。校务会负责决定学校的大政方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竺可桢本着这个宗旨，聘请名师，倡导"求是"校风，一大批国内外名教授纷纷而至。竺可桢时代，无论是科研还是教育皆风光占尽的束星北，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

图为1948年浙江大学部分教授留影。

针、方向。另外，学校还专门设立了教授会、学生自治会、各级级会等，都可以参与学校作出的重大决定。在教学方面，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自觉求知和独立思考研究的能力，各院系高年级都有专门的学术讨论课，师生可以互换角色、轮流主讲，报告新的学术动态或传递新的研究信息。⑫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成功的根基便是"求是"。林启创办的"求是学院"的求是倡导，在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已化为：惟事而求其是，即物而穷其理，乃所以求真的精神。有了这个精神，浙江大学就有牢固的底气，无论社会怎样动荡，风云怎样迭起，都不会让大学随风偃伏，失去方向。浙江大学是竺可桢栽种的并精心培育的一棵大树，科学与民主的

根系已牢牢地抓住了土壤与岩石。⑬

1944年10月，剑桥生物化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李约瑟应竺可桢的邀请，参加了浙江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中国物理年会和中国科学年会。期间，在竺可桢的陪同下，他参观了坐落在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⑭这个由杭州流亡至此的尚在建设中的大学所透出的精神和品质，让这位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惊异不已。

这里峰峦起伏，湄江盘绕，到处是堰坝、水碾、水磨和依山而筑的吊脚木楼。如不是山坳中简陋的篮球场、游泳池和一间间民舍草棚庙宇中传出的读书声，没人会把它同一个全国著名大学联系起来。

在李约瑟眼里，这样一个山寨般的大学天空上竟然飘荡着只有剑桥、哈佛才有的那种学术气氛和自由与民主的精神。

李约瑟将这座活跃在"山寨"里的大学亲切地称为：东方剑桥，并在其所著《科学的前哨》一书中，专门作了描述：

浙大起初虽有三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维持交通，但已经破旧得无法修理，也无新车补充。年高望重的学者和院长们，往来遵义湄潭之间，须攀上满载的军用卡车，途经人烟稀少的郊野，有时竟需历两天之久。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这时关于甲虫类瓢虫所有奇异的色彩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已引起很大兴趣。较有名的工作有磺胺类药剂的衍化物的研究(有几种业经证明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的功效)。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具有广大试验场地的农科研究所，也正进行着很多工作。该所发现本地所产的一种野蔷薇的果实(即刺梨)里，含有多量维生素C，并在枣子里找到维生素P。该所又在研究贵州著名的茅台酒所用的酒曲。这种酒曲除掉酵母之外，还包含特意配入的药材不下28种之多。这种配方是一种特异的例证，显示一种方法，根据几世纪工作的经验，竟能在没有消毒设备的乡村情况下，确实有若干良好的结果。这一点甚至有军事上的重要性，因为一部分盟国军用卡车在中国路面上应用的动力酒精，是从传统方法制成的烧酒送到中央蒸酒厂蒸馏而得的。土壤方面，进行着氢离子浓度的研究和土中微量元素如镍、锌等的研究。特别注重对茶、豆、蔬菜等作物的关系(的研究)。⑮

李约瑟在书中描述的科研成果只是一小部分，"东方剑桥"还有许多研究工作都是处于科学前沿的。如理学院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级数、钱宝琮的《金元之际数学的传授》、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如《中子与反质子》和《五维空间场》(与程开甲等合写)、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绂与王谟显的量子力学、何增禄的光学、朱福炘的应力研究、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罗宗洛的植物生理研究、张其楷对有机药物合成的研究等等，其中不少是科

学前沿的"力作"。有一些如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等，更属世界性的重大发现。

第四届物理年会和科学年会上，还进行了学术交流，因时间关系，只宣读了9篇论文，其中束星北的《加速系统的相对论转换公式》，王淦昌的《中子的放射性》等5篇论文给李约瑟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后，5篇论文被他带到伦敦，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⑯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已建立起科学先进而又符合国情的教育机制，有了这样的机制，无论什么样的环境，大学都能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与生命力。根据浙江大学何增禄教授的不完全统计，仅从1945年到1951年，仅浙江大学物理系在国内外最高杂志发表的论文就有51篇。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4人。在国际合作方面，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函国民党教育部，承认中国7个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牛津大学研究院，浙江大学的名额又排在7个大学之首。⑰

注释

①据《浙江大学校史稿》1982年版第6页。

②同上。

③邵裴子《校史讲述》转自《浙江大学校史稿》1982年版11页。

④《浙江大学校史稿》1982年版第7页。

⑤王国松：《浙江公立文工业专门学校史纪要》，转自《浙江大学校史稿》1982年版第24页。

⑥《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卷18页。

⑦《竺可桢校训词》，《国立浙江大学校刊》248期1936年4月。

⑧谈家桢：《哲人云亡遗风永存——纪念竺可桢先生诞生百周年》，《浙江大学在遵义》第306页。

⑨苏步青：《怀念竺可桢先生》，《浙江大学在遵义》第302页。

⑩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一卷第37页。

⑪据《峥嵘岁月流风遗泽——抗战时期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在遵义艰苦办学纪实》，《浙江大学在遵义》第25—26页。

⑫据《浙江大学在遵义》。

⑬《峥嵘岁月流风遗泽——抗战时期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在遵义艰苦办学纪实》，《浙江大学在遵义》第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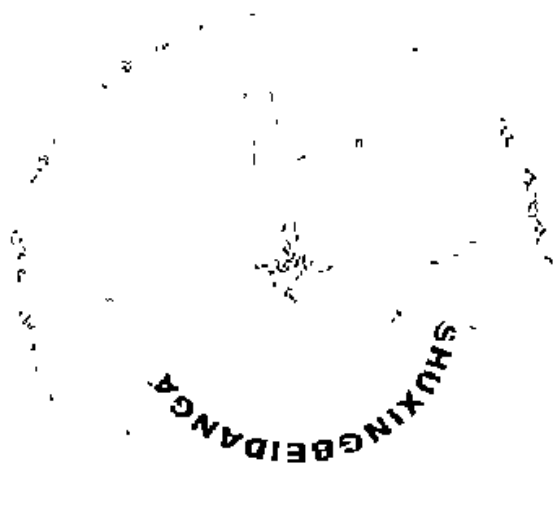
⑭1937年7月7日，日军袭击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本调集海陆空三军进攻上海。8月14日驻扎台湾的日军木更津航空大队开始轰炸杭州。京沪杭沿线皆

遭敌机的轰炸，战火弥漫了东南各省，一些大中学被迫疏散停办或向内地搬迁。浙江大学在日军的轰炸中，坚持了三个月后，开始流亡大学的生活。大学在竺可桢的率领下，自浙皖间的西天目山、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又从吉安、泰和到广西宜山，最后从广西宜山到贵州遵义，共进行了四次迁徙。迁徙的路程超过7000里路。迁徙时间长达一年之久（最后一批人抵达遵义，已是1939年年底了）。大学在遵义县城民房草屋庙宇里安家后，又因城内房屋不敷应用，竺可桢便选定了遵义以东75公里的湄潭县城作为学校分部。稍加修葺，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便在"山寨"安家落户了。

⑭《峥嵘岁月流风遗泽——抗战时期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在遵义艰苦办学纪实》，《浙江大学在遵义》第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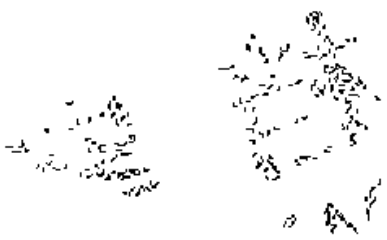
⑮ 据《峥嵘岁月流风遗泽——抗战时期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在遵义艰苦办学纪实》，《浙江大学在遵义》。

⑰ 据《浙江大学在遵义》。



3.天下第一才子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活跃的代表。他的学生程开甲对老师的评价是：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活跃的代表。在一些人眼里，束星北属于那种秉性出众、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他的学生程开甲对老师的评价是：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

许良英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20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

我第一次听束先生的课，是1939年10月在广西宜山，听他为浙大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开的"力学"（即理论力学）课。上课前，听说这门课要从牛顿运动三定律讲起，我很失望。因为牛顿运动定律我已学过四遍（初中三年级的物理，高工一年级的物理课和二年级的应用力学，以及大学一年级的普通物理），以为自己早已懂得，没有什么可学的。而我在上大学前读过十几本关于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读物，知道一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本知识，急于想跳过250年前牛顿的古典理论，径直学习20世纪的新物理学。想不到听了束先生的第一堂课，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完全错了，原有的自满情绪也就破灭了。

束先生讲课的最大特点是：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着重、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地理解整个理论框架。他由日常所见的自然现象出发，通过高度的抽象概括，从各个不同侧面，对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透彻的分析。并不厌其详地动用各种垂手可及的实例，深入浅出地反复论证，使学生能够一通百通地领会、掌握基本概念。他讲课，既不用讲义，也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工整的提纲，而只是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他举止〈随意〉不修边幅，说话非常随便、直率，喜欢在教室里到处走动，还爱坐在课桌上高谈阔论。

力学第一课，他先讲物体的运动，接着讲速度、平均速度、瞬时速度，由此引进数学上的极限和微分概念。然后着重论证，是运动的变化，而不是运动本身需要"原因"。所谓原因，是指外界影响，可以叫做"×"或"鬼"，牛顿把它叫做"力"。以前人们，包括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都以为物体运动总需要有一个推动者在不停地推动着；伽利略和笛卡儿

却发现，只有当运动状态改变时，才需要有外界的影响。就这样，他把古代运动观和近代运动观作了鲜明的对比，把哲学和物理学融为一体。

这一堂课，我听得出神，觉得茅塞顿开，精神上得到很大的享受。就这样，束先生把牛顿运动三定律足足讲了一个月，而其回味无穷。对比之下，以前我虽然学过四遍运动三定律和两遍微积分(离工二年级学第一遍)，也能熟练地运用牛顿定律解决不少力学问题，但对于运动和力并没有形成清晰的物理概念，实际上是似懂非懂。由此我才开始真正领会什么叫理论，什么叫原理……

通过束先生的课，我比较彻底地理解了牛顿力学基本概念的物理内容。对于古典物理理论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开始有了欣赏能力，认识到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重要性，并且开始养成对问题穷根究底的习惯……

在宜山，力学课只上了一个多月就中止了，因为日寇从钦州湾登陆进犯广西，浙大不得不开始第五次搬迁，迁到了黔北遵义。正当我们陆续到达遵义准备复课时，束先生获悉父亲噩耗，即请假赴上海奔丧。力学课由另一位教授代教。这位教授照本宣讲，平铺直叙，引不起我多少兴趣，因为所讲的内容，任何一本力学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我只盼着束先生早日回来。1940年6月束先生回到遵义，给我们讲牛顿力学的发展——分析力学，着重把拉格朗日方程和哈密顿原理讲透，使我们并不很困难地攀登上古典力学的第二座高峰。

我还有幸在三年级听束先生开的"热学"(即热力学)课。他讲热学也像讲力学那样，用一个月的时间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概念。他用高度的哲学概括，把自然界中的变化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可回复的，如人的死亡，生物的生长。一种是可回复的，如2个H_2分子和1个O_2分子合成2个H_2O分子；一个物体从A处位移到B处。而可回复的变化又可分为"真变化"和"假变化"两类。真变化是指：在变化后虽然可以使其中一物或状态还复，但在还原过程中必然要使另一物或状态引起变化；即使再令这种变化还原，可是其他地方又发生了变化。如此继续下去，纵使竭尽种种方法，也终不能使一切事物或状态都恢复到变化以前的情况。两个不同温度的物体相接触所出现的就是这种真变化。假变化是指还原过程中至少可以用理想方法使之丝毫不留任何痕迹于宇宙间的那处变化。卡诺热机的运行，平衡状态下压缩气体，都属于这一类。这样，他就把不可逆的变化称为"真变化"，把"熵"理解为真变化的精确量度，使物理概念增添了丰富、深邃的哲学内涵。①

周志成

(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20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

物理学既是实验科学，又是思辨科学。它从自然哲学演变而来。不论是实验物理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不论是做研究或教学工作，都需要科学的哲学思想的指引，才能出色地完成任务。束先生就是一位有哲学头脑的物理学家，他把亲身的体会贯穿在课堂教学中，



把我们这些初学物理的大学生，一步步地领上了较正确的道路。

1940年秋，我和同班同学金德椿相约从电机系转到物理系。当时工学院和理学院的课程安排很不相同，工学院的选修课极少，理学院的选修课占很大比例，该怎么选才好，金就带我去找他高工同班同学许良英，许帮我们出主意后，接着说，物理系有两位大师王淦昌和束星北，要我们抓紧机会听他们的课。束先生讲得较难懂，但理解后很受用。那一年束开了理论力学，王开了电磁波(相当于现今的电动力学基础)，我都选了，有幸在一年中听了两位大师的课。

……

束先生讲课的内容与众不同，听完别的老师的课，再找一些外文课本和专著来读，就会感到老师在哪些方面把课本的内容深化了。束先生讲的内容，很大部分在书中找不到，而且每一节课都有所未闻，甚至〈都是些〉意想不到的新内容。如果接连有几节课印象不深，我就怀疑自己学习不专心了。我用最珍爱的活页厚道林纸笔记本来记〈课堂笔记〉，但我的笔记能力比同班的邹国兴差得远，他的井井有条，在全系甚至全校都出了名。我一向记得很乱，束先生的思想又跳得很快，怕漏掉内容，来不及消化就记，就更乱了。复习时又加了许多记号和内容，更乱中添乱。就这样一本乱七八糟的笔记本，我视为至宝，从湄潭带到桂林，又从桂林步行背回湄潭，为了减轻负担，把较重的衣被连笔记本的皮面都丢了或卖了，惟独束先生的讲课笔记没有丢。以后它还跟着我到杭州、北京和新疆，派了不少用场，可惜"文革"期间丢失了，因此我不能按笔记系统地整理束先生的物理学观点，只能凭记忆一鳞半爪地介绍一些印象。

束先生讲力学时要我们从最基本的变化即位置的变化来研究物体的运动。例如我们都觉得相对运动不难学，无非是用向矢量减法求相对速度和加速度。束先生说那只是一时一地的〈相对运动〉，真正的相对运动是从一个运动物体看另一个运动物体的全过程，那才是完整的全面的。

……

束先生还特别注意物理量的可测度性，在讲到瞬时速度时，用到了无穷小的概念，他就问什么叫无穷小和无穷大。我们就说小到不能再小，叫无穷小，大到不能再大，叫无穷大。束说这是数学和哲学中的无穷小和无穷大，是理想的，不可测度的，但物理学中研究的量必须是实际的，可以测度的。小到或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认为够无穷小或无穷大了。例如地球绕太阳的公转运动，隔1天，方向的变动不到1°，1小时只差0.04°，1分钟只差0.0007°；速度的数值，1分钟平均只差0.002米/秒，相当于公转速度的万分之七。1分钟内完全可视地球作匀速直线运动，因此1分钟可视为无穷小。如果要求程度不高，1小时乃至1天都可视为无穷小。同样，在静电学中提到无限大均匀带电平面附近的均匀电场，实际上平面大到一定程度，中心附近的电场足够均匀时，就可把平面视为无限大。这番话使我们了解物理学中的无限小和无限大实质上都是近似无限小和无限大的有限量，在以后学到无限长载流导线，无限缓慢的准静态过程都不认为难以想象了。

束先生对牛顿运动三定律讲了一两个月，许多内容都是从未听到、看到和想到的。当时普通物理和中学物理教材对牛顿定律特别是第一、第三定律介绍得非常简略，远没有我国当今教材分析的(得)深入(我甚至猜测因束先生的同事如王谟显先生和学生雷树人参与大、中学教材的编写，而把束先生的精辟分析已渗入到教材中了)……

对于牛顿的第三定律，束先生强调力的相互性和成对性，即作用和反作用是成对出现、成对消失、也即是相互依存的。它们又都属于同一类型的力，或都是万有引力，或都是弹性力，或都是摩擦力，绝无例外。而且不论相互作用的物体作出什么样的运动，这个定律永远成立。实验证明，根据这个定律推出的动量守恒定律对高速运动的微观粒子依然成立。即定律的应用范围超出了经典力学范围。然后他又分析我们同学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马拉车的力和车拉马的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为什么马和车还能起动？他说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作用在同一物体上即同一马或同一车上，当然不能加速；但作用和反作用力是作用在不同物体上的，对马来说受到车的向后拉力以外还有地面给它的向前的力，如果后者大于前者，马就能加速前进；车能否加速也要看它所受力的合力。所以作用和反作用力决非平衡力，而一对平衡力也绝非作用和反作用。从而彻底澄清了我们对这定律的误解。

在分析系统的动量变化时，束先生强调了划分系统内力和外力的重要性。他说"力举千钧而不能自拔其身"，系统内力的作用和反作用都在系统内部，产生的动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不可能使系统的动量有变化，要改变整个系统的动量，只能依靠外力。把汽车视为一个系统起动时，引擎可使汽车的一部分例如轮子转动，但若没有地面的磨擦力，只能空转，不能前进一寸。从而，他就引入动量守恒定律。在分析系统的动能变化时，他也不把问题局限在质点动力学的范围，而扩及到物体系统的全过程。例如子弹打入冲击摆的过程，他说由于子弹射入到相对地停止在摆内的时间极短，可以忽略摆线的拉力和地球引力的影响，即不计外力，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动量守恒；但因冲击摆块的质量远大于子弹，尽管摆块和子弹间的作用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但子弹的位移远大于摆块的位移，子弹损失的动能就越大于摆块获得的动能，所以在这过程中动能或机械能不守恒，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其他能……

束先生还特别重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他说一切力学定律，都要经得起伽利略变换，即在一切惯性系中都成立。因此他要我们用不同的惯性系来研究同一物理问题，使我们理解尽管在不同惯性系中，外力作的功以及物体或系统的动量、动能及其变动值都不同，而所得结果却是相互适应的。他也要求我们用惯性系和非惯性系两种方法来分析同一个较复杂的力学问题，而求得同一的结果。例如要我们分析升降机和列车加速时其内部的摆的运动，使我们认识到这相当于重力的数值和方向有了变动。这些不仅使我们更深刻地掌握〈了〉力学概念和方法，也为我们学习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打下了基础。

束先生最反对学习上的浅尝辄止、一知半解就自以为是，多次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弄虚作假。他说，有些概念、定理或问题，乍看觉得简单，再思觉得很复杂，又再深思，复归于简单，才真正学到了东西。有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这是难点，往

往也是重点，经千思万虑，终于把问题弄清楚了，这就一通百通，解决了你在物理上的重大疑点，能大大地前进一步。有许多物理学的见解认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这不是神秘主义，也不是老师卖关子不愿说，而是你们还没有想到这一层，老师越说就越糊涂。所以不能满足课堂上学到的，要知一反三，要紧追不放。他还规定，做作业时，不能满足于推算出一个公式，而要讨论公式中每一项的物理意义，还要讨论公式成立的条件，在特殊条件(包括初始条件)下公式的简化等等，推动我们往深处思索。

束先生在讲授力学时的许多精辟见解，远非本文所能概括。可惜我们刚学到分析力学(时)，束先生就因奔父丧回上海了。等他回到湄潭，我们快毕业了，只学了一点狭义相对论。但束先生在分析长度和时间的悖论后说，两个作相对运动的惯性系，你看我的尺、钟短(慢)了，我看你的尺、钟短了、慢了。产生这个似是而非的结论，是由于同时的相对性，理解了同时的相对性，即你的两地同时和我的两地同时不是一回事，相差vl/c^2(v是两惯性系的相对速度，l是两地的距离，c是光速)。公式中出现：vl/c^2或其导数vu/c^2(v是物体一惯性系中的速度)，都是由于同时的相对性。因此尽管我几十年未和相对论打交道，但现在看有关相对论的文章时，不会感到有很大的困难。②

程开甲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防科工委顾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束星北的研究生)：

我第一次见到束星北先生是在1937年秋，那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浙大将一年级新生迁往天目山善源寺上课。一天，束星北先生来到天目山，一年级物理老师朱福炘先生请他吃晚饭，我们几个一年级新生去找束先生，请他和我们谈谈。他当时同意到物理实验室去谈。他一开言便考我们，他摆动一个桌上的天平，问我们为什么会摆动。用这个例子讲，学物理就是要把遇到的现象能分析解释。这就是我们进浙大所受(听)到的生动的物理学第一节课。以后一年中，浙大又迁往江西泰和乃至广西宜山才定下来。那时我们已是二年级。听束先生的理论力学。他的讲法令人感到物理现象和生活(是)融和在一起(的)。就力学(来讲)必须弄清什么是速度和什么是加速度。这是掌握牛顿第二定律的实质。因为速度是相对的，力和加速度是绝对的，而相对加速度只能是运动学上(的)名词。对此有深刻的准确的认识才能对力的特性有所认识。束先生第一次考试出了这么一个题："月亮同时受地球和太阳的引力，而太阳的引力比地球的引力要大得多，为什么月亮跟地球转了？"我们有几个人答对了，他上课时说：我心中十分高兴，你们答对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深思熟虑地(的)将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的)，有深刻的内涵和启发性。你能忘记这个考题吗？像这样的事例在他的教课中很多，大家都说束先生的课难学，但能真正学到手。

我们在二三年级时，经常参加物理系的讨论会，其中有束先生讲的傅里埃变换、光谱

特性，其中他就埋伏了为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而分析研究了光学中的频率和时间分散关系△v · △t～1。其后讲量子力学，直到用Darwin计算的Dirac的方程。但在这之前，他有意的〈地〉从光谱精细结构中的拉莫进动，又加〈入〉Thomas进动来说明，再用Pauli自旋理论，最后一下子进入Dirac理论，使人觉得好的成果并非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使人珍视一个科学真理的来之不易。他常说，"物理学真理是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他结合朱正元讲他如何测量4686这一条谱线及其精细结构来讲相对论量子力学。这样，使学生们认识到物理学是存在〈于〉我们生活实践中的。

1939年我们进入三年级，束先生就开始教数学方法和工具。主要讲：(1)正交函数及希尔伯特空间。(2)格林函数及积分方程。(1)是引入量子力学中的教学方法。但是(2)在当时还不能看到在量子场论或其他多体问题上的应用。1940年年初，〈束先生〉就提出用特异点解微分方程这一方法，可是真正有大的应用一直要在Feynman理论出来以后，这真是令人惊异。这门课因为浙大再次从宜山迁往遵义，没有能讲完。到遵义后，束先生一方面讲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相对论。相对论是作为讨论讲座，教师们都参加听。束先生讲的相对论又是与众不同。他十分强调同时性的物理概念，用了许多Paradox阐明观点，去掉模糊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从以太理论的许多实验中，如以太风等困难〈的问题〉，一步步逼近相对论。〈告诉人们〉相对论在于转变牛顿的绝对时间，是一个革命性的突变。因此，自然要再三强调时间的相对性。对于罗伦兹变换，他是从Maxwell方程出发，达到光速不变的要求从而得出来(〈按〉他说法〈是〉"逼上梁山")。他也向我们演算如何凑出这个变换。因此，听了束星北的相对论，就不觉得相对论神秘，而是懂得认识真理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实践过程，这是非此不可的惟一途径。

在遵义我是四年级了，他开的热力学和量子力学的讲演也很独特，〈他〉着重讲了两种永动机失败的许多实例，并从中得出结论：热力学过程中的规律是只有在可逆变化中。世界上总的熵是不变而且熵可以积分成为状态的函数，其他过程的熵只能单调增加。把熵描述成可以捉摸的物理量，不像一般的〈地〉叙述为数学公式。他十分强调热的概念：只是在能量流入或流出物体时才称为热，其余的不是"热能"，是内能。这样既生动实际又严格的〈地〉描述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给学生一个正确和具体的观点。实际上这是在排除接受常有的热力学中许多错误的认识。

他讲的量子力学，十分强调测不准原理的事实根据，从实际测量中或数学推导中引出：将原理化成与实际等同。但这与实证论(Positivism)不同。规律性只要有实践证明，并非要求每一过程的规律都要重复的〈地〉证明。他讲量子力学着重坚持实践的结果，而不必过分去猜测超实践的问题。这就排除了爱因斯坦等人去寻找隐函数的问题。量子力学本身是一个完全〈的〉系统，并不需要和可能有更多的内在规律，只要严格推导他〈它〉就可以了。比如按量子力学，同一核子为什么先后〈在〉不同时间衰变发出粒子，我们回答这是量子力学讲几率。再问为什么有几率不同，那就问到家了，他指出："你说相同的核子，其实核子本来不都相同的！"这真有些像禅宗惠能回答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从这里可以看到束先生对原理真是深思熟虑，已经深入到哲学



境界了。他引用玻尔在原子光谱和自然描述(Atomic Spectra and Description of Nature)一书中最后的结语，描述量子力学：在这个宇宙的戏剧之中，我们同是观众也是演员。③

20世纪40年代的浙江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学生，对束星北的教育才能是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曾经受教于他的学生认为，对物理学研究得这样精深且又阐述得如此清楚的人国内难有出其右者。就连他的好友王淦昌在谈到他的教授方法时，也很是钦佩有加："〈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课文(本)，也不写讲义，常常是结合日常生活中所遇到事物深入浅出讲解新概念、原理等，讲得非常透彻，学生们都爱听他讲的课，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④

束星北的才华与其在物理学上的水准，从他同王淦昌的关系上也能够反映出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的王淦昌，是1925年清华大学首届本科生，一年后分科进了物理系，从师于叶企孙教授(1898—1977年)和吴有训教授(1897—1977年)。两人都是中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大师和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两个大师都特别强调学生从事实验物理学研究的本领，充分掌握物理实验的技巧，努力提高实验的精确性，把对物理理论的理解建立在牢固的实验事实与基础之上，使王淦昌一涉足物理学就获得了严格训练，并为日后驰骋物理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淦昌1930年考取了江苏省官费留学研究生，来到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放射物理研究室，从师于被爱因斯坦誉称为"我们的居里夫人"的杰出物理学家迈特内。研究所地处柏林郊外的一个叫达列姆的小镇。他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子的实验室里常常工作到深夜。实验室的大门晚上10时关闭，王淦昌只好翻墙越户回到自己的宿舍。只有两种情况使他奔走于柏林城内的校部与小镇达列姆之间。一种情况是去听大师的讲演(他曾听过物理大师薛定谔的几堂波动力学课)。另一种情况是参加每周一次的Seminar，Seminar是德国物理学界群英荟萃的讨论会，王淦昌从中吸取了多少新思想新方法，自己也难以记清了。但是正是这样的柏林城内与达列姆之间的奔波，成为他日后成为物理大师的必要的准备。

1930年到1934年，王淦昌留学德国的四年里，正是现代物理学史上的黄金时代。量子力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狄拉克提出空穴理论，预言了正电子的存在；泡利提出了中微子假说，以解释β衰变的连续能谱；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安德逊在宇宙线中找到了正电子；费米提出了β衰变理论；约里奥和居里夫妇二人发现了人工放射性。滚滚海潮般的前沿理论和科学发现，冲击着迈特内和尤重实验物理学的王淦昌。他和老师敏锐地捕捉辨识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这一年，王淦昌两次在柏林大学本部参加了意义深远的物理讨论会。从讨论会上他知道了玻特和他的学生贝克以前做过一个实验，用放射性钋放出的α粒子轰击铍核，发现了很强的贯穿辐射。他们将这种辐射解释为γ辐射。而γ辐射与元素衰变的关系，他的导师迈特内早在1922年就做过实验研究，对γ辐射的性质也作了一些探索。王淦昌的脑子里突然闪出了火花。他对γ辐射能否具有那

么强的贯穿能力所需要的高能量表示怀疑。玻特在实验中用的探测器是计数器。王淦昌想到的是，如果改用云雾室作为探测器来重复玻特的实验，也许就会弄清那种贯穿辐射的本性了。当他将自己这个伟大的设想告诉给迈特内，建议用一个云雾室着手研究玻特发现的这种贯穿射线时，迈特内没有同意。两年后(1932年2月17日)身居世界科学中心的人们，突然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看到了一颗光耀新时代的太阳——查德威克——照亮了柏林上空。那一天，也许只有迈特内心绪复杂地想到，这个"太阳"正是采用了王淦昌两年前向他建议采用的实验手段——用高压电离室、计数器和云雾室——来重复玻特的实验，才证实了那种贯穿辐射的名为中子的中性粒子流，并计算出这种粒子的质量。几天后，居里夫人公布了他们用云雾室再次进行的这项实验的结果，成为查德威克成功实验的佐证。这样上帝将本应该戴在王淦昌头上的193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桂冠戴到了查德威克头上。⑤

王淦昌来到浙江大学后，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是"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

早在1914年，查德威克就发现放射物质辐射出的γ射线、α射线的谱是分立的，而β射线的谱却是连续的。这似乎与原子核处于分立的量子状态的事实不一致，产生了所谓能量危机——即能量似不守恒。玻尔认为，在放射β射线时，能量仅在统计的意义下守恒，对于单个的反应并不守恒。可是，1930年12月4日，泡利在致"蒂宾根地区物理会议放射组"的公开信中提出："在原子核内可能存在一种我称为中子的电中性粒子。"但是泡利对自己的猜想并没有充分的信心。1933年，在中子发现后，费米提出了β衰变理论，认为中子衰变为质子、电子和中微子(即泡利所说的中子)在理论上肯定了中微子的存在。由于中微子不带电，静止质量接近于零，因此这类实验十分困难。1941年前，虽然已有不少物理学家做过这方面的实验，但都没有取得确凿地证实中微子存在的结果。

王淦昌意识到中微子实验的重大意义，虽在抗战颠沛流离中，他却一直关注着这个题目。他所在的理工学院随浙江大学经五次搬迁后落脚在贵州遵义的湄潭，条件极为简陋，国内也没有必需的实验设备，他只能将自己潜心研究证明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写成论文，发表在美国的《物理评论》上，文章发表后，在物理学界引起了轰动。

王淦昌《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把普通β衰变末态的三体变为k俘获中的二体。这就使得中微子的探测有了实际可能。美国科学家阿伦教授据此进行了实验取得了肯定的结果。以后，又经罗德拜克、阿伦等科学家的多次实验，王淦昌于1941年提出的建议，最终在10年之后(1952年)取得了成功。这项成果也成为当年国际物理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⑥

束星北与王淦昌，尽管经历不同，性情更是形同霄壤，可是对科学事业的执着与严谨的精神相同。在专业上，两人虽各有所长，一个擅长理论物理，一个擅长实验物理，但整体实力相当。从学业经历上讲，两人都乘坐过"科学英雄时代"的列车，都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然的人在浙大遭遇后，遂成为"对手"和至交，他们既能相互冲撞

启发，又能相互吸收弥补。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形同两军对垒。如在湄潭时期，两人曾为大学四年级学生专门开设了"物理讨论"课程。课程分甲、乙两种。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主要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实际上是两个人和全体学生共同的讨论或争论，两个主角无论谁登台做主讲，另一个一定会不断地在下面"拆台"，不断地提问插话、诘问"抬扛"，常常使讨论变成了近乎吵架的争论，有时候，两个人竟像顶了牛的小孩子一样，头对头，喊叫着，争得面红耳赤。大教授竟像孩子一样地论争，让学生们颇感惊异新奇，而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

在科学研究上，两人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尽管各有所专，却每有新的题目或思想时，必到一起探索讨论。学生或同事有疑问或新发现，王淦昌一定要将他们引到束星北那里。他常说，束星北鬼点子太多了，你们去讨吧。反之，束星北也是如此，他称赞王淦昌的语言是：他肚子里的货很多，你们得盯紧点。有时两人也就共同关注的题目进行研讨，如核裂变和Bohr的色散理论或β衰变理论等。据程开甲称，40年代初，两人已开始讨论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两人的研究已完全进入国际物理学的先进行列了。

束星北与王淦昌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就卓越，还一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闻名于国内和世界物理学界的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

湄潭期间，束星北的相对论研究也越发地深邃、成熟。在湄潭，他开始从一个新的途径继续对广义相对论进行了探索。他将精力集中在从罗伦兹匀速变换发展加速变换，导出加速变换方程。他认为匀速变换是相对的，而加速是绝对的，其桥梁应当是罗伦兹变换。他力图证明等价原理中时空变化率，从而进入相对论。这种思想是极为大胆新颖的。它实质上等于否定了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只承认罗伦兹变换，放弃了爱因斯坦统一场论，时间空间的弯曲是由相对运动物质的加速而来的：将普遍的时空变成相对于运动质点的时空，而不是一个统一场的时空。粒子物理、场论、宇宙物理都是科学上的难题，远没有得到规律性的认识，因而束星北新颖大胆的思想观点也难以证实，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他敏锐而又独到的思路。没有超凡的实力与功底，是难以进入到这样的科学深度的，这一点，老友王淦昌是从不会怀疑的。

"星北在湄潭的一个比较有趣的工作，是用特殊相对论的原理，推演物质在加速时，也是可以有相对关系的。这项工作很有趣，他把所得结果发表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杂志Nature(即《自然》)上，时间估计是在1944至1945年间，论文是以束星北、蒋素卿两个人的名字发表的。我出于好奇，也将这个公式用一般的相对论原理试加推导，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李寿枏先生最近谈起此事时说，他也曾对此事加以验证，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因此，我们对此深信不疑，认为这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举，在理论界应有所反应。奇怪的是，就我所知，并没有什么反应，这使我大惑不解。但我个人对他的文章是很感兴趣的，觉得立意新颖，很希望以后会弄清楚，究竟这篇文章是否有价值。"⑦

束星北像个巨大的章鱼，除去自己的“专业”还将吸盘伸向所有能够到的地方：死光(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于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他都潜心研究过，有些限于条件没能进行下去，有的出了阶段性成果，有的竟也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功。这说明束星北不但有理论，也有动手能力。

在浙江大学，程开甲是束星北惟一的一个研究生，毕业后又在物理系做助教，跟随束星北时间最久，对他的天赋和智慧也体会最深。他认为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如对量子电磁场的高次微扰的计算，就是一个足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因为量子电磁场的发散不能计算，因而人们无法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可是束星北想出一个点子，“将发散上限切断(Cut-off)，继续进行下去，就可以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实质上已经接近了Bethe计算Lamb Retherford效应的观点(当时Lamb效应还未发现，到1948年才发现)。那时他要王谟显先生用手摇机计算，我用分析方法，对于He的电子能级计算，并得到相同的修正。当时只能作为一个预测的计算，并没有想到以后真会有Lamb效应。这可明显看出束先生的深人远见。但束先生有一个弱点，工作做好就放下，不久就忘了，不然，这些工作以及他未继续下去的其他研究工作(如果能够继续下去并)开花结果，那可以说是十分宏伟的。”⑧

程开甲认为，束星北科学素养与天分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思想与认识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作用，很多见解在今天的实践过程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机遇(的原因)，没能显示出来，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⑨

这个时期，束星北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即使一些老辈称誉他“天下第一才子”，他也欣欣然，既不自谦，也不觉为过。心里本来就有这样的感觉。“我28岁就成了名教授，自持有大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低下去。”……⑩

他自觉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这样的念头，早在1937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扎下了根。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他访问了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有缘与这位量子力学大师相识的。大师在杭州游览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大师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5月23日，12时30分，我们到达杭州，受到从大学来的三位青年科学家束星北、王淦昌、何增禄以及张绍忠教授的迎接。5月24日，演讲之后，我们应邀到市政府赴宴，由于年轻的物理学家们，特别是束博士和我父亲争论得特别起劲，我们迟到了一会儿。5月25日，束博士、王博士和何博士陪着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并不停地与我父亲讲

话。当我们分手时，天正下着雨，但我仍然看到强壮而坚定的束博士面带微笑站立在倾盆大雨中，只为尽可能地与我父亲多争论上几句。”⑪

原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朱福炘曾称，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⑫

凡熟知束星北的人，没人怀疑他的能力和天赋，就如同没有人怀疑王淦昌的能力和天赋一样。以后的日子，如果世界上一个重大发现和新的学说有了他的名字，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实际上王淦昌的经历就是如此。可是束星北的道路却未能这样延续，他早早地从这个如鱼得水的舞台退了下来，并很快就消失了。据称，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以后，束星北又出现在一些关注他的人们的视线里，而那已经是另一个舞台了。

注释：

①许良英：《忆束师星北先生》，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15、16、17、18页。

②周志成：《难得的物理思想家和教育家——记一级教授束星北》，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37、38、39、40、43、45、46页。

③程开甲：《束星北先生的学术思想》，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7、8、9、10页。

④王淦昌：《深切怀念好友束星北先生》，束星北《狭义相对论》序言第1页。王淦昌，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二机部部长、原子能研究所名誉所长，已故。

⑤据《王淦昌传略》《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第228－230页，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⑥同上第237－239页。

⑦王淦昌：《深切怀念好友束星北先生》，束星北《狭义相对论》序言第2页。

⑧程开甲：《束星北先生的学术思想》，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11、12页。

⑨同上第7页。

⑩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⑪尼尔斯·汉斯日记，载《中国科技史料》第11卷(1990)第二期。

⑫据朱福炘采访录，1989年4月9日。



4.第三条道路

束星北认为，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还有一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即使到了政治的急风暴雨时期，所有的人都必须在革命和不革命之间作出惟一选择的时候，他仍坚持“第三条道路”的观点。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对束星北来说，三四十年代的浙江大学是他辉煌的坐标，此后，他每况愈下，再也不曾回到那个高点上。换句话说，他是一条大河，源头曾经波涛汹涌激流澎湃，可是随着百曲千折，一路而下，这条大河却日趋萎缩干涸，到最后以至让人很难想象他辉煌与伟岸的当初。关注他的人有诸多的解释，有人认为是他的家庭与历史造成了他的命运，有人认为是他对共产党的"成见"导致了他的霉运。有一篇文章更是直接将他的不幸归结为来到山东大学后与华岗的冲突与矛盾。种种解释各执一辞，却都失之偏颇。

纵观束星北的一生，他的命运有其更为广阔的背景，就个人而言，他的命运的源头无疑是他的个性和早期经历。他的命运走向早在浙江大学或邗江开沙念四圩江堤上就开始了。因而可以说，是个性和意识形态铸就了束星北的命运。

束星北的个性鲜明如刃，在一代知识分子中极为罕见。这肯定与母亲束大嘴的"基因"和他特殊的经历有关。束星北形象也甚是奇特，在浙大或山大一些师生眼里，个性和才华一样杰出不凡的束星北简直就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奇迹："他是个彪形大汉、身高体宽、犷武魁伟，大概只要用一个手指就能把人提起来；他又是个生活在沉思中的人，无论上课、走路都在沉思，说的话又那么发人深省。造物主真奇怪，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大力士与哲学家——揉(糅)合在一起了……"①

在学术或教育方面，束星北和多数老一代科学家和教育学家一样，严谨认真，从不暧昧苟且，只要发现问题，不管对方是谁，一定要当面指出。与他打交道，若是没有实力底气，是架不住几个回合的。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多大，学问多深，一旦发现下面坐着束星北都禁不住心惊胆战。他会提很多问题，常常会将报告人问得张口结舌，惊慌失措。当然回答不出是常事。"但是有人往往用书上或某人这样说的，用引经据典的方法来回答问题。对这样的回答束先生从不放过，总要问报告人自己是怎样看的，如果理解并同意引用的观点，就可以用讲道理来回答。否则，某某人某某书的说法，不能代替回答问题……"②



姓名	现名	束星北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05.10.
	曾用名	仝上	家庭出身	工商业地主	本人成分	教员
籍贯		江苏省南通市 县市 唐闸镇 村			民族	汉族
原有文化程度		大学	现有文化程度	大学	工资级别	未定
身体健康状况		一般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团、入党，何时转正		未				
何时何地怎样参加工作		1949年5月10日杭州解放，原浙江大学由军管会接管				
爱人情况	姓名	葛楚年	出生年月	1908.8	政治面貌	一般
	家庭出身		本人成分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肄业
	现在部门职务				工作级别	
土改前后家庭经济情况		無區別				

这样的履历表，你我都曾填写过。束星北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山东大学填写的履历表。

于　良

（青岛海洋大学物理系主任，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助教、束星北的学生）：

在学术上，束先生的做派与众不同，他身上有一种"霸气"，这当然与他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出众的才华有关。他不分场合，不讲方式，也不分对象，常常弄得人下不了台。我曾听束先生当年在浙江大学的同事说，束先生即使对他的至交王淦昌也是如此，在浙江大学，两人在物理学术报告会上，常常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有时甚至怒目相向，面红耳赤，好像恨不能要将对方揪起来。但是这样的"争吵"，并不影响两人的关系，他们过后即忘，友谊随着"争吵"而越加深入。他的这种不讲情面、不讲方式的"脾气"，让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名家）尴尬不安，有人婉转地提出批评，他当面也认账，可过后仍我行我素。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束先生是1952年下半年来山东大学的，他到学校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彻底认识了这个早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束大炮"(束大炮是束先生在浙江大学时，同事赠给他的外号)。这年年底，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

王竹溪30年代初就在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论，以后留学英国，从师于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福勒，福勒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的老师，王竹溪在跟从福勒研究统计物理时，与狄拉克来往密切，成为好友。王竹溪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便被西南联大聘为正教授，那一年，他才27岁。院系调整后，王竹溪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以后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1955年)，王竹溪当选为数理化学部(后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当时，教育部要求南北重点大学相互交流学习，王竹溪作为北方的代表专程到了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作了讲学和交流，返程途中，被华岗专门请了来。那天，大众礼堂座无虚席。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教授们大都到场了，华岗校长和一些校领导也来了。这样的场合，我属"小字辈"，因而在最后一排拣了个座坐下来。在我印象里，王先生的学术报告内容广泛，他介绍了国内热力学的学术状况，也谈到了国际上的最新动态和发展前景。当然更多的是谈他自己的认识和成果。他一边讲着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流畅漂亮的公式或重要的概念。我那时现代物理的底子较薄，量子力学也好，热力学也好，虽也知道个一星半点，但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学习，对王竹溪那些排炮般的公式概念也只能是囫囵吞枣。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笔记做好，留待以后慢慢消化。学术报告大约进行了将近50分钟时，坐在前排的会议主持问：用不用休息一会儿。意兴盎然的王先生说不用。他正准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向讲台，他也不做任何解释或开场白，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那里。没人说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大厅上空沉寂了好一阵子后，我听有人小声嘀咕说：束星北、束星北。我一入校就知道了束星北的名字，却一直无缘得见，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里认识了他。

最难受的应该是王先生，他呆呆地"干"在一旁，看看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又求援似的看看台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会场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劲地瞅华岗和其他领导。会场发出了一阵骚动。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别人情绪和反应，也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味在那里"正本清源"。大概是见华岗没有反应，会场渐渐平静下来，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有40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近40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让他坐下来，他都未从。

王先生是周培源的大弟子。据说他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大学的有关领导也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束先生谈话，束先生

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怎么做的。堵得领导没脾气。③

束星北同人们早已习惯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不同。他是个棱型复合体，身上的每一个棱角都异常地锋利鲜明。与那些外圆内方、以柔克刚、“从善如水”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束星北更多的品质是黑白分明、刚直不阿、心口一致，最见不得不公与黑暗。在学术上，他实事求是、锱铢必较，毫无客气可言。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有人因此说他脑子不会打弯，将学术作风带到了生活当中，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了真理或正义，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在熟悉人的眼里，他的秉性品质，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历史上那些率真、豪爽的英雄人物。

这样的品性，使他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回避或沉默，因而，学校发生的一些大事，总能与他挂上钩。如最初发生在浙江大学校史上的两件大事：“驱郭事件”和“于子三事件”，他不但参与其中，还都是主角。“驱郭运动”和“于子三事件”，与浙江大学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有关系，也可以说，是科学与民主同专制与集权的政治斗争。



1952年，“三反”运动中，人民法院在看守所设立的贪污检举箱。

“驱郭运动”发生在1936年。矛盾焦点是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郭任远是1927年浙江第三大学中山大学成立以来(后为浙江大学)的第四任校长。曾任大学文理学院心理学教授的郭任远为了严格教育原则，一上台就在大学设立军事管理处，对大学进行军事化管理，引起了学生的反感。在随后不久爆发的北京“一二·九”运动中，郭任远又联合警察宪兵对呼应北京大学生、上街举行抗日救亡游行的浙大学生进行阻挠镇压，逮捕了学生自治会的12名学生代表，由此导致学生与郭任远的矛盾激化，展开了“驱郭运动”。束星北和浙江大学



的一大批教授，本来就对郭任远的“统治”心存不满，特别是他们得知郭任远将中华基金会拨给学校物理系的实验设备的专款挪作它用时，也加入到学生的运动中。据原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朱福炘称，束星北曾作为理工学院教授的代表到校方责问交涉，当他找到郭任远时，发现他正在酒店里设宴招待客人。束星北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里交杯把盏，上去就掀翻了桌子。

束星北是浙江大学第一个带头辞职的，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陈建功、苏步青等一大批著名教授愤而辞职。国民党行政院迫于压力，终于在第二五七次例会上免去了郭任远浙江大学校长职务。

“于子三事件”发生在1947年。这一年，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日子是非常不好过的，战场上，他们已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战争的主动权不断地丧失，经济和政治危机也日甚一日，生产萎缩，通货膨胀，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因而，这一年也是学生运动最为频繁与高涨的一年。如1946年底1947年初的抗议美国军队在北平暴行的反卖国、争独立的“抗暴运动”；5月20日以“反饥饿、反内战”为主题的“五月运动”，10—11月的“于子三运动”等。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危机日甚一日，因而镇压控制也日甚一日，为了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国民党采取了许多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临时条例，如严禁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还授权各地方政府，对“违法”行为，可断然采取紧急措施。于子三是浙江大学自治会主席，他是在一次外出访友时被国民党当做共产党逮捕的，得到消息，竺可桢校长曾全力营救，可是在狱里，于子三仅被审讯了三天就杀害了。

消息传到学校，束星北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学生而提出了罢教。这在当时风险是很大的。曾担任中共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的许良英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回顾：

尽管束先生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也不同情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但由于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在1947年"于子三运动"中，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大全体教授罢教，以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学生的暴行。1947年10月26日，浙江大学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逮捕，三天后惨遭杀害。第二天上午全校教授集会，在听取了竺可桢校长、校医和学生代表的情况汇报后，束先生首先发言。他说，“我向来不赞成学生搞政治活动，但是，政府如此残酷(地)摧残我们苦心培育的学生，如此践踏人权，我们无法容忍。教授会应该以罢教来抗议政府的暴行。”他还愤慨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不敢罢教！”在场的70多位教授都赞成他的意见，于是以浙大教授会名义作出决议：为抗议于子三被杀，全体教授罢教一天，并发表宣言，谴责政府暴行，要求保障人权。全体教授的罢教，在浙大历史上从未有过，它有力支持了浙大学生和竺校长的正义行动，推进了全国反迫害运动。这次运动随后就命名为“于子三运动”，(它)是解放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当时我正担任中共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于子三运动”后期任新成立的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委员)，对束星北仗义支持我们的斗争，我无限感激。④

有一点需要强调，束星北的品格或骨性异常坚强持久，最初一个历史阶段，他抱定的思想与信念从没有因环境和时代变化而变化，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

于明远

（某大学党委副书记、20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

40年代的学界，束星北的大名无人不晓，他身材高大，操着一口苏北口音，嗓门洪亮如钟，腰板笔挺，像军人一样（时时低头思考问题时，那腰板也是笔直的）。他是浙江大学体态特征最为明显的教授，听说过他的名字的人只要见到他，不用介绍就能对上号。我进校之初，最先知道的两个人就是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都是学生们崇拜的大师，好像束星北的名字要响亮一些。在我的印象里，束星北很像传奇中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曾为了实验设备材料竟与学校总务主任动手过招，飨以老拳，打肿了总务主任的脸；看到缺衣少棉的学生在课堂上冻得发抖，会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他穿上。

这些事都是听说的，亲眼所见的是入校不久发生的"挑战书事件"。那天早上，我和同学去食堂吃饭，见一些师生围在食堂门口争睹贴在门口上的什么东西，本以为是学校通知，凑过去才发现是束星北用毛笔书写的"挑战书"，字写得很大，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期的小字报，大意我还记得：陈某某教授，你向领导揭发检举我利用供给紧缺，囤积倒卖大米面粉一事，皆属污蔑不实之言，望于明日早上七点（挑战书显然是头一天贴上的）在师生食堂门口当众向我作出道歉或与我进行辩论。我们正在议论着，束星北高大的身影已经出现了。他站在食堂门口，一言不发，等着他的对手践约。

显然是个误会。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胜利的后期，大学的生活极为贫困，师生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比比皆是。而贫穷和学校的良好风气，使大学变成了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束星北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部分财产，与其他教授比较起来，手头属于宽裕的。可是在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里，束星北和其他教授的财产基本上是被公有的。他常常托人从大城市买些大米面粉，不仅是自己用，更多的是救济一些最贫困的师生。那个期间，王淦昌、苏步青、陈建功等，都享用过他的"公有物品"。可是那个陈教授却揭发他囤积倒卖，他能不光火？束星北对总务主任飨以老拳，是因为那个主任常常在实验设备和实验材料上设障刁难，束星北也是忍无可忍，可事后束星北自知有错，便主动向竺可桢认错，也当面向总务主任赔了不是。可是对捏造污蔑之举，他却不能原谅，他一定要那个教授当面作出解释或与他辩论，那个教授自然不敢应战，很快就应聘到别的大学去了。

在浙江大学，束星北的故事很多，不过就我个人而言，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徐名冠事件"和"苏步青事件"。（我所说的"事件"，是不在史的"事件"，也就是在个别人的档案上有那么一两笔，浙江大学校志或校史是不会将它当做"事件"的。）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先说"徐名冠事件"。徐名冠是束星北的学生，1944年国民党军令部请束先生去研究军工武器，束先生带了几个教授和学生，徐名冠是其中之一。他们在军令部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如小型发报机、雷达等。抗战胜利后，军令部为了留住这批骨干，要求他们"请委"，并声明"请委"之后才可发胜利奖金，"请委"就是填表加入国民党。束星北自己不"请委"，也不允许他的学生"请委"，可是徐名冠和一些人为了那笔就要到手的奖金，没有听束先生的话，"请委"了。"镇反"时，凡是"请委"的人都受到审查，也有一些遭到逮捕，徐名冠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已是助教的徐名冠遭到逮捕的罪名据说是参加了中统。束星北认为徐名



1951年，青岛市在汇泉广场召开声势浩大的"镇反"大会。

冠"请委"是事实，但绝不是特务，中统的"罪名"要么是误会，要么是个别人的诬陷。当时政府有个划线，抗战期间为国民党做事的，只要没有罪行是不予追究的。束星北便是凭着这一点来替徐名冠游说、"请命"的。

"镇反"是巩固政权的第一场运动，大潮之下，其势汹汹，其浪滔滔，无人可挡。大家都被"大势"鼓动着，都身在其中，都不想被时代甩下来。这个时候站出来"伸张正义"，难免有同政府作对之嫌，更何况束先生在一些进步人士眼中并不干净(一些进步学生或地下党曾将他划为反动教授)。但束星北不退让，他就是这样的人，认定的事谁也别想阻拦。他不断地找领导、找民主人士为徐名冠"鸣冤叫屈"。后来，徐名冠被捕，有些曾为他呼吁的人一看大势已去便适时刹车，只闪下束星北一个人在那里"抗拒"，他像历史上仗剑行侠的英雄一样，宁可伤及自己也要救人于难。

徐名冠的妻子受不住打击和压力，精神几乎崩溃，独自一人跑回了老家，闪下还未入学的女儿流落街头，知道的只恐连累其身，佯装未见，是束星北用一张毛毯将她抱回自己家里抚养起来；狱中徐名冠因受不了酷刑，中途出逃，又是束星北冒着风险把他藏到自己家里。束先生最后找到了沙文汉(那时候他好像是浙江文教厅厅长，不久之后当了浙江大学校长)，在沙文汉的过问下，徐名冠才得到无罪释放。

"镇反"受其牵累的不止是徐名冠一个，凡是束星北认为属于"误会"或"屈打成招"的，他都会站出来。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束星北敢说话，有一些被"扩大化"网进"反革命"名单里的，一发现不好，就会向束星北求救。那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快找束先生"好像是呼救信号，像现在的SOS呼救信号一样，因为也只有束星北听到呼救声音后会奋不顾身地站出来。

"苏步青事件"发生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前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中，"三反"运动本来是上面实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的政治运动，按说，这个决定与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它既然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自然要把知识分子包括进来。在北京，清华大学成立了专门机构"节约检查委员会"。在上海，复旦大学成立的类似专门机构"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其他一些高等院校也大都仿而效之。不久之后，也正是这些机构和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三反"的第一项就是反贪污，所有的教授们都得参加，都得从自己查起。这确实让人非常尴尬，不说吧，显然不行，因为是运动，谁也不能回避。要说呢，又没的可说，一些教授(绝大多数教授)只能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件当做贪污来说。如谁借了图书馆一本书忘了还，谁使了公家的桌子忘记登记，谁用了学校的一些纸张或书钉等等。

最初，大家都没太在意，认为挖了鸡毛蒜皮就过关完事，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始背对背揭发，有些人的历史问题被陆续揭发出来，教授们才感到运动的压力了。苏步青也就是这个时候被人参了一本，成为"重点"的。

苏步青是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浙大最早的部聘教授，曾担任过理工学院院长、教务长。苏步青30年代初就获得东北帝国大学研究院理学博士，从此成为中国在日本获得这个学位的第二人(第一个是浙江大学数学大师陈建功)。毕业回国后，北大、清华、厦大和东北帝国大学都给他发了聘书，可是他却选择了浙大，据说是他的好友陈建功与他有约在先。在竺可桢主持浙大期间，苏步青完成了《射影曲线概论》一书，震撼了学坛。世界著名的德国数学家布拉须凯称他是"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的人品也深为人们称道，他待人诚恳，为人和善，遇事能让则让，在生活和工作上，从不与人争长论短。他又是放牛娃出身，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是浙大公认的大好人。谁也没想到这样的大好人会绊在"三反"运动上。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找苏步青谈话，告诉他有事情没交待，向党打了埋伏。苏步青不知道打了什么"埋伏"，他认为自己清白无瑕，奉公廉洁，绝不做贩夫走卒之流的事情。可是当人家让他仔细想想，浙大南迁时，他是不是保管过一些仪器，他才如梦初醒，知道中了人家的暗箭。

抗战爆发，浙大在竺可桢率领西迁时，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的大搬家，大的设备仪器由学校委派专人负责，部分小的仪器和设施便分散到各系。由于数学系的东西由苏步青保管的最多，再加上归还仪器时，有几把长条凳子落下了(与学校打了招呼的)，有人便作出了他贪污的推理。上面正愁没有典型，苏步青贪污一事便被牢牢抓住。



犹如火炉上的水壶，政治运动是一步步地烧热并沸腾的。1952年2月3日，山东大学学生举着拥护"三反"的标语牌示威游行。

浙大搬迁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仪器、图书、设备多得不可胜数，可是近万里战火行程，没一件(本)损坏也没一件(本)遗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上面还专门表彰过这事。按说，这事无人不知，可是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苏步青讲话。

有人说，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后，知识分子才发生了变化，学会了乖巧，学会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其实不然，趋利避害、趋炎附势是人的本能，很多人的所谓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早在打着小旗走上街头时就丧失了。因而，这个时候，束先生站出来时就显得很孤单。

束先生一开始就对"运动"很有抵触，他认为让一些清清廉廉的教授去扒翻"鸡毛蒜

皮”，实在是有辱人格。他曾串联了一些人，去学校提意见，为苏步青讲话。可是一到动真格的了，那些一度曾信誓旦旦、义愤填膺的教授便开始支支吾吾，王顾左右而言他。苏步青一向把名誉看得和生命一样，思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既能保节又能保命的路子，便想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束先生得知其情(束先生当时与苏步青住邻居，消息是其妻子苏松本告诉他的)，先去稳定了苏步青的情绪，而后就闯进了设在院办的运动核心小组办公室。据称，当他怒气冲冲地闯进办公室时，节约委员会主任正在和人谈话，他冲着那人说，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个什么东西。还没等那主任醒过神来，揪鸡似的，上去就把他从椅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那主任就被打得鼻口蹿血，摔出好几米开外。

苏步青解脱了，束先生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⑤

与很多同代的清高矜持的知识分子一样，束星北对政治(官场)尚抱着戒心与距离。在他眼里，政党，无非是为集团利益服务的。因而从本质上讲，任何政党都是一样的，所谓区别不过是好坏高低的区别。“以为(他们纲领)只是政客想抓权的‘漂亮话’，全是些‘狗皮膏药’。”⑥

对于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他认为是“朋友”或者“主与客”的关系，把自己看成是“客人”，“党是主人”；如此，他与政府的关系便是“东家”和“雇主”的关系。他认为自己是“被党聘来的教授”，学校是“聘老师的东家”。这样从心态上讲，他便将个人与党的关系放在一个对等的关系水平上：“你们主人是请我来教书的，我并不是白吃你们的饭。”⑦

浙大期间，师生们都知道束星北的“政治态度”，他从不掩饰对这个“灰色物质”的反感。他最厌恶的就那些热衷于政治、党派的学生和同事。如果是他的学生，他一定要严加管束或“挽救”，如果是他的同事或朋友，他就会同他们疏远。束星北认为，政治就是政治，学术就是学术，它们是两个完全不能相碰的“专业”，一旦掺和在一起，势必要出问题。在他的眼里，人的标准也被简化为“好人”与“坏人”：“‘好人’是‘公正无私’、‘没有害人之心’、‘爽直忠诚不虚伪’，反之就是‘坏人’……肯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是‘好人’，为自己而牺牲别人的是‘坏人’……”⑧而政治或立场，往往会将人的面目弄得晦暗不清，以至失去人的根本的东西。

抗日战争期间，受强烈的爱国心的驱使，束星北曾一度中断自己的前沿课题研究，专门研究军工武器，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武器等。后被国民党军令部借调到军令部专门研究雷达等军工武器。在军令部，束星北可谓一路顺风，薪水高达一万余元(在当时相当于两个上将的薪水)，并委任他为技术室副主任(虚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令部为了留住束星北，对他加官晋爵，想正式委任他为军令部技术室主任，束星北以从不与任何政治政党相涉为由拒绝。军令部为此而颇为恼火，以不“请委”(填表加入国民党组

织)就不发胜利奖金为名要挟，束星北不但自己不“请委”，也不让他的学生和助教们“请委”，并让学生拆掉已安装完成的雷达，从而激怒了军令部，遭到囚禁。

在束星北的眼里，知识分子是绝对不会与“政治”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第三种人”，因而，他认为，在革命与非革命之间还有一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即使到了政治的急风暴雨时期，所有的人都必须在革命和不革命之间作出惟一选择的时候，他仍坚持“第三种人”的观点：“我不认为，除了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在革命和不革命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第三条道路。”⑨

束星北既不相信共产主义也不同情支持“进步学生”的政治运动。对此他也从不避讳。束星北与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甚至和那些虽有参与意识，却知道如何规避风险、顺应潮流的知识分子也不同，骨子里有着强烈的民主意识和独立意识的束星北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当做一种独立的力量、一个阶层、一个有别于政治的独立群体(浙江大学在早期有这个传统)。一旦遇到事情，良知、正义感和独立意识就会将他推到“判官”席位上，并让他深陷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如前面叙述过的“于子三事件”、“徐名冠事件”和“苏步青事件”。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束星北这个人。1949年5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杭州市，浙江大学的领导和师生们打着小旗纷纷上街与居民夹道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的朋友王淦昌正埋头实验室安装他从美国带回来的直径30厘米的大云雾室。⑩而他却将自己关在家里，研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解放军有关入城条例。

束星北对环境的系数要求很高，如同对实验室的要求一样，客观环境必须符合实验要求，否则就要对实验室进行改造。因而，他的这种个性与品质，很难心平气和地与外界合上拍节，特别是当一个不破不立、推倒一切另起炉灶的时代到来时，冲突便成为必然。

束星北的个性和思想，注定了他步履踉跄、命运多舛的人生道路。他一生中，多次遭遇不测，却都挺了过来(他的扭曲与变化也正是在一次次不测与灾难中积累而成的)，如果不是他的学生许良英的着意保护，他恐怕连新中国第一道门槛“镇反”也过不了。许良英在一篇文章中对当时的情形作了回忆：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了，我离开浙大，到中共杭州市青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鉴于束先生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和军令部工作过，对共产党很不了解，而且敢于直言，对他的处境，我是比较担心的。解放初“反动党团登记”时，听说他主动交出了一支手枪，交代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动组织，我为他感到宽慰。

解放后半年，杭州各校中共党支部陆续公开，这项工作从浙大开始。在浙大支部公开的大会上，当支部书记作了工作报告后，束先生和物理系另一位教授丁绪宝先生相继上台发言。束先生对党组织在浙大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提了不少意见，特别是对浙大军事接管

小组的一个秘书(学生党员)作风提出很尖锐的批评，认为他是"官僚"。当时坐在我旁边的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学校保卫科科长听了很不满意，会后对我说，此人很反动。我告诉他：这是一位学术水平很高的教授，秉性耿直，能主动向党组织提批评意见，总是好的，应该是党的团结对象。

一年以后，全国开展势头很猛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杭州市学校系统的逮捕名单的审查和确定工作，由中共杭州市学校党委会负责。当时我是学校党委会的宣传委员，上述那位学校保卫科长是保卫委员。开会时，他拿出了一沓准备逮捕对象的档案材料，我意外〈地〉发现，里面竟有一本束先生的档案。要逮捕束先生，我当然不能同意，指出束先生没有参加国民党和特务组织(在军令部工作的有很多参加了军统)，他的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不属于政治上的反革命；而且他在科学上的造诣很深，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应该受到重用。主持会议的学校党委会书记(市委宣传部长兼)和其他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这样，束先生总算被保了下来，在这次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这件事，束先生恐怕一直都不知道。⑪

束星北解放初的档案资料；《复杂分子登记表》也佐证了许良英的回忆录：

复杂份〈分〉子登记表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制

1951年4月12日

姓名 束星北，别名 Hsin P.SON，年龄 45，性别 男，籍贯 江苏南通，住址 浙大龙泉馆，成份 大地主，职业 教授，文化程度 留学英美德。家庭关系姓名年龄及职业、详细社会经历〈略〉

解放前的犯罪事实：〈略〉

解放后的罪恶事实：解放后曾主动交出手枪一支，(由其侄交雷达研究所军事代表)军代表曾在收据上写〈道〉："缴获"。很不满意此二字，说我是人民又不是敌人。

雷达研究所徐名冠曾住其家中。

解放初期游行时说，"国民党以前游行也有这样〈的〉规模。"匪特胡步青(被)捕后，曾为胡辩护，说胡不可能是特务。其弟逃〈往〉香港，所留之南通面粉厂由其管理，苏北当局对他很好。暑假回校后反映很好，后个人的政治学习参加较多，整风文献上(画得)满是圈圈，口头上说，佩服毛主席，"共产党真的要能照毛主席的办那中国就好了"，"人民政府再也不能坏下去了，如果再坏下去，中国就要完了。"

登记时在苏北工厂工作，故未登记，回来后，胡济民要他登记，后他说登记条例〈有规定〉：解放战争以前离开〈国民党有关部门〉的不必登记。未登记。



束星北档案

S h u X i n g B e i D a n g A n

在中苏签定友好协定时曾说，"我们的矿产两国平分，太不(公)平了，苏联还不是(和)帝国主义一样。"随后胡济民说他，他说，那我没有弄清楚。反苏思想严重。

抗美援朝运动时说，"不要出兵，屯兵百万在鸭绿江边就好了。"后出兵了，又说，"决(绝)不要打过三八线。"思想非常恐惧帝国主义。曾哭过说，大战又要来了。自称曾写信给毛主席要他慎重，不能过三八线。他说没有靠山只有靠毛主席。

参干运动时，曾鼓励他儿子参军，(其子)现在空军干部学校。在一次会上曾说以前，他认为共产党是挂(簪)羊头卖狗肉。现在科学院要其著一本磁学书，写得很努力，常在实验室内。最近曾告诉李文铸同志匪特徐名冠地址(已交公安局)，他曾说徐恐怕不会是匪特。

其思想甚反动，曾说开会不想到(场)，因为有些话不讲自己痛苦，讲了又怕别人误会。

未登记过有反动活动。

主管单位的分析与处理意见

希上级党委研究此情况，是否需(要)登记，最好登记后进行揭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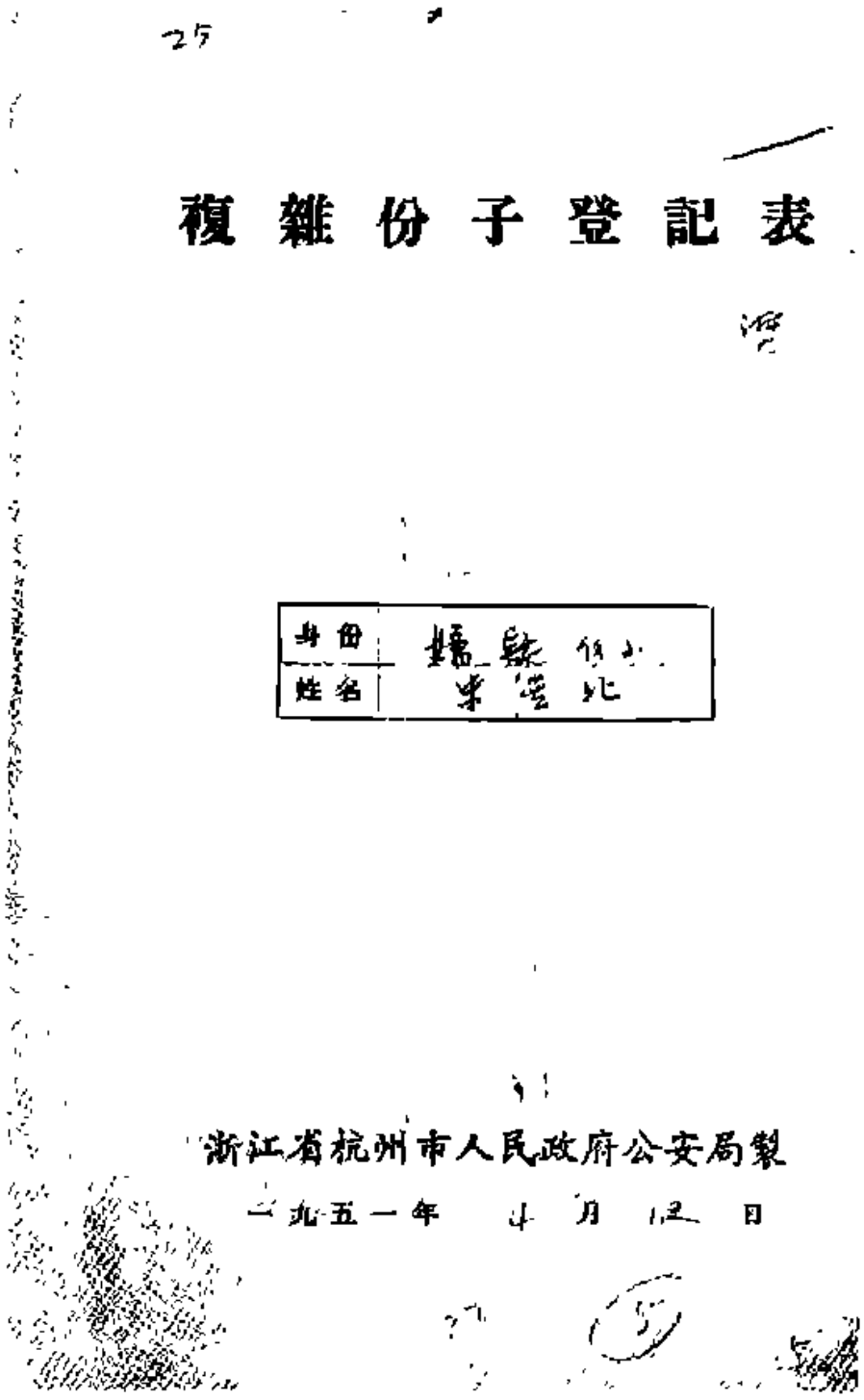
李某某

该犯历史复杂，曾在军统局电训班毕叶(业)，国防部二厅任职，试制小型收报机(自称不是特务，在二厅任职是抗日战争时候，不须(需)办理登记)，而该犯在学校一向言语反动(但有时表现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四款第十条第三款，应予逮捕管训。

伍某

机关负责人意见

基本上认为必须处理，但暂时不动，继续侦察(查)，再作处理。⑫



27

複雜份子登記表

身份	反动
姓名	束星北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製

一九五一年 十 月 12 日

一旦打入"另册"，命运基本就注定了。1951年杭州市公安局为"另类"专门制定的登记表。

其实，束星北并非与谁过不去，起初，他也曾想适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已经落到了河里，如果不顺着水势而行，就会淹死的。因而很想作一番新的认识和调整，以期同别人一样，跟上时代。可是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似乎也明白，只是走起来，那双腿却难与时代和运动合拍，而他这人又不能同他认为不对的事情妥协，因而一切便早早地铸定了。他与时代的矛盾渐次累进，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后，对立情绪开始突出起来。

注释

①周志成：《难得的物理思想家和教育家——记一级教授束星北》，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37－38页。

②胡济民：《怀念敬爱的束星北老师》，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5页。胡济民，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20世纪40年代为束星北的学生。

③于良采访录，1995年2月23日。

④许良英《忆束师星北先生》，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20－21页。

⑤于明远采访录，1995年5月9日至14日。

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11页。

⑦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15页。

⑧同上第15－16页。

⑨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66页

⑩1947年9月，全国选派十二名教授和研究员以美国联合国对华资助(United Service to China)的研究补助金(Fellowship)赴美研究。浙大的两名教授为数学家陈建功(1893—1971年)和王淦昌。陈建功去普林斯顿，王淦昌赴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

由于王淦昌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给美国物理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布罗德教授和弗雷透教授的帮助下，王淦昌和他的合作者琼斯争取到了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NR)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的部分资助。王淦昌完成在美国的研究后，用自己节余资金购买了许多科研用的电子元器件，并带回来一个直径为30厘米的大云雾室。回国以后，他就带着两个助教开始安装这个云雾室。1949年5月3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杭州市。此时此刻，王淦昌正在实验室里埋头做实验哩！据《王淦昌传略》《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244页。

⑪许良英.《忆束师星北先生》.扬州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22页。

⑫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一卷第27－31页。



5.自然科学第一
马列主义哲学第二

如果说，华岗的信念与原则坚硬如铁，束星北的信念与原则也是坚不可摧，两个人在大是大非上都不会稍加退让。大学一些对两人的人格和品质深为爱戴敬仰的老教授们，曾多有调解撮合，却不能稍缓两人钢对钢铁对铁般的越来越猛的碰撞。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BangAn

1952年，中国的教育制度开始按照苏联的模式全面改造，一场全国性的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轰轰烈烈地展开来。已有7个学院的浙江大学进行了一番调整后，仅剩下一个工业大学。这个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无数辉煌并享誉国内外的综合性大学，宣告解散，作鸟兽散的浙江大学的教师、教授开始在上海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重找位置、归宿。束星北也面临着选择。远在北京的王淦昌向老朋友伸出了手，他极力催促老朋友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任职。

1950年4月，王淦昌应钱三强的邀请，到北京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同吴有训、钱三强、彭桓武、何泽慧(1914－)等共同筹划建设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更名为物理研究所)。

1951年，钱三强被任命为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王淦昌、彭桓武被任命为副所长。钱三强因兼任了所外的很多工作，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完全由王淦昌主持。

1952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与近代物理研究所密切相关的“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将被列为中国科学院十一项重点工作的第一项。王淦昌主持制定了近代物理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①这个时候，王淦昌非常希望束星北能够和他一起共谋大业，可是束星北以中国科学院人才济济无须他去添赘为由，谢绝了王淦昌的邀请。有人称，束星北不去北京，主要是中国科学院有一些令他不舒服的人，在他眼里，那些人属于“政治学者”，所谓“政治学者”是指学术造诣不深却热衷政治并活跃于政界的人物。与此同时，山东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也向束星北发出了邀请。束星北选择了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良好的学风和科学自由民主的传统，而且还有着其他高等学校难以相比的优美的海洋环境和浓浓的殖民文化色彩。“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甚大。”②“山大的环境可以说是中国惟一的，背山面海，实在是适于研究学问的地方。”③山东大学一直是学者教授们的梦想所在。

一个大学如同一个人一样，山东大学的“个性”充满了教育家杨振声、赵太侔等多任校长的风格。他们大都是学贯中西：既受过现代西方文化与科学的薰陶，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和儒学风范，因而山东大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起，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管理制度的建制和规模上，都臻于成熟完善。20世纪30年代的山东大学除去与全国一些高等院校具有相同建制外，还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特色——文理合一。这一点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

赞许："山大还有几点特色，是其他各大学少有的……第一，文学院与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因为文理不能划得界限太清楚了，譬如有许多课目，过去都划在文科里，现在却都归为理科了；如果文理两院合并，自然可以使文科的学生不致忽略了理科的东西，理科的学生也不致忽略了文科的课程。所以，山大合并来办是非常好的。第二，是理工两学院都在一起来——我们知道工与理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工就是理的应用，理就是工的基础，两个东西是不应分开的。现在山大将两院在一起来办，自然很经济，而且很容易得到好的成绩的。第三，是农学院能按照本省的农业情形，加以研究，再想法来改良和发展本省的农业，这也是非常适宜的。"④

1934年秋季，王淦昌从德国留学回国后，马上就被聘为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尽管他在山东大学仅有两年的执教与科研生涯，可是山东大学的治学、管理和学术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山东大学设在海滨城市——青岛，风光秀丽，气候宜人，得天时，占地利。校长赵太侔是留学美国的戏剧文学家，办学热忱，处事稳重，属于学者治校的类型。学校设有由教授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各项重大兴革和决策。这既发挥了教授治校的作用，又体现了民主管理学校。那时学校规模不大，有文、理、工三个学院七个系，学生也不多，但教师阵容比较齐整。记得文科有张煦、老舍、洪琛、沈从文、游国恩、萧涤非、孙大雨等等著名学者，多是当时学界之彦。理科有黄际遇、任之恭、郑衍棻、何增禄、王恒守、郭贻诚、王普、汤腾汉、傅鹰、刘咸、童第周等等专家，又都各有所长。工学院虽是新建，也聘有唐凤图、尚津、周承佑、张闻骏等一批知名教授。这个教师阵容，和全国著名大学相比，实无逊色，可以代表那时山东大学的学术水平。

30年代山东大学的学风，较为严谨笃实。教授一律担任课堂教学，效果显著，或可符合"名师出高徒"之谚语。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注重质量，实行学分淘汰制，所以学生都肯勤奋攻读，刻苦上进，形成浓郁的学习风气。科学研究工作，更是学校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记得每周一的"总理纪念周"会上，向例由教授轮流作学术讲演，各系的学术报告会或讨论会，从不间断，全校呈现出学术空气浓厚、学术思想活跃的喜人景象。师生动手编印的各种科学和文学刊物，甚受学术界的欢迎。学生进入高年级后，均须选定专题，由教师指导进行独立研究，以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和开拓精神。在1935年和1936年的两年中，中山文化教育基金会举行全国大学生自然科学竞赛，山东大学物理、化学、生物三系参赛的学生，成绩都名列榜首，为学校赢得了社会声誉。那时毕业的学生，如臧克家、汪志馨、郭质良、庄孝德、张致一等等，都已是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由此可以窥见山东大学的教学质量。⑤

束星北所以选择山东大学，显然是这里"背山面海"的环境和对"将来必成为文化中心

点”的期望。

但是他眼前的青岛，已完全不是老舍、沈从文、梁实秋笔下的青岛，王淦昌给他描绘的山东大学的学术气氛已无从感觉。扑面而来的是沸沸扬扬的政治热浪和诸多的与学术无关的嘈杂的喧嚣。很长时间里，他不知如何是好。

与其他老牌或知名的大学相比，山东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的两校合并。通常那些老牌或知名的大学，在新政权军事接管后，大学的基本教学或研究人员变化不大，而合并后的山东大学，不仅是人员的变化，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在以后的运动或改造中，政治气氛尤浓，力度尤大。这是因为华东大学同山东大学完全是两种环境和体制下产生的学校。

华东大学是革命与战争的产物。它的前身是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临沂山东大学建立于抗战胜利、国内革命战争初露其端的1945年8月，目的是为国内革命战争培养有用之才。其实临沂山东大学只是一个适应战争与革命之需的政治速成班。临沂山东大学的老师大都是革命营垒里有些文化的文职干部，也有一些“弃暗投明”的国统区知识分子和进步开明人士。生源以解放区年龄18岁至30岁的青年为重点，也吸收一部分从敌占区过来的进步青年(吸收敌占区的青年也是当时生源的重点。为了争取敌占区的青年学生入学，学校专门选派优秀的战士，潜入青岛、济南等城市宣传策动青年入校。上海、南京一些城市的地下党也常介绍一些青年学生进入临沂山东大学)。既然是适应战争与革命“速成班”，便没有春雨润物的天长日久，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转变人的思想头脑出发。换句话说，“速成班”的任务和目标，就是为军队培养优秀革命干部和革命战士。大学学习课程大都是：《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论联合政府》、《论人生观》等社会科学和哲学课本。其实，“速成班”是一个地道的军营，所不同的是它参战的机会少一些，读书时间比正规军多一些，歌唱得多一些，小戏演得多一些。

华中建设大学是在华中党校的基础上创办的。1944年冬，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为了解决解放区和各方面革命干部的匮乏，中共华东局决定建立一个为抗日战争胜利后适应各方面需要的革命干部大学。大学根据革命需要只设民政系、财经系、文艺系和一个高级干部班。各系的头目都由华中局的高级干部兼任。

1945年华中建设大学首届招取的学生共400人左右，民政系招收的是区乡干部(实际上大部分是乡干部)，财经系招收的是多少有点文化的地方和部队中的业务干部，文艺系学生多数是来自上海、南京等江南的一些学生。高干班的生源是部队里正团级工农干部，也有很少一部分县级干部。学校师生干部生活为供给制：一天一斤大米，衣服、鞋子等一应生活用品全部由公家统一发给(临沂山东大学的衣服每年两单一棉，从最高领导到战士全都吃一样的大锅伙食，后来专为教授开设了小灶)。大学的教育以改造世界观转变头脑为主，它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没有明确的学制和课程布置，每日的课目便是一些领导轮换登台演讲形势和党的政策，过一段后就开始讲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堂就是每次行军

安顿下来的村头路旁田边或者晒麦场，讲完后便是小组讨论。学习之余便帮助老乡翻地种菜或排练简单的配合战时需要的文艺节目。华中建设大学与临沂山东大学的形式基本相同，也属于适应战时的"速成班"。它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给解放区培养输送用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干部。"双十协定"后，大学的眼光比以前远了一些，它不仅为革命和战争培养干部，还开始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了。"速成班"设立了畜产、造林、农化和纺织、土木工程、应用化学等等专业课程。有了正规大学的初步框架，师资力量也有了较高的要求，大学于是颇费周折地从国统区请来了一些先生、教授。招生规模和形式也是按正规大学进行的。虽然学生没有按既定的计划招来，办正规大学的意图已经很明确了。可是随着国共战争重开，"双十协定"的名存实亡，仅按正规路子办了一年工夫的华中建设大学又回到老路上，其培训宗旨更为明确，"速成"速度也更快了。一般情况下，学员从入学到毕业，期限仅为四个月。在国共战争的头三年半的时间里，两所大学就为地方和部队输送了四千多名干部和战士。这部分人到了建国之后，不少人都成为新政权重要部门的骨干力量和主要领导人。

1948年4月，华东部队，攻克了国民党的鲁中重镇——潍县城。山东除济南、青岛几个孤立的城市还被国民党占据着，全省已成为解放军的天下。为了迎接胜利，适应华东新解放区的需要，中共华东局决定以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的经验为基础，建立一所为革命胜利培养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思想觉悟高的革命干部学校——华东大学。学校设置大学预科部和临时研究班。预科部招收高中肄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学期一年；研究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和大学肄业的青年学生，学期为二到三年，待遇一律实行供给制。学生生源多数为昌潍当地新解放区的初高中生，再就是山东省和苏北老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小学教员，还有一部分从国统区跑过来的进步青年。大学的教育基本与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相类似。教学大纲明确表示：大学就是以提高政治觉悟，坚定革命立场为已任。课程大都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发展史和自编的中国近代史。时事政策为必修课；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联共党史等等。

1949年初，解放军取得了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欲乘胜渡江南下。因而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刚刚要坐下来喘口气的华东大学学员又开始在"服从祖国召唤，接受革命考验，坚持自觉自愿，为中华民族作贡献"的口号下，随军南下了(报名的有两千人，占华东大学所招收学员的百分之九十，实际批准的为一千五百多人)。接着又要成立南下工作队，又先后抽调了两百名学员充实有关军政部门，也就是说，大学才创办了半年，就将还没有坐稳屁股的大学生全都送了出去。一个空壳又开始迅速地向里填充人员。当然也是有点饥不择食的。于是学校很快地从全国十三个省市也包括国统区的十几所学校临时招收了两千多名学生。直到解放前夜，华东大学仍没有摆脱"速成班"的教学形式和训练模式。

直到建国之后，华东大学的"速成与短训"历史才告结束。可是它的班底不可能一夜之



中国教育史上，一次畸形而又无奈的"婚姻"。1951年3月15日，"山大""华大"合校典礼大会会场。

间改变性质：没有教材，也没有校舍，也极少自然学科，师资基本是革命干部与政治教员。因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秀才们想到合校这个一举两得的法儿：合校既能马上解决速成班向正规大学的过渡；又能够解决对旧大学的领导与管理问题。1950年9月，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饶漱石以华东军政委员会名义致电政务院转中央教育部申明其意。中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称：山大与华大合并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饶漱石同志坚决主张的，而且早有准备，因此我部应予批准。1950年12月8日，一千多华东大学的师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青岛，全国最大的革命大学与旧大学的合并史拉开了序幕。⑥

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一个是战火中诞生并适应与解放战争需要的短期干训班，一个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的正规大学。两所大学，历史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

不同，教育制度和组建方式也不同。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校硬性地合并起来，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先例。奇迹是可以创造的，特殊的年代，要奇迹诞生，奇迹就会诞生。

1951年3月15日，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正式合校，3月19日两校在一片欢腾的歌声中举行了合校后的祝捷大会，就任山东大学校长不久的华岗提出了“事理兼顾，舍异求同”的合校方案并宣布3月15日为校庆节的决定，迁并处理委员会主任彭康用皆大欢喜来形容两校合



1951年，华岗校长在“山大”“华大”合校典礼大会上讲话。

并的成功。会上一个突发奇想的学生将一个用松枝野花编织的桂冠戴到了华岗校长的头上，这质朴而美丽的贺礼使华岗笑了，⑦这个细节给祝捷大会增添了些许暖意和情趣。尽管会场始终处在一种高昂与热烈的气氛中，两个学校的人不时相互招手致意，一起热烈鼓掌祝贺两校的合并，却无法抚平堆积在“老山大”心头上的忧虑。他们大都清楚，两校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与差异，而这个差异是无法用掌声和美丽的言词来消弭的。

建国初期，在同类大学中，山东大学的政治运动搞得尤为轰轰烈烈，政治气氛尤为浓厚，这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全国高等学校统一进行的“政治大课”，山东大学搞得极有声势。显然与两校合并的“基础”有关。

山东大学政治大课学习制度是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军管小组接手山东大学后，为了使全校师生认清形势，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便采取了不定期的时事政策报告会。

1949年11月17日，新成立的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及京津19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的改造方针，明确“对高等教育应进行坚决的和有步骤的改造，改造的方向是一切服务于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的学习”。⑧根据会议精神，校委会决定建立学校学习委员会，院系成立分会，制定学习计划，

确定学习内容，编班分组，定期讲授，学生列必修课，计学习成绩。从而将“大课”形成制度。

自1949年冬季开始，由罗竹风〈军管会成员、军管会下设的党总支和青年团团委书记〉讲《新民主主义论》，并聘请在青岛疗养院疗养的党的理论家华岗讲授《社会发展史》和《共同纲领》及有关文教政策。每个星期六下午为政治大课的学习时间，一般不得占用，每两周讲课一次，分班组讨论一次，学习讨论情况各分会及时汇报。为了推动学习和交流经验，校委会还决定自1951年1月1日起将油印的《山大生活》校刊改为铅印，每周出版一期，重点报道学习动态及学习理论的心得体会，同时也报道学校的重大新闻、校委会决定以及有关兴革事项，充分发挥校刊的指导作用，这一阶段的政治大课学习，一直延续到全国院系调整前的1952年秋天。⑨1952年9月院系调整后，山东大学进人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学校的党组、党委合一，由华岗担任党委书记，崔戎、武杰任副书记，委员较以前也有增加，设常委主持党委的日常工作，党委的职权扩大了，成为学校的领导决策机构。新组织的学校党委认为，要把山东大学建设成为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师生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以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破除人们的旧传统、旧思想和旧观念，从而使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的师生，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思想也获得真正的解放。在此基础上，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就可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开拓前进。因此，1953年初恢复因院系调整暂停的政治大课的制度，重新组织学习委员会，由华岗校长、童第周和陆侃如副校长分任正副主任。校学委会决定，在全校教师和干部中(实际学生也参加)，进行为期一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学习，由华岗担任主讲。⑩

那是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大学师生大都有着强烈的了解学习政治的热情。他们渴望了解上面的政策、精神、意志，当然也渴望了解学习马列主义。华岗顺势而为。他将自己对马列的博学，诗人的激情和哲学家的雄辩熔为一炉，使山东大学的政治热潮，熊熊燃烧。

华岗(1903—1972年)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杰出而优秀的才子，也是最早加入革命组织的中共党员之一。早在1924年华岗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入党并到上海担任了团沪西区委书记，不久便被任命为江浙两省联合省委宣传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江浙联合省委进行了改组，分设浙江和江苏两个团省委，华岗担任了团浙江省委书记，负责恢复和重建浙江团的组织。不久，江苏团省委遭到破坏，华岗又调任团江苏省委书记，并兼管团上海市委的工作，随后调任团顺直(河北)省委书记。

1928年5月，华岗受共产党的委派随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10月在上海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长，并主编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

如果说，华岗的信念与探索始终如一，未变的信念与追求也是坚不可摧，两个人在文革大潮上都不会随波逐流，关学一系对两人的人格和品质有突出影响的老教授们，曾多有阐释颂念，却不能佐证两人面对剧烈动荡的思考反应的强弱。







>>>>>>>>>>

一篇"小人物"与"祖师爷"不同观点的学术争论文章，竟成为一个时代学术政治化的"杠杆"。他们自己也不曾料到。

（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思想，批判了《红楼梦》学术研究权威俞平伯的"唯心论"思想，受到毛泽东的重视。）

图为合作撰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李希凡（中）与蓝翎（右）

左图：李希凡此后撰写的争鸣、批判文章发表于此。

1929年3月，华岗离开了团中央，先后担任了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和华北巡视员。1938年1月16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华岗担任了总编辑。在此期间，华岗因抵制王明路线和家长式统治，受到长江局负责人王明的排挤、打击直至撤职。可是他却日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重视。1943年，周恩来将他派往云南做龙云等人的策反工作，此间结识了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等文教界著名知识分子。1945年9月，毛泽东由延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建国"的谈判，华岗被专门召至重庆，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参加谈判。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华岗随周恩来到了上海，担任了中共设在上海的上海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1948年春，华岗身体欠佳，被秘密送往香港治病。中国解放前夕，华岗应召从香港搭船回来，他原计划着先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北京。因吴淞口遭到飞机轰炸，船只得驶向青岛，华岗便留在了青岛。当时，山东大学初被接管，千头万绪亟待一个既有革命资历和实践经验，又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领导来主持。中共山东分局和当地的一些负责人把目光盯上了华岗，应中共山东分局的要求，中央同意华岗留在青岛工作。⑪

在党内，华岗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早在1929年，他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和华北巡视员期间就撰写了《1925年～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这部书被认为是中国史学上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惟一著作。一年之后，华岗在上海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系英汉对照译本）。1920年陈望道首次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华岗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二个翻译者。以后，华岗陆续写出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纲》、《苏联外交史》、《中国历史的翻案》、《五四运动史》、《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等著作。在党外，华岗也有一定的统战经验和同"旧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能力。因而，经过反复协商(周恩来专门为此事同华岗交换了意见)，华岗作为最合适的人选，成为接管后的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

一个新型大学的工作很多，千头万绪从何做起，善抓"牛鼻子"的华岗认为，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目标的问题，要培养适合形势需要的治国人才，必须以新的教育体系代替旧的教育体系，因而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思想、世界观的问题："教学改革，科学研究，学校建设等等，都是依靠人来进行，而人又是受思想支配的，学习马列主义，改造人的世界观，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⑫华岗在大学建立了学习委员会，在各系设立了学习分会，要求在全校范围开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他亲自担任主讲，每两周报告一次，讨论一次。"华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本理论，结合着科学发展、社会进步、研究成败、工作得失的充满激情的演讲，生动具体，说服力强，大受欢迎，引起了青岛市有关部门的重视。每次讲课，校外许多人蜂拥而至，能容纳四千人的广场挤得坐不下，成为青岛一大盛事。他每次讲三个小时，一年讲三十五次，声波超越市界、省界，变成文字出现在报刊上……"⑬

很多人显然对这种"政治氛围"颇不适应，特别是"过来人"，感到"经史子集"、解惑授业、师生相承的教育之路突然截断了。大学是什么？大学是"社会拿出血汗换来的有组织的学术机关之一"。它应当"以学术增加人类的幸福来报答他们！"(山东大学老校长杨振声语)可是山东大学的道路离他们的感觉越来越远："政治大课"、"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运动迭起，许多配合形势的新人新事更是层出不穷：一份政治性很强的校刊——《文史哲》问世了，这份以马克思思想作为统领的杂志，很快就以其深度和新意引起了毛主席和很多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工农速成中学开天辟地头一回建立在大学校园里。以创造了"郝建秀工作法"的闻名全国的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成为速成中学的第一届学员，深感荣幸的山东大学派遣著名文学家陆侃如兼任速成中学的校长。以期那些"识字班"的学员们迅速地变成既有革命思想又有文化的劳模，两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小人物向他们的"红学"祖师爷俞平伯开战了。最初小人物的文章只是发在校刊《文史哲》上，可是它被敏锐的大人物发现了，一篇初衷也许只是学术争鸣的文章，便成为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排炮。小人物运用马列观点批判俞平伯非马列观点的文章马上就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转载了。大人物成了由党培养起来的革命的文化战士的有力的臂膀。两个小人物自己当时也没有弄明白，他们的一篇文章会有这么大力量，竟能够掀开中国知识分子学术思想政治化的新的一页，社会上的政治活动也搞得沸沸扬扬，校园再不是"深宅大院"，它与社会遥相呼应。

与他人比较起来，束星北对这种"政治氛围"的反应更为强烈，他时常在一些场合发表

自己的不满："学生不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做政治家，那就应该去专门培养政治家的学校。"⑭束星北还曾联合过一些教授到党委去提些意见，可是教授们临阵退却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束星北与华岗遭遇了，两个皆恪守信念与原则的人，将两种不同的观念、思想的交锋演化为一场轩然大波。

刘洪宾

（青岛职工业余大学（现为青岛技术职业学院）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为山东大学物理系主任）：

束先生与华校长第一次见面就剑拔弩张，我没想到。本来，我以为两个人一定会成为朋友的。

在物理学界，束星北的才华无人能及，而作为党的代表，华岗德才兼备，尤其是理解善待老知识分子，因而，深受知识分子拥戴。束先生一来山大，我就有意将两人引为相知。

华岗虽不了解束先生，但对他的名气和在中国物理界的地位还是清楚的，因而，束星北一来就被安排到鱼山路26号教授别墅大院。26号别墅大院，只有学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另外，束先生的薪水也定得很高，好像是600多元。有一个时期，再加上束先生的兼职薪水，他一度拿到840元。840元，肯定为山东大学之最，这么高的薪水，让学校大为诧异，为此学校有关部门专门向高教部请示，高教部认为过高，下文要山东大学削减，束先生却据理力争，最后折衷了一下，减到720元，即使是720元，在高等学校里也属最高之例了。从这也可以看出，华校长对束先生是很看重的。

束先生从不愿同搞政治的人打交道的，尤其是不愿同领导打交道，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我一说要把他介绍给华校长，他便欣然允诺，这足可以说明他对华校长是很有好感的。

华校长住的是一幢红瓦黄墙的德式洋楼，在青岛龙口路40号。他的家有个小院子，小院正中有一条用贝壳镶了边的鹅卵石小路，夹在百日红、紫荆、迎春和丁香之间，小路的鹅卵石和贝壳都是华岗在海边捡来的。华岗还喜欢养花弄草，这样的情趣，在其他领导人那里，很少能见到的。那时候，山大的师生，谁都可以走进华岗的家门，只要他在家，你一准会受到热情接待。

刚坐下来，气氛还是友好亲切的，华岗先问束先生的家庭安置和家人情况，束先生也很客气地问及华校长的家庭。之后束先生谈到了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谈到自己正在研究的狭义相对论，华岗也谈到了自己的历史，谈到在香港期间打过交道的一些文化界名人。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华岗很快就将话题谈到了"本行"：哲学。华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课影响很大，一直为山东大学引为骄傲，声势弄得很大，不但青岛很多单位来旁听学习，外省市包括北京的一些高校也慕名前来取经。因而，华岗对他的"专业"是很自信的，不管是什么事，他都能联系到辩证唯物论上。

也就是这个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束先生直截了当地对哲学的意义表示质疑。他说他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两者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关系也只是方法上的关系。他说自己在德国游历期间，曾对哲学发生过兴趣，研究过一阵子康德、黑格尔，可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哲学毕竟更多的是"虚幻"的东西，当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现象不能作出明确解释时，就需要哲学出来，哲学和宗教、神学联系得更近一些。



风起云涌的政治时代，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成为备受关注的"亮点"。图为1952年《文史哲》杂志工作人员创刊周年合影。

在我的感觉里，华校长最初只是把束先生的思想当作一种糊涂认识。华校长是非常自信的，尤其辩证唯物论又是他的拿手好戏，因而，等束先生说完，华校长便开始正本清源。他的观点和思路和上大课的讲演一样，讲到哲学的来源，讲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然后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最后的结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束先生不同意华校长的说法，他认为，不管谁的理论，都属于哲学，哲学是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和证明，如门捷列夫的化

学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言地争论起来，华校长反复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不仅是具体的真理，而且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先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哲学说到底就是白马非马，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不能解决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很具体的，是要解决客观世界的各种问题的。两人越争越凶，最后竟像小孩似的，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起真来。华校长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先生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谁也管不着谁。两人简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我的本意是想成就一个佳话的，没想到两个人就此结下疙瘩，从此战火不断，到最后，学术争论演变为政治斗争。我不敢说，这次见面导致了束先生另样的命运，但他每况愈下的境况却肯定与此有关。⑮

束星北回来后，思前想后，便将华岗同山东大学的政治气氛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山东大学之所以是一潭政治沸水，始作俑者便是华岗。于是便将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逐一列项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华岗。束星北的思想不乏理性，却也杂有不少情绪(束星北本身就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他将党的理论基础称为政治说教，将辩证法称之为"辩术"。他认为，哲学说到底是空谈，这样说也对，那样说也对，一点实际问题也不解决，而自然科学或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它能够解释和解决自然现象的诸种问题，可以用精确的数字来计算物质。"我最初就是学哲学的，在德国时期我学过，因为这个路子走不通，不解决实际问题，后来我就开始学习物理和数学了。"⑯

束星北对华岗的辩证唯物论是统管一切科学的科学更是不认账，他认为："哲学不独不能管自然科学，也不能管物理学，其他科学也不能管。""哲学应该和自然科学分家。"⑰

华岗是公认的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在他心目中，辩证唯物论神圣无比，因而他认为，一切离开辩证唯物论的科学家最终都要成为反动的或唯心主义哲学的俘虏：

为什么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宇宙观，同时又是研究自然、社会思维——世界一般法则的科学？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页)而辩证唯物论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人类思想一切宝贵成果的最高综合和发展。⑱

华岗不会允许有人对共产党神圣的理论进行如此不恭的理解，但他非常自信，他认为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像束星北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是从另一个时代过来的，思想意识囿于传统的封建的旧东西，难免会产生些糊涂认识。这些旧的东西在老知识分子中间又不是孤立的，因而，华岗想通过对束星北的“征服”，来“以点带面”教育大家。于是在以后的“大课”中，他时常结合着形势将束星北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来理论一番。

但是华岗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他在“上面”讲，束星北就在“下面”以书信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束星北又连续写了两封长信加强阐述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针尖对麦芒，毫不相让。后来，华岗便以《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为题，从辩证唯物论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及其哲学意义、批判物理学中的唯心论、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五个方面，系统地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证明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的真理”，而离开这一真理的人必定要滑进唯心主义泥坑。

我们在学习辩证唯物论的过程中，曾经遇到一些疑难问题，其中特别是讨论到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关系问题的时候，竟有个别物理学教授表现出很不虚心的态度，公然认为“辩证唯物论不是普遍真理，不能应用到物理学领域，特别是物理学中的微观世界，完全受自由意志所支配，根本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可说，也不是辩证唯物论所能解决”。有人居然公开声言“自然科学应该和哲学分家”，要求辩证唯物论不要“过问”和“干涉”自然科学，尤其不要“过问”和“干涉”物理学。我们不难看出在这种声言中所包含的根本意义，这在实质上是唯心论者对于辩证唯物论的一种反攻。全部科学史已经给我们证明：任何一个扬言拒绝辩证唯物论的自然科学家，都存心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引进唯心论。事实上凡是责骂进步哲学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最丑恶的哲学体系的奴隶或俘虏。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运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自然现象并没有什么阶级性和党派性，所以自然科学本身也就没有什么阶级性和党派性，因而自然科学也就不能成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我们可以说有封建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有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有工人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但是，我们不能说有什么封建阶级的化学、数学和物理学，不能说有什么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化学、数学和物理学。然而，自然科学本身虽然不是上层建筑，虽然没有什么阶级性和党派性，但自然科学必须被自然科学工作者所掌握，才能发生作用，而自然科学工作者既然生活在阶级社会里，就不能不带上阶级的烙印。这样一来，自然科学本身虽然没有阶级性，但它不能不和一定的阶级发生关系，不能不和其他上层建筑发生关系，并且必须要受到一定的宇宙观所指导，才能发生作用。因为自然科学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要思维就必须有思维方法，而任何一种思维方法都不能逃脱宇宙观的支配。恩格斯说得好：“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高兴采取怎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问题只在於他们究竟愿意某种坏的时髦的哲学来支配他们，还是愿意由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绩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来支配他们。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一切自然科学都不能没有

哲学宇宙观的指导，物理学当然不能例外……⑲

华岗的文章重申了辩证唯物论的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神圣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阶级性(从而也就认为它是有阶级性的)，尤其是华岗在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一章中，对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作出的评述与分析，让束星北无法容忍，在华岗的笔下，牛顿和爱因斯坦两位束星北最为敬仰的科学家，一个被贬为“狭隘的、片面的经验论”，一个被划为“唯心论”。束星北被激怒了，束星北也拿起笔来对华岗进行“回敬”：“哲学说到底就是玄学，我主张理论应该有用处，而不是白马非马。”⑳



1949年10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的教育界首席代表。前排左三为成仿吾，1958–1974年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排右一为晁哲甫，1956–1958年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好，辩证法也好，是有阶级性的，而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两者不存在谁大谁小，谁主谁次，谁管谁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哲学就是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而辩证法也只是一种方法，不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也不能说离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就会无所作为，因而不能过分渲染它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牛顿、爱因斯坦、玻尔，也包括华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巴甫洛夫都没有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也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武装，不是照

样成为世界大科学家吗？”②束星北的“文章”，自然无处发表，他就用口头发表，两个人的“矛盾”从此大白于天下。

刘洪宾：

其实，华岗的人品和修养是很受人称道的，他不但受到党内人士的称道，也深受旧知识分子的钦佩。有些人将华岗时代的山东大学称为黄金时代，也是有其道理的。早期的山东大学的领导，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爱戴，无人能同华校长相比。华校长曾多次讲过，老知识分子是大学最宝贵的财富。那些既有学识又有名气的专家教授，房子一定是最好的，薪水一定是最高的。如果哪个生活发生问题，华校长一定会亲自过问的。外语系一位老教授家里子女多，妻子又患重病，他知道后，便遣人将补助费送到他的手里；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化学教授，对国内的兵营式宿舍住不习惯，他便专门从校外为他租了一幢西式洋楼。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有时甘冒政治风险。张维华是个国学底子深厚的老先生，调至山东大学之前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又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管理委员会委员。“三反”“五反”运动，原校领导作了个推论：既然此人曾是“庚子赔款”的管理委员会委员，一定会有贪污行为。于是便追“老虎”追到山东大学。华校长将那些来抓“老虎”的人挡在了门外：你们不会否认山东大学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吧。既然山东大学和齐鲁大学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们何不将张先生的材料转过来，由我们按着上面的政策来处理呢？张维华得救了。

华校长本身就是个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常年在“白区”生活，使他结识了很多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他认识他们，也知道怎样同他们合作。因而在他身上嗅不到“江山是俺们脑袋挂在裤腰上打出来的”的那种“占领者”和“统治者”的自卑又自负的气味。

但是束星北却触动了他的根子，触动了大是大非问题。他当然不会作出让步。那个时候，华岗是代表时代的，他的思想观点自然为多数人接受、拥戴，不过束先生的思想观点也有一批听众，当然这些听众多为旧山大的老知识分子。他们表面上不会给束先生帮腔，心下却觉得束先生讲得有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对炽热的政治之风感到不安，不知道大学要被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束先生与华校长的“论战”越演越烈，以至在一次华校长主讲的“大课”上，当他不点名地批判了束星北的糊涂观点和认识，强调马列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时，束先生也站起来当众喊道：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②

有人称，束星北栽到了华岗手里，或者说，造成他另一种命运的源头始于华岗，这显然是误解，华岗从不以权势压人，也从不随意给人扣政治帽子，即使一些已被划到敌人营垒里的人，他也不会轻易举起致人死命的拳头，一般情况下，他会放一放，抻一抻，宁可

让时间来说明问题。可是华岗又是个有信念讲原则的人，同老一代共产党人一样，信念、原则是他们的生命，比钢铁还要坚硬。这一点清楚地写在他的革命经历特别是遭劫后的经历中。

华岗在山东大学的校长职务只担任到1955年，这一年秋，他在全国开展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反运动中落马。在全国的肃反运动中，山东党内在康生的领导下，开展了对所谓"向明反党集团"的斗争。华岗过去曾与向明一同蹲过监狱，有牢狱之交，解放后两人都在青岛工作，颇有接触。向明事发，华岗因不肯昧心揭发而被划进"向明反革命集团"，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1955年8月25日，华岗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后改为"隔离审查"。在青岛关押了两年。1957年华岗被押送北京，到1965年，整整审查了十年，却始终没有查清"罪证"。但最后还是加了罪名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7年，送到济南山东省监狱关押。"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华岗诗)，在隔离审查和关押期间，华岗以惊人的毅力写出《规律论》、《美学论要》、《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要素"试释》、《自然科学发展史略》、《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近百万字的文稿。

华岗与束星北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却演绎了极为相同的命运。华岗并没有因他曾经的地位和忠贞而稍获宽恕。在隔离关押中，华岗饱受了肉体与精神的折磨，以至造成了多种疾病，被监狱遣送回家治疗。他的家人在他落难后便从原来的别墅迁出，挤在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为了家人的生存空间，也为了不在政治上牵连家人，他在家住了不到一年，病体尚未好转，便又回到监狱。他自己要求返回监狱的时间是1972年春节前夕，回到监狱几个月(5月17日)，便病死狱中。华岗尽管受尽折磨，贫病交加，饱尝世态炎凉，可是据山东省监狱看守称，至死，他的信念与原则也没有动摇。

1979年由于胡耀邦的过问与主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重新审理了华岗的案件。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华岗平反昭雪。不久，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恢复华岗的党籍和政治名誉。㉓

如果说，华岗的信念与原则坚硬如铁，束星北的信念与原则也是坚不可摧，两个人在大是大非上都不会稍加退让。大学一些对两人的人格和品质深为爱戴敬仰的老教授们，颇感遗憾，曾多有调解撮合，却不能稍缓两人钢对钢铁对铁般的越来越猛的碰撞。束星北对那些真诚劝解的人回答道：我或许认为他是个好人，是个有品有德的人，但好人归好人，原则是原则。华岗则认为：好人的概念基本与认识是平行的，一个没有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信仰且对此缺乏基本认识的人，是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的。㉔



注释

①《王淦昌先生传略》，《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页。

②1929年6月3日蔡元培致吴敬恒（雅晖）函，载台湾《山东文献》第六卷第三期。

③蔡子民（元培）先生在国立山东大学成立四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词，载《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85期，1934年9月24日。

④蔡元培先生在国立山东大学成立四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词，载《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85期，1934年9月24日。

⑤王淦昌《往事回顾》代序，《悠悠岁月桃李情》，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⑤以上均据山东大学校史第三章第一节 临沂山东大学的创建；第二节 临沂山东大学的学风；第三节 在华中地区创办的华中建设大学；第四节 华东大学的组建；第五节 向新型正规化过渡的华东大学；第五章第一节 山大华大合并。

⑦据《华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⑧《中国社会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170页。

⑨《山东大学校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⑩同上第202－203页。

⑪据《华岗生平简介》，《华岗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⑫《山东大学校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页。

⑬据《华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

⑭《揭发束星北的反动思想》，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⑮刘洪宾采访录，1996年6月12日。

⑯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⑰同上。

⑱华岗：《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页。

⑲同上，第1页。

⑳《揭发束星北的反动思想》第2页，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㉑同上。

㉒刘洪宾采访录，1996年6月12日。

㉓据吴富恒《华岗校长的生平》，《悠悠岁月桃李情》，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8页。

㉔据刘洪宾采访录，1996年6月12日。



6.遭到驱逐

束星北对日益升温的政治热潮，无力抵挡，却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搭台子唱反调。在华岗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大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他不断地向学生灌输牛顿、爱因斯坦、狄拉克、玻尔等科学家成才成名的故事和经历。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1954年下半年山东大学决定对束星北展开公开批判。罪名是“公开地反对辩证唯物论，公开叫嚷：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公开地反对并抵制‘全面学苏’”。①

50年代初到“反右”之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全面学苏”构成了高等院校和知识分子的生存背景。如果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一次极为有效的知识分子自我否定的“洗脑运动”，紧跟其后的“院系改造”和“一边倒”学苏联，便是彻底摧毁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基础——教育体制和旧的生存方式的运动。

首先由于我们的社会，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在教育上资产阶级那一套——理论、制度、内容、方法等，对于我们根本上不适用，只有苏联先进的经验，足以供我们借镜。中国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教育，只是毫无计划地搬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再加上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若干措施。解放以来，教育上封建的法西斯的遗毒，已经基本上被粉碎了，但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直到今年教师改造思想运动以前，还在很多学校中占着实际的统治地位，甚至于在教育行政机关若干工作人员的头脑中，也有相当影响。由于他们留恋甚至迷恋资产阶级那一套，对于我们教育上的革命办法以至苏联的先进经验，就抱着歧视或对抗的态度。这就障碍着课程改革，障碍着院系调整，障碍着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并因此不能很好地编出新教材，不能很好地运用新的教学方法。资产阶级教育上那一套，通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搬运过来，本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并且许多理论是错误的，不能适应新中国各项建设的需要。因此，改造教师思想，打破资产阶级的一套，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对於我们今天的教育建设，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②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面学习是“全面否定”之后的“全面照搬”。在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上，教授导师的个体教学制被否定后，取而代之的是苏联的组织模式：集体教学；在课程内容上，逐步删除了欧美资本主义腐朽的内容，大量采用了苏联的材料：

如化学系的某些教学小组经常把苏联科学小丛书上的化学先进发明吸收到教材中去：

普通植物教学小组在集体编写讲义过程中，也批判了过去一本常用的美国教本之后，采取了米丘林的研究路线，在他们的教学过程中，即按照着米丘林的原则来分析生物的变化，又如普通化学教学小组也根据列宁的学说来解释物质的概念；根据苏联学者对于唯能论的批判来讲质、能间的关系；根据热的运动与分子吸引力的矛盾，来解释气体液化的现象。动、植物系也根据苏联学者勒伯辛斯卡娅的活质学说，来批判旧的细胞学说；根据巴甫洛夫对于生物整体的观点，来批判欧美学者研究生物现象的破裂分割的观点。数学系也根据列宁的反映论，来批判"数学是人类理智的创造"的错误观点等等。

…… ……

为了使高等教育适合于国家大规模计划建设的需要，逐渐改革过去"通才"教育的旧制度，本校各系现已遵照中央教育部的指示，在校行政的领导下，研究采用苏联"专业"设置的经验，如动物系、海洋系、物理系、水产系、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等都准备设置不同的专业和专门化，使学生所学知识逐步专门化，以培养适合于祖国建设需要的专门人才。

此外医学院在学习苏联先进教学经验上，也有相当成绩，并开始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实行了"重点分科"制，附设医院吸取苏联医学先进经验的成绩更为显著：组织疗法、无痛分娩法都先后实验成功和大力推广。正因为大家要求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迫切，所以学习俄文已成为大家的一致的要求，这学期来全校仅教职员中参加业余俄文学习的就有380多人，就连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参加了俄文的学习，早晨晚上在校园内经常听到读俄文的声音，各系教学小组和教研组对每个参加俄文学习的教师也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在一定时间内能读有关本系的俄文业务书籍和进行翻译……③

尽管有些人，对摧枯拉朽、"全面改版"的革命难以接受，心存抵触，却无人公开抗拒时代潮流。解放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大致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基础"和"头脑"，使他们从整体上失去了"声音"，放弃了"自我"。

在这样的背景下，束星北意欲对抗潮流或扭转校正乾坤的企图，便显得尤为不合时宜。

束星北反对"一边倒"学苏联的意识，最早可追溯到20年代末的亚欧考察。在那次探索社会出路、寻找救国良方的考察中，社会主义的苏联给他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在他的意识里，苏联是个专制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德国进攻苏联的初期，他们之所以被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就是证明。最初的代价完全可以说明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差，当然和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也有直接的关系。"④

束星北认为，"院系调整"是急功近利，是一次破坏："院系调整"简直就成了法律。"所有的私立学校取消了，大多数的外国教职人员和行政人员离开了中国。斯大林模式迅速地



在清理一空的中国高等学府里扎下根来。西方式的文科学院和通才教育取消了。为了适应眼前利益，使好不容易成为通才的人再变成专家，使本来就很细的系还要再进行划分。一些大学变成了短训班或职业职能训练班，这同大学宗旨体制相悖，是倒退。”⑤

中苏签定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人们都沉浸在两国蜜月的喜庆气氛中，束星北却忧心忡忡地告诫人们说，沙俄向有侵吞占领的本性，这一点他们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这样下去，要把我们的矿产给平分了。”⑥

在与华岗作科学与哲学之争时，束星北曾公开地摆出自己对科学有无阶级性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等)本身没有阶级性，数理化是全人类文化的共同积累，谁都可以使用，如果这些人类共同文化瑰宝只是因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使用了，我们就不能再碰它，岂不是因噎废食吗？”⑦显然这一点也是针对“全面学苏”所言。他认为：“苏联的科学水平是比较差的，像样的物理杂志一本也没有，科学全是抄袭德国人的。科学家也大都是二流货色。”有人反驳说，那么巴甫洛夫、门捷列耶夫算不算第一流的科学家？他说，“据我所知，那是沙俄时代培养出来的。科学也好，技术也好，都应当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去做，不能搞虚的。苏联之所以不行，就是会议太多，政治学习太多。”⑧对于科学技术，他认为必须向最先进的国家学习。他曾公开讲，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言论是自由的，既不要参加政治学习，开会可以随便不到，说错话甚至骂骂人也没有人斗你，而这个“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障，是文化勃兴的基本因素。他虽然没有公开地提出要向最先进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学习，但所言所指，人人皆知。

本来，束星北的对抗还仅限于物理系或和朋友的小圈子里，当他得知帮助高教部制订中国教育大纲的苏联专家是个副教授时，再也不能忍受了，他站出来用书信直接向高教部提出了质疑：“我听说高教部帮我们制订教学大纲的〈苏联〉顾问是个副教授，他本身的教学经验都很浅薄，我们也得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非得让人家当瘪三一样看？”“我看这是胡弄，这样下去，有亡党亡国的危险。”⑨

在运动大潮面前，束星北并非单枪匹马，他的思想言论，在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当中，还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只是将一些人埋在心里的所想所思和不满非常情绪化地表达出来。他也常常因“革命”不能成功，而采取一些过激的形式。

刘洪宾：

束星北的思想显然不是孤立的，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比如他对大学的政治化倾向、专科教育(实际上所谓的专科教育也是一种临时的过渡性的档次很低的教育)、工农速成班的成立等等看法，我们都有同感。不同的是，我们将想法和不适埋到肚子里，而他一定要讲出来，即使引火烧身也在所不惜。

在中国，一个事件一旦成为全面运动了，也就成为灾难了。全面学苏也是如此，比如有英美背景的臭了，英文也就跟着臭了，大家便赶快转俄文，一些知识结构早已定型，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跟着突击俄文。教本教科书全部都要使用苏联的，都得现翻译。束先生有一本电磁学本是高教部的约稿，可是"一边倒"之后，高教部便找人翻译苏联的有关教科书，束先生的书便被搁置起来。束先生的书动用了多年的积累，连一些苏联专家也承认是一部充满独立思想，水平极高的高等教材，突击翻译出来的苏联有关教科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他能不有气？再比如，大学使用的初级物理学课本，不但质量差，还缺不少东西，用这样的课本，岂不是误人子弟？还有更荒唐的，反美连摩尔根和他的基因学也一起反掉了，大家只能跟着苏联伪科学家李森科和米丘林后面跑。这样的事，明白的人自然有气。

束先生是出了名的"反对派"，早在来山大之前我们就知道了他的一些传奇经历，如为了苏步青而拳打节约委员会主任；"三反"之初，在食堂门口贴挑战书，要与那个揭发他囤积大米的教授当众论战，吓得那个教授好长时间不敢见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期，他是惟一一个不写"忏悔书"的人。⑩但束先生毕竟是个学者、科学家，他的"抗拒"形式通常还都是理性的，只是万不得已了，才采取非常方式。如他对"全面学苏"的不同看法，最初就是正面接触：他不断地向学校领导提出自己的意见，也不断地用书面的形式向学校领导或高教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希望。只是当正面渠道行不通后，他才以个人的特别方式来进行"抗拒"。

他以年事已高，知识结构早已定型为由拒不学俄文，也不使用苏联教材，人家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集体教学了，他还我行我素，继续着师生相承的老路子，如此等等。他与学校的对抗实际上是方向性的对立，因而也就不存在调和，就像他同华岗校长的哲学争论一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⑪

潮流之下，束星北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他"扭转乾坤"的企图只能招致越来越强烈的批判和政治压力。但他不会认输，不想被潮流所淹没，在"声音"失去空间后，他便退守到自己所管辖的"地盘"上，继续"抵抗"，他仍用自己独到的教育方式来同社会主义"争夺阵地"。

大学在政治万能的影响下，一个人的进步与好坏，首先要看他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水平，学生在这样的氛围里，自然对数理化或其他学科的兴趣和欲望越来越小。在学校，只要是党员，无论品行怎样，学习多么差，也一样保持着"尊贵"之优。氛围给人们的感觉是：政治好了，一切也就好了。什么是政治呢？首先是政治学习、马列理论的学习，再就是向组织和党靠拢，立场坚定，原则分明，敢于向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做严肃的斗争，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诸如：上街游行、集会、刷标语、贴喜报等等。在这样政治气氛的影响下，学生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课堂和业务的学习时间越来

越少，范围也越来越小。很多头脑正在发育的学生已无心学术和知识的争拼，而是想方设法地去察言观色、洞察风向、投机钻营、牟取政治资本。

束星北对于学校日益升温的政治学习热潮，无力抵挡，却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搭台子唱反调。为了把那些躁动不安的学生拴在课桌前，向不善思想工作的束星北，在华岗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大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不断地向学生灌输牛顿、爱因斯坦、海伯森、狄拉克、玻尔等等科学家成才成名的故事和经历，他也不时地用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的学风学制和学子的精神来激励他们。他早早地就提出"红与专"的概念，他让学生们讨论两者的关系，让他们知道，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靠什么。"如果学生和老师都去做政治家、理论家，那么，社会主义建设靠谁来搞，工厂企业谁来建，大炮坦克谁来造，量子力学，相对论或尖端科学谁来研究？"⑫让学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习中来，分散他们的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的热情与精力，他不断增加测试、考试，常常是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弄得学生疲于奔命，他还不知趣地将学生们分成两帮：一帮是有心学习没有很强的政治欲望的学生，一批是政治当头，积极进步积极靠拢组织的学生。对前一种学生，他想方设法稳住他们，小心地呵护着他们。对后一部分学生他采取拉拉打打的办法。他的目的是"挽救"他们。对于那些完全做了政治的"俘虏"的学生，他或者不闻不问、一味地冷落或者寻找机会"打击挖苦"他们。

束星北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范围里"造成混乱"，不但引起了学校的警惕，也遇到了物理系党支部书记李哲明的抵制和斗争。也许碍于师生关系，最初斗争还属"内部的"、"地下的"，当束星北和华岗的因哲学或科学孰大孰小，孰先孰后之争的矛盾公开后，学校的领导和李哲明对束星北的斗争性质发生了变化，一直在"后台"对束星北进行监督、抵制的李哲明走上了前台，开始和束星北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部分师生也围绕束星北和李哲明分化出两种力量。一方面是学校、是潮流、是绝大多数，一方面是极少数、是代表着反动、落后的东西，因而，胜败早在硝烟未起之时，已经分出。

如果说束星北与华岗的"恩怨"是两种意识行态、两种价值观念的交锋，他和李哲明的冲突与斗争，却有其他一些心理心态方面的原因，至少矛盾的起因缘于个人恩怨。

李哲明于动荡的年代(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1946年，年仅20岁的李哲明被聘为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1946年正是全国学运频发，游行示威、罢课罢学的运动如潮如涌。血气方刚的李哲明深为感动，在山东大学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9个小时的辩论大会上，他勇敢地站到了学生的一边，并登台作了极为鼓动人心的演说。在这一次大会上，他出色的口才和坚定的立场受到了学校地下党的注意。在紧跟其后的由学校自治会组织举行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中，他和大学学生骨干手挽手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二百多名进步学生遭到毒打，四十多人被捕。这次名为"六二惨案"的示威游行，轰动了全国。由于成功地配合呼应了中国学运的大

潮，这次学运，被誉为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英勇而悲壮的一役。李哲明在这次运动中，虽没遭逮捕，也没有受到皮肉之苦，但是他英勇无畏的精神给进步学生和地下党留下深刻印象。在以后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六二惨案"中被捕学生的斗争中，他又同进步学生一起，争得了社会名流和一些群众的支持，成功地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六二惨案"被捕的全部学生。新政权成立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大学的中坚力量、干部苗子，受到重点培养。

为了弥补新大学教育与师资力量的不足，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自己的教育队伍，山东大学将一批政治可靠，年轻有为的学生、教师迅速地选拔到教育岗位上来，可是很快发现，匆匆上岗的年轻的教师大多不能胜任他们的职位。大学只好让大部分年轻教师重新"回炉"。李哲明尽管已有了几年教龄，仍被下放到这个队伍里。本来这项师资教育规划期限定为三年，出于对飞速发展形势的考虑，山大校委会几经研究，决定将三年学期压缩为一年。为了能让他们尽快地扛起大梁，大学让最好的教授为他们"掌勺"。

"院系调整"后，刚刚从浙大来到山大的束星北便成了李哲明等青年助教"回炉"班的第一任老师。

方辉明

（南方某大学物理系主任，20世纪50年代初为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束星北的学生）：

客观地说，最初李哲明对束先生还是很尊敬的，因为李哲明的启蒙老师王普⑬是束先生的好友，两人一直保持着很深的交往。在做束先生的学生前，李哲明已对束先生耳熟能详了。我记得李哲明多次给我讲束先生，多是在浙江大学时的故事，如数家珍一般。但是束先生对王普的弟子却一点也不客气。

在我印象里，束先生对我们"回炉班"的教育还是很卖力的，他虽然不苟言笑，可回答起问题来却是很有耐心的。以后想起来，我们有一些问题提得是多么幼稚可笑，尽管如此，他也是不愠不怒，逐一回答。他常说，你们基础水平低一些，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用心，只要用心、心无旁骛，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那个时候，运动多，社会活动多，我们大都是"苗子"、"骨干"，自然要积极地参与，说不分心是假的。矛盾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认为我们这些人心浮意躁，没有责任感，没将心思搁在学习上，却只想着当政治家。当他同华岗校长为了哲学和科学谁前谁后的战火爆发后，我们好像也跟着受到牵连，一些学习不行却又热衷政治活动的学员常常被提溜起来发问，回答不出来是自然的事，于是"笨蛋"、"草包"、"狗屁不通"等不雅的语句便如连珠炮一样发泄到他们身上。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一个学期还未结束，很多学员对他有了反感、恼恨，将他的课堂视为险途，即使一些曾对他崇拜尊敬有加的学员也开始躲避着他。尽管如此，李哲明却还在有意维护他，常常替他开脱，替他摆好，让大家以理解宽容的心胸对待他。但是李哲明的好心并没得到好报，在课堂上，问题答不好，他一样会当众"受难"。

一年的学业结束了，好多人都有解脱了的感觉，可是束先生却不想放过我们，他跑到大学有关领导那里阻止我们毕业。从以后揭发出来的材料来看，他将我们的水平评估得很低，认为我们这些"回炉班"的学员，根本就不是"成品"，甚至连半成品也不是，根本就不能"出炉"。他说我们中间有些人连初等物理的基础都未打好，若是让这样的人去做教员的话，简直就是视教育为儿戏，不但误人也会误己。他执意让校领导，将压缩为一年的学期，再改为三年。

那是个急功近利、一日等于一年或几年的时代，大学极需要有思想觉悟有革命激情的新生力量走上教育岗位，因而，束先生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于是我们这些"非成品"最终还是按着预期的安排走上了课堂，成为社会主义灵魂工程师。

本来，我们以为"解放"了，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束先生没放过我们，他像是索债的债主，一路追讨过来，让一个个刚刚拿起教鞭的年轻教师们个个心惊胆战，李哲明与束先生的怨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束先生"讨债"的方式很独特，有一段时间，他几乎什么事也不做，天天在我们上课的几个教室门廊前溜达，他像个心怀鬼胎的侦探一样，不时地从窗户或门缝往里瞅或驻足听听，感觉有问题了，就悄悄地进来，在后面找个座坐下来，掏出小本来，将发现的问题一一记下来。然后再"秋后算账"。他的所谓的"秋后算账"不外是课后或周末将一些"营养不良的孩子"提溜到教研室，吃些小灶。礼拜天就让他们到他家里。不过很少有人买他的账，背地里都管他叫"瘟神"。他让我们老是紧张心怯，一旦听到走廊里有动静，神经便倏地绷起来。有这么一个讨债的"瘟神"，我们再小心谨慎，尽职尽责，也难免不出漏洞。挨训挨批是少不了的。挨批挨训也没关系，关键是有时他不会顾及你的脸面，让你当众出丑。李哲明就为这事，和他结了怨。

那天，我去听李哲明的课(学校规定助教们之间相互听课，相互提出改进意见)，他好像讲的是物体运动。我相信，他一定是作过精心准备的。李哲明的口才很好，平时发言讨论，他总是头头是道，有条有理。讲课也是这样，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他可一口气就讲下来，大家都很佩服他这一点。说实话，那堂课，我听不出来什么问题，我敢肯定学生更不会发现什么问题。可是中途，束先生闯了进来。显然，进来之前，他在门外已经观察了不短的时间。进来时，脸拉得很长。我记得他走上讲台后，二话没说，摸起一根粉笔头来就在李哲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重点提示上打叉。他先是在一些公式上打出一些小叉，然后又在每一个单元上打上几个稍大些的叉，最后一个大叉几乎够到了黑板的四个角。

束先生也不管李哲明什么表情，会受到多么大的伤害，开始从他第一个打过叉的地方讲起。李哲明退到一边，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涨得通红的脸，深深埋下。束先生一直讲到第二堂课的铃声响起，才想起李哲明。他说：我给你们说过多次，任何事情必须首先得自己弄明白了，搞清楚了，才能讲得通讲得明白，如果连自己都搞不懂，怎么指望让别人听明白。

场子是怎么散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事后，李哲明跑到华岗那儿放声大泣，他认为自己当众让束先生给出了丑，失了面子，无法再进课堂了，一定要华岗为他主持"公道"。华岗听了李哲明的哭诉后，并没马上表态，而是把听示范课的几个老师(其中也包括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询问。本以为华岗校长至少也要找束先生谈谈话，可是此后却没了下文。我听别人说，华岗之所以没有作出处理，是认为束先生除去方法欠妥外，并无大误。李哲明因此与束先生结了怨，以后李哲明当了物理系党支部书记，与束星北的矛盾越来越深，不能说与这事没有关系。⑭

按照学校的旨意，首先要将束星北的反动思想和意识公开示众，要让人人都明白他的思想和意识的危害性，以达到分化和孤立他的目的。学校的舆论工具加大了力度，校刊校报等专门辟出走什么道路，选择什么方向的专栏，让师生来参与讨论。物理系各班级的党团员骨干，多数成为支部书记的"内应"、"密探"。束星北在课堂上或私下里散布的"谬论"，都会有人向上汇报，并成为落到他自己头上的"炮弹"。

学生也面临着选择。束星北当年的学生王景明曾谈及那时的感受，他认为，最初多数学生是有学习欲望的。束星北的才华和教学能力深得学生的敬仰。因而，他的一些"反动言论"很有"市场"。他们崇拜他，相信他，也觉得他的一些落后话说得在理，至于那个不苟言笑满身"阴气"的党支部书记，多数人却很反感。可是一旦以阶级和营垒划线了，选择束星北还是选择李哲明，实际上成为是选择一个反动教授还是选择党的原则问题了，学生们只能抛弃束星北。

一些同情或支持束星北的师生，在斗争公开化后，有的开始反戈，有的只有沉默。在支部书记的领导组织下，束星北的"队伍"很快就被瓦解了。可是即使成为孤家寡人的束星北也不轻易言输，他且退且战，大部队抓不住了，就单兵操练，只抓几个愿意被他"蛊惑"、"蒙骗"的"苗子"。在这种胜负早就确定的较量中，他的班很快就与其他班拉开了距离，每每学校会考，他的班成绩一定是最差的，成为学校领导时常需要"关照"介入的班。学生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就像当年闹学潮对付国民党的反动教授那样，不断地给他出难题，找麻烦，他的课堂已没有了纪律，迟到早退或旷课时有发生，有时他们干脆在支部书记的默许下集体"罢课"，让束星北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教室。

即使如此，他也不放弃，不退缩。他仍然靠自己的力量和教育方式来影响学生。对系里的同行，特别是年轻的教师也是如此，他一定要用自己的思想和方式来影响教育他们。

尽管他失去了绝大部分阵地和师生，可从没有全军覆没，无论何时，总有一部分人利用各种方式来追随他，支持他。甚至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地和他站到一起。王景明就是这样一个人。

王景明是社会主义新大学中培养出来的优秀的新生力量，可是他却和束星北这样的人弄到一起，这让很多人困惑不解。

王景明是华东大学短期训练班的第三期学生，两校合并后，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送进"回炉班"成为束星北帐下的学生。他出身贫困，最初报考华东大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每日有一碗大米饭果腹。三大战役之前，部队需要新鲜血液，他曾咬破中指写下了"我要上前线"的血书，为此受到华东大学最高领导人的表彰。在山东大学的一些领导眼中，王景明是个谜。他本是上级着意培养的革命中坚和骨干。他的方向本应同李哲明等年轻教师一样，经过培养和训练，然后走向教育领导岗位。可是他却成了束星北的"俘虏"，成了一个跌进资产阶级泥坑的"败类"。王景明成为束星北"俘虏"的过程很简单：束星北刚来山东大学时，应大学物理教研组的要求，作了一次有关力学教学的总结性报告，其后又就表面张力、电磁场，以及光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等问题作了几次报告。王景明折服了。他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时称：束星北手里拿的是一根魔杖，轻轻一点，就为你的世界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你如梦初醒般地发现了一个令人着迷神往的宇宙。王景明不仅在学术上钦服束星北，性情、思想也与他相近。束星北的很多"反动言论"正是他所思所想的，而束星北那些大谬不经的行为，在他看来简直是英雄壮举。在束星北一步步走向自己营造的深渊，越来越多的崇拜者都弃他而去后，王景明仍然保护、捍卫着自己的偶像。

1953年，山东大学与苏联一家大学结成姐妹学校，并达成互派进修生协议，校领导看出王景明的一些思想苗头，有意挽救他，决定让他赴苏联进修学习。第一批名额极为有限，能有幸中选，本是年轻教师或助教们梦寐以求的事，可王景明却违拂了领导的良苦用心。他的理由很简单：山东大学有了束先生为什么还要去苏联？苏联有他这样的物理学家吗？

在山东大学对束星北的无数斗争会上，王景明从没有违心揭发批判过自己的恩师，更不要说造谣生事了。即使面对威逼、恐吓也是如此。在关键时刻，甚至不惜自毁其身也要站到老师的一边。"文革"初期，他被以莫须有的叛国投敌的罪名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度过了近二十年。⑬有人问他被束星北牵连到如此程度而作如何感想时，他仍不悔悟。他警告那些在运动中整他和束星北的人：你们是错误的，你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历史早晚会证明这一点的。

学生们在支部书记的领导下，用各种形式"造反、革命"时，王景明一定会同束星北站到一起。如果哪天学生"罢课"，王景明定会来选听束星北的课。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学生竟冒着风险回到教室，回到束星北身边。

王景明属于特殊时期的一个现象，而王景明现象让学校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校方认为必须对束星北采取措施，可又没有很好的办法。束星北毕竟是个全国知名的教授，而他的思想言论又多属于思想言论方面的问题，人尽管反动落后，但还没有明显的反革命行为，因而还不能给他定论或定罪。但校方又不能任其发展下去。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下去，像王景明这样的变质分子会不断地冒出来。支部书记李哲明决定和物理系的学生们联合驱逐束星北："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兴大学，绝不能再让一个披名教授、大学者外衣的豺狼为非作歹了。"[16]让束星北离开物理系，离开学生，无阵地可守，无流毒可播。校方认为非常时期，这不失为一个纯洁校园革命队伍的好办法。

山东大学党委：

我们四年级全体同学忿(愤)怒地和坚决地控诉束星北对我们的毒害。控诉束星北反党反革命行为。束星北你听着，你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澈(彻)底交待一切问题。他公开地谩骂党行政(部门)，挑拨同学与领导的关系，在课堂上宣扬唯能论，散布毒素。

1.三年级第一学期，我班因力学测验有多半同学不及格，《新山大》上反映了这个情况。束星北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恶毒谩骂党和行政(部门)。(他)先划了一条向上弯的曲线说："我是让你们学好，尽力拉你们向上弯。"接着他又划了一条向下弯的曲线说："偏偏有一些人为了讨你们的好，让你们图眼前舒服，把你们往下搬(扳)。他们高高坐在宝座上，根本不懂科学，是做官的，他们是"狗"；又说，我不忍心让他们把你们往下搬，我不能再教下去，我不干了。(摔了粉笔就走了)……

2.本学期讲到场论中物理与能量的关系时，束星北趁机大肆宣扬反动的唯心论。他说："能量与物质好比大船和小船，小船可以放在大船上走，小船也可以自己走。能量就是这样，可以藉物质传播，也可以离开物质单独传播。"束星北就这样造成了许多同学思想上的混乱，有的甚至吸收了他的唯心论观点。束星北就是这样利用以大学教授的名义，以他所谓科学家的态度，利用同学们追求知识的欲望来宣传唯心论，达到其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目的。

3.除去公开放毒外，还私下里拉拢个别同学。有一次，他对徐某某说，现在有些人尽(净)谈哲学，其实哲学是玄学，没甚意思。还有一次，束对徐说，以后分配工作，主要看业务，政治上表现得马马虎虎，不好也不太坏，能敷衍过去就行了，并鼓动徐说，什么事也不要管，好好读书，先生总是喜欢读书的学生。他还在班上说，你们的底子太差，大概是以前参加活动太多了，像参干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影响了你们的学习。(由于他的影响)我们班上的徐某某甚至向团组织要回了团员申请书，这是对革命事业多么大的打击，以前我们找不到根本原因，现在我们知道了……

4.束星北不仅散布毒素，在教学上也不负责，消极怠工，破坏教学计划，打击同学情



绪和信心。表面上他似对同学负责，关心同学学习，实际上，他的教学根本就没有计划，上课乱讲，从不考虑大多数同学的实际情况，同学听不懂，他就大骂"笨蛋"、"草包"，对学习较差的同学(郭、刘)甚至都不屑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⑰

山东大学党委：

1.束星北受到批评后(因在会上公开与华岗唱反调)，经常与陈成琳(物理系青年教师)接触，陈在思想上成了他的俘虏，有时经其他同志批评，陈有所感悟，束便说他投降了，追问他都是和谁谈了话。因而陈的思想总是(反反复复)不能得到扭转。

2.最近经常拉拢刘洪宾，有时还请刘到其家喝酒，据刘说，是让帮其接洽高教部，出版他写的"电磁学"一书。可是因高教部在忙着翻译苏联有关教材，未能接受，束便大骂高教部是混蛋。刘最近表现不好，可能是受了束的影响。

3.周北屏未戴校徽与校警发生冲突后，要提出辞职，束便借机挑拨说，校徽的事是枝节问题，应该找出事情的根源。要查一查是什么人让他们这样做的。(他还说)学校拿教员不当人，只认校徽不认人，是极端的官僚主义，他华岗进校门戴不戴校徽？现在说是民主了，比法西斯还要厉害。他还说，以后要同周北屏一起走……

4.经常扯郭(贻诚)院长的后腿，用的是又打又拉的方法。在会议上他说郭是傀儡，李(哲明)是太上皇，会后又找郭谈天，给他灌米汤，希望他不要总是参加政治活动(你终归还算是科学家，为什么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⑱

上上下下构成了一张网，束星北越是挣扎那网收得越紧。他的结局只能是离开物理系，离开讲台，一时间成了一个无人敢要也少有人敢接触的"游侠"。

注释

①据《揭发束星北的反革命言行》，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13—17页。

②《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人民教育》社论，转载于《新山大》第68期，1952年11月22日第四版。

③《全校师生逐步树立科学"一边倒"思想，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已获相当成绩 目前广大教职员学生已投入学习俄文的热潮》，《新山大》第66期。1952年11月8日第一版。

④《束星北的反革命言行》，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第2页。

⑤据《束星北的反革命言行》，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第2页。

⑥《束星北的反革命言行》，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第6页。

⑦同上第1页。

⑧同上第8页。

⑨同上第12页。

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束星北是浙江大学惟一一个抗拒运动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对查三代、揭家底、自我否定、为过关而无中生有、自我污蔑的现象，深恶痛绝，因而拒绝参加这样的"毁灭尊严的运动"，拒不书写"不堪其辱忏悔录"，也不承认运动小组给他提出的意见。"'三反'中认为浙江大学搞错了，运动初期(尚在浙大)藉口'三反'有偏差，不肯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并以浙江省沙副主席的名义，到处收集反动意见，避免检查自己的反动立场，先后经过大组、小组及个别同志的帮助，历时两个月，最后还是不同意小组给他提的意见。"(《束星北登记表》中共青岛市委统战部1953年8月4日。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⑪刘洪宾采访录，1995年5月2日。

⑫《揭发束星北》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56页。

⑬王普是中国著名原子核分裂专家，20世纪30年代就任教于山东大学，不久，被派往世界科学中心德国威廉皇家学院学习，学习期间，他参加了原子分裂的早期实验研究，从而成为中国最早从事原子核分裂研究的学者。他因最早发现铀和钍原子核分裂时放出的迟发中子，而扬名学界。他的这一发现对以后的核裂变反应堆的物理过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王普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先是到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任教，抗战结束，山东大学在青岛复员，王普重返母校。李哲明在辅仁大学有缘成为王普的弟子，并在他的麾下读完了大学物理(普通物理)。辅仁大学毕业后，李哲明之所以选择了山东大学，与他老师的选择有直接的关系。

⑭方楫明采访录，1994年8月14日。

⑮王景明在狱中一直待到1978年。这一年束星北复出。复出后的束星北第一件事便是营救他的学生王景明。他通过有关领导与关押王景明的山东省第一监狱交涉。因历史等原因，王景明的"案情"被搞得错综复杂，逐一理清洗净需要过程，为了避免学生在黎明之后的漫长的甄别核查和手续办理中绝望，束星北托人将大量的物理、数学书籍和国外一些较新研究资料送进监狱。王景明被无罪释放后，束星北又让他作为助教陪伴左右。一年之后，束星北认为学生的心身和业务能力都"恢复健康"后，才将他放到海洋大学(时为海洋学院)。此后，王景明担任了海洋大学物理系教授、主任、博士生导师等职。

⑯据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9页。

⑰同上第2－3页。

⑱同上第74－76页。

7.改　行

在我们这里，气象主要还是要靠感性的经验积累，这恰恰是束星北不具备的，但前人普通的材料经他总结或点化，立刻就不同凡响了。他过人的才华和高度也就在这里，束星北的学问实力雄厚，聪明灵巧，才能够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屡屡碰壁的束星北有些心灰意冷，自以为真理在身，却弄得孤家寡人、声名狼藉，职位不保。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失败”却让他离开了矛盾与是非的圈子，暂时放弃了“仕为道谋”的争论和斗争，不再为同人家黑黑白白竞一时之豪勇，心思重新投入到科学研究上。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门却打开了，他很快就在气象学上找到了感觉和位置。

《高压变压计算法的建议》

《流体力学的一个定律在气象学上的应用》

《根据基培尔基本假设的天气预报新法》

《干空气绝热上升时，是否作等熵变化？》

《空气运动学研究》

《基培尔基本假设的理论证明及对流顶压力温度试报》

…… ……①

这些成果分别刊登在《中国气象学报》、《中国物理学报》、《山东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很快就引起了气象学界的关注和反响。

王彬华

（气象学家，曾任青岛观象台台长，20世纪50年代为山东大学物理系气象所教授）：

因为时代的原因　束星北实际从事气象工作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共发表了十几篇论文　十几篇论文虽不能说篇篇都是珠玑　但每一篇里都有束星北特有的风格。气象就是观天看象，在我们这里，主要还是要靠积累经验　这些恰恰都是束星北不具备的，但他过人的才华和高度也就在这里，前人普通的材料经他总结或点化　立刻就不同凡响了。这也正说明，束星北的学问实力雄厚，聪明灵巧　才能够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②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气象专家对束星北的气象研究的评价众口不一，但多数人对他的创见与发展是深为钦佩的：在气象研究中，对于干空气绝热运动，一般情形下都视为等熵变化。在等熵运动中，束星北得出决定温度直减率r的变化的因素有：空气压力变化，水平辐合和辐射平流切变等三种理论。他的这个理论无疑比气象学家彼得逊和赫尔维茨等所得出的结果更有深度，也更为完善；在大气扰动和空气运动学方面，束星北的波速方程要比罗斯贝的结果在形式上更为广泛，理论上更为完整。他还从大气扰动导出温压结构的槽脊方位和倾度关系，提出了倾向与强度相互消长变化等结论，这个理论对于西风波的认识有着重大的突破。束星北的《高压变压计算法的建议》中导出的高空变压公式，虽方法上与气象理论学家罗斯贝的公式大致相同，但又绝不能同日而语，束星北在理论上更为严格完善。从个人关系上讲，王彬华比他人更了解束星北，对其气象成果的认识也更有权威性。他认为，束星北接触气象的时间太短，因而更多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展开，所以说一些研究尚属于阶段性的，尽管如此，他一年多的研究还是有些成果的，他的研究成果大致可概括为三点：一是最早发现了中国降水的来源。50年代中国没有卫星，因而降水一直搞不清楚，气象界说法多半属于猜测。有人说降水来自太平洋，也有人说来自大西洋。没有人敢想象它恰恰来自印度洋，因为有一个西藏高原挡在那里，人们的思维被西藏高原挡住了。束星北在分析研究了大量资料后，一口咬定，中国的降水来自印度洋。这一观点在有了卫星之后得到了证明。二是一个地方有一个高压另一地必有一个低压。理论界中有个"灯光理论"的说法，是说人的才智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像探照灯一样，照到哪里哪里亮。束星北便是如此，他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积累已经达到了很高境界，可在相关的学术领域里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他研究气象的着眼点首先是地球的大气层，他把大气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观察分析，然后再由整体到局部。这种宏观到微观，微观到宏观的观点或方法，对于50年代的中国来说，无疑是超前的。而在这一思想的前提下，他又进一步论证了高压与低压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的变化机理。三是向苏联科学院院士基培尔投出了矛枪，修正了他对中国大气理论的观点。基培尔是出色的动力学家、气象学家，他在气象理论的研究方面很有些建树，"一边倒"学苏联，基培尔的理论被奉为了金科玉律。尽管他的一些理论是对的，可是一旦生搬硬套，麻烦便来了。如他的高空引导层理论层高为2000米左右，这个层高的标准是根据苏联的大气环境作出的，显然没法适应中国。在中国，不但南北东西季节温差不同，即使一个地区和一个地区的局部环境的温差也是千差万别。怎能生搬硬套？束星北在大量的资料分析与环境调查的基础上，对基培尔的高空引导层作了修正与归整。他认为，高空引导层在中国不仅南方北方不同，而且也将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甚至不能单纯地以南方北方区域来划分高空引导层。他用大量的事实与数据批驳了生搬硬套基培尔理论的数据，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季节环境的高空引导层。他的这套高空引导层理论在中国气象界延续使用了

多年，有些地区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其实，束星北最初考虑的“出路”不是动力气象学，而是30年之后将引起世界技术革命的计算机。也就是说，束星北被无法抗拒的政治大潮席卷而下时，他的天赋和敏感的神经始终“醒着”。他通过广播(从这点来看，以后有人揭发他收听“敌台”实在不冤枉)、朋友的书信，甚至被官方肢解过的信息来了解国外最新科学信息。他敏锐地感觉到计算机日后的前途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1948年晶体管的发明明显地促进了计算机的发展。到50年代中期，晶体管代替了第一代体积庞大的电子管计算机，电子设备的体积不断减小。由于晶体管在计算机中使用，晶体管和磁芯存储器导致了第二代计算机的产生。第二代计算机体积小、速度快、功耗低、性能稳定。第二代计算机已具备了现代计算机的一些功能，如打印机、磁带、磁盘、内存、操作系统等。当时，晶体管技术的计算机，虽然使用范围很窄，只限于研究机构用于原子科学的数据处理，但它(存储程序)极好的适应性，给研究和设计人员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有些敏锐的人已经开始探讨它广泛的商业用途。束星北希望有人能够像他一样理解这种东西的影响。他曾多次写信给王淦昌探讨计算机的前景。他还抱怨过王淦昌。称中国科学院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十一项重点，没能将计算机发展列入其中是个损失。他将自己的认识分析写了报告，数次递交给山东大学党委，自然是泥牛入海。一年之后的“小阳春”之际，束星北平反复出，又旧事重提，上面竟然同意了他的关于筹建计算机研究小组的报告，并让他担任计算机研究小组组长。学校甚至还向他的研究小组提供了一点资金，作为前期调研与初步研究之需。学校的资金与束星北要求的相差甚远，一个时期，束星北曾为资金而四处奔波。1956年年底，山东省副省长晁哲甫来山大视察调研，束星北盯上了他。也许当时有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大背景，晁副省长竟被他说动了心，答应回去后一定同省委委员们一起认真研究解决。晁副省长回去果然认真对待了这事，几经反复后，终有了初步方案和措施，可是“反右”运动到了。这事便被搁下了，永久地搁下了。

离开讲台的束星北除此还考虑过很多题目，他曾想在青岛建立一个无线电工程企业。50年代无线电还是“高科技”产业。他将这种想法写信告诉了王淦昌，王淦昌马上来信表示支持，并表示加盟。可是一个新兴企业要牵扯到多少“机关”多少环节哪。束星北建厂一事，很快便成为“死胎”。束星北离开讲台后究竟动了多少念头，没人说得清。几条道路都走不通了，束星北选择了气象动力学。⑥

在很多人眼里，这似乎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束星北在气象学里，无非是小试牛刀，就引起了气象学界的轰动。科学界一些高层人物因此而为他奔波，为他提供机会。一时弄得风起云涌。中央气象局长涂长望首先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涂长望曾是浙江大学史地系的气象学教授，束星北的校友。他的研究生叶笃正(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曾受导师之命，长期在湄潭跟从束星北、王淦昌学习物理专业课程。束星北是他在浙江大学最喜爱的

老师之一。涂长望、叶笃正一面为束星北大造舆论，一面向教育部提请在山东大学增设气象研究室，委请束星北主持全面工作。在众人的支持下，山东大学气象研究室一起步就是大型研究室的规模，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大气、雷雨台风、风暴潮、短期预报和长期预报等专业项目全部开展起来，专业人员也从最初的一兵一卒迅速地发展为20多个。束星北的动作也引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关注。他委派中国气象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做一次青岛之行。赵九章是束星北的浙大校友，最初在浙大电机系学习，因"学运"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被派往德国学习理论气象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浙大，他曾多次作为束星北和王淦昌物理讨论课的旁听生，对束星北的功底分量自是清楚。赵九章的青岛之行，除了解束星北的研究室建立情况并同他讨论动力气象学的问题外，还有一层不可言说的意蕴。

王彬华：

有意思的是，束星北的气象研究室在行政上辖属中科院。这让山东大学的一些领导颇有些吃惊。历史上气象机构一直以小组的编制和物理小组一同辖属于物理系，竺可桢、涂长望和赵九章一下子将其规格提得这么高，并在编制上脱离了山东大学，这等于是在搞一个"国中之国"，这样一来，对那些盯着束星北不放的校领导来说，会做何感想？圈内一些人颇觉得意蕴深长，显然上面的动作意义远远大于对一个科学家的专业支持，此举如戏，有弦外之音。事后多年，有人分析这出"戏"时认为：50年代中期，一个被学校和物理系视为另类的"过来人"，能获得如此待遇，实属一次非常之举。束星北才华人所共知，但有才华的人不止束星北一个。对一个人而言，一次变化或职业调整，可能是生命(中)的大事，可于机构、单位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束星北的变化能引起北京这么多人物的关注，一是说明他们了解他，重视他，爱护他。再就是通过束星北这件事，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一种抗争精神。历史学家赵俪生曾说过：他身上有一种可贵的品质。像一种易碎的稀有元素，需要大家好好保护。后来也有人将他誉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旗帜，我相信这不是用过年话儿来抬举他，而是深思熟虑的评价。这说明，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并没有被数次的运动阉割掉，只不过有时迫于无奈而蛰伏下来，一旦有了气候，他们就会醒过神来，想法表现自己。因此可以说，束星北不是一个人，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同另一种力量共同存在，只是彼消此长或此消彼长而已。⑦

束星北雄心勃勃，意欲在三五年内将山东大学气象研究室建成全国独一无二的动力气象研究中心。这是一段心无旁骛的日子，也是束星北惟一一段沉潜于科学研究的日子，他



好像马上就忘却了伤痛和屈辱，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他的梦想之中。

气象研究室初具规模时，赵九章受竺可桢之托，邀他到中国科学院气象所作一次短期讲学，题目是动力气象学的数学模式和物理模式。束星北几乎马上就拒绝了。他说：北京有数学所、物理所，而且也都人才济济，你所提出的问题，这两个所都能够解决，何必让我去呢？⑧此中也可以看出，束星北对新事业的投入程度。

可是，“肃反”运动降临了。自1954年8月到1955年8月，束星北主持的气象研究室仅存活了一年便夭折了。

1955年，森严、恐怖的气氛是伴着公开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的。这一年的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之后，城市上空的云层日益凝重，一切都势不可挡地到来了。在全国，受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的多达上千人，而受到这一运动冲击的人就难以统计了。从青岛当年由基层肃反小组统计的数字来看，自6月份始，每个月自杀或被屈打致死致伤的就有几十人。

在这之前，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苏联正在公开批判斯大林，斯大林时代造成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走出了集中营，苏联的近邻波兰，几年前被打入冤狱的哥穆尔卡重新复出，当选了国家领导人。在匈牙利，僵化死板的独裁者拉可西被革职。纳吉、卡布尔重新复出。而当年，他们差点被砍了脑袋。

中国密切地注视着兄弟国家这些惊人的变化。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违背斯大林意愿而赢得的，被国际社会视为比铁托更加危险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从批判斯大林的浪潮中，得到了他阴魂的昭告。也许是为证明斯大林的正确而不惜重演他的历史。

6月10日的《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口气极为强硬，断定胡风“同国民党特务早有联系”，“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忠实走狗”。6月15日，《人民日报》将三批胡风的材料编辑成册，出版单行本，毛泽东亲自作序，以配合全国进行的深挖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山东大学在市委八人肃反小组的领导下，对旧知识分子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排查后，束星北的历史问题特别是40年代在国民党军令部研究军工武器的历史被重新翻出。

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情况报告

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束星北、男、40岁、浙江〈江苏〉南通人，家庭成分为资产阶级兼大地主〔据说有五千余顷地〕。1942年在杭州之江大学上学，1925年9月转济南齐鲁大学，1926年4月去美国干〈堪〉萨斯拜克大学物理系学习，1927年离开干〈堪〉萨斯到三藩市，此时认识了胡适。蒋共分裂时，曾在该地办一报纸名为"玉碎"。后由日本经满洲里去莫斯科、华沙、柏林、英国等地。1930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此时因生活困难流浪到芝加哥，认识了一美国教授介绍

其到麻省理工大学任研究助教，1932年其妻(葛楚华，系特务恺悌之妻妹)催其回国并介绍至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教官，后由其连襟军统特务凯悌领见蒋介石。1932年7月到浙江大学任教。1935年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1940年又回浙大，1944年6月在国防部二厅技术室充(当)顾问、副主任等职，据浙江公安局来函称：当时匪军统局电讯训练班二期将毕业时，缺一电讯教官，由当时匪军统局四处处长魏大铭(后任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技术室主任)函(请)浙大学生胡国治负责物色，胡即介绍束去负责主持该班电讯工程实习。此时曾试制一小型收发报机，而为魏大铭所赏识，邀请重庆见戴笠，经戴批准留用，从此魏即倚(视)为左右手，照顾无微不至，派至技术室为顾问，1945年秋升任副主任。同年1月介绍其弟束健北至国防部三厅技术室试制小型交直流特工电台。1948年束又介绍其弟束健北到国防部六厅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任少校技佐。1945年9月该又回浙大教书，此时束反苏反共言论极为嚣张，称赞戴笠为"爱国志士"。当国民党发动反苏游行时，束之活动更为积极，在反共反苏游行时，该为首高呼"枪毙斯大林"、"打倒新华日报"等反动口号，污骂我党为"吴三桂"。解放后匪国防部六厅雷达所之军统特务徐名冠(束到国防部二厅时亦有(由)他介绍，解放后不久被逮捕，现释放在杭州浙大上学)常去束家。徐匪曾对其同伙说：如被逮捕要先通知束星北以设法营救。据中共浙大党委会反映：束表现一贯反动，对抗思想改造运动，在国防部二厅工作时与美帝驻华情报部关系极密，从国防部二厅返回浙大时，还带了四个来历不明的人。束家藏有无线电器材。解放后曾交出手枪一支，特务登记时又拒绝登记……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肯定该系一较高级军统特务，历史上一贯反动，解放后又拒绝登记，到山大后拉拢落后，组织小集团，破坏教学计划，并公开发表反动谬论，对抗和污蔑领导，其反动气焰已达极点，实应给以应得处分，但因其为大学教授，究竟如何处理，待上级指示。⑨

注释

①据李寿枏：《束星北先生主要论著目录》，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79页。

②王彬华采访录，1995年5月12日。

③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④《关于束星北一年来的表现》，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70页。

⑤王彬华采访录，1995年5月11日。

⑥据刘洪宾、于良等采访录，1995年6月3日至6月6日。

⑦王彬华采访录，1995年5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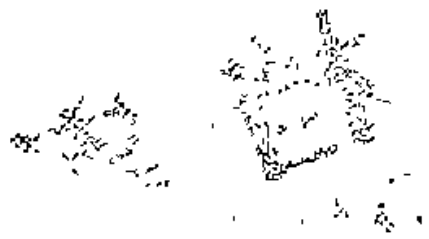
⑧据《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轨道计算者——束星北》．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103页。

⑨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一卷第33－37页。



8.“别矣，淦昌兄”

死虽死，真理仍旧要取胜的！淦昌，记得我最佩服的人是Galileo〈伽利略〉么，我想绝不会给朋友们丢脸，我也不会给中国人民丢脸，屈服于恶势力之下〈的〉。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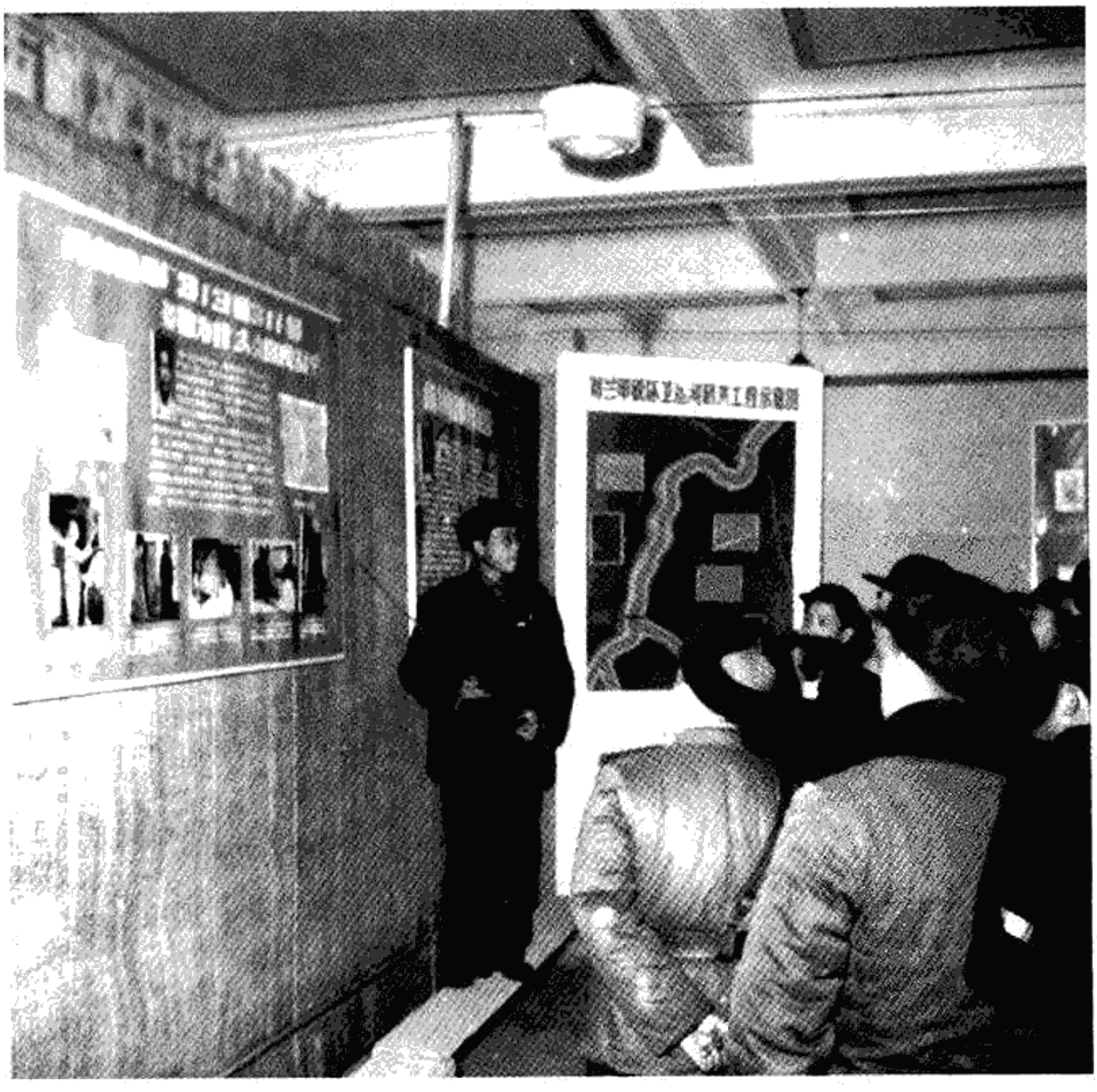
校园上空阴云如铁，人人都能感觉到暴雨前稠密呛人的土腥气，知识分子特别是“过来人”，在无数的不眠之夜里，对自己的命运作着无数的盘算，束星北在得知肃反小组对他在国民党军令部的历史重新展开调查时，似还坦然。他认为军令部的历史问题，解放之初已作过历史登记，不存在任何疑问。

1943年，我装置了一个低压收音机，可以收听国外的广播。当时浙江大学电机系一年级学生徐名冠知道(了)，1944年春，他对我说，这种收音机对军事很有用处，他愿意介绍我把这个用到军事机关。我当时认为国内战场主要靠国民党的力量，即欣然同意。几个月后，徐对我说，已联系到军令部技术室主任魏大铭，每月津贴三万元，旅费另行支付，并请介绍一两个人先去綦江军令部办的(也由魏大铭负责)“军令部电讯人员训练班”教无线电技术，我随即介绍了物理系助教陈维昆(是我过去的学生)去綦江。1944年7月，我和爱人去重庆，在綦江住了几天后，魏大铭即来綦江问询低压收音机和其他有关无线电方面的问题，特别提到制造雷达的问题，谈后，由魏大铭用车接到小龙坎伪军令部技术室，并介绍了里面的一些负责人。不久，陈维昆也从綦江调来技术室(在我的指导下)帮我制造了一个低压收音机，交魏。魏又问我能不能制造一个“远近电台测听器”(后来，由我和我的侄子束慰曾完成)。并让我全力以赴制造雷达。我转介绍重庆大学无线电教授谢立惠制造雷达接收部分，陈维昆制造雷达发射部分，束慰曾制造雷达天线，我则总成并负责向英美接洽雷达站器材。陈维昆介绍的江乃骅(也是我的学生)在我的指导下，制成了低压发报机……我虽负责制造雷达，(但)无职位，无军衔。魏大铭曾建议我就任副主任职，并说军衔可至“少将”。这时(我到伪军令部技术室几个月之后，大约在1944年冬天)我已知魏大铭是军统特务。现在他有求于我，而我则有浙江大学做后方，可进可退，无求于他；假使我参加了军籍，成了军人，(不但)要受军纪的约束，失去自由，还要受他的控制，甚至会将生命交给他。所以我坚决不就正式职位，只和他敷衍。谢立惠和陈维昆也和我一样，不就正式职位。据我所知，我们所有人的工资是从“器材设备费”内拨出来的。1945年4—5月间，副主任陶士珍(据说，陶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亲戚)赶走了魏大铭，被任命为技术室少将主任。他请我做少将副主任并贴出一张“布告”(只是陶的私人字条，并无军令部大印)：

兹请束教授担任本室副主任之职。

陶士珍

实际上，陶士珍无权委任我为副主任，所以以刘必(军令部总务组长)为首的整个总务组(兼人事保卫)并不承认这件事，也从未找过我，我本人也未"到任"。陶请我赶快"请委"，并说已和徐部长讲妥。我知道陶士珍是(我以为是)一个物理教授，不是特务，但手段厉害，不能共事(当时，欧洲的希特勒已经垮台，日寇不久也将垮台，所以更不愿请委)。我说，我从不参加任何党派，〈让〉我填履历表时，我就说证件一时找不到了，〈让〉我请委军衔时，我就说，"少将太小了"。我始终不请委，也未上任。8月份，日寇投降后，我先将家属送走，随即向陶士珍说我要回浙江大学了。陶士珍反复劝说后，即又贴出一个"布告"：



1958年山东省"肃反"展览会在青岛巡回展出一角。



束教授久未请委，其副主任一职，即日取消。

陶士珍

并派卫兵数人把守我的住宅(因军令部未兑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胜利奖金，束星北令学生拆除已总装起来的雷达，而被软禁)不准我离开，这样被软禁了半个月后，由于我不是军令部正式人员，军令部花名册上没有我的名字，再加上亲友的努力，陶士珍终于将我释放，1945年9月，我返回了贵州湄潭浙江大学。①

肃反之初，束星北便被列为重点，青岛市委八人肃反小组和山东大学党委，专门派出了八个人的调查小组，南下北上对束星北进行了为时数月的调查，调查结果与束星北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写的自传没有出入，但是束星北的反革命结论早在调查之前已经做出。因而必须在他的"丑恶黑暗的历史"、"他与社会主义一贯对抗行为"中找到证据。这时候，他在1953年人民代表选举中的一桩"罪恶"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作为他的反革命的有力罪证。有人在讨论束星北问题性质会议上称：仅凭破坏人民代表选举一事，就足可以给他定性了。

1953年11月山东大学选区选举人民代表时，发现了一张中英文的选票，当选人竟是英格丽·褒曼。英格丽·褒曼是美国好莱坞的一个电影明星，竟赫然出现在人民代表选举这样严肃的场合中。大学领导认定这是一桩有意图的反革命的破坏行为，对这一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有关部门作了深入的调查和细致的回顾，最后认定这张选票是由束星北所写。

那天下午，大学师生在青岛市南区片选举人民代表时，束星北与周北屏坐在一起，另一边是他的得意弟子王景明。他们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很是不严肃，周北屏很快就填完了，便拿给束星北看。我趁他们不备，从后面靠上去看，发现周的填写是正常的，他在规定的几个候选人中选出两个并打了勾(钩)，当我们凑近束星北时，他似有察觉，迅速地将选票折叠了起来。

事后据我们查对笔迹，认为此选票系束星北所为。

另有学生到其家询问课程时，发现束星北、周北屏等几个教授在一起神神秘秘地议论什么，一见她进来便不言声了。原因是这个同学新近刚入了党……

山东大学物理系周某某②

刘洪宾：

那时候，气氛紧张压抑，很多人都有喘不动气的感觉。在高校中，山东大学搞得尤其厉害，在我印象里，先是逮捕了外文系的一个老教授，老教授历史上曾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待过一阵子，这就给肃反人员以想象的空间，一项项罪名很快就罗织出来，接着中文系的一个教授也遭到逮捕。没隔几天，山东大学又弄出了向明反革命集团。下一个是谁？人们只有猜测和暗暗祈祷灾难不要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可是那时候，谁保险呢？我们这些“过来人”谁没有国外留学的背景和经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我们为了表示忠诚(也许是深藏骨子里的恐惧)把自己的心胸都撕开来，几辈子的“家底”也都掏了出来，甚至不惜给自己上纲上线、添油加醋，来扩大自己的“罪恶”，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不但失去了自己，也将自己的材料双手捧给了人家。肃反的时候，人家就是凭着这些材料来整我们的。那些胆战心惊的日子里，我们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一听警车车鸣，就得和妻儿告别，作好入狱的准备。③

“肃反”的大网疏而不漏，束星北和其家人越来越感觉到逼近的阴影。一切都在不事声张地进行着：调查、取证、罗织材料等等。到了7月底，上面的结论显然已经较为明确了，于是给束星北派上了“卫兵”，一个带枪的便衣开始跟踪束星北并时时出没于束家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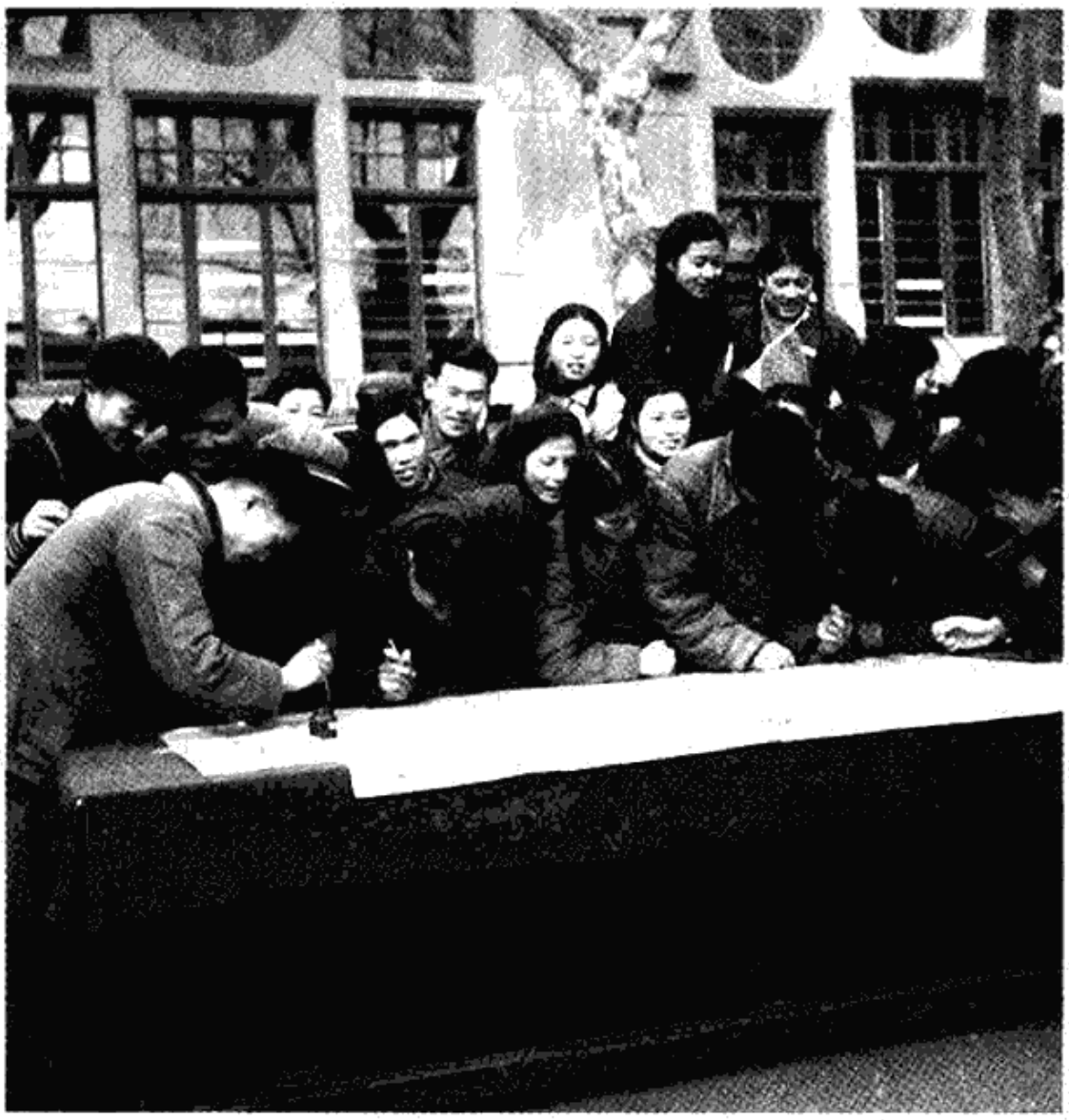


山东省“肃反”展览会展出的反革命武器。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让子女帮助父母配合政府接受改造是那个时代最行之有效的方法。1955年，山东大学学生在动员父母交待问题接受改造的呼吁书上集体签名。

近。先是束星北的孩子们发现的，他们给那个“卫兵”起了外号叫“影子”。他们发现，“影子”不仅跟踪父亲也跟踪他们，甚至王妈李妈(束家的佣人)出去买菜，他也跟踪。有一次“影子”竟壁虎一样吊在他们家的房檐上(下面正好是父亲的书房)，双手抓着檐瓦，脑袋用力探出，不知是想看什么，把正在收拾书房的王妈吓了一跳。他们把“影子”的事告诉了父亲，可是不更世事的束星北最初还不相信，不过再外出时，他留了心，才发现了那个已跟了他很长时间的“尾巴”。束星北意识到事情有些严重，给党委写信，让他们对此作出解释，党委不作反应，直到1956年“小阳春”后，才作出解释。党委个别领导的解释是：“特殊情况下，担心他自杀，属保护性跟踪。”

8月初，束星北的气象研究室经过筛般的搜查后，打上了封条。④学校由系、学院和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批判斗争会如急风暴雨，批判会上他已是“高级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头子”。束星北拼命抵抗，据理力争，但他洪亮如钟的声音很快就被喧嚣的海洋淹没了。几天之后，束星北的妻子葛楚华受其株连，遭到批斗体罚。葛楚华早年毕业于美国教会大学，因其品学兼优(尤其以英语最为出色)被束星北之母束大嘴聘为家教，给束佺保(束星北的弟弟)辅导英语时，与束星北相识相爱，葛楚华曾有意于翻译事业，大学校长詹姆斯教授曾有意让她赴美国进修，深造，可是为了束星北和他的事业，葛楚华放弃了这个机会，也放弃了翻译家的梦想。她跟随束星北来到山东大学后，按照她的学历和

素养，完全可以在外语系谋一个职位，可是她素恐出头露面，宁可安安静静，相夫教子持家，因而她只在大学校产科做了一个普通职工。

个人遭难，束星北尚能吞忍，可是妻子也因他而遭受株连，耻辱难当："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起码也算个民族主义者吧，为何落得这样的下场？"③妻子受到牵连后，在部队已被发展为预备党员的大儿子也遭到批斗。束星北在四处申辩无果的情况下，给毛主席发去了电报，以期他人道的救援：北京、毛主席，山东大学把我当反革命分子斗争已三天，请注意发展，山大物理教授束星北。④

这样的电报自然不会有下落。束星北万般无奈之下，抱着最后一点希望致信青岛市委和山东省委：

青岛市委〈员〉会并转山东省委员会：

这次山东大学把我当做"反革命分子"斗争已多天，并有时指摘〈责〉我是"反革命分子"，已报请检查。现在更多次肯定我是"山大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运动正在开展中。特再提请注意检查、彻底的检查。昨日，校产科对我爱人竟采取了体罚手段："罚站"(站在凳子上)并用强力抽去凳子，不准离开会场，结果〈致使〉我爱人坐在地上。此事昨晚即报告校方及学委会(但尚未提出抗议)，请予注意，并请假。现校方委员会，虽不否认罚站抽凳子等事，但不准假。为避免妨碍运动的进行，我爱人下午仍去开会，不过为避免不幸发生(昨天我爱人不肯站(接受罚站)，及〈欲出门而〉不准出门时已两次以头撞门，请予注意山大这种行为，〈并〉及时掌握。我今天先写下这点材料供给您〈你〉们参考，其有序的，待以后头脑较清〈醒〉时，整理奉上。

此致

敬礼

鱼山路26号甲山大宿舍

束星北上 1955.7.28

没有回音，等待他的是更加凶猛的围剿和批斗。

束星北反革命斗争大会

时间 1955.8.13

地点 大众礼堂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1.主席概括说明束星北的反革命行为及其在运动中不老实的态度(群众愤怒地一致要求束星北站起来，束仍然安坐，怒容满面)。

2.王某某：揭发(束星北)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反对马列主义，宣传实用主义的事实：(1)破坏辩证唯物论的学习。(2)公开反对马列主义宣传，说哲学是玄学、辩证唯物论是骗人的。(3)在课堂上散布传播唯心论。

3.秦某某：补充揭发束反对唯物辩证法的反革命罪行。

4.余某某：揭发束反对党领导的各项运动与改革：反对思想改造、污蔑三反五反运动，反对工商业的限制改造，反对教学改革，反对学习苏联，反对别人购买国债，破坏第一次普选(这时候束星北突然讲："胡说！"全场群众愤怒地要求束星北站起来。束竟不理，无理扰乱会场！还要离开会场)。(1)束反对学习苏联，假装出忧国忧民的样子提醒别人说："这样下去，有亡国的危险。"(2)说党不能领导学校，不懂教育的人不能管理教学工作。(3)破坏教学工作，阻挠教学计划的执行，挑拨离间，破坏团结，拉拢一些人一起反对党的领导。

5.刘某某：揭发束星北露骨的反党活动，一贯攻击党的领导，一贯辱骂行政领导是傀儡……骂民主党派，骂一切靠拢组织的人(群众强烈要求(束星北)交待反革命罪行。束讲："我没有反革命罪行，刚才讲的不是事实。"群众这时要求依法严办。束星北说："我也要求政府逮捕法办。")。

6.海洋系主任：(1)束星北对我说："听说你哥哥是被政府镇压的，弟弟也自杀了，我很同情你。"(2)海军让他到部队讲雷达现象时，他要人家告诉波长，人家不告诉，他就不去解答问题。这是为什么？这种波长是国家的绝密，你为什么要刺探？(3)拒绝有革命立场的复员军人(到气象室)工作，而千方百计地要政治面目不清的于宝琛到中央气象局，这是为什么？

7.海洋系(主任)：1953年指示他的爪牙赵某某要我到他家谈谈我的一篇论文，说要将我的论文登山大学报，当时我有怀疑，不敢去。

8.陈某某控诉束对他的毒害，使自己脱离组织脱离政治，要求组织清洗反革命分子束星北。

9.包某某：代表四年级全体学生控诉束星北对青年同学的毒害。

10.张某某：(1)束星北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党的理论，并有自己的纲领。在全国教育方针确定时，提出"科学技术第一、马列主义第二"的论点(就是其纲领之一)。他自封为科学家，他说辩证法是骗人的，不能领导科学，认为"顶用"就行，很明显，他反对的是党的理论。(2)他在组织上对党进行破坏和瓦解。他告诉部下"不要反对党组织，要反对个别党员"。在物理系他谩骂李某某(党支部书记)和冯某某是吃党饭的，骂民主人士是给共产党摆样子的，他骂党的领导，也骂行政领导。实际上他没有一个党员不打击。(3)对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的反对。他说领导不懂科学，就不能领导学校。他认为上至高教部下至大学各系的领导都是做官的，不懂科学与教育。(4)束出身于大资本家，蒋介石很赏识他。他过去就

干过一些反动勾当，他的面目和手段与胡风一样。

11.欧阳某某：他是国民党TC特务，蒋介石的亲信。反苏游行时扛过大旗，高呼口号："枪毙斯大林。"他是我们的敌人，必须坚决镇压。

12.徐某某：你讲毕业分配只要业务好，政治上马马虎虎就成。你还讲哲学是玄学，俄国的书不好，全是抄德国人的，你利用我想做专家的思想，把我往你的反革命道路上拉。我差点上了你的当，我要求政府依法严办束星北。

13.叶某某：在他家里，他说了很多反党言论。他骂浙江大学的党一塌糊涂。利用学报上的问题进行一系列的挑拨离间。说郭(理工学院院长)任何事情要看李(物理系党支部书记)的眼色，说党支部书记是"太上皇"，挑拨学生与党的关系，要学生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反革命道路。在同学中散布唯心论。

14.束星北的反党反革命事实是一贯的，时间这样长，接触面如此之广，完全可以说明他是个现行的反革命分子。束星北的反党反革命是有其阶级立场、政治背景和历史根源的，他是为资产阶级和蒋介石宠爱赏识的。他所谓的爱国科学家是伪装出来的，说老实话或讲真话只是他用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幌子。他的两面派手法和胡风是一样的。

15.欧阳某某：束星北是国民党高级特务，一贯毒害青年，破坏教学。

16.李某某：今天是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就是要识破束星北真正面目，他的(真正面目)是大资本家、流氓头子，不是科学家。华岗在俱乐部宴请老教师时，我亲眼看到他借酒装疯卖傻，谩骂党的领导，说华岗校长就是与他作对(群众义愤填膺，一致要求他交待谁是他主子，他竟然说："我的主子是毛主席，是全国人民！"激起了群众无比的愤怒，要求将他的校徽摘下)。崔教务长：今天大会上可以看出束星北面目，看出他对揭发批判的态度。群众给他机会要他交待，但他却顽抗狡辩。我代表党委宣布他停职反省(几个人冲上去强摘下他的校徽)。⑧

不堪其辱又无力自救的束星北想到了自杀，这时，王淦昌闻讯来信询问，束星北在给王淦昌的信中表明自己绝不屈服恶势力，想以一死来告别世界的心态。

淦昌兄亲及：

我在军令部技术室的事及其他与政治有关的事均在"思想改造"时全部毫无隐瞒的(地)交代清楚(事实上也没有隐瞒的理由，我从未加入过任何党团派(别)，为什么要隐瞒呢？)，请勿挂念。

山大在"肃反运动"中，对我所采取的方法我本不想告诉你的，现在你既然来问，大约也听到一些，我就告诉你吧。自7月20日起，山大就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来斗争我(起初

颇厉害(的)是"以束星北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7月24日我就电告毛主席请予注意,又报告了青岛市委会。到8月13日全校理学院师生在山大党委会的主持下,召开了"斗争反革命分子束星北"的大会,高喊"反革命分子束星北",强迫我站起来。诬蔑、捏造、歪曲事实来证实我是"反革命"(例如说我用"选美国女电影明星"方法来破坏选举而不查一查笔迹,不查票根,就高声喊叫)!极尽一切侮辱的(之)能事,当场予我"停职反省"的处分,下掉我的校徽,污蔑我学气象是为的"打冷门","钻入人民心脏来施破坏"……但我坚信毛主席坚信人民给我的"考验",我始终未发脾气,破口骂(这出乎"某些人"的意料之外)。要不是这几年来对人民政府的信仰爱护,我在这次运动中早就倒下去了。楚华(也被"大骂罚站"侮辱过了)已经要自杀过好几次了。在8－13(日)下午我也想:"毛主席处我也报告过了,现在还是如此,我也尽了我的责任,人民既不需要我,我活在世上也没趣味。"幸亏"小斗"(思想清楚得多)的鼓励,在8－15号我找到检察院(检察)长,那位同志先生真好,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并)鼓励我斗争下去,说以前你是拿笔杆子,现在是拿枪杆子(进行)实际的斗争。(他)扯着我讲了好多话,末了还教(叫)我记着三句话:"真金不怕火(炼)"、"大肚包容"、"忍耐"等。我才鼓起再活下去斗争的勇气,我一直要支持到我身体不能再支持的时候。

这事的原因是1953年学习唯物(主义)辩证法时。我不同意华岗校长所标榜的"哲学一定要管科学(自然科学),唯物辩证法一定要管物理、化学"。一方面我认为哲学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另方面"管"字很不妥。不独哲学不应当"管"科学,连"物理"(现在的)也不应当"管"。"物理"(未来的)一"管"就限制了物理学的发展(华岗校长的言论载在《新山大》83期1953年4月4日)。我不赞同,同时,山大提倡的(在)我看来,(在)很多人看来(这些人本来全在我"反革命集团"内的),山大提倡的是奴隶的盲目服从,而我居然敢不吃那一套,遇事要"研究研究"(也是我的"罪名"之一)。别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刘遵宪也是"集团"的"主要份(分)子"之一,(其他)等(也)如此),我(却)敢向华校长直接提出(异议),(当属)大逆不道,犯君之怒,罪该万死了!

死虽死,真理仍旧要取胜的!我现在等,等法院来查,等上级来查清到底谁是反革命!人生最多不过"死",是别人逼我的,不是我自愿的,我就抚心无愧了。淦昌,记得我最佩服的人是Galileo么?我想绝不会给朋友们丢脸,我也不会给中国人民丢脸,屈服于恶势力之下(的)。

别矣淦昌,请维珍重。

此致

敬礼

弟束星北上1955-8-29⑨

注释

①据束星北档案第一卷第165－168页。

②《揭发束星北破坏人民代表选举》，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③刘洪宾采访录，1995年6月11日。

④束星北在气象研究室被查封后，已被置于"死地"的束星北，仍惦记着他的气象研究室，他多次向上级写信，呼吁恢复气象研究，其科学家精神可见一斑。他在10月13日的信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员会：

我曾于7－28、8－6两次奉上材料，请予参考。自8－13号，山大开"斗争反革命分子束星北"大会后，已有两个月，我向学校借的图书已被全部收回，我主持的气象研究室已被封锁，一切科研活动全部被迫停顿。我的主要罪状"反对华校长"，应当以华岗的反党〈罪行〉暴露〈华岗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罪名于1955年8月25日被捕〉而得澄清〈其余"罪状"多半是无中生有、捏造和恶意夸大〉。但至今我的事没有处理，反革命的帽子还未有去掉，一切研究工作还是封锁着，无法进行。

对我个人来讲，我薪水照拿，我深信"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迟早总要去掉的，我并不着急，不过因此而耽误了科学研究的进行，实在是一个不易补偿的损失，尤其是气象研究职员，全停顿下来，无事可做，对国家也是损失。

也许有人会对你们反映说："气象研究有保密性，在他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进行"，促使有人这样说，他是在那里又说假话了。因为目前我们研究所用的记录〈资料〉，不独丝毫无"保密资料"在内，而且还全是用的美帝的旧的记录呢！替谁"保密"呢？即使我们是反革命分子也应当劳动；假使你们不放心，可以派人监视我们的工作，虽然这样不是顶好的办法，但是还是可以使工作延续不致中断下去，而为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高兴。

以上意见我已於9·23号向崔戎副书记提过，但到今天〈已二十天〉还没有消息，所以不得已再向你们提出，请予以考虑。

此致

敬礼

束星北上1955－10－13〈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33-34页〉

⑤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35页。

⑦東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41页。

⑧据東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24－32页。

⑨東星北档案资料第六卷第60－63页。



9.英雄束星北

其实，大家在“鸣放”之初已经想到束星北了，有人称赞他是硬骨头，是绅士、君子。这种时候，提他、称赞他，是一种比照，是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窝里窝囊的气愤和憎恶。这个时候，大家重新再看束星北，觉得他是个英雄。



東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1956年是一个坎儿。风波频发，挠心事不断：先是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哥穆尔卡在波兰上台。接着匈牙利又出了个纳吉。上台又下台，弄得社会主义阵营危机四起。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犹如大地震，把社会主义阵营震得七上八下。一切动荡之源在毛泽东的眼里，无非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恶果，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问题的原则分歧由此而出。毛泽东虽然认为波匈事件的诱发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可根本的原因却是没有抓住阶级斗争的刀把子："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①这期间，中国的一些城市(1956年9月起至1957年春天)也相继发生了数十起共近万人的工人罢工请愿事件，30多起共万余学生参加的罢课、请愿活动，在农村也发生了退社风潮，还有些农民进城告状。

毛泽东显然从波匈事件中意识到一统天下的危险："……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②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他领导下的中国有足够的准备和自信，几年来，他和共产党为一个新兴的国家做了不少事情：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写了序言和按语，领导了肃反运动；推行了合作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也写了序言和按语。这一系列的运动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基础建设"，有了这个基础建设，就踏实而自信。因而，毛泽东1956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自信地宣称：阶级消灭了，阶级反抗不存在了。"中国社会'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他明确宣布，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在中国基本上结束。"③

既然阶级斗争在中国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政治生活中取代敌我矛盾而居主要地位，就有必要努力化解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以便更好地向自然开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进行整风。

整风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已是驾轻就熟。第一次是自延安时期，从1941年至1945年七大召开。这次整风很成功，在党内这次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也受到沉重打击。以后又于1948年和建国初期进行了党内整风。

几次整风至少让毛泽东相信，它是保证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有效保证。

中国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后，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有了重大改变。作为执政党，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更加重大。在毛泽东看来，在形势变化面前，很多党员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他们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方法来处理问题。部分人，由于党的执政地位，逐渐滋生了特权思想，屡以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而为党所一贯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又有了新的增长。毛泽东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从波兰、匈牙利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危害，他认为这一事件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警钟，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一次党的教育。因而，毛泽东试图以“整风运动”的方法或代价，使中国避免东欧事件的错误。④



鸟儿在围剿中纷纷坠落了，天空只剩下我们的叫声。1957年的“除四害”运动中，少年儿童在轰赶麻雀。

尽管春消息频频送暖，大地却无泛绿之意，知识分子已“麻木不仁”，更多人却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一俟运动来到便可以好好整一整。建国之后的一个接一个的“清洁”与“洗礼”，已在整体上改变了知识分子思想面貌，多数人适应了自我抛弃、灵魂扭曲的工程。对于执政者的意志，他们已由被迫接受到自觉地接受。今天突然要让他们来鸣放，给共产党挑刺找毛病，他们不敢相信，也难以接受。毛泽东的思路，即使连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没有理解，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会议，对前者仅发了一条简单消息，而对后者则完全没有宣传。鸣放最初的日子《人民日报》仍按兵不动，等待指示。使得毛泽东大动肝火，用激烈的言辞批评了由邓拓把持的《人民日报》，并亲自作了部署后，僵局才得以打破，知识分子开始有节制地放开喉咙。《人民日报》是全国舆论的领头羊，它脸色一变，善于跟风的报纸便紧随其后。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把持的上海首先跟了上来，中央有些部委也跟了上来。一切按着毛泽东的调门吹拉弹唱了。中共中央适时地

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被打过屁股的《人民日报》立刻"闻风而动"，马上就在5月1日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于5月2日配发了社论《为什么要整风》。5月7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指示"向全国下达三日之后，毛泽东将各民主党派的头头脑脑和无党派的重要人物一一请上了天安门城楼。一是给他们烧火，一是给他们吃安心丸。毛泽东的这个举动表达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整风是为了听到不同的声音。

自此之后，"鸣放"的烈火才真正地点燃了。"大鸣大放"一时成为中国最新最热的政治词语。中央统战部为了"听到不同的声音"，不断地把民主党派弄到一起，"逼迫"着他们向共产党"交租子"。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引起知识界、文化界的强烈反响，并很快被《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让人感到一种姿态，一种方向，一种肯定：

近来，我们全党正在过着极其不平凡的日子。在上海市委召集的各种座谈会上，在报纸、刊物上，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大家议论纷纷。一些不明情理的同志，认为似乎是满城风雨了。其实，哪里是什么风雨，正是我们需要的阳光……

有些共产党员觉得这些议论好得很，但是也有些共产党员却说它糟得很。有些共产党员在这种形势之下，感到又怕、又屈、又难、又急。"怕"什么呢？怕大家议论纷纷，不好领导了；"屈"什么呢？自以为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革命，到头来还只落得一个官僚主义，不大服气；"难"什么呢？四面八方的意见压来，以后工作不好干了，没有安定的日子了；"急"什么呢？认为大事不好了，自己又无能耐，如何才能想个主意赶快把纷纷的意见收拾了才好。

看来，党外有议论，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党外的议论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好在哪里呢？好在这些议论，大多数是批评得中肯的，对加强党与非党之间的大团结，全市六百万人民的大团结，对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克服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极为有利。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这类情绪是不健康的……⑤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站出来发炮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站出来发炮了，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也向"老和尚"叫板了。⑥继罗隆基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到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大鸣大放"之火，便成为燎原之势。

由于地缘和环境的关系，北方学府重镇——山东大学在这次鸣放中慢了一两个节拍。北京、上海的一些大学的"鸣放"已经"烧"得热火朝天了，山东大学才开始有节制有分寸地下"毛毛雨"，还不断地"乍暖还寒"。⑦直到5月18日山东大学校党委才对上面的精神有了较明显的反应，在全校召开了动员会并开始邀请青岛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帮助党员整

风。尽管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杨希文在动员报告上再三强调，帮助党员整风，对大学党委提意见绝不会遭到打击报复，也绝不会遭到歧视，但知识分子们却仍显得忧心忡忡，顾虑重重。

最初的几次座谈会上，多数人都是心口不一、欲言又止。即使情急之下提上几条，也大都是皮皮毛毛、隔靴搔痒。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遵守着一个约定，谁也不愿意突破这个约定的圈子。如最初的意见多表现在：一、党委个别领导同志脱离群众情况比较严重，山大让人感觉不到温暖，同志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冷冰冰的。二、领导和知识分子之间缺乏沟通(特别是个别领导干部对旧型大学了解不够。因此，有不少同志反映：以办革命大学的姿态来办旧大学。对老教授的心情理解不深，因而某些方面有"左"的倾向)。三、对民主党派重视不够，某些支部党员对民主党派不大熟悉，认为起不了什么作用，轻视民主党派。四、党员们普遍存在骄傲自满情绪。首先是政治上自满，成了党员好像就高人一头。入党前，群众关系好，一入党，就变了。政治自满也影响到业务自满，认为政治上好，业务不怕。五、学校宣传工具校刊《新山大》很重要，应很好体现"百家争鸣"，但是这个工具偏重报喜不报忧，只登表扬稿子，却从不登缺点。⑧


新山大
263
教師們在党委召开的座談会上
揭露学校存在的嚴重問題
許多教師要求党委下决心：糾正科正路綫，改進思想作風，清除三害，開明是非。
在中文系教師座談会上
在数学物理兩

很长一个时期里，结果总是忤着我们的希望。1957年5月23日的山东大学报《新山大》第一版

也有人提到山大与华大合并的背景，由此触及"宗派主义"这个敏感的题目，但是只是触及却不深入，也有人将矛枪对准了"肃反"，却引而不发。

刘洪宾：

鸣放之初，整风意见虽然提了不少，该说的也说了不少，可是大家却都觉得堵得慌。表面上看，学校党委响应上面的号召并不含糊。上面说什么，下面就跟着喊什么做什么，调子似也不走样，可是人们总觉得有一股子冷刹刹阴森森的空气飘荡在学校上空。给这样

的"空气"罩着，怎么能畅所欲言？上面的锣鼓越敲越响，与北京、上海有关高校相比，山东大学煞有介事、温温吞吞的、阴阴阳阳的气氛让人窝火、憋屈。

应该说山东大学"极左思想"和宗派主义是非常严重的，因而，一有运动，就搞得很凶，问题的根子在于华大。华大是革命大学，骨干力量全是革命军人，都是从战争中或仇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往往按着对敌斗争的方式来治理山东大学。在他们眼里，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教授不是反革命分子就是心存不满的落后分子。当然也是每次运动收拾的重点。比较起来，最残酷的是"肃反"运动。山东大学的"肃反"运动搞得尤为凶猛，老教师或教授大都"过了堂"，"挨了打"，光束星北反革命集团成员就十几个，有的成员和束星北还不熟悉，糊里糊涂地就戴上了帽子。说起来，人人都有一笔"血泪账"，可是上面给你"算账"的权力了，又都各自打开小鼓了。于是大家这时都盼望着有一个能振臂一呼，能将沉闷的天空捅个窟隆的人。自然就想到束星北。束星北的个性脾气无人不晓，特别是肃反运动时期的表现，让人叹服，要不是他的一身硬骨头，束星北反革命集团得有多少人受到牵连哪。有些人就不敢恭维了，肃反小组"刀子"还没落下，就开始咬别人，这就是很多人稀里糊涂地成了反革命的原因。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束星北对待华岗的问题。

华岗是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反党"罪名遭到逮捕的。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55年8月25日，逮捕的当天就开始抄家、搜查，后又改为隔离审查。以后才知道，当初根本就没有确凿的"罪证"，华岗本人也几次要求把问题搞清楚后再捕，可是华岗入狱全凭康生一句话："先抓起来再定罪。"1932年华岗被国民党逮捕时就遭遇过"先执行后调查"的经历，没想到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夜之间就成了囚徒。

华岗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出，犹如晴天霹雳。很多人第一个感觉是震惊：这样的人会是反革命吗？我相信多数师生心里是打了问号的。以后他的帽子多了起来，不光是"胡风反革命分子"了，还有向明反党集团的"后台"、"叛徒"、"国际间谍"等等。这样更增加了一些人的疑虑。在9月中旬的一天，中共山大党委宣布召开大会，揭发批判华岗的"罪行"。被押到主席台的华岗说："我已经被捕了，我向组织上写的材料，可以发给大家，其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事先组织好的一些人开始揭发声讨。检举揭发的人大都是他身边的人，也都是受过他关照恩惠的人。华岗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偶尔以淡漠的眼神看一下发言者。就这样大会连续开了三天，华岗只说了两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希望大家要相信事实。"

那个时候，震惊也好疑虑也好只能深深埋在心底，人们宁可相信上面，等待事实与真相。可是束星北却又不适时宜地走了出来。因身份与处境的关系，揭批华岗的大会束星北没有参加，但他显然从其他的渠道得到了消息，他找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华岗不是胡风反革命分子，一定是弄错了。看着束星北焦急认真的神情，我不知说什么是好。那时候，应

该是他最困难的时期，除去没有公开遭到逮捕，他比华岗好不了哪里去。他自救还来不及呢，竟又想管华岗的事。我说，上面已有结论了，大会上讲的。他神情很是沉重，摇着头说：弄错了，我认为是弄错了。

在山大，束星北和华岗的冲突人人皆知，有时到了针尖对麦芒的地步。束星北也一度认为他的不幸是华岗一手造成的，思想情绪很大，最明显的一次是在1954年年初，华岗在青岛饭店举行新春酒宴，宴请山东大学所有教授。那天束星北显然是带着一肚子情绪参加宴会的，所以喝得很多，平日的情绪便借着酒劲发作出来。他先是来到华岗桌前要求与校长大人碰杯，碰着碰着华岗发觉他已经醉了，就不再喝了，束星北便指着华岗的头责问：为什么派"打手"来压迫他。他所指的"打手"是物理系党支部书记和个别党员，华岗说你喝醉了。束星北说，我没醉，我今天就是要问你，为什么派"打手"？华岗一看这情形，便不再说话。而束星北还是在那里喋喋不休地给华岗理论，几个人赶紧把他拉开了，后来还是我把他扶回家的。我记得路上，醉成一坨泥的束星北说了一大堆"真言"，在当时可以说句句都让人心惊肉跳。事后我问他，为什么当着众人跟华岗吵，他却说，记不得了。

显然华岗获罪入狱并遭到公开批判后，束星北已意识到自己错怪了华岗。华岗没有因同他政见不同和公开顶撞而挟私报复，反倒多次在他人生紧要的关头帮助他或为他网开一面。为了他和一些思想认识上有问题的"过来人"，华岗一直戴着"右倾"帽子。批判大会上，山东大学党委当众宣布华岗的十大罪状，其中有一条就是包庇历史反革命分子束星北。束星北这时才知道，若不是华岗的着意保护，他也许早就"倒下"了。于是他决定向华岗道歉。

束星北就是这样的人，他认为对的事情，不管对方是何方神圣，压力多大，他也一定会坚持到底，而且他的争论方式也常常是咄咄逼人、声色俱厉，他的态度有时会让人觉得尴尬难受，可是他心无芥蒂，过去就过去了，若是他发现自己错了，也一定会登门认错的，从不含糊。程开甲曾给我讲过一件事：1939年国民党参谋长白崇禧到浙江大学参观(那时浙江大学已迁到广西宜山)，下午在校长办公室开了个教授座谈会，会上，白崇禧出于战争的考虑，提出要教授们研究"死光"(激光)，那时候浙大已有个别人在设想长距离不衰的强光，并向白崇禧作了建议。那时，同步激光的激发还属理论设想，或者根本就是幻想，还没人能够想象到它日后会有如此的辉煌(程开甲说，要是那个时候有人能意识到这个东西存在或者展开研究，简直就是神人了)。束星北自然也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因而认为那个教授和白崇禧的想法甚是荒唐，当场就反驳说：胡说八道。弄得白崇禧和那个教授都非常尴尬。可是过后不久，束星北意识到激光的存在，他马上就在教授们参加的教务会上当面向那个自己错怪了的教授赔礼道歉，以后还和他一起探讨研究过激光。束星北在学术上如此，在对待华岗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以后我听说，束星北果真给华岗道了歉，当然华岗他是见不到的，他通过华岗夫人将自己的歉意代转达给监狱中的华岗的。随后，他又数次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为华岗鸣冤叫屈，直到有关部门公布了从华岗家抄出的美元，⑨

他才作罢。

其实，大家在鸣放之初已经想到束星北了，有人甚至在会上提到他的名字，称赞他是硬骨头，是绅士、君子。这种时候，提他、称赞他，是一种比照，是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窝里窝囊的气愤和憎恶。这个时候，大家重新再看束星北，觉得他是个英雄。⑩

青岛鱼山路26号教授大院南头的那幢小楼一直沉寂着，它好久没有动静了。这一年4月份，开始有人进进出出，可是小楼的主人似仍按兵不动。5月份，沉寂的小楼又重新热闹起来，来来往往的人如过江之鲫。一些重新将束星北视为英雄的人，希望他"出山"来做大学"鸣放"的"旗手"(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逐束"和肃反运动中充当过"打手"或"帮凶")。他们要找一个拳头一伸就能将沉闷的天空捣出个窟窿的人，这个人只能是束星北。

注释

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

②同上第324—325页。

③转引《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第33页。

④据《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⑤《解放日报》1957年5月9日第1版。

⑥1957年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面对各党派负责人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老和尚"一语由此而出。

⑦"鸣放"之初，学校的一个身居要职的领导在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精神，要求知识分子大胆向党展开批评时，突然发威，他以手作枪指着台下的学者教授们说：你们要给我整风，可以，不整也不行。毛主席定的。可是在你们整我们之前，我这里先要给你们一点劝告，你们别以为给我们提个意见骂个娘就能把我们给骂蔫了。告诉你们，这江山是我们共产党脑袋扎在裤带上打下来的，谁也翻不了天。



10.出　山

从"肃反"到"小阳春"，中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几个月，束星北由冥府而阳间，像是掉进人家精心编织的恶作剧的陷阱里。尽管身上每一处伤口的疼痛都是真的，可事情本身却如此荒谬。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按说，“肃反”的打击，束星北已死了一次，死过一次的人，面对风风雨雨心似不会再生波澜，可是束星北却又一次“出山”，有意无意地成为1957年“鸣放”的“旗手”或领军人物，因而，再次落水也就势在必然。

从束星北自身讲，追求真理、不甘寂寞的品行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戏剧性变化给束星北提供了再次展现自己的平台。从“肃反”束星北被打入另册到“小阳春”的平反并恢复名誉，中间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几个月，束星北由冥府而阳间，像是掉进人家精心编织的恶作剧陷阱里。尽管身上每一处伤口的疼痛都是真的，可事情本身却如此荒谬。

1956年，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极为罕见而又奇特的年份，这一年有一股温暖的春风，自上而下，几乎一下子就吹透了冰雪深锁的严冬。这一场令人惊喜而又让人难以置信的春风，被知识分子称之为“小阳春”。

“小阳春”首先与上面所说的“国际风波”和国内的民主要求有关，再就是中国的经济形势有了长足的发展。自1953年开始实施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得以提前完成。报纸宣传口径一致称：1956年，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与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全国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60%以上；国家财政收入也比1952年增长了50%。让人更振奋的是中国的钢产量由1952年的135万吨迅速地提高到446.5万吨。在毛泽东和部分上层领导人的眼里，中国确实是仅用了4年时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10年或20年才走完的路程。农业集体化的完成、工业的高速发展，给了毛泽东足够的底气，使他能够以无比的豪气和浪漫主义的激情向全党提出用五六十年的时间完全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口号。在激情与浪漫主义的幻想刺激下迅速膨胀的国家，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与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性。1955年3月的《光明日报》有一篇文章写道：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学术地位和专门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这篇文章完全是“凌汛”的信息。1956年初，上面对知识分子的控制进一步松动。1月7日，一份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出台了。在这份文件的草案中，有一段话令人欣慰：必须对目前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和历史作用有一个根本的认识。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进步分子，

已经占多数，党要求全党一切组织，首先是同党外高级知识分子有密切关系的科学机关、高等教育机关、文化团体、经济机关、企业、卫生机关、军事机关等机构中的党组织，迅速地坚决地消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缺点和错误。1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将草案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引申与阐述：

……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

……

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有一部分科学家，本人愿意做科学研究工作，也以做科学研究工作对国家最有利，却被分配做机关行政工作或者学校行政工作。还有一部分专家，由于工作分配中的错误，完全没有理由地被指定担任他们所没有学过的工作，有时今天叫干这个，明天又叫干那个，可是就不让他们调回本行。

……

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信任和支持不够……有的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甚至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样，彼此缺乏了解，也就容易形成隔膜。①

对于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周恩来提出今后各部门需要做到的三点意见：1.对所使用的知识分子应给予充分的信任与支持，让他们有职有权，重视他们的科学成果；2.改善对他们的使用与安排；3.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如配备助手，解决资料，制订合理的升级及奖励制度等)和必要的生活条件。

1月20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闭幕式上，毛泽东以他激昂幽默天马行空式的口吻阐述了知识分子的作用：

我们在经济上和科学上都还没有独立，重要装备自己不能造，大机器不能做，小的也不成……要建设就要有科学文化，有的人说："没有你们也行，老子革了一辈子命。"这是不对的，没有他们是不行的。这个会议上同志们反映有人说了这样的很不聪明的话。这是没有知识的话，不聪明的话，现在要革什么的命？是文化革命、技术革命、是革无知、愚蠢的命，没有他们不行，倒是靠我们老粗不行。要向干部很好进行教育，我们打的仗不同了，现在要打什么仗？要到一万八千公尺以上，要快到比声音还要快，不像过去骑马那么

快，超音速，没有他们能行吗？不行的。②

1月21日，中国科学院各学部负责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分别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李富春和各部委负责人报告各学部所属研究工作。竺可桢报告的是生物学、地学。他的报告赢得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掌声。

束星北在山东大学的"经历"，竺可桢早有所知，之所以没有动作，是因气候条件不成熟。现在"春风"自上而下，眼看成了气候，竺可桢顺势而为，利用会议的空暇，向周恩来提出了束星北，并将提前写好的要求给束星北落实政策的报告呈给周恩来，周恩来作了批示后，马上转给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协主席陈毅。

在一些老科学家的心目中，陈毅是个豁达、率真富有诗人激情的政治家。在他身上可以感觉到宽容理解和真挚的热情，因而他同那些被"仇恨"和"使命"培养起的干部区别还是很大的。他知道科学、教育和人才对于一个新政权意味着什么。因而他尊重他们，也试图能够与他们真正地坐到一条板凳上。陈毅善于统战也有着统战工作的不凡经历，但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不用权谋。他不是那种功利性很强的当权者，他善于用自己的谋略和热情来激发他们的热情和创造力。在针对知识分子的一些运动中，他不像有些人习惯性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而是艺术地削减过滤一些冰冷的伤人的芒刺，尽量避免一些伤害他们的做法。因而他在很多老知识分子当中有着很高的威望。陈毅曾自称"桥梁"，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纵横驰骋在被毛主席称之为"第二战场"的统战战场上，他不断将自己认识发现结交的高级知识分子引荐给毛泽东与周恩来。

陈毅也是竺可桢最早相识依赖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一个新政权大潮一样席卷而至之时，作为家族与国民党上层有着不可割舍的血缘关系的竺可桢何去何从，不是没有顾虑。解放前夜，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力劝他"乘机飞穗"，而后转道台湾。傅斯年、蒋经国也频频向他发出邀请，但都被他拒绝。可见他主意早定，对已呈秋木落叶之朽的国民党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可另一方面，他对滚滚而至的"红潮"也抱着疑虑：一个缺少文化素质和文化训练仅靠着仇恨和一些简单的理论武装起来的队伍能否引领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走向科学与文明，他心中无数。正是陈毅让他消除了这个疑团。上海解放刚刚一周，中央研究院集会纪念建院21周年，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上海市市长陈毅闻讯特意赶来祝贺。在那次会上，陈毅作了一次大大出乎研究院的学者们意料的讲话。他一口气三个多小时的讲话，全部围绕着一个新政权怎样充分发扬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题，让一些战战兢兢、心里直打小鼓的"过来人"有了石头落地之感。日后陈毅便与老科学家们结下了不解之缘，隔三差五地就要找上个题目与他聚上一聚。讲话也更显随意大度。竺可桢也正是从这个共产党的高级将领身上感受到一个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需要。竺可桢进京后，与兼管科学技术的陈毅的交往便更多了，给他的感觉是，时机和条件合适的话，有关知识分子的事情，只要能够上达到陈毅那里，大都能有一个较理想的结果。

尽管如此，陈毅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为束星北落实政策时，心里未必没有梗阻。这之前，他从山东大学党委有关人的汇报中已对束星北产生了"印象"，这个"印象"显然与竺可桢对束星北的描述颇有差异，因而，陈毅一边责成下面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解决束星北问题的同时，胸中也落下一口气，一口不快之气。这口不快之气，一定要找个机会发泄出来。

刘洪宾：

陈毅亲自为束星北落实政策，这事我们都知道，但落实政策的过程是有些曲折的。首先是陈毅本人，他在着手解决束星北的问题时，专门对他作了了解。束星北的形象早已固定，山东大学的汇报即使是客观的，也一定会给陈毅留下较坏的印象。因而，他在督促下面为束星北落实政策时，也一定要将自己的另一种态度表达出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让张玺把这层意思捎给束星北，只是不知道，张玺有没有把陈毅的原话告诉束星北。

张玺是中科院海洋所副所长、生物学家、九三学社青岛分社主席，与我很是要好，他曾亲自给我讲过这件事。他说那是1956年4月，全国民主党派在京开会。他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的宴请晚会上，陈毅作了简短的讲话后，举起酒杯给代表们一一敬酒，来到山东代表的桌子前，他问道："你们这里有个叫张玺的先生吧？"张玺说："我就是。"张玺说他和陈毅从无相识，可是陈毅竟然能叫出他的名字来，显然他在这次会上对他作了了解。陈毅对张玺说："你是海洋研究所的教授，我向你打听一个叫束星北的人。"张玺一听束星北的名字吃了一惊。张玺同束星北虽有交道，但交往不深，不过束星北是什么样的人，张玺非常清楚。张玺说，"是的，我们认识。"陈毅说，"听说你们是老乡哪。"张玺没料到陈毅竟然对他了解得这样详细。他只好如实相告。陈毅说，"来，我敬你一杯。"也不管他喝不喝，自己一口饮下后说："你回去跟这位束大人捎个话，就说是我说的。告诉他，以后不要再骂共产党了，共产党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张玺当时很为自己这位老乡担心，以为他又惹了什么麻烦。没想到回去后就得知大学已开始为束星北落实政策了。

从张玺的经历可以看出，束星北的"政策落实"是多么不易，尽管那时候大气候已经有了些变化。可是束星北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的意识里，好像一切都是应该的。③

中共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关于
山东大学教授束星北专案结案材料综合报告

中央、省委肃反领导小组：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兹将束星北问题的调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束星北、男、现年50岁、浙江(江苏)南通人。家庭成分资产阶级兼大地主，个人出身自由职业者，现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

家庭情况、个人简历(略)

主要问题及查证情况：

一、从1944年7月至1945年9月去匪军令部技术二厅技术室任职经过情况，通过其在该室的同事陈维昆、江乃霁、束建(健)北、蒋素卿、凌德洪及介绍该去技术室之军统分子徐名冠调查结果如下：

1943年匪军令部二厅在无线电工程技术方面由于缺乏技术人员，当时之第四处处长魏大铭，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曾签请军统局本部准许原有之军统工作人员投考大学电机系或物理系深造。1943年9月即派军统分子徐名冠去浙江大学电机系学习无线电方面的技术。该徐去浙江大学不久，魏匪大铭又给徐去信，令徐在浙江大学物色电机系或物理系的毕业生去军令部担任无线电工程教官。该徐接此信后即委托物理系讲师孙××(名已记不清)帮助物色。此时正当束星北在浙江大学永兴分部物理实验室设计了一架用6个伏特低压做屏压的收音机，在浙大闻名。因此徐名冠便委托讲师孙××请"束"代为物色物理系的学生和助教。当时"束"对讲师孙××说："假使待遇高我倒愿去……"(从调查材料看，"束"当时因抗战时期与家庭经济断绝，当时教授待遇每月只有法币2、3(两三)千元，同时家庭负担很重，生活较困难)，因此孙××即将"束"直接介绍与徐名冠相识，后"束"对"徐"说："假使能够有1万元1个月的待遇能够供我一家的开支，我就可以去。"在这种情况下，徐名冠答应写信去魏大铭处请示。当时徐名冠在给魏大铭的信中提到"束"在待遇上的要求，以及报告了束星北所设计的低压收音机的情况，并说束星北教授是一个可以做研究工作的人。不久魏大铭即回信答应满足束星北的要求，每月给他一万元的待遇，同时并将去重庆的路费一起寄给徐名冠。徐将魏的信给束看后，"束"即动员他的物理系助教陈维昆，对陈说："现在军令部有个通讯人员训练班，想叫我找几个人去担任无线电技术方面的教学工作，你是否去？早点去迟点回来，利用这个假期(当时是'浙大'将要开始暑假的时候)我们可赚几个钱，这对自己经济上也有些帮助，也算间接对抗日有帮助……"后来陈维昆考虑了几天即同意与"束"同去……

1944年7月束星北与陈维昆去军令部后，先到綦江电讯人员训练班住了1、2(一两)个星期，在此期间主要是对该班的徐××谈了些如何教学的问题，被魏大铭接去重庆技术室后，当即给"束"找了一幢小洋房住，并赠送"束"手表一只、派克钢笔一枝。另据束健北称：曾听束星北对其说魏大铭当时曾对束星北说："只要你来干，挂不挂名没有关

系，就给你钱……"1、2(一两)个月后束星北又回綦江电讯人员训练班一次，当时曾带去李博(重庆女子师范学校教授)，去后曾对班内人员说要准备做实验工作，并请李博、朱福(炘)准备实验讲义，又叫训练班盖了一个大草棚给学员做实验时用，此阶段"束"给学员作了三次实验(电池实验，简单收报机实验，简单的发报机实验)。于1944年10月即又返回重庆技术室直至1945年9月，在此将近一年的时间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1)指导陈维昆(束在浙江大学时的助教)、谢立惠(重庆大学教授)做了一个低压收发报机；(2)指导束慰曾("束"之侄子)做了一个电台远近测样器；(3)指导陈维昆、谢立惠、束慰曾研究装备雷达的实验工作……据调查该"束"在军令部二厅技术室内，主要负责电讯方面的研究工作，待遇是很高的，每月薪水是相当于两个少将的(收入)(当时技术室魏大铭是少将级，只拿"束"的一半薪水)，(束)在职责上一直担任顾问(是属编外录用人员性质的)。据劳改犯徐名冠供称：在介绍"束"去技术室后，徐曾到技术室看过"束"一次，当时"束"对"徐"表示好感，并对徐说："我在这里不过是出出主意，指导指导一些技术人员不能解决的问题，很少自己动手，做的是顾问。"又说，"我好像是做客人似的，一切事情，魏都会给我安排好的。"据陈维昆称：到军令部后该陈曾对"束"说："这个机关现在抗战时期还是对日本人的，抗战胜利后是否会成了对国内的问题，这样是否好？"当时"束"说："据我看法不会的，即便就是这样子，不'请委'也可以随时离开的。"1945年日本刚投降时技术室人事科长曾催该"陈"填写入国民党申请书和报请委任的表格时曾对"陈"说："从前你们在这里发的薪水是另外想的办法，在编制中是没有的，你们必须请委后算编制以内的人员才能发，不然是不能发薪水了。"陈维昆将此情况告诉"束"后，"束"说："不用理他们。"据江乃霁称：当时技术室人事方面一再催我请委，并说不请委没钱了，当时该"江"问束星北是否请委，"束"回答说："不理他，你们请委钱就少了，他们不敢不给钱，不给我们就走……"(按：该江乃霁一直在技术室干到解放，"束"等走后，他请了委，系解放后被捕判刑3年现刑满释放的分子。)据陈维昆称：1945年8月日本刚投降两个星期左右，某日陶士珍(技术室主任)召集了技术室全体人员开会，会上陶士珍除了谈了些改组的情况外(后)并宣布说："现在技术室改组了，现已承蒙'束星北'先生同意担任副主任兼总工程师……"另据江乃霁称：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约1、2(一两)个星期时，该"江"亲眼看到技术室布告板上贴着匪军令部二厅四处之派令一张，上印有："兹委任陶士珍为技术实验室主任，束星北为副主任，此令。"以后，"束"即让随其同去的陈维昆、江乃霁等拿出个人学历及服务证件送上去请委，"束"当时也在请委。但在他们的请委书还没有写好，束星北的请委书虽然送上但没有被批准(当时，"束"请委的是中将未批而批为少将)，在这个同时技术室内部的编制以内的人员分发胜利奖金，而"束"等是属编制以外的人员，没有胜利奖金。

束星北对此问题大为不满，并去找陶士珍，又与"陶"发生冲突，之后，"束"即带领陈维昆将已装在雷达上的一部分浙江大学的器材拆掉带回宿舍。技术室内当即去"束"宿舍进



行了搜查，并派了两名卫兵把"束"扣在宿舍内。共扣押了两个星期，后由蒋素卿(女，当时该蒋与束姘居)去重庆找到束佺保(系束星北之弟，当时在重庆任自由论坛报总经理，曾在重庆郊区陆军大学受训时与魏大铭同学，因此与魏关系很好)的住处，当时束佺保不在家，而蒋把束星北被扣的情况告诉了佺保妻，当时束佺保妻说："没有关系，等佺保回来告诉他，想办法。"第二天，"束"即恢复了自由返回了浙江大学(时间是1945年9月左右)。据劳改犯徐名冠称，"束"回浙大后某次曾遇见过束，当时束对徐说："那个地方不是人蹲的地方，尤其是那个陶士珍不是东西。"

根据上面材料分析，该"束"去技术室的主要原因，是敌特机关缺乏电讯方面的技术人才，特务头子魏大铭用金钱笼络、引诱，而"束"本人也是为了金钱。是一种聘请性质的(问题)，"束"到技术室后一直是担任顾问，并无实权，自己为了多拿钱，也不愿请委……

从现有的几个线索除蒋素卿、凌德洪不了解"束"是否参加过什么组织外，陈维昆、江乃霁、束健北、徐名冠都说，"束"未参加军统组织和国民党组织。他们所谈的情况基本是一致的，调查中也未发现他们在解放后有过联系，不可能串供。在缴获的敌特档案中亦未发现"束"的材料。

再从其在技术室内不准许陈维昆、江乃霁等请委，其弟束健北去技术室后，该又让其弟改名为束佳宝，并对其弟说："这个地方不是个好机关。"

因此，怀疑"束"在此间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是没有根据的。

尚未彻底弄清的问题：据陈维昆谈，束星北在技术室内任顾问时曾两次带着外国人在室内参观，一次是1945年4、5(四五)月间曾听室内人说上面要派人来看看，叫准备一下，不久见"束"领来一个美国人，当时还听到"束"对那个美国人说："我们的工作有人做，但主要的困难是缺乏仪器和材料，希望你们在这方面的帮助。"后来又带进两个英国人，当时又谈到物资问题，有一个英国人说："可以考虑给你们一部分。"(据束星北事后对陈说，这两个英国人是从英国伦敦英国情报机关派来视察工作的，他们有一部分无线电器材在印度，不准备带回英国去，可以给我们。)又据陈维昆、江乃霁谈："束"在技术室工作阶段经常不到技术室。有一次陈维昆曾对"束"说，请他多到技术室指导一下工作，当时"束"回答说："我在外面为他们搞从美国的租借法案中要物资的工作。"分析这个租借法案，可能与"束"接触外国人时要过"物资"有关系，但估价(计)在外面搞租借法案物资时还可能与外国间谍人员有接触，是否在此间与外国间谍有什么勾当或被敌特机关利用，尚无实际材料。目前只能挂一笔账，以便在今后对其长期考察中作参考用。

解放前在浙江大学任教授时，参加过反苏反共游行，并为首高呼"枪毙斯大林"、"打倒新华日报"等反动口号，曾污骂我党为"吴三桂"(据"束"谈是因蒙古问题对苏联不满而参加反苏游行的)。

二、在此次肃反运动中群众揭发和浙江大学转来该"束"解放后的一些反动言论，经查

对，按其性质分述，大致如下：

（一）属于学术观点方面的问题（略）

（二）谩骂党政领导，谩骂党、团员和非党人士（略）

（三）其他：

（1）据浙江大学转来的材料该"束"在三反时说："红旗所过之处，一片凄凉，是鬼的世界。"军统特务胡步青（浙大物理系讲师）被捕后"束"说："不可能是特务。"后又扬言说，"胡被捕后受到了酷刑，指甲也被剥掉了。"

（2）"新三反"时"束"说："该反一下了，现在农村里的干部奸淫烧杀非常厉害。"

（3）棉布统购统销时让"束"去听报告，"束"说："不用听了，这是政治手段。"

（4）总路线学习，讨论对资本家改造问题时，"束"说："现在那（哪）里还有资本家，他们也是拿薪水的。"

（5）在系内一次小组会上，"束"主动提出问解放后的生产发展、物价稳定的原因是什么？当时有人回答是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该"束"表示怀疑说："不是"，但也提不出别的理由来，只又说："可疑，可疑！"

（6）1954年省人民代表选举时"束"对我党李哲明说："我们现在（的）选举是不民主的，因为候选人早已确定了，代表们到那里选举只是'画圈'。"并要李给他将此意见向上级提出。

（7）当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公布时"束"对王振泉（山东大学老师）说："胡风（是）反革命？不敢说，谁能保证他将来不和铁托一样。"

（8）1955年7月8日，在讨论胡风反革命（的学习材料）时，有人提出有缺点有错误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即一条是改正错误，另一条是坚持反动立场。"束"即反对说："不革命不一定是反革命，可以有第三条路。"并举例说，"尼赫鲁就是不革命也不反革命。"

（9）党支部曾布置物理讲师陈成琳在接触"束"的当中时常帮助"束"，但在接触时有一次谈到党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时，"束"说陈是迷信共产党，并说："我也曾迷信过宗教，后在美国迷信过共产党，并找到该处党的负责人谈过话，这个人坏极了，有种族歧视，从此我再也不相信共产党了。解放后我又相信共产党（了），思想改造时打了我一阵，又冷下来了。来山大之后起初也很热心，但同学们向我提意见，显然党组织不希望我热心工作。"当陈谈到应靠近组织时"束"又说："对党还是疏远一些好，你愈靠近组织他们对你的要求就愈高，你还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地主，被斗的，党不会相信你的。"

对束星北问题的认识及处理意见：

该人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观点，一向崇拜欧美，宣扬资产阶级科学论点，提倡实用主义，主张物理至上。经常污蔑我党及诽谤苏联，歪曲马列主义、曲解党的政策，藐视党的领导，谩骂民主人士等。这说明该人思想极其反动并公开散布反动言论，品

质极为恶劣。但经调查目前尚未发现其反革命政治身份，只证实其任过反动职务，且无政治背景。解放以来对其所揭发的问题大部分属反动言论，尚无以反革命为目的的破坏活动，因此不应属反革命范围。

经分析其所以产生以上之反动思想，主要是其出身于地主资本家，自幼即出国受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深受资产阶级反动毒素的影响。解放以来，由于其个性粗暴蛮横、高傲自大，不愿吸收新的事物，拒绝别人批评，不虚心学习无产阶级理论知识，对马列主义学说〈认识〉极其浅薄模糊，因此其反动论点在其思想领域中仍占统治地位……

为了达到教育和改造的目的，我们〈的〉意见对该人采取严厉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其逐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并应摘掉反革命的帽子。但该人不宜做大学教授工作，可调离做专门科学研究工作。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指示。

中共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办公室

1956年4月1日④

犹如梦幻舞台，山东大学一夜之间，物是人非。

市委肃反小组于1956年4月3日对束星北做出了“结论”，结论称：经过调查并没发现束星北有反革命政治身份和反革命行为，组织决定摘掉他的反革命帽子。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束星北对摘帽的态度，不但没有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反而是“得势不饶人”：既然特务或历史反革命已不存在，“反党”和“反苏”的问题呢？人民代表的“选票”问题呢？另外还有一些子虚乌有的罪名呢？束星北要求党委作出解释。

实际上，早在2月初，“春风”就开始吹拂了：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开始给历次受到运动冲击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安排工作。对一些住房面积小、朝向不好的知识分子重新安排住房，配发家具。有的城市专门为高级知识分子增设“特权”，如生活上多安排食油，乘车可以不排队，优先上车。有的城市卫生部门还规定：高级知识分子到医院就诊，不用排队挂号，随到随诊，优先住院。有些大学则让高级知识分子与学校最高领导人书记或院长一起在小灶就餐，并给一些学术功底深厚的老知识分子配助手或资料员。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随即成为一个小特权阶层。山东大学尽管有些人对如此优待或宠惯知识分子心有抵触，可在落实中央精神上也不甘示弱。

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精神
我校对教师的工作时间及生活作出新的安排

本刊讯 我校党委和行政(部门)，为了保证教师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根据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精神，对我校教师的工作时间及日常生活进行了适当安排。现将各项安排情况分列如下：

(一)积极地合理地安排了教师的业务工作时间。规定教师每周除星期二(或星期五)下午，用作会议和接洽公务时间，星期六下午用作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学习时间外，其余每周四个整天和两个上午(共40小时)全部作为教师教学或科学研究时间。并规定在教师从事业务工作时间内，有关单位不召集教师开会和接洽行政工作。以便教师能够集中精力和时间完成自己的业务工作。同时校长办公会议为了今后加强讨论教学研究工作，对于一般行政工作随时汇报解决，有关重大事情也须事先作好准备，减少(省)时间，以更多的时间进行教学研究工作。

(二)为了照顾教师生活的困难，于本年春节前普遍深入地进行了解，对生活有困难的教师进行了补助，计补助教授11人共发665元；副教授13人共发660元；讲师24人共发870元；助教20人共发650元。以上总计补助68人，共发补助费2845元。

(三)对教师住房，为了适当解决备课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目前急需调整宿舍者为20家，根据学校现有宿舍条件，已经调整者有教授5家、讲师3家、助教4家，共计12家。其余8家正在抓紧时间进行研究适当调整。同时对教师宿舍用的书架，也一并进行了解，计需增添书架49个，均已分别送至各宿舍。

(四)对教师的粮油，除在春节前经调查缺粮者有教授4家、讲师2家、科长2家、助教职员12家，共补助粮食212斤外；最近又派专人至各宿舍普遍了解，现缺粮者有教授7家、副教授2人、讲师10人，每月共缺粮232斤，已与青岛市粮食局联系研究予以照顾。对教师的食油，在实行食油定量供应以后，已与青岛有关单位联系研究，凡我校教授、副教授即开始每人每月发给照顾食油半斤。自本年1月份起又经与市里联系，凡我校讲师以上每人每月发给照顾食油增为一斤，现全校共有教授副教授101人、讲师119人，共220人，每月共发食油220斤，现已发至3月份。

(五)为了教师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方便，现已与市财委研究，确定由青岛市合作社在本校添设长期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站，现该社正在筹划办理，以便教师采购，而免往返市场多费时间。

除以上而外，对部分在干部食堂入伙教授、副教授、讲师现在计划将饭桌固定(以前不固定，随到随吃)，同时将饭菜送在(到)桌上，设有专人照顾。并对所需饭菜票，以前是到膳宿科购买，为节省教职员时间，自3月份起改由膳宿科根据每人每月需要，按月分别送给本人，所需饭菜票款由财务科于每月发工资时代为收交膳宿科。⑤



显然这股子越刮越劲的“春风”对束星北的政策落实起了作用，尽管肃反小组和山东大学对此颇有抵触，可是在上面和束星北的“两面”夹击下，不得不作出让步：

束星北教授：

你在1956年6月30日给党委写的信，已收见。关于你在肃反运动中的问题已有书面结论。(附件)来信中所提"反党"、"反苏"的问题要作正式结论，经我们研究认为：

(一)你的问题不属于反革命性质的问题，政治嫌疑应予取消，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应予摘除；思想作风上的缺点，要在今后以同志式态度，通过诚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加以解决。

(二)关于所提"反党"、"反苏"问题，我们认为你在政治上是不存在的，应该否定。运动中有的同志曾提出一些属于学术思想方面的例子，作为"反党"、"反苏"问题看待，我们认为学术思想问题不应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学术思想问题应该通过自由争论的方式，求得统一认识。对于思想问题首先应该由自己加以正确认识，分清是非。在当前的形势下，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们殷切地希望你在政治上、业务上，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加强团结，更好的(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此致

敬礼

附：结论一份

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

1956年7月20日⑥

这个“让步”，较肃反小组的“结论”，有了大大的突破，它等于将以前对束星北的大部分指控和罪责否定了，否定了对束星北的指控与罪责，也就等于否定了山东大学党委和在党的领导下针对束星北的一切“成就”。大学多数领导(特别是华大派的领导，也包括很多老知识分子)对此深感不解(这时有些富有政治阅历和政治嗅觉的人开始接近束星北，他们试图从这个极为特殊的人身上，了解上面的这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力度和时间)。在政治上，人到了这一步，似乎就到了极限了，可束星北仍然“得寸进尺”，这让很多“待遇”远不如他的人匪夷所思。

与束星北理性态度相对应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群体。对这个群体而言，短暂的“小阳

春”更像一次赦免或恩赐，他们对此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据有关人称，1956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几天后，青岛市委副书记孙汉卿在刚刚落成的青岛市兰山路礼堂对报告精神进行了传达和解释，并代表青岛市委当众表示要向知识分子学习，同知识分子一道“向科学进军，向知识进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时，会场上有人开始抹眼泪，最初是星星点点抽泣，渐渐汇成一片，当孙汉卿以激动的口吻代表青岛市委向在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高级知识分子致歉时，会场的哭泣声如波如涛，终汇集成海啸般的号啕大泣。有人突然站起来高喊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雷鸣海涛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在会堂上空翻滚了很久很久。

据称，惊喜莫可名状的知识分子纷纷以各种形式向共产党和毛主席表示谢恩，有人当场在会堂过道上向主席台上的毛主席肖像下跪，有的会后在家里搭台设案，向恩人摆供烧香。但这些还不足以表达他们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情感，很快，山东大学就掀起了向党组织靠拢的热潮。

整个3月份，山东大学掀起了“听党的话，努力改造，提高自己”；“响应毛主席号召，使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热潮。与此同时，一些新老教师，在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大学党委落实中央精神的热潮鼓动下，纷纷找党支部、找党委谈话，提出了自我改造和争取入党的决心。“最近一个时期，几十个老教授写了自传，申请入党”。⑦

7月21日，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崔戎、教务长吴富恒和海洋物理学家赫崇本、物理系主任刘洪宾一同来到鱼山路26号高级教授别墅区，给束星北送呈山东大学的“结论书”，并代表党委当面道歉。这样的“待遇”在一般的教授中(不管他多么有名气)，恐怕想也不敢想。按说，山大党委已经给足束星北面子了，可是束星北仍不满足，他要把自己做人的尊严和名誉全部索回。

刘洪宾：

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在上面有背景，只是觉得为了国家的经济和科学的发展，上面确实下了决心。束星北实力超人，尽管他身上毛病不少，但为了科学和教育事业，国家还得用他。

那天，我陪着书记、教务长和赫崇本来到束星北家，尽管已事隔好几个月了，“肃反”的遗迹依然随处可见：木地板虽经重新拼接安装，但很多地方对不上碴，踏上去便咕嘎咕嘎地乱叫；修补过的沙发也塌陷了，坐上去屁股就会感到坚硬的钢丝弹簧。不知为什么那



个穿凿得洞孔累累的墙壁没有修补。听说，春节之后，党委就专门派人来修补，可是被束星北拒绝了。看着这一幕，崔戎、吴富恒等都很尴尬。好在束星北还是很客气，他遣妻子为我们沏茶倒水，洗水果。大家闷着头喝了好长时间的茶，就是无人打破场子，我们只能拿眼睛瞅崔戎。崔戎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革命家，他从最初中共清河区党委的一张宣传传单——《群众报》总编辑开始，官运虽不敢说亨通，升迁图却也是一直向上起伏的。以后，他又从总编辑做了宣传科长，从宣传科长升到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工委书记。1949年当上了华东大学教务长。华东大学和山东大学合并后，他升任为党委副书记兼教务长。来山东大学前，他很少同高级知识分子打过交道。在他的眼里，那些高级知识分子或者说"过来人"，都属"另类"。但他人朴实，忠诚，凡上边说的，他一定会坚决支持响应。即使有些事与自己的心里相抵触，也绝不以私害公。因而，上面一吹风，他便着手落实束星北的政策，一直都不含糊。

见我们都不说话，崔戎才开口了，他没有什么口才，几乎是照着党委的结论书念了一遍。这时候，有了点气氛，大家都开始说些安慰话。束星北陪着我们喝茶，不说话。直到崔戎准备起身告辞时随口问了句，你对党委还有什么要求，尽管向领导讲，束星北才开了口。第一，他表示对山东大学党委的这份结论书不满意，因为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回答或解释。第二，他要求党委为他的平反履行一个形式，比如说开个大会公开宣布一下。崔戎一听这两条意见又回身坐了下来。经过"讨价还价"，第一条，崔戎很快就答应下来，可是第二条，他感到犯难。一级党委公开在全校大会上向教授道歉，似不合常理。领导的面子也不好搁。可束星北话也跟得上，他说共产党不是说，最讲认真，最讲实事求是吗？是面子重要还是原则重要？吴富恒说，有了这份材料，党委又派我们做代表登门道歉，不就是表明我们的态度了吗？为什么还要公开声明？束星北说，这是两回事。人家是相信你们还是相信我，你们不公开，人家会相信我手上的结论吗？如果相信我的话，也就不会有历史反革命一说了。再说，既然你们能够登门道歉，又为什么不能公开呢？我们又坐了一个时辰，无论怎么商量，也无法说服束星北，崔戎只好怏怏地说：这事恐怕还得党委研究研究。我现在无法答复你。⑧

尽管上面的风吹得很盛，可是真的要为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或提高待遇了，很多领导还是很有抵触的。他们认为，上面的风吹过了头，把个刚刚吃了点苦头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过来人"抬得太高。不但将好不容易缩小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又拉大了，还助长了一些人的特权意识，让他们都感到飘飘然了。这样抬高"同盟"，实际上是贬低了"主人"。至于束星北的态度，很多领导更是不满。他们认为，一些人确实在运动中受到了冤屈，吃了苦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今既然要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为他们恢复名誉，为的是让他们在教育和科研上驾辕拉车。让人家干活，自然要给些好处。对这样的人，即使让他们享受一点特殊优待政策，也说得过去。可是束星北与他

们不同。束星北过去就反党，至今仍反党，将来还一定反党。⑨因而，在束星北问题上失掉了原则，大学将会陷入被动。

物理系的支部书记、理工学院院长和一些自觉深受束星北之害的师生，挽起臂膀阻止束星北再回物理系，学校的多数领导则认为，党绝不能向一个(即使不是历史反革命)一贯反动的教授当众平反道歉，如果这样做，无疑是对革命的背叛和亵渎。但束星北也不退让，他的原则是尊严和事实。双方僵在"原则"上。

1956年9月，山东省副省长晁哲甫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后，僵持的局面才得以打破。晁哲甫力主大学党委向束星北作出让步，当众宣布平反结论并道歉。

山东大学的第三任校长晁哲甫出身于书香世家，20年代他从河北直隶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便开始了小职员的生涯。他于1926年加入共产党，并很快成为革命的中坚分子。他的学问和组织培养干部的才能及领导暴动的能力，得到上级的赏识，从而使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从县委书记、边区特委统战部长、行署主任到边区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几乎每一年就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可是这样一个忠贞于党的老党员，却又是一个以宽大为怀、与人为善的君子。他一上任，就解决了束星北与大学的对峙。他认为既然党委能够登门道歉，就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道歉并宣布平反结论，无非是个范围问题嘛，这有什么不同呢?

1956年10月17日下午4时30分，山东大学党委在山东大学大众礼堂当场宣布束星北的平反结论并当面向他道歉。山东大学物理系、海洋系等各系的教授和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参加了这个大会。

中国共产党山东大学委员会:

宣布关于束星北问题的结论讲稿

1956.9.28

物理系束星北教授在肃反运动中，曾被追查，并于1955年8月13日，在理科各系教职员生大会上，被斗争过，当时经上级批准，由党委宣布"停职反省"。在其问题查清后于1956年4月3日，由当时的党委书记，将结论告之〈知〉束教授。上述结论已于1956年9月1日，书面通知了全校各单位。现将查对经过及结论，向到会同志宣布如下：

在1951年—1954年期间，先后有人检举束教授在1944年—1945年期间，在綦江电讯人员训练班，及军令部二厅技术室工作时，有重大反革命嫌疑。据此，经上级批准，在肃反运动中曾将束教授列为重点进行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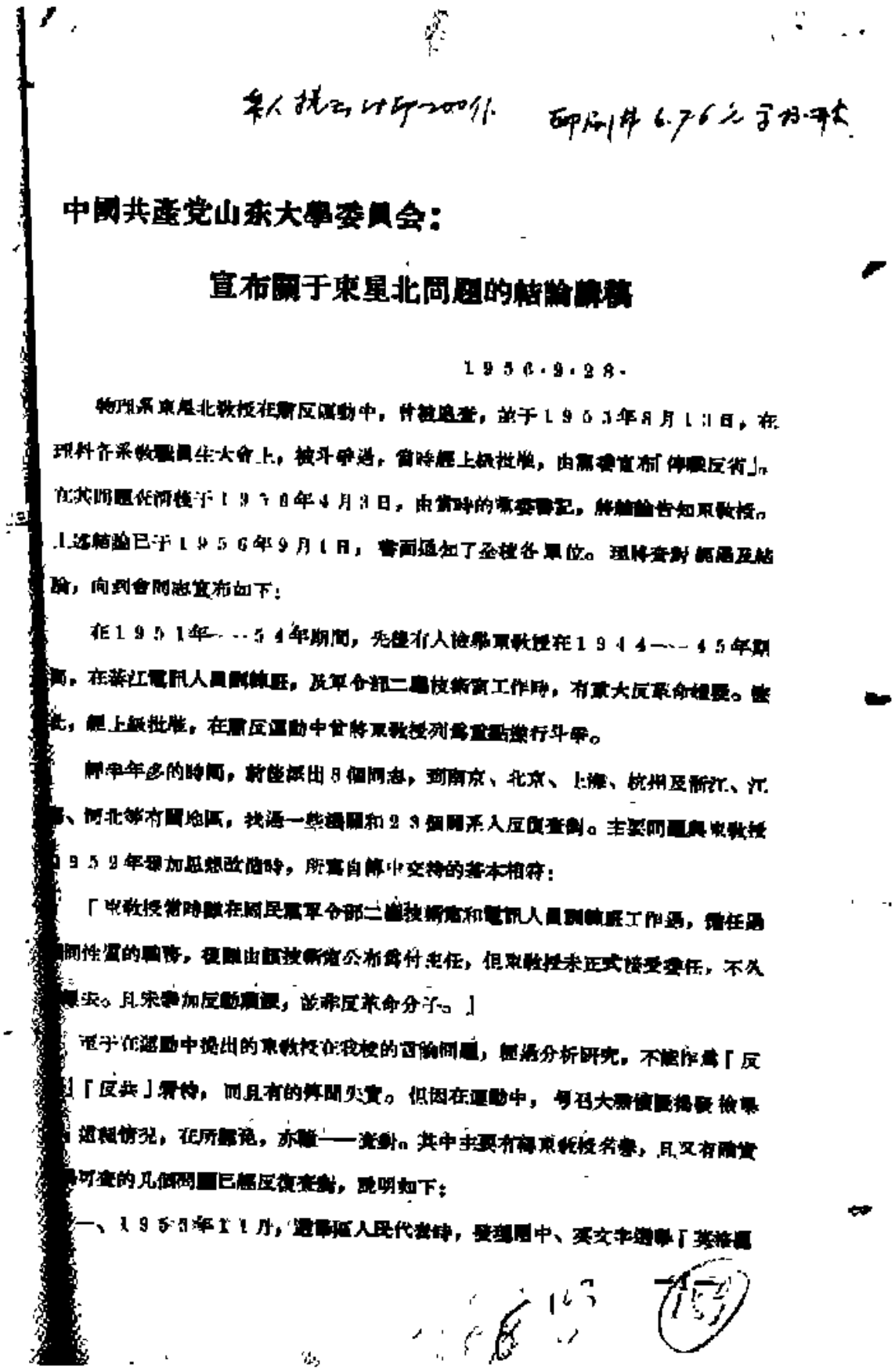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前后派出8位同志，到南京、北京、上海、杭州及浙江、江苏、河北等有关地区，找过一些机关和23个关系人反复查对。主要问题与束教授1952年参加思想

改造时所写自传中交待的基本相符：

束教授当时虽在国民党军令部二厅技术室和电讯人员训练班工作过，担任过顾问性质的职务，后虽由该技术室公布为副主任，但束教授未正式接受委任，不久即离去。且未参加反动党派，并非反革命分子。

至于在运动中提出的束教授在我校的言论问题，经过分析研究，不能作为"反苏"、"反共"看待，而且有的传闻失实。但因在运动中，号召大胆怀疑揭发检举时，这种情况，在所难免，亦难一一查对。其中主要有碍束教授名誉，且又有确实材料可查的几个问题已经反复查对，说明如下：

一、1953年11月，选举区人民代表时，发现用中、英文字选举"英格丽·堡〈褒〉曼"的一张选票，曾在肃反运动中，怀疑是束教授写的。束教授当时声明不是他的选票，他改选的是李哲明。⑩但当时由于我们查原有选票，粗枝大叶，仅找出两张选有李哲明的票，都不是束教授所写的。现经1956年9月24日下午，党委又将原选区的全部选票，由市南区借来，由党委代表和物理系正副主任，重新彻底清查，找出了束教授选李哲明的那张票。因此，证实



中国共产党山东大学委员会：

宣布关于束星北问题的结论决定

1956.9.28.

物理系束星北教授在肃反运动中，曾被逮查，于1953年8月13日，在理科各系教职员生大会上，被斗争过，当时经上级批准，由系领宣布「停职反省」。在其问题经调查于1956年4月3日，由当时的党委书记，将结论告知束教授。上述结论已于1956年9月1日，书面通知了全校各单位。现将查对问题及结论，向到会同志宣布如下：

在1951年——54年期间，先后有人检举束教授在1944——45年期间，在蒋江电讯人员训练班，及军令部二厅技术室工作时，有重大反革命嫌疑。经查，经上级批准，在肃反运动中曾将束教授列为重点进行斗争。

历半年多的时间，前后派出8个调查，到南京、北京、上海、杭州及浙江、江苏、河北等有关地区，找过一些证明和23个同志人反复查询。主要问题与束教授1952年增加思想改造时，所写自传中交待的基本相符：

「束教授曾时经在国民党军令部二厅技术室和电讯人员训练班工作过，担任过顾问性质的职务，后虽由该技术室公布为副主任，但束教授未正式接受委任，不久即离去。且未参加反动党派，并非反革命分子。」

至于在运动中提出的束教授在我校的言论问题，经过分析研究，不能作为「反苏」「反共」看待，而且有的传闻失实。但因在运动中，号召大胆揭发检举时，这种情况，在所难免，亦难一一查对。其中主要有碍束教授名誉，且又有确实材料可查的几个问题已经反复查对，说明如下：

一、1953年11月，选举区人民代表时，发现用中、英文字选举「英格丽

>>>>>>>>>

"小阳春"带来的春风。1956年山东大学党委当众向束星北道歉。图为山东大学党委为束星北"平反"的结论书。

那张"英格丽·堡(褒)曼"的选票，确不是束教授写的。

二、在肃反运动中，曾提出束教授敲诈寡妇300万元。当时由于江苏南通专区检查分署，根据商人单志荣检举，于1953年7月8日和1953年9月17日，给学校的两次来函引起的。但有夸大误传之处。束教授在两次复信(中)声明，系商人诬陷。经查对证实，束教授确实曾代其弟经营过南通复新面粉厂，且与该商号有过正当的银钱来往，但并无敲诈事情。所谓敲诈寡妇300万元一节，系误传和夸大事实。

三、在肃反运动中，1955年8月13日的理科各系教职员斗争会上曾提出束教授是"美国之音"谣言的策源地，亦与事实不符。事后已当面向束教授说明误会。

以上错误，主要是由当时党委领导上对有关材料未能认真研究，存在主观臆断和粗枝大叶的缺点。甚至于在束教授一再申辩后，亦未深入查对，因此对上述夸大和误传的材料亦未及时发现和纠正，造成不应有的错误。在斗争过程中，党委领导上对束教授采取大会斗争方式，亦有错误。以上缺点和错误，影响到束教授的名誉，增加束教授精神上的负担，我们深以为憾，现在藉此机会，在全体到会的同志面前，向束教授表示歉意。

希望束教授谅解，并希望到会同志转知其他未列席的同志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搞好今后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

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 ⑪

1956年9月28日

1956年的中国，一级党委公开向教授承认错误或失误，这在全国高校中极为罕见。束星北的朋友、同事、学生遍布全国高校和科研界，很多人一直关注着这个总是"是非缠身"的人的命运。在他出事后，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纷纷打听了解。因而山东大学党委公开宣布平反结论后，束星北又出难题，让学校将这份结论打出200份，散发给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科研界的有关人士。学校党委自是不能同意，认为这样扩大范围会影响损害山东大学在同行中的形象。束星北认为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只会赢得同行的尊重，再说，已经公开了，还在乎范围的大小问题吗？双方因此又陷入僵局。最后，由于晁哲甫的默许，双方达成了折衷：组织不出面，由束星北以个人名义写个申请报告，并自费由学校资料室为其将这份材料打印200份。大学党委称，这次行动，只是束星北个人行为，与组织无涉，因而由此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与后果，组织概不负责。

对一般人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非凡的"待遇"，可是在束星北看来，它却是经过努力和斗争取得的一个胜利，这个胜利，让束星北的自尊和精神得到了满足。可是从另一方面讲，这样的结局无疑又是一个错误的导向，它让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幻想又得到了膨胀，因而，当整风之风开始吹拂时，不甘寂寞的束星北尽管闭门不出，可心却早有所动。据家人



称，这一年年初的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就让他心有触动，但真正感动他的是费孝通发表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有人称这篇不满三千字的文章是时代大变动前夕的嘴矢。但最初，很少有人能感觉到这支响箭会射出去多么远。

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对过去几年作了简略的回顾——经历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知识分子受到多次社会主义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原本已经起了变化。周恩来在1956年1月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像是进入了草长莺飞的天地。

费文开篇先述喜悦心情：喜悦心情来自于一批知识分子又重新开始学术研究了。再也听不到"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又开始了学术研究。北京召开了社会学老前辈陈达的论文讨论会。沉默数年的社会学家李景汉也在《人民日报》发了文章。有些知识分子甚至用"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有的要申请入党，有的打算买些大部头的书搞些基本建设，费孝通自己也把一部二十四史搬上书架。他由衷地感叹道："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著出了新枝。"

然后，费孝通写到了知识分子心情的另一面。那是一种犹感春寒的余悸。

他把知识分子对"向科学进军"和"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的响应程度作了比较，得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向科学进军"已经很成功地鼓动起了知识分子钻研业务的积极性，"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得似乎要差一些。

费孝通认为，从知识分子方面看，他们对争鸣还有所顾虑，心里热而嘴上紧，最好是别人多鸣，自己多听。顾虑的原因，有政治上的，怕是个圈套，鸣放过后又挨整；有业务上的，怕出丑，抱着讲本上堂念，别人不知深浅，一旦对面争论起来，就会现形；还有的怕被业务问题扯到政治问题上的，不怕上场，就怕一上场就被定个唯心主义，第二天上课，学生脸色就不一样，自己脚跟也软，再戴上个"落后"帽子，"德"就成问题了。加薪评级、进修出国、恋爱结婚，都会受到影响。有些人想，不鸣也无妨，鸣了说不定自讨麻烦，也就不开口了，省得吃眼前亏。

从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来看，还不能说百家争鸣的方针都搞通了。有些人觉得，中央的方针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里的具体情况还没有条件。有些人则把这个方针圈成个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认为这样可以不出乱子。等到鸣放起来，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又有人敲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不容易才把妖魔镇住，盖子一揭，又冒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这就使得对百家争鸣方针抗拒的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个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

被他人鼓励着要积极鸣放的知识分子还有顾虑，负责鼓励知识分子参加鸣放的人也不够热心，所以，费孝通实事求是地说，虽然已经入春，但还是早春天气。知识分子的生气

正在冒头，但还是有一点腼腆，自信心还不那么强，顾虑似乎还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暖还寒，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写到这里，他水到渠成地引用了一句古诗："草色遥看近却无"，认为这本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同时，这也是费孝通主张揭盖子，认为"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比冲开了为妙"的原因。他希望知识分子的天气从早春顺利地过渡到仲春、暖春。

这篇文章生动传神地表达出了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却没有摆出一副代言人的架势；在客观上有助于共产党懂得知识分子，同时有助于知识分子得到应有的信任，在作者心态上又表现得从容、坦诚、不卑不亢；通篇对知识分子所喜所忧所愿所虑的表达如叙家常，结尾处一串10个问号又足以让人警醒和深思……这篇文章说出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引起了广泛的共鸣。⑫

正是这篇文章，让束星北的血液又开始燃烧起来，在很多人虽然兴奋却还在小心翼翼地揣摸上面动向的时候，他却认为，"一个犹如西方文艺复兴的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的大幕拉开了。"最初，他尽管没有马上走出家门，呼应群意，不是对自己过去的伤口，有所顾虑，而是在找一种方式，一种最能够表达自己的平台。

注释

①《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170页。

②毛泽东讲话会议记录。据山东档案馆馆藏资料。

③刘洪宾采访录，1995年5月9日。

④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一卷第70－86页。

⑤《新山大》总209期第1版。

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一卷第138页。

⑦《在在职青年向科学进军大会上的发言——中共山大委员会书记崔戎同志的讲话》.《新山大》总211期第2版。

⑧刘洪宾采访录，1995年5月28日。

⑨束星北被打成右派后，曾去问那个把他划为右派的书记："为什么你非要把我划为'右派'不可？"那个党委书记说："我一看你就觉得像反革命，越看越像。"（周志成《难得的物理思想家和教育家——记一级教授束星北》，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47页）。

⑩很多人对束星北选举李哲明颇感不解，他们不明白，束星北为什么要把自己

"神圣"的一票投给那个想置他于死地的"对头"？束星北的解释是：恩怨归恩怨，原则归原则，是两码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也是科学，李哲明的物理专业不行，可他在政治上是擅长的。因而，他认为就应该让擅长政治的人从事政治。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束星北的不凡的人格。（据刘洪宾采访录）

⑪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一卷第153－154页。

⑫据《费孝通传》，张冠生著。群言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338－340页。

SHUXINGBEIDANGA

11.“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

大起大伏的经历，使得束星北的思考与那些一味申冤诉苦的人拉开了距离，他更加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命运背后的东西。在独舔伤口的日子里，束星北已大致意识到没有或缺乏法制或法制意识，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根源。

几天后，风云突变，大致还是那些人，可是口吻和言辞突然成了利刃和矛枪。显然是受到了来自《人民日报》等舆论工具进一步鼓动的影响，当然束星北的加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山东大学的知识分子到了这时候，已明确地感觉到上面对"整风"和"鸣放"的决心已是板上钉钉，毛泽东和中央这回是真心希望党外人士真枪实棒地给共产党割痈去疮了，久久压抑在心底的火焰终于有了突破口。随着上面的调子的不断升温，山东大学的鸣放火借风势，越燃越旺。

几年来，在紧锣密鼓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早已斯文扫地，即使再谨慎小心，也不敢保证哪次运动中不"过堂""挨板子"。多数情况下，被"打"被"斗"的人都很无辜，特别是有一定学术成就和国外背景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不爱国呢？哪一个不是因爱国进而又爱党呢？如果不是这样，当初他们就不会回来了。可是哪一个不是落得"多情总被无情恼呢"，哪一个没落下一肚子的苦衷和一身的伤痕呢？个中滋味，北京大学教授傅鹰在该校化学系座谈会上的发言颇具代表性。且看傅鹰教授的几段发言：

党和党外人士关系不好，首先是由于"三反"时的偏差。"三反"后，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而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其实教授们并非在骂毛主席，也许是在谈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斗争时，党员会说，某次我听见傅鹰在议论梅兰芳，为什么不尊重艺术家？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根源？所以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毛主席说一句话，本来清清楚楚，偏要左体会右体会。煤是黑的——就完了。非要说什么"煤之黑也，其不同于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是废话。

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加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看电影时，特别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座位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用

现在比过去的方法教育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头。现在比过去好，因此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用于知识分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13间房，5个澡盆，每月600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政府？

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

但我心里还是有不快，党还是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并不是不愿意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己。



书写者，亦被书写着。1957年，青岛某单位张贴的“反右”大字报。

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应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教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什么叫政治水平！我认为，爱国，百分之百拥护政府，政治就够条件。人事处全是一帮孩子，不知大学该如何办，不懂哪能不主观？化学系一个复员军人学生，党员，去年因为侮辱女生，被开除出党了，校方处分是留校察看，今年他又在实验本子上大骂教师，我们教研室教师全都认为这回该开除了，人事处不同意。不知人事处凭什



么资格不同意。最好废除人事处，如果废不了，至少要他们了解自己的地位，不能掌生杀大权。教授评级，最后也是由人事处定的。人事处的毛孩子，有没有"术"不知道，"不学"是定了的。不学的人在学校做主，何堪设想？冯新德教授太太神经有病，要求换个清净房。唐有祺教授家人多，要求换个大房。总务科就是不理，我家旁边有一幢大房子，空了一年，也不肯给他们住，现在给新上任的科学研究处副处长住了。现在是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

也不能完全怪学校领导，教授本身也要负责。不顺眼为什么不说？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毛主席提出了百家争鸣以后很久并不热闹，现在才热闹起来。以前没人敢说，偶尔有几个不识时务的人说了，好家伙，我几乎和胡风弄到一起去了，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人就是这样说我的，不敢说，是没有肩膀。很大一部分"进步分子"是光拣领导爱听的话说，昨天还是国民党，今天又申请入共产党，这样的人不只是一个，算进步我不信。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把国家办好，中国知识分子有气节传统，不会阿谀谄媚。现在"气节"两字不时新〈兴〉了，说是封建的。三反时，凡是1949年以前的全都要不得。自己半辈子培养了多少学生，也全给批判掉了，说是为蒋介石服务。

邢其毅教授问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最紧张，我说，这不知是底下的党员如何向上瞎汇报的，我就不信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和农民和资本家的关系还紧张。党员瞎汇报的例子很多。①

由于山东大学深厚的基础和特殊的背景，每次运动都搞得非常彻底，特别是肃反运动，使知识分子们创伤尤深，因而，鸣放中，这一段历史成为他们鸣放的焦点，也最见深度。

周北屏〈物理系教授〉：

为什么把我当反革命来斗

我是1949年到山大来的，已经8年了。结果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斗争。"新山大"、青岛日报都登载过我是罪行重大的反革命分子，结果是一无所有。今天我要提出：为什么"新山大"、青岛日报喜欢登这样的文章？我是既无历史问题，也无政治问题。我被认为是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组织者。这个集团的团长是束星北教授，团员有医学院潘作新教授、马贤成教授、化学系刘遵宪教授、历史系许思园教授、水产系邹源琳教授。说我们是有纲领、有计划地进行反革命活动。我现在对记者善意劝告，这种文章少登些。我身任16年大学教授，去过外国，我深知国民无国是不幸。因为爱国才爱共产党，有话就要讲，但讲的结果是罪行重大的反革命分子。我是有爱国思想的。我今天吃了三杯酒，说的〈得〉可能有些激动，但没有受过苦的，对我的心情是不能理解的。我心里有牢骚，束星北先生〈我们的团长〉了解。今天，我本来不想来参加会，来了就会骂人。〈束星北：我看座谈会可以不必

开．可以开个诉苦会，让党委听听。)我过去曾向系里提意见："这样搞不对的"，"这种教学方法不对的，这样对教师和学生都是不适宜的。"我是仗着我既没有历史问题，又没有政治问题，才敢这样提的，但结果把我当反革命分子打，害的(得)我一年没有工作。②

邹源琳(水产系教授)：

"三反肃反都把我反
一错再错究竟谁错"

今天揭发批判党委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解放后有三件大事都是党委在领导，都存在三个主义。

(1)先谈肃反．我是个主角，这个问题直到现在党委还存着官僚主义。当时我想我有什么罪，而崔戎说我希望蒋介石复辟，(在)教研室工作不负责任，破坏教学，是束星北集团的成员。这真是个晴天霹雳，当第一天党员王方要我赶快交代(待)，不然就抓起来，并说我骂党团员是特务。到去年5月28日，崔戎与王方约我谈话，我就提出这话的来源，答覆(复)说来自中水所，我去信向中水所党委请(求)调查．(中水所)已答复学校党委，没有这样(的)言语。肃反后对我的结论，征求意见(时)我是同意的，我提出崔戎和王方的两句话，要求帮助解决搞清楚，要求和崔戎对证，党委不肯。我认为无论什么(都)应实事求是，有错误就应承认。我平时在小组不大说话，并没有说什么反动言论．有一次王方让我讲话，我说这样说话我不怕，怕的是我平时没说的话，要强迫叫我承认。肃反总结我写了五次检讨书，一次不行再次，就成为你叫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这全是废纸，这就是肃反运动的成绩！

(2)三反也是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出了偏差，冤枉了好人。图书费只有四千万(旧币)，说人家贪污(了)三千万。三反中山大陈慎昭自杀，所谓大老虎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假若叫崔戎领导三反，可能自杀的(得)更多。我们有三反的经验，为什么肃反还再犯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③

王仲莹(历史系教授)：

大放大鸣，小放小鸣
这样的党员我心不服
领导不要"训一顿"时才找我们

过去没有机会发言，今天抢第一个发言。知识分子很敏感，大放大鸣，小放则小鸣。从青岛日报上已看到我校在放，但看到今天(5月21日的)青岛日报一则消息，好像逆转了。这条消息登的是九三学社山大成员举行座谈，而有些典型性的发言，却没有登出来。我遇到伊孟伦先生，他说，他在那次会上的发言中提到，国民党时代有一次枪毙了14人，陪绑

了一人，而我们学校肃反搞出的反革命少，错斗的多。而青岛日报把这个典型的例子去掉了，也就是把肉去掉了，只剩下骨头。这说明了只有小放，而没有大放。有人说教授不敢鸣，实际上是党委没大放，大放是会大鸣的。青岛不是不鸣，而是有了鸣没能反映出来。人民日报、文汇报为什么放得好鸣得好呢？

一些人认为提意见不要提肃反，我觉得要提，就历史系说，有些斗错了，童书业被斗了两次，赵俪生被斗一次。许思园也被斗了。有的公开斗了，在房间里偷偷道歉，而有的没有道歉，对许思园还没有道歉。据说，不是当反革命斗，不用道歉，但为什么要斗？难道要斗的不是反革命的人吗？这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1.斗争是开玩笑的，斗可以，不斗也可以；2.对"凶"一点的道歉，对"善"一点的人不道歉。

肃反中，有人叫我坦白，揭发，我说没有。因为我不能不负责任来揭发，我也无材料可检举。但党把一个不肯冤枉好人的人，却当成了落后分子。相反，有的人因斗了某人，便入了党，而且升了付〈副〉教授，我意见很大。他是被斗者多年的学生，〈被斗者〉是否反革命，他应该是了解的，而不应不介绍真实情况，抹煞良心。今天被斗者不是反革命，而他却因而成了党员。这种人可以入党，党员的品质是怎样的呢？我有意见。

群众中认为山大、华大合并后，有宗派情绪。我的看法，决〈绝〉不是华大同志先要搞宗派，我爱人是华大的。但通过三反，中间这堵墙高起来了，后来慢慢又矮些。到肃反，墙又高了起来。现在晁、杨校长来后，墙又低些了。总之，这堵墙忽高忽低，阻碍进步，希望党委拆去。

……④

童书业〈历史系教授〉：

不怕查历史，就怕不去查
对老教授工作安排不当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肃反查历史，很好，查清了才明白真相。我最不怕调查。我曾经写了证明人，但为什么没去问呢？最近听说对方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为什么不查呢？

我对崔戎的意见很大。他捏造材料来攻击我。对孙思白也有意见，他利用崔戎的材料来害我。后来和孙谈过话后，没啥，觉得他胡来。

我在解放后，曾把历史写了登在报上，哪个反革命敢于这样？我在上海20多年，上海的友人也可看到，如果我是伪造历史，那么别人会核对的。而蒋捷夫却说我是捏造的。杨向奎第一天要我说明情况，第二天蒋却斗我，使我上了大当。我与蒋捷夫也有接近之处，对他有意见，但不大，对崔戎的意见最大。

……

这里再谈谈领导上的毛病。有人说，我们历史系的条件不比有些大学差，但是，我们

研究成绩则不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主要是我校对老教授安排不当，把老教授当成青年教师了。我研究中国古代史，而领导上叫我搞中国手工业商业史，这方面我没有基础，我到去年试讲时为止，已花了2000多个小时，而讲义水平并不高，除古代史部分还比较熟悉外，魏晋以后，将史料凑凑而已。为什么花这许多时间呢？主要是查对名词。用去了这许多时间，如何做研究工作？张维华先生也有类似情况。放弃了老教授的专长而硬开新课，这样当然搞不好。如再回到原来的工作上来，则花了这些时间又白费，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要真正做新的研究，还得两年以后。把有用的力量使用不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下次开会希望崔戎来参加，对他的公愤很大。⑤

许思园（历史系教授）：

为什么把我斗？整风要彻底

建议中央派人来。肃反中违反宪法

我要写稿，公诸新闻界。肃反中我是被斗的，人家都有结论，而我没有。我曾问过党总支书记，写信给党委，要求知道7年来我有那〈哪〉些地方对不住党和人民？又问高云昌同志，高说“很难回答”。我又问市委，市委说我不是当反革命斗的，故不给结论。据说，我没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因而档案上〈也〉没有〈问题〉。究竟有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斗我呢？说我思想反动。评级时，还说我反动。肃反时，承蒙大胆怀疑，收集材料，有40多条。徐经泽同志叫我抄下来，最近高云昌同志也看过，说没有反动。既非反革命，也非历史问题，又不是反动思想，我也没有作风问题，〈那〉为什么斗我？除逼着我骂自己外，我没有说过一句谎话。骂够了，也就算了。

当时说我是束星北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其实我连他们有的名字也写不出来，也从不来往。和束星北是过去认识的，和周北屏是邻居。崔戎还说我帮胡风说话。逼我多次写材料，要我检举束星北。蒋捷夫否认束星北曾在国民党军令部担任过技术顾问，他说，军令部的“令”字需要换一个字。我和束星北往来很少。党委说束星北在一次普选中选举了美国电影明星问题闹了一年多，而后来两三个小时便查清楚了束星北选的是李哲明。为什么过去党委搞了这些时〈间〉没有查出来？这说明要有意害束星北。束星北的老婆孩子也被斗了。

我在山大勤勤恳恳，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和反动言论，而把我当反革命斗了多少时候！这次整风使我看到了光明前途，这是国家盛衰兴亡的关键！党要依靠6亿人民，这是对的。

肃反中，以蒋捷夫为首的工作组当众宣布，倘使我还是老样子，要把我送到5号炮台去枪毙，我等待着去枪毙。

我并不要打击报复，诸位党委对我打击反复，我决不打击，希望不要抗拒党中央毛主席，这次整风一定〈要〉彻底，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把马列主义当幌子。过去不顾事实，不

讲道理，完全是造谣。马列主义是实事求是，造谣、污蔑是反马列主义的。以自己利益、小集团利益来打击群众，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剥削思想吗？这些材料要公开。

对教授研究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评级？这是不可设想的官僚主义。总之，为宗派利益、个人利益打算，做了许多坏事，造谣打击，欺骗上级。

山大党委在肃反中，蔑视宪法，对吴大琨、对我都是这样，侵犯人权。肃反半年，房金堂和我说，可以和束星北相见，但不能多谈，违反宪法；对赵俪生、束星北、张维华打击报复、违反党纪。三反中说陈慎昭贪污，她自杀了；丁山先生也因造谣刺激病重而死了，好些先生病了。有的得了心脏病，这是肃反有功！肃反总结向上居功，而很多人痛心，据说"成绩是基本的"。工人阶级的品质丧失殆尽。赵俪生先生将这比之拉科西，我觉得不是拉科西，而是历史上的魏忠贤，是东厂。凡是被打击的，都是比较正派的，个别的例外。我许某不说谎话。党委将来可要求大家宽恕，但必须有真正的思想转变。我不怕，也不怕送5号炮台枪毙。

我建议：一、请中央派人来；二、群众成立组织，帮助整风。⑥

整风鸣放更像是知识分子的集体诉苦申冤大会：山东大学太冷酷，人人视同陌路，只有斗争关系而没正常情感与友谊，干部思想水平太低，作风粗暴，用过去对敌斗争的那一套来管理大学对待知识分子；对教授极不尊敬，职称评定由工作组左右，结果对教授业务一窍不通的工作组大都以政治进步与否来给教授定级，宗派主义思想严重，根子就在华东大学身上……据校方统计，整个鸣放期间，山东大学的意见或批评达3700多条。束星北是鸣放中后期才出头露面的，此时山东大学的鸣放之火已开始燃烧。与那些完全个人情绪化的诉苦申冤相比，束星北发言面要广一些，也更见深度，所涉角度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

束星北物理系教授

党委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今天党委请我们向他们提意见，我想谈不谈没有多大关系，君不见："开会通知"上只提"批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似乎忘记了或是故意的(地)忘记了提"宗派主义"？其实就是提出来，也还不是山大党委们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委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暂时"保密"。看"行情"行事！不过，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团结，稍微露一点春光，让党委们自己想想也无不可。下面是几句顺口溜：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有人山下走不准把头抬！"

此指导思想之一种表现也。但是"道德文章"均不能服人，"敢"抬了头！怎么办？好办！起码已有了三大罪状：

1.别人都规规矩矩，只有你"张牙舞爪"，"故意捣乱"。2.他是党员，代表党；你反对他，实际上是反对党，高呼："我警告你，反对党员〈就〉是反对党！"〔当然叫别人喊，自己喊就不"辩证"了〕3.他是领导，是政府任命的；你反对他，就是反对政府；反对政府目的为的是颠覆人民政府。这就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

以上三论证灵活使用，例如："对抗组织"，"阴谋颠覆"，"公开骂党"等等，拉拢打手，巧妙无穷，上可应付官僚主义，下可威胁恐惧的群众，中又可以应付宗派主义者；无往而不利。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假使还不够，可以再造点谣言来凑凑，例如选举美国女电影明星之类是也。这些谣言并不一定从群众中来，所谓"在运动中，号召大胆怀疑，揭发检举时这种情况在所难免"。我们党委自己又不让人，并不需要"号召"，也可以创造发明出来应付门市。谁说我们党委没有创造性。我就反对，这些不全是创造么？

决定要你低头，"打"之后，怎么变？有顺口溜为证：

"要你死，你难活，

书籍全搜走，研究不准做，

老婆儿子朋友一齐打，看你低头不低头？"

万一不低头，又死不了，怎么办呢？放心，老早准备好了：

"万一死不了，顶多我检讨，

凡事推组织，组织包下了。"

三部曲完了，事后"总结"〔这里也有窍门：顶好趁"捣蛋鬼"不在青岛时来个总结〕。"既然死不了，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弄清楚了〈一〉些问题，成绩是肯定的。限于水平，个别偏差是难免的。有人说"打击报复"，这是不可能的，实在是那个人的个人立场问题：当然也只有极少数的极个别的人这样的想。"还有"窍门"，再趁开扩大校务会议的时间，在外面来个"总结讨论"，"万事大吉"了。以上是"打"的一个起因，三个经过，再加一个"鬼混"。只是举例而已，当然对各种不同情况，要灵活掌握，不可教条呆板〔对这方面我们得佩服我们党委"辩证法"的应用〕。总之，是围绕着一个指导思想〔暂时保密〕进行的；不过这个指导思想绝不是解放前领导抗日战争时的指导思想了。声明：以上讲的这一套是"经典著作"，有古本可对，有记录可查，不是我的发明，我创造性很差。

其实"打击报复"不独是"有"，而且可以证明是普遍的，有人害怕"打击报复"四个字，有甚么关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比这个更严重的还有呢，不过我让他悔改，暂时不讲。

我今天曾考虑来不来，为了团结来就来吧，为什么不来？我替党委同志们代说四句"顺口溜"：

"虚心接受，研究研究，

研究之后，基本照旧。"

所谓缘木求鱼者也，但是缘木求鱼还无后患，我还有几句某些党委同志们的心里话："你这狗头，三年之后，看老子的手段。"



所以还是不来罢！但为了整体的前途，尽尽人事，还是谈了一点。"手段"就"手段"罢！末了再奉送几句"改字唐诗"给领导干部："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前年喊打声，成绩有多少？"末了两句可以具体的〈地〉改为"前年一片喊打声，我们党委，除创造发明之外，其他成绩有多少？"（不过不是五个字了，只好算白话诗罢！）稍泄漏"春光"，劝勿再迷恋于"春晓"也无不可，虽然只换一个党委书记，其余原封不动，但是同志们："虚心接受，基本照旧"的"窍门"现在并不完全吃得开了！

今天就是这些，是皮痛肉不痛〈的事〉，以后我们看"行情"。对科学研究，"疑则灵"，但是对人，我看还是诚则灵，把人民当呆子看的，自己也未必聪明，还是老实些好！（我这篇讲话虽然没有创造性但是还费了点组织力量；假使记者同志要刊载出来，我欢迎。不过请给我看过再登，不要删改变动原意才行。）

我看也不必开批评会了，开个诉苦会，吐吐苦水，也许能帮助党委们清醒些，知道他们对人民带来了多少损失。⑦

果真，人们又看到了过去那个束星北，那个疾言厉语毫无客气可言的束星北。他的发言还多了一点俏皮和幽默，因而，人们有权相信，"肃反"的大棒没有把这个天不怕地不怕、不屈不挠的勇士砸趴下。

几天后，"鸣放"之火熊熊燃烧起来，人们期待着束星北高举起大旗，带领他们将这把"鸣放"之火烧得更旺更足。可是束星北却突然刹车，调转车头，不再涉及个人恩怨与苦难，只谈法制或宪法。



虔诚却又显得木然的表情。青岛某单位在"反右"运动中。

大起大伏的经历，使得束星北的思考与那些一味申冤诉苦的人拉开了距离，他更加关注思考的是知识分子命运背后的东西。在独舔伤口的日子里，束星北已大致意识到没有或缺乏法制或法制意识，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根源。1954年中国尽管出台了第一部宪法，但它的精神远远没有普及到广大群众中间，甚至也远远没有在知识分子中普及。上上下下的管理和管制仍沿用着祖宗的老路子。而这恰恰是他和这个民族的悲剧所在：“回忆我自身在肃反中被斗的情况：老婆被斗得回家大哭，手臂青伤，几次计划全家自杀，气象研究遭到严重打击，一个在部队里工作学习都好好的大儿子也因我的原故被斗，又有好些朋友也被划在我的‘反革命集团’之内，而崔戎还说：‘一直没有把我当反革命问题看待’……又由于我认为‘自由争论’是发展科学的主要因素而现有的人常因为持不同的意见而被斗，因之使我认为‘保障宪法的实施’是克服这些缺点的最好的保证。认为再在新社会里养成严格遵守宪法的风气则是‘最理想的社会’。〈这样〉运动中的偏差〈就〉可以避免，科学文化就可以在我国前无古人的〈地〉勃兴起来，为了这件事，我曾在57年3月将此问题提请毛主席注意。”⑧

束星北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养成认识法律依靠法律捍卫法律的习惯和意识。目标锁定后，束星北不是把它作为一种自我宣泄的渠道，而是把它当一门科学来研究。在束星北眼里，政治也是一门科学，要做好这门科学，就必须恭恭敬敬地拜这方面的专家当老师。因而，一向厌恶政治的束星北学习方法如同他改行研究气象学一样，第一步是先找专家拜师求教。因他不熟悉“政治圈子”，便让刘洪宾帮他介绍了号称青岛第一马列主义才子、教育局局长王桂浑作为他的政治教师。⑨

王桂浑

（离休干部，20世纪50年代为青岛市教育局局长）：

最初，束老是由刘洪宾介绍给我的，说是拜我为师，我并没认真。政治怎么学？我们国家的政治有两种，一种是书本上的，另一种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无处不在的政治。书本上的自不待言，可我们生活中的政治呢？也许是一句话，一个眼风，一种势头，一个心情，都可能是政治。或者说，不定哪一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我们的生活和很多人的命运从此就改变了。这东西是一种感觉、一种经历，一种道业，一种磨练，能教吗？好在束老的“政治学习”基本上属于法制咨询。我所能做的，无非是给他推荐一些有关书籍和提供一点“方法”。书籍大致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以及国外的一些法律书籍。我没料到的是，束老对这项工作如此的认真。有一天，我去他家串门，见那些书大都摆在书房的书桌上，几乎每一本书都夹着写满笔记或心得的字条。等案头工作准备得差不多了，他又开始为自己的课题做社会调查。直到5月底，他在参加山东省宣传工作会议前，才将写好的讲话稿拿给我定夺。我没料到他的



文章写得如此之好，我觉得即使是专门从事这个职业的专家也不过如此。我说，束老，凭这篇文章，你可以当法学教授了。我真有点嫉妒你了，你要是这样干下去，我用不了多久，就好失业了。他很认真地问我，当真？我说当真。尽管有我的肯定，他还是忧心忡忡。他认为，碍于身份，无法从专业的资料室或档案馆得到资料，多数证据只能从朋友同事那里间接得到，这是做文章的大忌，只是限于时间和条件，也只能如此了。他决定将自己的这一段学习成果拿出去。⑩

束星北很快就变成了个普法专家，在一些场面上，只要发言，就谈法律与法治，对事不对人，大都是些分析。这让一些视他为英雄、拥他为旗手，想跟在他的身后欲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人们不解。他们觉得这样泛泛宣传不过瘾，与大学的现实没有直接挂钩，也有人以为他听到什么风声或受到了来自上面的干涉或暗示。

束星北的"课题"直到1957年5月后期的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才显示出了威力，在这次会议上，束星北作为山东大学的代表做了题为《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立刻就产生了强烈的回应。对于来自全省各地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来说，他们的处境经历大体相同，他们久盘在心底的疑团和遭受的苦难也大体相同。"鸣放"与"整风"给他们提供了"发泄"的机会。他们有了"申冤、诉苦"的"自由"，但是造成一切"机制"的原因何在？束星北直捣龙门，道出人想道所未道，想发所未发的声音(有人也许想到了，却没有像他那样进行系统的"研究")。束星北总共半个多小时的讲演，被台下欢呼的掌声打断了二十余次。有人事后将束星北的"发言"形容为一个令人警醒的炸雷，一场心田久旱的甘霖。

同志们：

我感觉到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文化经济蒸蒸日上的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工作，不能使它流产。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准备前的工作之一。我今天先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贯彻的障碍和原因揭发检查一下。

"鸣"和"放"的问题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经解决了，《宪法》，就是一九五四年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根本大法，第八十七条上明白的(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即使在革命的动荡时期，毛泽东也早就提出："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方针。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不能鸣，不敢鸣"，"不能放，不敢放"呢？还要一再强调这种方针呢？什么原因？什么障碍？我认为主要的关键在于我国一向没有"法治"的习惯，因而，当有些人不尊重宪法甚至公然破坏宪法的时候群众也并不以为奇怪，不及时制止；也因为这样，这些违背宪法的人能得到官僚主义者的包庇和谅解，这样问题就不能解决了。

例如宪法上明确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但是在“肃反”中，这一条宪法不幸被粗暴的(地)破坏了，而破坏的并没有听说有何处理，人民群众似乎熟视无睹，还替这种违法的事加以形形色色的解释。(从而使)更严重违背宪法的事发生了。宪法上明明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在“肃反”中就有打人骂人的现象发生。青岛的中学老师在一九五四年的“肃反”时，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是老师，就全部“集中学习”，不准出入，母子不能见面，夫妻不能见面，一两岁的孩子也几个月不能见母亲的面，只因为母亲是中学教员！对于这些侵犯人身自由的事，除了“打人”之外，其他似乎并未引起群众的愤慨，领导也未重视，这就说明我们对宪法丝毫没有认识。

据说青岛九中一个物理教员被关进牢房好几个月，稀里糊涂地被关，稀里糊涂地被放，问什么罪？公安局不知道，检察院不知道，法院不知道，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关的，为什么关。你推我赖，没人负责。这说明即使像“逮捕”这样一件大事也被视同儿戏！人身、住宅和信件的搜查，更不用谈了。

在肃反时，任何人(尤其是党外人士)都有可能被划为“斗争”对象，甚至株连牵累到几十人，宪法即便不懂，连“一人犯罪一人当”的一句老话也忘记了么？结果往往又全部推翻。固然我还没听过“错就错到底”的，不过就那一次苦头就够瞧的了，有吓疯的、有吓死的。(有人)把这一切责任推到当时“头脑发热”(上)，固然当时确有“头脑发热”的“狂热”现象(这也不全面)。但是上级领导不予处分，谁敢相信下次不再来一次“发热”呢……

当人身自由还没有保障的时候，谁能相信(会)有言论自由呢？

因之要人们敢于揭发矛盾，揭发三害，第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要“宪法”得到保障，违反宪法的必须处分。

宪法，如同刘少奇同志一九五四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说的，“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奋斗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还不重视宪法呢？我想可能是下面的原因：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人治”，如“歌颂清官”，“痛恨贪官”。这当然是对的，但直接反映了“人治”的风气：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的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党在摧毁三大敌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宪法”。人民宪法保证了“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就不再被“某一个“执政者掌握了，想“坏”也“坏”不了(到)哪儿去。人民可以依照宪法罢免任何不称职的官员。但是几千年的“人治”风气一时扭不转(俄国沙皇时代和中国宣统时代法治的风气也未养成)，还是习惯于歌颂“人”而不习惯于歌颂“宪法”。“鸣”和“放”一定要等毛主席提出来后才引人注意，而忽视一九五四年党与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制定的，称为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总结的，巩固人民革命成果的宪法，这样就很危险。



谈到人，即使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如肃反时毛主席偶然说了一句"反革命分子可能只有百分之几"一句估计猜度的话，但是后来竟成为肃反的指标，据说安徽省有一个铜矿，铜矿里有一个领导就按百分之五的定额把四百人抓起来了。为什么百分之五？大约是毛主席没说百分之六或是百分之十几，就按平均数百分之五。我们看靠"人治"是多么危险，（据舒同同志报告说山东清查出八千多现行和历史的反革命分子，他没有说多少是现行，多少是历史，历史的中间有多少是"已经交代过"，有多少是鸡毛蒜皮的。不过山东有五千万人，即使如此也只有七千分之一），毛主席的偶然估计错误，可能根本是误会了他的意思，竟弄出非搞百分之几〈的〉定额不可。

假使我们可遵守宪法的精神，即使估计错误，也不会发生打人骂人（有组织的骂人显然〈也〉是违法的）、乱抓（即停职反省群众学习也是抓之一种变形，〈是〉侵犯人身自由〈的〉），〈也〉就不致造成人人神经过敏，人人恐慌的心理了。甚至有时下级干部的领会错误呢。〈？〉我们不能保证每个干部全〈都〉清楚〈地〉体会中央的意志而不致弄错。

有人问，假使某一个野心执政者自己本身破坏宪法怎么办？〈由此可以看到〉这就是"养成风气"的重要性。当一切人民……已习惯于爱护宪法，保护宪法的时候，任何人想公然破坏宪法就很难了。马克思可以公然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的英国写资本论，出版资本论，当然资本家和其他统治者都很恨他，但是由于英国的宪法（我们今天不谈它的反动性质）的"言论自由"一条，当时已得到人民习惯的默认。执政者不管如何反动也不能公然禁止他的〈书〉出版，即使在资本主义末期，美国政府公然破坏宪法的时候，封闭《工人报》仍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巨〈剧〉烈抵抗。再如他们杀害罗〈卢〉森堡、迫害鲍威尔也引起了舆论的大哗和责难，这就是法制精神的特点。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轮换频繁：美国总统四年一换，法国内阁几月一换，而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动摇，反动政策也很少改变，其原因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的法律观念已深入人心。上层建筑产生于〈经济〉基础也服务于〈经济〉基础，要建立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制，所以说我们人民宪法，巩固了人民革命的成果。

斯大林在他的执政期间没有重视过法制，他自己不尊重"法治"（这和他经历过的斗争有关系），也没有养成人民〈的〉"法治"精神，以致犯了错误，也没人敢提出批评或公然反抗。因之使他犯了更大的错误，造成了使人痛心的斯大林悲剧……

"法制"对〈一〉些官僚主义者可能有些碍手碍脚，但是当风气建立之后，他就没办法了，而且，请他注意，对他自己的人身〈自由〉也有保障。

当风气建立之后，人人可以发挥积极性而无所畏惧，人人敢于坚持正义，做到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以人民宪法的实施，巩固了人民革命的成果，奠定了人民政权千万年的基础。

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主对农民不守法律，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不守法

律……这样长期的统治，使人民忘记法律，蔑视法律，养成了不尊重法律的风气习惯，这种习惯到了人民自己的宪法制定之后，也未能及时改变。

显然党在这方面的宣传还不够，学习得也不够深入，长期养成的习惯一时不能扭转，同时也有"事事依法，缚手缚脚"的封建思想，因之当遇到具体问题时，就会常常违反宪法，而上级领导也熟视无睹……〈法是所有人的法，〉即使对反革命分子也必须依法办事，也不能违反宪法。

所以我认为在学习毛主席报告的同时，要大力宣传"人民宪法"的重要性。"人民宪法"是人民的基本大法，任何人都应当尊重，应当保护。违反宪法的都必予惩处，蹂躏宪法就是蹂躏我国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的人民！

我建议省委及省政府赶快对监狱先来一次检查，受冤的速予平反，没有确实罪行尚在"调查过程"中的先予释放（罪行有无还没确定，就捉起来坐班房是违法的）。对于仅有历史问题的也应按照中央政策从速处理。当然在这时要注意矫枉过正，即有斗错的，也一定有漏网的，不要只注意"纠错"而忽视了"肃反"……

在检查中，任何人，不管他官有多大，资格有多老，凡是违背人民宪法的必须予以揭发，必须予以惩处。这样才能使人民觉得宪法是不容易破坏的，人身自由是有保障的，以逐渐形成守法的优良品德和习惯。

我们的人民宪法，我认为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最进步的宪法，我们应当怎样爱护它，才对得起为宪法奋斗的先烈，才对得起党与毛主席的奋斗和领导呢？才对得起全国人民呢？用"像爱护眼睛一样的爱护她"的句子还不够，用"像爱护生命一样的爱护她"也不够达意。我要爱护她远超过我的眼睛，远超过我的生命！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宪法故，两者皆可抛。

〈只有〉当人民宪法得到普遍尊重和爱护之后，人身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才会有保障，"三害"迫于舆论，迫于宪法，也就不能横行了……⑪

注释

①《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457－46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②《教师们在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揭露学校存在的严重问题》，《新山大》1957年5月23日第2版。

③同上第3版。

④《大家动手拆墙填沟》，《新山大》1957年5月25日第2版。

⑤同上。

⑥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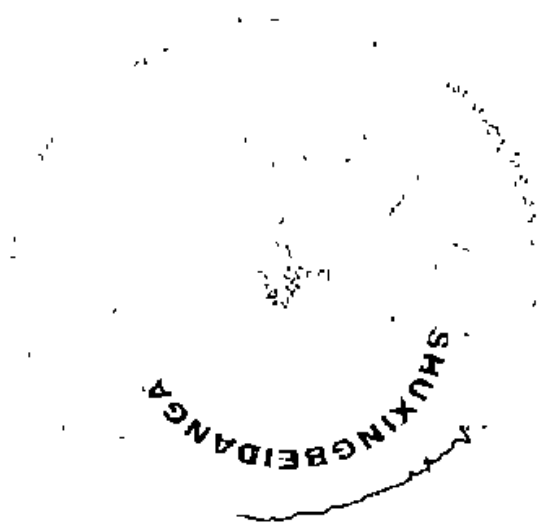
⑦《教师们在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揭露学校存在的严重问题》，《新山大》1957年5月23日第4版。

⑧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81页。

⑨王桂浑是那种天赋和悟性极高的人。他的即兴演讲和时势评论文章堪称岛城一绝。在党内，有人将他同华岗相提并论，称他为共产党的秀才。王桂浑的文章和演讲才华与华岗相类，但他的品性却与华岗极不相同。他虽然是共产党"出身"(30年代初他就参加了共产党)，但骨子里却有很多很多"资产阶级"的东西。虽说他的出身、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与束星北大相径庭，可是在很多思想认识看法上却颇为一致。而且他们对待科学与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态度也很一致。从而使得两人一见如故。王桂浑兴趣广泛，文学、艺术、历史、音乐，无所不好，也有很高的品位和修养。灰色的日子里，他的家庭竟然还能定时办办舞会，到场的人大都是青岛艺术界、文化界名流。浓浓的人情味与宽松的环境，让束星北感到亲切、舒适。他在以前怎么也不会想到，共产党也有这样的干部。王桂浑于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撵回老家。但聪明而又有生存能力的王桂浑迅速地成了一个出色的农民。他的几亩薄田无论是种粮还是种菜，都比祖辈生活在农村里地道的农民种得好。弄得四邻八舍和附近的村子都来人请教，他一时成了方圆百里的农民状元，王桂浑也算是因祸得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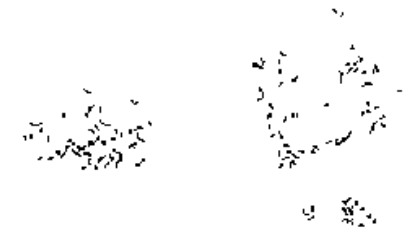
⑩王桂浑采访录，1994年7月6日。

⑪束星北在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35－38页。



12.“三座大山”

有人这样来形容“6月”的天空：云翳越积越厚，大地透出雷雨前浓烈呛人的土腥气味。要是你是个敏感的野兔，一定会感觉到猎人早就支在树杈上的枪口。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可是绝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敏感，结果都落到自己掘好的坑里却还在疑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李凌钰

（山东某大学副院长，时为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

1957年6月8日是个明亮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可是它明亮得让我们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了。直到现在，我也说不太清那时的感觉，当我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感觉很钝很涩，脑袋轰隆隆直响，像在梦中，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实了。几天前，大家（大学各系的教授和一些学生代表）还在一起畅想"明天"，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兴奋不已。可是眼前是怎么回事？是一种被打了闷棍的感觉。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明明是艳阳高照，怎么眨眼的工夫，便黑暗无边了呢？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按照上面按照毛泽东本人的要求进行的吗？有人说这场运动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可那时没人会想到"游戏"，毕竟是一个泱泱大国，一个政党自上而下的政治事件，毕竟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本人倡导发动的，怎么会是"游戏"呢？有人说这场运动简直是一部新天方夜谭，可那时谁有这样的幽默感呢？

以后，沉下心来，再反复回忆一些"章节"，还真是有些预知了呢。许是"捂盖子"或堵塞渠道的关系，山东大学的"鸣放"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五月底到上面反击之前，山东大学几乎所有闸门都打开了。"鸣放"的温度，一升再升，它开始与北京遥相呼应，不分彼此。北京的高校有什么新东西，这里也会随之出现什么新东西。北京出现了民主墙，这里也就在校园的东南角出现了民主墙，北京有了民主讲坛，这里马上就跟着出现了民主讲坛。一向作为党的重要舆论宣传工具的大学广播电台也向师生开放了，谁想鸣放一下，只要登个记就行了。很多学生也不上课了，他们更关心的是迎接中国新时代到来。他们放弃学业，整日在民主讲坛和街头巷尾议政论政，慷慨激昂地发表着一知半解的政治演说。他们陶醉于自己的革命激情里。一部分学生还因青岛日报对鸣放没有好的表现，结队去游行示威。而很多人期待着再走得远一些，再激烈一些。民主墙上的大字报上的语言越趋激烈，揭露隐私、辱骂和个人攻击的文章越来越多。有人这样来形容"6月"的天空：云翳越积越厚，大地透出雷雨前浓烈呛人的土腥气味。要是你是个敏感的野兔，一定会感觉到猎人早就支在树杈上的枪口。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可是绝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敏感，结果都落到自己掘好的坑里却还在疑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①

从1957年5月21日的山东大学党委领导的“鸣放”会议算起，到反右爆发，束星北在“中国的文艺复兴”期间的政治参与，满打满算也仅有一个月，这一个月是他为国家和民族兴亡的最后一次参与。

刘洪宾：

束先生在省委宣传会议上的发言，一鸣惊人，一些报刊纷纷找他索稿，特别是由九三学社办的《民主报》的编辑们，对他紧追不舍，非得拿到首发权不可。束先生尽管答应了，却没有马上拿出稿子。他没有拿出稿子不是对上面的风向有了感觉，而是觉得这篇发言稿的分量还不够（主要是认为权威性不够）。束先生从省里回来后，将稿子作了些修改后才交给了《民主报》。束先生交稿的时间是6月7日。一天之后，《人民日报》便刊出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好在他的文章还没有发出来，一些朋友让他赶快到青岛九三学社《民主报》编辑部撤稿子。《民主报》的主编也来问他稿子发不发，他说：文责自负。

《民主报》在刊出他的讲话稿时，觉得他批评人们习惯“人治”、“歌颂清官”一段和“谈到人，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的一段太扎眼了，删掉了。他看了报后，坚决要求恢复，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民主报》只好在最后一期上（此后便被停刊）用补遗的形式全部作了恢复。

之后，他又在此基础上作了浓缩，将自己的法制观点以信的形式，邮给了省人大主任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并在信中特嘱刘少奇委员长阅后转毛公。束先生决定将自己的文章发给省人大主任和全国人大委员长之前，曾征求王桂浑和我的意见，我们已明确地感觉到形势的变化。王桂浑直接警告他说，这篇文章极有可能会成了他以后的“罪证”，他说，那篇文章（指《这是为什么？》）发表后，他的感觉也很强烈，可是他又反复地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后，觉得没什么问题。他认为是上面发生了分歧，中央出现了两种声音。所以越在这样的时候，才越应该旗帜鲜明。两天后（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工人说话了》，6月11日发表了《全国人民在拥护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社论明确提到各地工人“愤怒地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多数人见势不好，开始调整自己了。束先生却依然如故。

束先生将信发出去的时间大约是在6月16日或17日。这时候，全国各大报纸批驳右派言论的文章已铺天盖地了。②

在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束星北除去一鸣惊人的“法制”演说，还对山东大学由来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大字报的形式其实并不是"文革"的首创，早在"反右"或更早的时候，人们就掌握了这一宣传的武器。1957年山东大学的"反右"宣传栏。

已久的"宗派"问题投去了枪刺。他的题目为《不从六亿人口出发叫"宗派主义"》的发言，首先提出，宗派主义是党对非党的武器，他以发生在大学的大量事实，揭露批判了山东大学由来已久的宗派主义的种种荒唐的现象，并由此深入到用人或选拔干部的标准上，即用人或选拔干部，应该"德才兼备"而不是仅凭着成分，是不是党员，政治上是不是可靠。接着，他提出了一个精彩的理论，即向那个将不够医生资格的党员提拔为医生的领导者发出疑问：当他自己有病或者他自己的妻子儿女有病时，肯不肯找那位大夫医治呢？既然不肯，为什么让他医治别人呢？

束星北在这个发言中，还讲了一个春秋时期，赵襄子用人的故事。故事说赵襄子想任命自己的侄子去治理"晋阳县"，叔向对他说："令郎年纪太轻，恐怕对这方面没有经验。"赵襄子回答说："先让他学习学习，慢慢也就会了。"叔向问："您假使有一件绸衣服，肯不肯让人家学习裁缝？"襄子回答："当然不肯。"叔向接着说："晋阳是您的根本，您为什么让您的侄子去学习管理呢？难道您爱您的侄子胜过你的根本吗？"襄子听了，马上改变计划，另派了一位有能力的人去治理晋阳。(结果)治理得很好。襄子死后不久，智伯攻赵，赵国靠着晋阳的人民守住基础，打败了智伯。束星北通过这个故事，向宗派主义者发问："您肯不肯拿您的新衣服给裁缝学习剪裁呢？既然不肯为什么让您的'宗派'去学习管理国家大事？人民是您的根本，难道您爱您的宗派胜过您的根本吗？"③

束星北将他的“法制”文章寄给了山东省人大主任和全国人大委员长之后，又将这篇揭露批判宗派主义的发言作了一番整理，亲自送交到山东大学校长晁哲甫手中，由此可以说明束星北对自己的行为已经义无反顾了。

当反右斗争一步一步走向高潮的时候，民主党派的一些被视为右派的头面的人物，开始意识到前景不妙，自我批判兼揭发检举，成为他们惟一的选择。

6月13日，在民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叶笃义率先进行自我批判。陈新桂也如法炮制，结果被认为很不满意，一周以后重新进行自我交待与批判。在最初的会议上，章伯钧承认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

6月15日，在民建中央常委会与工商联联席会议上，李康年为表示沉痛悔过之心情与决心，声明放弃曾经提出过的延长资本家定息期的建议，而章乃器则声称自己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

同日，在民革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龙云对指出他的错误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而黄绍竑则认为自己过去的发言受到了“误会”。

6月21日，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会上，储安平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要划清与章、罗的界线。

各党派的反右决议也作出来了。6月15日，由各民主党派代表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委会，连续两天，要求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承担《光明日报》反社会主义立场的责任；6月16日，《文汇报》表示欢迎一切批评指责。6月17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会向所属各级组织发出指示：《坚持社会主义，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作斗争》。6月18日，民盟中央常委会号召全体盟员展开反右斗争，并在盟内整风。6月19日，民建和工商联向各级组织发出指示：《全体工商人士团结起来，立刻行动起来，向章乃器反社会主义行为作坚决斗争》。

进入7月后，反右斗争如同当时气温一样迅速升温，党外右派分子（用这个称呼并不恰当，姑且称之）已是惶惶不可终日，检讨也就越来越“深刻”。

7月12日有两位党外右派作检讨，分别是：

叶笃义：《揭露罗隆基的本来面貌并检讨我自己的错误》；韩兆鹗：《悔恨交集》。

7月13日，检讨之人增至5位，分别是：毕鸣岐：《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费孝通：《向人民伏罪》；黄琪翔《请求人民的宽恕》；储安平《向人民投降》；龙云：《思想检查》。

7月15日，检讨者猛增至13位。他们是：

章伯钧：《向人民低头认罪》；罗隆基：《我的初步交待》；章乃器：《我的检讨》；黄绍竑《我的错误和罪行的检讨》；陈铭枢：《自我检讨》；谭惕吾：《我为什么犯了严重错误》；张云川：《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潘大逵：《我承认错误》；李伯球：《我痛恨自己给章伯钧利用作（做）点火的工具，支持了黄琪翔在农工民主党执行章伯钧的道路》；马哲民：《我要重新做人》；黄药眠：《我的检讨》；宋云彬：《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钱孙卿；

《我做了人民的罪人》。

从这些检讨的题目中就可以想象出检讨的内容。章伯钧、罗隆基等昨日的名流贤达，今日的"大右派"，都不得不把往日的威严和自尊打到十八层地狱里，都不得不争相进行最惊人的自我贬低和讨伐。鸣放的罪过与建国前的民主活动(不是与共产党的最亲密合作)联系在一起；自己的错误或罪行同时与朋友同事的交往联系在一起，揭发检举就成了许多人检讨的必备部分，否则，决(绝)不可能被放过关。然而，这些检讨中，到底有多少是发自内心，又有多少是出于压力或出于无奈？④

山东大学在经过暴风骤雨般的万众讨伐之后，溃不成军的右派们在进行了短暂的抵抗、逃避后，便纷纷缴械投降，走向人民向党低头认罪的道路。前一段还声泪俱下、申冤诉苦的知识分子们，争先恐后地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自我批判、低头认罪。随着组织和群众的善意劝说、批判斗争、高压恐吓、威逼利诱、严厉处分等手段的使用，揭发告密出卖等成为普遍的自救自保行为。不久之前曾将束星北称为英雄拥为旗手的"同党"们也纷纷倒戈。

风吹草偃的大地上，束星北高大直立的身影便越发凸现暴露出来。他很快就成为反右斗争中的魁首。历史反革命、极右派的恶名，令他为世人所知。

比较起来，束星北的"极右"的帽子戴得有点冤。除去捍卫"法制"和批判"宗派主义"两篇文章，他在整个"鸣放"时期的表现并没有出大格。

"大鸣大放阶段全体师生员工给学校党委和领导(不包括对系行政)和党员个人提出了3783条意见(有一条算一条，未整理合并所以比上次报告多)，其中对党委领导方面的481条，对团委领导方面的311条，对肃反工作的541条，对教务工作的155条，总务工作方面的567条，对人事工作的396条，各总支、支部领导方面的495条，对有关党员的672条，其他不好分类的55条……"⑤3783条意见，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什么都有。束星北的意见概括起来不过4条：一是法制问题，二是肃反问题，三是党委党员思想作风问题，四是学校宗派问题。与一些锋芒毕露"恶毒攻击"的人比较起来，束星北的问题应该不是最为严重的。

于　良：

与多数人比较起来，束先生在鸣放运动中，表现得更为克制更有理性(这让一些曾认为他勇猛直率有余而理智克制不足的人着实吃惊)。1957年6月1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第十一次座谈会上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了意见，其中批评"党天下"现象的直言相谏最令人震惊。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二版报道了储安平的这次发言。当时正是鸣放的高潮，储安平一语惊天下，道出了很

多知识分子的隐衷。刘洪宾和王普(物理系的著名核物理教授)很受感动，认为山东大学的教授们也应该作点什么，于是决定联名给储安平发声援电报，以此表明态度。可是一份汇集了几十名著名教授签名的声援名单送到束先生手里后，又被原样退了回来。他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这种做法太刺激太敏感。会给上面造成一种不好的感觉。刘洪宾、王普虽然有些不悦，但还是听从了他的建议。

“鸣放”的高潮中，陆侃如提出了取消党委制建立校长负责制的建议。陆侃如是山东大学副校长，民主党派人士，他一向小心谨慎，寡言少语的，因而，他的意见让不少人感到吃惊，其实取消党委制的首创者正是毛泽东本人。1957年4月30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正式提出这一建议。陆侃如建议的根据是工厂里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认为建立校长负责制不但对教育学术大有好处，对“拆墙填沟”消除宗派也很有必要。他曾考虑自己斗胆提出这一建议肯定要遭到不少人的非议或反对，但是他没有想到第一个起来反对他的却是束先生。陆侃如与束先生算不得朋友，但是他对束先生的人品与才华却是敬佩有加。运动中，作为党委领导他眼看束先生惨遭迫害、侮辱，却无法伸出自己的手。他曾说过，每次批斗大会上，他所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回避，即便回避不了，也想法找借口离开，以避免喊口号举手的尴尬场面。学校里进行体制或业务上的改革，他最担心的就是束先生的反对。他实际上也清楚，每每违心举手表决通过的“改革”多数都是不利于大学的教育与学术发展的。可是作为党的附属品陆侃如又能做些什么呢？束先生对他提出的取消党委制的反对理由很简单：不现实，没有任何可能性。在中国不能取消党委制。陆侃如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以此作为专题组织召开了九三学社会议。束先生没有参加他的会议。结果陆侃如因此而成为仅次于他的第二号右派。

“鸣放”的闸门打开后，很多人失去了理智，一味地跟着吆喝、煽风点火，好像火烧得越旺越好。特别是“鸣放”后期，学校已有失控的趋势。比如，有些鸣放会，成了个人的攻击会，“民主讲坛”的言论越来越充满火药味，“民主墙”一些大字报上，出现了不堪入目的个人隐私。广播站成了人人可以随意讲演发泄的自由讲坛，很多学生放弃了学业，整天聚集在“民主角”或学校行政大楼前讨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束先生对这些现象感到忧虑，他担心这样下去，会走上歧路(其实这也是不少人的感觉。我们一面被激奋和热情引着向前奔跑，心却惴惴不安，我们不时地自问：这样行吗？我们能走多远？这说明我们心里发虚，从没有踏实过)。束先生从省里回来后，对这些现象深感忧虑，可是正值运动的高潮，他也不好说什么，只是与一些相近的人谈到自己的忧虑。不过当一些学生因为青岛日报没有像北京、上海那样浓墨重彩地报道大学的“鸣放”，决定游行示威时，他出来阻拦了。他先是挡在那些血气方刚、焦躁不安的学生面前，让他们不要丧失理智，要遵纪守法，接着他又跑到晁校长和崔书记那里，让他们出面维持秩序“抓主动权”。他那时当然不会预测到运动的走向，却感觉到，这样“乱”下，鸣放会走向反面。⑥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束星北在批斗会上曾自称"左派"。无论他的动机如何，客观上与上面达成了某种契合。因而，有些人就是以他"左派"的行为作为根据，希望从轻处罚束星北的。这也是晁哲甫的意思，在他眼里，束星北属才华横溢、桀骜不驯的"浪子"，他错误或罪行的主要根源在于他的"个性"和傲慢。因而，与那些用站在阶级和立场观点看人的领导不同，晁哲甫对束星北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宽容。1956年10月，山东大学党委按着他的要求给束星北公开平反道歉后，马上就将他聘任为山东大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著名文学家、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副主任委员还有吴富恒，郭贻诚，王普和刘遵宪。束星北的名字排在吴富恒之前。科学委员会在大学里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既要为下属各系进行咨询，还要参与大学的教育体制、科学研究、教学计划的制定。特别是束星北的计算机研究与开发计划，也得到了晁哲甫的支持。尽管限于财力，学校不能马上兑现束星北的要求，但晁校长却答应束星北先成立个研究小组并逐步将工作开展起来。

反右之初，在揭露反击右派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的批判与斗争中，束星北尽管榜上有名，却不是舞台上的"主角"，在《青岛日报》、《新山大》上，他的名字也是排在陆侃如、刘洪宾、许思园等人的后面。晁校长和崔书记在反右派的大小动员会上也从不提他的名字。不点名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就是一种暗示，因而鳌初的批判会上，他只是个配角。转折点是在毛泽东来到青岛之后。

1957年7月12日，毛泽东乘着斯大林赠送给他的"伊尔—14型4202号"专机来到了青岛。

毛泽东的首站是上海。1957年的3月下旬，毛泽东专程来到上海亲自为鸣放煽风点火，一百天后，毛泽东再来上海却是为上海的反右斗争煽风点火。尽管上海在他的好学生柯庆施的领导下反右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可是他仍嫌不够，太温。在7月9日的上海干部会议上他亲自点了上海一串"右派分子"的名：

"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⑦毛泽东在上海"放了一把火"后便移师南京。按计划，他要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省、市委书记会议，来讨论当前的国内形势，总结反右斗争经验，确定下一步斗争方向与力度。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和各省市的大员们刚刚集结到了南京，毛泽东却因无力招架南京的滚滚热浪而移师青岛。

毛主席来青岛前在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部分省、市第一书记谈话，并欲起草《1957年夏季的形势》。由于南京太热，会议开了几次后就停了下来。那时候又没有空调，只是用了冰块来降温，但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因此，中央决定移会青岛。为什么要选择青岛呢？因为1957年8月1日，正是我军建军30周年的纪念日。30年是大庆，中央军委决定在青岛举行海上阅兵……毛主席在青岛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省、市委书

记会议，青岛的干部没有资格参加，但主席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却发给青岛市委，征求市委领导同志的意见。完成这篇文章是主席在青岛的主要工作。这篇文章是主席根据政治局会议的意见以及主席和省、市委书记谈话的一些要点起草的，并经过10多次讨论和修改，最终在青岛迎宾馆完稿，并印发。⑧

毛泽东在(根据他的讲话要点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对反右斗争的意义，定下了调子："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⑨

"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⑩

毛泽东的调子一定，全国反右的力度加大了，面积也加大了。山东大学的右派名额最初定为几十名，《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出，便增为一百多名，以后根据"校情"又多领了近一百个名额，最后实际落实的是204人。这个数字在同类高校中属偏高的。

七八月份，深入揭批右派的斗争在山东大学形成持续的高潮，束星北被重新"发掘"出来，他的大名和陆侃如、刘洪宾、仲平⑪等罪大恶极的右派分子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青岛日报》《新山大》等报纸上。围剿和批斗也愈加激烈起来。从7月底到8月初，束星北被围剿和批斗的频率平均每日一次。他的历史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以此来证明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他的问题也随着揭批的深入而越来越重。他的一些言论特别是那篇法制文章经过重新整理和加工后成为他的头号罪证。⑫这个时候中央又发出党内反右派的信号。《人民日报》7月28日刊发了一篇题名为《反右派斗争是对每个党员的重大的考验》的社论，社论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右派，这些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早在过去的岁月里，就与党外的右派朋比为奸，他们"利用党的生活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党外右派联成一气，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社论号召共产党员对党内右派分子进行严厉的批判，绝不能对他们表示出"温情主义"。这样一来，一些束星北的同情者从此封住了嘴。

尽管如此，束星北也还是有机会的，至少他还有一次孰轻孰重的选择。

考虑到自然科学家对中国经济建设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毛泽东听从了民盟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昭伦保护科学家的建议(尽管毛泽东采纳了曾昭伦的建议，却仍将他打成极右分子，因曾昭伦是章罗同盟的一员大将和帮凶)，9月初，一份有关"照顾、保护"自然科学家的文件出台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



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右派和我们夺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认真严肃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

但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更加细致地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

在反右派斗争中，对挂帅点火的，进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

对于老右派，主要应该拿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政治标准来衡量，而不可简单地拿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是否是右派来衡量。

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排不斗"。⑬

束星北既可属于"个别情节特别严重非划不可者"，又属于"有较高科学成就的"，因而尺度的掌握便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是划不划"右派"。这一点似没有异议。可是"右派"又有普通"右派"和"极右派"，虽只有一字之差，一个人的命运却可能差之千里。学校领导对此持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束星北罪行实属严重，但没有明显的反共行为，应该作为"有较高科学成就的"高级知识分子，划为普通右派，在校内监督改造使用。另一种意见是：束星北一贯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其在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有关法制的发言，是一篇污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所谓法制精神的"恶毒透顶"的宣言。特别是他在其思想和反动言论受到广大师生批判斗争后，仍不思改悔，拒不认错，继续坚持其反动思想观点。这样的人，"右派"、"极右派"的帽子都轻了，应该建议司法机关逮捕法办。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

1957年9月中旬，青岛召开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为了向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庆节献上一份厚礼，省有关部门对山东大学下了命令，要他们在这之前一定要拿下最后的堡垒。"命令"无疑是对山东大学右派分子的最后通牒令，这个时间，态度能否配合变得无比重要。

山东大学为了配合上级的意图，打打拉拉，强攻与缓怀并使，大势所趋之下，右派们都是惊弓之鸟，惟恐不能脱身，有谁敢螳臂挡车呢？实际上，9月份青岛人民代表大会前夕，真正的"堡垒"仅剩下束星北一人了。

晁校长意图是很明显的，最初他只想给束先生一顶普通右派的帽子，可是束先生的"民愤"太大，特别是上面开始反对党内右派、反对温情主义后，晁哲甫只能顺势而为，让束星北领了一顶"极右"的帽子。⑭

尽管束星北领了"极右"的帽子，晁哲甫对他仍有"挽救"之意，他多次暗示束先生配合形势，走光明大道。如果束先生能像其他人那样真心向党忏悔，向人民真诚投降，写出深刻的检查，他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束先生没将机会接过来。

束星北脑袋一直没有别过这个弯来："主人请客人讲话，讲错了，不听就是了，何必又

要斗一顿呢？""被斗的人有几个是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断定，这样搞下去，"以后人要消极了"，⑮很长一段时间，束星北都无法相信鸣放与反右的导演同出于一人，直到毛主席在莫斯科对留学生发表讲话前，他一直认为毛主席极有可能被个别野心家给架空了。反右是毛主席迫于压力而违心做出的。他曾幻想有一天，毛主席给他平反。⑯他甚至连自己平反的时间都做出了估算：半年。也就是说，对他而言，这场"闹剧"的时间不会长于"肃反"。

刘洪宾：

学校的反右派运动，明明是围剿批判，却美其名曰辩论会。实际上到了9月，右派的阵地上也只有束星北一个人了。面对围剿批判，他和以前的运动一样，要么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要么礁石一样，沉默不语。他还经常找一些借口逃会，家门口和楼梯道仍旧像肃反时一样贴上由他亲自书写的拒客令：本人近来身体有恙，恕不待客。居民住宅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人家上门揪斗他时，他就说："首先我参不参加会是我的自由，第二，我不参加会是出于对你们的考虑；因为你们要是现在斗了我，将来你们一定要向我道歉。再说，要是反过来我斗倒你们，你们也下不来台呀。"

实际上，到最后，束星北的思想也没有解决。9月之后，我们在学校劳动改造时（9月后束星北和其他一些离职右派便被剥夺一切政治待遇，在校内接受改造。每日无非是做些擦擦玻璃，扫扫教室，清理垃圾的活儿），他仍在宣扬他的法制主张。他说中国虽然有了宪法，却等于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民没有法制意识，大家都习惯了人治。像鸣放和反右这样的事都得由党中央号召。上面一声号角，下面跟着就是千军万马，席卷一切。假如党中央的号召同宪法相悖呢，是听党中央的号召，还是遵守宪法呢？他有时还会瞪着眼睛问其他人：难道毛主席一句话，市委书记一句话，比宪法还重要？党中央不就是一二百人吗，他们作出的决定就那么英明？他们真正地集中了人民的智慧了吗？⑰

学校正面强攻不下，便绕到了他的后面，转攻他的家庭。束星北一直没有放弃希望。就在他期待着"柳暗花明"的时刻，而就在这时候，大儿子束越新肩负着组织的使命，回家来挽救父亲了。

让家庭和组织联起手"帮助"或"改造"负隅顽抗的死硬派，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它最初发明于1955年的肃反运动。当时，某系的一个女学生因父亲曾是"旧职"人员（在青岛国民党政府里谋一个文职角色）而苦恼万分，她担心父亲哪一天会被鸣叫的警车带走，弄得她日夜不安、神思恍惚。她的情绪被系领导觉察到了，便找她谈心，苦恼中的她以为有了依赖，便将这种心思告诉了系领导。系领导便给她讲了一番道理：你的家庭出身不好不等于



你不好。我们有多少共产党人出生在不好的家庭，但并没有影响他们成为最优秀的共产党人。这就要看你自己的立场和行动了。那女生认为自己的觉悟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一直在要求进步，可总也摆脱不了家庭的阴影。一和家庭出身好的人或党团员站在一起就觉得自己矮了几分。她向系领导表示了决心：如果发现自己的父亲真的是反革命的话，一定会大义灭亲，毫不含糊。系领导觉得这是个推动肃反运动的好机会，便动员她将这种心情写下来，发表出来。女学生的文章一经发表，马上就在全校乃至全市引起了一场子女呼吁父母或亲属向党交心向党认罪的热潮。据有关部门统计，经过子女们的规劝和呼吁，山东大学或青岛市主动向政府坦白交代罪行的反革命多了，自杀的比例也上升了。

肃反运动中，大学试图通过部队组织让束越新回青岛"帮助"父亲认清形势、交代罪行。可是束越新似没有很好地合作，因而遭到批斗，累及了前途。这次再领命回来，断无回头之路。

束义新：

在我们子女中，大哥最受父亲器重，这是不言而喻的。一是传统的长子地位，再一个是经历的关系。在浙大，父亲最得意的时代，大哥一直是生活在他的身边。大哥一直是我们家的骄傲。1950年抗美援朝时，父亲将他送到部队(父亲虽然不同意毛主席出兵的策略，屡屡写信劝阻，可是一旦"出兵"成为定局，他便转而从行动上支持了毛主席。⑱大哥人聪明又有文化(这与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受到很好的教育有关)，在接受了一些必要的考查之后，就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一所为中国培养军事将领和接班人的学院，只有中央领导的儿女和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才能被派送到这里。大哥能被保送到这里享受着拥有着其他高等学府难以想象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是幸运的，也说明上升时期的共产党还是很自信、很大度的。大哥毕业后被分到锦州航空部队做了教官。大哥身着油黑发亮的皮夹克，腰里别着"五四式"，斜靠在美军吉普车上的照片寄到家里时，我们是多么自豪和钦佩哪。

大哥不仅业务好，篮球也打得好。他曾是部队篮球队的主力中锋，在一次全军的比赛中，他超常的体能、柔韧性和高大的体魄被八一队首长看好。为了把大哥调进八一队，八一队的队长竟动用了中央军委的关系，来说服了大哥部队的首长放人。不过大哥最终没有成为专业运动员。原因是大哥部队的首长爱才如子，舍不得将他放走，再是大哥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喜欢所在部队的氛围。大哥落魄后说过：那时候根本就不用考虑明天。明天或者后天没有什么不同，一切都早早地铺设好了。平坦的大路，路两旁是五彩缤纷的鲜花，他只需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行了。可是因为父亲，他的一切都化作了泡影。

大哥命运的转折点是肃反运动前夕，那时部队正准备发展大哥入党。入党申请也写

了，组织也谈过话了，剩下的便是党旗下宣誓了。可是突然就没了下文。大哥最初也不知哪里出了岔子，惟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接受党的考验，不停地向组织写入党申请书。终于组织找大哥谈话了，但谈话的内容已与入党无关，而是父亲的事。大哥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也不相信父亲有什么历史问题。父亲在国民党军令部时，大哥和母亲也在那里，什么事都知道，父亲怎么会成了"特务"、"间谍"了呢？可是部队组织有外调材料，有山东大学组织部门的信函，言之凿凿。让大哥在组织和父亲当中选择：要么站到组织一边，来劝说父亲坦白认罪，要么滑到父亲一边，站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在组织和父亲中间，大哥到底能选择谁呢？他终于在无法承受的压力面前崩溃了。结果遭到部队批斗，从此一落千丈。"反右"后期，大哥又一次面临选择，但这一回同上一次已完全不同，这一次已不是前途问题，而是能否保住军籍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如果大哥完不成"帮助"父亲坦白认罪的任务，就等于自动滑进右派的泥坑了，下场如何不言自明。

大哥一回来，父亲压力大了。他常常半夜里起来，在书房里溜达。有时他需要借助劣性白酒来睡眠(肃反运动期间，他有时就借助大量的白酒来麻醉自己)。有时大哥也睡不着，就来到他的书房，两人一谈就谈到天明。⑲

束星北终于做出了妥协，他开始在书房里构思"认罪书"了。他的妥协不仅是出于儿子的压力，更大压力是上面出台了对右派处理的具体方案。

7月18日，毛泽东在青岛时就对右派的处理定了框框，他表示无意对右派采取极端政策："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⑳毛泽东不采取极端的处罚却搞了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根据他的规定，国务院在8月3日就以命令的形式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虽然没有写明"右派"二字，但一看就明白，它的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就是说，在斗争中划出来的一大批右派分子，都是"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8月4日《人民日报》在公布"决定"时配发了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对这个措施作出了解释："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决定"与批斗和口号不同，它是个很实在的东西。有的人在无论多么激烈的围剿和批判中都挺了过来，可是过不去"决定"这一关。束星北在反右之初曾认为中央不会采取极端措施，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杀鸡

给猴看，但他不能杀猴，因为杀了猴，就没人给他们耍把戏了。"⑳

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心态。可是"决定"让他们顿悟：上面既能杀鸡也敢杀猴。由于很多单位对于问题特别严重的极右派在投入劳动教养的同时，宣布开除其公职。也就从根子上触动了右派分子。因而，"决定"一出，气节也好、尊严也好、真理也好，都很难再把持下去了。

家庭、儿子和"决定"让束星北拿起了笔，开始了他颠踬困顿一生中的第一次妥协或第一次投降(他自认为是一次向谬误与邪恶势力的投降)。这也是他生命中的另一种开端，这篇沉重如山的检讨书最终没有交上去，但却是束星北一次心迹的暴露。尽管字里行间中有很多表白、解释，自我圆说，使它更像一篇"自我开脱书"，但它却为日后束星北另一种命运路线开了先河。这也是一个人向另一种(说什么呢，怎么来形容呢)"人"的生命形态的过渡的桥梁。

亲爱的党：

我错了，我对党对人民犯了罪。

我曾经为自己辩护过，我曾经自诩为是爱党的左派，我也曾经以为群众不了解我而消极抵抗过，甚至准备一直顽抗下去做一个维护"真理"的人，拿毛主席"又要改革，又怕，那就不好办了"的话自解。回忆起古代的忠臣，有些辛酸。当我平静时，我也曾经想过：为什么几年来中国会变成这样的团结统一，向着繁荣富强的道路上跃进？为什么在仅仅八年的时间内，中国就消灭了几千年来的饥饿，抢杀、淫秽、贪污……等等现象而在老牌的资本主义所谓的"文明"的国家内，这些现象却仍旧猖狂？为什么我国的社会秩序会如此的安定，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围绕着我，我只简单的(地)用"社会主义制度好"几个字来答复而不去深思原因及至反右派斗争之后，更出我意料的(是)出现(了)工业农业的大跃进，而且在各方面，引起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这些"为什么"就更加纠缠着我，责问着我，直到处理右派时，才不能不将问题仔细的(地)想，深刻的(地)想，终于发现我基本错了，基本的立场站错了；这样就发现我变成了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

我长期受着资本主义的教育而又由于一帆风顺的环境(25岁起就当副教授，且一直受人尊敬)，养成狂妄自大的习气以至一直没有改变立场没有得到进步，一直用旧的观点来看新问题而又顽固不化的(地)自以为是。

我用旧的眼光来看党，用类似"资本主义革命时代资产阶级，一个好的执政党"的眼光来看党。我自居于"客人"的地位，把"党"和"我"的关系分裂成"主客"和"朋友"的关系，又对党的组织纪律性认识不清，没把党看成一体，我又以为党内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我对党的各项运动不是无条件的拥护(不是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来符合党的各项政策，

而是看该项政策是否符合于我的主观观点），所以时而怀疑，发生抵触情绪，我对基层组织的执行政策也发生怀疑，以为〈他们〉可以假公济私的〈地〉利用运动来整别人。

这样已够造成我反党反人民的根源而又顽固的自以为是"爱党"（我当时以为我既没有对外讲过肃反中对我是打击报复，也从来没有对外发过牢骚话，而只是对晁老和杨校长谈过和在党委会上谈过。当时以为内容很多很复杂，一时也谈不清，如果党重视就会找我专门谈这个问题），我是"向组织提意见的"；同时〈即使〉在鸣放时，我还做了些"卫党"的工作，经常向人宣扬新社会的优点，反对"取消党委制"，反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反对"有职无权"的说法，反对谩骂式的大字报，反对打电报拥护储安平，斥〈责〉闹青岛日报的学生，拒绝参加九三〈学社〉的"六二座谈会"，拒绝参加"民主讲坛"等等，又以为是"打击报复"的继续〈肃反中以为已明明查清我既不是"特务"又不是"少将"而现在还替〈给〉我戴上这个帽子），因之迟迟不认罪，以致堕落成为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

现在才认识到我过去的言论确实起了丑化党污蔑党和宣传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作用，对党对人民犯了罪，我现在谨将我从肃反到现在的全部思想活动以及现在对问题的认识全部写出来交给党审查，争取党的谅解和宽大，以便于今后的改造。

〔一〕思想活动情况略述

在肃反及平反过程〈中〉，我收集了〈一〉些材料认为可以肯定"崔戎是打击，李哲明是故意陷害"（材料的根据另写成附录），但由于控诉李哲明就势必牵涉到崔戎，而崔戎对我已百般迁就，心里想，"他只是气量小，容不得人而已"，所以就一直没有提出正式控诉。1957年1月份，我托张鼎周先生交给李十个问题请他书面答复，但一直等了四五个月，李都未诚恳答复，又听说是党委会叫他不要答复的，以致使我怀疑是"华大路线"的作用〈校内关于"华大派"的传说已很久〉。在鸣放时，觉得崔戎严重的宗派主义以及特权思想、享乐思想〈如买小汽车等等〉必须清算一下，于是在57.〈年〉5.〈月〉18日，山大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影射的〈地〉〈当时党委也强调"对事不对人"〈只〉"针对党委"的方针〉谈"党委指导思想是什么？"以此来影射崔戎和其他所谓"华大派"的党委〈成员〉，在会上看见周北屏难受的样子又说"改开诉苦会"。当讲稿在《新山大》印出寄到济南之后，我马上拿给崔戎看并讥讽地说："有什么意见？"以此来打击他。在济南的山大青医小组联合座谈会上，我又和别人一起向崔戎进行了攻击，在冷嘲热讽了一顿之后，也说开诉苦会一类的话。当会上大家对崔的"宗派主义"进行攻击的时候并说什么华大派山大派的时候，我就举了"赵襄子"的例子来讽刺崔和所谓"华大路线"。自以为这个故事很生动，可以针对其余〈它〉的宗派主义者，于是在省委宣传会议上发言时就将那次会议上的大致内容连同赵襄子的故事附在正文的后面，这样又造成我反对党的罪行，使人认为"党"是宗派主义，以为我赞成"取消党委制"〈实际上即〈使〉在那次会议上，我也是坚决反对"取消党委制"的，并以没有一个人是各方面都"精通"的，来驳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意见)。又听说于副省长是"华大派领袖"的谣言，以致对于副省长也不满，在离教小组会上又借词讥讽。

回忆我自身在肃反中被斗的情况，老婆被斗得回家大哭，手臂青伤，几次计划全家自杀，气象研究遭到严重打击，一个在部队里工作学习都好好的大儿子也因我的原故被斗，又有好些朋友也被划在我的"反革命集团"之内，而崔戎还说"一直没有把我当反革命问题看待"，这就使我容易相信别人谈到肃反中偏差的传说。又由于我认为"自由争论"是发展科学的主要因素，而现在有些人常因为持有不同的意见而被斗，因之使我认为"保障宪法的实施"是克服这些缺点的最好的保证。认为再在新社会里养成严格遵守宪法的风气则是"最理想的社会"。运动中的偏差可以避免，科学文化就可以前无古人的〈地〉勃兴起来。为了这件事，我曾在1957年3月将问题提请毛主席注意。在1957年5月底又在省委宣传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养成"法治精神"的演说，并举了些当时认为可靠的例子来增强说服力(而这些例子和"说服力"的确犯了丑化新社会宣扬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的罪行)，但我当时看到省委等很多人都拍手，还自以为是赞成我的意见就颇为得意。事后并将原稿交给陈继述印在民主报〈上〉，并写信给人大刘委员长请"监督宪法的实施"。

演讲后即回青岛(事前并不知道山大已在闹事，而只是怕开会所以先回来)，当看到山大该时乌烟瘴气的情况，心里虽然不赞成，但认为"真理越辩越明，迟早会弄清的"，所以也不很急，只请党委赶快掌握主动领导权而已。也因为这样，所以虽然对闹青岛日报，打电报拥护储安平严词指责，但对刘鸿(洪)宾邀我去九三开会，学生邀我去民主讲坛……等等行动只是借词拒绝而并不正面拒绝，所以当人民日报批评储安平党天下等等谬论时，我当时认为："这又何必呢？""只要拿解放后的成绩来说理就行了，人民日报这样一来，之后大家就不敢提意见了"，"整风恐怕也整不好了"。对后来反右派斗争的深入也有抵触情绪："主人请客人讲话，讲得不对，反驳一顿就够了，又何必斗一顿呢！"并以为"小题大作"，"毛主席不会同意的"。我并不认为这些右派言论会煽起事来："秀才造反"，"军队在我们手里，怕什么？"丝毫没认识到，这是一场有关社会主义前途的敌我斗争，以为"只用嘴辩清就行了"，"不理睬他们就行了"，"何必斗"。及至青岛日报对我展开批评之后，以为是投稿者歪曲我的原意，心里想"运动一来就不管真(的)假的斗上一顿，只好等运动过后再说罢"！以后，报上登出"特务少将"的具体事实后，我心里有很大抵触，想，"我既不是特务，也不是少将，肃反中已明明查清，这准是有人在陷害我了"。于是先向市党委、校党委以及青岛日报馆、法律顾问处反映并在1957.〈年〉7.〈月〉6号群众大会上先把这件事刷清。当时以为即使我牺牲了，只要共产党能注意我的话而改变过去的缺点："不以人废言"，则"死亦瞑目"，并认为既已被划为右派分子，"要想把我一棍子打死，永远不得翻身甚至再陷我为反革命"，则辩也辩不清，自以为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听人说我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甚至"右派言论"就觉得刺耳，起了反感。"谈不谈都是一个样，反正群众不会相信你的，也不会耐心听你的"。于是情绪恶劣，态度顽抗(固)，又始终顾虑着崔戎以及所谓"华大派"

而不正面把问题谈清，以至问题更加复杂化，更加上对政治运动的不正确看法和怕开会的习气，于是就借口有病不开会。在会上，甚至耍无赖，开顽〈玩〉笑骂人等等都表现出来，而丝毫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当然更难理解自己的罪行，心里想：“反正不会饶我的”，又由于文章内确是存在着些错误，所以也不能向党中央报告，以为总有一天：“党会了解我的。”以为一认错，就会全盘否定文章的“价值”，“既要改革，就不能怕”。甚至认为“党会向我道歉”？！直到多半年的时间之后，才使我从迷梦中觉醒过来，而才开始检查自己的错误！过去一直为自己辩护，以为我不是右派，我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而不看我的文章所起的实际作用！一个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领导的人怎么会写成那种具有煽动性的恶毒的文章呢？归根结底的检查之后才发现我的立场观点错了。

（二）言论和态度的批判

检查我鸣放中错误言行对党所起的危害性，实〈在〉是痛心之至。党为我的事组织了多少人跑了多少城市，进行调查，才下了结论，这说明党对我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而我却认为我的问题早已查清，这只是崔戎的“将错就错”的策略，以此来掩盖他对我的“打击报复”。

党对我的平反工作确已做到仁至义尽，我很感激党，但在平反会上却只说：“党是伟大的，对我仁至义尽”，意思是说“山大党委只是由于上面的指示而不能不做，并不伟大”，无形中分割山大党委与党的关系。

所说“华大派”与“山大派”在山大虽然传说很久，但我也只是听人说说，就凭主观在山大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加以攻击，又让新山大把讲稿印出，以至犯下煽动群众向党进攻的不可饶恕的罪状〈行〉。在文章内以“此山是我开……”描写崔戎和其他所谓华大派的党委为恶毒的山头主义者并根据自己认为正确的材料（见附录），主观的〈地〉认为山大党委崔戎对



革命者与反革命分子向来无理可讲，讲理会实际上是批判会。1957年6月20日，青岛日报社职工和“右派”讲理会会场。

我的肃反是由于"三大罪状"，并诬蔑"党委造谣"，恶毒的〈地〉叙述"经过"，造成对党对人民不可弥补的损失。虽然我过去没有对外谈过肃反"经过"（平时也只是向晁校长，杨副校长谈"打击报复"，群众也只晓得闹了一年多、闹大了的"选举美国女电影明星"一件事实的真相），但经过这一次党委座谈会以及《新山大》〈将文章〉印出之后就弄得人人皆知，这个罪状是难以弥补的。

文章中"不是抗日战争时的指导思想"虽然只暗射崔戎的特权思想和"出门必坐小包车"、"买新小包车"等享受思想，但由于故意的闪烁其词，就给人以"党现在变了"的恶毒印象，其中"打击报复可以证明是普遍的"也只是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主观推论，"比这个更严重的还有呢"也只是主观的〈地〉以为是李哲明陷害。而我在文章中就用这些词句把山大肃反说成一团糟，更用"开诉苦会""三年之后"等语〈言〉加深"打击报复"的语气，以致形成当时向党委倒算的一种歪风，打乱了党的整风计划，对党对人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其次，在当许多对肃反心怀不满的人以及其他别有用心的分子利用我的肃反问题以及座谈会上的言论向党进攻的时候，如果我确是一个头脑清醒和党一条心的人，在这个时候就应当挺身而出，不计个人的得失而加以驳斥。但我并没有那样做，只是请党赶快掌握领导权，在一张邓从豪等写的一张反批评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而又抹去，怕影响"群众的积极性"。这充分说明我过去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看不出大是大非〈除坚决驳斥闹青岛日报以及反对取消党委制之外〉。在反右派斗争时，还顾虑着崔戎〈同时因为崔戎了解我的肃反情况，又希望他出面为我辩护，所以后来在小组会上提议请崔戎为我〈做〉"辩护律师"〉等人的报复而躲躲闪闪。不将问题交代清楚，只推到李哲明一个人身上，以致矛盾百出，更难使人理解。这就难怪有人认为我当时"安慰某些党员不要消极"是"猫哭老鼠"，驳斥王普打电报拥护储安平的错误是因为他是"政治上一年级而不是老手"，婉言拒绝参加当时的"民主讲坛"是鼓励学生做"轻机关枪"、"有我们老教授在后面支持撑腰"等等的指责了。这些指责毫不足怪，因为我当时既不是和党一条心，认不清大是大非，而又不在紧要关头驳斥我文章中的谬论，这些指责是罪有应得。且在省委发言中我又继续攻击肃反中的偏差而所举的那些"九中教员"、"安徽铜矿"的例子，只是由于我对肃反中政策的贯彻感到怀疑，就没有其他可靠根据的轻信谣传，以为这样可以增加文章的说服力，以为反正省委要调查的，却不认识经过这样的扩大宣传之后，对党的威信造成如何重大的损失！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是罪有应得。

再检查省委发言中所引用山大齐医小组座谈会上谈的赵襄子的故事，确给人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恶毒印象〈尽管意愿只是针对"宗派主义"者〉，以致犯了"反对党的领导"的〈令人〉痛心的罪行。

尤其荒谬的，是在省委宣传会议上发言强调"法治精神"养成"守法风气"时，竟举资本主义国家的罗〈卢〉森堡、鲍威尔等等例子来宣传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精神"〈而这些却正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守法的"例子"！〉。这样给人以我国人民守法的精神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人

民守法精神的错误和恶毒的印象。(这明明是胡说，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盗杀、贪污不也是违反他们自己的宪法么？何况由人民奋斗出来的一些微(弱的)"民主"和"自由"也经常遭到御用的假证人伪造的证据的摧残么？而我国社会秩序的安定不正是说明我国人民的守法精神"法制精神"么。)

事后我将稿件亲手交给陈继述全登在反动的民主报上，以致在校内更造成嚣张的空气。(稿件)还准备交给青岛科联。在校内外均引起丑化新社会宣扬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恶毒作用，而这些罪行，我还一直不承认，还自以为"要改革，就不要怕"，"要使我们落后的国家人民，变成先进的国家人民，我们要有这个志向！"以致在小组会议上还继续宣传"法制精神"造成对人民更大的罪行！

由此可见，我的文章引起了三个无可否认的歪风：第一，起了攻击肃反污蔑肃反的作用；第二，起了攻击党的领导以及无产阶级的歪风；第三，宣扬资本主义国家"法制精神"。单是这三个罪状已够划我为右派分子；而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则更为恶劣，我的态度是消极的，是对抗的而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反怪别人曲解我，怪别人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当物理系召开反右派斗争会时，我明明接到通知却用各种借口如"记不清开会时间"，"今天不是开会时间"，"开会时会吵架"来逃避开会，逃避斗争，即(使)7(月)6日的大会的出席也经工会和同学的三请四邀，大会上要求自己先讲，企图讲完后可以先溜走，当工会追查我问题的专门小组找我开会时，我也是推三阻四，甚至对他们说："只能每星期一次"，而在会上边只是随口答复，东扯西拉，从来未做过什么准备工作，有一次竟然对工会小组说："犯人可以请律师辩护，我为什么不能请呢？"以此来逃避斗争、逃避开会，甚至当小组让我自己请辩护人时，我建议请崔戎和杨校长。(这)我还嫌麻烦，又说"法院可以指定律师，请你们自己指定"。这样我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用不严肃的态度(来)对付。不独如此，我还在家内客房门上和楼梯口、书房门上贴上"避(闭)门思过，概不接见"，又贴上"请勿上楼，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宪法第70条"的纸条，以此来躲开别人对我的帮助。(但这些全是谎言，因为我不但没有"思过"，而只是在写一本书：相对论，准备传之"后世"。)心里只是想，"辩不辩论总是一样，认不认错也是一样，反正不会饶我的。"又说，我反正不是右派了，混得过就混过斗争时期，混不过也没办法，只好由他"处理"后再说罢！这一辈子只想混一碗饭吃就算了，种种消极抵抗的思想也表现出来，尤其表现得恶劣的是当人代会要我出席会议辩论时，竟借口有病而不出席，又用了很多"理由"，作出不出席的借口，这些赖会的花招引起了群众的愤怒，使我与党和人民形成对立的局势而自绝于人民！除去这些花招之外，我还耍了无赖的"手法"。现在我坦白交代与刘鸿(洪)宾订"攻守同盟"的事。当民主报第一期印出后，刘鸿(洪)宾拿到我家的时候，我先翻看自己的文章，觉得中间漏了一大段，让刘鸿(洪)宾补上，又翻看了第一篇陆侃如的文章问刘"为什么又谈些问题"。他说，"陆的文章怎能不登。"后来又翻到支持闹青岛日报社的文章，我当时很气愤的(地)对刘说："岂有此理"。而刘却说"应当质问"(指青岛日报)。当我和他辩论时，他就含

含糊糊地急忙走了。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我觉得刘的其余问题还是属于思想范畴内的问题，而只有支持闹青岛日报一事是思想范畴以外的事，属于法律问题。(我)想到他一家老小，于是在小组交待时故意说"刘鸿(洪)宾当时说，'他们要登，我也没法'"，以此来推卸他的责任(这是谎言，因为据我判断，刘鸿(洪)宾对闹青岛日报，至少对"质问"青岛日报，是同情的)。当天我就将交待的内容教(叫)小孩送给刘看，使他体会到这一件事的严重性(由于条子上只有这一件事是假话，其余都是老实话，我想他是理解我的用意，所以没加另外说明)。当小组会议对这件事追查时，我起先的确不晓得所说的"攻守同盟"的意义(思)，以后愈追愈紧，愈逼愈紧，使我十分难堪(当时认为是一生最难堪的时候)。我就只好耍无赖，说什么"没有"、"大概没有"、"假使有了，那我说的话全是撒谎"，以及"有人找我，说我不在家……"甚至自认为"强盗"，而始终不坦白真正的用意，甚至在处理右派时还不坦白交待，还代为掩护。这说明我对党的不老实，说明我与党的对抗的情绪。我这种撒谎、掩护也不只是这一次。关于九中教员事，我硬说该九中教员是我的学生，而事实上是葛源先告诉我后，又在海边介绍该人与我认识的……这些事一方面暴露了我的品质，另方面也说明我对党的看法错误，以致把私人情感放在党的利益之上。

在大小会议上，我也表现出很不老实的态度，一会儿说我是"左派"，认为"对我斗争是错误的"；一会儿又自认为是"强盗"，"你们还会相信我的话"。总之是要无赖，不是诚恳的(地)摆事实说道理，更不是诚恳接受别人的批评教育。不虚心检查自己的错误而老怪别人，所以造成"态度极端恶劣"和"顽固不化"的应得结论，这全是咎由自取。

(三)错误思想根源的检查批判

在检查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之后，我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干出这些反党反人民的罪行来呢？"细细的(地)想起来，实在难以理解。第一，现在中国日新月异的每天都在富强的道路上前进，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连美国也在朝鲜碰了钉子回去，而我做梦也想中国富强起来。现在这种梦想已肯定的逐日实现。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我一生也最恨人压迫人，而现在中国的一向贫苦仰人(鼻息)生活的工农全都翻了身，当了主人，国土上再也没有帝国主义的铁蹄，我国对弱小民族的正义支持，例如对埃及及其他国际问题上的正义行动(的支持)都使我五体投地的(地)感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说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罢(吧)，谁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日益危机，而且正在走向崩溃的前夕，更何况帝国主义者也不可能让中国在工业上发展成资本主义国家。再看资本主义国家内失业的威胁，(还有)枪杀、淫秽、饥饿、贪污，而我新中国才成立八年就消灭了这些现象。资本主义国家内有一个发明就被紧密地收藏起来，不肯公开施(使)用，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先进发明创造就(会)马上被全国推广形成生产跃进的高潮。这些无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可能使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谈些个人生活罢。我解放后的生活水平，一天一天的提高，衣暖饭饱，而且可以天天

读书吃酒，毫不顾虑"饭碗"问题，和解放前想办法向市侩买米，抢购"大头"的日子比较起来，有天涯(壤)之分。那时甚至我自己的弟弟还说"教授几个铜板一斤？"的挖苦话。我有什么(理由)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呢？说我为的是想"向上爬"罢(吧)，(也不对)我一向就厌恶行政工作，请我做也不肯做，更何况"爬"呢？说我对国民党有什么好感罢(吧)，国民党把中国搞得一团糟，我自己被国民党的兵打得吐过血，又被军令部陶士珍关过好几天，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逼得流离分散(失所)，我父母也间接的(地)被逼死亡。那些市侩官僚趾高气昂一脸看不起"教授"的样子。这些怎能使我对国民党有好感呢？(再拿国民党时代的社会秩序和现在比较，更是天地悬殊，大概除去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之外，没有一个人会"怀念"国民党的！)那么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莫非是怀恨党在肃反中对我的斗争罢(吧)？但是党在肃反中对我可算是"无微不至的爱护"。即使在斗争当中，除斗争会上之外，在其余的时间内也没有一个人不待我好的，检察院对我慈父般的安慰，使我感激得流下眼泪来，即使崔戎在斗争会之后，也对我加以安慰、解释，并亲自削苹果给我吃。市委矫部长也亲自倒茶给我吃，连陈毅副总理都关怀我的问题，据说中共中央每个月有信到青岛市委查问我的问题。(过去社会上有谁这样关怀过我的呢？)平反以后就更不必谈了。我常常自誓："在党困难的时候，我必定用性命来报答党的恩情。"我还有什么可能对党怀恨和不满的呢？难以理解，再平静地想一想，我有我幻想的生活和环境：幻想在一个幽静的农村(最好在靠近拍岸的海涛的环境里)，和几个朋友或几个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既没有人打扰我，也不要"开会"更没有"斗争"，这样可以身心愉快又可以专心一致(致志)研究生活下去，既可以保证研究的质量，也可以按计划交成品，对人民作出贡献。所以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对"斗争"本身就有着抵触的情绪，所以向往资本主义式的民主自由。以为最理想的社会是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加上资本主义式的自由(互不打扰)。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之下，使我对"斗争"心怀不满，发生抵触，不过这还不是基本的原因。

另外还有基本的原因，检查后发现我对"党"的看法基本错误。过去的错误看法不谈了，即到山大后，思想的变迁虽快，也没有真正的(地)认识"党"。最近几年来，只认识共产党好，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但并没有深入追究(党)为什么取得这些伟大成就的原因。我还是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个好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眼光来看"党"，以为也只是一个"好党"或"好人党"而已。对党的各项政策并不是无条件的(地)拥护，也没能改造自己的主观"来合乎政策"，而是用自己的旧脑筋旧立场来看政策，因之，有时发生抵触情绪，同时对党的组织关系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如我以为在肃反时，山大党委会就是崔戎一个人"说了就算"，其余的党委成员只听他的指挥而不认识集体领导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听信什么山大派华大派的谣言。我对党中央与党基层组织的纪律等关系也搞不清，还是用旧的眼光来看问题：以为基层组织可以利用职权在党中央或上级指示的公文内"兜圈子"，可以假公济私的(地)执行政策，甚至我还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各人的意见也不一定一致，而人民日报的社论也只代表人民日报编辑部里几个人的意见(所以有"反右派"不是毛主席的意思等

等错误看法)。不认识党的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致发生一系列的错误看法和错误言论。

我又把"我"个人和"党"的关系看作是"朋友"或者"主""客"的关系，把自己看成是"客人"，"党是主人"，把自己看成是"被党聘的教授"，学校是"聘老师的东家"。认为，"你们主人是请我来教书的，我并不是白吃你们的饭。"把党看作是一个"好朋友"而不是和党一条心，不是从党的立场看问题，而是以自己的旧观点看问题，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玉〉"，而不是站在同一个立场，只以旧的"好人"，"坏人"的眼光来衡量自己和别人，来要求自己和别人，以为"好人"是"公正无私，没有害人之心"，"爽直忠诚，不虚伪"，反之就是坏人。而没有从"立场"来看问题，以为肯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是"好人"，为自己而牺牲别人的是"坏人"，而不细细追究所谓别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以至无原则的把好人当坏人，把坏人当好人。现在才认识到这种无立场的看法是错误的。认识到"好人""坏人"的定义，应当从"对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有利有害的两方面看，也就是说要用"阶级立场"来看。对建设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大众有利的事才是好事，一心一意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劳动的人才是好人，否则就是坏事就是坏人。新的标准定了之后，就觉得过去的错误。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但是为什么过去看不清呢？还是一个"立场"问题。不是从党的立场看问题就看不清，对什么是"有利"，什么是"有害"，也就看不清了。现在既然肯定党是完全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立场，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站在六亿人民的立场，而党的智慧比个人的智慧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之后，问题的好坏，人的好坏，就看得清楚。所以今后第一步改造的计划就是完全听党的话："凡自己的言论行动对党有利的就是好事，对党有害的就是坏事；做好事的才是好人，做坏事的就是坏人。"这样衡量起来，"我在鸣放时期做的是对党不利的事，因之是坏事，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坏人"。现在要立誓做对党有利的好事，才能成为好人，才能对建设社会主义有贡献。也由于没有站在党的立场，所以对运动中斗争的方法有着自己一套的看法：以为在运动开始时就应当先掌握相当充分材料再用"斗争"来向纵深方向发展，以为这样既不会斗错，伤了被斗者的心，另方面又可以更好地教育群众，在听说山大12个反革命分子全不是用斗争的方法斗出来的，就更加反对运动中所采取的那种狂风暴雨的方法，以为斗争只损伤人的心使人消极而又查不出反革命来，说什么"一片风雨声，成绩有多少"，来讽刺暴风狂雨的斗争。这样说法暴露出两个错误看法：第一，是机械唯物论的看法，以为只有查出反革命来才是成绩，而忽视肃反运动对反革命活动沉重打击的伟大意义，使反革命分子内部分化瓦解以至投降，弄清许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从而获得丰富的经验，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和警惕，有更好识别反革命的本领。第二，不是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以为自己的智慧比党还高明，而不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偏差"只是伟大运动中的一点小波浪而已，党也及时地采取各项措施来防止偏差，来避免和纠正偏差)，而这些偏差与运动的成绩比较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狂风暴雨的方法是解决敌我矛盾的一种好方法，也是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因之，连〈联〉想起来为什么几千年来的贪污和投击〈机〉倒把现在绝迹了？

资本家为什么可以和平的(地)接受改造，国家的经济为什么可以稳定，不全是三反五反运动的成绩么？这些道理现在想起来都很简单。所以不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就看不清楚。就拿自己来说，在反右派斗争时，我认为"主人请客人讲话，讲错了，不听就是了，何必又要斗一顿呢？""被斗的人有几个是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并断言："以后人要消极了"，但事实恰恰相反，"人民却更加积极"，这样就使我开始检查自己的错误看法，而到今天，才决心改造自己。(否则我准会把自己的立场观点"带到棺材里去"；和风细雨的方法不能使我从顽固不化的迷梦中惊醒过来。)所以只有从党的立场看问题，才能有全面的认识；才能知道解放后成绩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不是单靠"好心"两个字可以做到的，而是和各项运动分不开的。通过运动又可以使群众成为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有机体，提高思想，提高觉悟；"斗争"则是人民对某些问题的怀疑的追查和责询；是锻练革命队伍中纪律性和纯洁性的一种措施，并且是克服自由散漫和各种有害于革命建设的一种措施。这样使我对"斗争"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并愿意参加斗争。

其次也由于立场站错(了)，所以对"民主"和"自由"也认识不清，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是自由的，既不要参加政治学习，开会可以随便到不到；说错话甚至骂骂人也没有人斗你，以为"言论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障，是文化勃兴的基本因素。现在看起来，这些所谓自由是"自由散漫"的自由，是无纪律无领导的自由，是造成过去中国"一盘散砂(沙)"的基本因素。在我们国家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是"自由"的最可靠的保障，资本主义式的自由是虚伪的自由，是少数人的自由；当人民站在饥饿死亡的边缘上时，还有什么"民主""自由"可谈呢？所以谈来谈去，还是一个问题："立场问题"。当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当站在劳动人民、六亿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时，"自由"和"民主"的定义也就不同了。这样一看就认识到"抽象的自由"和"具体的自由"的分别，也就是说"集体主义的自由"，而不是自由散漫式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是对人民有利的自由。否则无纪律无组织，则是对人民有害的自由。我第二步的改造计划是使个人自由服从集体自由，养成集体主义的思想习惯。另外我所宣传的"资本主义法制精神"，也是夸大歪曲。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杀盗淫秽的到处猖狂，正是违反他们法纪(的结果)，而我国的社会主义秩序却远胜过他们，这是一个对比的讥讽，说明治好一个国家不是单靠几个条文可以解决的。由此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党领导"的作用，远胜过空洞的条文(当然条文是应该遵守的，但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条文可以被人钻空子，如找假证人等等)。谈来谈去，还是立场问题。不站在党的立场，问题就一切看错了。

除去以上所述的主要的立场站错的问题之外，我又回忆到那两篇文章中的恶毒字句。为什么出言吐语那样的恶劣呢？态度也是那样的恶劣呢？很多立场站错的人的态度言吐(谈)并不那样，这种态度并不是偶然的。解放前也是一样，是一贯的。不管什么人对我提意见时，我就先堵住他的嘴。有人说我的缺点时，我就先说他的缺点并且当面夸大，不耐心听别人的话而只要别人听我的话，夸大事实证明我的话对(和别人在一起谈话时，也只听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狂热和盲目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1959年青岛职工反"右派"誓师大会会场。

我一个人的喉咙，使别人无法插嘴。当我自己的话讲完之后，我就借故走了）。这种恶劣的态度特别表现在对上级领导的谈话中，以为不如此就会被人认为"向上爬"，"胆小"，甚至会被人误会为"骗饭吃"。

是不是由于"吃酒"的原因呢？也不是，"吃酒"只增加问题的恶劣性，我在不吃酒的时候也不肯听别人的话。自己拿定一个主意之后，就坚持到底。合于我主观想法的意见就容易接受，不合我主观想法的就借词推却甚至疾言厉色的〈地〉驳斥。单是性子急脾气不好么？也不尽然。固然这些也是主要的因素，但还不是惟一因素。另外还有重要的因素："骄傲狂妄，自以为是"，以致使自己不能得到改造。对政治不关心，这个因素是有来源的，我小时候读书比较聪明，二十五岁就在浙江大学当副教授，并且有许多名教授向我请教，也"佩服"我。以致使我也成为"名教授"，在国外的科学权威杂志上又发表好多篇研究论文，就渐渐的〈地〉使我骄傲起来。起初还只在科学问题上骄傲自满，及至平反后就以为在政治问题上也看得准，就使我在政治问题上也以为自己看得对，把一知半解的知识抓在手里，还以为这是为的"改革"，为的六亿人民并将这种错误的意见强加于党，这样使我堕落成为今天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要使我能根本改造，则必须把这个根子挖出来，予以摧毁（在肃反期间，我对这个问题也开始有点觉悟，但当时集中在"我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上，而没有在思想工作上深刻检查，平反后就更不曾检查了）。

在反右派之后，接着有系统的整风，接着全国大跃进。人民觉悟提高了，工业农业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前跃进，和我的估计"人民消极了"却完全相反。而反右派斗争确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再想到解放后各项的建设成绩和人民生活品德的改变却是过去几千年来人民所不敢梦想的，而现在实现了，且在一日千里的前进。想我自己呢，连家庭几个成员，系里面几个同事的关系总〈都〉搞不好，连一个山大物理系总〈都〉搞不好，还有什么理由值得骄傲呢？肃反后的平反只是党谅解我，党爱惜我，并不是什么"看得准"，而我却又

骄傲起来，以为我自己的"政治也行"，实在荒唐之至！想到这里不由我不低下头来。再检查我的文章，不由我不痛心，我实在对党对人民犯了罪，是一个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害党害人民的右派分子，请求党再谅解再宽大再爱护，我以后决心听党的话，照着党的方针做事，改变自己的思想使〈之〉符合党的政策。

另外再检查我的科学成就，实在是沧海一粟，并没有什么大发明，而自己的东西又不肯拿出来，对人民有什么特殊贡献而值得如此的骄傲呢？再想到即使对人民有了特殊的贡献，对人民骄傲起来也将步"朱可夫"的后步〈尘〉。由于骄傲而失败的例子不是多不可数么？想到这里，使我不寒而栗。一生的骄傲自满使朋友不敢亲近我，使我在家庭里在系里形成"恶霸行为"，"说了就算"，以至没有人愿意当面指责我，而我又不听别人的话，同我要好的都是顺着我脾气的，使我在政治上得不到提高，在学术上不注意别人的研究成果，骄傲自大并不能使人尊敬，相反的使人厌恶，使人觉得我是妄人。靠骄傲既吓不倒人也骗不了人，徒然使人更贬低自己，徒然使人嫌恶而自绝于人。回想起过去党对我的爱护实在令人伤感，回想起当我初来山大的时候(1952年)，党和行政对我的关怀和尊重，以及平反后党和行政对我再度的爱护，而我却以为向党和组织靠拢会使人疑心，我是"巴结领导"，使人怀疑我"有所企图"，因之"故意"与党疏远，故意的闹"不一致"，以为这样可以表示我不是"有所企图"，不是"骗饭吃"，可以表现出"无求于人"的"清高身份"。到今天才认识到，向党靠拢并不是向某一个人"献殷勤"，而是为的社会主义前途，为的六亿人民的幸福，为的是改造自己使〈之〉能担任起建设社会主义繁荣富强的事业。过去站在旧的立场看问题，使我和党疏远，使我和党不是一条心，以致堕落到右派分子的泥淖内而成为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实使我痛心之至！党向我伸了两次手而我顽固拒绝，这种悔恨对谁说呢？只有对党说！向我亲爱的党说：我过去完全错了，我现在觉悟过来了！只有党是我暴风雨中的磐石，我坚〈决〉抓住这个磐石不放。从今后完全听党的话，改造自己，使自己能为建设繁荣的社会主义祖国尽一点力量，使自己的知识能为人民所用。党！我今天是败子回头，从今后决不违犯〈反〉你的政策，决心听话。希望〈得到〉你的教育和改造！恳求你再伸一次手，末了一次的手！

…… ……

写完之后，感觉心情比较轻松。回忆一下思想的转变，从自以为爱党到认识到反党，中间走了许多曲折弯路。

当一开始反右派，报纸上登载我是"特务少将"时，我的抵触情绪达到最高峰，认为是"打击陷害"的继续。认为大家开会帮助我是故意整我，叫我检讨是想套我的话来抓我的"小辫子"。所以不论大会小会对我都不起作用。我根本没想到"检讨"，并且认为反右派后，整风要是整不好，人民也将消极，以后要"平右"，所以我将青岛日报和新山大的材料全部留下两份，准备以后上诉用。当反右派深入之后，发现我的文章里是有缺点，说得"不顶好"，造成"大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一直认为基本的看法和观点是对的，所以也不想检

讨，以为一检讨就会把基本观点(所谓法制精神)冲淡，失去文章的"应有价值"。一直到双反后，工业农业大跃进之后，我的信念动摇了，才发现我的看法和观点"有问题"。"平右"大约不会有了，但那时仍然顾着面子，认为反正已经这样了，检讨等于"画供"，徒然受罪，同时又由于我没有做过检讨，对检讨的认识不足，以为检讨就是一齐包下来，拼命的〈地〉骂自己而已(由于我过去的态度不好，所以也没有人愿意找我个别谈话)。到处理右派时看见校内贴满"逮捕历史反革命"的标语，心里有点乱，想马上到中央上诉，但想到既然有错误还未检讨，到中央理由也不充分，但苦在不知怎样检讨，于是就想找晁校长认罪，谈了后就我当时的认识水平，匆匆写了个检讨。

以后，党派我的大儿子回家帮助我，使我非常感动。他劝我参观了工农业大跃进展览会和肃反展览会，和我谈了立场问题和对党的看法问题。他对我两篇文章的批判和大家的看法差不多。使我想，"如果别人有意整我，故意夸大，难道我亲生的儿子也想害我么？"这样我又重新的再复看我的文章和(我留下来的)大家过去对我的批判，这时我发现了大家对我的批判是有理由的，因此感觉到党对我的教育是正确的。这样使我决心把全部的内心活动谈出来。

由于许多问题过去从来未对人谈过，也有些问题从来没有系统的〈地〉谈过，更由于自己的水平所限，所以这个检讨还是初步的，也许过程显得太多而深刻不够。但我诚恳的〈地〉希望党今后多多帮助我，作进一步的检查和认识。

通过写这个检讨，我初步地认识了两点：(1)相信党、听党的话；(2)相信群众，是最好的办法，我如果过去这样做的话，要少走多少弯路，今天也不会变成右派分子。

由此回忆对党的认识怎样的迟迟不前，一直等到〈有了〉大量的事实才推动自己逐步的前进，一直等碰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使自己真正认识到"立场"的重要性，才从迷梦中觉悟〈醒〉过来，才下决心以后永远相信党，听党的话，永远和党一条心。②

束义新：

父亲终于拿起笔来，开始构思"认罪书"。一篇几千字的"认罪书"，写了撕，撕了写，也不知耗费了他多少个晚上，以后才知道，父亲这种人，要他扭曲自己，放弃原则和人格是多么艰难。父亲的"认罪书"终于完成了。家里人看了后，觉得不大像"检查"，通篇都是解释与辩白。不过对于父亲来说也算勉为其难了。那时候，我们是多么天真哪。母亲和大哥以为有这么个东西，校领导也好向上面交差了，就会网开一面了。

但父亲最终也没有说服自己。他尽管写了"认罪书"，却没有上交。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来，母亲问他见到晁校长了吗，父亲说，见到了。母亲又问：交了？父亲说：交了。母亲这才透出一口气来。在母亲的印象里，晁校长对父亲还是比较关照的，她以为父亲这样

做，就会减轻罪责，学校就能对我们开恩。她哪里知道，在那样的形势下，即使晁校长有心帮助父亲又能怎样。父亲的"恶名"太大了。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大学哪个人能说了算的。

父亲最终还是没有让自己的人格作出让步。让他这样的人违心做事简直太难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父亲在山东大学的行政楼外徘徊到凌晨一时，因为晁校长办公室里的灯光亮到凌晨一时，父亲实际上是在利益利害和原则人格两边徘徊着。最终利益和利害没有战胜原则和人格。父亲也无法向家人交待，只好撒谎。㉓

中共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

送来束星北案件〈报告〉收到，据报告材料称：束星北于1944年6月至1945年10月任蒋匪军令部二厅綦江电讯训练班、军令部二厅技术室教官、顾问、副主任等职，积极进行指导用干电池装制发报机、研究试制小型特工收发报机等罪恶活动，并先后介绍江乃霁、陈维昆、束健北等数人到该特务机关工作；束参加我教育工作后坚持反动立场，辱骂我党和民主人士，散布反动言论；在大鸣大放期间又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经研究同意你们定为反革命分子的意见，至于如何处理的问题，你们可根据其表现与对工作的作用决定。

中共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

1957年11月13日 ㉔

关于极右分子束星北的处理报告

一、本人概况(略)

二、本人主要政治历史问题经历(略)

三、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略)

四、反党阴谋和策略方面的言行(略)

五、对束星北问题的认识及处理意见

束系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后一贯思想反动，并有一系列反共反苏言行。整风中又借机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的〈地〉大肆向党进攻，他的阴谋做法和言行是极其阴险恶毒的。反右后态度又极恶劣，不但不认罪且继续攻击和污蔑党，是一个毫无悔改〈之意〉的极右派分子。其根源除解放前任反动职务和受资本主义反动教育影响外，〈其〉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他〉是一个阶级敌对分子，因此理应与反革命问题并案严加惩处。但因束星北在物理学上尚有一定水平，原系二级教授，并在全国物理界稍有影

响需给予照顾，不过因其情节甚为恶劣，处理已需严肃，为此建议法办判处管制使用，调离学校，不再作(做)教师。

中共山东大学党委会
1958年1月27日㉕

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

束星北案件，经我们研究并请示中央十人小组批准认为：束星北于1944年6月至1945年10月在蒋匪军令部二厅綦江电讯人员训练班和军令部二厅技术室任教官、顾问、副主任等反革命职务期间，曾积极进行指导用干电池装制发报机、研究试制小型特工收发报机等罪恶活动，并先后介绍江乃霁、陈维昆、束健北等数人到该特务机关工作；参加工作后，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敌视我党和人民政府，散布反动言论，辱骂我党和民主人士，污蔑苏联，在整风运动中，又恶毒地向党进攻，被划为极右派分子。据此，同意将束星北定为反革命分子，建议司法机关给予判处管制处分，留校控制使用。

中共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
1958年6月13日㉖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8)南法刑字第375号

公诉人：青岛市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夏本英。

被告人：束星北，男，52岁，江苏省南通人，现住本市鱼山路26号，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家庭出身地主兼资本家，个人成分自由职业者。汉族人，无前科。

上列被告人因反革命一案。本院于1958年10月14日在本院法庭公开审理。审查了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并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和检察长的意见，现认定事实和理由如下：

被告人束星北于1944年7月至1945年9月在蒋匪军令部二厅綦江电讯人员训练班和军令部二厅技术室充任顾问、副主任等反动职务。被告人在任职期间，积极从事技术研究活动，指导用干电池装制收发报机，研究装制小型低压特工收发报机和雷达等罪恶活动。

解放后，被告人参加工作(后)仍继续坚持其反动立场，敌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散布反动言论，辱骂共产党和民主人士，诬蔑苏联，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又借机大肆向党和人民政府进行攻击和污蔑。经讯(，)被告人束星北只承认在匪军令部二厅研究过雷达和小型的收音机，否认担任顾问、副主任职务及制做小型低压特工收发报机等罪恶活动。

（经）查被告人束星北历任蒋匪军令部二厅顾问、副主任职务和研究制作小型低压特工收发报机等罪恶事实，完全属实（有被告人1952年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内交待和检举材料为证），被告人有意狡辩抵赖，企图逃避罪责。被告人束星北历任反动要职，解放后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敌视党和人民政府，散布反动言论，并进行造谣污蔑。在肃反运动中，政府给予从宽处理，让其悔改继续改造自己，被告人并没有被政府的宽大政策有所感召，痛改前非，重新作（做）人，反而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借机大肆向党和人民政府进行攻击和污蔑，辱骂党的领导。实属违反国家法纪，应予依法惩处。据此，本院特依据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第3条第5、6两款规定之精神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束星北管制3年。刑期自1958年10月14日起至1961年10月13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宣判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赵春生

书记员钟秀英

1958年10月15日④

1958年10下旬，束星北踏上了月子口之途，他夹在青岛市的1800多名右派分子大军里。这一年，束星北52岁，52岁的束星北在奔赴月子口的时候，他的儿子束越新，也从部队回来了。不过束越新不是转业，也不是退伍，而是被"黑"下来的。他没有完成组织交待的任务，首长便让他回来了，没有任何说法，没有任何交待，也没有任何手续。束越新在1958年成了个"黑人"。1958年的中国城市，"黑人"是没有出路的。不过这时候束星北还不知道儿子的事情。他只能考虑自己眼前的事情：极右派、历史反革命分子和被管制分子，这三顶帽子犹如三座大山，牢牢地将他压住（历史反革命在档案中虽没有明确记载，但束星北以后却深负其累，也没有人对他这一顶帽子产生过怀疑）。这很像一个寓言，在以后的漫长的日子里，他成为一个愚公，一个带枷的愚公，每天挖山不止，并期待着终有感动上帝的那一天。

注释

①李凌钰采访录，1995年5月21日。

②刘洪宾采访录，1995年5月19日。

③据束星北档案第三卷，第38－40页。

④《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0页。

⑤《大胆、坚决、彻底地改进工作争取整风运动的全面胜利——校长兼党委书记晁哲甫同志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所做整改阶段的动员报告》，《新山大》1957年11月13日第5版。

⑥于良采访录，1995年3月3日。

⑦《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8页。

⑧《1957年毛泽东的青岛之行》，青岛党史通讯总31期第4页、第10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页。

⑩同上，第461－462页。

⑪仲平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鸣放期间因一篇《国事十条》而闻名。《国事十条》被称为右派向党进攻的最为恶毒的文章之一。《国事十条》载《新山大》1957年6月14日第3版，附原文：

国事十条

仲平

一、大城市大"鸣"，中城市小"鸣"，小城市和乡村不"鸣"。广开言路何厚此而薄彼！党中央就应该设法普遍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倾听中下层人士意见，尤其是农民意见。目前报纸上那么多发言，一个农民的意见也没有。不合理，不公平。

二、因"胡风问题"，党中央情绪有点不够正常，头脑有点发热。因此这次"肃反"知识分子被冤枉被搞错的特多(与别(的)社会阶层比较)。尤其以教授为最。显然对知识分子进步估低了。谁叫你们知识分子中有个胡风来！

三、天下是我的，民主人士、起义人士，"留客"、"养士"。只要有你们饭吃就应该"谢主龙恩"。古人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母；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XX(路人)；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XX(寇仇)。

四、政治待遇："一律平等"之下又分九等三十六级，等等不一，身价各不相同。党员一等，团员二等。家庭成份，个人头衔，载诸史册(指个人档案资料)，有条不紊地走遍天下不乱。

五、校内普选富有戏剧性。我们决不希望资产阶级民主，但我们要求享有基本的人权。

六、"李万铭事件"是盲目信任，崇拜"党员"的恶果。(李万铭乃大学一名年轻教师，属大学培养的骨干力量，入党不久便因一次报复事件而被打成反革命。)

七、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在党的领导下，在同志们的努力下，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难免的。

八、全国统一招生统一分配(指高校)，害多益少，东山石头西山搬，西山石头东山运，石头大搬家，热闹煞。背井离乡，就差险化做"望夫石"，为何不"就地取材"？

九、好事不背人，背人无好事。如果没有不可告人之秘密，请把人事制度公开。

十、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指解放初期党员干部)，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谨〉择国事十条，如(有)不同意见，请争鸣。(《新山大》1957年6月14日第3版)

⑫据说毛主席在青岛读过他的那篇名为《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文章。"毛主席每天都要阅读国内各重要报刊。报纸是由青岛有关部门提供的，先集中到市公安局临时设在湖北路30号的警卫工作指挥部，然后派专人送到迎宾馆。"(《1957年毛泽东的青岛之行》，青岛党史通讯第4期总31期第7页)

⑬山东省档案馆馆藏资料。

⑭山东大学的高职中打成右派的有16人，带上极右帽子的两人，束星北是其中之一。

⑮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18页。

⑯那个时候，束星北梦想给他平反的大人物正在青岛迎宾馆里构思他的反右杰作：《1957年夏季的形势》。迎宾馆原是德国人占领青岛时期的总督官邸，人称提督楼，是德国海军上将托尔伯尔建造的。从提督楼到束星北和其他一些右派挨斗的"舞台"，直线距离不过四五百米的样子。

⑰刘洪宾采访录，1995年6月17日。

⑱1950年，朝鲜爆发南北战争，中国则应金日成之约，决定出兵朝鲜。束星北在此期间，连连向毛泽东致信或电报，力陈出兵朝鲜之弊。他在发给毛泽东本人的信和电报中分析道：其一，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长期的战争创伤未愈，财政状况还很困难。人民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恢复生机。其二，中国人民解放军刚经过连年的战争，精神和精力都处在非常疲惫之时，当前最主要也只能是休整。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军装备太差，海陆空的力量非常薄弱，而且部队与美军相比，根本就没有制空权，因此与美军对抗，没有几倍的兵力不敢言胜。束星北认为：当前只能陈兵东北边防，绝不能引火烧身，如果战争确实免不掉，那也得等到经济恢复了，发展了，再动手也不迟。根据以后的资料来看，束星北的军事谋略与军事家林彪不谋而合。(资料由束星北子女和他在国家海洋第一海水研究所的学生提供。)

⑲束义新采访录，1996年5月12日。

⑳《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页。

㉑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㉒束星北第一次检讨认罪书，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76－109页。

㉓束义新采访录，1996年5月12日。



㉔東星北档案资料第一卷第1－2页。

㉕東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12页。

㉖東星北档案资料第一卷第3页。

㉗同上第5－6页。



13. 月子口没有尊严

月子口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声音，是一种令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声音。那是一种金属链条碰撞的声音，哗啦哗啦的，那种声音只有机械加工厂里才会有。我们纳闷的是，在这荒寂的旷野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声音？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月子口水库是青岛解放后建设的最大的工程，直到今天它仍可以称为这个城市最大的工程之一。水库的主坝全长为672.15米，顶宽6米，底宽171米，地面以上高度为26米。填筑黏土297,500公方，沙石、卵石、反填料107,000公方，干砌石块42,000公方，共计沙土石工作量为1,189,000公方。①若是再加上溢洪坝和副坝拦沙坝等部分，工程量还要大得多。

1958年，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口号与精神的鼓舞下，中国的水利建设也跟着一齐跃进。当年国家就决定建设10座大型水库，修建一些水利枢纽工程。1960年全国水利会议决定年内建设蓄水1个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为100个，而这个指标一到地方又层层加码，实际上全国各地的建设总量为360个，至于1亿立方米以下的水库上马了多少，恐无人知晓了。同煤、铁的“小洋群”、“小土群”荒唐的命运一样，一哄而上的水库建设部分因手段原始、粗制滥造等原因，很快就被冲垮毁坏，部分虽能够使用却也因先天不足而隐患重重、“疾病缠身”，无法达到质量标准和使用年限。②



领导带头，一直是我党的光荣传统。1958年，青岛市委书记刘特夫在月子口水库开工现场亲自挥锨。

月子口水库当属那个年代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全优工程。与那个时代上马的大水库比较起来，最大储水量5000万立方米的月子口水库，只能算个小小陶盆，可是这个小小的陶盆却是中国疯狂的水利建设中的一个样板。

直到今天，水库的主坝、溢洪坝还完好无损。四十多年的护坡石、挡浪柱仍在坚守着

自己的岗位，很少有被替换下来的。在引黄济青工程建造之前，月子口水库一直是青岛人民生活用水和工业建设用水的主要来源。

如今，在北方水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被喻为天然矿泉水的月子口水库日显金贵，成为“专供”，月子口还因其独特的地理地貌和优美的风景成为青岛黄金旅游线上的景点。它是上清宫、下清宫、华严寺、狮子峰、北九水等等美丽珠串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黄金风景线上的每一处“历史遗存”，都有大量的碑文石刻，载记历史，载记修建者功德。独月子口水库没有。如同干干净净的水库一样，月子口看不到一点“人文”的东西，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这个建设于1958年的水库没有“文字”，也没有“历史”。旅游者的大巴路经此地时，人们或许能得到这样的信息：这个美丽的水库建于1958年，建设者是1800名右派和10000余名来自淮北监狱的犯人。

杨　阳

（青岛日报记者，时为机关大队二中队一小队队员）：

月子口水库是个平坦的弯月形的山坳，它的水源来自崂山上游的北九水和上葛场，两条水脉，在两边陡峭险峻的山峰夹击下，一波三折，势为激流。汹涌澎湃的激流一口气飞奔了20公里后，便在宽阔平坦的弯月形山坳里，失去了脾气，铺铺漫漫，波光潋滟，如遐思的处子。人称这水为白沙河。月子口两面逶迤绵延的群山，翠绿如涛，而夹杂其中的形形色色、状如百兽的奇石巨卵如浪如涛，浪涛由上而下翻卷而来，“流”至山腰以下时，颜色便缤纷锦绣起来：密密匝匝的茜草、水柳、苇丛和姹紫嫣红的山葡萄、杜鹃、野山菊、三角枫等等，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月子口水库开工之前，是一片荒凉而美丽的山地。

山坡或山腰上的村落，只有十几户人家，村落的屋顶一律呈桃红色，炊烟、红屋顶和随便散在山上的牲畜很有些陶渊明诗词里的意境。月子口南面有一个村子叫响石村，之所以叫响石村，是因为村头前有一块巨

大的奇石，每每清风吹来，便发出怨女哭坟的呜呜咽咽的声音。由响石村再往南登阶而上，就是全真道华山派道士刘志坚创建的寺庙华楼宫了。华楼宫始建于元泰二年(1325年)，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和康熙年间(1662～1722年)重修。华楼山有老君、玉皇、关帝等殿堂及客堂、道舍等，华楼宫内外颇多石刻，据称为崂山之首。华楼宫因此而得名，不仅如此，月子口周围的其他山上也一样有着难以计数的寺庙宫宇碑文石刻，有着数不清的传奇与故事，只是有一些因年代久远和兵乱等原因毁坏了。我们的单砖茅草顶的宿舍就建在山坡上，我们虽住在这景色迷人的环境里，但是这一切都不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右派……③

石　艺

(高级工艺师，某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时为月子口机关大队二中队一小队队员)：

月子口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声音，是一种令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声音。1958年10月23日，我们一千多名右派在青岛市兰山路礼堂开过动员大会，就被送到月子口。那天，卡车把我们卸在夏庄公社。其实夏庄公社离我们的目的地夏庄还有一段路程。许是刚下过雨的缘故，司机不愿再走了。我们只好卸下行李踏着泥泞，徒步向夏庄走去。夏庄是个百十来口人的村子，在月子口西北方向，我们的驻地就在夏庄附近的山坡上。接近夏庄村头时，又开始下雨，我们停下来披挂雨具。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听到那个声音，那是一种很异样的声音，起初我们以为是雨点打在雨衣上的声音，仔细辨别又不像，那声音逐渐向我们靠近，越来越大，并从越来越大的雨声中脱离出来，那是一种金属链条碰撞的声音，哗啦哗啦的，那种声音只有机械加工厂里才会有。我们纳闷的是，在这荒寂的旷野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声音？那声音大得有些山呼海啸了的时候，我们跃上一道小山冈，看到了"声源"。那是一队人马，一队一律身着黑灰色的囚服的犯人，他们扛着铁锹，镐头，长钎，大筐，正沿着村子前的小路向工地走去。10月中旬的月子口已有些冷意了，可他们没人对"天意"作出反应，淋着雨的脸全都一个模样：阴灰，冷漠。他们当中很多人脚上都拴着镣铐，两旁每隔十几米的样子，便是一个荷枪实弹面无表情的军警，也同他们一样淋着雨。这是一条多么长的队伍啊，几乎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尾巴折在村后面)。以后我才知道，这些人是从安徽淮北监狱迁来的重刑犯，大部分是三大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战俘，少部分是城市的青红帮分子，共一万多人。我们从此就要与他们为伍吗？

我敢说，这个时候，所有的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脚下的大地沉陷了。我好长时间无法相信眼前的现实，那种感觉比单位宣布我为右派的时刻还要令人震惊、绝望。

有人(当年我在月子口的同仁)将月子口同古拉格群岛相提并论(以后我专门读了这本书)，我觉得他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两种环境、两种背景或两种文化的产物是很难搁在一起

比较的。首先，亚·索尔仁尼琴经历的古拉格群岛是个人间地狱，它汇集了人的智慧似乎也难以想象出的人类丑恶。在那里到处是：森严的枪口和动辄的打骂与酷刑，监狱周围设有铁丝网或铁栅栏，牵着狼狗全副武装的警卫走来走去，隔三差五就会响起射杀逃犯的枪声。(射向逃跑犯人的枪声在月子口也曾出现过，但它发生在淮北劳改营那边。)可是月子口没有这些。月子口的右派们劳动学习改造之余，可以相互讲话，有了病(当然要经严格检查确定确有其病)还可以得到治疗，如果病情较重，机关大队医疗室治不了的，还可以回家自行医治。除了有严重问题或表现不好的队员外，队员们还可以享受到每月一天的假日。第二，古拉格群岛天天都在发生悲绝人寰的肉体折磨、酷刑与枪杀，而月子口很少有。月子口的功夫属于"内功"，它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灵魂的整治与改造上。机关大队(我们右派统属于机关大队)在青岛兰山路礼堂召开动员大会时，青岛市委的负责人便为我们的改造定下了调子：你们要自觉地用汗水(甚至血水)来冲刷对党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也就是说，改造将是灵魂的工作。事后也证明，月子口对人的改造工程是成功的。古拉格群岛是"消灭人"，而月子口是改造人，消灭人除肉体的消灭还有灵魂的消灭，从月子口来讲，改造的目的是让我们"弃恶从善"，但实际上，却是把人的属性给改造掉了，从这一点上讲，两者确有相同之处。④

杨　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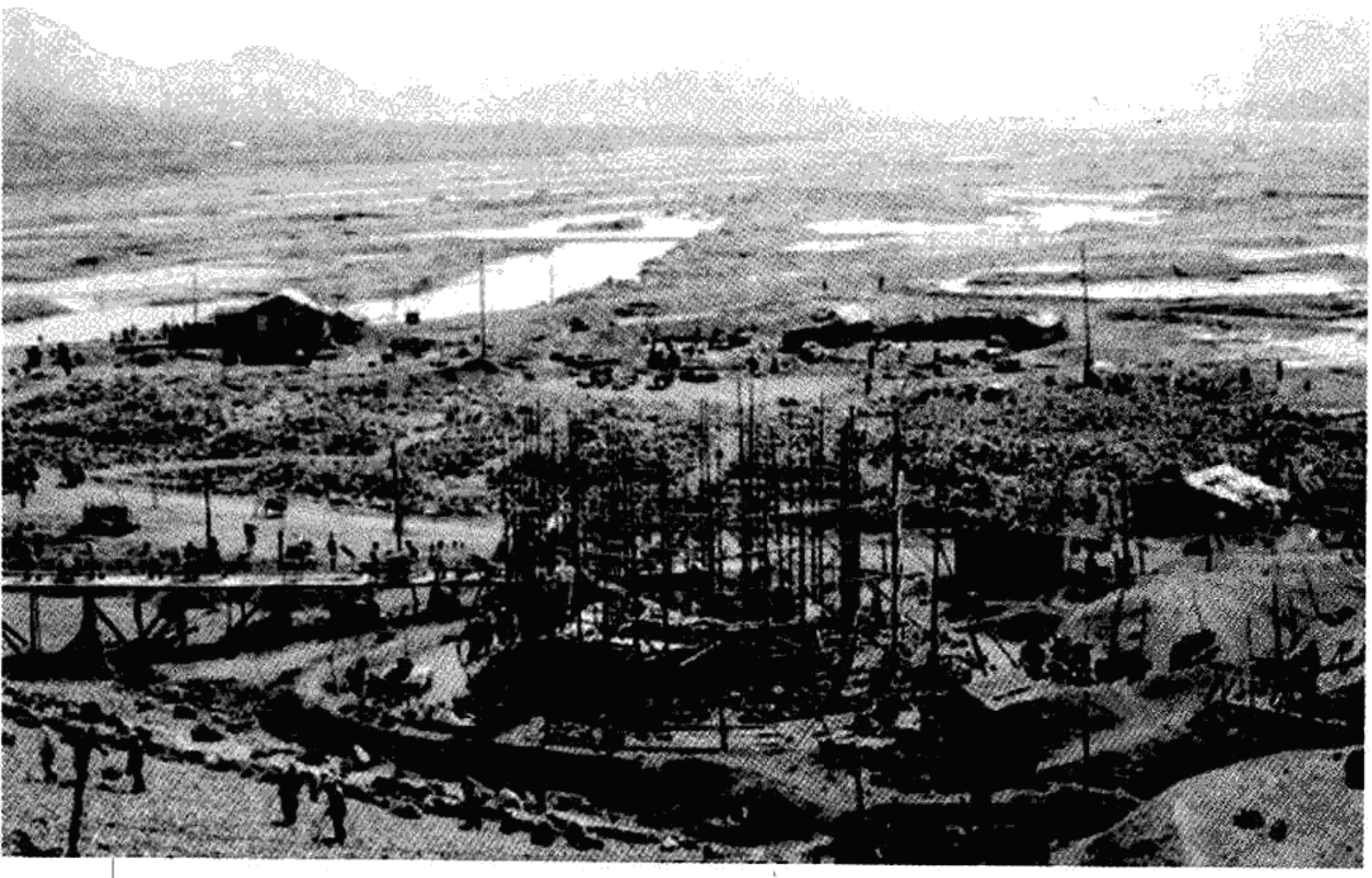
那天我们来到月子口驻地，卸下行李，还没有来得及收拾一下湿漉漉的身子，队长就吹哨集合，将我们带到工地上"上课"。我们的队长姓仲，有人说，他以前在监狱里干管教，因为打犯人打得太凶，受到处分，才弄到我们这里。也有人说，他原是机关事务局的科长，因为总是抗上，机关整风时，被作为有重大缺陷的干部罚到农村去搞支农。成立机关大队时，有人想到了他，便将他遣到月子口。

我们被带到"工地"并被划分为两队，一队由副队长领着清理"库底"的杂石乱草，一队"年轻体壮"的人跟他抬石头。那时水库修建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用石灰粉圈出来的"拦水坝"还没有清理干净，到处都是密丛丛的灌木和嶙峋的山石。他指着眼前的一块约和小水牛大小的石头让我们抬。来月子口改造的右派中，多数都是些"书生"或文职人员，恐怕没有几个人干过强体力劳动。看着这样大的石头，我们心里直发虚。可我们知道，石头再大我们也得抬。这是队长对我们的考验，也是月子口对我们的考验。我们找来一些八号铁丝八根拧成一股，横横竖竖将"大水牛"来了个五花大绑。又在山坡上砍了两棵成年的松树拾掇了拾掇做抬杠。一开始，我们使用的人海战术，两副杠，一头十六个人，两头便是三十二个人。即使这样，一开始竟也没有撼动那块石头。一言不发的队长，找了个喊口号的，大家的劲用齐了，那"水牛"才极不情愿地动了动，离开了地面。可是还不等我们走出两步，

轰的一声巨响，杠子断了，我们一个个都被闪得四仰八叉。

我们只好再去砍"杠子"，这回砍得自然比上次还要粗。队长也亲自出马了，他扒光了膀子，排在头一个，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又一次抬起了"水牛"。"人海战术"在平缓的开阔地还行，可是来到陡峭的山坡就不灵了。上坡时，三十二个人变成了十六个人，上到坡头时路更狭窄了，十六个人又减到十个人，一些够不着杠子的便半跪在地上肩扛手推。那石头对我们这些书生来说，太重了。在这个队伍中，我属于年轻力壮的，因而当仁不让地成了"驾辕"的主力，山坡上嶙峋不平的石头，要搁平时不会有什么，可是面对负重的鞋子，全都变成了锋利的刀子。脚上球鞋，一脚没有踏好，哧一声，鞋底就开膛了。

我们终于将"水牛"抬到指定地点，所有的人都掏空了一般瘫倒在地上。队长也不等我们喘口气，便让我们列队集合总结。他总算还肯定了我们的成果，但对我们的体力和效率仍不满意。他认为这么多人抬这么一块石头，就割破了好几双鞋，并有几个人被碰伤腿和



当脚手架竖起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它未来的模样。1958年，月子口水库开工之初。

胳膊(其中还有个当时就吐血的)，这说明我们平日活干得太少，太缺乏锻炼。如不抓紧时间改变这种状况，就不能适应月子口的工程速度，自然也谈不上很好的改造。我那时年轻体壮，报社下乡支农，我从来都是头一个，什么活没干过？可是月子口头一天的"上课"，就让我体验到以后的改造生涯会有多么艰难。⑤

石　艺：

我常想自己的悲剧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悲剧还不是非人的体力劳动和灵魂改造，而是没有自知，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弄明白自己是什么，或者说头上这顶右派帽子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毛主席早在1957年的青岛之夏就说得很明白了。毛主席在青岛执笔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对右派的性质作出了这样定义：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以后社会上就是根据这个调子来给右派定性的。月子口当然也是按照这个调子来对我们进行改造的。可是最初我们都缺乏自知。我相信多数人都是一样的心态：委屈、冤枉、欲哭无泪、欲辩无声。最多也认为不过是主观和客观的问题(主观是响应党的号召，而客观上起到了反党反人民作用)。这个思想意识不解决，就无法适应月子口的改造。这一点是无疑的。如同我在赴月子口劳动改造动员大会上听到那个市委领导要求我们：用汗水甚至血水来洗刷身心的滔天罪恶时，就会犯抵触；当我们中队队长告诉我们右派之间的关系只有斗争没有团结的时候，我会犯抵触；苦役了一天，身子疲惫欲散却又要进行每日的功课：学习文件自我批判时，我会犯抵触；当我们走在路上，路人向我们吐口水，孩子们向我们投掷石头时，会有抵触。抵触的结果会怎样呢？只能是自取灭亡。在我们临时搭建的宿舍大门旁边有一个宣传栏，头一天我就看到上面写着的两个鲜红的大字：洪炉。这两个字的意思我是很久之后才明白的：洪炉就是要将一些投进去的"料"，烧制成另一种东西，在月子口的大洪炉里，你怎么可能保持不变呢？而变化的前提首先是解决思想意识的问题，也就是抵触的问题。

有一次，我们二中队的几个小组到农场(机关大队自办的)劳动，列队回来，这边刚宣布解散，那边又列队集合。队长和指导员叫出一个队员端着缸子，要我们每个人漱漱口，然后将漱口水吐到几个盛满水的脸盆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的时候，手脚立刻寒彻如冰而血液如沸直逼头芯。原来是有人告发我们偷吃农场的苞谷，队长指导员也不询问证实，就用这样法子来抓贼。人们对这样的有侮人格的做法当然不满，却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先头有两个人稍一表示出抗拒，就被自己的队友扭住胳膊往脸盆里撳。尽管如此，轮到我时，我还是决定维护自己的尊严。我来到队长面前对他说，我没有偷吃农场的苞谷。队长说，这样可以证明你自己。我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而不是用这样残酷的方式。队长却说，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方式。这时候，指导员也过来指责我：你要是心里没鬼，还怕

接受检查吗？我说，我的良心可以证明我没有偷。指导员说，你的良心要是没有问题就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开始抗议，我说：我是人，人是有尊严的。指导员一听我说尊严就笑了。他说，我告诉你，月子口没有尊严。队长也跟着喊起来：对，月子口没有尊严。

通过这事后，才明白，我所以总是抵触的症结在那里。⑥

注释

①据青岛自来水公司档案：崂山水库(月子口水库)建设工程初步验收报告。

②据青岛自来水公司档案资料。

③杨阳手记，未刊稿。

④石艺采访录，1996年5月3日。

⑤杨阳采访录，1996年5月5日。

⑥石艺采访录，1996年5月3日。



14. 较坏的队员

付出了这样的努力竟也被评比为"较坏的队员"，原因何在？束星北想不通，也无法想象，当然他更无法想象的是，12月份的第一次评比，仅仅是他噩梦的开始。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束星北在1958年12月的月子口的第一次月评中，被评为较坏的队员。

月子口建立了严格的评比制度，首先是日评，然后是周评，再往后是月评。月评便是建立在日评和周评的基础上。评比即是对每个队员一天的劳动、纪律、学习、思想改造及生活作风进行的综合评定。日评以小组为单位(机关大队下设六个中队，每个中队下面设六个小队，每个小队下设五六个小组)，周评和月评以小队为单位。月评分为较好、一般、较坏三个档次。一般情况下，一般较多，而较好与较坏很少。机关大队一中队二小队一小组只有两个人被评为较坏的队员，一个是束星北，另一个是叫孙志坚的党员右派。党员右派自称患骨结核，到月子口时间不长就患了劳动恐惧症，早晨一听上工的钟声，就在被窝里抖成一团，让他干活他就大呼小叫，时不时地还会号啕大泣。队长为了严明月子口的纪律和改造右派的决心，就让几个壮汉强将他往工地架，如果还要赖装死猪，队长就让人用筐把他抬到工地上，现场开了批斗会后，再强迫他干。

束星北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评为"较坏"的，尽管他身体条件和劳动技能有限，却尽其所能，该出的力都出了，该做的事也都做了。最重要的是，他咬牙抗住了最初恶劣生活与环境所带来的不适与影响。最初，不要说劳作，一日三餐的地瓜干和苞米面窝头就够他受的，地瓜干窝窝头和白菜萝卜咸菜疙瘩，对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知识分子算不得什么，可是对生活优越肠胃从未受过锻炼的束星北来说，却难以适应。比较一日三餐，更大的考验还不是肠胃，而是生活节奏的改变。在大学，束星北的生活节奏如同时钟一样，几十年来，每个阶段每一天每个钟点干什么都有安排。他的工作和睡眠与常人不同。一般情况下，他都是晚八时即眠，凌晨三时起来工作，他这样的生活习惯即使在被打成"极右"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没有改变。但在月子口却完全是另样的生活节奏了。

月子口的"右派"住在仓促盖起来的单砖简易工棚，那些工棚，远远看上去像一个个车间，码在月子口东边的山坡上。每一个工棚就是一个中队，约三四百人，一律地铺，所谓地铺是直接睡在山坡的土地上。"床板"便是从河边搬来的鹅卵石，鹅卵石上再铺上从山上割来的山茅草就得了。山茅草做褥子倒也保暖，可是身子一动草就散了，石头就突现出来。过来的人回顾那种感觉时说：铺盖或褥子无论铺多么厚，也挡不住从大地深处和那些鹅卵石上传递上来的阴凉坚硬的感觉。刚去的时候，天还不凉，"工棚"一到晚上就成了澡堂。三百多个男人的体热和汗

水和大地阴潮的地气，云雾一般弥漫着在“工棚”的每一寸空间，并在“床板”的缝隙中流淌，不停地往每个极度困乏疲惫的男人毛孔和骨缝游动。很多过来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意识在那里清醒地走着，身子却软成一坨泥巴。这就是为什么最初很多人总是感到如此的疲惫如此的散软的原因。很多人以后患了腰腿病也是因这里的“床”造成的。

这样的“工棚”和“床”，束星北很难适应，他常常在人家兴奋昂然的时候，昏昏欲睡，而在人家鼾声大作时却双目大睁，睡意全无。身子骨被“床”硌得苦不堪言。他的一个学生，实在看不下去，偷偷利用工地上的废料，给他打了一副床板。最初，“工棚”的监管念及他的年龄和身体，没有做声，可是他身边的左右不干了：大家都是来改造的，为什么只有他特殊，他作得还轻吗？谁的罪孽能赶上他？这事一反映了上去，马上就成为政治问题，因而，束星北只好将床板交了出来，跟大家一样。

尽管如此，束星北还是坚持了下来，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劳动改造，他除去请假回市里治了几天病外，没有被月子口最初的改造甩出去：“我初来时，患胃出血、腹泻、下体红肿、接着又生关节炎，而现在这些病除关节炎外，都一一克服了，身体较以前健壮，气力也大了些，肩上挑满担水也不酸痛了，吃粗粮已完全成了习惯，吃得又多又香，胃病也消失了……”①

付出了这样的努力竟也被评为比“较坏的队员”，原因何在？束星北想不通，也无法想象，当然他更无法想象的是，12月份的第一次评比，仅仅是他噩梦的开始。

乔宾秀

（青岛某局办公室主任，时为月子口机关大队第二中队一小队队长）：

束星北被评为较坏的队员，不足为奇，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来月子口之前，他已臭名昭著，人人皆知。在月子口同样是右派，可是别人都不愿挨着他，好像他有传染病（这一点在我分配床铺的时候表现得很突出，人家都不愿和他搭伴，最后我只好把他分在靠门的地方，另一边空出一个铺位来）。再一点就是他身上有“架”（我们队长是鲁南人，他看不惯谁时总会说，看你那个熊架，这“架”意思很广泛，大概含有傲慢、猖狂、洋相等意思）。对于一般人而言，来月子口之前几个重大问题已经解决。一是右派的性质问题。右派分子的性质毛主席早就有了定论，以后又陆陆续续出台了一些文件，来加以具体阐述，最具体的还应是1958年3月中央公布的处理右派分子办法。社会围绕这个文件进行了大讨论，在讨论中比较广泛而统一的认识是：资产阶级右派和反革命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是个比较广泛的概念，而右派则是反革命中的一个类型。资产阶级右派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反革命（尽管文件中称：一般只称呼“右派分子”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有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成，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第二是对右派实行专政的问

题。他们主要根据是：第一，右派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就是反革命，而且已经触犯了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第二，处理右派的方针是"严肃与宽大相结合"，不是以"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为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给右派以争取改造的机会，不等于团结右派。正如对反革命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一样。尽管文件上没有提到"专政与镇压"，可是所在单位却是依此来执行的。因而，多数人在来月子口之前，对此已有了足够的认识。再就是改造的态度问题。既然前面已解决了自己身份的问题(不管是真解决还是假解决，表面上要做到解决)，改造中就得摆正位置，时时不要忘记自己是人民的罪人，而月子口的劳动改造是人民和党给予的一次用汗水和血水来洗刷自己滔天大罪的机会。这两个问题是在月子口改造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改造或脱胎换骨就比较顺。

束星北却不然，首先是他根本就不承认自己的右派(更不要说反革命了)。最初，他把自己和下放干部摆在一个位置上，说自己到月子口是来锻炼的。再一点他不懂得委曲求全，不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不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还当月子口是大学。在大学好像还能拿住"架"，可在月子口就不行了，月子口的手段很多，月子口不允许右派有"架"。有个事例足能说明这一点。

我们刚到月子口时，工程还未正式开始，又不能让这么多的右派们闲着，于是就把一部分人派往市里参加炼钢炼铁，一部分人留下清理水库库底的石头杂草，一部分人到农村帮助农民翻地。我们小队被派到即墨农村翻地。在田头上，队长手一比划说，三天时间翻一遍，深度两尺。那是一片几乎看不到边的土地，也是一片荒芜的土地，农民兄弟都去炼钢炼铁去了。田地里难得有几个人影。这么多地我们一小队几十个人三天哪完得成哪？再说，这地为什么要挖二尺，有这个必要吗？我们在心里嘀咕，可是没人敢说出来，因为是毛主席号召的。可是束星北却问队长为什么是二尺而不是一尺五寸。队长说，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问为什么。束先生却仍在较真，说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习河南长葛县的经验，说的是一尺五寸。

束星北说的一尺五寸是有根据的，在这之前，上面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上，河南省长葛县县委第一书记向毛主席介绍他们那里深挖土地的经验，他说，他们在1958年春季就将河南33万亩旱秋地都深翻了一遍，深度一尺五寸，他们还计划着一年之内把全县的100多万亩土地都深挖一遍，这样，就可以使全县的粮食产量增加一二倍。毛泽东当即在会上号召全国都来学习长葛县经验。他说，深挖一尺五寸，是一大发明。长葛县一年就把全县耕地深耕一遍，难道别的县就不可能吗？既然有毛泽东的号召，农业部便立即行动起来，随即在长葛县召开了全国现场会，决定大干一秋，把全国的所有耕地深耕一遍。我们这次被遣送到即墨翻地就与这个会议有关系。

事尽管是这么个事，可队长火了，他是我们的头儿，是月子口一方土地上的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他无法容忍这样的顶撞较真。他说，毛主席虽说了一尺五寸，也没有说不让我们深挖二尺。我说二尺就二尺。为了保证二尺，我们这边翻过去，指导员那边就在后面拿皮尺量，谁的深度不够，就罚谁重来。

已是深秋季节，天很有凉意了。可我们都干得大汗淋淋的，衣服脱得仅剩下内衣内裤，最后干脆扒光了脊梁，这样一是省得弄湿了衣服，再就是很有一副干活的模样，到最后没有扒光脊梁的只剩下束星北一人(他的上衣好像是一件灰色毛料制服)。他过去又从没拿过锹，动作又慢，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在"偷奸磨滑"。队长刚才憋了口气，便过去责问他穿着这身衣服怎么干活。束星北最初没有弄明白他的意思，直到最后队长指着别人说，人家都光着膀子，而你穿得人五人六的，怎么干活？束星北才明白了，人就恼了，他说：因为我是人。

束星北这话不但彻底惹恼了队长，也等于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我们小队一共50多人，束星北不算年龄最大的(还有两个比他年龄大的)，可是身体条件却是最差的，又因水土不服弄了一身的病，按说是应该划在老弱病残之列的。划在老弱病残中的一般都分派到后勤或食堂干些轻活，可是对束星北却总是"重点照顾"。以后月子口工程全面展开，为了响应上面水库也要大跃进的号召，各队成立了突击队，队员由队里身体素质最好的青年人组成，一般都是在晚上干活，而且都有定额(定额又因常常被刷新而不时加码)。有人比较过，机关大队突击队的活儿大得惊人，甚至超过了淮北犯人的劳动量。

但这个由最强壮的青年人组成的队伍是一定要有束星北的，不是为让他干多少活，而是为了打击他身上的"架"，每每结伴干活时，队长一定要给他找个年轻力壮、立功心切的伴儿，比如拉车抬筐，束星北自然跟不上趟，常常被弄得窘困万分，自尊屡屡受挫。②

杨　阳：

在月子口首先要有强壮的身体，如果没有强壮的身体，就必须马上让自己强壮起来，以适应超常的劳动量。在这里，所有适应与竞争都是原始而又简单的：从清理库底、采石、挖运黏土、到夯坝基、上护坡石等，每一项都是重体力劳动。在这个战场上，只有身体最强壮的人(当然又必须肯干，在月子口没有一个人不肯干的，它关系到命运前程)才有可能生存下来。比如大家同样地往工地运石头，人家抬着一百多斤的石头能健跑如飞，你抬上三四十斤的石头就行如蜗牛了，那怎么行？再如，运送筑坝黏土，人家最多的肩头上能摞四筐，而你即便再搭上个伴儿，最多也只能抬两筐。同样都是人，人家为什么摞上四筐还能健跑如飞，而你两个人抬两筐还慢慢腾腾的，谁优谁劣，一下子就比出来了。

在我印象里，第一次被评为较好的队员，一中队也只有一个，叫李崇义，是一家部属水产养殖研究所的海带养殖专家。他之所以被评为最好的主要是因为他有一副铁打的身体和超人的精力。在月子口头一次突击会战中，他的抬(挖)土石方量，为月子口之冠，甚至连淮北监狱来的重刑犯也比不上他。他这人还有一个超常的本领，白天一刻不停地忙活了一天，晚上的政治或时事学习竟然也能够保持着旺盛的精力：腰板笔挺地坐在那里，不打瞌睡、不走神。对一般人来讲，白日的超负荷的劳动已将人折腾得人困马乏，晚上一挨床铺(学习大都坐在自己的床铺

上)身子就散了架子。多数情况下，人们是熬不住的。因而，李崇义当选为一小队惟一一个较好的队员也是理所当然。而束星北被评为较坏的也有其道理。

最初，月子口工程还未全面铺开，工地用不了太多的人，机关大队一部分人便被遣回市里参加大炼钢铁，一部分被派到即墨农村翻地。最初虽也感到辛苦，可多数人倒也能挺得住。可是到了11月底，月子口的摊子正式铺开后，一些年龄大的，体质差的便吃不消了。特别是束星北的劣势最明显，这当然与他的职业与"级别"有关。一般人多多少少都干过些活儿，有些体能储备。束星北一直从事教育与科研工作，一直"高高在上"，哪有"劳苦大众"的经历。我是在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认识束星北的，在那个会议上，他的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给与会的人带来强烈的震撼。在这之前，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大胆、新鲜的言论。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结束后，我受青岛日报委派专门对他做了一次专访。尽管我为他采写的专访没有发表，但我们之间却有了一种默契和友谊。他被打成极右后，我也因为那篇专访成了另类，只是我没料到能成为他的队友。我为他担心，因我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弄到月子口，就好像是抛到沙滩上的鱼。是不会有好结果的。③

对束星北而言，劳动改造困难重重(对别人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他来说很可能就是极限)，但更为严峻的考验还不是高强度的劳动改造，而是灵魂的改造。劳动改造毕竟是实现灵魂转变的手段，它最终还要体现在灵魂的转变上。如果说劳动改造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山，它至少还有攀登的可能(能不能攀上去是另一回事)，灵魂的改造对束星北而言是"死亡"和"重生"。

石　艺：

从某种意义讲，月子口是个大竞技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在月子口，光会干活也不行，最重要的是思想改造，劳动改造也只是体现思想改造的一种手段。

思想改造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消灭人(的属性)的改造。这一点在水库建设之初就定下了调子。我记得在月子口召开的第一次中队会议上，中队指导员给我们作出了约法三章：不许破坏月子口的制度和纪律，如不许随便离开水库工地和驻地而自由行动，不许破坏公共秩序，不许破坏生产建设(他的这几条"不许"与《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的说法一致。《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是为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配发的社论)；第二不能向组织隐瞒所有生活和工作的事情；第三不能勾勾搭搭，拉拉扯扯，具体地说就是要斗争、揭发、检举和批判。有人不理解，嘀咕一句说：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团结了吗？指导员说，对！因为你们是右派，右派就是反革命，反革命之间只有斗争、批判和揭发检举。以后很多过来人回顾起这个人，都恨得不行。认为月子口风气之所以这么污浊，此人是始作俑者。其实，月子口恶劣的风气和这个人并没有太大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没有这个人，月子口也是一样。由于上

面的倡导，斗争、揭发、检举实际上成为思想改造质量的指标，因为凡是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都受到上面的鼓励和表扬，有一些还因此摘掉了右派帽子。

沦为月子口的右派都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是一种逃生的欲望。为了能够摘帽，人们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选择。

特别是有了右派摘帽的消息后，这样的欲望就更强烈了。

"摘帽"的消息，一直传说不断(人们在绝望的时候，总是夸大希望)，直到1959年2月的机关大队会议上才得以证明。在那天的大会上，大队指导员对怎样才能摘帽作出了解释：一是要有其心，二是要有其行。心就是思想，行就是行动。换句话说就是思想好，劳动好。两句话似是简单，实际上不简单。它直接建立在各队实行的日评、周评、月评的基础上。以后又实行了累计积分法。累计积分法借鉴了监狱对犯人的改造方式。如劳动表现多少分，学习讨论多少分，思想改造多少分，表现最好的当然是分数最高的。上面没具体说多少分才能"摘帽"，只是说，当分数累计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作为"摘帽"的依据了。

"摘帽"虽然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可我觉得它实在是个坏消息。它就像一剂腐蚀剂，把本来就很坏的风气给彻底败坏了。评分制使人们之间很脆弱的关系破碎了。逃生的欲望迅速地蔓延到了月子口，相互攻击、揭发、检举、出卖等等成为自觉。

我们小队本来很抱团，大家相互遵守着一种规则，一种默契，尽量不去破坏这种规则。这样的规则曾令队长、指导员头疼。在他们眼里，正是这种"抱团主义"才使得一队揭发、斗争等运动落后于其他队，人家那边热火朝天时，我们这边冷冷清清。他们觉得很没脸面，总是想方设法摧垮一队的抱团堡垒，可始终没有如愿。不过摘帽的消息一出，一队"团体精神"很快就瓦解了。原因很简单，大家都是溺海者，突然前面有了救生圈，逃生欲望让人本能地去抢那个救生圈。抢来抢去就打起来。到后来人人都成了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④

凡来月子口的右派，都有"枷锁"在身，也大都在斗争批判中学会了自我保护。因而彼此之间想找到重大的立功机会是不大可能的。所谓政治斗争和揭发检举材料，无非是些十分琐屑的事件，如谁晚睡了几十分钟，谁多占了一会儿厕所，谁多吃了一个窝头，谁和谁多说了两句话，且说话时脸色神秘，谁跟谁借了一元钱一斤粮票，谁在被窝里偷吃从家中捎来的咸菜，谁休假回到市里进了某家饭店，谁在抬黏土时筐子装得不满等等，都是检举揭发的材料和斗争的导火索。在束星北眼里，这些所谓的政治斗争无非是些"吵吵闹闹"，属贩夫走卒也不为的鸡毛蒜皮。因而，束星北即便吃亏，也不做宵小之为，抑或他根本就不懂也不会这些宵小之为。

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束星北的为人。和他同一个组的党员右派孙志坚，在被医院证明确实患有骨结核病后，划到了后勤组里，后勤组都是些"老弱病残"，劳动方面便有些照顾。如看看门帮帮厨或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可是孙志坚的表现太差，平日(特别是政治学习或讨论期间)他稍得空儿，不是为自己申冤诉苦，就是讲领导的怪话(他像祥林嫂一样，不断给人家说自己这顶帽子不是党给他扣上的，是他的局长给扣上的，他局长搞男女关系，不巧被他碰上了。这事

很快又传出去了，局长便认为是他在作鬼，反右补课时，就把他补了进去)。结果弄得人人都厌恶他，检举揭发他，不断地开他的批判会。可是即使这样，孙志坚也不吸取教训，常遗些错误把柄给人家。有一次孙志坚饿得受不了，吃饭时藏了个馒头，被人发现。于是他又成了贼，大会批了小会批，工地干活之余还批，孙志坚被批得实在受不了，中途跑回了家。第二天，被揪回来后又扣上逃兵的帽子，整天斗得死去活来。

面对这样严肃的斗争，束星北却是另样感受："本小队内有一个队员孙志坚，系15年的老党员，整风时因反党划为右派分配到本小队，从事体力劳动。去年11月下旬，我才和他认识，他告诉我他在18岁就加人(了)党，整风时犯了错误(被)开除出党，现在又患骨结核病。有一次他吃饭时藏起了一个馒头被其他队员追查出来，所以有些队员就喊他'小偷'，我当时心里有点同情，还认为吃饭多藏一个馒头不过是生活小节，不能就作为小偷看待，何况他又有骨结核病想吃点细粮，也情有可原。另一次，我们去'华阴'劳动，他在中队部哭泣不去，后被其他队员硬架出中队部，到'华阴'后，队部开会批评斗争他的这种恶劣行动，很多队员建议将他送劳动教养，当晚回月子口时，他就私自逃跑，直到一二天后才回月子口。于是又对他进行斗争，我那时心里还同情他，认为他是被'吓跑了'，他是一个有病的人，不能和健康的人一样看待……"⑤

其实，这些鸡毛蒜皮，恰恰是月子口生存或进步的条件，像对孙志坚的斗争机会，人人都不会放过，而束星北理解不了，因此自然要付出代价。如他在1959年3月被评为较坏队员的根据就是：同情坏人坏事，同情孙志坚，把严肃的政治斗争看作吵吵闹闹。也正因此，束星北成为月子口的"靶子"，几乎所有相关的人都能够在这个不懂政治不通世情的人身上捞到好处。在束星北档案月子口卷宗中，检举揭发束星北的材料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思想或世界观的问题。二是劳动改造方面的问题。三类是生活作风问题。人是思想和社会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的一切言语都是他思想的表现。因而，束星北的这方面的材料最丰富。他在学习讨论时的发言，平时的言谈话语，不经意的玩笑，甚至梦呓都是人家检举揭发的材料。有些人，早已参透了束星北骨子里的天真性情，为了"拿分"，找个话题(能够触动他的话题)一路引导下来，一篇有实有据的材料就出笼了(很像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关于束星北的言论

1. 大概是一月初，在拉绳劳动中，有一次谈话中，我曾问束认识不认识闻一多，他说不认识，但认识李公朴，接着束说："他(指李公朴)活着也说不定会是右派。"我说："你怎么好这样讲呢？李公朴和闻一多都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左派。"束说："是啊，但民主革命时期的左派今天有许多成了右派了，七君子事件你知道吧，其中有好几个不是成了右派了吗？"

2. 最近在拉绳中，有一次束吟毛主席写的词："长江大桥"，问我能不能背上来，我说能。他又吟了毛主席赠柳亚子的一首诗，我没听清，问他哼的什么，他说是毛主席赠柳亚子的诗，并问我知道不知道这首诗，我说知道，接着我说："柳亚子不久之前去世了。"束说："不知道他是不是右派？"我说："你不能这样胡说八道，动不动怀疑别人是右派。"他说："毛主席的诗里说他是牢骚满腹么！"以后我说，"柳亚子好像是住在陕西，可能是回家了吧。"他说："不是，柳亚子是太湖人。"我有点<开>玩笑的意思说："那么可能是到他儿子那里去住的。"束似问非问的<地>说："不知他儿子是不是右派。"事隔两天(束谈过鉴定材料的当天晚上)，我对束说："从你怀疑柳亚子是不是右派这问题反映了你思想观点有问题，你怎么可以随便怀疑呢？"束说，"柳亚子不是旧知识分子吗？旧知识分子有很多成了右派了。"

3. 最近拉绳时，谈话中我曾问束："大概你也不喜欢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吧？"束说是。我说："你不喜欢社会科学，但是可问社会科学。"束说："错就错在这里。"我说："社会科学爱好也得问，不爱也得问，一个人不能逃避对人生、对社会(得)有自己的态度、看法。"束说："在旧社会里，不需要学，或者学一点就行了。旧社会也不让学(指社会科学)。"

以上情况片断地暴露了束的一些思想、观点。提供领导参考。

嵇某某1959、3、2⑥

这次学习、辩论中束星北的一些言论

一、3月17日，在讨论"不平常春天"文件时，我曾在发言中联系到束星北过去的一些言论。在去毛家岭之前，有一次我曾和束星北一起到沙沟去拉过松枝，路上谈到认罪问题，我曾说，反右中有些文件曾指出：如果右派的阴谋得逞，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问题。现在想起这一论述确(实)是正确的。当时束星北说，这是不可能的，右派根本就不能得逞，因此你这个"如果"是不能成立的。并且还说过：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一类的话(我现在记不准确了)。这次讨论，我重新提出了束星北的这一观点，我认为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束在发言中仍然坚持这种看法，他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企图是想在整风中捞一把，提高一下政治地位，至于说右派分子想推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领导，则根本不可能，他们连这个梦也做不成。因为右派分子不掌握兵权(大意如此)。束星北发言之后，当时小组对他的观点进行过批判。他辨解说，别人误会了他的意思。

二、3月14日，在讨论"这是为什么"文件时，束星北曾发言说："当时我认为有没有这么封信(指卢郁文收到的匿名信)还是个问题，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封信，共产党为了收兵，不知什么人写了这么一封信，就是有这么一封信，也不过是六亿五千万人中的一个，也许是国民党的特务有意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不值得小题大做。"……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三、……我不承认反党，反党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解放后我的生活比解放前还好，我为什么要反党！当初认为我的确是帮助党整风的。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人说话了"的社论，我才觉得自己是错了，也知道为什么错了，是立场问题，但不承认自己有罪。后来小组讨论定我为劳动教养，问我怎么样，我想：劳动教养大概对我有用，因为我过去没有劳动过。过去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社团，只是教教书，做做实验，吃吃酒，睡睡觉，一个礼拜上七个钟头的课，和同事、家庭的关系相处的〈得〉都不好，有从劳动中锻炼自己的必要，把懒散、好逸恶劳、脱离群众等封建文人的恶习改掉。但是不承认自己有罪。来水库时，看到墙壁上有"烘〈洪〉炉"二字，我很满意，投进劳动的烘(洪)炉，把理性的东西变成感性的(东西)。

有时在家庭、党的束缚(我没有听准确他是不是用的这个字眼)下，承认自己有罪，但感情上不能接受，理性上也弄不通。我认为我放的毒虽然起到削弱党的作用，但是我没有什么企图，没有造成犯罪的恶果，毒草变成了肥料了，右派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反右以后来了个大跃进，即便有罪也是未遂的。

…… ……

束在谈到右派犯罪未遂时还说，有句古话说："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比方说，某人劳动好，但他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这不算真好，某人无意弄石头打了别人，虽然错了，也不能责罚他。我认为有一种无形的罪，右派攻击党，并没有造成天下大乱，有罪也是未遂的(大意如此)。

四、束星北在这次发言中虽然说了可能他的立场有问题，但对自己的这一些反动观点毫无批判。叙述反动论点〈时〉振振有词，但在谈到立场问题进行批判时(如果说这也算批判的话)，却寥寥数语，虚晃一枪，立即滑过。而且联系他在交心运动中的一些言论来看，那时候，他就曾说过，他认为自己有错而无罪。过去也曾说过，他是来锻炼的，不是改造之类的话。看来他的这种观点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改变。

嵇某某1960.3.26⑦

束星北不善劳动，动作迟缓、笨拙，有关这方面的检举揭发材料也非常之多。如拉沿(一种独轮车，一人驾辕一人在前面拉)上坡动作如何的迟缓，如何气喘吁吁，抬石头人家都拣大的装，他却专拣小的；人家一筐装三四块石头，他只装两块或一块(还强调自己是量力而行，实事求是)；到农村翻地，人家一上午翻了四五分，他一分也完不成；送筑坝黏土，人家一人背上三筐且来回只需五六分钟，他只背一筐(还装不满)来回却要七八分钟；人家碰碰擦擦、小伤小病的，说声轻伤不下火线，他时常不是叫腿疼就是说腰疼，有时干脆就坐在地上，半天不起来；人家干活时一律只穿裤衩(即使大冬天也是如此：因一上工地大家都在跑，一般情况下，都是一边跑一边拉车或抬石头抬黏土，一边减棉衣，直到脱得仅剩下一条裤衩。若不如此，一旦停下来，被汗水浸透了棉衣立时就被冻硬，人易生病)，而束星北却总是人五人六，长衣长衫。

在生活作风方面，束星北的吃喝拉撒睡皆有异处：他经常一俟晚上学习讨论就打瞌睡，经常不按时作息(人家都睡了他不睡，不知在琢磨什么)，经常与落后分子拉拉扯扯，如公休回家曾约过一些落后分子一起到饭店吃饭，不时地向公休回来的人打听吃喝的事(如哪家饭店卖包子，哪家饭店卖火烧)，吃饭的时候经常抢菜吃(一般情况下，都是六人围成一堆吃一份菜，有一次烧白菜里仅有的一块肉碴子被他抢去了)，多领过一次窝窝头(有一次他公休回家，因误车头一天下午没走成，只好第二天乘早班车走，便到食堂领回了自己的晚饭，结果被认为是多领了一次饭)，经常从家中捎咸菜，经常借钱给别人，一元两元不等(属拉拉扯扯行为)，经常借"洗澡"之名，不经领导允许私自到夏庄饭店买窝头吃(被人抓到后，让他检查这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他只说因为我的肚子饿)，经常在茅房待得过久，特别是在重体力劳动中，经常破坏公家的工具(一次劳动结束，他忘了将搁在路边的铁锹收起来，后被一辆车轧断了锹柄)，经常搞特殊，人家都睡山茅草，他却睡床板。⑧

在月子口，他防不胜防，无力招架。偶而发出的呻吟也不曾被人放过：

揭发束星北

……

一天中午，大家都回宿舍休息，我在水房值班，束星北也没有走。我坐在那里拉火，他坐在我后面的小床上吸烟。我和他又谈起劳动的事来了。大致是这样的。我说："你这过去不劳动的人，现在劳动一下有些什么感觉？"他说："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很有意思，只是不会干。"接着他又说，"哎，你是干什么的？"我说："乱七八糟的干了不少，主要是当工人。"他说："唉，我见你面只当你是个中学教员，知识分子，起码也是个小学教员。"我说："我过去连大学教授还没有见过，到了月子口来，看见你这个教授先生，还是第一次开了眼呢。"他说："嘿，还不是这个熊样子嘛。"我又说："你这南方肚子，我们这里的生活能合得来吗？"他说："可以，可以。"这时我就低下头去挖炉底，他在后面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嘿，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句话我听得非常清楚，而且我能保证一字不差。等我抬起头来，一想这话不对头，但已经隔了一会儿了。所以当时我没追问他的意思，检查起来当时是很麻痹的，不仅没追问，也没立刻向领导汇报。过了很短时间他就走了，再也没说话。我分析束星北当时说这话是有所谓的。一、他在煽动，继续网罗反党对象；二、可能认为别人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反动言论在我面前说是不要紧的，所以在这时又勾起心里话且是自然流露。

大队服务队王某某⑨

在月子口的束星北"死硬"和"弱者"的形象，无人不晓。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家的眼睛里，

甚至连其他的小队也有人盯着他。

邢队长：

束星北自从队长公布在劳动当中不准吸烟后，他每天的大便次数忽然比过去多了起来。过去每天大便是一次。现在每天是两次，每次占用时间约有20分钟。由本月6号到8号，每天午前十时左右大便一次，午后四时大便一次。我虽然没有到厕所去，看他是否真大便。仅根据情况分析，(认为)他是借大便为由过烟瘾。结合以上情况投稿批判如下，请领导核批。

真奇怪(黑板报稿)

束星北，真奇怪，自从队长公布吸烟制度后，你的大便忽然多起来。借着大便为由过烟瘾，这是偷懒的丑态。遵守制度要严肃，欺骗手段不应该。叫声老束快扭转。(否则)对你改造有危害。

四小队蔡某某6.8⑯

注释

①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1页。

②乔寅秀采访录，1996年5月19日。

③杨阳采访录，1996年5月11日。

④石艺采访录，1996年5月12日。

⑤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106－107页。

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45－46页。

⑦同上第125－129页。

⑧据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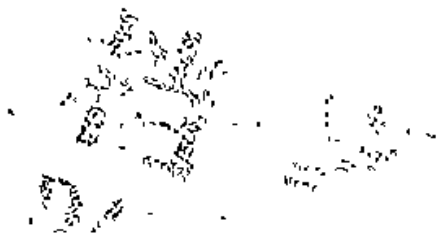
⑨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56页。

⑯同上第140页。



15.四顾无门

束星北不甘于月子口赋予的“最差”的“角色”，他寻求出路却又苦于无路，当月子口第一批队员“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后，他坐不住了。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束星北不甘心“弱者”的角色，也不能接受“弱者”的角色。最初，他作出一些努力，尽管身体与年龄不支，还是跌跌撞撞地跟在这个赎罪的大军后面拼命地狂奔：拉土推车、挖黏土搬石头，他咬着牙关跟那些身强力壮的人一竞高低，幻想着奇迹的出现。“〈我〉初来时甚么也不会，所谓‘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连小半桶水也挑不动。自己也认为这是由于不习惯的关系，所以在一个月后能抬‘双筐’，能挑满担水之后，心里很高兴，以为这样下去，不久就可以成为劳动中的能手……”①

石　艺：

束星北是我们的小队最不济的，也是中队最不济的，是不是在全队1800名右派中也如此，我不能确定。如果说有比他还不如的，那只能是四队的一个大学老师。那是个相貌很



1959年月子口机关大队召开大会，宣布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等待宣判的感觉。

儒雅的老人，他年龄比束星北大些，好像还有病，他做事很慢，甚至连转头都要费半天劲。这样的人和工地的节奏是很不合拍的，为了改造他，四队队长和指导员没少费劲，他自己也很愧疚，想法儿改善自己，可是年龄和身体条件摆在那儿，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济于事，只好用时间来弥补，人家收工了，他还留在工地上，人家拖也不回去，队长、指导员熊也不回去，非得干出个样子不可，结果有一天晚上，他抱着块鹅卵石，一脚没迈好，跌进了一个不大的坑里，死了。

月子口是个不折不扣的"集中营"，可是它却能够制造出一种气氛，一种生龙活虎战天斗地的"集体"气氛。每天我们扛着铁锹、镐头，抬着大筐列队向工地行进时，个个都是精神抖擞的，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月子口的天空还是很明朗的，特别是工地大喇叭高亢嘹亮的劳动进行曲响起时，你会感到振奋和激昂。工地上一派生机勃勃、争先恐后的火热场面。即使在今天，我们有些过来人回顾那时的劳动场面时，仍会有短暂的陶醉感。那种时刻、那样的场合，谁还会去思索劳动的性质，因而，谁要是在这样的集体中掉队或跟不上趟，就如同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士兵，只能承受自卑和耻辱。②

杨　阳：

有人说，束星北曾为了维护人权而抗拒非人的劳动改造(好像有文章也这样提过)，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很荒唐的。我敢说，在月子口没有一个人能够抗拒劳动改造的，你可以装病或者把个小病弄大了，再不然就设法讨好队长、指导员，让他把你弄到后勤组去，但你不能抗拒劳动，人人都不愿当弱者，不愿被一个集体像扔死狗一样给扔出来。孙志坚那样论堆的毕竟是少数。其实，束星北还是很努力的，也很想跟别人一样，成为劳动能手。记得有一次拉沿，和他搭伴的年轻人，本来队长安排他推车掌车把辕，让束星北在前面牵绳，可他有意想出束星北的洋相，便把位置颠倒了一下，让束星北来推车掌把。车上两边的柳条大筐黏土装得冒了尖，少说也得两千斤，束星北不知其情，抓起车把就推，那车子没动窝就倒下了，而后又装满土再推，车子又倒了，翻来覆去，几次下来那车子硬是动不了窝，人家都在一边看他的笑话，可束星北却动了真。收工后，仍弄了个车子在工地上练。我记得束星北还专门练过挑水和砌石头，但都没有成功。独轮车练到最后也只能空推，一担水挑不上百米准得洒一半，最典型的是夯坝基的活儿。一个夯锤六人拽，它要求人人动作协调一致，力量使得均匀，那夯锤才能垂直上下，落地有力。可是只要有了束星北，夯锤要么起不来，要么(起来后)偏到一边去，人家自然不愿同他搭伴。③

在现实面前，束星北终于明白了，他不仅当不了生产能手，甚至连月子口最差的人也不如。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只有亲身的参加劳动，才体会到体力劳动的艰苦复杂性，既要有力气有干劲，还要灵活；我在劳动时也想拼命干点，洗刷自己的罪行，早点立功赎罪，但干得既少又不好，还不时气喘心跳，已经干了近一年还没有什么进步，顾了东就(丢)了西，做了这件(就)忘了那件(技术方面更是一无所知)……痛心自己已沦为人民的敌人，得不到人民的信任，还没有贡献自己所长，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机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贡献自己特长的机会，因此更加深我的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情绪有各式各样的复杂原因，而且也有了一定的时间……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劳动中的无能而引起的，有些队员不肯和我一起干活，有时我主动去‘帮忙’也常被喝‘走开、走开’！的确，我的笨手笨脚有时不但不能帮他们的忙，反而会碍他们的事……其次自来到月子口已将近一年，除抬筐儿还可以应付(据队员们的反映)之外，就一无进步。觉得别的队员，老的少的病的弱的几乎全比我强，再加上‘关节炎’、‘胃出血’、‘头痛’等病，即使咬牙拼命干，也给人‘偷懒耍滑’的印象，听到不少冷讥热嘲。的确是干得不行，走得又慢，怎能怪别人生气……”④“有的人甚至骂我‘老不要脸的’(我)也毫不生气，只检查自己为甚搞不好，这些全(当)是‘烈火’焚烧我身上‘自高自大’、‘听一句跳三跳’的狂妄作风，实际上那些也正是反动立场的思想作风，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怎会有‘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的思想作风呢？”⑤

往下怎么走？身体所限，体力与年龄所限，而“极限”又不可能突破。在月子口的大竞赛场上，没有他的立锥之地，他要想继续生存下去，改造下去，就必须另辟蹊径。他考虑着走技术改造的道路。

其实，这条道路，束星北早就考虑过了。当初，山东大学勒令他向党和人民作出深刻认罪检查时，校长晁哲甫似有网开一面之意，即束星北只要认罪深刻，或许能得到戴帽留校改造的机会。留校改造与去月子口改造，孰轻孰重，束星北是清楚的，但他没有将认罪书交给晁哲甫。尽管如此，束星北仍然天真地对山东大学寄予人性化的期待，他希望山东大学能让他到机械加工厂或有点技术含量的工厂去改造。在他向大学组织提交的申请报告书中曾强调自己在技术方面、动手能力上的特长，并提及自己的年龄和身体条件不适合月子口。最后的结论是通过技术改造，一是可以达到洗刷罪恶改造思想的目的，二是也可以将自己多年的知识储备拿出来，贡献给社会。“我的年龄体质在体力竞赛中虽稍嫌老，但是在科学技术的行列中还算年青(轻)，估计还可以为党为祖国人民作(做)二十年左右的事业。因此我曾请示党先分派我到金属电机机械等厂当短期学徒工，以备联系实际，准备在机械电机元帅升帐前，在机械电机技术革新中作出贡献立出功绩。”⑥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和能力，束星北在赴月子口之前，专门根据农村所需，构想设计出一个新型电机：“我最近对发电机的构造想出一种新的‘土’方法，农村中人人可以动手，我想如有机会能在电机制造厂，半个月到一个月，在技工的协助下，就可以制成一种价廉物美的发电机，可以用土法大量推广，有助于农村电气化。党如感觉到有这种需要的话，

希望能让我借此机会，立功赎罪。”⑦

显然，束星北最初的走技术改造道路的设想，是行不通的，有关领导在他这份期望入道的申请报告上批示：此人到了这一步，竟然还想偷奸耍滑，逃避劳动改造。⑧

月子口残酷的竞赛，使束星北再一次生发了技术改造的幻想，他仍旧采取向上申请的老路子，告诉人家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平日也在寻找机会，期望通过一两次好的表现，引起领导或管教的重视，好让他到有关技术部门去改造。

石　艺：

想走技术改造的道路，只是束星北天真的幻想，他在不断向上要求调到有关技术部门进行技术改造时，肯定没有想到两个简单的事实：一是他的身份，二是月子口对右派改造的目的。

按说，技术改造的机会还是存在的。当时社会各条战线的大跃进开展得轰轰烈烈的，为了月子口的大跃进，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好月子口水库，月子口一直鼓励生产中的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于是，一大批新技术新革新项目应运而生，如皮带运输机、绞链车(一种用绞盘拖拽的运输车)、轨道车、哈泥筒(一种土制的夯坝基的工具)等。有一些人也因此成了革新能手或技术能手，境遇自然随之发生了变化。可是在月子口，技术与束星北无缘，月子口对束星北的脉搏把得很准，他们似乎本能地知道，技术是束星北的命穴，因而死死掐住他这个穴位不松手，免得他借技术改造来逃避劳动改造或立场的转变。直到最后他也没捞着技术改造的机会。不过我们队的队长还是给过他一次技术改造的机会。那一次，工地断电了，队长便让他去检修线路，可是看他爬不了电线杆，于是就说他不行，连个断电问题都解决不了。以后很长时间里，很多地方都拿他作例子，说大教授一年时间也没学会用锨，而且连个电线都不会接，如何如何。⑨

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束星北的自信不断地遭受打击，“在到月子口的初期时，我还想在技术革新中立功赎罪，但是不久就感觉到困难很多。”⑩

相比之下，他开始意识到“群众”的伟大，自己的无能：“到月子口来收获之一是认识到群众的智慧伟大，不独干劲儿比我足，其实我根本谈不上干劲儿两个字，只是说明我如何赞美他们的‘青春活力’，羡慕他们的光明前途，体力比我强(真是生龙活虎)而我耳朵眼睛不行，甚至脑筋也不灵，学一件新东西，那〈哪〉怕是最简易的动作，也要教上几十遍才初步会弄，弄得也不像样，除个别如孙志坚之外，仍然是我最差，惭愧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这样腐朽无能(而且又不是没有蛮力气)！即在技术方面也没有某些从没受技术训练的群众灵活敏捷！使我初步认识到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真理名言……过去一下课就凡事不

管，吃得醉醺醺的研究些对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从未想到对生产有什么用……”⑪

劳动改造中“手笨脚笨脑袋笨”和无能不断地打击着束星北的自信心和价值观。使得束星北对自己的思想“改造”的认识也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中。

之前，尽管束星北写了几千字的悔过书，全面反省检讨了自己在反右期间的思想动机、立场观点和错误根源等，但那份出自各方面压力的悔过书是被迫作出的“官样文章”，也可以说是束星北的一步“缓兵之计”，它并没有动摇束星北的思想基础，骨子里，束星北的“反动认识和反动观念”都没有改变。首先，他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更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什么是右派，弄不清，我是右派吗？我不能接受。文件(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说右派是反党反人民(的)，这些我都没有，我不是右派。斗争我时我也不承认，认为是官僚主义者对提意见的人打击。反右派时，从报纸上看毛主席不在北京，我认为毛主席是不赞成反右派的，直到11月，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在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讲话(时)说，一小撮右派分子的反党阴谋被粉碎了，我才知道毛主席也赞成反右派，但仍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我想陈铭枢、罗隆基、陆侃如是右派，我不是……以后看到许多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自己的一样，像浙江的沙文汉，前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陈学昭，感觉不理解，他们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反党？肯定有一定的意图或考虑。而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我记得赫鲁晓夫说过，走社会主义有许多道路，所以我认为像我这样的右派，不是有政治野心的，不想做官，不想抓权，而是想通过另外一条道路走社会主义。

我不承认自己反党，反党对我有什么好处？解放后我的生活比解放前还好，我为什么要反党呢？……”⑫

他坚信“反右”是上面的错误，至少也是一次失误。因而，它很快将会得到纠正。他的根据是，反右之后，“大家不敢讲话了，怎么会有积极性呢，怎么会有大跃进呢！政治压力也只能使人粗率地完成任务，‘多、快、省’而不能‘好’，怎么跃进？……要提高人民的热情，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平右’”。⑬

基于这样的认识，束星北看待形势和发展的角度和眼光自然与众不同：为什么人民公社发展得这样快？为什么吃饭不要钱？⑭为什么各条战线都在大跃进，难道不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吗？为什么经济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而商店反倒日渐匮乏，副食品、粮食、日用品供应紧张，香烟买不到、肥皂买不到，手电筒也买不到？为什么报纸上说，人民的干劲越来越高涨，而荒地却那么多？⑮“大跃进不是真的，是骗毛主席的”。⑯

“目光”，从某种意义上讲，已是束星北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这道防线失守，他就会全线崩溃，“目光”是束星北的原则。对月子口来讲，“目光”则是“立场”问题。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目光。月子口是一座“洪炉”，它要保证使每一个右派都在这座“洪炉”里脱胎换骨，重做社会主义新人，而脱胎换骨的前提是立场的转变。对绝大多数队员而言，月子口的改造功效显著，出于“逃生”或屈服于政治高压等等原因，他们对自己右派性质的

认识和立场的转变似乎没费什么周折。即使少数不识时务的，也会在数次挫折之后，慢慢乖巧起来。否定自我、痛骂自己，歌颂赞美形势；树立更新更高的目标，力争早日回到人民队伍当中，几乎成为每个人思想改造的三部曲。这样，束星北便成为极少数的死硬派、顽固派，成为月子口批判和帮教的重点。

束星北不甘于月子口赋予的这个"角色"，他寻求出路却又苦于无路，当月子口第一批队员"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后，束星北坐不住了。

杨　阳：

1959年11月12日(这一天记在我的日记里，也铭记在我的脑子里)，月子口在工地东侧的平坡上召开了隆重的"弃恶从善"摘帽大会。会上六名"脱胎换骨"的右派被当场宣布摘去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当中。六个名额我们一中队二小队就占了两个：一个是李崇民，另一个是安未然。李崇民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在人意料之中。他这人实在能干，领导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问什么，也不打折扣。不过他右派帽子戴得也实在冤枉，只是在不恰当的时间里上了一次厕所。大家正在讨论将领到的右派名额分派给谁呢，他却不知趣地出去了。即使这样，他似乎也没有什么怨言，他相信自己有罪，也相信上面说的：必须通过用汗水甚至血水来洗刷自己的滔天大罪。必须通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回到人民队伍当中。他有力气，干活也从不惜力气，他一个人的工作量，我们三五个也比不上。最初，每个月月评他都是"较好的"，可是月子口有了摘帽的消息后，他却失掉了这个桂冠，原因人家也说不出来什么，只是后来，他忍不住找指导员谈了一次心，指导员便告诉他要加强"斗争"和"监督"。斗争自然就是对坏人坏事的斗争，监督无非是检举揭发别人。这两点在他身上体现得不突出。可他这人就是不善这两点。但他并没因此丧失信心，只是更加卖力地干活，学习和思想改造时，更加深刻地批判和揭发自己。他终于在"摘帽"之前又夺得了"较好"。他重新夺得"较好队员"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表现分数上去了，而是因为立了一次大功。有一次采石场出现了哑炮，正在现场的李崇民没等队长命令就冲了上去，结果他被炸成重伤。李崇民平时与人没有积怨，人又成了重伤，所以大家对他的摘帽没有异议，可是对安未然的感觉就不同了。安未然被摘掉帽子出人意料(他很少在月评中被评为"较好"，一般情况下都是"一般"。为数不多的几次也是在指导员的授意下取得)。多数人是一肚子的不服气，不过冷静下来一想，也就不觉得奇怪了。安未然人长得瘦弱矮小，浑身上下没有四两劲，可是他干起活来，总是特别招眼。比如，月子口百日突击大战，考虑到速度与质量，便将一些老弱病残减下来做后勤，他也在老弱病残之例。很多人都为做后勤而庆幸，他却不断地向队长和指导员申请，嚷着哭着要进突击队，最后咬破食指写了血书才进了突击队。进了突击队后没干过几天活，脚心就被工地上的钉子扎透了，可是他跑到

工地卫生所包了包又上了工地。队长看他的脚背被渗出的血水染红了，就派他到厨房帮厨。他说轻伤不下火线，在厨房没干几天就又回到了工地。抬石头、扛黏土等重活干不动了，便干些发肩和收拾工具等轻活，一样干得很招眼。

他的政治学习也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要么空洞无物，要么大而无当不着边际地联系自己。可他的学习心得或思想改造总结却总能得到队长和指导员的赏识。人们思来想去，认为关键还是队长和指导员信任他。他这人很会摸领导心思，知道领导好哪一口，因而能够及时地将队里每个人的思想和表现反映给队长和指导员。

摘帽大会，给月子口带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很多人当场表示要向六名回到人民队伍中的队员学习，进一步加强劳动与思想改造，争取早一天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一些被安排到二线的"老弱病残"也沉不住气了，纷纷向机关大队申请：重返一线，还有几个人当场咬破指头写了血书。弄得大队指导员只好当场解释说：一线二线都是一样的，只是分工不同，丝毫不影响改造。能不能像第一批回到人民队伍中的队员一样，关键是要看你们有没有彻底的脱胎换骨的决心。⑰

"摘帽"对束星北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安未然出现在第一批摘帽的队伍中，却使他感到疑惑。安未然是靠什么回到了人民队伍当中呢？"我和安未然在一个小组内已有一年，在夏庄机关大队时床铺连在一起，经常在一起谈笑戏谑，习以为常。这次安未然脱掉帽子，我一方面为他庆幸高兴，另方面也对自己的脱帽有了信心……在座谈会上，要安未然说出改造的经过。大意是要大家跟他学习，早日一齐脱掉帽子(因为我以为过去安在思想改造和劳动方面都不是顶出色的，但脱帽子却在前面，必有其特殊理由，也就是说过去我的看法和观点必定有错误的地方，所以我迫切的(地)需要跟他学习)……"⑱

束星北尽管没有讲安未然的"特别理由"是什么，却也在考虑自己的出路问题了。

在月子口，人各有其道。束星北也在寻找自己的"道"。早在机关大队的动员大会上，大队长和大队指导员便强调过：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可是束星北当时没有理解，到了月子口后，才感觉到这句话的分量。指导员在和他"谈心"时，也强调了这句话。他说：脱胎换骨就是说要全部改造和置换，而不是换掉某一个坏掉的器官。置换一个器官也许容易，但置换思想和意识却不易。束星北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脱胎换骨，适应月子口；要么坚持自我，甘为较坏的。如此心灵常在那里拉锯：坚持自我无疑等于自取灭亡，放弃自我(也许会同大家一样)，也等于灭亡。思来想去，他硬是在死胡同里凿开了一个洞："初到机关大队来的时候，经常发生错误，以至对自己的一切判断都发生怀疑，不知道怎样做对，不知怎样是对怎样是不对，弄得不知所从，后来自作聪明地发现了一个"秘诀"(或)"窍门"：对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总认为对，过去不去想它，无条件地执行就是了。"⑲

束星北的"秘诀"或"窍门"，只是一种幻想，在实践中却行不通，因而，它只给束星北

带来一时的麻醉感。“药效”过后是更深的困惑、痛苦。

月子口的“较好”与“较坏”的月评比活动共进行了12期(1958年12月到1959年11月)，束星北一共领了10次“较坏”，为月子口右派之最。到1959年12月，机关大队突然决定不再进行“较好”、“较坏”的评比了。但对束星北来说，并不意味着解脱，有没有这样的月评，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

注释

①束星北档案材料第四卷第104页。

②石艺采访录，1996年5月12日。

③杨阳采访录，1996年6日2日。

④束星北档案材资料第四卷第34－35页。

⑤同上第26页。

⑥同上第24页。

⑦同上第2－3页。

⑧据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⑨石艺采访录，1996年5月4日。

⑩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36页。

⑪《思想鉴定》，同上第31页。

⑫《关于束星北的一些言论》，同上第152页。

⑬《一年的思想鉴定》，同上第100页。

⑭1958年8月9日，毛泽东来到了山东，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他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大办农场，毛泽东听罢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可以是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的讲话于8月13日见报，“人民公社好”传遍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自此，全国迅速地掀起了人民公社运动。公社首先是“大”，全国平均28.5个农业社并为一个人民公社。公社的“公”的程度也很高。9月14日公开发表了《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成为各地办社的样板。《简章》规定，各农业社并为大公社后，原农业社的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也都归全社公有，只允许留下少量家禽家畜。生产大队(管理区)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



核算的单位，盈亏则由公社统一负责。并规定了在分配上一律实行工资制，同时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全体社员，不管家里劳动力多少，按照人口免费供应粮食。各个生产大队都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公共食堂，全国共计有数百万个食堂。实际上是在大的范围内搞平均主义，刮共产风。

由于高估产，造成了粮食已经过关或即将过关的错觉，并为了利于早日过渡而培植"共产主义因素"，柯庆施提出了"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各地纷纷依照推行，甚至提出"放开肚皮吃饭"。

9月中旬，毛泽东视察安徽省，当听到舒茶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他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就可以不要钱了。

9月27日刘少奇说：我经过了3个省，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据《文革前中国的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6页。）

⑮1959年10月初，束星北所在小队到市郊国营农场干活，当他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地时，便无法沉默了。这个期间，"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已在中国大地弥漫开来。月子口虽与外界隔绝，但总有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走来。饥馑和凋敝已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怎样造成的？束星北充满疑虑。"10月20日下午，王可夫〈一队队员〉问束来了〈农场〉后，有什么感觉，他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来后看到这么多的荒地我不能理解'。24日他由市内休假回来对我说'这次我回去到党委谈了一下，我说到这里有这么多的荒地，不但我不理解，就是党委书记听了也很惊奇'。27日晚，小组讨论束星北的鉴定时，最后邢队长提出他的问题之一就是对今天的问题不能理解，事实上也不能理解。并提到他对荒地的看法问题。〈可是〉会上他又说，'对这么多荒地到现在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以前没有荒这么多地？'等……"（《束星北来国营农场后的表现》，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49页。）

⑯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202页。

⑰杨阳采访录，1996年6月3日。

⑱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85页。

⑲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110页。



16.饥馑的日子里

与政治压力或"较坏"队员比较起来，饥饿的考验更为严峻。为了饥肠辘辘的肚子，束星北不得不伸出"乞讨"的手来。"宁为人憎，不为人怜"的束星北终于屈服于自己的肚皮，开始靠着亲戚、朋友、或者儿女的"接济"来维持生存。



束星北档案

Shu Xing Bei Dang An

饥馑的日子到来了。其实大灾荒的阴影早在1958年春或更早一些时间就布满了中国大地。1958年，中国的高烧年代，全国上下都在忙着“钢铁元帅”升帐，力争十年或十五年赶超英美时，上帝已经伸出了惩罚的手：大江南北普遍发生了春荒，饥饿、浮肿、逃荒要饭的甚至饿毙的全国各省到处都有。可是头脑昏热的上层领导人，几乎都陶醉在一个又一个的天文数字里，陶醉在上下共同编织的中国神话里，有谁会理会上帝的忠告呢？如果说1958年第一个回合的“大跃进”，让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元气大伤，但国家毕竟年轻，还有勉强为之的气力(郑州会议后的纠“左”，也多多少少地使中国经济稍得喘息)，可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又使“大跃进”狂飙再起。两个“大跃进”叠加在一起，终于压垮了中国。

饥馑的瘟疫迅速地降临到每一个家庭。中华大地，赤土千里，饿殍遍地。据官方数字统计，到1959年4月，山东、安徽、江苏、河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2517万，实际数字远不止如此。到了1960年，患浮肿病和饿死的人迅速增加。“以全国来看，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两者相加，1959年到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到4000万人左右。”①

山东当时是浮夸、虚报瞒产的重灾区。仅即墨一个县，因人为的灾害就让二十多万农民命归黄泉。据说，即墨县人民委员会1958年放出了山东最为壮观的卫星：亩产小麦11万斤。这届领导在隐瞒上级检查团的技巧比河南那个“共产主义”公社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还要高明一些。为了让人们直观地看到亩产数字，他们将几十亩甚至上百亩的小麦堆摞到一亩地里，然后将麦田靠路边的地方全部密植上高粱玉米，用来遮挡住参观团的视线。结果11万斤的数字就被认可了。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游戏。大家都在点火，就没人敢泼冷水。谁都怕当右倾，都怕插白旗。不过利令智昏的人民委员会个别领导还是受到了惩罚。他们因迎合上面、浮夸虚瞒、好大喜功使即墨二十万人的生命惨遭不幸而受到审判。

因为重点工程的关系，大灾荒的阴影降临到月子口的时间要晚一些。右派们刚来月子口时，生活还是不错的，尽管口粮基本是地瓜面和玉米面(多数是替换下来的前些年的战备粮)，却能够吃饱。毛泽东提出大办人民公社之初，农村大办公共食堂，粮食随便吃。月子口也跟着沾了几天光，但很快就开始限制了。先是每人口粮每月定量40斤，以后为37斤，到了1959年后减为30斤，再往后只有20斤了。实际上1960年后，每人每月的口粮连20斤也无法保证了，机关



饥馑在我们庆祝丰收时已经弥漫开来。人们勒紧的不仅仅是腰带。1959年，青岛大跃进展览会一角。

大队便采取减后勤保一线的办法。

尽管上亿人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上千万人毙命，1960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仍在头版头条上以套红通栏标题醒目地刊出了《展望60年代》的元旦社论。社论宣布了八届八中会关于在1959年提前3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的号召已胜利实现。文章中用高昂的调门宣称："我们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②元月2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了题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社论，社论充满自信地说道：我们已经圆满地实现了"1959年红到底"，现在正满怀信心地为"1960年开门红"而奋斗，我们努力的目标不但是开门红，而且还是满堂红，红到底。从全国范围来说，就是要各个企业、各个行业、各个地区今年第一季度的平均日产量，不低于或略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稳定上升，实现月月红、季季红；不但要做到产量红，而且同时做到质量品种、成本和安全样样红，全面跃进。③

1月26日，中共中央又提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宏伟设想。这个三年和八年的宏伟设想，仍是三年赶英，早日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八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赶超美国和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了。1958年毛泽东对赶英超美的打算是，经过一二十年至几十年的努力，在主要产品方面首先超过英国然后超过美国。这个调子在灾难降临时，不但未变，反而有所加码。

在上下疯狂地"赶超"中，1960年，中国的列车仍按着1958年铺下的轨道向着更大的灾难行驶。

滔滔的白沙河不断地漂下如同泡发了馒头一样的白花花的尸体。月子口的工程已近尾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全面跃进"仍是机关大队的主旋律。可是无论上面怎样叫喊，怎样动员或刺激(比如火线摘帽等)，月子口水库的工程速度和质量还是大大地降了下来。一

群靠着“二稀一干”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气力和精力了。消极怠工成为普遍现象。

杨　阳：

民以食为天，饥饿逼迫得机关大队调整了路子。领导将我们所有的老弱病残全部编入副业队，任务是上山下海找吃的。蛤蜊、虾虎、紫菜、海草和野菜、树叶、甜根(一种野草的根，有甜味，当地人称其为"甜根")，凡是能够吃的东西，能弄到的，全都果了腹。可毕竟资源有限，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差。干的东西不干，而稀的东西越来越稀。稀饭成了只有水没有饭的汤水。有一个故事最能说明当时的处境：有一天，我们干活回来，躺在铺上饿得辗转反侧。这时候不知谁发现了一条从附近村庄来觅食的狗。于是所有的人一跃而起。本准备有一番恶战的，可那条饿昏了头的狗，不等我们围猎它，晃了晃就倒下了。

半夜里，狗肉的香味引来了其他工棚里的人，狗肉只好成为公共财物，让所有的人来品尝。可是那条狗简直太瘦了。瘦得几乎撕不下丁点肉来。最后只好不断地加火把那只狗的骨头也一同煮化了。每个人最后只能得到一小碗狗肉汤。

也许有一些人直到今天也未完全从那场噩梦般的年景里走出来。很多人患了精神饥饿症，无论以后粮食蔬菜多么充裕丰富，他们仍自觉不自觉地为日子担忧。很多人因怀疑富有日子的真实性而总是暴饮暴食。他们绝不敢伤天害理地扔掉一点粮食，那怕是腐烂变质的。还有一些患了一种癔病。即使每日吃得再饱，也会有饥饿感。每日晚饭后，厨房里一定不要剩东西，如果有一点东西，觉一定是睡不踏实的。我本家的二叔就得了这种病，他每天要吃四顿饭，第四顿饭一般都是在深夜11点左右吃。这第四顿饭无论吃多少，有时，凌晨二三点还会爬起来加餐。这时候如果家里的厨柜里有一条鸡腿或肉肠，那是绝对不能过夜的，他一定要找出来吃掉。我甚至怀疑他即使做着梦也能够不停地吃东西。可是这样报复性的吃法并没有延长他的幸福和恐惧，他早早地就谢世了。

因为肚子里缺东西，工地上常常发生昏倒和死亡现象。尽管如此，月子口的劳动量似乎没有减缓，上面早有规定，水库领导人也早就立了军令状，日期只能提前不能推后。饥馑的日子里，月子口的水库的加班突击反倒多起来。即使是这样，月子口还是开展了节粮运动，让一些饥肠辘辘的劳动力自己向组织提出减粮申请。④

石　艺：

月子口上空充满抑郁绝望的情绪，工伤事故大大增加了，自残自杀的事也时有发生。月子口第一批摘帽的屡屡被评为"较好队员"的安未然就是这个时候"光荣牺牲"的。

安未然摘了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不久又被退了回来。原因是很多队员纷纷给他的单位写信，揭发他弄虚作假，蒙骗领导的恶劣行为。特别是有人揭发他的脚伤是假的，他为了逃避劳动、骗取荣誉而故意踩在钉子上。也有人说他写的无数的检举揭发信，大部分都是编造的。

也可能是他失去了靠山，原来的指导员因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另就高职。很多吃过安未然亏的人便设法治他。重新遣回月子口的安未然精神涣散，全没了以前的精神，每天一上工地就哭爹叫娘。在工地上，动辄四脚朝天翻白眼，可是没人再相信他这一套，围成一圈斗他侮辱他。可有时他的眼睛真的就瞪直了。8月份一场大雨，淹了工地，领导下令队员们抢救国家物资，他好像是要捞一根木桩，一头扎进白沙河再也没上来。

饥饿和遥遥无望的摘帽使人们的情绪变坏了。有些人半夜里一醒来就哭，不断地咬被头。无故的口角甚至打斗时有发生。偷奸耍滑，消极怠工已成为家常便饭，一些过去名列前茅的"好队员"，也放弃了过去得到的地位和荣誉，混到较坏队员队伍中。尽管吆喝声调不减，可管理人员似没有以前那么凶了。有时候，他们对一些"坏人坏事"(只要不出大格)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绝不轻易得罪那些被饥饿弄得要发疯的人。那时候，一切都变得不太重要了。我们考虑的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填肚子是我们求生的第一需求。⑤

"难道我束星北就这么完了吗？"⑥

山穷水尽之后，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一步步逼到束星北的面前。

与政治压力或"较坏"队员比较起来，饥饿的考验更为严峻。

饥馑的日子里，为了饥肠辘辘的肚子，为了总是狗抓猫搔的慌兮兮的心，束星北已无力再承担别的什么东西。因为贫困，他不得不伸出"乞讨"的手来。"宁为人憎，不为人怜"的束星北终于屈服于自己的肚皮，开始靠着亲戚、朋友，或者儿女的"接济"来维持生存。

方立业

(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

束先生的境况很糟糕，比我们一般的家庭还不如。想一想就行了。他七个孩子，除束越新(长子)外，全都是在校学生，妻子又没有工作。所有人的经济生活全压在他一人的肩膀上。他这人从不在意金钱(检查或向党交心书中常称"动机"为钱，是扭曲，是自贬，是为了交差而自辱其身)。早期的浙大，有两个人的慷慨为师生们公认，一个是王淦昌，一个是束星北，只要有所求助，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他们都会无私相助的。我所说的无私，是真无私，是那种只要自己有一口，一定会掏出半口来给你的无私。抗日战争时期的浙大师生们都很困难，困难到王淦昌家在山坡上养羊，苏步青需要在山坡上开荒种地才能维持生计的地步。即使这样，王淦昌和束星北还是将自己的皮衣棉衣捐给了当时学校里最苦的学生。以后到了山东大学，束



先生还是这种风格，老师同事，谁家有困难，只要相求，他是从不含糊的。至于借款，三十、五十，甚至一百二百的，只要开口就不会落空。也有些不自觉的，知道他的性子，这边借了钱那边也就没有下文了。束星北也从不追问，从没有听说他向哪个人讨过债。这样的人家里会有多少积蓄？其实，他被打成极右后家中的经济情况就一落千丈了。很长时间里，家里生活实际上靠的是束越新从部队带回来的"复员费"，可也是坐吃山空，能支持多久呢？饥荒年景，他只能靠着借贷和变卖家产对付日子。幸好还有自由市场和农贸市场(为了自救，自由市场仅开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有一次，我到南山市场去换东西(那时自由市场的贸易方式可以以物易物，比如用自行车、收音机、家具、衣服类换些吃的东西)，见束先生也挤在那里摆摊。他好像用自己装的收音机换了几十斤地瓜干。按说，青岛比起内陆地区，还要好得多。青岛有海，果腹的东西很多。再一个，但凡是个家庭乡下总少不了三亲六故的，乡下有了三亲六故，总会有帮衬或接济。有个顺口溜说：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农村一沟葱。人在饥饿的日子里，才会真正感到乡下穷亲戚的可贵。可是束先生家呢？束先生的小女儿束美新给我说过，他们家是个"独门绝户"。在北方没有一星半点的亲戚乡属。1952年她父亲把全家从南方带来时，就是干干净净的。生存能力弱(高职家庭的孩子的生存能力与街道上的孩子无法相比)，又是"干干净净"的，日子过得自然比一般人家不如。

师兄王景明家常常接济束先生。王景明是和束先生一样，属带帽发配到月子口的改造右派。山东大学的右派打得太多，以至有些课已无人可上，只好矮子里面拔将军，挑拣些罪行轻些的回来上课，王景明有幸被挑了回来。一上讲台，工资就有了，经济上也就宽裕了些。那时候，王景明和束先生住邻居，束先生每次工休回来，总是在他家的窗户上敲两下，算是告知一下。一般情况下，王景明都会过去看看先生，送上点吃的。有一次束先生回来，王景明夫妇正巧外出，束先生敲过窗后，见家里久没有动静，又过去敲窗，仍没敲出人来，便推门进去了。王景明五岁的小女儿抱着一小半碗杂合面条在那里吃，见是束先生，便将碗伸了过去说：爷爷，尝尝，爷爷，尝尝。束先生犹豫了一下，便接过碗来就开始尝，可是一尝就刹不住车了。小女儿哇地哭起来。王景明夫妇回来后，见束先生一脸愧疚地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知道先生饿得撑不住劲了，便赶紧下了碗杂合面条。束先生捧过滚烫的面条，站着就往嘴里扒，人被烫得泪水哗哗也不擦。

那个期间，束先生总是四处借贷，不光向亲朋好友借，也向左邻右舍借，甚至向自己当年的保姆借。我有一次去看望束先生，那时他刚从月子口回来，身体很差，只能歪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跟我讲话。这时候，他家的保姆王妈也来看他们，记得王妈还带了玉米、地瓜、白菜什么的。王妈一进门，束师母就慌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她显然以为王妈上门是来催债的，便不断地跟她解释说：你看看，你看看，家里就这么个情况，老束现在还没发下工资，发下工资就好了。不过什么事他都记着呢。说着，就四处找账本。最后还是束先生从抽匣里找出了账本，他似无力也不愿翻那账本，让我来找出所欠王妈的账单记录，那是一个硬纸壳皮面的道林纸笔记本，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一个家庭的欠账记录，哪年哪月哪日，借了谁家的东西，从

钱衣物到面粉地瓜苞米鸡蛋面条大葱等等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连人家给的地瓜秧和榆钱子叶也都记在上面。我记得最小的债款仅为1.5元，一个家庭借1.5元好干什么哪？显然欠账记录时间已很久了，厚厚的一摞哪。我曾想，这么厚的账单，就凭束先生这样的境况，靠什么还呢？

他本是一家九口人的经济依靠，打成"极右"后，好几百元的工资一下子降到二十元的人道主义生活费，这点生活费能干什么呢？连他自己也保证不了，怎么养家？我们这些做学生的，虽然也经历了饥馑，境况要比他好得多，因而我们无法体会他的处境。我听在月子口改造过的同事说，有一次，束先生曾到附近老百姓的地里偷地瓜，显然他是饿急了，是没别的法子向肚子交待了。结果地瓜还没扒出来就被看田的老头给逮住了，幸好那老头见他饿得实在可怜，也没罚他，反倒从地头的草棚里捧给他一捧花生，没想到他竟连皮吞了下去。

王妈的欠账单总共有三四笔，大都是萝卜、地瓜、苞米什么的。我指着让王妈看，王妈才明白了，脸拉得很长说，我又不是来讨账的，旋即就落下泪来。



月子口庙前的老树，见证了令人心酸的世事沧桑。

尽管我也是过来人，却也难以理解束先生是靠着什么度过了那段日子。我觉得束先生能从那段日子里活出来，本身就是奇迹。⑦

饥谨使很多人包括前个时期表现较好的有希望摘帽的队员，也放弃了"理想"、"目标"，他

们要么偷奸耍滑，要么泡病号，有一些人则通过熟人在医院里开出病情证明，从一线上退下来。束星北虽被划进"老弱病残"之例，可是却因思想改造成效甚微或对抗情绪而经常被遣往一线队伍，进行强迫改造。长期的饥肠辘辘、营养不良和身体的过度透支，束星北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了：肺气肿(肺病此时已转化为肺气肿)、胃溃疡、腰腿硬伤等各种疾病集于一身，他时时昏倒在工地上。而月子口的改造似乎仍遥遥无期，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出月子口，能不能走出饥荒灾年。

"在到月子口的初期时，我还想'思想'改造是一件并不多困难的事，一年之内可以彻底完成，现在想起来这些想法真是太幼稚，觉着变化越过越慢，日子越过越快：好像开头的一两个月进步得比以后七八个月还多些。这样越感觉前途茫茫，改造无期，悲观的情绪也就日益滋长，难以自制。"⑧

石　艺：

其实活着还是死去，不只是束星北面临的问题，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面对这样的疑问。月子口风云莫测，瞬息万变，也许今天你还是较好的队员，明天就会因莫须有的原因变成较坏的队员；今天也许感到摘帽的日子已伸手可触，明天却又跌入万丈深渊。特别是后期，改造与摘帽对任何人来说，都变得遥遥无期了。人的悲观情绪便像传染病菌一样蔓延开来。

右派是什么，平时还不太觉得，可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中它会露出锋利的刀刃来：比如，有一天，医院漂亮的女医生背着药箱来到工地，你正在沟里大汗淋淋地刨着黏土，她却和队长、指导员在沟沿上打情骂俏，泥土被他们一颠一颠儿的脚驱下来，迷住了你的眼睛，这时候，赤条条的你(干活的时候，无论春夏秋冬，我们都仅穿一条裤头)会作何感想？运水泥的车上了工地，你去卸车，车上的装运工，不是将残破的水泥袋子发给你，而是扔给你或砸到你背上。有人不堪其负，被砸倒了，马上就召来一阵大笑，你背着残破的水泥袋子(一只手还要捂住残破的地方)，强忍着令人窒息的粉尘，竞赛一样沿着大坝跑。这时候，你会作何感想？有一天，饭堂盛菜的大盆坏了，掌勺的师傅(不是右派)就将头一天还用来盛粪的木桶扔到白沙河里一涮，便用来给我们盛菜，你吃着这样的菜的时候会作何感想？你回到城里(往往是休假时期)就会发现自己来到另一个社会，一个根本就不属于你的社会。到处都是敌视或寒如冰雪的目光，因为你是敌人，是坏人，连孩子也不放过你，你常常要迅速地躲开飞来的石头(我们队的一个教授的头就给孩子打破了)，还要善于躲避随时都会吐向你的口水，或者根本都不要躲，也不能作出任何反应。这时候，你会作何感想？

我印象最深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战犯令的时候，那天是1959年12月4日，我们正在往大坝上扛护坡石，正在播放的劳动进行曲突然中断了，工地广播站开始转播北京、济南、西安等地隆重召开特赦战犯的新闻实况，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和中央的精神，经最高人民法院批

准，首批释放战犯33名，其中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杨伯涛等国民党将领和末代皇帝溥仪，另外还有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当时我正扛着一块石头爬在六十多米高的大坝中腰，一听到释放的战犯的名字，身子就瘫软了，人一头就栽到土坡上。我翻过身来，望着白花花的天空，满脑子飞舞的是死亡的念头。我是什么，右派是什么，连血债累累的战犯，连封建皇帝都能获得释放、重新做人，我们呢？在我印象里，那些日子月子口上空飘浮着悲观和死亡的气息，有人出现了严重的工伤事故，有人突然死去了。至于什么原因，肯定与这事有关，但月子口从不承认自杀。⑨

生存还是死亡，一直伴着束星北的月子口之途(也伴着他以后的改造旅途)。每当他的思想与现实、改造与理性冲突得无法调和了，这个阴影就会逼过来。在月子口的改造中，最为典型的一次是1959年6月16日的酗酒与"放毒"事件。对月子口而言，那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对束星北而言却是一次死亡的经历。

1959年6月中旬，束星北在月子口突击施工中眼睛被石屑崩伤，随后到青岛市立医院就诊医治。人家一看是青岛的头号右派，言语动作便有些轻慢不恭。特别是在急诊室里，几个护士竟像见到麻风病人一样躲避着他，没有一个愿给他处理伤口创面。束星北一气之下说了句在战场上即使是俘虏伤员也得给治疗的话，结果这边草草地治了一下，那边医院就有信息传过来。等束星北一回到月子口，机关大队就在工地上开他的现场批判大会，开过会后就让他继续上工地打石头。束星北的心绪一下子变得很坏，于是他赌气地向队长要求喝酒，队长竟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于是发生了6·16政治事件。

大约由于天气热的关系，我近来常常有头晕心悸发热的现象，常常吃点仁丹、十滴水之类。于6.(月)16日请准队长喝点酒。先到东头合作社前脱下一只鞋子请鞋匠师傅修补，说"半小时可以补好"，之后到合作社买酒(没有葡萄酒，只有另一种果子酒)和"一心油"、"一片丹"同吃，吃后(半斤)，到南边合作社又买了一斤葡萄酒和"一心油"同时喝下。喝后取了鞋回宿舍，吃饭、睡觉，当下午一点半上班时，仍旧未醒，在路上跌了二三次……⑩

6.(月)16日酒后，到工地上去的时候，当时心里惟恐队长叫我休息，不让干活(更加重我的罪)。所以队长一和我讲话，我就说，"我能干，不要紧。我没醉。"(直到四点多钟酒已将醒时，还瞒郭队长说，"只吃了十二两葡萄酒"。)在路上，对仲队长说"我能干，死了也要干，死了一个右派分子只当死(了)一条狗。"⑪

"6·16事件"只是束星北的一次"死亡"经历，表面上似乎只是对不公和屈辱的抗拒，根子却出在他的思想上，出在他同这个时代的对立上。在这样的社会与时代里，倒行逆施是没有出路的，因而，对束星北而言，如果不顺水行舟，每一步都是"死路"，所以说，活着还是死去的考虑与选择，一直伴着束星北。最早的自杀选择是在"肃反"时期，他在与1955年8月给王淦昌的

诀别书中已决定以一死来谢天下，只是在准备服氰化钾践诺的时候，技术上出了差错，服错了药。以后，他不再言死，因为他意识到只有活下去，才能与那些欲置他于死地的人斗，与邪恶黑暗的势力斗，并在斗争中洗刷掉那些被强加在身上的污垢。当然，生存下来的更为主要的原因，是他对自己天才之躯的珍惜，他一直认为自己有太多的事业还未完成，有太多事业还未做，因而他不能自绝。以后，每当束星北面对死亡询问的时候，恐怕最多的还是基于这一点考虑。

这一次，似乎已是人不绝天绝了，束星北最终还是选择活下来，痛苦地活下来，他对自己为什么不死的解释是“但为什么不死呢？一者(则)为还想看跃进中的祖国前途和世界科学的未来发展(例如是否能看到人类到月球上去)，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祖国发展到怎样的情况；另外我还有几本著作没完成，心事未了，再者‘死’更不能洗刷我的罪名和臭(丑)恶，我还没有对人民立功赎罪，还没有立功扬名改变人民对我的看法，所以万不能死，一死就永远不能翻身了！我要活下去，斗争奋斗，做到像‘徐呈龙’⑫一样，受人民的欢迎。虽然现在还做不到，但是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我还有信心可以做到，所以死不得……”⑬

可是饥馑却让人无法作出生存的选择，活下去的挣扎变得越来越吃力、艰难，他不知自己还能不能走出月子口了。这个时候，王淦昌出现了，王淦昌从莫斯科载誉归来的消息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阴霾四合天空突然闪出了一线光亮，绝境中的束星北向老朋友发出了求救的书信，他企图抓住这根生命的稻草。

王淦昌1956年来到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那个时候，束星北正在为着自己的名誉和尊严战斗着(他虽获得平反，人却仍被挡在物理系的大门之外)。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在莫斯科郊外森林蓊郁的卡玛河畔。那是一幢由无数白色大理石圆柱托举起来的穹隆式白色建筑物。在这幢浑圆的穹隆式建筑物下面，王淦昌和他领导的科研小组发现了一种奇异的粒子——反西格马负超粒子。

20世纪50年代正是第一代高能加速器陆续建成投入运行的时期。1955年，张伯伦(O. Chamberlain)和塞格雷(E.Segrè)利用美国6.3GeV的质子同步加速器(Bevatron)发现了反质子和反中子。

加速器从根本上改观了传统的利用宇宙射线作为粒子源的研究方式。科学家们可以在加速器上进行设计优选研究基本粒子的各种性质，寻找新的粒子，其广泛、深入与精确的程度是传统形式无法比拟的。加速器的问世成为冷战时期美苏竞赛的重要项目。两个国家纷纷投巨资来保持领先的机会。1956年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10GeV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即将完成，而设在日内瓦的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的30GeV质子同步加速器正在建设中。联合所的加速器在能量上可能只占几年的优势。因此亟须选择一批有可能突破的研究课题、有利的技术线路，才能及

时做出符合加速器能量优势的成果。

1956年9月，王淦昌代表中国去莫斯科参加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成立会议，会后，王淦昌留在该所工作，先任高级研究员，后任副所长。直到1960年底回国。他领导的研究组，最初由两位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两位苏联科研人员及一位苏联技术员组成，后发展到中国、苏联、朝鲜、罗马尼亚、波兰、民主德国、捷克、越南等国的二十多位科研人员，四位技术员及十余位实验员组成的庞大研究集体。

王淦昌以敏锐的科学判断力，根据当时面临的各种前沿课题，结合联合所高能加速器的特点，提出了两个研究方向：(1)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2)系统研究高能核作用下的各种基本粒子(π，Λ°，K° ……)产生的规律性……

在联合研究所加紧进行10GeV高能加速器建设时，没有配备相应的探测器。利用高能加速器进行基本粒子研究的优势在于选择有利的反应系统，全面观察所要研究粒子的产生、飞行、相互作用(或衰变)的全过程。根据这一特点，王淦昌小组果断地选择放置在磁场内可进行动量分析的气泡室作为主要的探测器。气泡室的工作介质既是高能核作用的靶物质，又是基本粒子的探测器。为了争取时间，王淦昌提出抓紧建立一台长55厘米，容积24升的丙烷气泡室，而不选用质量更好的但要花费更多时间的氢气泡室。

第二个问题是选择什么反应系统来研究新奇粒子及其特性。从发现反超子的角度讲，利用反质子束的$\bar{P}+P\rightarrow\bar{Y}+Y$反应是非常有利的。1957年王淦昌在与肖健教授的私人通信中已谈到这一想法。但是要得到比较"纯净"的反质子束，必须用复杂的电磁分离系统，这在联合所短时间内不可能建成。因此，王淦昌于1957年夏天提出利用高能π^{-}介子引起的核反应。这样可以把π^{-}介子引出至离靶很远的地方，可以大大减少本底。

王淦昌研究组于1958年秋开始了6.8GeV/c的π^{-}介子与核作用的数据采集。1959年春又建立起了8.3GeV/c的π^{-}介子束，开始新的一轮数据采集。前后总共得到了近十万张气泡室照片，包括几十万个高能π^{-}介子核反应事例。

王淦昌把握着研究课题进程的每一个环节，在大批实验资料开始积累之初，他便根据各种超子的特性，提出了在扫描气泡室照片时选择"有意义"事例的标准。

因为反超子衰变的重产物一定是反质子或反中子，湮没星是鉴别其存在确切无疑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画出了$\bar{\Lambda}$、$\bar{\Sigma}^{-}$存在的可能"图像"。王淦昌要求研究组每一位成员在扫描照片时十分注意与"图像"吻合的事例。1959年3月9日，王淦昌研究组从四万张照片中发现了第一张反西格马负超子($\bar{\Sigma}^{-}$)事例的图像照片，经过计算正与预期的一致，而且是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超子"产生"事例。

……

王淦昌小组的这一发现首先在中国和苏联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真理报》分别发表消息报道了这个重大发现。苏联的《自然》杂志指出："实验上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是在微观世界的图像上消灭了一个空白点。"两年以后，即1962年3月，当时世界最大的加速器(欧洲中心的

30GeV加速器)上发现了反克赛负超子。该中心领导人韦斯科夫(V.F.Weisskopf)指出："这一发现证明欧洲的物理学家在这一领域内已与美国、苏联并驾齐驱了。"这一评价的含义显然是指反质子和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而言。⑭

这一发现在科学史上有着它不可忽视的意义，但是对政权而言，更大的意义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不同世界阵营的和平竞赛的政治意义。它等于为社会主义阵营赢得了一个重要的筹码。王淦昌的载誉归来，恩荣有加。如果说，在此之前，王淦昌的名声还限于学界或同行之中，这一次他便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束星北在给王淦昌的信中，毫不客气提出三件事：出书、调动、要钱。当时束星北有两本书稿，一本是《电磁学》，是50年代初应高教部之命写的一本高等教材，另一本是《狭义相对论》。两部著作来源于束星北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日常积累。显然束星北有所不知，右派或被管制分子根本就没有出书的权利。至于调动，他身背这么多的罪名，怎么会有选择的权利？1960年的中国，一个科学家即使是一个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能为他这样的人做些什么呢？王淦昌为落难老友惟一能做的也只有经济援助。⑮王淦昌的回信口气似与以往不同："必须彻底改造，否则就不可能贡献力量，更严重的是不能适应环境，有时竟不能够生存。"⑯

月子口的工程在1960年秋季已告完工，机关大队已"名存实亡"，之所以没有宣告解散是因为还有一部分的右派没法处理。为了不影响改造，哪里有活就往哪里去。多数右派无论摘帽也好，没摘帽也好，都有了归宿：或回了原单位，或分派到了新的地方接受改造去了，也有少数表现不好的被开除了公职的(这在当时除去人监，属最重的处理)，打发到老家或街道接受改造处罚去了。束星北的结局出人意料，有一天，上面突然宣布他到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这让很多人都大惑不解(有人猜测是王淦昌和束星北在北京其他朋友做了工作)。在他们眼里，特别是月子口管理人员眼里，束星北无疑是月子口1800名右派中，改造最不成功的一个。他们认为这样放走束星北无疑是宣布月子口在对右派的改造中还有败笔或失误，这一点从他们给束星北表现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就可以感觉得到。

关于右派分子束星北表现情况的综合报告

一、本人主要经历和政治历史问题。(略)

二、处分情况。(略)

三、本人亲属及社会关系：详见附表(略)

四、主要反党言行。(略)

五、来机关大队(的)主要表现：

该表现不认罪。虽经两年多来的劳动改造，反动立场观点转变不大。放毒言论很多。经过

小队三次集中的批判斗争，小组多次斗争以及领导上反复的(地)个别教育，仍没有决心改造。到水库后，从1958年12月至1959年11月共(有)10个月被评为较坏队员(较坏队员从1959年12月就不再评了)。每月的评比中都是重点批判的对象。

来机关大队初期，态度嚣张，自称是来锻炼的，认为(自己)和下放干部一样，不承认自己是在进行劳动改造。当时曾有过："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言论，反映了他对党不屈服的态度。在小队和小组里，同情支持死硬分子和表现不好的队员。死硬分子孙志坚对抗改造，并有偷盗行为。但他却为孙辩护说："是大家逼得他这样，不应该只对他开展斗争，应该鼓励他好起来。"在小组评比中，他赞成评思想改造不好的人为好队员，并说："斗争会上跟着吵吵骂骂几句，并不等于改造好。"并污蔑党对右派分子不拿(他们)当人看待。1959年7月间，因大量饮酒不能劳动，当队长问他怎么样时，他恶毒地说："能干，我能干！"我们找他谈话，他说："死了个右派分子不如死条狗。"在对他进行斗争时，他仍坚持说："这话相当正确。"对于大家的斗争，他冷笑，并说，"辩论么，凶什么？"态度狂妄。要他交待问题，他说，休假时"右派分子惶惶如丧家之犬。"又说，"知识分子喝的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是劳动人民豢养的。"否认右派是客观存在这一事实。今年4月他和右派分子蔡敬如谈到蔡在反右前养病一事，曾说："如果养病到1957年，右派就不用当了。"

不服从党的管教，反对互相监督。有一次请病假过期一周，在一次休假时，领导上没有批准他回去，他态度反抗(蛮横)曾说："法院只剥夺了我的选举权和被选权，并没有剥夺我的休息权。"(对于)接受别人的监督，态度极不老实，经常采取无赖、狡辩、装聋卖傻等手法，拒绝别人的批评和监督。在二钢工地，有一次收工时，他不先收拾工具，拿出烟来要抽，别人批评他抽烟，他不接受，狡辩说："这不是抽烟，而是准备抽烟。"刚来大队时曾说："我要把别人的批评，甚至辱骂当着(做)焚烧自己缺点错误的烈火。"今年4月，又对队员毕庶谟说："我要锻炼得别人打我一巴掌，我不但不生气，还要检讨别人为什么打我。"

在学习八届六中全会文件时，他发言说："在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贪污都是犯法的，都要办罪。今天贪污也要办罪。"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新旧社会没有什么两样。对于自己在鸣放中的反党言行，原则上是承认错了，但口服心不服，而且对许多问题心不服口也不服。对于右派有罪的问题，至今没有从思想上接受。交心中以暴露为名，宣扬了一系列的反动观点，丝毫未加批判。曾说："罪字，我听不下去，罪人的身份是别人给我加的；错误，我能承认，人民日报社论说右派也是有罪的。也可以(不)承认。"对于攻击肃反运动问题，承认自己在肃反中应该受审查，运动后，党对他是仁至义尽，因而不应该攻击肃反。但对他攻击党的整个群众运动(包括肃反、三反五反等群众斗争)的反动言行和思想，从未进行过全面的批判。对于他宣扬资产阶级法治，污蔑党和人民政府实行人治的反动言行，也没有批判。犯罪根源很少检查，(也)没有认识，曾归之于自幼养成了孤僻的性格。对于历史上干过国民党军令部技术室顾问和当副主任等恶迹，从来不联系检查，并在10月27日填写右派登记表时还在"何时何地参加过何种反动党派、社团和职务"这一栏里(填)写着："曾在伪军令部工作过，但无名义、职务，也未接受少将、副

主任伪职，随即离开。"这充分说明束星北直至今天他仍不承认自己的反动职务，〈仍没〉从根本上否定他的反革命身份。对于〈自己〉地主兼资本家的出身和当前被管制的身份也从不提到。

交心中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观点。曾说："反右派斗争时，我以为毛主席是不赞成反右派的，当时毛主席在全国各地视察。我认为是被排挤出去的。直到毛主席在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讲话时说：中国一小撮右派分子的反党阴谋已经被粉碎了，才知道毛主席也是赞成反右派的。"企图把毛主席和党中央分裂开来和幻想翻案。又说：右派分子有错无罪，"放的毒虽然起到削弱党的作用，但并没有造成恶果。毒草变成肥料了，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来了个大跃进，即使有罪也未遂。"他认为别人说右派分子有滔天大罪有些过分。说："有的人说，终生劳动也不能挽回给党造成的损失，不能赎回罪过，〈这话〉我在感情上不能接纳，理性上也搞不通。"他认为右派分子无心为恶，不应该受到处分。他说："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有心为善，虽善不赏。"他认为像他这样的人不是反党，是想通过另一条道路走社会主义。他说："看到许多右派的言论和自己一样，像沙文汉、陈学昭都是反党的，他们革命多少年，反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所以我认为像我这样右派，不是有政治野心的，不想做官，不想抓权，而是想通过另外一条道路走社会主义。"他认为劳动改造是受苦，说："我们是右派分子，干活苦，工农干活，没有人压迫他们劳动，不会苦，要干多少干多少，农民冬天可以不干。但我又想到解放前工农的劳动更是苦，因为有经济的压迫，饿肚子，不干不行。肚子饿比现在的压迫更难受。我抬筐时，想到在贵州看到农民背筐上山苦啊！他们比我们还苦。"对于"如果右派阴谋得逞，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这一论点，他认为这个"如果"是不能成立的。在今年第一季度鉴定时，他又说："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是好心人的空想。"又说，"人都是自私的，都会为个人利益而竞争。因而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战争。"对于这些反动的思想和观点，他都没有批判，说明他仍然坚持这些观点。

去年几次改恶从善大会之后，态度嚣张，在小组会上叫已摘了帽子的队员"坦白"。又说："已摘帽子的，都是过去政治上的活动分子，会奉迎党，知道党喜欢什么，他们就怎样做。"〈对已摘帽的〉进行攻击和污蔑。他说，自己不会这一套，而且认为体力劳动不能改造人。因而他没有摘帽子的希望。幻想依靠自己的教授头衔和科学知识得到特别处理，不〈想〉经过劳动改造而安排工作。这种思想直到今天仍没有放弃。

生活方面，好吃懒做，肮脏、懒散。平日大量带咸菜、酱、咸鱼。酱里有蛆，有时带蛆吃掉。不洗手就抓别人的小菜吃。在即墨农场天天打听青岛什么地方有卖好吃的，什么东西怎样做了吃，以便休假时想法弄来吃。在月子口水库，有一次吃"火烧"，他事先定的是粗细粮各半的，值日错发成细粮的，他吃了不作〈做〉声，以后值日查了出来，他不但不以为耻，还问值日的：有没有粗细各半的了，我很爱吃，再给我两个吃吃。以上问题反映了〈他〉精神状态的丑恶和道德品质的败坏。

对党极不忠诚，没有跟着党走的愿望，和党的关系很远。今年5月背着党的组织去北京科学院〈他没去成，叫他儿子去的〉找老朋友科学家王淦昌，想把摘帽子的希望寄托于王。因为他从报纸上看到王淦昌在原子核研究方面有了新的成就，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国际上的重视，认为

有机可乘，想通过私人活动的方法，达到出书、借钱和得到特别处理，逃脱劳动改造的目的，并且恬不知耻地提出，如果科学院不给他出这本书，就到苏联去出。并扬言有两个把柄，到不得已时，他要翻案。今年5月曾想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对于党的各项号召，表现(得)无动于衷，没有积极拥护的表现。每次工作任务变动，党号召表决心，他都采取敷衍的态度。在月子口水库一次小组会上座谈表决心，他只说了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批评他说得太简单时，他无理取闹地说："这是开表决心会，还是开斗争会？"今年六七月间，领导上布置制定自我改造规划，他照抄大队提出的几条改造要求，一字不变，对党的这一措施表示反感。对各种政治活动，都情绪厌倦，开会就打瞌睡。

对待大跃进的形势，从实际表现上看还有怀疑。在即墨农场时曾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荒地，不能理解。"经过我们说明，还表示不能理解。

劳动方面没有自觉的劳动态度。不积极、不主动，挨时间，倚老卖老，偷懒耍滑，以不懂搪塞一切。劳动时常发生工伤，自称要吃些苦。但在真正的艰苦中和紧张的劳动时，又洋相百出。去年冬天运石子，因为天很冷，就不经请假，擅自回宿舍看病，在消力池扛筐，借头晕跌倒，很长时间不起来，放躺，企图逃避劳动。劳动两年多，至今还不会很好的用锨。在即墨农场提出：不懂为什么要用土蓄小麦种。

身体有些病，即经常以此为借口，请假往家跑，不想待在机关大队里，安排他看门也看不好。

有时在客观的推动下，偶尔在劳动中有些起色。去年5月和今年5月，在备黏土和保钢的任务中，一度情绪有些高涨，学习推车、抬筐也算尽力，但也只是咬牙干活，不是想通过劳动改造自己。而且劳累一些便不想坚持下去，甚至分配他干也不干。自8月份工伤至今已四个多月了，在此期间，他除在近期参加了几天很轻微的劳动外，余者时间均在宿舍看门，但是就连这点工作他也不想干，经常藉口骨折发作，骨痛头晕，多次要求不参加晚上的小组会议，并要求终日睡觉。当时，(为)夸大病情制造条件，想以此达到回家养病的目的。这种想法受到批判后便不满、(发)牢骚，叫他看门，他终日扣着门睡觉，并放毒说："伙房买菜人有办法，现在认识人好办事，这还和国民党时一样。"一天(他)自言自语地说："难道我束星北就这样完了吗？"看门时组长叫他择菜，他态度蛮横地说："你是干什么的？队长没叫我择。"

总之，束星北经过两年多的劳动改造，成绩不大，反动立场观点的转变甚微，上述情况仅是他在改造中主要错误言行的部分，特此报告。

机关大队二中队指导员：韩某某、小队长：邢某某

1960年12月13日 ⑰

注释

①《文革前十五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②《展望六十年代》、《人民日报》1960年元月1日第一版。

③《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人民日报》1960年元月2日第一版。

④杨阳采访录，1996年7月6日。

⑤石艺采访录，1996年7月8日。

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61页。

⑦方立业采访录，1996年7月19日。

⑧《思想鉴定》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93页。

⑨石艺采访录，1996年7月19日。

⑩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95页。

⑪《对6·16下午酒后放毒事的检讨》，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72页。

⑫徐呈龙，时为青岛树立的全国工业战线上的劳模。

⑬(《对6·16醉酒事三度检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70页。

⑭据《王淦昌先生传略》，《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第249－251页。

⑮王淦昌1960年接到束星北的信后，开始寄钱，每月四十元，月月不误，一直寄到束星北重新复出。据束星北的家人称，寄款单上的邮戳都是每月的15日，月月不差。

⑯王淦昌与束星北的书信，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束星北接到王淦昌的信后，勃然大怒，他认为这个时候，王淦昌竟用这样的腔调和政治说教来应对他，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和蔑视。显然处于绝境的束星北没考虑到王淦昌的用心与处境，而是使用了大量的不恭和情绪激烈的语言对王淦昌进行了攻击，最后绝然地提出与王淦昌从此一刀两断。束星北的决裂信不知王淦昌看到没有，有一点可以肯定，王淦昌一定不会理会老朋友的一时激愤之情。

王淦昌给束星北的书信和束星北给王淦昌的决裂信，我在1988年第一次借阅束星北档案资料时还有，1993年当我再次借阅时发现两封信都不见了。

束星北的档案资料也保存了这一事情的记录，一并附录：

从报纸上看见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王淦昌从莫斯科回国，报纸上报导<道>他和苏联科学家在国际原子能研究所发现(了)新的基本粒子，我当时有不少感触。写信给我爱人嘱她到北京去找王淦昌，希望通过他和科学院党组织的关系向党中央说情，减轻我的处分(那时我正患气喘、腰肿等病)，戴罪立功。同时希望出版我已写完的著作、并减轻经济压力向他借点钱。此信被我大儿子看见了，就拿去和他的党组织(青岛印染厂)商量。结果，大儿子自己到北京去并没有谈减轻处分的问题，只是带回王淦昌的一封信，劝我加速改造，并说经济方面不用愁。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146页。

⑰《关于右派分子束星北表现情况的综合报告》，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211－220页。

SHUXINGBEIDANGA

17.“我是一只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啊”

有一次公共汽车上太挤，一位解放军战士亲密地把我一路抱着，从夏庄抱到沧口， 我心里感愧地说，“您不知道我的身份，不知道我竟是人民的敌人，一只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啊！”这种悲伤感情一直的〈地〉压在心里。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束星北“顿悟”了。月子口虽然没彻底解决束星北“脱胎换骨”的问题，却扭转了他的立场和情感，使他认识到自己的目光发生了问题，放弃了抵抗。这当然有一个较长的痛苦的过程。

……当总路线开始提出时我持着怀疑态度，认为"多快省"与"好"是有矛盾，这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对大跃进是不信任的，认为反右之后，大家不敢讲话了，怎会有积极性呢，怎会大跃进呢？政治压力也只能使人粗率地完成任务，“多快省”而不能"好"，怎会跃进？那时还认为我的看法不错，要提高人民热情、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平右"，这也是我在反右派时抗拒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报纸上经常报道的跃进消息也使我不安，起初还认为这些报道只是个别的甚至夸大的消息，但以后"消息、报道"却越来越多，具体的农村、具体的工厂、具体的人名、具体的事情，总之一切都很具体，却(而)不能不使我(对自己)发生怀疑，“难道我看错了吗？”“难道这些人名地名事实全是捏造的吗？“要我承认看错，却是一件困难的事　何况这种看法不是对某一个小问题的看法　而是我从反右派之后的一直抗拒的根基　所以我思想上在1958年初就起了极大的波动。跃进的事实却越来越多　我又参观了 跃进展览会 看了好多新产品　在收音机中听到上海跃进报喜的锣鼓声，每一个发出的 卫星 都给我一个刺激 ··

大跃进的结果不仅在于工农业加倍翻(番)的提高　一年之内钢产量超过旧中国几十年的累积产量　增加的速度把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抛在后面(有些产品质量已达到国际水平，不正是好的例证吗？)(工农业总产值一年之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也不敢梦想的)　原煤、粮食、棉花等等产量几乎翻了一翻(番)。这些经济上的收获，也不仅在于全民炼钢　(而且)使千百万人民普遍受了一次钢铁技术教育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煤铁资源的调查　为今后炼钢提供了科学资料　为今后工业化进行了一次全民性的教育……工业上二参一改三结合，农业上的八字宪法保证了大跃进的继续和经济上政治上的收获　在国际上使全世界的人类受了一次广大的教育　‘社会主义确比资本主义优越’，在国内使最顽固的(坚守)资产阶级立场(的右派)受到致命的打击……①

“疑虑”和“刺激”伴着束星北的改造旅途。中国历史的轮子从没有出现他所期待的走

势，时代列车每走一步，似乎都在印证着他的错误。月子口的封闭、围剿、强迫式的改造以及媒体众口一词的宣传，使智者的目光逐渐迷离，自信逐渐丧失。

1960年10月，正是天灾、人祸肆虐中国大地，亿万人在饥寒交困之中，千百万人饿死之际，束星北却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认识到自己根本地错了。

关于学习三大万岁第一个问题的小结

1960.10.二中〈队〉六小队束星北

通过亲身的目睹事实和时事学习以及其他政治学习，两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在各条战线上的伟大辉煌成就已是无可怀疑的铁一般的事实。首先是月子口水库伟大工程的提前完工，向市内供应用水；其次在毛家岭看到筹划五万亩农田的新式农场，包括农林牧副渔和四座面粉厂，一座十万人居住的新式小城市和一所〈有〉农学研究院的新型农场的计划；在毛家岭看到人民公社组织力量的优越性，兴建水利河渠，鸡鸭猪羊成群，冬天雪地，公路上打扫得干干净净，农民生活的不断提高，穿着和城市一样，完全和旧社会多数农民衣不蔽身的情形不同；在城阳，看到从无到有从荒地上建立起来的青岛第二钢铁厂内的铁水奔流，钢花四放，目前又在改建小洋群、炼焦炉，增长生产的范围，增高生产的质量；看到农村公路二〈两〉旁的绿树成荫〈阴〉，那〈哪〉里还有丝毫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秽穷困的景象；在小白干路参加工地建设时又看到新建的小白干路二〈两〉旁工厂一个一个地在建立起来，看到沧口到李村的小铁路正在铺轨，接近完工；看到难以数计〈计数〉的如三钢、预制板厂、五金机械厂的建立；到处是建设，到处是运输，街头巷口，全有机器转动的声音，这不是大跃进的伟大成就是什么？

……城市人民公社成立后，家家户户搞生产，在台东看到街道二〈两〉旁林立着妇女参加生产的小工厂，很多妇女〈成为〉从事机器劳动的生产者，一片勃勃蓬蓬〈蓬蓬勃勃〉的新兴生气〈景象〉正在古老的国土上发挥力量，连瞎子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从耳听机器〈声〉中感觉出大跃进的事实！

再从报纸上的报道就〈可〉看出连内地过去荒僻市镇中也新兴起各种工厂，例如我在抗战时到过都匀、遵义，当初原是古老的完全〈的〉农业城市，我们当时看到都匀店面牌上写着"出卖盐酸"〈的〉字样，很诧异，问询之下才知道是"盐酸咸菜"而哑然失笑；但是今天则有化工厂机械厂，甚至炼钢厂；"盐酸"，真正的工业用品"盐酸"当然更毫无问题地作为日常化工原料，改变〈了〉都匀几千年来的面目，这些还不能说明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吗？

根据原来计划，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预定于1962年完成，但是在1959年，在两年的时间内，在粮的方面，已达到5500亿斤，超过预计1962年才能达到的5000亿斤，钢产量已达到预计1962年才能达到〈的〉1050万－1200万吨的指标，其他主要产品方面，也达到甚至

超过原定于1962年才完成的指标；不独如此，这两年中的增量、数量，无论在绝对数字方面或增长比例方面都超过1952－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和，不是大跃进的伟大成就的铁证吗？由于人民公社的成立，粮的产量从1957年的3700亿斤一跃就到了1958年5000亿斤，增长〈了〉35%，1500亿斤，历史上任何年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任何国家，有这样的奇迹吗？1959年我国遭受水旱、虫灾的地区有五亿余亩，但粮食的产量达到5500亿斤，还比1958年多500亿斤，比1958年增长了10%。这不是人民公社无比〈的〉优越性，全国农民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的〈精神鼓舞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又怎样能解释呢？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党的总路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和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已是尽人皆知无需再加渲染的事实，但是，为什么市面上有些东西缺乏而显得紧张呢？据我的认识是这样〈的〉：

1. 在跃进的情形下，有些产品跃进的程度跟不上趟，例如洋灰就跟不上建筑的需要，木材就更跟不上趟；

2. 人民生活的日益提高，有些日用品就跟不上趟，尤其在人民公社成立后，五亿农民成为日用品的最大消费者，肥皂、胶鞋、电筒、香烟等过去只有城市居民才买得起的消费品现在农民也买得起，报纸过去在农村中几乎没有销路而现在则每个小村每个生产小队总要定一份，布票过去在村中销路很狭，而现在农民的布票和城市居民一样，大家穿得干干净净，以前有病无钱治疗，而现在则公费医疗，人人可以医病……这样消费品的生产率就自然赶不上人民生活提高的消费能力；

3. 为了持续更大的跃进，某些产品就不能不节约下来，特别如鸡鸭牛羊猪等畜类，要留作再生产的种子，所以就不能随意宰杀，因此，肉类也显得更加紧张。

这些虽然只是初步的认识，但已经说明货物越是缺乏，就越是跃进，越是人民生活提高的原因。资本主义国家内货物卖不掉也正是不景气、建设停顿、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的明显标志，〈资本主义国家只能靠制造军火制造战争来销售物资克服不景气：一个失业的美国青年人曾对我讲过"一打仗我们就好了"。〉所以我们市场上某些物资供应缺乏正是说明我国在一日千里飞跃前进，何况党又及时采取了措施，采取了"定量"的正确措施，既堵塞了囤积的道路，又保证不致吃尽用光；同时又采取了"增产"的道路，使缺乏的日用品源源不断地增长；号召保粮保钢，增产节约，所以目前粮食供应市场形势还是良好地进行。今年我国又遭到几十年未遇的自然灾害，要是在过去，要有多少人流离失所，饥饿死亡，也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号召节约用粮，"有饭大家吃"，加上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灾荒。我最初对粮食的问题和少数日用品供不应求的问题想不通，以为既然跃进了，为什么粮食反而要"定起量来"？为什么"手电筒"都买不到，"香烟"也买不到？甚至疑心是否真的"大跃进"，以后经过目睹的跃进事实，经过指导员、教导员的报告，经过自己的思考和群众的讨论学习，才一步一步的〈地〉解决；同时也反映着自己立场问题。恨自己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认识清楚而怀疑"大跃进"？右派分子也就是这样怀疑新社会的成就

以致犯了反党反人民的罪……②"慢慢地，我明白了，我完了，我根本的错了……"③

"顿悟"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民群众对反右的支持和对右派的憎恨。反右之初，束星北曾认为人民群众不同意反右，会对上面的错误作出反应。他称，党中央不就是二百来个中央委员吗？意思很明确，真理未必掌握在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手里。他以为，如果"人民群众"能够坚持真理、尊重宪法，上面就不能或不敢随意地"刮风下雨"。但他发现自己错了。"人民群众"绝不仅仅是法制意识淡漠，"人民群众"支持政府的一切行动，"人民群众"对反右运动的支持和对任何运动的支持一样，情绪狂热而高涨。一个极右派，不光承受上面的压力，还要承受来自四周的"人民群众"的敌意或仇视的压力，这种随时随地都会感觉到的敌意和仇视往往比来自上面的敌意和仇视更为尖锐寒冷。以至于"见人抬不起头来，看见熟人赶快低下头来，遇着生人称我'同志'，就觉着含羞，您不知道我的身份，否则就不会这样称呼我了，光荣的'同志'两个字再不会落在我身上了，甚至当我教我大儿子数理研究，辩论学习方法时也常被他用'资产阶级教学法'几个字套在头上，使我哑口无言。他对我的批评态度使我无地自容，而他是下放干部复员军人，我却是人民的敌人，被管制分子！感觉到生不如一死，惶惶如丧家之犬！……有一次公共汽车上太挤，一位解放军战士亲密地把我一路抱着，从夏庄抱到沧口，我心里感愧地说，'您不知道我的身份，不知道我竟是人民的敌人，一只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啊！'这种悲伤感情一直的(地)压在心里"。④

更重要的是，月子口的改造使束星北真正理解了毛主席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若不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就一天(也)不能生存，我没有能力养活自己，我过去吃的是剥削阶级的残余(饭)，喝的是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劳动人民毫不需要我，我对他们不发生一点作用。没有我，劳动人民照样地生活下去，没有我，山东大学照样发展……"⑤

走出月子口，重新回到年轻而美丽的城市，束星北有绝处逢生之感。因身患多种疾病，回来后，他没有马上上班，而是在家治病休养了一个时期。这期间，他终于能够独自安静地自我反思一番了。按照组织的要求，他从根上将自己的思想立场意识和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反省与检讨。这篇检讨虽充满时代与历史的"特色"，但也不乏束星北的虔诚与率真的性情，它全面总结了束星北"顿悟"的心态与过程。

思想汇报

束星北 1961年1月18日

首先，应当感激党对我的宽大和照顾，调我到青岛医学院工作，使我有较好的表现悔罪的机会。我在整风中，在反右斗争、在过去的一切的言行中，犯有反党反人民的恶劣罪行，到现在并没有改好，而党仍然这样宽大地不咎既往，不把我踢在一边不管，还增加了

生活补助，又给我休养的机会，检查两年多来，还带着不少的反动思想回来，真觉惭恨交加，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也对不起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前途，我想对我的各种腌臜思想清算一下，并将这些思想起了些什么程度的变化，汇报给党组织，请求党的帮助和教育，请求人民群众更好的(地)监督，以便彻底改造；在党的领导下和人民群众一起建设幸福的将来。

我是严重地染着反动立场思想的人，一贯地以(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互相利用的，没有真正友谊(的)，虽在解放后，特别在近几年来，报纸上，小说上，电影上表扬了叙述了不少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好人好事，使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一些)反动看法，但是还没有根除，这种反动思想(有时在思想上暴露出来的这些反动的看法——年深日久在旧社会处久了，养成了习惯)，这些思想方法过去使我痛苦，而现在又使我悔恨。两年多来的劳动的结果和社会跃进，人民生活道德的提高以及祖国在各方面的辉煌成就，固然打掉了我不少反动思想的分子，但已成习惯的各种思想方法仍然不断地缠绕着我，使我感到痛苦，甚至灰心："反正没办法，随它去罢(吧)"，"年纪这样大，身体这样坏，还改造什么？"但是社会上日新月异的成就，太使人兴奋，家庭中儿女的期望也不能不使我重新打起精神来。认识到"随它去"这种思想也是反动思想的残余。看着过去的历史，想着自己目前的情况，政治上被人看不起，在社会上在机关，人一谈到"束"字就抬不起头来，见人不敢称"同志"，听到人称"同志"，就觉到(得)惭愧，深怕暴露自己的右派身份而遭到口唾。经济上靠着卖衣服，靠儿女，靠着亲戚朋友的接济。(在)家庭害得妻子儿女也抬不起头来，已当过飞行教官的大儿子蹲在家里，到现在还没有爱人，二女儿和人结婚之后，遭她家庭中翁姑反对，三儿子沾染了我的反动立场，现在成都劳动教养，四儿子多少沾了一些反动思想方法，最近又和他的朋友爱人决裂，学生中沾染着我的反动思想方法的也不在少数，有些固然背叛过去，甚至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但有的还是只走"专"而不走"红"甚至堕落为右派——我一生害人害己，做了多少对不起人民的事，对党又那样地猖狂进攻，而党还对我宽大，我怎能不打起精神来做一个新人，跟好人好事反复地学习，立功赎罪，抛弃反动的根子，坚决彻底和反动思想一刀两断，决不能抱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自暴自弃，决不能再做人民的罪人。趁这个机会，把反动的根子挖一挖，摆出来使今后能时时地警惕，使党组织和群众能更好监督教育帮助(我)改造。

我出身于反动的家庭，父亲虽然出身于贫农，但他本人成为资本家兼地主。另娶了一位庶母住在南通。我母亲是封建家庭没落地主的女儿，带着我和弟弟(现在国外)住在扬州靠近她母亲不远的乡镇。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钱为第一"和"惟有读书高"。小时候我还是勤快的，喜欢跟着劳动人民东搬搬，西弄弄，但是却被母亲打着回家读书，说是"没出息"。母亲断定一个人的有出息和没有出息，完全要看他的收入"多"和"少"，读书既容易发财又容易做官。做了官就可以不受人欺。(在)这样的鞭策教育之下，就养成了我"劳动没有出息"的反动思想，形成我一切以"钱"为中心的反动本质。以后在社会上，在资本主义的学

校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受的影响和教育也只是这个基础上的扩大建筑。其次对我思想影响较深的是旧的侠义小说。我从小就喜欢看侠义小说(废寝忘餐(食)地看，长大还是如此，这可能和小时候受父母特别是父亲的压迫……有关系)，这些小说，一方面固然冲淡了我的"专门弄钱"的思想，但另方面却又养成"神秘""看不起群众"和要"不畏权势，打抱不平"的反动思想，这些思想确实支配了我的一生，至少支配了我到月子口改造之前的大半生。例如我和人交朋友首先就考问(虑)"和他交往对我有什么好处"，所说好处就是"钱"，或者"名"或者是"利"，而"名""利"的最终目的仍是为的"钱"，为了更好地，妥当地弄"钱"，研究科学就专心一致地钻进物理学，研究神秘的"相对论"做一个"神秘"的人。在"三反""肃反""整风"中，对党那样地猖狂进攻，也是受了侠义小说中"不畏权威，打抱不平"的反动思想(的毒害)。这些思想确实支配了我的一生，至少支配了我到月子口劳动改造之前的大半生……

25岁起我就从一个校门跨出，又走进另一个学校的门，从一个书房间跨出，走进另一个书房间，根本就没有时间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相反地却使我接触了"社会经验"，更使我的反动思想具体化。刚回国时，我还有些好的思想，在学校里读书时常被人喊做"呆子"，我中学的诨名就是"束呆子"，结果是碰了一些钉子。回国后不久，一个姓孙的朋友对我说讲："你真呆，把问题看得太真了，中国的事情要朝最坏的方面看，就一猜准。"而以后遇到不少事都证明他说的是"真理"，听人的话，要从反面看，这就养成我的思想方法，不相信别人的话专找他藏着的坏事，把坏事作为他说话的动机和目的，专抓别人缺点，专找他的黑暗和隐藏的见不得人的思想，不相信好事，总朝最坏的一方面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人好事，全是鬼话"，也成了我的思想习惯。也由于这种思想的支配，使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不相信共产党，以为(他们的纲领)只是政客想抓权的"漂亮话"，全是些"狗皮膏药"。(反右后，我仍然持这种看法，直等到社会风气天翻地覆的变化，多少新人新事出现之后才开始转变。)(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以为加入共产党的是不得意的"政客"，或者是些"呆子"，以为没有转变立场加入共产党的是想投共产党的"机"，这些反动看法的转变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一下子就觉悟过来的，而是经过无数事实的教育和反复不断地(的)思想斗争，才逐渐转变的，甚至这些思想到现在还有时痛苦地袭击我。细想我的反动立场是这样的根深蒂固。

从25岁在浙江大学教书起就一直风帆顺利。初去时我还虚心用功地学习物理，对人也谦虚，肯请教，但不久成了"名教授"，就使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只在我的一点狭小的范围内兜圈子。在这一点狭小的范围内，有一点小成就，就以为自己了不起，恨不能把全世界科学家、全世界的人都看低下去。听到别人几句恭维话就浑身发酥，自以为是"天下第一才子"，把恭维我的人当做"知己"、"好人"、"好朋友"，特殊看待。28岁由于反对郭任远校长辞聘闹架之后，马上就被暨南大学和交通大学聘做教授、"讲座"，到暨南大学和何炳松校长闹意见之后，马上又被浙江大学聘回去当教授，同时还有山东大

学、大同大学争着聘请，这样一来更使我飘飘然地不识自己，变成了傲上慢下，对学校行政东批评西指责，和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校长就时常吵骂，用拳头打事务科长的嘴，打一个职员的耳光，形成一个"恶霸"！这些可耻的行为和作风不知损害了多少人，而自以为"爽直"，想起我一生的罪恶，真是难以尽数！但是"并没有把我怎么地"，就使我自以为"高人一头"，遇事就任性而为，侮辱群众，漫〈谩〉骂领导，〈现在想起来，真是一只疯狗！〉专门不守纪律，专门不服从组织而怡然自得："我是靠真本领吃饭"，认为守纪律服从组织分配老老实实工作的人，是无用胆小的懦夫。感谢共产党这次给我的教育，使我比较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罪恶，〈也认识到〉党要我"怎么地"，就可以把我"怎么地"，党和人民绝不能再容忍〈我〉这样的狂人。我自己也不能再容忍我那样的狂人；到月子口劳动之后，才清楚地认识到若不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就一天〈也〉不能生存，我没有能力养活自己，我过去吃的是剥削阶级的残余〈饭〉，喝的是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劳动人民毫不需要我，我对他们不发生一点作用。没有我，劳动人民照样地生活下去，没有我，山东大学照样地发展，而且没有我的反动阻碍，〈会〉发展得更好更美。我那种麻木不仁自以为大〈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反动立场，也支配我的整个行动，使我在解放后不能进步，到现在堕落为人民的敌人，〈堕落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回想我许多的朋友同事，和我同样出身的，名利心甚至比我还重的，为什么在解放后会进步？有的在"三反"时被斗争而现在已转变成为党员，他们的家庭出身并不比我好，在金钱方面也很斤斤计较，为什么会变成光荣的共产党员，而我今天却落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他们肯虚心，虚心地学习，虚心地检讨，而我还是那样地狂妄自大！这个病根子也是由于我反动思想的支配：我根本不相信世界上真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我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不为个人利益打算的人，以为"进步"就是"投机"，想"向上爬"，是"假积极"，我既不想靠政治力量向上爬，也就不需要这样"假"，我靠我的本领吃饭，所以解放后，从不学习，还讥笑那些虚心学习的人为"投机"，1955年在北京时，我就当面侮辱我的老朋友王淦昌为"投机"；1957年在上海时，我又当面侮辱老同事苏步青是"打怕了"，我这些罪恶也〈是〉擢发难数，现在悔恨莫及。我在这里准备把我过去黑暗部分的思想，全部地挖出来，摆成一个清单，来清算一下。自己先检查之后，再请党组织帮助教育，挖出脓根子来，以便加速改造。

〔Ⅰ〕在对人方面，我一贯地：

1. 瞧不起劳动，瞧不起劳动人民；认为〈劳动人民〉"没出息"，认为是"笨人"做的事，认为劳动人民是粗手粗脚没有头脑的"笨人"。

2. 瞧不起"群众"，认为群众是"无知""无用"〈的人〉。

3. 瞧不起"政治家"，说他们是"搞政治的"，"不做好事"。

4. 瞧不起有钱的，说他们全是投机倒把〈的人〉。

5. 瞧不起一切人，缩小别人的成就从而故意矜持地夸大自己的成绩。

〔Ⅱ〕在思想习惯方面，对朋友的关系方面：

1.交朋友先看是否对自己有利，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的物质关系；总朝着坏的方面来看别人对自己的友谊，所以除个别的老朋友之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而只是互相利用。

2.总强调自己对人是"真心真意"而别人对我是"虚心(情)假意"；总觉别人对不起我，我是"凭良心"的，对得起他(们)的。

3.强调自己是"好人"，是"好心"，别人不能了解我，我是受了冤枉被委屈(的)。和人有了争执则总向自己好的一方面想，总朝着自己"有理"的一方面想，而专找别人缺点，朝别人坏的一方面想，朝别人"不好"的动机(上)想，而为自己的错处解释。

4.别人为自己做了事，尽管心里感激，但嘴里还要讨便宜，说些"缩小别人好处"的话，好像满不在乎似地<的>。不独嘴里当时这样讲，而心里也这样地想：他是为自己做的事，对我有益是他顺便的卖人情。

(III)在行动方面

1.做事不负责。教学方面的不负责表现在只想培养"天才"的学生，以显示我的才能、学问，增加我的名誉和地位，而对一般的学生就不负责，骂他们"笨"，用"不及格"的方法来打扮自己成为严师，使多少学生伤害了自尊心，而对学习、前途失望。对一般事情的不负责表现在专找理由推卸责任，能有藉口就卸到藉口去："不是我不负责而是没有办法……上面所述骂学生笨就是这种推卸责任(一个方面)，"不是我不肯教，是他们'笨'"，或是(为)"由于他们不肯用心学"(我)的藉口。

2.无组织、无纪律。认为组织纪律是"统治"，要人乖乖地服从他的统治，显示他的权力，否则他领导本身为什么不守纪律呢？认为不守纪律是光荣的行为，坐汽车不买票，买东西走后门，是有办法；认为守纪律是没有用的人，认为服从组织的(人)，是没有饭吃的懦夫。

3.傲上慢下，任意而为，骂了领导长官骂了校长，就到处宣传，自以为荣，以(为)不能把我怎么地，显示高人一头。专门打击名誉地位比我高的，金钱比我多的，权力比我大的人；对名誉地位金钱比我少的就轻视侮慢；对助教学生对家庭妻儿，则随意侮慢，完全不考虑到这样(做)对别人有多大损害。我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我做事又任性而为，以为"不能把我怎么地"，全不管这样做对人甚至对己有多少损害。

4.好逸恶劳，好吃懒做，被不叠，地不扫，认为这些全不是我应当做的事，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甚至懒到这样的程度，连吃饭都懒得吃，经常不洗脸，不刷牙，不梳头。

5.酒量并不好，但却"好酒逞能"，认为不吃酒的人，没有"豪气"，不是敢做敢为的"好汉"。

6.对人不满则借题发挥，对人不满却不直接提出来而是借另一件事打击他，借题发挥。

7.不懂装懂，懂的有时装不懂。对不懂的东西却把自己打扮成很懂，来使人敬佩我学

问的渊博："束先生真了不起，他什么都懂。"(造)成了学生的迷信，其实就是我这种手法骗来的；整风时，我在省委会上大谈"法制"，也是(以)这种手法来夸耀自己的多才多艺。其实，我从来没有学过法律，"法制"这个名词是刚从"词源"上查出来的。但懂的有时又装不懂，原因是以后人家发现我是的确懂而却说不懂是何等的谦虚，这样可以使人摸不清我的学问究竟有多深，也是显示夸耀自己的另一种手法。

8. 专找社会、政治、学校、机关的黑暗部分，作为谈笑讥笑的资料。

9. 喜欢"打个抱不平"，主要还是为的夸耀自己。

10. 心里很想钱，很计较名誉地位，但表面上却装得满不在乎，表示自己的"清高"。

以上只是挖出来的主要的腌臜思想，这些思想虽然很多，但是总结起来，可以拼成一个"受侠义小说影响而又一帆风顺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所以敢于傲上慢下，任意而为的主要原因是"一直有饭吃"，这个学校不聘我，有别的学校，抢我还抢不到手，你不能把我怎么地。否则只能损害你自己的名誉、地位，所以我才敢傲上，才敢骂校长，敢骂领导，也由于这样，我才敢无组织无纪律，讥笑那些守组织纪律的人为懦弱无用的人。否则我现在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原因是已经碰了大钉子了，问题摆得很明显，党愿意"把我怎么地，就可以把我怎么地"；党是一个党，这个学校不要你，别的学校也不会要你。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变了，假使坚持反动立场就"没饭吃"，而且有我没我对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并不发生影响。山东大学不是照样地发展，而且由于没有我反动思想的阻碍，教学改革、教育方针反而更快更好地推行起来，学生的思想更加进步，成为又红又专的两面手而不是只说不动钻牛角尖为个人兴趣为个人名利打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钱"也没有办法，假使决心不向人民投降，人民就不供给你粮食，你有钱也买不到，那只有活活地饿死，现在才懂得毛主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句话的真理。在劳动人民当家的社会里，除非愿意饿死，(才会)为反动阶级守节，否则就必须抛弃反动思想，必须老老实实地守纪律，服从组织，不能任性而为，也不能和群众关系恶劣，因为那样一来，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反映到党组织来斗争你，斗争的结果还是要低头认罪，改造自新。肃反运动中我所以被斗的原因之一就是群众的关系太坏了，群众平日忍受我的侮辱够了，所以一发就不可收拾。所以不能"任性而为"，不能"傲上慢下"。

任性而为其实也就是"不知足"，对某种要求不能达到目的或者没完全达到目的就不满意，毫不考虑别人的困难而借题发挥地"任意(性)而为"，当我初到山大时，因为华岗不能达到用哲学丰富我的物理学的希望，又没能使我做"一级"教授，就不满意，一直就大骂华岗，也因此对山大整个党不满。平反时，山大党没有能满足我处分李哲明的要求，又没能使我当一级教授，而不满意，在整风时就将不满的情绪发泄到肃反问题上去，又因为青岛市委没能满足我处分李哲明的要求，而对青岛市委不满，也借题发挥到肃反问题上去，还自以为"不能把我怎么地"，一直等到受了管制处分送到月子口劳动锻炼改造后，才恍然觉悟到党完全可以把我"怎么地"，事实上人民完全有权不给我饭吃，除接受(群众)改造之外，

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对自己的工作也不能不负责任，否则群众会有意见，组织上会有意见，还是受不了，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不改造就不能生存。

以"钱"为中心的反动思想也在形势逼迫下逐渐改变，主要的是，在旧社会里，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有钱能使鬼推磨"。而在现代社会里，钱就没有那样的价值了，不供给你粮食，你就没法生存。虽然在"自由市场"里还可以买些东西吃，但是很明显，在不久的将来就不能买到这些东西，只要政府一个命令，自由市场就会马上消灭。所以工农当家的社会，不是金钱万能的社会，而且钱的来源要靠劳动生产，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来得容易，假使不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人民不会给你钱，也没有"资本家"来养活你，也不能开个小店摆个摊子"赚钱"，亲戚朋友也不能无限制地接济你。例如我这次生病，要不是党的照顾和公费医疗，我就没有这么多钱治病，而且到现在为止，亲戚朋友甚至儿女到底接济了我多少呢？

至于"朱家郭解"的侠义作风，在现代社会也失去令人敬佩的价值，现代社会里并没有令人不平的事需要"侠客"来解决，真正遇到黑暗的事可以随时随地向组织汇报，根据情况，党会处理得比"侠客"更妥善，更全面，更公正。而那些小说书上的"侠客"往往是自以为高人一等，只听一面之词的人(我过去就是只听一面(之词)先入为主的人)。他们能把事情搞乱而绝不可能全面彻底地解决问题，所以"朱家郭解"(的)作为，在现代社会里只是反动思想的残余，(其是)连唐吉诃德都不如的人物。

由此可见，我这种受"侠义"小说影响而又一帆风顺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坏思想坏习惯以及反动立场，在迫人形势下完全是"不改也得改"……没第二条路可走。我既不愿走死路，也不会替反动阶级守节，而且想着过去的生活，确是毫无价值也毫无趣味，我相信我能改造好，快快乐乐地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幸福的未来。

我那些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不懂装懂，指手画脚，批评这个批评那个的(作风)，专找别人的社会的黑暗部分作为讥笑辱骂的言行，为的是要表现自己"出人头地"，从而使我能在名利上得到好处，现在社会基础变了，风气也变了，这样的做法不独不能表现自己的"出人头地"，而相反地只能引起别人的反感……

到月子口劳动之后，认识到自己确是可怜的"无能"(的人)，才知道过去说这个笨嫌那个笨，而自己才是真正的"笨手笨脚"，学一件小事，小技巧，也要费那么多时间而还学不好，有时被叱责：笨手笨脚的(地)碍事。觉得自惭，而事实上就是那样，不独帮不了忙还确(实)是碍事。刚去的时候，还原谅自己是"不懂话"，"不习惯"，过了两年还是差不多，这才恍然觉悟到过去自以为是"天才"的想法是何等荒谬，才认识到我离开劳动人民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而我学的东西对他们却毫无用处！两年来的劳动结果，使我从自欺欺人的反动(空想)观点转到活生生的事实(中来)，剥掉我唯心思想的一层画皮(来看)，我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不是劳动人民给我饭吃，我就一天(也)活不了。

在月子口，我看到很多没有想到的东西，我看到农村人民生活的变化，农民穿的哪里

还有过去破烂不堪的情况，也从没看到过面黄饥瘦的农民。(甚至淮委(北)犯人中，我也没看见面黄饥瘦的犯人，由此也使我感到党的仁慈宽大，对反革命分子甚至反革命杀人犯也如此地仁慈！)我看到的是水利建设，是公路建设，是工厂学校的建设，到处是勃勃生气。这些辉煌的成就，也促使我思想的迅速转变。我相信每个人的思想都在转变，何况社会改变了，风气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建筑在金钱基础上了，同志式的友谊势必要代替经济利害冲突的物质基础，家庭之间的关系也势必起着变化，过去那一套旧的反动思想方法已不能适应新社会的发展，思想方法就势必跟着变。每个人都会体会到，除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否则)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抛弃，不改也得改，不变也得变，只是有的改得快些，有的改得慢些。

我是(改得)很慢的，但相信还能够跟得上去，现在想将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的基本转变再汇报给党，以便党对我更能抓紧改造。

过去，我一直以为一切的政党都是一样，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说些漂亮话。甚至在解放之后，看到共产党的政策措施也以为只是新上台的政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能不做些好事，也以为，共产党只不过和其他的资本主义的政党一样，为了个人和集团的利益而巩固统治，丝毫没觉察到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后一个运动接连着一个。回想"土改"，摧毁了封建主义的基础；"镇反"，摧毁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恶势力；"三反"改变了社会的风气，使中国从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讥骂为"贪污国"的社会转变成为清廉奉公守法的国家；党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大公无私，不管多高地位的老干部老党员，只要违背人民的利益就(会)受着(到)一样的处分。接连着又是农业合作社；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更好的可靠的保障，从个人利益走向集体利益，接连着又是反右派的斗争，更摧毁了资本主义思想的残余，从而激起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觉悟，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情绪，产生了空前未有的大跃进的形势，这一系列的成就才使我从迷梦中觉悟过来：共产党是抱有远大眼光真心诚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尽管资本主义的政策(也能存在)，过去历史上上台的政党也能说些漂亮话，做些漂亮事，但当它的集团利益和人民利益冲突的时候，就会牺牲人民的利益，而为自己的集团利益打算。很明显共产党不是这样的党，我体会到共产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二者是分不开的，因之也不能有冲突；个别人，个别集团为了自己利益打算而和人民利益冲突，就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而毫不姑息。党的基础是建筑在广大人民而不是某个集团(利益之上的)。

党依靠群众运动使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地提高，也惟有共产党才能使绝大多数的群众抛弃狭窄的人生观而自觉自愿地建设社会主义。我有一个学生，他在入党时，曾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是一个小角色，不能和教授们较量，所以想加入共产党，在政治上抓权。"不过，在他申请入党后，不久就受到党的教育而完全改变了他初入党的动机。毛主席也讲过"有许多人在入党时曾抱有形形色色的不纯动机"，但是在党的教育

下，绝大多数人，就抛弃了原来的思想，而全心全意为人民为党为共产主义努力，以至可以毫不顾惜地牺牲生命。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绝不能做到这样。这也是促使我思想转变的重要关键。我在三反时曾骂过积极分子是"假积极"，骂过群众是"盲目"，这些全是罪恶的言行，我受到处分是理所应该。党对我百般的照顾，而我却辜负了党。〈我的〉思想转变也是曲折的，起先，我对社会风气的改变，还以为是群众被打怕了；不过单是"怕"并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长期地推行政策，历史上有很多纪律性很高(例如秦始皇的政策更能叫人"怕"但是却引起了天下大乱)的统治者，但是只有顺着历史发展的才能改变社会的风气，而且改变得也没有现在改变得迅速而彻底。几千年的习气会在十年的时期之内，得到基本改变，真是天翻地覆的改变(只恨自己受的反动影响太深，以致迟延不前，而落到今天这样的结果)；六亿人民根深蒂固的一穷二白，会在十年内得到基本的改变，而且在不断发展地前进，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能做到这一点吗？写到这里，不由人不想，歌颂共产党而愿意死心塌地的〈地〉跟着党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

我对党的政策起初是怀疑，认为不会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党，以后逐渐地感觉到共产党是"有一套"，可以使国家富强，不过仍是用旧的眼光来看，并没有体会到共产党和别的政党不同的基础(这也是导致我犯罪的基本原因之一)。及至社会上种种的发展，不断地摆在眼前，才开始有点新的认识，但还是将信将疑，很难相信有不为自己利益打算的政党。尽管有这么多的事实，但还不能相信，时时想用旧的方法来加以解释。我也不相信共产主义会在人类中实现，人怎会不各为自己的生活利益而引起战争呢？直至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动摇了旧的经济基础旧的思想基础之后，才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开始觉悟到人是可以改造的，才开始抛弃过去的唯心思想。尽管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过不止一次的斗争，但已逐渐地认识到过去思想的狭窄，过去思想的反动，才感觉到跟着共产党建设共产主义才是生活上最愉快的，也是最伟大的事业。我相信我的思想是在逐步地稳定下来。走社会主义大路不独是形势所迫，也是人生惟一的愉快大路。只希望党不断地教育使我还能尽一点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尽一点力。我现在准备这样做：将这次思想总结先汇报上去，请求党的指正和教育；然后订一个具体的改造规划，再请求党的帮助，然后照着党的指示照着改造的计划严格地走，这样可以加速自己的改造。这样的计划是否正确，也请党的指正。总之一句话，请求党指示。我下决心，必定照着党的指示执行。⑥

注释

①《一年的思想鉴定》，东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100－103页。

②同上181－184页。

③同上第101页。

④《思想鉴定》，同上第92－93页。

⑤《思想汇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5页。

⑥同上第2－14页。



18.以专长立功，向人民赎罪

脑电图机的起死回生，在青岛医学院引起了轰动，也在青岛医学界引起了轰动。这一年年底总结会上，张秉武代表院领导第一次表扬了束先生。让束先生发言时，他竟叹了口气说：纯属雕虫小技。



束星北档案

Shu Xingbei Dangan

束星北上班了，他是拄着拐杖来上班的。青岛医学院是他新的起点，也是他与过去诀别的分水岭，过去的他死去了，一个新的束星北活了下来。尽管做个"新人"的道路还很漫长曲折，可是他要走下去，不断地走下去。

张德华

（山东滨州医学院教授，20世纪60年代青岛医学院物理学教研组教师）：

严格地说，我只能算束先生的半个学生。1956年我考进山东大学物理系时，束先生早已经离开了物理系，离开了讲台。我和他的交往只是通过个人形式。因慕其大名，曾和几个同学到他家去过几次。那时候，形势颇为松动，大学里又出现了较浓的学术气氛。束先生的家又开始热闹起来。在我印象里，进出他家的人很多，多数是去请教问题或进行学术探讨的师生。以后，有人揭发说他在家里搞什么俱乐部，大概和这一段历史有关。他这人就这样，不管什么人，也不管什么时候，凡登门求教的，他一律满足。就是连一些很幼稚的问题也会得到他耐心的解答，人也总是和颜悦色的，与外界对他的传言大不相同。不过我还是领教过他很个性的一面，那是崔戎书记代表大学党委向他当众道歉之后，物理系、数学系的一些师生（好像还有海洋系的）纷纷到他家去慰问，说着说着就说到专业上，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时候，理工学院张院长和物理系刘主任也一同来看他来了。他也不问人家干什么来了，招呼了一下，便继续给我们讲，讲着讲着好像动了气，便对两个人挟枪带棒地说：今天学生提出的问题对你们两个也是个关键。别光忙活别的事了，你们怎么说也是做学问的，别光跟着那些人屁股后面跑（他所说的那些人是指学校的一些行政领导和支部书记李哲明）。院长和主任在我们眼里毕竟都是"大人物"哪。束先生竟当众让院长和主任下不来台，让我备感吃惊。

想必多数同学对他的性情早有所闻，大都见怪不怪，最关心的还是他什么时候能返回讲台，他对我们说快了。结果整风反右开始了，他尽管不是首当其冲，可坏名声却越弄越大。以后，山东大学迁到济南，我听说束先生被发配到月子口修水库去了。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青岛医学院物理教研组后的头一件事，就是接受管制监督束先生的任务。那时候我已是党员发展对象，大学党委林副书记和保卫科李科长为此专门给我和其他几个助教交待任务。他们说到束

先生时，面孔很是严峻，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监督的措施定得很具体：工作情况、劳动改造情况、与人接触情况，下班工余后的情况都要记录在案，还要按时汇报。这时候，外边对束先生的到来也传得沸沸扬扬的，好像医学院来了个多么大的妖孽。

束先生是拄着拐杖来校报到的，他和几年前我见的那个神采奕奕、侃侃而谈、高声大嗓的先生已判若两人。要不是保卫科李科长在前面引着，我无法相信站在面前的这个憔悴、浮肿、目光散淡的老人就是束星北。他头顶着蓝色带护耳的棉帽，双手支在拐上，背抵在墙上，好像不这样"夹"着，人随时就会倒下去。李科长当着物理教研组全体成员给他训话时，他就像个泥雕木塑。身子和眼睛好长时间也不动一下。只是他的腰背还直挺着(过去他那像军人一样笔直有力腰背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学府里的教授或学者，少有腰板这么直挺的)。印象中，他人已形同纸糊，轻轻飘飘的，好似一阵风就能吹跑。

最初，让他打扫教学楼的厕所和清洗实验室、化验室的玻璃器皿。有时也同我们一起到学校的农场去开荒种地。那个时候，灾荒和饥饿弄得人们无心也无力上课了。我们学校统共三千多师生，患浮肿、肝炎和肠胃炎的就两千多(还是校方统计)。很多系里的课已开不下去了。学校提出的口号是：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大力支援农业，劳逸结合。所谓的劳逸结合实际上多半时间是到外面找吃的。我们物理学教研组在青医不是"主力"，工作很是清闲，多半时间在学校的农场开荒种地。农具便是一台双人双铧犁。束先生那时还很虚弱，双人双铧犁他没法拉，只能干些下种栽秧浇水等轻活，即使干这些轻活他也时时地弯下腰来大口喘气、咳嗽，有时竟咳出血来。

他像个机器人，上面说什么他就干好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他刷过的试管、烧杯、注射器一定比新买的还要干净得多。有个时期，学生们开解剖课，他还被遣到太平间旁一间小房子里制作尸体标本。制作标本的活儿，学校员工没有做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到外面雇临时工来干。可束先生照样干得津津有味，一丝不苟。

平日里，他不与任何人讲话，也没有任何表情，开会学习(那时学校的政治学习也少了)他几乎一言不发。有时主任非得让他谈谈看法、认识，他要憋很长时间，确实觉得把话拿准了，才开口。①

李俊峰

(山东某大学物理系教授，20世纪60年代青岛医学院物理学教研组教师)：

有人称束先生离开月子口是脱离苦海，我不这么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到哪里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在青岛医学院，尽管他没有搬石头、抬黏土那样的重活了，但是他被改造被专政的性质没有变，他的身份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初到青岛医学院，特别是张立文院长给他调整生活费前，他的生活还是相当艰难的。那时

候，他简直就是个"乞丐"，不断地向亲戚朋友伸手，向左邻右舍伸手，甚至向保姆伸手。即使这样也难以维持生活，于是便变卖东西，家里能卖的东西大都在这个时候卖掉了。有一次他到青岛南山自由市场卖东西，被我发现了，我跟了过去。如果说那时我有监督他的任务，但那一次跟踪绝对是出于好奇。那时候，上面的口号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全面调整时期。中央在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错误的同时，提出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允许社员经营少数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城市，自由市场也半遮半掩地开放了，尽管上面没有规定，可是特殊时期，上边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灾荒时代的南山市场恐怕是青岛最热闹的地方，比起空空如也的国营商店，南山市场可谓是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但最多的还是可以果腹的各种农副产品和副食品。束先生那次带来的是一身西服，他用它换了大半袋子地瓜。

医学院也有些朋友暗暗地帮他。像寄生虫学专家马贤成就是其中之一。马贤成是3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享受着国家特殊津贴补助的著名专家。平日看不到他与束先生来往，有那么一两次，我发现他偷偷地往束星北的怀里塞东西。有一次，我走了过去，束先生慌得了不得，像是作弊的小学生被老师当场抓住一样，他几乎马上就将马贤成给他的东西交了出来，原来是一包饼干，两包香烟。我装作没看见就跑开了。

饥饿和管制让束先生失去了尊严，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学校的农场收地瓜时，他竟偷偷吃了一个。按说，所有收地瓜的人都在偷吃地瓜，这事对别人来说不算什么，可摊到他身上就不行了。第二天就开了他的批斗会，大家众口一词地责问他为什么偷地瓜，他支吾了半天，先是说，我没有偷，我是捡的。大家马上堵住他说，头一天收地瓜，哪来的捡？他只好照实说了：因为我的肚子饿。

最初，他甚至想离开医学院。原因主要还是政治压力太大，在医学院，全权负责改造和管制他的是保卫科李科长。李科长是那种做事极认真的人，他认准的事，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我记得束先生来之前，他就给我们说过，这个人是个"特务"，肃反让他滑脱了，可是历史早晚会证明我的结论。

肃反那年，他才18岁，就当了山东大学保卫科干事，和进驻大学的青岛市委八人肃反小组一同清理追查反革命分子。束先生内定为反革命重大嫌疑，他作为专案负责人，南上北下走了十几个城市进行调查。尽管没有抓住确凿的证据，却也不能说没有疑点，如束先生在国民党军令部曾同美国、英国情报人员有过接触，是什么样的接触，有没有间谍活动？再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请委"？尽管束先生一再解释说，与他们(美国、英国情报人员)接触的目的只是想获得研制雷达和其他军用产品的设备和有关电子元件，但李科长不相信。即使束先生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陈毅逼着摘掉后，肃反小组仍给留着尾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什么叫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明摆着是先下了结论的。因而，在李科长的眼里，束先生"特务"案件的水落石出，只是个时间问题。对这个结论，他从不避讳：他是个特务，表现得好无非是伪装得好，说明他很狡猾。以后束先生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市长和院长都开始召见他，甚至破格使用他的时候，李

科长也毫不含糊地坚持他的观点。

记得李科长与束先生第一次见面时曾说过：不是怨家不聚头。事情咋就这么巧。束先生在外面蹦跶了三四年，也没蹦出李科长的手心。那天我也在场，看得出来，束先生很怵李科长。李科长那张脸像是铁铸的，没有任何表情，目光里有一股子冷剌剌的寒气，他一旦盯上那些"四类分子"，眼睛好长时间都不眨一眨。那时，就凭他这一点功夫，就让我们很服气。其实，他的年龄不大，我估摸着跟束先生的大儿子差不多。但他稳重干练，学院的"四类分子"没有一个不怵他的。束先生犯到他手里，其情形可想而知，幸亏张书记和一些人对束先生还不错，想给他摘掉帽子，让他早早地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好为青岛医学院和青岛市做些贡献。每当"气候"好些的时候，李科长便会稍稍放束先生一码，可只要上面形势一紧，他马上就会铆足劲来修理他。

记得蒋介石叫嚷着反攻大陆的时候，李科长便将医学院的"四类分子"集合起来训话，他话虽然是对大家说的，可眼睛却盯着束先生：蒋介石就要反攻大陆了，你们是不是心里很高兴呀？听着这话，人家都在发愣，束先生却慌忙站起来申辩：我没有，我没有高兴。李科长便接上说：要是没事，那你紧张什么？束先生便越加慌乱，指着自己的心口，反复解释。这事以后被很多人作为笑谈。

束先生的处境直到年底才有了变化，那是因为他修好了院里一台沉睡多日的脑电图机，以专长立了功。为这事，院长张立文给他增加了生活费，还让他重登讲台，给青年教师辅导电动力学和统计学课程。不过据我所知，他的处境真正的变化还是在他检举揭发了一个叛国投敌的反革命分子之后。②

束星北在青岛医学院的"转折点"是1961年，这一年年底，他修复了医学院的一部损坏闲置了多日的脑电图机。这次机会是院长张立文给他的。有了这次机会就有了实现技术改造的开端，从此，束星北可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进行自我改造了，这也是他去月子口之前就开始期盼的。

张立文是青岛医学院第二任、第五任书记。他的红色履历填写着一个从河北蠡县走出来的农民步步向上的脚印：1937年他在河北蠡县青救会，县剧团任部长、团长，1939年任冀中抗日联合会工作团团长，1940年任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股长，1942年在冀中、冀东、热河省任县科长、秘书，而后便是主任、处长、秘书长、专员、市长，来医学院前是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张立文是那种对事与人达观而又平和的人，革命生涯并没妨碍他对文化与科学的融通与理解。从某种角度讲，他与华岗有些相似之处，医学院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大都能从他身上感到难得的宽容与温暖。

青岛医学院的前身是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附属于青岛国立山东大学。1951年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并后，仍为山东大学青岛医学院。1956年经国家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批准，独立出来，定名青岛医学院。50年代的青岛医学院曾有过辉煌的时期，它因拥有一大批全国一流专家而驰名国内外医学界。如解剖科教授沈福彭、生化科教授陈慎昭、药理科教授徐佐夏(兼)、病理科教授金泽忠、细菌科教授田浩泉、寄生虫科教授马贤成、外科教授冯雁忱、内科教授穆瑞

五……50年代初期，在全国的38所医学院校中，山东大学医学院有一定地位。③即使经历了院系调整和一系列运动之后，青岛医学院的人才和实力也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人才实力反而还有所充实，这不能不说是华岗和张立文的功劳。

张德华：

束先生是张立文力主接收的。据说在接收束先生时，他和其他几个院领导的分歧很大，党委多数成员都反对。可是他却说：我们共产党怕什么呢，我们连杜聿明这样的战犯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都能改造过来，难道还惧怕一个"右派"吗？（根据"文革"期间大字报的揭发材料。）这话口气和华岗非常相似。最终，束先生还是被接收下来。

青岛医学院的青年教师大都是在解放后的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从速成班里培养出来的），理论基础普遍薄弱，张立文便有意让束先生"出山"，给青年教师讲电动力学课。他征询了一圈意见，多数人认为，让"带帽右派"登台讲课不妥。只有我们物理教研组主任张秉武认为可以。于是张立文便拍了板。张书记的做法让很多人感到不解，认为他这样做是阶级阵线不清，敌我关系暧昧。张立文为此作了解释：什么叫改造？修水库、搬石头叫改造，发挥其专长，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是改造。

那个时候，张立文大胆起用束先生肯定要担很大的风险，但他了解束先生，认为他没问题。不过最初，束星北并没有给他"长脸"。失去了"爪牙"的束星北重返讲坛后，表现得很让人失望，他畏首畏尾，如履薄冰。一本教科书捧在手里读读念念的，不敢有一点自己的东西。结果他的电动力学课开课不到两个月，学生便从最初60多名下降到20名。这等于给很多人造成口实。束星北在月子口期间的表现人人皆知，很多人就是凭着月子口或山东大学反右期间的一些结论来看待他的，课讲得这样糟糕，等于印证了先前的结论。这个时候，张院长又提出让束先生来修脑电图机，很多人就认为不正常。

青岛医学院这台名为"皇帝"牌脑电图机是从丹麦引进的，全省仅有两台。60年代属世界医疗器械最为尖端的高科技产品。机器刚运到医学院附属医院时，领导曾让人专门为这台机器修了一道铁栅栏，并由专人保管。不是专门的技术人员只能像在动物园观看珍奇动物那样隔着栅栏看稀罕。因操作不当，这台娇贵的机器没用几次就出了毛病。负责机器的室主任，为此还背了一段黑锅，人事部门和保卫科把他和他科室成员里里外外查了一遍。以后多方联系找人维修，先是在青岛招贤纳士，结果找了几个所谓行家，竟连说明书也看不懂，马上又派人到省城里请了几个有关的工程师，他们看了看，也以从没有接触过为由，动也没敢动就走了。以后派人到天津、南京、上海请了专修医疗仪器的专家来，摆弄了一阵子也没修好。从此机器被蒙上白布判了"死刑"。到张立文提出让它起死回生时，这台机器已经躺了快两年了。

这事对束先生来说，无疑是个机会，可是主任张秉武让他接活时，竟被他一口拒绝了。显

然他感觉到了压力，不主要是技术压力，而是这台机器背后的压力。学校围绕着让不让束先生来修机器分歧很大，虽然张院长力主让束先生试一试，可反对的人却认为将这样一台机器交给右派是在冒险。万一反革命分子搞破坏怎么办？表面看上去，只是一台机器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思想两种意识的斗争。那时，有些人与张院长的矛盾已经很深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个姓华的军人出身的副书记。华书记自称是"光腚赤脚"的穷棒子(佃户)，他参军打仗的动机就是想吃饱饭。我记得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跑到食堂里去做掌勺师傅。他给师生打菜，完全根据其衣着面貌。若是面色红润，衣着干净利索的就给一小勺，若是面呈菜色，衣着褴褛就给一大勺。要是菜盆里还有几块肥肉的话，他一定要留给自己认为最贫穷的学生。

1958年医学院招生也开始按着"大跃进"的思路，一大批没有任何基础的学生草草地招进了医学院，结果造成医学院学习成绩、质量严重下滑。1962年全社会又开始"消肿"(消"大跃进"带来的"肿")，一批草草招上来的学生经过考试测验等程序给淘汰下来。与此同时，学院对新招学生提高了门槛，加强了质量和素质的比重。这时一个叫林晓青的女学生的名字提到了党委会上。林晓青的考分为全省第二，可是其伯父是山东大学右派教授。要不要？几个党委成员争执不下。最后张立文拍板接收下来：这样好的学生我们为什么不要。她伯父是她伯父，她是她。

华副书记认为：这个学院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了，一方面，学院在淘汰大批的人民群众的后代(被淘汰的大部分是农村的学生)，另一方面却为资产阶级右派子女大开绿灯。他毫不避讳地向外公开他与张书记的分歧：我们的医学院是谁的医学院，你们撵走的是什么人，招进来的是什么人；排斥的是什么人，依靠培养的是什么人？

两种思想两种意识都有代表性，且斗得难分难解。围绕着右派改造与使用，特别是围绕着束先生的改造使用，两路人马也是如此，因而当张书记提出让束先生来修这台机器时，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争议，也等于将束先生推到矛盾的风口上。

不过，束先生最终还是接受了任务。据说是张书记给他谈了一次话，促使他下了决心。

有一天(根据"文化大革命"揭发出来的材料)，束星北正在打扫行政楼的厕所，张立文来上厕所，与束星北擦肩而过时，碰了他一下说：到我办公室来。在院长办公室里，张立文给他讲了三条：一是不要绝望，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真理，也要相信自己。改造是必要的，但不要丢掉自己专业，那是自己吃饭的本领，也不要因"身份"的压力而畏首畏尾，旧业还要重操，技术工作还要做，你是个理论物理学家，但动手的能力也非常强，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不然就不会把医院的外国仪器交给你了，所以说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至于你个人一些问题，也要抱定信心，迟早会解决的；二是如果需要看什么书或查什么资料的话，可开出书单，交给我的司机大老刘来办，图书馆长是我的爱人，她会全力支持你的；三是经济上的困难组织上也很清楚，解决是迟早的事，目前可以由我个人先接济你一些。

这次谈话之后，束星北马上就进了脑电图室。头一天，他还是正常上下班，第二天，他干脆让张秉武给弄了张行军床住了进去，吃饭睡觉全在机器旁。那几天他因感冒引发了肺气肿，一咳嗽起来，就惊天动地的，好像不把肚子里器官给咳出来不算完。即使这样束先生也不离开



脑电图室。据说那台机器损坏得很厉害，先是修了一阵子没有修好，后来他干脆给它来个大卸八块：电子管、电阻、电容、真空管和五花花的电线，东一摊西一摊地摆了一地。许是怕人干扰，外面还拦了道绳子。很多人见此都有个感觉，别说修好了，照原样恢复起来就不错了。我相信为此提心吊胆的不只是张院长、张秉武，那些暗地里关心他的人都要为他捏一把汗。中间我给他送饭，见他躺在行军床上直喘粗气，一摸头竟发着烧。我劝他看大夫。他说，不修好了机器，哪里也不去。以后我才明白，他的确哪里也不敢去，万一闯进来个人，在哪里动一下，这罪过可就大了。

按常规理解，机器有毛病就找毛病，那里坏了就奔那里，所以一些人对他这种大卸八块的修理方法很不以为然，自然也就不放心。当然还有一些人是想看他的笑话。以后才知道，他之所以将那台仪器大卸八块，是因为仪器闲置时间太久，病症太多，如灰尘太多，需要清理，真空管烧了，需要更换，前线放大整流线路和半导体三极管也有故障。再就是他以前也没接触过这东西。

有一天我给他去送晚饭，他正躺在行军床上，一见我就说，机器装好了，让我开机试试。我还有些不放心，问他到底行不行。我担心这边一撳按钮，那个宝贝轰隆一声，青烟四起。他说，你就大胆地试吧，一个物理学家要是摆弄不了这么个玩艺，还叫什么物理学家。我撳下按扭，那个"宝贝"嗡的一声启动起来。

脑电图机的起死回生，在青岛医学院引起了轰动，也在青岛医学界引起了轰动。青岛的各大医院(也包括部队医院、外地一些医院)都慕名来请他做修理工，而他总能够"手到病除、起死回生"，一时束先生名声鹊起。这一年年底总结会上，张秉武代表院领导第一次表扬了束先生，让束先生发言时，他竟叹了口气说：纯属雕虫小技。

束先生的"雕虫小技"，折服了一些人，连华副书记也称：看不出，这伙计还真有两下子。张立文说：岂止是两下子。

顺便说一下，束先生他在修理仪器时，还顺手进行了一个小小的改革。他发现引进的脑电图机的真空管太容易烧坏，原因是电压过高所致，于是他便用电池降低灯丝电压(由12V降到10V)，这一小小的改革，不但解决了真空管易烧坏的问题，还大大地延长了真空管的使用寿命，而延长了真空管的使用寿命，也等于延长了脑电图机的寿命(当时医院引进的脑电图机普遍的故障大都是因为真空管易燃易损)。④

注释

①张德华采访录，1997年5月2日。

②李俊峰采访录，1997年5月3日。

③据青岛医学院院志1996年版第4页。

④张德华采访录，1997年5月2日。



19.“只有依靠组织才有我的出路”

这时，我脑子里闪出的是“叛国投敌”，这个词一出现，脑袋立时就大了许多。我从父亲嘀嘀咕咕的声音里听得出，那个动员他出逃的人自称是他的学生，不知道他用什么打动了父亲。



束星北档案

Shu Xing Bei Dang An

束星北开始盘算着“摘帽”了。

“皇帝”牌脑电图机的起死回生，给束星北带来依靠技术改造的信心，紧接着学校通知他减免清理厕所和打扫校园等一些劳动改造，专心备课辅导医学院青年教师。

束星北开始感到希望的大门正在缓缓地开启。他知道这一切首先来自张立文书记，更主要是来自于上面。

1962年吃尽大跃进苦头的中国进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短暂的“休养生息”期。这一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点自我批评，强调了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朱德也在预备会议上诉说心曲：“这几年的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这次会议，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下通了气，我很满意。”2月8日陈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低估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稿”中，对所犯错误作了些分析：“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及时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①

“八字方针”尽管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和“大跃进”的前提下施行的“权宜之计”（毛泽东虽然同意“八字方针”，却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想从指导思想上纠“左”和退却的主张，有明显的分歧），但它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它至少让一部分上层领导冷静下来，较为平和真实地面对这个被各种运动整治得疲惫不堪的国家。经济调整或退却自然也旁及到其他领域。

这年春节刚过，主持国防科研建设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由全国部分科学家参加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会议”。8个月前，即1961年6月30日，聂荣臻曾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未向外界披露过的报告：《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首次触及“红与专运动”以来的知识界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正是这份报告，才有了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批示中特别

强调了"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重要"。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的作风必须坚决纠正。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人，要进行甄别平反。②聂荣臻的报告，无疑是1961年要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先声。

9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又称《高教十六条》)。条例中多处涉及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必须"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提高学术水平"等等。③

1962年2月16日开幕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会议"，连同3月2日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周恩来、陈毅等人为知识分子大声放言。周恩来3月2日下午向科学家们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讲到的"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就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到劳动者之中"④等话语，几乎就是六年前《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讲话的翻版。六年前已经表述过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话语，六年后再说一遍，意味着勇气与胆量，但话语的背景和时代氛围已经完全不同了。

3月6日，在同一会上，陈毅以他的豪放、坦诚和胆魄，为1962年尖锐触及知识分子问题的"广州会议"，书写了令人动容的篇章：

如果对立的形势现在不改变，那我们共产党就很蠢了；人家住房、吃饭、穿衣什么都给包下来，包下来又整人家，得罪人家，不是很蠢吗？反动统治阶级，还高明一点。科学家、知识分子的吃饭问题他不管，工作也不管，什么都不管。他也不一定强迫人家搞思想改造，他跟科学家、知识分子和平共处。而我们有些同志的搞法打击面太大，得罪的人又太多，伤了人家的心。使得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的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笑声)。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有些人是两三年不知肉味，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其实，1949年解放的时候，有些人不到台湾，不跑香港，就是不错的……科学家、知识分子是很难得的，使他们消了这口气，使他们出一口气，松了一口气。肯定地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估计。这里面也牵涉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说十二年的改造，一点成绩也没有，他们全部都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也不能交代。这等于说我们共产党十二年来的领导是不行的，等于自己宣布自己的破产——共产党你有什么本事呀？⑤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紧跟其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的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⑥

从各种渠道里吹出的风，让人感到温暖和希望，也给人以无尽的联想：既然上面承认以前斗争是扩大化了，对"反右倾"等运动中批错了的可以平反了，甚至"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了"，那么在"反右派运动"中戴上"帽子"的右派呢？很多人也包括党内的一些人士开始向中央统战部提出了这个敏感的问题：错划右派甚多，也应予甄别、平反。1962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示中，严肃地批判了统战工作中"宁左勿右"的思想，它使得更多的人感觉到春意融融的信息：

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种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滋长了骄傲自满，"宁左勿右"的思想，这对于党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必须坚决纠正。当前，为了保证顺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⑦

深负"三座大山"的束星北开始掂量自上而下的信息分量，他小心翼翼地向张立文院长提出了"摘帽"申请。他第一次提出申请的时间大约在1962年的春天。

1961年9月，当张立文决定让他"出山"，重新执掌教鞭时，他开始提出（口头的、书面的）"摘帽"申请。起初他还不敢张扬，不敢越级，只是向青岛医学院物理学教研组主任张秉武申请，有时，保卫科李科长找他训话时，也捎带着说说。但是他对此并不抱多大希望，只当是必做的功课。可是这一次不同了，他感到了形势的变化。也就是这个时候（1962年春天），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青岛一个有海外背景的"反革命叛国集团组织"瞄上了他，他的一个学生（或者自称他学生的人）动员他出逃国外。这个发生在60年代的几近神话的故事，一下子将束星北推上了命运的十字路口。经过思想斗争，束星北终于选择了组织和祖国。从束星北的改造经历来看，这个时期和这一事件成为他思想改造和立场转变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的改造生涯变得单纯了。

束义新：

那是1962年的初春（大约是2月初吧），天仍阴潮寒冷。我记得那天落了雪，身着黑棉衣的父亲很晚才回来，他的样子很奇怪，惶惶悚悚，丢了魂似的。在客厅里转了两圈，身上的积雪也不扫一下，便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母亲重新热了饭菜叫他出来吃，也叫不应。

我觉得蹊跷，平日回来，他总是和我们说说笑笑的。他从不将压力和痛苦带回家里来。可是这一天，他的惆惶和惊恐全写在脸上，好像给人家拿着枪追到家里来似的。家人都觉得气氛不对，上床之前又喊了他几声，仍没有动静。我们只好睡下了。可是我有心事，睡不着，便悄悄地搬了椅子到他房间门口，从上凉窗上往里看，发现父亲的房里真是"云山雾罩"了，可他仍在不断地抽烟。他的两眼呆呆滞滞地望着前方。这情景常有，他在思考事情或课题时都是这样的神情。可是这回有明显不同。思考事情的时候，他眼神给人的感觉是散淡的，干涩的，很像是丢在海滩上的死鱼一样的眼睛，在外人看来这双死鱼一样的眼睛会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其实这个时候，正是他大脑皮层活跃最为旺盛的时候。可这个晚上，他的赤红灼热的眼睛却是凝聚在一个看不见的点上，好像要看破什么似的。我想试着喊应他，可又不知喊应他干什么，只好又回到床上。因脑袋里挑着一个事，翻来覆去好长时间睡不着，等脑子里一片朦胧了，房子里有了动静。父亲被打成"极右"，我们家就从鱼山路教授楼搬到合江路的一个小套二的房间里，兄弟五个正好塞进北向的一间小卧室里。我听见父亲在悄声地叫大哥。两人来到客厅后，便开始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大哥虽然受到父亲的株连被"黑"了下来，可是在我们的眼里，在父亲的眼里，他仍然是个军官，是个政治素养很高的转业军人，家里无论什么事，只要牵涉到政治或选择的事，都要大哥来拿主意。父亲在连连受挫，方向感和自信都逐渐丧失后(特别是从月子口回来后)，有关政治的事，多数都要听大哥的。

大约凌晨两点，正是城市熟睡的时候，两个人的嘀咕声越来越急。听得出来，父亲和大哥都很激动，他们的声音也因极力压抑收敛而越加清晰。我渐渐地听出个子丑寅卯，原来有人要策划父亲出逃。几天前，父亲就说有人跟踪他，家人还没当回事，以为是上面专门为父亲配备的"尾巴"。显然父亲说的跟踪他的人，不是专门监督他的"尾巴"。

这时，我脑子里闪出的是"叛国投敌"，这个词一出现，脑袋立时就大了许多。我那时已是青岛玛钢厂的工人，"叛国投敌"是怎么回事，是非常清楚的。我从父亲嘀嘀咕咕的声音里听得出，那个动员他出逃的人自称是他的学生，这个学生似乎对父亲是非常了解的，不知道他用什么打动了父亲，不然父亲也就不会如此紧张如此反常了。

父亲绝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毫不犹豫地斥责了那个引诱他出逃的反革命学生，义无反顾地检举了那个投敌叛国分子。相反，最初他是有意出走的。在医学院，他的处境虽然有所变化，却没有根本变化。尽管他做了一些工作，开始受到张立文院长的赏识，走上了课堂，但在多数人(领导)眼里，他只不过是个戴枷立功的罪犯。到这一年(1962年)他的三顶帽子(三年管制分子、反革命分子、极右派分子)一顶也没有摘掉。他的周身环境和改造氛围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尽管表面上他是教师了，可是反革命和右派的待遇，他一样也不少，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有关部门马上就要把捆在他身上的小绳紧上一紧。再说，这一年，父亲已过半百，对一个科学家和教育家来说，眼看着岁月在身边无情地流失是最痛苦的事情。我听他说过多次(有时是自言自语，有时是对来看他的朋友说)：要是有这么



一个地方，最好是靠海的地方，没有会议，没有斗争，也没有这么多的莫名其妙的麻烦事。带上几个学生，安安静静地搞项目搞研究，也可以按着大学或国家的要求进行研究。到时候按着要求上交成果就行了，该多好。这是他的梦想，多年的梦想，可是对他而言，这个梦想恐怕永远都是个梦想。当然这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他到底都想了些什么，恐怕没人猜得到。

我相信父亲一定是被他的那个"学生"说动了心，因为他是在自己的思维陷入绝境时才想到找大哥的。据父亲讲，那个"学生"早已与海外取得了联系，出逃线路与海上的接应船只都准备好了，万无一失。可是父亲却作不出选择，这恐怕是"出逃"或"叛国投敌"与已经下决心重新做人的决心发生了冲突，也可能，他对能否走得脱还拿不准。

实际上，到后来，大哥与父亲的谈话变成了家庭讨论会。我、四哥、三哥都来到客厅。不过我们只是紧张万分地看着大哥和父亲。最后还是大哥的分析击垮了父亲。我大体记得大哥说的几个"如果"：如果出逃成功的话，会怎么样？难道这个家不会遭到株连吗？如果出逃不成功呢，一旦被抓住将是什么罪行？谁能够保证出逃的线路和海上接应的安全呢？谁能保证在那些出逃的线路上，是不是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最后分析到那个学生身上。如果那个学生是上面派来的诱他入瓮的"托"怎么办？为什么这事早不出，晚不出，单等到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时才出。再说，那个学生可靠吗？这些年，人早就变得面目全非，还有谁可以相信？

父亲的"出逃之梦"，很快就瓦解了。凌晨父亲由大哥引着出门了。就在父亲出门的那一刻，我感觉到父亲一个晚上就变成老人了。他有些脱相，眼睛肿成一条线，乱草般的头发和胡子粘在了一起，走路时，身子晃得厉害，背好像也驼了(以前他的腰板总是挺得跟军人一样，即使自尊被摧残得不像样子的时候也是如此)。大哥的警惕性自然比父亲高得多，想得也多，出门时他又折回来，到厨房摸了把菜刀，装进挎在肩上的黄书包里。他们径直来到青岛医学院保卫科，告发了那个企图拉拢父亲叛国投敌的反革命分子。据人讲，学校保卫科的领导听了揭发后，立刻就报告了青岛市公安局，并和公安局一起破获这一年最大的一宗反革命投敌叛国集团案。而父亲也因此受到青岛医学院的表扬。⑧

这次变故(或精神出轨)，让束星北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依靠组织，才能有光明前途。这也是他惟一的选择和原则。原则是什么，原则是个房间，你只能在这个房间里走动或寻找"自由"。意识到这一点后，束星北开始调整自己的改造方式，他的改造以往都是被动的，人家说什么，他干什么(当然也没有主动的机会和条件)。这次变故之后，他开始改变了被动改造方式：以往一般情况下，都是上面拨一拨，他转一转，现在他采取了积极主动的策略，定期地向物理组、保卫科、党总支汇报自己的思想改造情况，并要求人家给予思想改造方面的指导，特别是在政治学习或时事学习中遇到解不开的疙瘩(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自己思想意识观念落后陈旧造成的)，也不再闷在肚子里，而是主动找领导去咨询，

有时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获得满意的解答。

5月份，张立文让张秉武通知束星北写一份"摘帽"申请。这无疑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束星北意识到"摘帽"有望了。

束星北的技术改造和主动的思想改造逐渐取得了成果，他的生活费由每月20元增加到82元。这在青岛医学院右派中，属调整幅度最大的。中央对于右派分子的生活待遇标准分三个档次：一是根据职务和级别，给相应的生活补助；二是对于家庭生活条件尚可的给予基本生活费；三是对于个别生活上确有困难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适当的临时补助。束星北只能卡在个别生活确有困难的这一档上。按以往惯例，这类的补助费最高为60元。可张立文将束星北作为特例，生活费突破了上限。其后不久，学校又减免了他打扫厕所、清理化验室等清洁卫生的劳动，安排他参加院里的重点科学项目：经络本质研究，还将有关经络研究的内部资料给他参考阅读(在此之前，除去毛主席著作、有关反右的政治材料和报纸外，所有的书籍和资料都对他封闭)。尽管"经络本质研究"，他并未接触过，似也不通，但这种安排是组织上对他的态度。他开始感觉到信心，"生命"又开始在他的身体有了流动。

……

(四)自今年初减免了束打扫厕所等清洁卫生劳动，通知他参加我院重点科研项目——研究经络本质——并给以看有关内部资料(1962年3月)以来，在组内开始看到他有说有笑了，在给教师及业大学学员上课时，常常带病坚持上课，拄着拐来，坐着讲。虽然教学效果仍有反映不佳(药学系)，但他却确实作(做)了多次改进。与此同时，他耐心给生化、生理学教研组修好了一些大件仪器如光电比色计，示波器等，审阅了部队用〈的〉高等数学教材。

……

(六)束不断地在书面上，在口头上表示急于请求摘掉右派帽子。理由之一是：摘掉右派帽子，在教师培养提高方面，可以起的作用更大些，这样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在今年3月份以前，他的确对跟其听电动力学课的青年教师要求不高不严。当告诉了他："严肃地对待工作与否，是对你一个重要考核；不要顾虑别人向领导上讲你的坏话，因为领导不会只听片面之词。歪曲地反映情况者，只能显示出他本人的缺点而已。""(应)该主动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管摘掉右派帽子与否都该这样。这才是正确的态度"等之后，他才逐渐〈对自己〉要求从严起来，不断地督促(学生)完成作业，经常蕴〈酝〉酿着"考期"，并在教研组会上，公开批评不慎重制定学习计划、自我要求不高的现象。

……

(八)他给教师答疑时，有问则答，来者不拒，非物理专业的问题，他也要过书来准备

一番再认真答(如物理化学、生物电类问题)。答时耐心，一遍不懂可讲好几遍，一个方法不行，换个方法。去年以前，他回答问题时，只是就题答题，近来则注意到"从根本上"而非就"枝节"上来解决问题。有时他给刘世安先生讲完了以后，再叫刘先生讲给他听听，还指导学习方法：一定要算题，一本书的绪论最好背一背等。

(九)……

与会抽烟的人有了交换烟的现象，对教辅问题也不厌其烦。工人及青年教师开始叫他"老头"了。修理仪器时也带教辅导。对青年教师指指点点、画画讲讲。在给青年教师备实验课时，偶而瞥见操作不当，也立即纠正。与此同时，也就有了某些同志觉得他"随便"了。

…… ……

(十一)起初他是不爱留在医学院的，虽然他不做声，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心里却盘算着离开，可是最近他改变了。)因为最近他说：……我已向党委讲过，我最近不打算离开医学院，因为对生物电问题已开了头，要把它搞到一段落再说。他提出下学期要修好一至两台脑电(图)机的计划。⑨

注释

①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②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③同上。

④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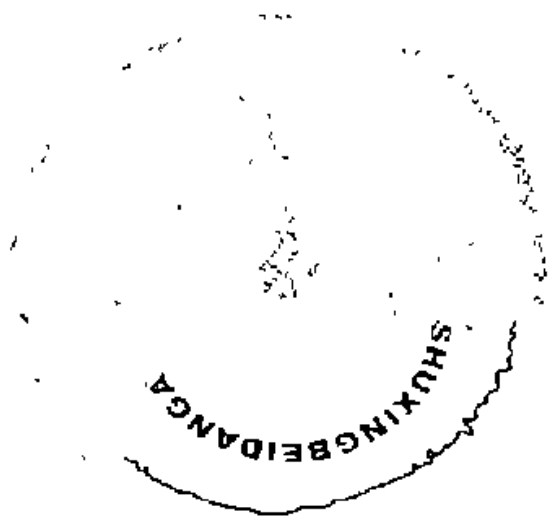
⑤陈毅1962年3月6日"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报告"，同上。

⑥同上。

⑦同上。

⑧束义新采访录，1997年6月22日。

⑨关于《右派分子束星北一年来被监督劳动情况》的汇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23－26页。



20. 还是立场问题

苦海泅渡，千难万险大风大浪终于挺了过来，人眼看着就爬上海岸了，可突然又被抛到原地，先是让他停止写书，紧跟着又恢复了每周两次的"四类分子"的集中政治学习。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束星北，感到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要当老师，给医学院的年轻教师辅导物理、数学等基础课程；为了适应医学院的需要，他要调整自己的专业方向，并加强新专业的科学训练：“由于我的专业‘理论物理学’在目前不适应国家的需要(但仍准备写成几本书，见后)，到医学院后，耳濡目染地学了一些医学和生理知识，感觉到物理数学对医学生物学在将来发展上的重要性，去年起商得党委同意，将今后的科研方向转向医药生物。因此本年来读了一些有关生物学和生理学的书籍，为将来的科学研究搞一点基础，同时也鼓励本组人员学习有关生理知识，〈这样〉能使本教研组具有数理的特点。另外，由于‘统计学’对我国将来的医药生物学的发展有重大的作用，而该门课程在我国还是个‘冷门’，遍查有关文献，中文的只有二三本，且亦不全面，因此本学期进行学习，同时，也鼓励本教研组特别是张主任结合着学习，为六年制‘数学课’填补‘空白点’。暑期中准备再加强学习，使〈自己〉更好地掌握统计学的理论问题。”①

因修复了脑电图仪，他的“修理技能”名声大噪，青岛以及外地的一些医院纷纷慕名而来。“修理师傅”的活计也要牵扯不少精力。

他还要写书：“根据党的方针，我陆续将平生有关的学习心得和科研成绩及教学经验写成书本，现已初步补充了过去有关相对论的稿子，增添了理论物理鸟瞰一篇，共约二十余万字，现正在补充修改，请人誊写，暑假后即可完工，向党初步献礼。”②与此同时，考虑到社会主义建设和广大群众更需要普及性的物理学与电工学丛书，他开始着手进行一个庞大的著书计划：

想起自己在建设繁荣富强祖国中应尽也能尽、但迄今没有尽的责任，恨不能立即把我的所有的可能知识一齐贡献出来，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为迅速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贡献〈出〉我的一切，同时也弥补过去对人民的欠债。眼前有很多的事可以做也应该做，例如怎样把已有的物理知识传授给新生的一代，使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能发挥更大的力量；怎样从事科学研究，使过去的知识能充实起来，能实际应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服务。

我幸运地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解放社会里，生在这个旋转乾坤改造人类的伟大的毛

泽东时代，再不努力地干一下，死也难瞑目。但是要做的事太多了，时间又是有限的，条件也是有限的，先做那〈哪〉几样，后做那〈哪〉几样的轻重缓急问题就一时搞不清。党的指示"先出书"，解决了问题。这样有几个优越点：第一，写书的范围牵涉面比较狭些，共用几百本参考书和纸张就可以干起来；第二，写书对知识的传播比教学又广泛些，可以传给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能够写得好，所产生的效力并不比教书差，而且可以提供参考，比在讲堂上只讲一遍更可以深入些，其中主要的关键在"写得好"，多举例子，多搜习题，做到清晰而又全面照顾，则可以比教科书更有适应性，〈可〉成为教学及参考的两用书本。第三，在写书时必然要参考许多文献，这样既可以提高本人的知识水平和实际应用水平……而且也可能做出新的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进一步的贡献。这样写的书就具有教学、研究相结合的优越性，有理论与实际相互结合的特点，所以党对我写书的指示是目前最全面的指示。

其次的问题是写什么书。起初想写两部书：一部是理论物理丛书，另一部是电工丛书，但时间和精力是究〈毕〉竟是有限的，每部总有几百万字，在缓急的方面又要有全面的安排，这里也费了一段时间的考虑和比较，最后服从于总路线的精神，先写电工丛书。列宁也曾教导过我们以全民电气化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列宁的伟大思想：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这就是说，电气化是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迫切任务，而我对电工理论方面又有一些基础，再加上参考现代文献，则可能写出一部好的全面的电气〈工〉书来，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一点力量……

照目前的条件看来，平铺直叙的〈地〉写书则每天可写两千字，精简短悍的〈地〉〈写〉书每天只有一千字，遇到要研究结合的内容则每天也只有一千字左右。假使能每日十五六小时的写〈作〉，则每天的成果可以两倍于上述的进展。预计电工丛书共约五六百万字，那么照最快的速度还需四五年之久，所以要改变一些原定计划，有这样两个意见：1.对已经出版的特别是有很好水平的书籍，而我对这些书的内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解的从略。〈或〉只是精简地概括一下，列出书名和杂志名称，让读者自己翻查。不过这样对系统的完整性稍有缺陷，不能成为百科全书。2.除去第一卷〈约一百余万字〉之外，则请别人协助，几个人共同合作，这样可能在二三年内就能完成任务，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时还准备抽调时间写理论物理小册〈子〉，并且，在可能〈的〉范围内作一点科学研究工作。希望党的指示……③

为了向党和人民"赎罪"，为了尽快实现"摘帽"，也为追讨损失的时间，束星北恨不能分解出无数个人来。对时间报复性的使用，以至使他有时竟乱了方寸："……一会儿搞理论物理，一会儿搞数学，一会儿搞生理学、细胞学，一会儿搞遗传学，总觉得学问无限，恨不能一起学完，因此，〈常〉半夜起来学，医生坚嘱夜间吃安眠药，好好儿睡觉，也不完全遵守，也因此〈可能〉经常引起头疼头昏甚至高血压昏迷的现象……"④



对整个改造生涯而言，那一段短暂而又充实的日子，束星北不仅自己"成果"累累，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青岛医学院物理教研组也形成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学术空气和研究氛围。

张德华：

用今天的话来说，那个时期我们物理教研组的科研和学术氛围可称为一种现象。那时，大饥荒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失，副食品供应也很匮乏，高等学校还在没完没了地讨论"红与专"的问题。师生都在那里讨论"红与专"，也就说明，政治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可是我们物理教研组却大步地走上了"白专"道路。我们小组加主任一共七个人，除束先生和张秉武主任，其他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助教。我们在束先生的影响下，都开始野心勃勃地搞起科学研究。我记得我们组一个姓万的年轻助教，大概是从一本科普杂志上读到一篇永动机的发明假设，竟疯狂地迷上了永动机的发明创造。他经常抱着一堆似乎谁也看不懂的论文和图纸来找束先生讨论。再一个就是主任张秉武。张秉武最崇拜的科学家是牛顿和爱因斯坦，幻想着一夜之间，功成名就，便开始将自己的方向对准了世界最前沿的物理课题。张秉武虽然好学好问，可他的学历太浅(他只在山东师范学校读了两年书。那两年的学期里，真正读书的时间恐怕一年也不到，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政治学习和下乡助农中度过)。束先生认为他连普通的大学物理基础都还不具备，因而，搞前沿课题研究纯属是在不着边际地浪费时间，可是张秉武认为只要努力就会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因而有一个时期，他也不知从哪本杂志里看到一个新物理名词：光气子，便迷醉到"光气子"的研究里，不断地在那里"假设"，写出一堆堆的公式或研究思路让束先生指点。有一天，他又将新发现的"路径"演算给束先生看时，束先生竟将他的一摞"心血"撕了个粉碎：你怎么也不想想你自己的基础，为什么非得把时间搭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上，简直是狗屁不通！在此之前，我们从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我们甚至也不相信他会发火。在场所有人都呆住了，显然束先生也给自己吓住了。他意识到自己走火时，便向张秉武道歉：我这是怎么啦，我这是怎么啦？

好在大家都没拿这事做文章，张秉武和那个姓万的助教也因此开始务实了。此后，束先生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为我们制定了一个基础补习计划，为我们补了近一年的基础数学物理和统计学的课。

我认为，我们这批先天不足的人，真正的学问底子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时候，我们和束先生的关系已经十分融洽了，特别是张秉武好像就离不开他了。我们开口闭口称先生、老师。弄得束先生有时不得不提醒我们：你们不能称我先生、老师，这样久了会让我忘掉自己右派的身份，对我的改造不利。可我们依然以先生、老师相称。⑤

这个时期，束星北须不断地提醒自己，告诫自己，头上的三顶"帽子"一顶也没有少。

否则就会造成错觉，造成和别人一样的感觉。进而就会让人感到他与正常人平起平坐了，言谈举止随便了、出格了，甚至又超出常人了。他确实让人感觉到超出常人了。因为这期间，他总是不断地得到组里、院里领导的表扬和关心，也不时地得到嘉奖(奖品不外乎是一枝钢笔或一个笔记本)。甚至年终全院的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他也破天荒地得到院领导的表扬和物质奖励，奖品尽管只有一本毛主席著作，一个保温瓶，但它的意义却是很大的。谁也不能否认这不是一次对他改造的肯定，不是对他将要摘帽的铺垫。更重要的是，年终受到表扬和奖励的积极分子中，只有他一个右派分子，其他的都是党团员。这样的待遇恐怕在青岛也是绝无仅有的个例。奖评大会不久后，张敬焘市长专程到青岛医学院物理教研组看望了他。

张德华：

老一代的市民的心目中，青岛有两个爱民如子的父母官，一个是40年代的沈鸿烈市长，另一个就是张敬焘了。沈鸿烈在青岛为官时做了不少好事，人们记得较牢的就是修建了一些澡堂、影剧院和有名的青岛八大院(八大院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点像专门安置特困户的安居工程)。八大院着实让几代同堂挤得喘不动气的百姓刻骨铭心地记住了这个国民党市长。当然更多的人记住的是他独特的生活做派和一些体察体恤民情的生活小节。他常常独自一个人到最贫困的大杂院去溜达，礼拜天休息到港务局同码头工人摔跤，也是他的一大爱好。这样既体察了民情民心，也赢得了市民的爱戴。张敬焘在青岛为官时间不长，给青岛城市留下的东西不多。那是个崇尚简朴的时代，城市难得发展。但是市民还是记住了他。他们记住的是他专门在政府设立的接待民众办公室，每周四、周六下午，凡是有事情的市民尽可以到这里来和市长交心。如果你排不上号，也可以利用晚饭的时间到市长家里，趁他吃饭的工夫，递交你的状子反映你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吃饭，尽可以和市长同桌共餐，一点也用不着客气。张敬焘不光是在家里和接待室里了解民情解决问题的。他的礼拜天或节假日基本上都是在市民家中度过的。

那天下午，我们正开会学习，张市长在张书记的陪同下，来到医学院物理教研组，问候了我们后，两个人便约上束先生到办公室谈话。听说张市长、张书记和束先生一直谈到深夜，晚饭也是在办公室吃的。

尽管那个时候，很多人对束先生的印象已发生了变化，但市长、书记亲自来看望一个右派分子的事还是成了医学院一大新闻，私下里，什么样的议论都有。当然这丝毫不能影响上面对束先生的关照与重视，几天后，张书记就让束先生给市长写报告。于是我们知道，市长要为束先生成立专门研究机构，研究世界先进的高科技医疗仪器产品，市长对研制医疗仪器很有兴趣。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自从市长看过他后，束先生简直高兴得要手舞足蹈了。我们那时已经知道，他的"摘帽"申请报告，早已顺利地通过了医学院和青岛市并上报到山东省。显然市长看他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从心情上看，他已经抑制不住"摘帽"的喜悦心情了。他不断地说：等我摘了帽，要大摆宴席，将所有的帮助过我的人，全部请到我的家里。我家房子小，摆一天，当然不行，我要连续摆上三天宴席。我算过了，对我帮助、改造，监督有功的朋友、领导、同事加起来一共三十多人，我当然要一一请到，并让每个人都要喝上我亲自酿制的米酒。当时，教研组所有的人都不会怀疑，如果医学院有一个"摘帽"名额的话，那一定就是束先生。可是天不遂愿，青岛医学院60年代第一批"摘帽"右派的名单中，偏偏就没有束先生。

"摘帽"大会是在青岛医学院职工俱乐部召开的。那天，束先生是拄着拐杖去的。"摘帽"大会我没有参加，其中的事是以后听说的。我听说，当院领导当场宣布了四个"摘帽"名额后，束先生便站了起来，好像非要听到领导宣布第五个名额不可。直到会场的人全都走光了，他还痴痴地站在那里。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偏偏没有束先生的名字？按照贡献和改造成效，医学院没有任何人能够与束先生比。以后我们才知道，他的"帽子"，掐在中央十人肃反小组的手里，连山东省也做不了主。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上面的"风向"又转了。在这之前，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多次专门强调了阶级和阶级矛盾。他认为，前一段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是阶级斗争日益严重的表现。因而，他开始重申阶级斗争。这样一来，形势又吃紧了。痴痴地站在那里的束先生肯定想不到这些。我还听说，那天他站着站着，那个木柄手杖突然断了。⑥

突然间，一切又恢复了原状，先是让他停止写书(物理丛书与电工丛书)，紧跟着又恢复了每周两次的"四类分子"的集中政治学习(这样的会议主要是要"四类分子"之间相互揭发批判。在这之前，"四类分子"的集中学习虽没取消，却成了不定期，有时束星北也可以借故不参加)。没过几天，医学院人事部门和保卫科便成立了医学院、合江路街道办事处和束星北家庭的三级联合监改小组，并根据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指示，加强落实了对束星北的改造措施，召开了束的家庭会议，争取了其家属子女协同"监改小组经常对其教育帮助。组织和指定他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时事政策"。⑦束星北监改小组的监改内容丰富而具体，通常情况下，对他的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工作表现、思想情况、情绪变化、外出请假制度等等都有要求。也就是说，束星北的一切行动和思想意识都要由监改小组来负责、控制、监管。在医学院，束星北的工作和行动由学院的有关部门来负责，回到家里，束星北学习或思想情况则由街道办事处和家庭负责。这样的多层次、全方位管理方法确有奇效，它既可以了解掌握束星北在单位的思想动态与表现，又能够掌握束星北在家庭或社会的思想和表现。⑧

没有首批"摘帽"，对束星北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想不通。之前，他曾专门找过张立文书记，书记肯定地告诉他：材料都报上去了，摘帽已是指日可待。

苦海泅渡，千难万险大风大浪终于挺了过来，人眼看着就爬上海岸了，可突然又被抛到原地。

星期六上午听了宣布摘帽子的名单之后，起初是有些难受，情绪上也有些波动，经王部长的启发教育以及贾书记的报告后，夜间再回想自己前一段的思想改造情况，觉得组织上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大公无私的。第二天早晨先请家中人提出意见，再诚恳地到教研组征求意见，找到张主任、周述志老师、周义雄老师、晓阳同志，徐兆兰同志和盛文美老师，请求他们帮助我改造思想，尽管他们当时很忙，大约由于我的诚恳，他们也谈了许多，对我有不少的启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思想方法问题。我的主观想法往往不符合客观的事实。自己的想法仍是不客观、不现实、唯心的，经常将事物和事实看错了，对事和对人有了错误的成见；解放前如此，解放后如此，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直到鸣放、反右仍是如此；加上过高地估计自己，固执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自己就堕落了。这几年来，我懂了一条：跟着党走，听党的话，这样，许多事情是做好了，但做得仍不够，听别人揭出自己的缺点，提出意见后常不是虚心检查而是想找理由解释，堵住别人的口；听别人夸奖自己时就沾沾自喜，而不是虚心检查这种夸奖是否符合实际及其实际的目的，遇到失意的事，常会情绪波动，有时感觉到在山东搞臭了，想换个地方，遇到得意的事，就志〈趾〉高气扬，认不识〈清〉自己，忘记了自己曾经对人民犯过了大罪；至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思想，在某些问题上至少仍然思想不合于客观的规律。

…… ……⑨

“思想方法问题”到了人事处、保卫科等有关部门后，就升级了。主管束星北改造的领导政治水平显然要远远高于束星北的同事或“学生”，他们在帮他分析根源时，一针见血提到了立场。

“立场问题”很是让束星北感到憋屈，他在以后的检讨书中以攻为守，对自己的立场问题加以解释：大胆地揭发检举了要伙同他叛国的反革命分子，是不是立场的转变；看到有人随便浪费公家东西，如不正当使用医疗仪器，致使损坏，就感到心痛，是不是立场的转变，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向中国挑衅或侵犯一些正义的弱小国家就义愤填膺，是不是立场的转变，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等问题上，惟恐中国吃亏，不惜冒着风险进行“政治参与”，这算不算立场转变。从揭发的材料上来看，束星北的“立场”和“思想”也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上的：

①我们国家现在只红不专〈他说是理论上虽然强，但科学技术上、〈经济〉建设上都不行〉，很需要帮助。现在与苏联闹翻了，他不管我们了，结果我们的建设慢了，生活水平提高得慢了。这样闹翻了与人民的利益是否相符？

②美国见苏联与我们分裂了，万一使用了核武器，我们就要吃大亏了。从这点来讲，

与苏联闹翻了也不利。

③赫鲁晓夫讲就让他讲好了，我们表面上不反对，不批评他。实际上走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还能得到他们帮助，岂不更好。

实际上，苏联不是在向共产主义过渡吗？科学技术生活水平不是都挺好吗？国内也没有资产阶级地主，他们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赫鲁晓夫也没有叫我们不搞社会主义，表面上也听他的指挥棒有什么关系。⑩

显然，束星北对自己的"立场"问题的认识太过肤浅，他以为感情转变了，一些认识颠倒过来了，"立场"也就转变了。但主管部门却不这么看，在主管部门的眼睛里，他的改造远没有抵达"立场"的边缘，甚至连对自己的思想认识问题都远远没有解决，因而，束星北的"立场"转变须从对自己的反动思想反动意识开始，须从上边为什么没有给他"摘帽"的原因认识开始。束星北只好沿着上边给指导的路子着手，只好不断地对自己的思想意识和历史进行挖掘，挖着挖着，思想也就有了变化，就意识到组织没有给他"摘帽"是有其理由的："去年11〈月〉时，他盼着摘帽子没摘掉，今年之初寒假时盼着摘帽子又没摘掉，给〈和〉别人谈起来有点着急，同时也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是严重的，曾对刘世安〈青岛医学院物理组教师〉先生讲过，反右之前，我觉得自己满〈蛮〉对，那是由于站在了反动立场，如今开始认识到过去罪行之严重，立场问题是个根本问题。"⑪

注释

①《总结报告》，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51页。

②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52页。

③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29－30页。

④《总结报告》，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55页。

⑤张德华采访录，1997年6月12日。

⑥同上。

⑦《关于对束星北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报告的主要问题和表现》，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⑧关于束星北的监改小组形式与管理方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和重视，曾作为改造"四类分子"的先进经验，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⑨《保证书》，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六卷第74－75页。

⑩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44页。

⑪同上第27页。



21. 孤注一掷

命运又一次将束星北推到“生存与死亡”的十字路口。他意识到这是他改造生涯中的一次机会，也许是惟一的机会。他已经上了跑道并开始起跑，而竞赛对手便是大西北茫茫戈壁滩上的朋友、同仁、学生。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王淦昌于1960年底回国后，开始考虑下一步做什么工作，他曾想到从事加速器的研制工作(的部门)，正当这时，1961年3月底的一天，二机部部长刘杰和副部长钱三强约王淦昌教授谈话，向他转达中央的决定，拟请他到研制原子弹的九院任研究员，王淦昌慨然应允，响亮地回答："以身许国。"第二天就到九院报到，开始工作。他和彭桓武、郭永怀(1909－1968年)分别担任了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方面的领导工作……

最早的爆轰试验是在河北省怀来县燕山的长城脚下进行的。王淦昌、郭永怀亲临爆轰实验的第一线。一年之内，他们作(做)了上千个实验元件的爆轰实验，在古老的长城脚下响起了轰轰爆破声。

1963年，王淦昌等又来到海拔三千多米的青海高原工作，与其他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接连突破了一个个科学技术难关。1963年初，九院院长李觉、吴际霖和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等来到高原的实验场地，进行点火装置的测试。负责测试的唐孝威(1931年－)多年来是王淦昌从事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助手。起爆的结果，示波器上出现的光亮、波型与两年多来的模拟实验十分相似。爆轰波理想，点火装置点火成功。①

青岛医学院，重陷改造低谷的束星北嗅到了它的气味。

束星北是怎样嗅到它的气味的？从档案资料分析，他的信息来源，首先来自外电。国外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颇为关注，为了了解中国核武器的情况，美国在中国周围建立了二十多个监听站和三十多个测向站，U－2型飞机不断进入中国内陆进行高空侦察，国外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多有猜测和报道，再就是他的一大批朋友、熟人、学生如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等人的突然"消失"，显然都在印证着这个事实。三是1963年初夏，上海同济大学物理系教授卢鹤绂向他提到核武器的事情。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卢鹤绂于1941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就教于广西大学物理系，抗战期间为避日寇入侵，来到浙大任教，遂与束星北成为好友。这年初夏，卢鹤绂到青岛疗养，专程拜访了束星北。在随后提交给组织的汇报材料中，束星北一五一十地报告了两人的谈话，两人先谈到了家庭生活，经济情况和子女情况等，接着卢鹤绂向他询问有关原子裂变和核武器的事情。束星北回答，久不接触了。也就是这个期间，束星北开始了他的大动作。

中国的原子弹情结，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了。

……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1946年，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枣园的窑洞里，首次向毛泽东提到了原子弹这个名字。毛泽东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她和世界："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②他在向世界做出这个宣告的时候，世界已进入一个以核能的广泛利用和开发为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时代——原子能时代。这个时代到来的意义和对世界以后将产生什么影响，最高层领导人当然是心知肚明，所以尽管毛泽东本人一再表示了对原子弹的轻蔑，但他却深知原子弹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地位、强弱甚至生存。他也正是力主中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的主导者之一。1949年，中共中央派出以郭沫若为团长、马寅初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正在国内培训原子核科学和筹建实验室工作的钱三强便向参会代表提出借开会之机，托他在法国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定购一些原子核科学需要的器材和资料，得到中央支持。周恩来曾托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约见钱三强，并专拨外汇20万美元。

1954年，中国地质部门首次在广西发现铀矿资源。铀矿资源是发展核工业的前提，得知这一消息，毛泽东一定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当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带着矿石标本向毛泽东汇报时，这位一直对原子弹表示轻蔑的伟人说：这是决定命运的。铀的发现使得原子弹的研制变得明朗起来。

1955年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1956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1次会议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为了尽快掌握原子弹的研制技术，1957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三机部部长宋任穷、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率领由31人组成的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同年10月1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聂荣臻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别尔乌辛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1958年成立了三机部九局，负责核武器研究设计的组织工作。同年7月，北京建立了核武器研究所，负责接收、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调集、培训人员。

正当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按着最高领导人的意愿，快马加鞭地开展着，风云突变，由于无法相融的分歧，苏联政府撕毁了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1960年8月，撤走了全部专家，带走了所有重要图纸资料，停止供应一切有关设备材料。西方社会的封锁，苏联的单方面撕毁合同协议，国内经济困难等等"毁灭性的打击"，深深刺激着毛泽东和中央高层领导人，也激发出他们对制造原子弹更为强烈的渴望，因此决定：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也就是这个时候，王淦昌，邓稼先，彭桓

武，郭永怀，朱光亚等一大批科学家，隐名埋姓开始了他们特殊的历史使命。原子弹与民族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60年代初，中国的天空充满火药气味：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有意反攻大陆，中国、印度因边界问题而引发战争，美越之战日益升级，中国深深卷入，而在这样的形势下，中苏这对曾经的同盟与兄弟却反目成仇，矛盾越发尖锐。在多数人眼里苏联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

在反苏浪潮越涌越烈之时，一向对苏联没有好感的束星北却对从上而下的反苏情绪表现得忧心忡忡，他甚至感觉到这样下去，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我曾经一再地这样想，对苏共领导错误的揭发和批判，对他们不会发生作用，且势必会引起报复性的打击，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害。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揭发和批判……

我又曾这样想：苏共还"只是""战术"上的错误，赫鲁晓夫不是一直强调反帝国主义吗？苏联国内是社会主义并且正向"共产主义进军"，我们同苏共的争论，只是"兄弟阋于墙"，甚至向〈像〉我们这样严厉的批评，是否"过火"了呢？对社会主义必然带来更大的损失，而且我们科学还不发达，还得依赖老大哥，帮助我们建设，这样做下去，只能使"仇者快"。

这一系列的问题，甚至使我一度悲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不会因此而"垮台"呢？弄得心里很沉闷，又不便和别人谈，和李支书谈了几次，还不能了解事实真相，想和吴玉馨主任谈，又凑不上时间，和方绍总、陆文庭主任谈了，也不彻底……③

显然，束星北的目光所及，要较常人理性、深远，在他对中苏关系破裂忧虑的背后是对核战争的忧虑：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他最担心的是，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将会使用核武器。如此中国难脱毁灭的命运。④

这一点，在加勒比海湾危机事件上，束星北表现尤为突出。1962年6月，苏联秘密将中程导弹和"伊尔－28"型轰炸机运往古巴，这是把原子战争引向战争的冒险政策。没想到，苏联的举动被美国发现了，于是美国于10月封锁了古巴各岛，肯尼迪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联把导弹和轰炸机立即撤出古巴。形势十万火急、一触即发。对峙的结果，还是赫鲁晓夫退出了古巴。一场核战争避免了。这一举动在束星北看来无疑是明智之举："对古巴问题，认为赫鲁晓夫从古巴撤除导弹是明智的举动。苏联做得对，免除了一场原子浩劫，看到报纸上批判赫鲁晓夫犯了投降主义错误，自己感到不服气，不管赫鲁晓夫动机如何，古巴危机总算过去了，古巴受不住一个氢弹。"⑤

束星北不断地述说着自己的忧虑，不断地解释核战争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的后果。由于范围所限，他的观点和思想只能在医学院物理教研组、四类分子和一些能够说得上话的领导人中间发表。人们对越来越浓的战争气氛，多处在狂热与盲目的激昂的情绪中，在他们意识里，战争爆发之时，就是帝国主义灭亡之日，对什么是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几乎茫然不知。因而，束星北喋喋不休的"预言"，就像梦游者的呓语。但是束星北并没有在漠视与讥嘲中气馁退却。他认为，原子弹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生存还是灭亡，在这样重大的问题面前，他甚至忘记了自己还深负重枷，不断地告诫人们原子弹是什么，核战争一旦打起来，将会是什么样子。他还企图说服领导，尽快研制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林方

（山东某医院副院长，时为青岛医学院党委办公室秘书）：

在青医，尽管我不具体负责束星北的监管改造，但是他的改造与表现情况都要汇总到我这里，再由我传递到有关院领导那里。他是个重要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上上下下都比较关注，因而我们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多。也许是我平日对他比较友善吧，他有些话愿同我讲，思想上出现了疙瘩也愿找我拿主意。因他的身份特殊，我只能在不失原则的情况下，帮他出出主意，最多是给他一点暗示，让他尽可能地少碰些钉子，这样，他似乎就很满足了，对我有了信赖感。可是有一天，束星北突然向我谈起中苏关系和核战争的事。最初，我并没在意，在我的意识里，这样大的事，实在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所能考虑的，可是束星北很上劲，不停地找我谈这事，好像说服了我就能够改变什么。可能是见我反应冷谈，他还专门给党委写了一份报告，让我转交。那份报告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中苏关系，二是讲原子弹的威力。在我印象中，他讲得最多的是原子弹，他用很通俗的语言讲了原子弹是什么，原子弹的威力、危害，举出大量的美国核武器试验的一些数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举出了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丢下的两颗原子弹。他在具体描述了两个原子弹所造成的损失与伤亡后说，比起现在的苏美正在实验的原子弹，美国"小男孩"（原子弹代号）只能算个小弟弟。他最后的结论是：原子弹不是纸老虎。它不但可以"吃人"，还能够毁灭世界，因而要尽快研制中国自己的原子弹。这个观点前一部分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错误的，而后一部分显然又是十分荒唐的，前一部分毛主席已早有定论，离开他的所有观点都是错误的，至于原子弹的研制问题，它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警告他说，这份报告可是你的"罪证"，他表示不在乎，他说只要上面能引起重视，他甘愿承受因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

报告交上后，他果真受到批判，我还受院领导的委托来澄清他的糊涂思想。我搬出了"九评"和一些中央有关文件来，希望说服他。可是怎么也无法说服他。也许是认为从我们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这里说不通，他就越级跑到市委统战部找赵部长，商量研制原子弹。赵部长曾随着张敬焘市长来看过他，以后赵部长又单独看过他几次，两人好像挺投缘。但是这样的大事，赵部长也够不着边。我曾私下里与几个副院长说过这事，他们都认为此举简直荒唐至极，应立刻加以制止，以免造成不良影响。我本以为束星北的荒唐之举一准会受赵部长的批评，没想到赵部长竟给说转了(也有人说赵部长做了束星北的俘虏)，不久之后，连宣传部的王部长也给扯到里边了。⑥

“荒唐至极”的举动是有历史根源的：束星北青少年时期颇有尚武情结，曾一度迷醉过侠士剑客。据他自己所称，20年代末，他离开美国，闯荡考察亚欧诸国时，曾到著名的德国陆军学校听过一个时期的军事课。⑦从美国回来第一个选择便是蒋介石的子弟学校——南京陆军学校。因开罪蒋介石，他离开学校后还同其姐夫恺悌一同组织过抗日救国团。抗战时期，已成为浙江大学著名教授的束星北中断了一些前沿课题的研究，专门研制过一个时期的军工武器；“在科学研究中，抗战前搞过‘死光’(激光)、‘原子能’、‘人脑控制’，希望有一种新式武器来‘救国’。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以为日本投降是原子弹的力量。鼓励学生死‘读书不问政治’，‘科学技术第一’，‘科学第一、物理至上’……”⑧

很多人评价束星北时，往往将他“界定”为理论物理学家或相对论专家，其实，束星北的科学素养是全面的，他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动手”能力。他在核物理方面的研究，由于有“全面”和“整体”的雄厚优势，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准。浙江大学在湄潭时期，束星北曾一度与王淦昌携手研究核物理，研究水平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1945年8月，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的两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告投降，二次大战也因此而告结束。消息传到湄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知道原子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原子弹有这么大的威力。他们便纷纷地去找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个人便专门为学生开设了“军事物理”课，为了给学生一个直观印象，他们还专门画了一张原子弹原理示意图，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原子弹的原理、威力、危害和防护方法。在这些听课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原子弹专家。

束星北研制原子弹的梦想便建立在他的学生身上。

敬爱的党：

通过学雷锋，反修正主义，回忆对比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每个人的思想觉悟都迅速提高，都更加热爱新中国，都更加感觉到保卫我国伟大革命事业的重要性，防止核战争是保卫革命事业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我国能迅速获得拥有足够的核武器则又是防止核战争的首要任务之一。我相信，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再动员一切适当的力量，则这个目的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这个力量的一部分是我国目前仍在外国的留学生，据闻，我国有不少的留学生在美国参加过核试验，其中有的已加入了美国籍。争取他们回国当然是困难的(他们有的可能被特务监视)；但是，他们正是我们和美帝国主义争夺的对象。我相信，在党的英明方针(指导)下，他们完全可以被争取回来的。他们是中国人，在外国，特别是在美国，必然不可避免地受到种族歧视，因此也必然怀念祖国；他们之中也有不少像钱学森这样的人，他们看到祖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的伟大事业就必然会感动，所以也有条件被争取过来。他们可以通过先到其他中立国的方法回到祖国。希望党尽量争取。尽管他们在思想意识上长期地受着资本主义的毒害(有的也可能很顽固)，但是我相信他们的绝大多数是爱祖国的，在党的伟大教育改造的方针政策(影响)下，他们是可以被改造的。

鉴于以上原因，我曾二次向统战部、宣传部(赵部长)、王部长、提出了我熟识而且过去有过很好感情的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做核物理实验研究的，另外两个是做核物理理论研究的。他们出国后，也曾一度和我保持过联系，其中的一位在1958年还寄给我十几篇论文，征求我的意见(显然我没有答复)。如果党同意的话，我想我可以协助党动员他们回国。希望党再加考虑。

此致

敬礼

物理组 束星北

1964.8.9⑨

“荒唐之举”自然流露了束星北一贯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情结”。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不堪改造重负的束星北，一心想的是“摘帽”，他没有退路，只求一搏：政治的压力、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将他“逼上梁山”。

比较起来，这个时期最大的压力来自家庭。

月子口时期，束星北自顾不暇，家庭的压力似还不很明显。到了医学院，生活与改造稍有变化，家庭的“债务”，便如系在心灵上的绳索，越勒越紧，由此而引发的负罪感也越来越重。

长子束越新被部队“黑”下来后，便成了“无业游民”，很长时间里，他几乎什么工作也找不到，为了生存，为了弟弟妹妹的学业，他只能到码头、车站或建筑工地和那些身份不明的人争抢饭碗(有时，街道办事处念及他军人的身份，也会给他提供一些诸如搓缆绳、拉脏土、砸石子的活干)。

三儿束庆新也是束星北的心病。小时候，因一场感冒没有得到及时医治，他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一条右腿永远只有小孩胳膊那么粗细。上学后，为了“形象”，束星北给儿子的那条残疾的腿特制了一个木靴，这样至少让人看起来，两条腿好像一般粗细了。木靴很



重，束庆新形象虽然像样了，可腿却瘸得更厉害了。为此他常遭到同学取笑。父亲出事后，有些老师也开始歧视他。他的学习成绩最好，可是却得到不到相应的待遇和荣誉。他开始畏惧学校、畏惧同学、畏惧老师，耳朵出现了幻听，他常听见一些同学围着他喊"三瘸子、三瘸子"，特别是夜深人静时，喊声尤为巨大。为此，他便休学了。

也是因为父亲，长女束沪新(男女排行老二)只能看着自己的同学朋友胸戴红花走进纺织厂、印染厂或四方车辆厂，即使最不济的也会分配到橡胶厂或食品厂。而她呢，在家"闲"得都快要发疯了，一家街道办的石料厂才答应要她。所谓的厂子不过是只有二十几个人的石料工地。她每天要带着帆布手套，一手执锤，一手拿着个铁环，砸上几方修马路用的石料。她的一双被同学们嫉妒不已的修长的手，因长期劳作而粗糙不堪，骨骼也扭曲变形。因为父亲，被同学喻为"冷美人"的束沪新很长时间里，连对象也找不到。后来终于有一个家在南京的外地青年和她走到一起。外地青年为了爱情冒了风险，但他不想让家庭再冒风险，因而，两人关系一俟确立，他立刻就将束沪新带到了南京。

男方的父亲是一家企业的副厂长，母亲在机关工作，他们曾极力阻止儿子的婚事。当发现木已成舟，无力改变儿子的选择时，他们作了有限的让步，他们只接受让他们备感为难的儿媳，却不接受儿媳的家庭，他们的出身身份和地位都不错，他们不能让儿媳将其家庭的"细菌"带过来。因而，两家从没有来往与走动，即使在结婚的日子里也没有到一起坐坐。

儿女们认为，束家子女中，老四束孝新铁板随父，不仅外表随，性格、智慧也秉承了父亲。许是比其他兄弟姐妹们更多些呆气，也就多从父母那里得了些爱怜与管束。上小学的时候，他有一阵子迷上了玩牌，上学放学满脑子总是那些花花绿绿的Q蛋老K。年底考试成绩自然不好，卷子发下便掖到书包里，父母问及，便撒谎说，卷子在老师那里，以后再问又说在同学那里，一直挨到春节将至，实在是无路可退了，才将几张令家人蒙羞的卷子交了出来。在束家，子女们可以犯错误、可以偷懒、贪吃，甚至在外受到不公后，与人打架都可以得到原谅，但学习不优却是绝对不能宽恕的。平日不管谁的成绩若是考了四分，第一件事便是蹲冷板凳。吃饭的时候，其他兄弟姐妹都与父母围坐在大厅的餐桌上享受天伦之乐，考砸了的孩子只能屈就在厨房的小餐桌上独自进食。束星北有一点是一定要灌输给孩子的：我们这样的家庭要是连这点也没有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

看到儿子几张乱七八糟的卷子，束星北气便不打一处来，在儿女们的惊叫声中，他双手像抓小鸡一样抓起束孝新，一脚将门踢开，便扔了出去。也许气昏了头的束星北已经忘记他自己当时正在楼上。被扔出去的束孝新当时就滚到楼下，口鼻蹿血不省人事了。

父亲狠心的一摔，却摔出了青岛十七中最优秀的学生。从此之后，束孝新的成绩在全校没落过前三名。因而到了高考的时候，束孝新已经具备了非清华不考的自信与实力。

可是高考下来，却名落孙山。束孝新知道自己落榜的原因，最初，他不服气，沉寂了一年后，志向仍是清华，结果仍是名落孙山，最后他只得屈从"身份"与"阶级"的命运安排，

放弃了报考清华的念头，到青岛玛钢厂红专业校当了一名教师，一边工作，一面复习，最后，他在青海考上了中国铁道学院(当时青海高考对"成份问题"要求稍松些)。从中国铁道学院毕业后，束孝新被分到四方机车车辆厂成都分厂，成了企业的优秀工程师。1957年整风之初，厂子里的知识分子开始按照党委的要求向党提意见。一个受到厂领导"迫害"的技术员，写了一篇批评个别领导主观武断工作失职的意见书，让科室同事签名，因有同感，科室的多数人都签了名。一向小心谨慎的束孝新虽从无意参与政治，但碍于面子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反右开始，他头一个被网进右派分子的网里。自己什么事也没做就被打成右派，他不解也不服气，去找主管领导说理。那个领导只拿着他签过名的材料晃了晃说，还是回去反省吧。束孝新怎么反省也不能给自己领的"帽子"找到理由，又无处诉说，便决定进京找毛主席说理，结果人在车站被截住了，投进了监狱。

五子束义新命运也是父亲"安排"的。束义新16岁就进了青岛玛钢厂。这当然不是他的选择，他的选择是校园，是读书升学高考，然后选一个名牌大学，并最终留下来，做个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可是家境使他不得不早早放弃学业。他和哥哥一样才华横溢，厂子见他肚子里有些墨水，便将他安排到红专业校做教师，在玛钢厂，与一线的工人比较起来，红专业校的老师职位算是较好的职位，它曾让颇感失意的束义新信心重拾。可是随着父亲命运的滑落，他的地位也跟着下滑了。他的业校教师只做了三个月，位子就给别人顶了。他跑到厂领导那里去质问原因，人家也不解释，一鞭子将他赶到切削车间干床子。后来知道，自己的位子是被厂办主任的妹妹"抢"去的，又越级到厂部理论，结果又给撵到了浇铸车间。浇铸车间是玛钢厂最苦的工序，每日功课无非将小钢炉流出的滚沸的钢水，用铁勺子舀出来，然后倒进一个个耐火砖做的槽子里。因为他是束星北的儿子，他每天要在烟熏火燎令人窒息的车间干上十几个小时。车间里没有安全措施也没有劳动保障(甚至连人人都有的劳动保护费他也没有)，他的腿肚子给溅出来的铁水烧得伤痕累累。最初，他憋着口气，想象着一面做工挣钱，一面到夜校学习机械冶炼方面的技术知识，以便好为厂子搞些技术革新(这样的思路也是父亲为他设想的)。可是理想很快就破灭了。有一天，他所在学校中的一个同学考上了北京大学，几个要好的同学约他一同欢送。看着那个学习远不如他的同学喜气洋洋地踏上了北京的列车，束义新失去了平衡。当天，他就离开了玛钢厂。他决定一边做点生意，一边在家复习高考。当然这一切都瞒着父亲和母亲。

比较起来，六子束润新读书的兴趣差一些，这似乎不全是才智或上进心的原因，而是与他生存的年代有关。束润新于1959年初中毕业，那时，饥荒已经降临中国，束润新无心再考虑高等院校，而是选择了青岛楼山后农业机械学校。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学校，是因为学校每天有一顿免费的午餐，而且可以放开肚皮海着吃。由于年景的原因，"免费的午餐"没吃多少日子，便随着学校的解散成为记忆。束润新从此流落街头。那一年他才15岁，15岁的束润新在车站、码头和建筑工地干起了拉大车扛大包的苦力。这一切自顾不暇的束星北一点也不知情。直到有一天，原校总务科科长带着两个警察来到了束星北家，警察亮出

逮捕证并让茫然不知所措的束星北签字。

当然是一件历史冤案。学校解散，束润新曾带领十几个同学让总务科退赔他们的学费。既然学校已经解散，领导自然不会再退赔学费。对峙了一阵子，束润新的"队伍"在校方的劝说下，很快就解散了，事件便不了了之。可是后来发现，学校总务科大批的粮票与油票被盗，校方马上就联系到带头闹事的束润新，也不由分辩，盗窃分子的帽子便落到了他的头上。

……

因为束星北，所有子女都受到牵连、命运都发生了变化。相形之下，他的"补偿"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对束星北而言，家庭的债务是所有债务中最为沉重的一笔，也成为他尽快"摘帽"的动力源泉之一。他的心思在给组织的交心书中，颇有透露。

我大儿子以前是锦州驱逐机学校的飞行教官，曾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进修，也由于我是右派分子的关系，复员在家，现在四方青岛印染厂印染学院教大学物理，一方面这种工作并不是他的志愿(他志愿考科学院研究院)，另方面他今年已27周岁还没有对象，这些都〈是〉受了我的影响而不能解决。我的第五〈四〉个儿子去年从十七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在四方青岛玛钢厂红专学校教代数，今年春天又没考上大学，他的成绩一般是好的，比他不如的也考取〈并〉上〈了〉大学，所以他思想上认为考不取是由于家庭成分(由于我是右派分子)的关系。因此准备到青海去考"铁道学院"，据说，那边是不计较家庭出身的。但是假使考不取呢？他决心离开家庭。这对我是一个包袱。⑩

我的第五个儿子束义新前年不安心在四方玛钢厂工作，我们却一无所知，直到该厂人事科负责同志到我家询问他的情况，我们才了解他已有一二个月不上班了。问询他时，他还强调由于要考大学"备课"，并狂妄地说："我有力气，不怕没饭吃。"该厂党委(胡书记)及人事科负责人(刘科长)，一再教育他，我也将情况汇报总支，得到佟宁一同志(青岛医学院负责人)的帮助和指示，回家后以我本人由人民教师教授蜕化为右派的事例反复说明资产阶级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劝他赶快回头。该厂党委一再关怀说服并找我大儿子帮助说服，希望他珍惜自己的前途。经党的几次教育后，他终于从歧途回头到厂工作，最近由於工作积极还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并加了工资，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假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关怀照顾，他现在就可能是资产阶级分子了。我第六个儿子前年在技工学校读书，后来据说是学校"解散"回家，在街道拉大车劳动，直到他校总务科来人联系，才知道他早就和"同学们"做买卖"退学"回家，并怀疑他与最近该校失盗大批粮票和油票的事件有关。他几天不回家，当时我曾向总支报告，请总支协助查询他的消息。后来公安局来联系，才知道他从做买卖堕落为盗窃分子已被公安局逮捕。一个16岁的青年竟然堕落到这样

的惊人程度！目前他在济南附近劳动教养，在党的耐心教育下，他已有了改变……⑪

在这一大堆儿女家庭债务上，应该还有一个人(也许更重要)束星北没有提到，显然他也不会提到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在束星北困顿的生涯中和对他的改造到底占多大比重，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对束星北抛弃旧我的影响极大。换句话说，束星北急于摘帽的欲望也与她有关。她就是束星北的"妻子"佘淑芬，孩子则称她"二娘娘"。

"二娘娘"是束星北的母亲束大嘴的干女儿。20世纪20年代初，因丈夫再娶而含恨出走的束大嘴，先是和江都大桥镇上的妹妹一起打理绸缎生意，不久独立出来后又开始了过去的本行——经营管理土地稻田。到30年代初束大嘴已成为江都大桥镇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了。"佘二姑娘"这个时候走进了束家。"佘二姑娘"在家姊妹中排行老二，人也称佘二姑娘，因老家也在头桥便与束家拐拐弯弯地扯上了关系。16岁那年，"佘二姑娘"父母因病双双故去，舅舅将她领到了束家做佣人。"佘二姑娘"心灵手巧，聪颖贤惠，逢人迎意，极博束大嘴的欢心，很快就将"佘二姑娘"收为干女儿。"佘二姑娘"一直陪伴着着束大嘴，当家理财，成为束家不可或缺的管家。

40年代初，已是中国著名教授的束星北回家探望久卧病榻的母亲，自感不久人世的束大嘴将两人叫到床前，将干女儿的手搁到儿子的掌心里，也将一份嘱托留给了他。束大嘴当晚就让儿子和干女儿圆房，佘二姑娘从此成了"二娘娘"。

束大嘴不久便与世长辞，束星北冒着战争炮火辗转多日回到大桥镇为母送葬守孝，住了月余。从此束大嘴创下的数百亩田产和一幢三进数十间的大瓦房，伴着孤独寂寞的"二娘娘"。解放后，束家的田产收为国有，房产成为镇政府、乡政府、学堂、供销社、乡长宿舍、计划生育办公室。"二娘娘"的空间越来越小，最后被撵到佣人住的一小间西厢房里。

束星北虽与"二娘娘"生活在两个世界，但他从未忘记母亲的嘱托和一份情缘。每月发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二娘娘"寄款(凡同束星北打过交道的人都称他粗犷，实际上他也有很细腻的方面)。数目多少视经济情况而定，但底数不会低于20元。"二娘娘"与束星北有过一个儿子，这本是她生活和情感的支柱，可是不幸的是，儿子七岁那年患病夭折，"二娘娘"从此便有些疯癫了。在江都大桥镇至今很多老人仍还记得披头散发的"二娘娘"经常半夜三更来到镇子后面的一个池塘边喊她儿子回家的情景。

此后"二娘娘"与束家的联系需要依赖她的"侄子、外甥"了(实际上，束星北寄去的生活费大部分落到了他们的手里)。

"反右"之后，束星北失去了工资，只有20元的生活费，生活一落千丈，即使如此，束星北仍还靠着以前的底子接济了"二娘娘"一阵子。灾荒年间，束星北无力再顾及"二娘娘"了。万般无奈之下，束星北只好将"二娘娘"托付给老家侄子，并与其定了个君子协定：每月给"二娘娘"的生活费用不低于10元，待将来一并结算。

"二娘娘"是在灾荒年景(按通常的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即将过去的时候来到了束家。



至今没人说得清，精神失常、识字不多且从未走出过大桥镇的“二娘娘”是怎么从江都找到青岛的。

“二娘娘”来了。“二娘娘”不是迫于生计来讨生活费的，显然她意识到束家出了事情，她要看看一年复一年为之期盼牵挂的男人。

在儿女们的眼里“二娘娘”是束家的管家、佣人或保姆。多年之后，直到父亲临终之际，他们才知道“二娘娘”与父亲的关系。

“二娘娘”在束家洗洗涮涮，操起针线将束家大大小小衣服被褥拆洗缝补了一遍.她甚至还在短短的时间里，把一些女红和清洁的活儿扩大到左邻右舍，很快地得到人家的信任和好感。“二娘娘”这一次只在束家住了两个多月，这期间，正是束星北在月子口的生死关口。据说这两个月束星北只得到了一次“公休”，与“二娘娘”见面的时间有限。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束星北究竟与“二娘娘”说了些什么，无人知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短暂的一面，束星北带给“二娘娘”的是另一副面孔，一副与过去那个束星北差不多的形象。这有限的一面让“二娘娘”满足而踏实了很久，大桥镇的亲戚邻里发现，从青岛回来的“二娘娘”，满面春风，生气勃勃，换了个人似的。她做事有条理了，也不再唠叨了，人看起来像是正常了。

“二娘娘”在青岛期间，尽管心存疑虑，却从不打听束星北的事情，也未问过，这个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只是在默默地做事，让人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她走的时候，束星北仅仅为她买了一张票，票钱还是大儿子出的，便再也拿不出什么了。只是葛楚华很是谦意地告诉她：现在家里有些困难，等老束发下工资来，就给你寄生活费。

尽管束星北也不认为“二娘娘”是因生活所迫才来青岛找他的，可自责和疚愧却如丝绳勒心。在一次家庭会上，束星北曾稍透隐衷：为了你们的“二娘娘”，我也得好好改造。

林　方：

很显然束星北是将“摘帽”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大动作上，有一个时期，他表现得很反常。那时候农村正在大搞“四清”，形势又紧了起来，学校对四类分子加强了监督防范。对束星北也不例外，我记得当时对束星北管制很严厉，他无论去哪儿，只要出医学院的大门就得向保卫科报告。尽管这样，束星北还是不断地往市里跑。以后束星北向我暴露这时期的思想时说，1963年元旦青岛医学院头一批“摘帽”名额没有他，他就感觉“摘帽”无望了。因为市长也说过，张书记也打过保票，本来都觉得是把里攥的事了，结果还是个竹篮打水。再往前看，真是渺茫得很，因而寄希望于这件事上：一是想通过国外的学生来自己搞，如果这条路走不通的话，也想法弄出动静来，让上边的人知道他，使用他，只要有了参加核武器研制的机会，“摘帽”就有希望了。为了这个大动作，束星北似乎豁出去了，他常常发火，抗拒改造，

有时招呼不打一声就"失踪"了。有一次他"失踪"的时间很长，弄得学校的民兵带着枪四处寻找，幸亏这回束星北别着个心眼，回来时让统战部赵部长派了个人送他，才免遭"专政"。对他的这片"爱国心"，多数人认为是"投机"，是"赌博"，是别有用心。

不过束星北还是跑出了成果，赵部长和王部长对他的"游说"发生了兴趣，他们将他的建议向上作了反映，显然上面对他的"爱国心"也有了反应(是不是张敬焘书记不清楚)。据赵部长后来讲，当时市主要领导听了汇报后，很感兴趣，决定以统战部的名义成立一个班子，让束星北来着手这事，出于慎重起见，决定先不事声张。对外只挂青岛市无线电研制筹备小组的牌子，束星北名誉上是做老师、顾问，实际上是进行原子弹人员统战和联络的前期工作。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这事仅开了个头就结束了。⑫

1964年9月，王淦昌和吴际霖来到了茫茫戈壁滩。在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在张蕴钰司令和物理学家程开甲的具体组织下，戈壁深处矗立起120米高的铁塔。这将是放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铁塔……⑬

1964年10月14日，进入爆心的工作人员换发了白色的通行证，只有17个人领到了这种特别的棉布绣字胸标。随着一声哨响，2000公斤的原子弹被缓缓起吊，安放在孔雀河畔一百多米的塔式铁架子上。4名技术人员在拧紧螺丝，接通电缆。116根电缆分别通到主控室、各个工号，同上千台测试仪器连为一体。10月15日，气象员分别在几顶帐篷内抄收的来自阿拉山口、和田、敦煌和国际台的气象预报资料重新显示，10月16日是个好天气。北京中科院九院办公楼内，周光召和同事经过连夜的运算，于10月16日上午将一份报告呈到周恩来面前：经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失败率小于万分之一。塔式铁架子顶端有个小小的"鸟巢"，就要鸣叫了……

命运又一次将束星北推到"生存与死亡"的十字路口。他意识到这是他改造生涯中的一次机会，也许是惟一的机会。他已经上了跑道并开始起跑，而竞赛对手便是大西北茫茫戈壁滩上的朋友、同仁、学生。

束星北在计算着"小鸟"鸣叫的时间。但是他的计算显然出现了很大的误差，是不是受到国外专家的影响不得而知。西方有一些对中国缺乏认识的权威曾断言：中国20年也摘不出原子弹来。显然他们有所不知，中国在苏联撕毁了"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后，中国的核工业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更何况中国有一批聪明绝顶又有雄厚实力的科学家，一批早已具备了研制核武器能力的专家。苏联撕毁了合同，带走了重要的图纸和所有有关资料，可是他们有所不知，核武器的最为关键的东西已经装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有心者"脑子里了。中国需要做的仅仅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或者把他们像一部机器一样拼装起来。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久已疏离的束星北是从中国的整体科学和经济水平及他的朋友、学生、同行的科学品质来计算时间的。由于所处环境和处境的关系，他的计算显然滞



提請 解除監制 意見書

青島市公安局

1965年 9月 15日

"三座大山"搬掉了一座。1965年，青岛市公安局提请解除束星北管制意见书。

后了。当然"小鸟"的突然鸣叫，带给他的不仅仅是"摘帽"计划落空的痛苦与打击。

束美新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束星北的小女儿）：

那是个平常的夜晚，说平常好像又不那么平常，不知为什么，空气里有一种让人压抑得要命的感觉。事隔多年后，当我重新回顾这段日子，总有一种拿不准的感觉，像是在看一部既熟悉又陌生的老电影。那是个黑白两色的年代，是个小心翼翼的年代，生活总是飘浮着，随时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这样的感觉夜晚尤甚，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家庭，一入夜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和空虚感就会随之降临，一种要出事的感觉时时就会悬上心头，人的神经总是绷得很紧很紧。

在我印象中，那个晚上，日光灯嗡嗡的交流声很响，似乎注满了房间，隔壁家的收音机正在播放电影故事，好像是《南海潮》，声音刺刺啦啦的，听不太清。脑袋四周像是罩了东西，抓不住却又无处不在。我躺在床上背诵《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文章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散文，是他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五周年创作的。这是一篇充满情感的抒情散文，在这篇文章里，郭沫若先生用他的生花妙笔将毛泽东的思想比喻为世界人民的指路明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情节是，有一位外国代表团的团长和毛主席握过手后，就决定再也不洗这只手了，他要把毛主席的气味带回祖国去。结果有人便建议他把手泡在水里，其他人也好将手泡进去，一同沾溉毛主席的手泽……

老师在解析这这篇散文时哭得泣不成声，她要求我们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还要写一篇阅读心得。尽管事隔多年，这篇文章的主要片断和那个老师的神态，我仍记忆犹新。

我的眼睛虽然还盯在文章上，耳朵却听着楼道。我在等我的父亲。自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我们便被撵出教授楼，住进了青岛合江路一个大杂院的三楼上。那楼是50年代初按照苏联模式建造的，青水砖墙，有外走廊，厕所洗手间在楼的两头。门窗也关不严，透风散气的。那时，父亲总是回来得很晚，每天晚上，只要父亲的脚一踏进一楼的门洞，我就能

听见他那拖拖沓沓的脚步声。

父亲很晚才回来。母亲让我把给他留在锅里的菜热一下。菜端上来，父亲没动筷子，让我给他找酒。父亲好酒，平时总要喝一点，要是有善酒的好朋友来，他能用大碗跟人抡。可是自从家里生活拮据了，他就不再喝了。这个晚上，父亲竟要喝酒。我和母亲很高兴，于是便在破柜橱床底下各处翻，可是家里连个酒瓶子也没有。我又不愿违拂了父亲难得的好兴致，便到隔壁刘教授家借了一瓶果酒。我知道他是爱喝白酒的，可是刘教授家翻箱倒柜的也只找到了一瓶果酒。酒拿到手后，父亲看了看商标说，不错，凑合了。一边喝着酒，一边给我母亲叨叨着。我这才知道，原是市里要调他去当什么顾问。我不知道顾问是个什么角色，可是看他那高兴的样子，我觉得一定是个好事。他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让我母亲给他熨衣服。说是明天要到市政府办公室给参加无线电学习班的学员讲课，有市领导旁听。父亲平日穿着不考究，甚至还很邋遢，可是一旦上讲台了，他注定要焕然一新。这时的父亲就跟个接受检阅的军人一样，衣服上一定不能有一个褶子，不能有一点污垢。母亲给父亲翻找衣服。衣箱是大哥从部队复员后带回来的子弹箱。家里的东西都卖光了，只剩了这个衣箱，我想大概是卖不了几个钱吧，才留下了。家里没有熨斗，母亲便用大搪瓷缸子倒上滚开的水做熨斗。

父亲吃过饭后，便开始对着门后面一块摔得还剩半拉的镜子刮胡子。我觉得有些奇怪，按理说，父亲总是在早上刮胡子的。母亲好像嘟哝了两句，说他犯邪，半夜里刮什么胡子呀。父亲没有说话，对着镜片很是认真地剃他的胡子。他的胡子很硬，想必那刀片一定很钝，刺啦刺啦的声音，让人想到钝镰刀割麦子的声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一些异样的声音，窗外的大喇叭突然就惊天动地了。我想我只是隐约听到核武器和中国政府几个断断续续的句子，还没有明白"核武器"是什么意思，就预感到中国发生了大事情。先是楼道里弄出了很大很骚乱的动静，跟着无数的人冲上街头，并喊起口号来，就像发生了大地震，整个城市顷刻间地动山摇起来。



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青岛有关部门在街头向欢呼的群众散发"号外"。

本来我是准备冲上街道，汇入游行队伍的。积极参与一切庆祝或示威活动，那个时候，已是我们的"政治本

能”，我想正是这个时候，我听到了父亲奇怪的叫声。最初我并没意识到是父亲的叫声，那叫声短促干硬，而且间隔时间很长，当奇怪的叫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那声音是我父亲发出的。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发出这么奇怪的叫声。以后无数次回忆这个声音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绝望的嗥叫，只有森林里遭受屠杀的野兽才会发出这样的嗥叫。再往后，嗥叫声被哽咽声代替了，我才明白，父亲哭了。

窗外的大喇叭惊天动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员用他那高亢兴奋的声音向全世界发布着自豪而威严的声音：……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街道上开始了自发的游行庆祝活动，鞭炮、锣鼓和口号声震天动地，父亲的哭泣声马上就被淹没了。⑭

注释

①《王淦昌先生传略》，《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53页。

②《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090－1091页。

③讨论《学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1963且年9月6日《人民日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58页。

④《束星北在汇报自己思想情况中暴露出下列问题》，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58页。

⑤《束在五反运动中自我检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30页。

⑥林方采访录，1997年5月5日。

⑦束星北晚年曾亲口对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资料室主任汤光信谈到自己游荡亚欧时，曾到德国陆军学校听课一事，他说，当时认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救国。

⑧《束星北自传》，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一卷第170页。

⑨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六卷第89页。

⑩《继续向党交心书》，1960年6月27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四卷第145页。

⑪《1963年思想改造总结报告》，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61页。

⑫林方采访录，1997年5月5日。

⑬《王淦昌先生传略》，《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页。

⑭束美新采访录，1997年7月11日。



22.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束星北拄着拐棍上班了，他一上班就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他来到青岛医学院物理组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个小本挨个让人家提意见。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梦”破碎了。人还要回到现实中来。

束星北以后回顾这时的情形时认为：他犹如倒悬在山崖树杈上的绝望者，突然看见一条绳索垂到眼前，晃来晃去似乎伸手就可抓住，可是等真的伸出手了，那绳索却不见了，下面仍是无底的深渊。他也以西西弗斯的故事自喻：西西弗斯推着巨石不停地攀登着，眼看着就要抵达山峰了，那巨石却豁然跌落，他也只能回到山底重新开始推动巨石。

“梦”破碎后，束星北在家“病”了几天，他本来要“病”得久一些的，可是“三级联合改造小组”的压力使得他不能在家里“泡病号”，也不能消沉下去，他的改造已经不是个人的事情（这一点李科长曾反复向他指明），他不但要为组织改造、为人民改造、为家庭改造，也得为个人改造。这一点是不容商量的。

束星北拄着拐棍上班了，他一上班就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他来到青岛医学院物理组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个小本挨个让人家提意见。有人习惯背后或在会上提意见，不想附和他，他也不急不恼，一有空就掏出小本在人家一旁等着，人家不胜其烦或被其精神感动，只好同他“合作”。待人家挨个提过意见后，他便整理出来，上交领导，作为改造成果。

10月7日请李福文老师提意见，兹抄全文如下：

”先要看整个社会发展的情况，才能看到自己应当在哪个方面努力，否则不知道如何走。只要有决心就能改造好。〈我相信〉整个国家也都希望你这样，否则就不会留你在教研组。同时也〈要〉为下一代想，为他们〔儿女〕创造好的条件，如不能改造好，对他们也有困难。〈因而改造〉确是〈实要〉有决心，思想改造也是一个痛苦的事……我们有许多看法是不对头的，那<哪>里做得不对，那<哪>里做得对，〈群众是清楚的〉只要有决心改造好……〈群众〉总归要看到的，在易县我看到弟兄三个原来〈是〉富农，弟弟摘掉了帽子改成中农，确是〈实〉下决心改。我们有些观点肯定是不对头的……“

问：“请多提我的缺点。”

答：“缺点好像是急于想摘帽子……例如，某个时间好些，某个时间情绪低落些。再如讨论一些问题，为什么你有一些看法，别人有另一些看法呢？”

问：“当然，想解除敌我矛盾，〈这样〉对工作也好些，如何努力？”

答：“主要是在思想上和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有没有抵触，如果有抵触，摘掉帽子，

也是敌我矛盾。要想工作好些，一定要把敌对观点去掉……""别人对你有意见，不要急于表白，迟早会明白。以为自己改造好了，那就永远改造不好。〈关键〉是能否把与人民的敌对立场改掉……

"……自己每天都要想想哪些地方不对，那〈哪〉些地方对，再找人谈谈，首先要自己检查，再找别人谈谈，再找人谈谈，有那〈哪〉些不够。自己不能有'差不多'的思想，而实际上差得多，自己认为差得多，就越能找出问题，就越能改造自己……"

10.〈月〉14日请张德华老师提意见，抄录全文如下：

"感觉这学期实际工作做了不少，我觉得这样对，〈要〉从小事改造自己。过去总想从大事做，修大仪器，做科研〈不是不对〉……〈而是〉这方面与改造不甚合〈拍〉，因为过去犯错误就是因为自己骄傲，看不起小事……

"另外，不管什么方面，一方面〈要〉从政治立场〈考虑〉，一方面要注意行动。例如讲话，有时从你〈的〉方面讲并不是有意的，但实际上会产生毛病，不是不让你讲〈话〉，有时你的讲〈话〉会产生毛病。在行动上也要检查自己。例如，借显微镜没通过教研组，教研组不知道，外面有些误会，时间太长人家奇怪，为什么你家里有一个显微镜，弄出怀疑。你应当更加注意，拆仪器时也要有别人在面前，免得出了毛病，弄不清。我上次拆超声波你在旁边，可以证明是原来坏的，不要太随便了，〈使人〉产生不好的印象。

"主动想办法帮助别人提高还是不够，可能认为教研组里成员水平太低没出息〈可能是我猜测〉，你有时也提了很多意见，为什么别人不听呢？一方面是感觉不切实际……自己的意见得不到大家的采纳，因为不需要。在其他方面，例如，科研方面，不加具体安排〈〈你当然〉有些具体困难，并不是把责任推给你〉〈很少〉在实际水平上帮助别人搞一点，例如，做狗的试验，到医院去做，带儿子去做，大家也有意见，人家看起来，〈你是〉把儿子搞上去，不带别人……应当注意，别人看〈你的〉文章看不懂，应当搞个文摘，帮助〈人家理解〉。""另外，帮助教研组不是帮助个人的事，应当从国家整个〈来〉看，从实际水平着眼，也是从立场观点〈着眼的问题〉。党给你任务，帮助青年助教提高也是〈你的〉任务之一。

"记得主任提出过，教研组可以帮助你写书，你自己写，思想方法不对头，其实自己的帽子未摘，也不能出版。你让儿子抄〈这样不对〉。其实不是教研组要挂个名，大家〈是〉想学习。〈而你却把〉力量集中在儿子身上。当时主任提出来，你没考虑，现在这本书要教研组提意见也没法提，以你的名字保荐你出版，教研组也有困难……

"政治学习，特别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时要联系自己的想法，不要钻牛角尖，在字面上兜圈子，例如在学习'斗争更残酷'时，不要在字面上转，怎样更加残酷，主要联系实际，功夫做到家，自然会摘帽子……"

两位老师提的意见较多，有许多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如果不征求意见是决〈绝〉不

会想到的，对我的帮助也比较大。他们提的意见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我〈要〉在今后的具体行动中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有些缺点同志们虽然不能马上就看出来是否在改正了，但是，我是有决心改的，例如，不通过组织，让儿子去医院做实验和研究，今后一定不犯。如需要儿子做助手，一定请示领导批准，今后想每个月定期地征求一下意见，改造自己，这样会进步得快些。①

物理教研组的几个老师的意见，让束星北感到"出乎意料"，也给他带来启发，他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再将范围扩大些，让上级的主管部门也参与进来，一定会有更多的"高见"和箴言，这样就会更有利于他的改造。束星北先将这种思想汇报给领导，得到认可后，便一次次跑主管部门，央求人家来对他进行帮助和监督。上级主管部门似乎被束星北的精神打动了，应他之邀，党委、人事处、保卫科和物理教研组的部门负责人及部分员工一同对束星北进行了"会诊"并开出了"处方"。束星北第一次端着小本请人提意见，提出了一些"没有料到"的问题，这次由他主动邀请的评审会，竟让他有更多的"出乎意料"。

张某某：束星北在立场上没有根本转变……对你的右派没有真正的承认，觉得自己犯罪被划成右派，是自高自大，得罪了某几个党员。实际上……你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的根本立场问题，你改也只是从枝节〈上〉改，不能重〈视〉根本问题。〈你〉不愿意接受基层组织群众的监督改造，你曾问："怎样算改变好了？"实际上就是不愿接受改造……

有一次〈你〉在教研组会上谈，"我要下放回家，修收音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反修问题上，你为什么会有古怪的想法。〈说什么〉中国只红不专。说明你的立场观点根本没有改变过来。你也要看看，中国革命胜利才十几年，两枚原子弹〈就〉爆炸〈了〉……站在原来的立场来看问题，必然看错了。你总是希望少谈阶级斗争，多谈科学实验。我们谈阶级斗争，而你讲〈这是〉小孩脾气。你怕谈斗争，因为斗争你总是逃不了的。

〈你要是〉从人民的利益来看前途，前途还是有的，社教运动，对犯错误的人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教育〈他们〉作〈做〉〈社会主义〉新人，改造你，不是抛弃你，你只要把你的问题甚至思想深处的东西，老老实实地交待出来，在群众〈的〉监督改造〈下〉，出路还是有的，你可以对比一下，党对你和国民党对"敌人"的〈区别〉，应该对比一下。

这些年来你也有一点进步，修脑电图机，上学期带实验〈课〉……还是卖了点劲，你有点进步，做的事人家是会看到的，自己不要忙着为自己摆功。

…… ……

学习毛选，不要钻牛角尖，〈要〉暴露思想，你暴露思想人家是不会缠着不放的，你改造好了，〈国家〉可以用你的知识，改造不好，〈国家〉少了你照样发展，并不是少了你不行，不要从自己的名利〈出发〉，不要把知识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

盛某某：束星北来青医几年了，时刻想摘帽子。但做得如何呢？……你说，"张书记要给我摘帽子了，已送到省里去批了，摘帽子后，我可以大请客，可以去疗养了。"……你说"到海军学院去讲课，是多少钱？"你一切为了钱，谁〈只要〉给了钱，什么都干。都说明你的立场观点没有〈得到〉彻底改造。

你的〈问题〉不是思想问题，是政治的〈问题〉。我因迟到让〈我〉写检查，你说"我当系主任，才不让你检查呢！"……挑拨我与组织的关系，〈让我〉恨组织。

你想培养你的接班人，你也经常拉拢青年，你屡次要我做你的干女儿，〈说我〉是你的孩子，人民的子女怎能当你的孩子？

袁某某：…… ……

你说中国光红不专，是什么观点呢？我们又怎能跟修正主义的指挥棒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有了原子弹，有了双水内冷发电机〈美国没有〉，这是光红不专吗？〈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呢？闭着眼睛说瞎话。

你的架子，臭而大，放不下来。你对自己的看法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你的书本知识有一些，志大才疏，但还高傲。你实践上还是个矮子，盲目骄傲自大……

…… ……

马某某：一、对束而言，应当对自己问题的性质有个明确的认识。应从思想上认清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你的立场〉是敌我对立的立场，不是思想作风问题。你几年来的表现，不能说明你〈已〉低头认罪。你说，你〈被〉打成右派是得罪了几个党员，这是对党、党员的污蔑，是荒唐的。你说狂妄自大、骂人、骂所有跟党走的人，不过是作风问题，〈我看〉根本上是立场问题。你几年来，一直消极怠工、放毒、对抗，态度还是不老实……

二、怎么办？有没有出路，出路何在？对一个右派分子，也有出路。党对任何人都是给出路的。从对你的处理就是例子，给你劳动工作，这就是出路……歪门邪道是不行的。如几年来，你老想从科研上找出路，〈认为自己〉有本事，党就用我，但是科学为谁服务，要看立场站在何处。你的想法是危险的。从名利出发，就更危险、荒唐。另外，你也〈曾〉想单干，修仪器赚钱。单干，在社会主义道路中〈是行〉不通的。你还想拉拢青年，想增加点势力，同人民、党讨价还价，让别人给你说好话，这也是妄想。现在大家觉悟都提高了，大家对你的立场看得很清楚。此外，逃亡国外又有什么出路呢？即使出去了〈又怎么样〉？人家也是要走社会主义的。人民的革命越来越发展，你〈只能〉存在于人民中……所以，出路只有一条，低头认罪，改变立场，重新做人。我们也希望你能摘帽子，问题〈的决定权是〉由你来决定的。

…… ……②



束星北在这次评审会上也暴露出自己一些思想，特别是针对人家一针见血的“立场”问题，他谈到自己的深层的“活思想”：

〈我总〉想在科研上作出贡献，不重视思想改造，不大重视政治学习。想搞大名堂，修大仪器，甚至想叫我的学生回来搞原子弹。

…… ……

我很欣赏占洪实的论点：只要生产好就行，不管什么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而，心里总盼着国家重视科技〉，国家重视科技，自己就可早摘帽子，国家不重视科技，〈摘帽子就会受到影响〉……③

会后，1.请求长期刷〈茅〉房，改造自己。〈对此〉已有了一点体会。〈有了〉劳动人民，今天我才有饭吃〈劳动人民干活是为了生活〉，而我干活只是为了改造，这是本质之区别。要想改变立场，必须与工农结合。2.过去是别人伺候我，所以伺候人的工作〈是〉可以打掉我嚣张气焰的关键，我要求长期干下去。3.在劳动期间，向工人学到不少东西。如工人们时时从被服务的对象上看问题，而我就不是这样。劳动中可以体会到一点工人阶级思想。经过劳动对主席的话理解〈便〉进〈了〉一步。〈认识到害怕〉脏和臭是与工农结合的主要障碍……④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的心思人家看得清清楚楚。一个时期他认为，名利思想、立场观点问题，已经解决了，而实际上没有解决。在人家眼里，这仍是个根本问题。显然试图通过“搞大名堂，修大仪器”的技术改造来实现“摘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束星北意识到必须重新确定改造方向。以前刷茅房只作为他打扫卫生的一小部分〈刚到医学院时，他只分管行政楼的几个厕所〉，现在他要求打扫医学院所有的茅房。这是一项艰巨而困难的工作，但束星北乐得其所，他认为自己这样改造，可以回避很多他无法解决的矛盾，特别是技术改造的矛盾。改造生涯中，他一涉及这个问题时，就会给他带来无穷的麻烦与痛苦。每当他希望能够通过技术改造来实现“摘帽”时，人家就认为他是想逃避劳动、逃避改造，资产阶级高高在上的尾巴还没有剪掉〈他在向党交心书中也承认，他好长时间都没有认识到，人们对他的所谓技术改造是多么的反感与憎恨〉。经过认真思考，他决定长期从事刷茅房，以此来彻底解决立场问题，由此可以打消人们对他的憎恨与戒心。

实际上通过最初的一个时期的实践，他的认识和思想已有了变化，他喜欢上了这个工作。喜欢就包含着自觉自愿，很长一个时间里，束星北也觉得通过刷茅房，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立场问题也应该是相应地解决了。

刷毛〈茅〉房对思想改造有重大的意义，能刷掉资产阶级臭思想

1965年2月4日

有一天听说我和吴芳、刘仁德〈皆医学院的教师、右派〉涮〈刷〉毛〈茅〉房，认为这是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当看到便池上的大粪，便池坑旁的浓痰，扑鼻的臭气，难受得要呕吐，但是看见高师傅不声不响地在涮〈刷〉，一面涮〈刷〉，一面告诉我应当怎样涮〈刷〉，才会干净，心里起了深思：高师傅并不是右派，更不是反革命坏分子而且是光荣的积极分子，为什么他就不嫌脏不嫌臭呢？难道他的鼻子和眼睛有什么不同？想起来，只是思想的不同，他是劳动人民出身，我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他从小受的是无产阶级教育，我从小受的是剥削阶级教育，所以我们两个人对涮〈刷〉茅房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涮〈刷〉茅房既然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独社会主义即使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涮〈刷〉茅房的人，这是人民的需要，凡是做人民需要的事都是光荣的事，所以他不怕脏，不嫌臭，所以我也坚持不怕脏不嫌臭了。但是当我看见便池内有草屑，用扫帚扫，扫不出，用擦地板的擦子拖，也拖不出，正在为难，却看见高师傅在另外一个便池内毫不迟疑地用手拈起草屑。他这种不怕脏的行动给了我启发，我也就跟着学习，用手拈起来，又省事，又便利，而用扫帚，用地板擦却多时搞不出来。这是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我必须跟着学习，一个人脏些臭些，能给全院几百人带来好的不脏不臭的干净环境，就是为人民做了好事。因此，我就安心地涮〈刷〉茅房，保证不嫌脏怕臭，还要涮〈刷〉得更干净，给全院几百师生员工带来干净的环境。

涮〈刷〉茅房一事在旧社会〈的〉眼光中看来是很不光荣的，事实上，是被人看不起的"下贱事"，但是这是人民需要的基本卫生的一件事，涮〈刷〉茅房也就是具体"为人民服务"的一件事。单靠我空口喊"为人民服务"〈是不行的〉，有什么具体行动表现出来呢？单靠讲"听党的话"〈是不行的〉，有什么具体行动表现出来呢？一定要从具体的事下手，涮〈刷〉茅房就是具体地听党的话，具体地为人民服务，因此涮〈刷〉茅房也就意味着涮〈刷〉掉资产阶级的臭思想，涮〈刷〉掉"劳心者"的剥削思想，涮〈刷〉掉剥削阶级"高人一等"的臭思想。

凡是人民需要的事而又是我的力量所能做的事，必须全心全意的〈地〉做。在新社会只有没有出息的人，没有没出息的事。北京有位全国先进工作者"时传祥"，就是掏大粪者，一直被评为光荣的全国先进工作者。对我讲起来，涮〈刷〉茅房能改造我的旧的肮脏思想，〈这样一来〉对我的意义就更大了。因为〈过去〉我满脑子的"高人一等"的臭思想在作怪，是不是安心乐意涮〈刷〉茅房，就标志着是否看不〈看得〉起劳动人民？涮〈刷〉茅房是在群众监督下进行的，是"立竿见影"的，是不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服务，是不是真诚地悔过自新，群众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涮〈刷〉茅房最便于群众监督，而且涮〈刷〉茅房完全适合我的年龄体力……

检查这一段，涮〈刷〉茅房期间，缺点还是不少，首先，还是感觉脏臭，不很自然，所以我请求领导能长期地让我涮〈刷〉茅房，一定要做到完全自然，不感觉脏臭，要做到喜爱涮〈刷〉茅房的工作。其次涮〈刷〉茅房不得门，诚如高师傅指出的，"还不够灵活"，没有做



到"多快好省"，所以还得虚心学习，不浪费时间，不浪费水。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尿的陈垢固然可以用盐酸涮〈刷〉掉，但是盐酸会〈蚀〉烂下水道的铁管，我怀疑有些下水道的管子坏了的原因就可能是由于盐酸〈造成的〉，准备研究一下，改进去垢的方法。铁管的铁锈也去不掉，也要想法解决，可能用漂白粉去掉。小便池下经常积水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下水道管子坏了漏水，以致群众不便尿在池内，而尿在池外；大便冲水装置经常易坏，原因尚未查明；大便经常在坑外，原因不清，可能是由于水泥做的脚印太在〈靠〉后。便池坑内大便水冲不掉的原因之一是，便坑做法不对，既易积水，又冲力不够，如何设法改善，这些都是问题。⑤

申请长期洗涮〈刷〉茅房

1965年2月4日

虽然我做涮〈刷〉茅房的工作仅仅有一个月，可以说刚刚开始，但收获之大是几年来所未有〈的〉，初步认识劳动改造的伟大意义，深信这样长期下去，可以改变我的反动立场和观点。所以再书面申请领导给我长期洗涮〈刷〉厕所的机会，彻底改造自己，其理由如下：

1. 我以前几十年，都是"为人师表"，教书教这教那，做科研，指挥这指挥那，养成自己不动手的指手划〈画〉脚乱批评的坏习气，甚至来本院后，在改造期间，也是借"培养师资"之名，还是指手划〈画〉脚，〈还是〉"为人师表"，连全组的老师包括张主任在内，都由我考试评分，对改造不利。通过涮〈刷〉茅房的劳动，能够涮〈刷〉掉自己离人一等的特殊思想。

2. 涮〈刷〉毛〈茅〉房的劳动能够帮助我改造、涮〈刷〉洗掉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增加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过去只管拉屎，哪管别人涮〈刷〉洗，别人涮〈刷〉洗还嫌脏嫌臭，连上厕所都口噙着一支香烟来解除臭气。现在体会不同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和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不同的，是对立的。

3. 对刷毛〈茅〉房的劳动虽然已经有了不小的收获——很大的收获——但时间太短，还仅仅是开始，思想意识的改造还没有稳定，没有巩固，自然这需要一个长的时期，使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在脑袋里生根，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造自己。

4. 涮〈刷〉茅房是有些脏臭，但是涮〈刷〉洗后看见不脏不臭，则全身舒畅愉快，觉得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其意义就是从脏臭变成不脏不臭。

5. 二院有毛〈茅〉房20个，离师傅一个人忙不过来，与其用别人帮忙，不如用我，〈刷茅房〉适合于我的年龄体力，有些劳动虽然对改造也有伟大意义，但不适合我的体力，做起来就勉强而不是愉快，所以对劳动改造的体会也就不深刻。

6. 本学期物理教研组不开课，组内工作不会忙，因此我涮〈刷〉茅房不会影响组内工作。

7. 在洗涮(刷)茅房期间，有些技术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待实验，例如，用盐酸洗涮(刷)陈垢是否会影响下水道铁管的寿命，如何改革？瓷盆上的铁锈如何去掉？为什么大便经常拉在坑外？为什么大便经常用水冲不掉？水箱经常坏，为什么？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至少解决一部分，也是将功赎(折)罪，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因此为帮助我改造成为新人，申请领导批准我长期洗涮(刷)毛(茅)房，一直等改造好了，再调动工作。

申请人 束星北⑥

三 四月份思想小结

1965年2月15日

(一)…… ……

这几个月来我在劳动中，在和老工人的接触中受到的教育最大，深深体会到老工人是真诚地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新社会，也深深地感到老工人们关心集体维护集体利益的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

记得去年冬天同学们考试的时期，我们在七点半上班之前，邱师傅很早就将大锅炉生起火来了，晚上五点半我们下班了，邱师傅还没有走。有几天，我也起得早些，看他究竟什么时候来的。但是每次我来时，锅炉火已经生得很旺了。有一次我对他讲，"我不管来得多早，你总是比我更早！"可是他简单平淡地回答了一句："早上生起火，同学们可以早暖和些，考试考得更好些。"这几句平淡的话给我很大的启发！他是从被服务的对象、群众的利益考虑问题的，我更加坚定了跟他们学习的思想，以便加速改造自己，因而将涮(刷)茅房的工作重新作了安排。我也每天早点来，可以先重点地粗涮(刷)一遍，再慢慢地细涮(刷)，也要使大家可能早点用到干净的毛(茅)房，也使大家能工作学习得更好些。

在学习毛选时，我记着毛主席的一段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主席强调"这是惟一的标准"，主席又说过"家庭出身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在"，(我)觉得我过去犯了反革命的罪，犯了反党反人民的罪，但是现在可以好好地干了，应当改造自己成为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才对。

高、邱二师傅都是几十年的老工人，所以我也处处注意学习他们的高尚品质，又开始征求他们的意见。由于高、邱二师傅在旧社会都受过苦，而我一个反党反人民并帮助反动派压迫过他们的人，开始时我考虑到他们对我一定是仇恨的，不甚愿意对我谈话。大约后来看到我干活还肯干，是愿意改造自己的，所以他们也就愿意教育我改造我，将我从反动派改造成为新人。在闲谈中，高师傅对我谈起他的过去和现在。他说，在三十年前，他老

婆死后，乡下种地也活不下去了，带了两个儿子投奔胶岛一个伯父，租赁了一部黄包车拉车子，儿子拾破烂，以后又到码头上扛活儿，怕生病，怕年老。大儿子又被国民党抽壮丁拉走了，至今死活不知。〈高师傅〉解放后到建筑公司当壮工，现在有了安定的生活，生病有公费，年老了也有解雇金，每月可以存个10块20块的。三儿子今年36岁，在橡胶九厂做工人，每月70余元，儿媳在台东火柴厂做工，每月也有40元，有三个孙子(我看过他的一个大孙子，长得很结实，穿得很整齐，精神好得很)，生活得挺好。生活有了保障。邱师傅也讲过，在鬼子时代，他讲了一句"日本话，不用学，过了两年不用它"，就被鬼子和汉奸队抓去吊打，灌凉水，后来花了钱才放出来的。这些苦难的日子从今一去不复返了。从两位师傅的过去和现在，使我更加体会到解放前后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的鲜明对比。解放前，工农的生活是多么不好过，不管在城市或者在农村，环境总使他们活不下去，到处受压迫，受剥削，解放后才得到了安定的生活，有了保障，儿孙团聚。高师傅的过去和现在也是广大的无数的劳动人民的过去和现在。他们完全了解，这样的美好生活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带来的，所以从内心中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他们绝对不会让人破坏他们现在的美好和安定的生活的，不能容忍再被拖回到过去那些苦难的日子去的。谁要是那样做，广大的劳动人民是绝不会饶恕他们的……

高师傅说，"在旧社会，'看坟的'、'管祠堂的'、'家人'、'丫环'、'剃头的'、'修脚的'以及我们这些弄大粪的都是下贱的人，见人低几分；共产党来了，翻了个个儿，××乡的党委书记，就是这些人，掌权的就是这些人，地主被压下去了，工作队也说我们是一样的干革命。"的确，劳动人民是翻了身，这就可以体会到他们是如何地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百万农奴站起来"，在我国，几亿的农奴都站起来了！他们是多么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啊；他们是多么仇恨那些企图将他们拖回到苦难的日子的人啊！

……

在劳动中，自己也向老工人们学习了许多技术和精神。记得开始涮〈刷〉毛〈茅〉房一两星期后，自己认为涮〈刷〉得算不差了，有一次请高师傅提意见，高师傅说，"照你过去的情况，肯干就不错了"，我听了之后，觉得问题不少，一定有不少缺点。果然，在虚心请邱师傅提意见时，邱师傅就指出，地板擦后还有许多泥脚印，原因是地板擦子没有使劲拧干，所以擦后地板上返潮，鞋子走后就在上面留下泥脚印。他看我虚心地听，就教给我擦地板的一些方法，以后照他的方法去做，果然比以前干净多了。过了几天高师傅也说，"大小便池外面擦得好看，但有臊臭味，是由于里面有积粪和积尿垢没涮〈刷〉干净。"于是请他指教，他教给我用铁皮到便池内细刮，用盐酸洗后，多用水冲下水道。我按照他的方法去做，细涮〈刷〉之后，臊臭气果然减少了许多……

老工人不怕脏不怕臭的高尚品质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嫌脏嫌臭嫌腥的感觉在劳动中逐渐地消失了。有一次，一个大便池内被人倒了许多切成大块小块的人肝，又不知谁在上面拉了些大粪，用水冲洗，人肝和大粪堵住了下水道的进口，人肝和大粪又逐渐下沉，如果

有一两块拳头大的人肝沉到坑内经水泡后必然堵塞坑道和下水道，这时想用工具掏出，又没有适当的工具，用手掏吧，实在又脏又臭又腥气味难闻，当时时间也不允许找工具。想起高师傅一贯不怕脏，想起前年一位先进工作者掏下水道粪便的精神，想起毛主席说的，“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分界线就是愿意不愿意，实行不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当时就毫不犹豫地伸手进便坑将人肝和大粪一块一块地迅速地拉出来，之后再用手臂伸进坑道内掏出十几块大小不等的杂着大粪的人肝。虽然手上、臂上、腕上和袖子上都沾了些大粪，但是这些人肝终就掏出来了。以后经过试验，坑道和下水道并没有堵住，觉得自己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内心觉得从未有过的舒畅愉快。毛主席的教导和工人的品质，结合了几个月涮(刷)毛(茅)房的劳动，正在逐步地改变我的思想感情。也进一步体会到主席的话，“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都干净。”

…… ……

(二)目前在涮(刷)毛(茅)房的劳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搞好刷茅房的工作并不是如想象得那么简单。例如过去以为用碱水可以冲掉积垢，可以不用盐酸，以免腐蚀水管，但经实验之后(发现)碱水并冲洗不掉积垢，还是只能用盐酸，只(能)在洗涮(刷)后，用大量清水冲淡，可以“不致”腐蚀下水管子，以后还要进一步实验。

(1)研究大便之所以经常便在坑外的道理，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便坑在毛(茅)房内装得太靠前，人蹲下来头易碰到墙壁，所以倾向于后蹲，这样就使得大便便在后面的坑外。这主要是由于当初装便池的关系，初看起来没法解决，但是后来我将便纸篓放在后面，这样可以使大便的人自动向前蹲，免得靠到纸篓上，并和高师傅商量后，请大便的人注意靠前蹲。目前，便在坑外的现象已大大地减少了，大约减少了百分之六七十，还有百分之二三十仍然便在坑外，有待解决。

(2)研究小便池外所以经常潮湿的原因。主要原因之一是小便时往往离便池太远，以致滴尿池外，别人再小便时就不便靠前，更加离得远，所以积累起来，池边一片汪洋臊气，非垫起砖头不可。要打破这个恶性积累，一方面将小便池边尽量擦干，另方面请大家靠前站，不滴尿池外，保持池边干燥。目前除学生宿舍之外，各处的小便池边已能基本保持干燥。

(3)过去将鼻涕、痰喷吐在地上和大小便池瓷坑上的现象也基本改善，据高师傅猜度，这和瓷坑(便池)地板保持光亮并提醒大家自觉有关系的。

(4)还有大便经常冲不掉，以致经常积粪，要用扫帚刷的问题。这个原因大约主要由于便池装置不对，坡度不对，水的冲力不对，池内没有积水，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法解决。

(5)今后肯定还有不少新问题待解决。如草纸往往不能烧透，以致起风时或者清垃圾时草纸吹到拉圾箱外，妨碍卫生。现在每天起早将垃圾箱四周的草纸收拾干净，再开始涮



〈刷〉毛〈茅〉房的工作，以保持箱边清洁。如夏季、雨天毛〈茅〉房卫生问题也要及时加以解决，但有了党的领导，有高师傅的指导，有改造的决心，这些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

总之，涮〈刷〉了三个月的毛〈茅〉房之后，越涮〈刷〉越起劲，越涮〈刷〉越愉快，想到别人使用毛〈茅〉房时有愉快感，则自己也就禁不住舒畅愉快。我决心在这次涮〈刷〉毛〈茅〉房中，做一个<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人结合，将自己改造成为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⑦

束星北

1965年4月25日

然而，束星北的真诚改造并没有感动上帝，八届十中全会后，随着城乡教育运动的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人们的指导思想后，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也就接踵而来，并且火力越来越猛，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束星北希望通过长期刷茅房来实现同工农相结合的改造之路也因此搁置。

天下大乱，无数的专政者一夜之间变成了被专政者，无数的共产党的中坚成为人民的敌人，登上被批判被改造的舞台。而束星北，每次政治运动的主角，在这次中国所谓最伟大的政治运动中却退居“二线”。

不过，束星北的努力和付出终归还是有了一点回报：1965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他的三年管制被青岛市公安局解除了。（如果从1958年青岛市南法院宣判之日算起，解除这顶帽子用了八年时间。当然其中还包括青岛医学院党委书记张立文和市委书记张敬焘及统战部、宣传部等领导人的付出。）

经过八年的努力，他背负的三座大山终于挖掉了一座。

注释

①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96－98页。

②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六卷第19－26页。

③同上第15页。

④同上第18页。

⑤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115－117页。

⑥同上第120－121页。

⑦同上第122－127页。



23. 风暴中的“死老虎”

以后看了电影《白毛女》后，他又设想自己是杨白劳，而自己的小女儿就是白毛女。每作一次联想，他就会声泪俱下。很快就有人回过味来，当面对他进行了斥责，束星北这才意识到自己把关系给搞颠倒了。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文章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与此同时“篡军反党”的罗瑞卿遭隔离审查，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因种种罪名而被调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因罪被停止了工作。再往后，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被宣布解体。接二连三的“政治事件”，同报刊上气势汹汹铺天盖地的政治批判遥相呼应，在党内党外引起一次次“阶级斗争”的强烈地震：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

在众人的感觉里，这是无数“运动”的又一次“运动”，是前几次“运动”的累加或递进。一切都顺理成章，势在必然。

对山东而言，青岛无疑是反映“文革”的最为敏感的神经，也是决定上面“动向”的旗帜。这样的特殊地位，与这个城市的环境和地位有一定关系，更重要却是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些背景特殊的人物，如黄永胜、吴法宪的子女等，他们无疑是“文革”中的“通天”人物。在这些“通天”人物中，对青岛“文革”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当属康生的儿子、青岛教育局局长张子石。因为有了他，当山东大部分城市还在半梦半醒时分，青岛的革命烈火就开始熊熊燃烧。



“文革”初期，青岛某大学红卫兵小将书写大字报驳斥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如果说青岛是山东“文革”烈火的发源地，青岛医学院就是青岛“文革”烈火的发源地，它在青岛第一个造反起事、第一个成立群众革命组织、第一个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也是第一个杀上社会、到祖国各地传播革命“火种”的先驱。

“文革”时期的束星北与常人无

异，一样迷失在炽白的阳光之下。

…… ……

运动刚开始时，当时我对运动很不理解，认为这仅是批评吴晗的"学术研究"，与自己无关。以后，全院开始贴大字报时，自己又十分紧张，害怕贴到自己头上，挨整挨斗。在这段时间内，自己更坚持加强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包括主席的选集、选读、语录、诗词，也十分注意报纸上的社论与各项文件，除白天几乎是整天学习之外，还加上清晨、夜里，这样通过艰苦的学习和思考，才逐渐了解到运动的伟大意义：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行的一场崭新的创造性的伟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两〉个阶级，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二〈两〉条道路的大决战。从此，我明确了自己的改造方向，紧紧记着伟大导师毛主席教导："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我一定要做到心向着革命小将方面，口向着革命小将方面，而且要努力使自己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海枯石烂，此心不变。

去年，院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革命左派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到处收集黑材料。去年，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三大院校革命小将及其他革命左派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以致市内其他许多工厂、企业、机关甚至街道也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妄图扑灭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燎原烈火，许多身份不明的人到处调查所谓"青医一小撮"所设监狱的关键时刻，我能坚决地听毛主席的话，在口头和行动上坚决站在革命小将的一边。

…… ……

以后，我院的革命小将起来了，小将们对毛主席无限信任、无限热爱、无限崇拜，他们一往无前的心情和行动，大大地感动了我。他们的私字最少，顾虑最少，生气勃勃，干劲十足，将我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高潮，尤其是〈在〉去年九十月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笼罩全市，我怕矛头转向了我，怕被戴高帽子游街，怕被斗，怕被遣返下乡，怕字当头。但我院革命小将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紧紧掌握了〈斗争〉大方向，那种毫不退缩，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精神更使我感动。因此，我更下定了决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他们服务，〈我〉经常利用和家中儿女谈话的机会，宣传我院的革命小将热爱毛主席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精神，希望儿女们不要轻听〈信〉当时市面上流传的流言蜚语和对我院革命群众的攻击污蔑。我将亲自体会亲眼所见的事实对儿女们谈了，驳斥了一些坏人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捏造〈的我院革命小将私设〉"监狱"、"审问拷打"等等无耻谎言。当时明显地〈的〉是由于市内情况相当混乱，牛鬼蛇神内外勾结，妄图变天翻案，我院革命小将为了使一些有问题的人不发生意外情况，便于照管、便于教育、便于揭发问

题，将有问题的人集中在一起劳动、学习，是一件对人民负责、对革命负责的举动，我感到，至今仍感到，那样做主流是正确的，并且那样做了。我在每天集中劳动、学习评比中，得到的收获很大，对我的教育和改造是有好处的，而且睡得好，人身也安全。所以当市内比较稳定(但还不很稳定)时，革命小将安排我们回家住宿时，我就曾再三请求让我继续〈留〉在校内住，这样，既有人身安全，在劳动中、学习上又有收获，且便于大胆揭发问题……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逐渐牵涉到我的儿女了。由于我三儿〈五儿〉(四方青岛玛钢厂工人)公开表示支持和同情青医的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受到围攻并遭到原该厂党委书记的不满，将其列入遣返对象，并污蔑造反派说什么"造反派的黑后台就是束义新！"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斗争，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下，玛钢厂的造反派(最初只有三个，我三儿是其中一个)夺了权，成立了玛钢厂革命委员会，不久得到市革委的承认，我三儿子也被选入了厂革委会。

在农村的小儿子由于和其他六位下乡知识青年，揭发了原支部书记的问题，也被打成反革命，以后在北京南下串连革命学生的支援下，莱西县委给平了反，并成立了以贫下中农、下乡知识青年为主体的红卫兵革命造反团，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罢了原支部书记的官。

我大儿子在原青岛市革命军人转业复员委员会，(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统论的影响下，长期没有正式工作，这一次在他的战友、同学的鼓励和支持下，上访了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才正式安排了工作。

在上海，我的二儿子也是造反派，据说他现在是上海无线电十四厂革委会的委员。

显然，如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再次反扑(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次掌了权，则我的儿女将全部遭殃！

毛主席啊毛主席！十几年前，我没有读您的书，没有听您的话，背离了您的教导，对党对人民犯了罪，我再一次向您老人家请罪。十几年来逐渐有了一些觉悟，认识了过去的罪行，今后一定遵照您的教导，立功赎罪，在灵魂深处闹革命……①

最初，出于改造的本能，束星北认为，对于这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自己应有所反应。碍于身份，他只能积极地动员儿女们勇敢地投身到革命运动当中，自己却不能公开地站到毛主席红卫兵的一边来，因为他是"五类分子"，尽管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角"了，可仍是革命或专政的对象，因而，肯定不会成为革命运动中的"主流"，但是他认为自己可以用一技之长来为红卫兵服务，这样也就等于间接地参加了运动并支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最初的红卫兵革命运动中，束星北以特殊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痕迹：青岛医学院的行政楼、学生楼和一些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上布满了他安装的喇叭。他先是给"红旗战斗队"安装喇叭。"红旗战斗队"是青岛成立最早的一个红卫兵组织。由他安装的喇叭不但响亮，



1966年，青岛医学院红卫兵在山东率先"夺权"后，立刻得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在青岛，其报道消息被印成"号外"在街头散发。

而且声音分布均匀。很快，青岛医学院另一个红卫兵革命组织"东方红公社"在青岛市新建礼堂宣告成立了，两个组织立刻就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交上了火"。

鉴于学校的行政楼和一些学生宿舍都被"红旗战斗队"占了去，"东方红公社"要求束星北在他们抢占的图书楼和楼后的几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上安装功率更大的喇叭。这一年束星北已届花甲之年，体弱多病，架梯爬树很是不灵便了，可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能含糊的，他只能咬着牙，颤颤抖抖地爬梯上树，至今仍有人记得他爬树安装喇叭的窘相："他缘着梯子往上爬还行，可是一上主树杈，他就不会动了。我们头头的意思是要把喇叭架在更高的树杈上，那天风不小，我感觉他在哆嗦，便想上去帮他一把，头儿伸腿挡住我，显然他是想看束星北出洋相。束星北没有办法，便向我要了根绳，他先将绳子拴在一个更粗壮的树杈上，另一端捆住自己的腰，有了这根"保险绳"，他才开始小心翼翼地往上爬。我们的头头没看到束星北出洋相，遗憾地说：'这个老家伙，人家说他狡猾，一点都不假。'"②

再往后，青岛医学院和附属医院不断有人被无辜打死，一些优秀杰出的领导干部如张立文和黑五类一起被批斗得死去活来，一些过去受过处理行为不端的人物趁机跳出来，成了革命组织的头头脑脑。随后是军训团、工宣队的进驻，运动犹如台风拨弄下的海潮，一个浪头打过去，便是狼藉一片。不久，革命造反派组织就开始纯洁自身的队伍，一些"混人"组织成分不洁分子被清理出去，束星北的儿女们也在这个"浪潮"中纷纷落马，成为血统论的牺牲品。束星北开始意识到这场"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远不是他当初所想象的那样，他突然失去了方向。

束义新：

父亲做事一定要有思路有方向。恐怕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如此。可不幸的是父亲对他

的改造也持这样的态度。"文革"时期，他最初是想参与的，因为他已经形成了习惯，有了条件反射，不管什么运动，必须要积极踊跃地参加，这是态度，如果连态度都没有，何谈改造，又何谈"摘帽"。可是他很快就乱了脑子，他不知道这个疯狂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便在伟人思想里寻求出路。有一个时期，他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壁橱里，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时候，毛主席的著作版本很多，他尽可能地搜集到所有的版本：单行本、综合本、语录、选集和一批早期的全套本著作，甚至连毛主席的诗词也搁在枕边。另外他还找到一些马列的原著做参考书籍。我觉着，他是用研究科学的劲头来研究伟人著作。最初，他的研究时间不多，他要经常参加"陪斗"，和学院的当权派一同坐"喷气式"、认罪、揭发、游街或参加由造反派组织的劳动改造。后来，大概是军训团和工宣队开进了学院，学院的革命组织杀上了社会，到处传播革命火种去了。人家的精力大都在当权派身上，父亲就消停些了。这个时候，他的学习便由业余转向专业了。我相信，他为这项研究倾注了很多心血，他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用白纸自裁自制的十几本笔记本都被他写满了)，伟人著作的空白页上，也密密麻麻写满了他的学习心得。可是怎么样呢？我觉得他是越学越糊涂，越学越困惑。他显然是把社会科学当做了自然科学。他显然不能理解文字概念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上的表达是不一样的，有时根本就是两码子事。在学习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了伟人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评价和五六十年代的评价就不一样，不但不一样，简直就判若两人，可是父亲显然不能怀疑伟人，他只能怀疑自己，可是想来想去，自己的"研究"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到了这一步，好像就走不下去了，于是就在心上系了扣，常常焦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③

寻求方向或出路，无疑是束星北面临的"死结"。他尽管有时在被迫无奈的时候，会做点妥协，可多数情况下，他只能被困在"死结"里，他太真太实，又不会麻痹自己，因而，当"死结"解不开了，人就容易走向混乱。这是他在改造中常常遇到的事情，如前一章所谈到向领导申请长期刷茅房就是一例，最典型的是四清期间他曾为转变立场和情感所作出的努力。

…… ……

(二)大儿子越新建议我看电影《农奴》，他已看过两次，流过几次眼泪，(他)说这部电影揭露了旧社会，歌颂了人民子弟兵(大儿子本身是空军复员的)。10月18日下午，洗澡后在红星电影院看了《农奴》，悲愤感动。当看到解放军请强巴上马，强巴却伏在地上当"上马石"时，悲从中来，无怪西藏人称(解放军是)菩萨兵。回家后作诗四句：

五角红星菩萨兵，救人痛苦去人灾，

砸断千年铁锁链，百万农奴站起来。

1964.10.18看《农奴》后作

毛主席真是人类的太阳！看解放军救了强巴，不幸牺牲，将哈达献给强巴面含微笑时，感人至深……中国人那〈哪〉里还有一点"奴才"相呢？自从有了毛主席和他领导的党和解放军，亿万农奴站起来。人吃人的社会从中国消灭了，党改造了人，也改造了我！想起我过去犯的反党反人民的罪，今日思之：更加痛心，必须更加努力地改造自己，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取得人民的谅解，争取立功赎罪，才对得起党，才对得起毛主席，才对得起亿万的人民，才不愧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

看强巴将哈达盖在牺牲的解放军脸上，悲唱：

"雪山呵！青松呵！比不上您的恩情；解放军亲兄弟呵，我献给您白云似的哈达，您用血将它染红"时，泪难自禁，为人民，为解放人民而牺牲是真正的光荣。10.〈月〉25日再看一次，并邀请我爱人和邻居李太太同看〈小女儿已在二中看过〉。可惜她们的座位太近〈楼下第四排〉看不清楚，因此印象也不深刻，以后有机会，想再动员她们看一次，帮助她了解旧社会的残酷，可以提高觉悟。电影的确具有伟大的教育意义，对我的改造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要多看这种好电影。④

这部电影突然让他找到了感觉，他感觉到自己就是被压迫被蹂躏的强巴，这样一来情感便发生了"移位"，他在自我检查时，常常就有了"题目"。如全院里进行的"四清四不清"的讨论会上，本来人家是要他清思想的，可是他没谈几句话就下了"道"，谈起了电影《农奴》。他先是描述电影故事，然后开始叙述细节，大家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因电影几乎所有的人都看过了，都知道这部电影与"四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他根本就不管别人是什么感觉，一发而不可收，当他从强巴的遭遇联系到自己的身世时，竟泪流满面。他说：他同强巴一样大小的时候，他和母亲被父亲遗弃，他牵着母亲的衣襟离开家乡，流落他乡，寄人篱下。为了糊口自己早早地就开始做工，惟一的一个妹妹在纱厂做纱工时，辫子卷进机器，当场被绞死，他自己也在一个大雨如注的傍晚，被一个富人家的狗咬伤了双手……以后看了电影《白毛女》后，他又设想自己是杨白劳，而自己的小女儿就是白毛女。每作一次联想，他就会声泪俱下。很快就有人回过味来，当面对他进行了斥责，束星北这才意识到自己把关系给搞颠倒了。

我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常先把自己比成"杨白劳"和"强巴"，来体会主席的伟大思想；因为我体会到工农群众"文化程度"并不比我高，但是学起主席著作就学得好，就能用，和我不同的原因是由于他们过去受剥削、受压迫、受欺侮，带着阶级仇恨，带着阶级感情学习，所以学习时有强烈的感情。而我出身于剥削阶级，从未受过压迫、欺侮和剥削，思想感情和工农群众不一样，怎样才能学好呢？首先是找机会多和工农群众接近，改变阶级感情，同时，设想自己是一个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幻想"白毛女"就是我的小女儿，

自己是"杨白劳"，幻想自己是《农奴》中的强巴，得到毛主席的拯救。带着这种心情学习时，也的确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在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确实有了感情，读到"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仇敌"⑤时，心里感到十分的痛快。初步认识到这是阶级感情。

经领导指出，这样的比喻是不妥当的。"杨白劳"的一生是受饥受寒、受奴役、受压迫的一生，而我的一生是站在人民头上〈的一生〉，如果把自己比成"杨白劳"，岂不是忘记了自己过去的罪行。对自己过去的罪没有深刻的仇恨，模糊了阶级斗争的界限，就改造不好。

领导批评得对，我实质上是回避过去，想不谈过去。对自己的罪行认识不请，所以到今天还改造不好。如果要比的话，应该把自己的过去比成恶霸"黄世仁"和《农奴》中的"奴隶主"。事实上，我过去所作所为和他们没有本质的差别。我过去在伪军令部帮助训练特务，帮助做特工电讯器材，介绍些本来可以不干反革命事的同学、同事、弟侄去做蒋匪的帮凶，我在伪军令部每张伪币的工资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和那些恶霸地主有何区别？平时站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对党对人民心怀不满，一直到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死抱着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放，本质与那些黄世仁、奴隶主又有什么区别？

黄世仁的下场本来就应当是我的下场；党和毛主席宽大为怀，给我工作，给我生活，让我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目前形势是大好的，我应当赶紧努力改造，真正彻底将立场转变过来，就有可能回到人民的内部……⑥

束星北最终还是认识到，不是没有"路"，是自己没看见"路"，为什么看不见路呢，还是老问题：自己仍被旧的立场和观点蒙着眼睛。毛主席的著作不是课题，不是可以研究探讨的，它是经过无数实践经验证明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自己也只能是认真学习，照着做就是了。

根据林付(副)统帅指示：

"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我〕决心首先背诵背熟"老三篇"。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大概由于年龄大了些，背了前面，背熟了，等背到后面时，又忘记前面了。记起毛主席的教导，"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年龄大，记性不好，决不能挡住我背熟〈老三篇〉的决心。先背《纪念白求恩》。先背两句，背熟了，背得一字无讹，再背次两句，背熟了，四句一齐背熟。体会主席的基本观点在"毫无利己的动机"和"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然后再背列宁主义……的两句，再背"我们中国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的几句到第一段结束后，再总起来背，从头到尾地背熟这一段。这样一天

背两句，第二天再背两句，同时连背第一天的两句，反复背，反复体会每个字的意义，一天一点，就这样，现在已经克服了年龄大记性不好的基本困难，可以从头至尾地一字不误地把《纪念白求恩》篇完全背熟。现在正着手开始背诵《为人民服务》，同时还反复背《纪念白求恩》。不求快，而求熟。一字不讹，从而可体会出主席的伟大思想。睡不着觉在床上时也背，走路时也背，反复学习，这样再遵照林副统帅的指示，反复运用。遇到一件事，反复想到主席说的，"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就感到自己有无穷的力量，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充满了乐观主义，而不是灰溜溜的。这个背诵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现在看起来，完全背熟"老三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只要有"争取胜利"的决心，加之善于学习，是一定可以达到目的的。

同时还要学习主席的全部著作，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很下功夫。

当前，我的最大问题，就是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迅速回到人民内部。这就是我带着的问题，在学习中首先是学习这个问题。一切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毛主席早就指示了，一切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所以首先我一定要遵守毛主席的指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目前，更不准扰乱毛主席的伟大的战略部署，既不准"兴风作浪"，也不许"浑水摸鱼"。从目前揭发出来的"右派翻案集团"可以看出来，有些反革命右派胆敢在那里"兴风作浪"、"浑水摸鱼"的，违背了主席指示，则一定要弄得粉身碎骨，变成不齿于人类的一堆臭狗屎。因之可见，"反革命右派翻案集团"的可耻下场是毫不足怪的必然定律，因为他们违反了毛主席的一再警告，是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同时也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提高警惕，决不能有违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言论和行动。要学习像李文忠同志所说的那样：毛主席拥护我拥护，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反对，毛主席挥手我前进……⑦

注释

①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157－161页。

②张杰明采访录，1997年3月1日。张杰明，青岛某医院副院长，时为青岛医学院学生、红卫兵造反组织负责人。

③束义新采访录，1996年3月12日。

④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94－95页。

⑤查阅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未见此话，显然柬星北记错了。

⑥同上第153－154页。

⑦同上第166－167页。



24.好人束星北

他将自己与竺可桢、王淦昌等朋友作了对比之后发现：论出身、地位、学识、学历，他们之间都没有太大差异，甚至社会关系和人生经历也都差不太多，可是命运却如此迥然，问题出在哪里？经过思考和分析，束星北找到了关键所在。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文革”期间，青岛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死亡、伤残的“地、富、反、坏、右”和高级知识分子有四十余人。①而头号人物束星北却是囫囵囵囵，从处境上讲，他要比整天被斗得死去活来的“走资派”、“黑帮”们好得多，甚至比过去一同改造的“地、富、反、坏、右”们也大都好些。粗算起来，束星北只在“文革”初期，与死神擦了边(1968年青岛二中的红卫兵组织了一次全市规模最大的“牛鬼蛇神”批斗大会，在那次批斗大会上，一些“牛鬼蛇神”当场被打死打残，而排名头号的束星北在押送途中被其长子束越新和青岛医学院的一些人救了下来，才幸免于难)，基本上没遭受太大的磨难。

束星北相对“平安”的原因，知情者的说法是，他的“债务”大都提前“偿付”了，该领的罪也领了，该吃的苦也吃了。再就是“文革”中的“主角”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束星北早已成了“死老虎”，他充其量只能做个“配角”，后来，他甚至连配角也不是了，没人再对他感兴趣了。这显然是通常的说法。实际上，作为青岛头号反动人物的束星北的生活从来没有消停过，他那命运的舟楫一直行驶在惊涛骇浪中，之所以没有翻船，并非“运动”或“死老虎”给予他的幸运，而是在长期“改造”中，他逐渐地扭转了自己的性情，养成了自我保护的意识，换句话说，是运动教会了他“做人”，是改造让他懂得了如何与人交往。

“文革”初期，束星北有过一番骚动，他从自我改造和“摘帽”的角度考虑问题时，曾觉得运动也许会给他带来机会，比如，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的“革命”，既然是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那么，子女们的地位是不是也会伴着他们的革命行动而发生变化？再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前执行的是反动的错误路线，那么自己的“右派”帽子，岂不戴得太冤枉了。会不会对自己的“反动地位”重新确定？但是束星北很快就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幻想。意识到政治运动的矛头重点不管是谁，天下无论怎样变化，他和他的家庭环境与地位都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他的“帽子”也绝不会轻易地被摘下来，他这样的人，“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别无它途。

青岛医学院的舞台上，走马灯似的变换着各种角色，名目繁多的组织此起彼伏，有些憋屈了多年的“五类分子”，沉不住气了，“跳”了出来，跳准了地方或节拍，也会风光一时。可束星北没有非分之想，他也不能有非分之想。他虽然是“死老虎”了，但很多人没有忘记

这个"死老虎"，但凡发生点什么事，就会从他那里找根源，如社会上一旦发现了反动标语，青岛医学院或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第一个要追查的就是他和他的子女；哪里有个在押的"五类"分子突然跑了，束星北的家马上就会热闹起来。"清理阶级队伍"也好，清查"五·一六"分子也好，文化大革命潮流中，每掀起一次巨浪，束星北都难脱干系，因而，不管学院里发生了什么，怎么变化，有没有人"管教"，束星北只能一如继往地、心无旁骛地进行改造。

他如往常一样，上班下班，学习、"改造"；每周仍要写两到三篇的思想检查、学习心得与工作汇报，如果出现意外情况的话，还要加写情况汇报。很长一个时期里，主管部门被造反派冲垮，人事处、保卫科的头头都打成了"走资派"和"黑帮"，他的改造处于相对真空中，这个时候，他完全可以喘一口气的，可是他没放松自己，仍如往常一样，照样的上下班，思想检查和工作学习汇报无处可呈，也照写不误。等到"组织"恢复后，再一并上报。

这个时期的思想与心态，束星北在检查或汇报书中时有透露：

检查一年来，无论在思想上、工作上，私心杂念经常抬头，"怕得罪人、怕多事"，"不求有功，但求无罪"的思想经常出现。看见厕所自来水漏水、厕所水箱漏水或不出水，开始向邱师傅反映，向总务科反映，几次(反映)后没产生积极效果，反而引起"多管事"的反感，就甩手不管了。事后，随即作了自我检查，认识到这种反感的一部分是由于自己的态度，使听到反映的人认为我是在批评他不负责而表示自己的负责。至于甩手不管，更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作怪，是私心在作怪，是庸俗的一团和气在作怪……

在修理附属医院的超声波仪器和高频电刀的过程中，更暴露了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当时首先考虑的不是修理好了之后，可以为人民做点好事，立功赎罪，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再惹出事(是)非来。而回想到1967年为了海军医院修理心电图仪的事，所以当王科长命令我们国庆中不(得)出外(外出)时就顺水推舟地不去修了……心里想，如果万一修坏了，就有可能被加上"不好好地干，故意破坏"的罪名，再者，又怕别人加上"不愿涮(刷)毛(茅)房，逃避劳动"的罪名。这样多的私心杂念，在头脑里打圈圈……②

……

在修理罗青生交给我(的)三台陆军医院的心电图仪时，更是前怕狼、后怕虎。一怕军事机关可不同于别的机关，这种进口的精密仪器如果不幸修坏了怎么办？即使修好了，以我现在反革命右派分子的身份，修理军事机关的东西，可能再被揪斗。所以总借口推脱，宁愿跟电工任师傅干别的活儿，不敢动手。引起同位素(室)和医院革委会的极(大)不满。特别有一次，任师傅转告我说，王在中同志讲我烧坏了同位素居里仪上的一支(只)管子后，更加吓得要命，这是一支(只)进口的德国管子。对别人讲起来，修理仪

器烧坏一支(只)管子，问题可能不大，但对我讲起来，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我是戴着帽子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就可能被认为是"破坏"，一是可能被逮捕，二是可能(被)"遣返"，在我目前年老多病的情形下，准是一命呜呼，再也不能为亲爱的祖国尽任何力了！再也谈不上将功赎(折)罪，而只有"永远为人民所唾弃了"！另外还有一次，不当心(我是粗心的，老来更容易遗忘)弄丢了同位素(窒)一支(只)晶体二极管，再找也找不到(只有苞米粒一样大小，可能扫地扫丢了)。凡此种种，都使我迟迟不敢修理这三台陆军医院的仪器，顾虑重重。同时也想将功自赎，觉得"也可以"避免出错。患得患失的心理(让我)拖了好久。带着遑(惶)遽心情，从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首先从《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中，找到毛主席的指示："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推三阻四，找这种或那种原因不修陆军仪器，这些原因不全是一些空话吗？是真认罪，假认罪，真服罪，假服罪，真想立功自赎，假想立功自赎，就是对我的考验，是"南京政府向何去"的问题，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面前两条路的问题。决定"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但是又怕，如果万一修坏了怎么办？被戴上"破坏活动"的帽子怎么办？……由于这些仪器是新型的，半导体式的，我不熟悉，怎么办？如果冒失动手，弄坏的可能性就更大。这是一件"不能失败"的事，不能"摸索"前进。再查主席著作，主席教导我们，"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根据主席的教导，请使用这些仪器的解放军同志介绍它们的现状和它们的历史，有了初步的办法；但还不能做到"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于是再借来资料，通过思索，自觉已符合主席所指示的要求。为了防止万一，在罗青生同志和任树霖同志(陆军医院的两个战士)的分别监督和协助下，进行了修理，一个一个地完成了任务。心情非常舒畅，紧张过去了，带来了甜蜜。深深体会到只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才能"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钝刀子是割不下肉来的……③

"文革"期间，很多医院的仪器设备由于长时间闲置或使用不当，出现大量损坏、老化。这给时常"赋闲"的束星北带来了"显山露水"的机会，因"文革"前有了一段很扎实的"技术改造"的训练，无论什么仪器出了毛病，束星北都是手到病除。青岛医学院宣传处一位副处长曾对束星北在青岛医学院改造期间所修仪器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发现了束星北的足迹几乎踏便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据粗略统计(已拿不出详细数字)有50多家，所修复或改造的仪器涉及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保温箱、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比色计等装备。至于所修复的台数，已无法统计。

一般的情况下，要请个修理师傅，就等于请一方神仙，要好酒好烟伺候，要有专人陪

着，还得看着脸色，特别是"文革"后期，光烟酒伺候已经不行了，还得搭上些东西。如有一点照应不好，轻则给脸色看，重则让被修理的仪器三番五次地受折腾。束星北所到之处，虽不拒绝酒饭(可酒饭钱和粮票分文不少)，可是礼品，他一概谢绝。他只要一个东西：证明信。证明信一是要写明来往时间，二要有仪器修复后的验收报告，三是要写明他在工作期间的表现。一般情况下，这些证明信都被写成了表扬信。在很多医院看来，他的"事迹"的确让人感动，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出色、优秀、清廉的修理工，他还是个出色、优秀、热情的清理工，所到之处，他一定会将人家的环境(仪器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果赶上人家的下水道或阴沟堵了，他便会大显身手。他不光修理医疗仪器，人家的变压器、锅炉、水塔、汽车和食堂里用的鼓风机等也都在他的修理范围。

王惠玲

(青岛某国棉厂工会干部、某街道办事处主任，束星北的五儿媳)：

在我印象里，"文革"期间，老爷子还算消停，特别是"文革"后期，青岛医学院已经不太管他了(麻烦主要来自社会，如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等)，干活、洗刷茅房，全凭自觉，但是他却一刻也没放松改造，一刻也没放松写思想汇报，凡上面有什么新动向或人家要他做什么事，都要同我们商量。那时，我和义新在家里住，也许是因我当了几天工会干部和街道办事处主任，有些对付红卫兵和社会上爱捉弄事的人的经验，他就把我当成老师，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同我商量，征求我意见。比如说，思想汇报书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毛主席语录，社会上来人抄家应该怎样对待，每每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后，是应该参加街道办事处的庆祝活动还是参加青岛医学院的庆祝活动。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处理不好就有可能招致灾难，因而，老爷子做起来从不会马虎。他的谨慎小心，我们能够理解，因为这个家，只要他不出事，就不会倒塌。但有时候，他也会小心大了，弄出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比如说，有一天，青医附属医院行政科有个女老师来家通知老爷子去附属医院修仪器，他先是应了下来，可那人前脚一走，他就说不对，眉头憋蹙得老高，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一肚子的心事。我觉得蹊跷，就问他怎么了。他寻思好一会儿说：医学院总务科头一天告诉他到学校后院去抬土垫操场的。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他不说话，仍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焦焦躁躁的，像是让人堵在屋里似的。我说：爸，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人家让你去你就去嘛。他眼睛瞪着我，憋吃了半天，突然冒出来一句：她家是地主。老爷子这话我好长时间回不过味来：人家是地主出身，那你是什么？我跟他开玩笑，可他并不觉好笑，非得撵着我，跑了一趟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把这事落实了，才肯出门。④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1973年2月，青岛医学院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根据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指示和“改恶从善”的政策，将束星北的表现材料发给全院，以进行“摘帽”摸底调查。当时，医学院的行政机构和教育机构以组为单位，谁也未想到，束星北的表现竟得到物理化学组、宣传政教组、外文体育组等所有部门的一致赞同。这样的“待遇”在青岛医学院被改造的“五类分子”中还没有先例。从中可以看出，束星北的改造已达到了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仅靠着“谨慎小心”、“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修不来的，它还有更深刻的内容。

束星北曾致力解决两个问题(也是他解决情感与立场问题中无法绕开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的品质问题，二是做什么人的问题。品质问题是他将自己与竺可桢、王淦昌等朋友做了对比之后发现的：论出身、地位、学识、学历，他们之间都没有太大差异，甚至社会关系和人生经历也都差不太多，可是命运却如此迥然，问题出在哪里？经过思考和分析，束星北意识到他同竺可桢、王淦昌等人之间的差距：他们谦逊谨慎、平等待人、善于处理应付上下各种关系，并能够小心地将自己的锋芒包藏起来，可是他呢？他的命运如此的糟糕，不就是因为自己“傲上慢下”、“锋芒毕露”，“一贯地和领导组织作对”，“一贯地瞧不起群众”吗？因而，他才会有如此糟糕的人际关系，才弄得人人厌之、憎之。

对于做什么人的问题，他也有了新的认识，以前他一直是“高高在上”，高傲无比，自认为“超凡脱俗”，“与众不同”，来到这个世上是注定要有一番大的作为的，即使戴上帽子后，“骨性”仍然未变，想凭着技术改造来实现“摘帽”的意愿，实际上就隐含了这种心态。转折点应该在原子弹爆炸之后。因为原子弹的爆炸，粉碎了他企图通过“技术改造”来实现“摘帽”的梦想，他意识到，凭着“技术改造”实现“摘帽”的本身仍是骨子里“高人一等”、“瞧不起群众”的意识在作祟。于是才有了“申请长期刷茅房，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改造路线，才有了真心实意地与普通百姓交朋友的情感，才有了彻底放下架子，与普通的人搞好关系的行动，才有了学雷锋做好人，做普通人并成为他们一员的愿望。

从一个历史阶段来说，束星北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他成功地交往了一大批工农兵朋友，除去他的真诚与谦虚外，与人交往的方式仍是缘着技术与手艺，这一点他无法绕开，也不能回避。由于束星北在修理脑电图仪和其他医疗仪器上的成功，很多人把他当成了手艺高明的修理师傅。开始人们只是将出了毛病的收音机、半导体交给他修理，以后修理范围逐渐扩大，发展到闹钟、座钟、手表、电灯、电话线、自行车、缝纫机等。文革”中后期，一些意识超前的人、对运动开始厌倦的人或者被“革命运动”提前淘汰出局的人，重新确立了人生的坐标，有了文化知识的需求，便开始接近他，从他那个似乎什么东西也能变出的“万宝囊”中掏他们需要的东西。也有些家长似乎参透了“运动”的本质，他们将自己的“革命小将”，从“前线”上拖下来，送到束星北身边去接受文化补习。束星北有求必应，来者不拒。

为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地成全别人，他甚

至将自己的研制的成果送给那些急于功成名就的人。如陆军医院有一个姓任的卫生员，最初只是负责束星北为其院修理仪器的联络与服务工作，时间处久了，便跟他学了些星星点点的东西。赶上部队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争当标兵、先进，这个卫生员工作平平，竞争力有限，尽管作出不少努力也未能如愿，便将自己的“活思想”给束星北说了，束星北问他怎样才能成为“标兵”，他告诉束星北说因名额有限，必须做出超常的贡献才有可能，比如在医疗器械上做出点发明什么的，束星北便为他设计安装了一台电子兴奋器。没想到，这台新型的电子兴奋器，无论性能水平质量都远远地超过了老一代电子兴奋器，立刻就轰动了军队卫生界，那卫生员自然就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成了军队的英雄，束星北想不到在一个战士身上，这点小玩艺，竟能带来这么大的政治荣誉。人家出名了，如愿了，他也很高兴，像自己也得了头牌。



相依为命，携手人生。束星北与妻子葛楚华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青岛医学院的合影。

……当今春任某某同志被选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时，我的尾巴居然也要翘起来了！好像自己也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了！的确，在设计“电子兴奋器”代替老式的“电子兴奋器”时从头到尾用的是主席“对立统一”的伟大思想，才取得初步成功。但这一点点成绩仅仅是在党和人民的关怀支持下，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下，才能取得。光荣应该归功于毛主席，应归功于党和人民，应该归功于济南部队首先创造(了创造)"电(子)兴奋器"(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人。归功于任某某同志的辛勤劳动，而我仅仅做了一点点工作，根本数不上……⑤

"文革"中，束星北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形象"，很多人都不知不觉地消除了对他的敌意、对立和反感，并开始接受他、容纳他。在很多与他打过交道的人眼里，他是个好人，好老头，正直、大度、风趣、中交。他们大都不太在意他的身份，他们和他下棋、打牌、喝酒，谈家庭私事，谈藏在心底的秘密，家里来了亲朋好友，他常常被拉去陪客。有的人家有了红白喜事，也将他请去帮着张罗张罗。1968年9月，驻青医工宣队、军训团和实行大联合后的革委会冻结了部分牛鬼蛇神的工资，束星北也在其中，从此他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30元的生活费让多数牛鬼蛇神慌了神、麻了爪，可是束星北的生活却没有遭到太大的冲击(与在月子口只发20元生活费完全不同)。这个时候，他平日交结的朋友走了出来，今天你半斤鸡蛋，明天他两斤面条，后天又有人带上两捆新鲜蔬菜，总之，在从经济上打击牛鬼蛇神的日子里(直到1974年他的工资才解冻)，束星北的日子并没有太窘迫，⑥这让他的子女也感到惊讶。他们弄不明白，极少交友(特别是建国以后)的父亲怎么一下子冒出了这么多的朋友。甚至一些过去对他敌意很深的"专政者"也慢慢地改变了态度，他们虽不敢违反原则，为他网开一面，却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给他提供些生活方便。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束星北在医学院的"地位"。如1970年青岛医学院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开门办学"的精神，迁往惠民北镇办学。束星北被以年龄大身体弱的名义，破例安排了一间小房，冬季到来前夕，还专门给他送去了烤火煤。这对一些右派或"五类分子"来说，是想也不敢想的。

王惠玲：

老爷子的朋友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可是最好最近的还是那些看洗澡塘的，烧锅炉的，拉大车的，刷茅房的，这些人地位虽然很低，但是关键时刻最出力的就是他们，甚至连食堂的大师傅也是老爷子的朋友，只要他去打饭，总会得到他们"偷偷摸摸"的照顾。我记得有一天，老六孝新带着乡下的未婚妻回来(束孝新劳改回来不久，正赶上知识青年下乡插队，他在城里也找不到活，就跟着下到莱西，当了农民)，那天医学院食堂卖炸鱼，老爷子便去食堂买炸鱼招待未过门的儿媳，医学院食堂离我们家住的地方至少有二里路，老六怕累着老爷子，去抢他的手里的饭盒，可老爷子死活不松手，说着说着就嚷嚷起来。老六也不知其情，说，这鱼谁买还不是买；老爷子说，那可不一定。老六犯了犟驴脾气，非要看看怎么个不一样法。两人便一起去了食堂，结果，老六

买的一份炸鱼又少又小，老爷子买的又大又多，差不多是老六的两倍，老六愣说老爷子买了双份。他哪里知道，他老爹这份待遇是修了多少年才修来的，没有一定的关系，谁会白给你这么多炸鱼哪？⑦

注释

①据青岛医学院人事处处长王洪健采访录，王洪健时为青岛医学院人事处副处长，现已退休。

②束星北档案第六卷，第105－107页。

③同上第115－119页。

④王惠玲采访录，1997年1月12日。

⑤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六卷第139－140页。

⑥束星北的工资自1968年冻结到1974年解冻，为时六年之久，这期间，朋友或左邻右舍的帮助固然重要，但真正帮助束家渡过难关的应是"二娘娘"。

"二娘娘"再次来青岛，是在"文体大革命"爆发的翌年(显然生活与环境的闭塞使得"二娘娘"对外界的感知要远远地滞后于社会)，"天下大乱"让"二娘娘"又开始为束星北牵肠挂肚。对大桥镇来说，"二娘娘"突然失踪了，因为她没跟任何人打一声招呼就走了。

这次来青，"二娘娘"住了很长一段日子(这对身份不清不白的"二娘娘"来说，实属不易)，她仍像上次一样，择菜做饭，拆拆缝缝洗洗，做一个尽职保姆，她还从街道上找来一大堆活，诸如拆线手套、糊火柴盒、结发网等等。至于她怎么和人联系上的，怎么揽到的活也无人知晓。这个时期，束家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

"二娘娘"这次来青还了却了一件事，她将自己所有的积蓄留在了束家，那是一个紫檀木首饰匣，里面是一些金银首饰，这些金银首饰部分是父母遗下的家传，部分是束大嘴的报偿。束星北的工资被冻结后，正是靠着子女变卖"二娘娘"这些惟一的"家产"，才渡过了难关。

"二娘娘"这次回去之后，再没有来青，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束星北一俟工资解冻，头一件事便是恢复给"二娘娘"的接济。1983年9月自感不久于人世的束星北留下了遗嘱，其中一条，就是在他辞世后，将"二娘娘"接到青岛，养老送终。

按照父亲的遗嘱，五儿媳王惠玲到江都大桥镇将"二娘娘"接到青岛(王惠玲来到大桥镇时，"二娘娘"已命悬一丝，她的西厢房像个牢狱，无人靠近，左邻右舍有怜悯的，也不靠近，远远地丢过去一块米团子或饼子什么的，够得着就吃够不着也就算

了，王惠玲忍着腐烂的恶味，找了个大木桶，换了五次水才把"二娘娘"洗出来)。"二娘娘"在束义新和王惠玲家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日子，于1985年故去。

⑦王惠玲采访录，1997年1月12日。



25. “恳请党领导拉我一把”

父亲在前面，我拿着竹扫帚跟在后面，可没走几步他便把孩子交给我，要过扫帚又折了回去。我以为他又要回去扫雪，却看着他进了"路旁"。这时我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好大一片哪。是父亲的作业吗？

束义新：

在我们看来，“文革”后半期，父亲的日子应该说还是比较好过的，上面的事情少了，学生们也懒得打他的注意，一段时间，他好像被人遗忘了。按说，头上的紧箍咒被人家念了这么多年，突然不大念了，该是个好事，可他却受不了了。常常一个人独自藏在壁橱里发呆，有时好像要找一本重要的书(那时，他已经在家偷偷地翻看专业书籍了)，把堆在床底、墙角的书来来回回翻扒上几个遍，也不知道是不是找到那本书了。有时信手写个书单给我，让我到山东大学找某某某拿书，其实那时山东大学早就搬走了，老地方已是海洋学院了。他说的某某某是注定找不到的，他所要的书籍也无从去找。见我空手回来，他就发火。

他越来越“神经质”，一旦广播、报纸报道重大发明或成果，他就不停地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常常通宵不眠，然后他就把自己关在壁橱里拼命地写一大堆心得体会和赞扬稿，有一些还交了上去，其实，组织上从没人让他写这些东西。有一回，他独自坐壁橱里垂泪，口中还念念有词：本该是我来做的，本该是我来做的。我走过去一看到他手里的报纸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我记得那颗名为东方红号的人造卫星，以每小时三万公里的速度向全世界播送着《东方红》乐曲。

他的这种情绪也影响到家人。那时，我和妻子王惠玲跟他住在一起，为了让他高兴，我们想着法给他排忧解闷，就像陪护病号那样，陪他说话、陪他散步、陪他玩耍。特别是晚上，我们一定要陪他玩一会儿，不然他肯定会看书会失眠的。显然他理解我们的心情，一直配合得很好。我们曾天真地认为，这样时间久了，父亲的“病”就会好起来，可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明白了，父亲的“病”，恐怕永远也不会好起来了。那天晚上，我和惠玲、美新见父亲迟迟不睡，就主动邀他玩“老虎过河”。“老虎过河”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游戏，无非是谁先将老虎、羊和白菜通过不同的搭配，分别组合后用同一条船运到河对岸，谁就赢了。父亲从没玩过种游戏，哪是我们的对手，结果一个晚上，他都在输，最后输得拂袖而去。弄得我们还劝了他一阵子，才去睡觉。本以为这事就搁下了，没想到翌日一大早，父亲便把我们堵在屋子里，告诉我们说，有答案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着，钻进“壁橱”，拿出一摞子一米见方的大字报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计

算符号。他说这就是他的答案。我们谁也弄不明白父亲计算的是什么，父亲告诉我们说，这是他老虎过河的计算成果，他从各个角度用各种形式计算了老虎过河的方式。他说，尽管你们赢了我，但你们过河方式并不是最佳的。当我们知道父亲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游戏而通宵未眠时，都惊得目瞪口呆。①

秉美新：

父亲很早就说过(大约是60年代末一次家庭会上说的)，他最怕的还不是政治压力，最怕的是不让做事情了。这话谁听了都觉得挺沉重，可是对我来说，真正理解这句还是在多年之后。他虔诚地改造，一丝不苟地改造，全心全意地改造，总之，他为"摘帽"所作的一切努力，主要还是为了可以做事情。因而，对他这样的人，做事情才是他活着或活下去的理由。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原子弹的爆炸也没有把他的梦完全炸碎了，接下来的改造，尽管他包揽了青岛医学院几乎所有的厕所，决定在长期洗厕所中彻底改变立场了，那个"本"儿也没变。尽管他平日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东西，可是那个"本"会不知不觉地冒出来。譬如，他设法对厕所进行改造与设计，对人们使用厕所提出科学的建议等，他甚至还配制了一种除锈剂，瓶瓶罐罐地堆了一桌子，因化学不是他的专长，也不知道配制成功了没有。有个时期，人们看到他打扫完厕所，便躲在一边清点有多少人使用他清洗过的厕所，有人理解为清闲(因为那时候已很少有人管他了)，有人理解为成就感，说他打扫过厕所后，看到这么多人在使用他清洗得干干净净的厕所，就有了成就感。我觉得他们都没理解对，我认为父亲肯定是在作统计，以便找出清洗厕所和使用厕所的规律性的东西。他做事情一定要有目的，即使一些在人家看起来很荒唐的事情。

这样的人，不让他做事情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给我印象最深甚至还不是他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消息后的哭泣，而是在北镇青岛医学院大门口我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情。

1970年7月，山东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以"开门办学"、"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名义，将一些高校下放到农村办学，青岛医学院被迁到山东省惠民北镇。父母也随着学校去了那里。在这之前，我为了逃避上山下乡，找了个工人匆匆结了婚，并且很快便随着丈夫一同下放到聊城一家三线厂子，那还是我第一次和父母分开。孩子"百日"后，因惦记父母便带上孩子乘上长途车去北镇看他们。我记得那是1971年元月的一天，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长途车慢得像爬，路上折腾了五六个小时。路边车站离学校还有一段路，下了车，我抱着孩子又走了约二十分钟才来到北镇医学院，正逢寒假，建设得半里不落的学校格外的冷清。我生孩子时，母亲专门到聊城给我伺候月子，听她说北镇生活和住处很差，可监管却松了，父亲的改造好像都没人管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好像被人给遗忘了，清理厕所也好，打扫环境卫生也好，全凭自觉，可是父亲不敢有一点松懈。每一天的改造工作表

就贴在大门上，他像个听话的学生一样，照着做。我听了母亲的话后，心情很是难过，我担心这种被人遗忘的改造，对父亲来说会是很沉重的折磨。

远远地看见校门口一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扫雪，他一身黑棉衣棉裤，在漫天皆白的世界很是醒目。我马上就意识到那人是我父亲，心立时就抽紧了。走过去发现果然是他。显然他一大早就出来了，从他的身后看过去，一条长长的路已经被扫了出来，我忍着直往上翻涌的泪水说，爸爸，您的外孙来看您来了。父亲看着我和孩子愣了好一会儿，才大梦初醒似的在棉衣上使劲地搓了搓手，抱过孩子就不再撒手了。父亲在前面，我拿着又大又重的竹扫帚跟在后面，可没走几步他便把孩子交给我，要过扫帚又折了回去。我以为他又要回去扫雪，却看着他进了"路旁"。这时我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好大一片哪。是父亲的作业吗？这时候，我想起母亲告诉我的，父亲常在他清扫过的学校操场或球场上"做作业"，常常把操场或篮球场写满，然后擦掉，黑板擦子当然是他大扫帚。有时候也随写随擦。母亲说他从不阻止他做功课，外人看到也不管，只当他疯癫了。我抱着孩子候在一边，看着父亲用他的大"黑板擦子"使劲地擦他的"功课"，也不劝他。我这个时候甚至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从不劝阻他做作业了。他突然喘起来，嗓子像个风箱似的，很是吓人，我知道他的肺气肿又加重了。他终于觉得满意了，我们才往家走，看着父亲摇摇晃晃的后背和蓬乱的脑袋，我的泪突然止不住了，父亲抱着他的外孙子只顾在前面走，也不说话，我在后面哭了一路。②

1970年国庆节，一批"失踪"多时的科学家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钱伟长、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周培源、贝时璋等等。这些科学界的代表人物大都是束星北的



期盼"解放"、"摘帽"。束星北夫妇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合影。

朋友和熟人。他们的出现，让科学界和教育界为之一震。敏感的人们还注意到：美国客人埃德加·斯诺一直伴在毛主席身边。翌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主席和这位与中国有着特殊关系的美国记者的照片。照片下面的文字是："友好的美国人"。这无疑是一个信号，它至少说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松动的迹象。

束星北感觉到这个信号意味着什么，他向老校长发出了求救的呼叫。他显然不知道老校长的处境。一个曾经的中科院副院长，在1970年能做些什么呢？他尽管出现在天安门上，但距离他真正的复出还有两年之久。

竺可桢尽管通达、博爱、善良，可是命运没有惠顾这个备受到世界同行尊敬的"圣人"。"文革"初始，竺可桢便失去了职务，遭到批判。最初的批判还算"和风细雨"，可是不久，一张竺可桢重用包庇国民党分子崔克信的大字报贴了出来，"和风细雨"化作"狂风暴雨"。(崔克信是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老地质学家，建国前长期从事华中、华南和西康省地质矿产调查，曾出任西康省地质调查所所长。1955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任三级研究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到降级和调离地质所的处分。素来惜才的竺可桢，考虑到综合考察委员会缺少高级研究人才，冒着风险将他从科学出版社调到综考会矿产资源室参加研究工作。而实际上，崔克信到了资源室后，因政治成分的问题，根本就无法接触到矿产机密，人几乎被闲挂起来。)接着又以竺可桢为纪念明代农学家徐光启发表的文章作为借口，攻击的炮火越来越烈。起初，竺可桢对运动的理解只是在"反修防修"的层面上("文革"之初，他明确表态让大家给他提意见、贴大字报，他甚至真诚地希望中科院的人给他贴一百张大字报，来帮助他"洗澡"。)，可是当中国科学院一大批领导和院内外的科学家都成了"反党集团"、"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冲击迫害时，特别是他尊重的好友老舍等一批艺术家和科学家的自杀，让他困惑了：对敌人的俘虏也不能这个样子，更别说对中国有贡献的知识分子了。他多次要求周恩来的联络员，向总理如实汇报他的意见"注意改正这类偏向"，可是接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越来越强劲的风暴席卷了。竺可桢也只能自律自洁了。

比较起来，竺可桢也许是幸运的，他是中科院惟一一个可以不参加中科院党组活动的党员副院长，由于周恩来的保护，他没有直接受到暴力冲击。整个"文革"期间，他既没有受到正面批判斗争，也没有遭到抄家之祸。从表面上看，他只是离开了工作(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他的实验室就是大自然，以前他每年都要多次外出，直接考察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变化情况。同时他也从各地科学家不断的汇报资料和成果中，获得大量的信息，作为他认识自然，理解自然的根据。)退守到家中。也许是为了减少一些心头上的重负，他将自己的生活待遇一降再降。"文革"前夕，为了避免脱离群众，不知不觉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经沈雁冰倡导，他和老舍等人联名申请，降低工资标准。没几日，他又觉得光降低工资标准还不足以表现"继续革命"的思想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便和吴有训商量，两家一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减缩工资三分之一上交国家，只领原薪的三分之

二，(2)组织上安排的公务员，由院里另行安排工作，同时辞退家中雇用的保姆；(3)缩小住房面积，腾出当时儿子和保姆的房间(1976年又腾出了原做卧室的正房和耳房各一间)；(4)不铺地毯、不摆沙发、不挂画饰，家中这些东西，全部交中科院有关部门；(5)到院里上班或有公务时，和吴有训合乘一辆汽车，到图书馆、情报所查资料时，改乘公共汽车；(6)把个人私有钢琴赠与科学院芳嘉幼儿园。经过自我"改造"，到"文革"后期，身患肺气肿的竺可桢所拥有的只是一个仅能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了，他和那些住在建国门或东大桥的居民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还要差。他经常要去一里外的粮店买15斤大米，路上要歇上好几次。遇到自己做饭就更麻烦了，他60多岁的太太陈汲常常被街道办事处撵到街上跳忠字舞或参加游行、批判走资派等革命活动，他只好自己在家依着太太的说法，比葫芦画瓢地做家务。竺可桢将自己的待遇一降再降，以至最后像苦行僧一样不断地折磨自己，但这样也丝毫不能减轻他心中的痛苦。③

竺可桢无疑承受着另一种也许是更重的痛苦，这种痛苦发源于他的人格和仁爱之心。失去工作的竺可桢，尽管受到特别保护，却也没有闲着，因为他的特殊经历让很多人都瞄上了他，这使得他的家几乎成了来访接待站。每年都有天南海北大量的外调人员拥到他这里。

来找竺可桢调查的人，大体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前后，被清理出来的"特务"、"间谍"、"历史反革命"等。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另一个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因竺可桢是浙江大学校长，因而他的学生或教师、教授，凡是被调查的，一律都是敌对势力的受怀疑对象；另一类是在"三结合"中，两派人员对某人持有不同意见，或想打倒对方，就各自出人员，根据自身的需要，有目的地进行调查。这使得竺可桢每每应接不暇。据统计，竺可桢在"文革"最初的几年里，接待外调人员(多为造反派)一共500多批，最繁忙的是1968年，这一年他就接待了183批外调人员。这种繁琐忙乱的接待，让竺可桢苦不堪言，他曾向朋友发牢骚说："文革"期间，没做什么事，这事倒成了主要工作了。可是从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的这份独特的工作而心存感念。他知道，每一次来访，每调查一个人，都关系到那个人的命运和生存。来访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同感，就是这个老人的繁琐与谨慎。他总是仔细地翻阅自己几十年来，几乎一天不辍的日记，他要小心地做一些准备(因为他认为时间久远有一些人与事已漫漶不清了)。有鉴于此，他还将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有关人物进行整理，编出供本人使用的索引。那些外调人员有个相同的感觉，一来到这个清癯干瘦儒雅的老人这里，他们的热情就会受阻。在这里，他们得不到什么重大线索。那些经过风浪的造反派承认：这个老家伙软硬不吃。你要暗示他"配合"的话，他便一声不吭，似不懂你的意思，你若施以暴力威胁的话，他也一声不吭，就像坚守信仰的教徒一样，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一副安然超度的样子。④

尽管竺可桢小心谨慎地应付着一批又一批外调人员，用他独特的方式保护着他当年的学生、教授和朋友。但是束星北这个名字每每让他心绪不宁。因为这个个性刚直不阿、疾

恶如仇的江南"才子"却有一些"把柄"攥在人家手里。这些"把柄"，在他领导的浙江大学时代可能是"人格"、"品质"，可是今天，却是完全能够成为置他于死地的根源。但是，外调人员没有从竺可桢这里捞到一点好处，从当年有关调查材料和信函来看，除去一些"用意明显"的"评功摆好"外，别无它意。

老校长对束星北的命运产生过多次影响，一是在束星北被逐出山东大学物理系后，他一手为束星北在山东大学建立起直属中科院的气象研究室，再就是，束星北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后，他通过"上帝"(周恩来、陈毅)之手，给束星北摘去"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现在束星北又一次向老校长伸出了手，他期望老校长再创奇迹。他在给老校长信中称：我天天刷洗毛(茅)房，天天干一些杂活，离开我的专业越来越久了。每每念及过去，犹如梦里。日子一天天流逝，我也一天天的不济。真不知何时才能改造好，才能回到人民中间，才能够工作。⑤

可是竺可桢已无力回天了。生活条件的下降，政治运动对心灵的创伤，加剧了他的衰老和疾病。"文革"之初，肺气肿虽然令他时时感到气短，却仍可行走，呼吸无大碍。到了1967年，却日渐加重，早起乏力，着大衣走路就喘不动气了。1969年，一场肺炎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在医院里住了近两个月，体质大为衰弱，呼吸能力尚为普通人的七分之五，而肺活量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一了，稍一动作，就气喘不已，他深感自己已经"手无缚鸡"之力了。当年竺可桢对束星北的保护也好，关爱也好，尽管也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但总还是有一定的条件。好像一辆火车，虽然卡在那里了，可至少它还有轨道。很多情况下，竺可桢只是也只能顺势而为。可是这一次，他无法满足束星北的愿望了，尽管他知道，一个宁为人憎、不为人怜的科学家的求救意味着什么。

1970年已经80岁高龄的老人不断地给束星北写信，也许爱才如命的竺可桢自感生命已近黄昏，已没有能力来为束星北做些什么，但他却感觉到政治风向的变化，政策的松动，历史的车轮终归要回归到它原有的轨道上来。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将自己生命的绝唱留给自己曾寄予辉煌希望的人，他希望束星北好好地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得知你在青岛医学院所属园地工作，竟能与工人并肩劳动，让我高兴，你有这样的体力，使老态龙钟的我者闻之不胜羡慕。这样的短期劳动对于我们知识分子是身心两益的事。当然我以为国家为了人民健康需医务人才甚急，青岛医学院教学工作的恢复当不在(再)远。相信你仍就(旧)执行物理教学工作，驾轻就熟。"⑥

但是，束星北等不及了，当国产第一台脑电图机由上海电子医疗仪器厂制造问世后，他按捺不住了。即使再以走技术改造道路而招致批判，他也不在乎了。这台国产脑电图机被北京、上海的舆论界称之为中国医疗、卫生界重大突破与贡献，是中国工人阶级和科技人员在毛主席"中国人民有精神、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

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又一伟大成功。可是这台完全是用国产原材和零件装置的、已"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脑电图机，在束星北眼里简直就是"小儿科"："(1)(它在)机械方面(存在着)缺点。(2)抗干扰力量不强。(3)操作速度只及丹麦的一半，对急症病人及小儿不便。"⑦束星北多么希望由他来接手做这件事情，多么希望由他来真正地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所修理过的该厂以及其他厂家的国产心电图机、示波器和同位素扫描机也都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未能达到世界最高的先进水平，修理时只能稍加改良，而不能变更基本形式。我相信，经过出厂家的协助努力奋斗，可以达到世界最高先进水平的。"⑧"希望党和人民给我将功赎(折)罪的机会，贡献一得之愚，协助上海电子医疗仪器厂共同研究改进，以期赶上和超过世界最高先进水平。⑨

石头投入水中，却没有声音，也没有水纹。束星北似是被抛到了一个荒凉的海滩上无人理睬。他不愿坐以待毙。如果不做"事情"就是改造的话，生命和时间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向青岛医学院革委会发出了请求：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最高指示

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去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报告

我今年已64岁，改造了十几年还没有改造好，不知怎样做才好；岁月蹉跎，心中焦急：如果再过十几年，即使改造好了，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还能有什么用呢？！年华已老，时日不长了！

因此下定决心，尽快地把自己改造成为新人，能得到人民的宽恕和容纳，特别向领导请求：这次到北镇去后，领导能分配我和一位合乎毛主席指出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同志(又比较了解我过去的一位同志)同住一个房间内，以便对我加强监督，及时发现问题，批评管教，使我加速自己的改造，还有可能为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效力。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请求人 束星北

1970年10月14日

于青岛医学院⑩

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

青岛医学院保卫科　　公　致　介字第　(2)号

兹介绍 我局汪秉喜 同志系 中共党员 ~~共青团员~~

前往 保科 通过 组织 了解 束星北

的 历史政治 问题，请接洽。

今收到束星北揭发右派帖8
材料一份
揭发反动帖4份
另一份 共两份。

青岛市公安局 1976 年 [illegible] 日

说明：1.填写时必须写明调查人原机关单位。
2.每张介绍信只限找一个证明人使用。

1976年青岛市公安局到青岛医学院对束星北进行"外调"。图为"外调"证明信。

时间对寄予它希望的人总是显得如此漫长。一种征兆或迹象的出现，到成为趋势和浪潮，道路往往遥远而又曲折，有时还会发生迂回。1970年年底，青岛医学院突然宣布给一批右派分子摘帽。此前，几乎所有的人(右派)都认为，非常时期，"摘帽"工作已经停止。突如其来的喜讯，让不再抱有希望的右派喜不自禁，也给束星北以沉重的打击。在一些人眼里，束星北的改造已近"完美"，年终的总结和评审，很多人几乎提不出什么具体的意见，而束星北也认为，路已走绝了。至于怎么才能达到组织的要求，他也无从想象了。

思想汇报

…… ……

1970年12月30日晚间的"五类分子评审会"给我以"如果改造好了，是可以走吴方、田广渠的道路回到人民内部"的希望。但同时也使我感觉颓唐："年纪这样大了，可能就带〈戴〉着帽子进棺材，等不及了。"

今后应该怎么办，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谅解和容纳？是二三月来，实际上〈是〉

很早以来，心中的主要思想问题。希望得到领导的指示，单靠我自己的政治觉悟水平显然是不能解决的。

恳请党领导、军工宣队能拉我一把，在我未死之前，能利用我的"一技之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当然，主要的矛盾明显的是"如何回到人民内部"。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余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恳请领导拉我一把，解决这个中心问题，以在我未死之前，回到人民内部，尽自己的力量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⑪

仍没有回音。束星北的命运仍控制在青岛市、山东省和中央肃反十人小组的手里。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在国民党军令部的历史疑案，再一次被翻出来，青岛医学院革委会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天南海北调查落实，尽管没有进展，但也没有得到束星北清白的证明。因而，束星北还要等上一阵子，"摘帽"要等到大气候发生变化时才有可能。

注释

①束义新采访录，1997年1月16日。

②束美新采访录，1997年1月18日。

③据《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207、210页。

④同上216、217页。

⑤束星北与竺可桢的信，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⑥《束星北先生年表》，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75页。

⑦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六卷第136页。

⑧同上。

⑨同上。

⑩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六卷第132页。

⑪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六卷第158－159页。



26. 李政道来了

李政道受到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见时，就顺势提到了老师束星北的名字。这一次"提携"，对一个"戴枷改造"的"罪人"来说，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李政道来了。

气候发生变化之前，总有些征兆。先是美国有选择地批准进口中国商品，接着是中国批准解除了限制美国石油公司的油轮加油的禁令。好像是作为报答似的，罗马尼亚在美国有选择地批准进口中国商品的两个月后，用极为刻薄的语调谴责了已成中国头号敌人的苏联。不久尼克松总统对巴基斯坦的亚海姆作出了非正式的评论，并向北京摇起了橄榄枝：长期盘桓在台湾海峡的美军第七舰队悄悄地撤退了。一个被称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球外交时代开始了。再往后，尼克松——中国头号敌人踏上了北京的红地毯。

1971年夏季，和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被允许进入中国。杨振宁是"文革"期间，第一个被允许进入中国访问的外籍高级知识分子。

1971年春，从报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自1949年以来冻结了的中美关系正在显示出融解迹象。当我获悉美国国务院已经解除了美国公民不可到中国旅行的禁令后，我认识到重见我的故乡，重见我的家人、亲戚、老师和朋友们的机会来了。我迫不及待，因为我怕刚刚打开一条小缝的门，很可能由于越南战争和亚洲不断变化的地理政治形势而在几个月内又会被重新紧闭起来。我于是向巴黎中国大使馆申请签证，于1971年夏天访问了中国一个月。①

杨振宁没料到，中国之行如此顺利。杨振宁介绍道：他首先给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父亲杨武之发了电报，然后开始选择一条去中国的路线。父亲收到儿子的电报后，疑虑重重，当时在美国的"海外关系"回国探亲，还没有先例，会不会因此而造成什么恶果。疾病缠身、思子心切的父亲思虑再三，终于给国务院写了封信。没料到，国务院马上就给他作了答复。于是杨振宁便成了美籍知名学者访问中国的第一人。

在中国，所到之处，杨振宁所受到的待遇，令他始料不及。他在踏上中国大陆之前，几乎所有的设想都得到了满足。当他一下飞机，接待人员便问他有什么事需要办理，他便开了一个长长的要求会见的人名单，上面有他的亲人、朋友、老师等，结果名单上的人他几乎全都见到了。他还被获准到有关科研院所和有关大学访问。

杨振宁先后到了北京、大寨和他的出生地合肥。人们从公开的消息中看到，他在历时四周

的访问中，不但访问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核物理研究所，还在上海访问了复旦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所并与中国科学家一起举行了座谈会。不同寻常的是，周恩来还专门设宴招待了他。作陪的人有钱伟长、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周培源等中国科学家和傅作义、杜聿明(杨振宁的岳父)、郭沫若等人。

回到美国后的杨振宁使用了激昂的调子盛赞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人定胜天的中国形象。他给一些人留下了一个中国宣传员的形象。这只是"国外"的感觉，在中国，身受其惠的中国科学家和有关人士，却有着另一番感受。因为杨振宁，多少人因此而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至少被他列在名单上的人，生活或生存条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观。两弹专家邓稼先与杨振宁是儿时的玩伴、朋友，也是同一年赴美学习的同学。因为"榜上有名"，他自己不但得到"解放和自由"，连他的单位——九院也深受其惠。那是个特殊的时期，特殊时期的中国异常敏感，杨振宁的"宣传员"的使命，虽不能决定中美关系前进与倒退，却能多多少少地给它带来一些影响。

对中国的科学界而言，杨振宁的访华意义是很大的，大得难以估量。首先是他叩开了中国紧闭了20多年的科学大门。紧随其后，大批著名的华裔外籍科学家陆续不断地从中国微微开启的门扉拥进。另外他还影响并部分地改变了上面对知识分子的一些政策，使更多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的处境发生了变化。

杨振宁第二次来华时，周恩来已经有意修复乱七八糟的科学与教育秩序，他请杨振宁就中国的教育、科研提出意见。杨振宁就中国理工科大学不重视基础教育和理论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坦率的批评。对于把大批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工厂农村做体力劳动、作为改造对象这种现象，杨振宁表示了自己的困惑与不解。杨振宁还向周恩来建议，注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说，大学招生只吸收工农兵家庭的子女，这不利于团结知识分子。谈到这里，他特别举了张文裕、王承书的孩子张哲的例子。张文裕、王承书夫妇俩是于1956年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议的知识分子。可是正是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的独子却无法报考大学。杨振宁没有料到，他的批评与建议分量如此之大。事隔不久，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中国的拓扑学研究列入了课题(也是杨振宁提议的)，一批本来要下放到干校的知识分子被留了下来，张文裕、王承书的爱子张哲也被允许报考了大学……②

1972年10月，李政道踏上了中国大陆，他在这个阔别隔膜了近三十年的家乡所得到的待遇，几乎与杨振宁相同。他不但受到周恩来、江青、纪登奎、郭沫若、王洪文、刘西尧等人会见，毛泽东也会见了他。当他再次来到北京时，毛泽东向他发出了邀请。在中南海的住所里，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同他谈到物理学的对称性，谈到人类的活动。会见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李政道无法想象，他和杨振宁会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而一个教育几乎完全停滞、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的国家对他们的成就并不陌生，他们被当做炎黄子孙的佼佼者，当做华裔的最杰出的代表，这一切当然是由于他们在物理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尤其是他们凿破混沌的发现：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是不守恒的。③



1974年5月30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李政道先生。

他们对宇称定律透视性的研究，造成了在基本粒子方面的重大发现，并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宇称守恒定律，这个物理学上的金科玉律被推翻了。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了全世界，很多人从各个方面打探他们的成功之谜，打探他们的历史、家庭和所有对他们有过影响的人。就李政道而言，媒体的重点往往集中在他在美国背景的描述上。但很少有人对他的过去、历史或者最初的“起点”做过深入了解。至于他的启蒙老师束星北，人们更是无从知晓。

李政道认为，在他最初的治学道路上，对他教育和帮助最大的有三个人：束星北、王淦昌、吴大猷。尽管那时国内的条件特别是实验条件有限，但他却有幸拥有他们这样的中国一流的科学家和教育学家。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当时，刚满15岁的李政道只身离开上海去浙江求学。这期间的浙江大学已流亡到贵州遵义，李政道历经了战火纷飞难民如潮的两年流浪，才由福建、江西、两广，抵贵州进入浙江大学。

最初李政道报考的是浙江大学化工系。报考化工系是他二哥李崇道的建议。他的家庭很希望李政道将来在化工专业上有一番造就。可李政道的兴趣却在物理学上。李政道和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是大学里很要好的朋友，那时学生们听课非常自由，除主修课外，想听什么就可以听什么。当时，物理学在中国还属“冷门”，可是浙江大学因为有了束星北和王淦昌便成了炙手可热的“热门”，每逢周末的“物理讨论”乙（“物理讨论”是为四年级学生开设的课程，分甲乙两种。

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是由束星北先生和王淦昌先生就物理的前沿课题作系统报告)，束慰曾都要约上李政道一同去听。两位大师的课回回"爆棚"，以致一些晚到的学生不得不站在门外或窗外听课。

李政道是于1943年秋季进入浙江大学的，这一年，由于普通物理学师资紧缺，系里便决定由束星北来负责辅导。因大学驻地有限，竺可桢将一年级设在了贵州的永兴。永兴离湄潭理工学院20多公里，束星北按着系里的安排，每周要去一趟永兴。湄潭到永兴皆为山路，崎岖陡峭，可束星北准时往返，风雨无阻。每周一次现场辅导，对那些渴望学习、惜时如金的学生来说太珍贵了。每当束星北这边的人影儿刚刚出现在学校外面的路口上，立时就给学生包围了。于是便一边走着一边回答问题。束星北发现，在所有向他提问题的学生中，提得最多也最有水平的竟然是化工系的李政道。一般的学生的问题往往是些"现象"，或者，在问了"为什么"并得到了解答之后，就告结束，而李政道却总是在"为什么"之后，还要问"为什么"。也就是说，他不但要问"现象"还要问造成这种现象的机制。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个性与思维方式，使他和别人拉开了距离。"一念之差"可能决定着求知和求道的完全不同的层次。束星北突然有了"发现"，而李政道很快就从化工系转到了物理系，"师徒"二人也遂成知己。

每周一次的授业解惑或探讨切磋，已远远满足不了狂热痴迷中的李政道，一年级结束后，李政道便随着班级从永兴迁到湄潭。这个时候，李政道常去双修寺物理实验室阅读最新的世界英美物理期刊，束星北也常常到这里读期刊，两人便边读边探讨，常常谈至深夜。不久，束星北接受国民党军令部让他担任技术顾问、研制高科技军工武器的邀请，去了重庆。李政道常常乘上部队的军用汽车去重庆找束星北，继续他们的物理探讨。

束星北自然不会预知李政道的日后，但他知道具有天赋并又会使用天赋的学生，即使在浙江大学这样人才济济的大学里，也是凤毛麟角。在束星北眼里，李政道是一个具备了科学禀赋的天才学生，束星北对他天才的学生关爱有加。1944年暑期，由于日军逼近黔贵，大学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一部分学生做好了与敌人打仗的准备，也有一部分学生，在义勇军的歌声中走上战场，剩下的已无心上课，闹得校长竺可桢只好不断地出来讲话，告诉他们学习知识与抗日的关系。这个时候，李政道也做好了走向抗日前线的准备。就在他报名参加义勇青年军时，得知这一消息的束星北马上从重庆打电话给王淦昌，让他一定看住李政道。这期间，李政道因车祸背部伤得很重，以至无法行动，束星北得到消息后，又给王淦昌打电话，嘱咐他看好李政道，并用军令部派给他搬家使用的军车，专程将李政道从遵义接到重庆。李政道的骨伤养好后，投奔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的麾下，束星北又向吴大猷特别推荐，情有所托。④

日本投降后不久，(1946年)吴大猷教授得到了一笔经费出国研究，可带两名研究生随行赴美留学。吴大猷选择了李政道和朱光亚。在美国，李政道幸运地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费米的研究生，从此开始了他全新的科学人生。

有一点需要强调，李政道进入西南联大还是二年级转学生，由于他在浙江大学打下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底子，已具备了很好的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学基础，再加上禀赋出众，学校同意他



直接上大三或大四的课程，对大二的课程，只需要参加考试。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后，他因为没有文凭(其实因抗战，他甚至连中学和小学也没毕业)，不能当正式研究生，只能先当非正式生。但进人研究生院不久，由于他的天才和勤奋，得到了物理系费米密(E · Fermi)、泰勒(E · Teller)和扎克赖亚森(Zachariasen)等教授的赏识，很快成了正式研究生。

对于浙江大学那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李政道也是感念并肯定的，那时候，学校在流亡途中，每到一地，便草草定居，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开实验课。民房条件差，没有水电设备，师生们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利用两只木桶接上皮管来解决实验用水，没有酒精就用木炭盆当酒精灯，没有电源，就用自备的10匹马力柴油发电机发电，缺乏培养钵就以酒杯代用。物质条件虽差，但是师生们对实验的要求却是一丝不苟，非常严肃认真。李政道认为，尽管在浙江大学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都是在破庙里做出来的，但是同样能够培养出人才来。

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由于有一批杰出的物理学家，而成为当时世界活跃的物理中心。李政道惊喜地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教师队伍是世界第一。那里萃聚了一批国际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其中有钱德拉塞卡(S · Chandrasekhar)，费米(E · Fermi)，J · 迈耶(J · Mayer)，M · 迈耶(M · Mayer)，曼利肯(R · Mulliken)，泰勒(E · Teller)，尤利(H · Urey)和扎克赖亚森(W · Zachariasen,系主任)；稍后G · wenyal也来任教。物理系的研究生也是才气逼人，有H · Agrew,J · Anderson,O · Chamberlain,G · Chew,R · Garwin,M · Goldberger,J · J · Orear,M · Rosenbluth,W · Selove,J · Steinberger,R · Sternheimer,H · Ticho,S · Treiman,H · Wilcox,L · Wolfenstein和杨振宁。”⑤

上帝之窗为他的孩子打开了。

束星北对李政道的情谊之深，对天才学生的期望之重，深受其惠的李政道也深感教诲与呵护之情。初到美国，彼此一直音讯来往，中美两国成为仇敌后，联系中断，然而几十年后，李政道仍念念不忘。⑥

李政道的中国之行，有意无意地担当了改善中国科学家境况和科学环境的使者，他凭着自己的影响和顺应形势的智慧，在一定的范围内，改变了部分亲人、朋友、师生的境况或命运，并设法影响中国最高领导人来改善一点僵硬呆滞的科学与教育政策。如毛泽东就接受了他的一个小小建议，即：对于优异青年学生的教育应该继续坚持并受到重视。这个建议由于周恩来的支持，导致了“少年班”的开办，这个对于十几岁的优异学生采取特殊的强化教育的方案，首先在安徽科技大学实施，由于它的成功，以后在其他一些大学也相继开设了。

李政道受到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见时，就顺势提到了束星北的名字。这一次“提携”，对一个“戴枷改造”的“罪人”来说，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时间是1972年10月17日，周恩来、王洪文、江青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李政道。千篇一律的会见程序之后，周恩来向他谈起杨振宁博士对中国教育和科技方面的建议和意见，

不无忧虑地说到中国科学和教育人才的断层问题。周恩来希望他能为解决"断层"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些海外的才学之士到中国来讲学。李政道也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造成中国的"断层"原因，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人才和教师造成的，中国不缺解决"断层"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从现实来讲，解决中国面临的科学与教育的"断层"问题，谋求国外的高水平的人才或教师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起用中国自己的人才和老师。李政道说到这里，适时地提出了束星北的名字。他说，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

以后，在很多场合，李政道都提到束星北这个名字，用意是非常明显的。显然，他对老师的处境多少是有些感知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也说明束星北在李政道心目中的地位。

一向博闻强记的周恩来是否还记得束星北的名字，已不得而知。1956年，"小阳春"春风劲吹之时，竺可桢曾顺势向周恩来谈到了束星北，他立刻就让陈毅着手去给一个定为铁案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平反。这一次，李政道又一次提到了这个名字，周恩来很快就作出了反应。

几天之后，国务院有关官员到了青岛，专程了解束星北的情况并安排师生会面。青岛医学院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感到了空前的政治压力，很长时间里，他们不知道怎样应对这样的事情，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认定还是以"推掉"为上策。

王洪健：

说实话，上面来人，动静弄得这么大，我们都没想到。为了这事，核心小组专门开了几次会，可是研究来研究去，认为束星北不能进京，一是上面早有规定，右派、反革命分子或被严加管制的坏分子，是不能进京的，不但不能进京，就是本市也不能出，只能待在一定的监控范围内活动。尽管那时上面的调子有所缓和，但"革命和专政"的气氛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即使我们批准了，也没有用，到时候逐级向上汇报请示，恐怕哪一级也不会开绿灯。最好的办法是李政道来青会师。我们请示了上级有关部门，他们同意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开始着手研究怎么接待李政道，以及怎样让他们师生会面。李政道来青岛看起来简单，可是一涉及到细节就发现这条路也走不通。首先谁也不能保证束星北在同他见面时会说什么话，再就是李政道会不会去束星北的家，要是提出去束星北的家怎么办？我们专门到他家去考察过，那是我所见到的最赤贫破旧的家，你说它家徒四壁吧，破破烂烂的东西似乎又不少：缺了腿的桌子(晚上便铺上被子做床用)，两个箱子(部队装子弹的箱子)、几张自己打制的歪歪斜斜的板凳和一些堆得乱七八糟的书；地板虽是水泥的，可是到处都是裂缝，客厅中间还有一个大洞，大得能陷下腿去，上面盖着一张三合板，简直就是个陷阱，最不堪的是束星北的"卧室"，他的卧室不过是个两三尺宽的壁橱，束星北的个头这么大，常年"卡"在里面能舒服吗？"卧室"里只有一床被子，严格地说，那不是被子，只是一床破破烂烂的棉絮，如不是一些经经纬纬的黑色电工胶布粘连着，早

就散了。以前，束星北曾申请补助，虽然是张书记的主张，可有人坚决反对，说他过去多有钱哪，一个人赚得比三四个市委书记还多，这么有钱的人还申请补助，是往共产党脸上抹黑。我虽然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可我觉得，尽管他在反右之后，每月只有二十元生活费了，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怎么也不至于贫困到向组织伸手吧，看了他的家我才明白了，高级知识分子要是穷起来，可是比一般的平民家庭还不如。这样的家李政道看了会作何感想？那还不等于往国家和党的脸上抹黑吗？于是有人便想出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把学院的一套原党委副书记的房子借给束星北（那个书记已经病逝，儿女可暂时安排到外面去），可琢磨来琢磨去也觉得不合适。一但穿了帮，就是政治事故。最后决定将束星北"家"设在宾馆。这样既可以避免人多口杂，又便于监控。至于家为什么设在宾馆，让束星北自己去解释。可是这个方案一报上去就被否掉了，有关领导在我们的报告上批了一句话：李政道难道不是个中国人吗？言下之意，他既然也是个中国人，你们搞这一套有什么用？最后核心小组决定以束星北身体不适为由，将这事推掉了。⑦

注释

①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第13页。

②据《杨振宁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3页－106页。

③《杨振宁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65－68页。

④据许良英、李寿枏采访录，1994年5月15日、5月16日。

⑤李政道《六十回忆》，转引《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⑥束星北的学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总社副总编辑周志成，在《难忘的物理思想家和教育学家》一文谈道，"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编委会物理学史组讨论书写人物时，钱临照先生提出，在《李政道》这一条上要写上束星北对他的帮助。因此该书在李政道条目中写道：'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学物理学系学习，得到老师束星北的启迪，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该条目在发排前曾送给李政道看过，他认真地作了多处重大修改和补充，而对这句话只字未动。在一次《化学卷》的审稿会后，学部委员吴征铠对我说：'有好几个条目没有写好，就因为作者没有真懂，你看束先生的物理讲得多好，就因为他是懂透了的物理学家。'惟因束先生想得深、理解得透，才能启迪出得诺贝尔奖金的物理学家。"（周志成：《难忘的物理思想家和教育学家》、《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第49页。）

⑦王洪健采访录，1997年6月27日。



27.“摘帽”

1972年是束星北绝处逢生的一年。似乎注定是一种宿命，每当无路可走了，只有望天长叹悲号时，冥冥之中必有一只手来给他稍拨迷途。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束先生：

自重庆一别，离今已有差不多廿八年了。对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此次回国，未能一晤，深以为怅，望先生小心身体。

特此敬祝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生 李政道上

十月十四日

附：慰曾兄前请代问好，在北京问了好多同学，但未得他的近况。①

政道同学：

别后至以为念。看到你们在物理学上的非凡成就而衷心高兴，今接惠书，更感兴奋。便中能以别后的工作、研究和家庭情况告否？这次回国，当能看到祖国经历的惊天动地变化，28年前那种国内卑污、国际受辱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返矣！希望你能在国内多住几时，并盼在不久的将来，能见到你们一面。看到吴健雄、邹国兴、李博等诸位浙大旧友时，乞代致鄙意问候。慰曾家仍住上海乍浦路蟠龙街六号，亦多年未通信矣。

特此敬祝

双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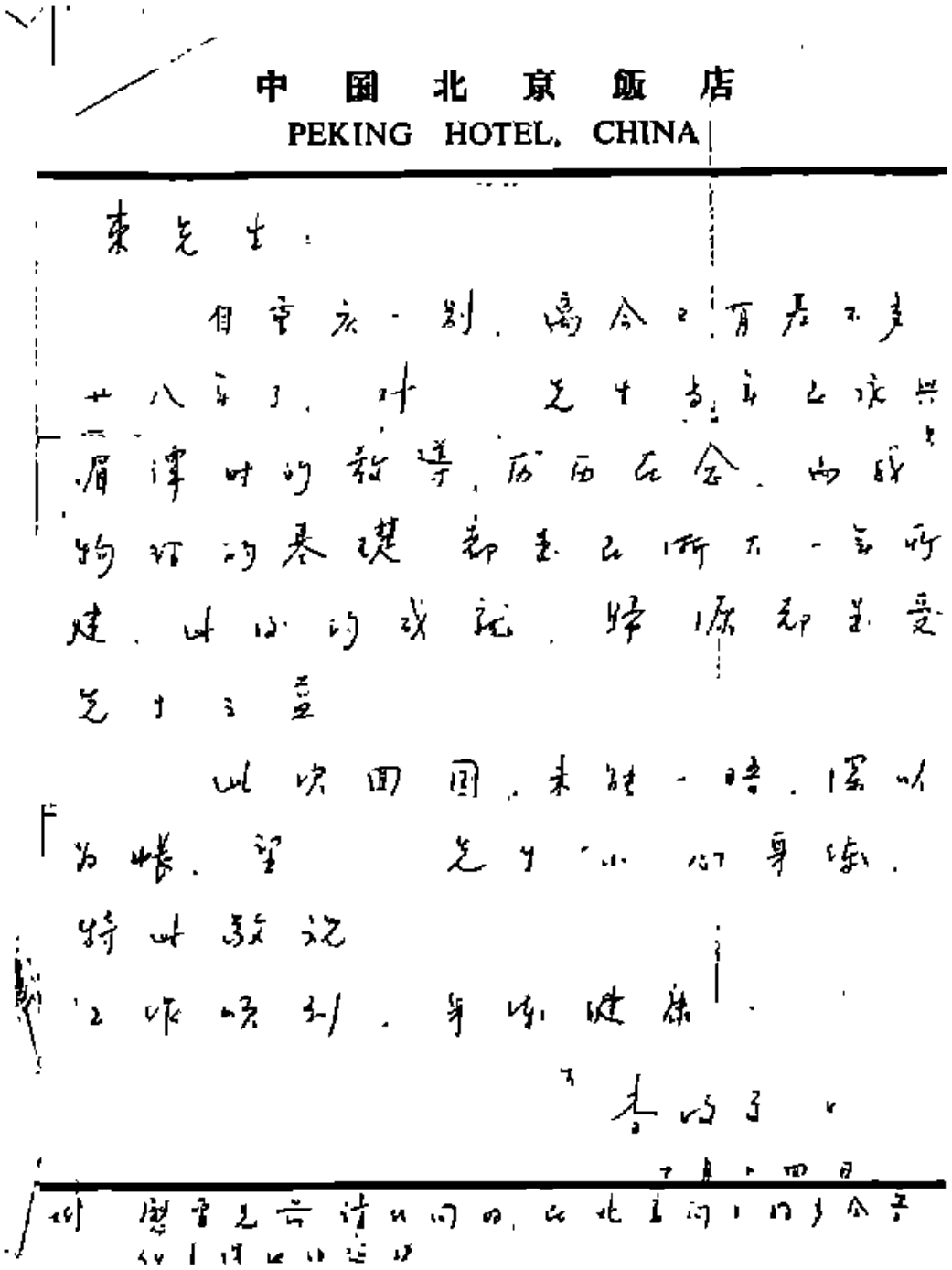
愚

束星北 上

1972.10.20

于山东北镇青岛医学院②

1972年是束星北绝处逢生的一年。似乎注定是一种宿命，每当无路可走了，只有望天


中 国 北 京 饭 店
PEKING HOTEL, CHINA

束先生：

自章东一别，离今已有五六年了，叶[illegible]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由我的问题症结所在一言所难尽，此次回国，未能一晤，深以为憾。望[illegible]小心身体。

特此致意

顺祝

健康！

李政道

"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李政道于1972年写给束星北的信。

长叹悲号时，冥冥之中必有一只手来给他稍拨迷途。

好像被人遗忘了。可是突然一天，竟有人来看束星北了，那是一些新结合到革委会的老领导们，他们什么也不说，作了一些例行公事的检查，转了转就走了。不久，束星北被冻结的工资就开始发还了，不久上面还专门为他分配了一间小屋并帮他代运了越冬的烤火煤，这使得久被晾在一边的束星北激动异常："感谢党不咎既往，今春发还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冻款，使我能偿还急欠；复分配我住屋一间，使我和老伴能互相照顾；今冬又怜我年老衰病，及时从青岛代运烤火煤。党对我这样多方照顾，使我感恩怀德，难以自已……"③

生活的关照，让束星北看到了希望，他希望党和组织能够给他指点迷津，好让自己早日回到人民内部。"检查自己经过十几年的改造，虽然思想上有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改造得很不够，缺点错误仍然存在很多，到今天还没有被摘掉帽子，不能回到人民内部发挥自己可能发挥的力量！由于自己的政治水平(有限)，又看不出症结所在，以致迟迟不能回到人民内部。为此特再度请求：党领导指出症结所在，对如何改正作出具体的指示。即除生活方面外，在政治上也再予以照顾，帮助我摘掉帽子，以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和谅解，可以轻装共同前进，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④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束星北一次又一次地向党和组织申请、请求，尽管上面没有答复他什么，然而"技术改造"的门却重新向他打开了。这一年5月初，中国科学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的领导和科研人员来到青岛医学院，他们是慕名而来，指名道姓地找束星北帮助他们所解决最新科研难题：冲击对两金属粘合剂的破坏。金属粘合剂是一种高强度粘合剂，20世纪70年代属于国际先进科研技术，它在机械化工和航天方面有着广泛的用途和作用，它的粘合强度和可靠性远远超过电焊和铆钉。

中科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为了这个活儿，跑遍了全国包括中科院数学所在内的著名的大院大所，竟无人能够"揭榜"。当他们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向他们推荐了束星北。鉴于束星北的改造表现，青岛医学院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经研究决定，让束星北来承担兄弟单位的这项科研课题。

对束星北来说，这项课题不仅是兄弟单位对他的考评或测试，也是青岛医学院革委会对他的考评与测试，项目也许不算大，但对束星北今后命运的转折却至关重要。

翁维权

（青岛医学院著名外科医生，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归国华侨）：

那时候我刚被"解放使用"不久，革委会决定让我来给还在北镇青岛医学院劳动改造的束星北下达指示，我向他传达了革委会的指示，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平时，无论什么人跟他讲话，他总是垂着眼皮）。我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提出要到济南山东大学去演算。因为山东大学的资料和有关书籍比较齐备。可是院核心小组没有同意。核心小组只同意他回到青岛医学院做这项研究。见去不成山东大学，他只好开出了一个所需资料清单，那是一张密密麻麻的外文书单，我一看吃了一惊，他需要的参考书和资料至少也得50多本。于是我就"按图索骥"满青岛去找，结果只在海洋学院图书馆里找到一本。名字叫什么已经忘记了。这本书经过有关领导审查后，决定给束星北使用，不过书交给他的时候，已经撕去了前言和后记，因为那本书的前言与后记里，有一些与公式和数字不相关的东西。我尽管与束星北隔行，却也知道他的实力，很早以前，我就听人（束星北在浙江大学的旧友）讲过，束星北的数学素养和功底毫不逊色于数学大师苏步青。40年代，两人曾在湄潭住邻居，经常相互串门，一同探讨数学，苏步青遇到难题了，也常向束星北求援。对外人而言，只知道他是个物理学家，想必是知情人推荐了束星北，不然人家就不会跑遍全国的大院大所后才来找他了。不过，这毕竟是个不小的工程，这么一个工程，学院就给他提供了一本没有皮没有尾的参考书，也真是难为他了。⑤

在束星北看来，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改造、一次向人民靠拢的机会，它更像一场及时而又充沛的甘霖，它给长期干渴乃至心口龟裂的束星北救了一次急，它让束星北对自己有了信心。这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多少年了，那个"自信的器官"，似乎萎缩了、退化了，可是一旦有"水"来滋润它一下，马上就苏醒了、复活了。没有参考书没有相关资料，一切从零开始，反倒激起了束星北的豪气，特别当听说兄弟单位是走遍了全国的大院大所后才来叩青医的大门时，他更有了应战的欲望。

对于束星北来说：冲击对两金属粘合剂破坏试验研究本不算什么大的项目。做个比喻的话，在他的科研攀登的山路上，这本不是一座多么难以翻越的山峰，如果参考书或资料齐全的话，就等于有了上山的路径，"翻越"便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可是因为没有参考书和有关资料，使得他的"旅途"变得复杂而又迷茫起来：要登山，首先要先开辟出一条上山的路径。

为了能够专心地不受干扰地投入工作，他要求提供个地方，革委会便给了他一间教室。那时，青岛医学院的大本营全都转移到惠民北镇去了，青岛医学院教学楼已人去楼空，他一个人一枝笔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楼里开始了他难得的一次神圣之旅。他很快就在只有他一个人的教室和学校里找到了感觉，进入了状态。这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也是一种重生的感觉，这让束星北的精力和身体都产生出奇迹："〈它〉使我感觉到精力的充沛，似乎最干扰我身体健康的哮喘病也长期不发了。（记得以前一年四季经常哮喘，夏天也不例外，今年则丝毫未发！这一方面由于党的照顾，使我身体健康起来，另方面由于我国国内国外的一派大好形势，鼓舞着我的精神面目〈貌〉。）对我讲起来，自从这一次计算看起来，我的身体的确比以前好多了。这是客观的事实……"⑥

今年党交给我解决两金属胶合剂破坏的问题．以作为生产胶合剂的参考（中国科学院东北石油化学研究所生产组提出）。由于缺乏参考文献，只能凭记忆及其他一切可利用的资料进行计算，这样使得时间拖长，有很多在计算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假象，在抄到四本笔记本上的记录中，其中过半数计算是假象，能借到几本书也就可以事半功倍了！经过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计算工作，为生产胶合剂时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也以此作为自己悔罪立功的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稍尽绵力）。再缮〈誊〉写清楚，以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但是正如主席的指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单单这一次的计算，一般是不够的，还要再经过具体的实践，甚至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实践的考验。因此，这次计算只能说是初步的计算。

在计算过程中，由于缺乏资料和参考书籍，困难的确不少。"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没有资料就从"零"计算起，没有参考书籍，就尽量利用现在具有的一点参考书籍，加上理论推算；计算错误的就想到毛主席的教导"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以鼓起自己的勇

气。遇到困难时，想到这是党和人民的考验，必须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经过这次计算，感觉到自己的年龄虽老，但脑力方面还不减少〈当〉年，（再度感谢党和人民历年来对我的宽大和照顾！）深信如有适当资料，则可大大地缩短计算时间，免去许多不必要的弯路。据闻，两金属胶合剂是最新的发展〈成果〉（甚至飞机两翼也是胶合在飞机本体上的），有的甚至胜过以往的电焊接。所以，胶合剂的生产，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这次计算，只是关于胶合剂生产的物理性能方面〈的计算〉，而且还只是如前所述，"初步的计算"恐将来还有改正、修改的必要。如果确系如此，希望还给我继续下去，一方面由于我对这方面已有一定程度的熟练，另方面也借以表现自己立功赎罪之忱。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⑦

"计算"即将收尾的时候，束星北得到了李政道欲来青岛的消息，以后又说不来了。具体内情他虽然不清楚，可他却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加速他摘帽的机会。他激动难捺，时时夜不能寐，但还是克制着自己，他要接受以往的教训。1962年，青医的领导、市里的领导都表了态，摘帽似只有一步之遥了，结果还是落了空。所以，越是接近"目标"的时候，他越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为了不出差错，他不断地同儿女们商量怎样走好每一步。特别是五儿媳王惠玲这个时候便成了他的先生和谋师。束星北最后的改造期间，每做一个决策、每写一篇检查、每迈出一步都要同王惠玲和其他子女商量研究，因而，改造每前进一步，都是"集体"智慧的产物。

他甚至连李政道给他的信也不轻易打开，而是先交给组织（以往，束星北的任何书信都是先由组织接收拆阅，然后再决定给不给他。可是这封信不知何故，直接从青岛医学院转到北镇，束星北才有机会拿到原件）。其后不久，束星北经过一番考虑后，给组织写出了申请任务报告书：

申请任务报告

李政道1943－1944年间在浙江大学（当时在贵州遵义湄潭永兴一带）读物理时，喜钻研理论物理问题，追根究底。我当时任浙大物理教授（理论物理方面），因此他常和舍侄束慰曾（与李政道同班同学，但读的是电机系）到我家中讨论有关理论的各方面问题，互相切磋。后来我去重庆伪军令部技术室工作，他又到重庆探望研究。以后失去联系，直到从报纸上才知道他和杨振宁、吴健雄等合作，在物理学上有了成就。又据闻他曾与吴健雄（女，1933－1935年曾在浙江大学任物理系助教，记得我曾启蒙过她的量子力学等课；因当时都在青年，她比我小三四岁，也常相往来）等人主持美国原子能方面某种研究，但详情不明。对他们加入美国籍（据闻，还有一些旧同学、旧识也加入外国籍），深为婉〈惋〉惜。但当时亦无能为力也！值兹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伟大胜利之时，接李来信，言中似念旧情，

特申请任务如下。

我自1957年向党猖狂进攻之后，经过十多年的劳动改造，思想有所改变；在党的一系列光辉成就的教育下，才逐渐醒悟过来：离开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中国；离开了工农兵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新中国。因之悔恨交加，亟思以实际行动来取得党和人民的宽恕与谅解，但一直很少能表现。现值有此机缘，特上牍恳求给我立功赎罪的机会，并期望在今后的工作行动中，给以具体指示。希望能有利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自己的应有力量(贡献)。

戴罪人

束星北 上呈

1972.10.22⑧

束星北不断地赢得组织的信任。在李政道问题上，他很好地配合了组织，两金属粘合剂的物理试验也大获成功。翌年年初，中科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的领导和技术员专程登门致谢，报纸还为这个成果发了消息，青岛医学院的领导也感到脸上很有光彩。特别是1972年年底，束星北在为青岛某雷达站修理损坏的雷达时的表现，让组织上感到他的立场确实从根本上转变过来了。

林　方：

青岛某部雷达站的雷达坏了，来青医找束星北，按说，以束星北的身份，这么重要的军事设施是不能碰的，尽管当时束星北有了重大立功表现，但他头上的"帽子"还没摘掉。以前在山东大学时，部队曾有意让束星北去指导雷达技术修理方面的事情，学校没有同意，那时他头上还不曾有一顶帽子，这说明我们的敌情观念是多么的重。可是这一次，院领导竟很痛快地答应了。(一种说法是青医的领导有意对束星北的考验，另一种说法是青医领导先是不同意，后来部队领导通过青岛市革委会有关领导通融才得以解决。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破例"。)

载着束星北的军车驶出医学院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束星北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旧毛巾，递到陪同的参谋干事面前，他们不知何意，正疑惑着，只见束星北用那个毛巾扎住了眼睛。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陪同的军人觉得没有必要，其中一个便将毛巾给他扯下来，可是束星北很固执，又重新扎住自己的眼睛。修好雷达，拿上人家写好的鉴定书，回来的路上，束星北上车第一件事仍是先用毛巾蒙上眼睛。院里有的领导听到这事后很是感慨，他们认为束星北"摘帽"的时机成熟了。⑨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关于对束星北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报告

束星北、男、现年68岁，家庭出身地主兼资本家，本人成分教员。江苏南通市人。1925年至1926年先后在杭州之江、济南齐鲁大学读书；1926年到1931年，先后在美国拜克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任助教；1932年至1944年，在浙江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44年7月至1945年9月在国民党军令部二厅技术室任顾问；1945年10月至1952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授；1952年至1957年在山东大学任物理系教授；1958年至1960年(在)青岛市月子口水库改右大队劳动；1960年在我院工作；文化大革命以来，打扫卫生。

一、主要犯罪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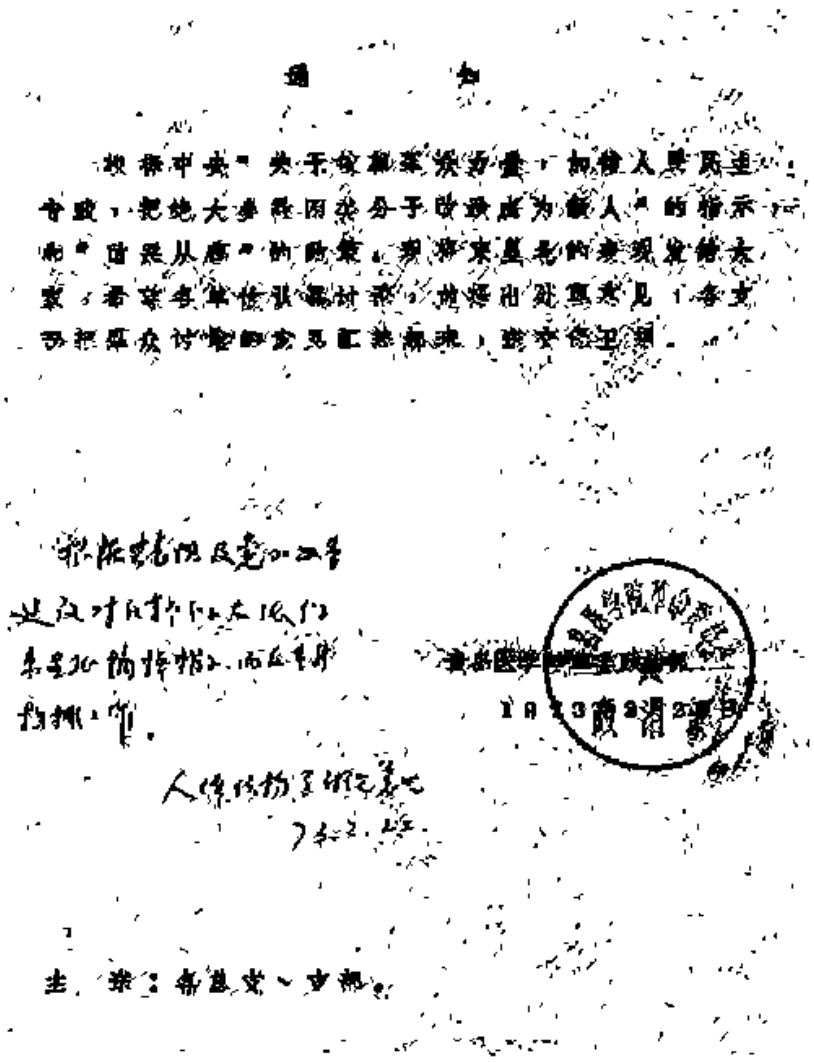
束星北于1944年7月至1945年9月，在蒋匪军令部二厅綦江电训人员训练班和军令部二厅技术室充任顾问、付(副)主任等反动职务期间，积极从事技术和研究活动。指导用干电池装制收发报机，研究装制低压小型特工收发报机和雷达等罪恶活动，并介绍陈维昆等三人到该特务机关工作。全国解放后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思想改造，敌视我党和人民政府，散布反动言论。肃反运动中被审查。1957年整风运动中又猖狂地向党进攻，被定为极右派分子，并根据其历史罪恶，二罪并罚，1957年11月经中共山东省委肃反小组并请示中央十人(肃反)小组批准，定为反革命分子，1958年10月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判处管制三年。1965年依法解除管制，保留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

二、表现：

束星北自(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以后，在较长时间内认罪态度不好，只承认有错，不承认历史上的反革命罪行，对改造抱抵触态度，1958年在青岛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期间，思想抵触，劳动不积极，多次被评为较坏的队员。

1960年调来我院后，其反动立场仍未转变，对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缺乏认识，以为在物理方面有点知识而自负，态度狂妄傲慢，企图单凭"一技之长"来赎买自己的罪行，缺乏从立场、思想上加强改造的自觉性。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指示，加强了落实了对束星北的改造措施，召开了束星北的家庭会议，争取其家属子女协同监改小组经常对其进行教育并指定他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的时事政策。通过学习，在国内外大好形势鼓舞下，在我党的"改恶从善"政策感召下，(他)初步认识到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的重要意义。他对全国人民的冲天干劲、发奋图强、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因此他的那一套反动观点和立场，发生了动摇，开始承认了(自己)在伪军令部的反革命活动和1957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说："解放前在伪军令部每月一万元的高薪中，每一张伪币上都沾满了劳动人民的血，沾满了共产党和中



通　知

根据中央"关于敌我矛盾，加强人民团结，专政，把绝大多数团结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指示，和"团结从原则的前提，对待来星北的表现发言态度，希望单位张贴讨论，提出处理意见，各支部把群众讨论的意见汇总起来，报告给我。

[illegible]

[illegible]

主，张：南医党、团部。

>>>>>>>>>>

当改造取得成功的时候，人的很多"元素"就消失了。1973年，青岛医学院革委会政治部下发的，征求为束星北"摘帽"意见的通知书。

华优秀儿女的血。过去对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的本质认识不清楚，就没有决心改造，就改造不好。""对自己的反动本质不彻底认识，就会把自己的改造和一般的群众改造混为一谈"。"反动派不打是不倒的，反动思想更是不打不倒的，如果不狠狠的〈地〉打，就会看不清解放前后反党反人民罪行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从此以后，他在口头或书面汇报中经常联系自己的罪行，批判其反动立场和观点。他说："过去我对我在伪军令部技术室的这一段历史，不独以为辱，还引以为'抗日'的光荣，以我不受国民党的官职的奋斗为光荣的'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历史，现在，我认识到我的那些活动是帮助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日的反革命活动。""我的反动立场乃是一贯的，即在脱离军令部技术室之后，仍旧是反共反人民的，1946年蒋匪引起的内战却被我认为是'共产党捣乱'，解放后我依然不改，一贯的〈地〉反对党的政策，对三反运动我反对，肃反我也反对，鸣放时还猖狂的〈地〉向党进攻。坚持反动立场，不肯向人民投降。我的罪行是一贯的，而且是严重的，党对我一再地宽容，等待我回头，而我一再向党进攻，直到1958年10月，党忍无可忍，同时也是为了教育我对〈我〉更好的改造，才根据我的罪行判我管制三年，而在判刑后，党对我仍是宽大照顾，只有党和毛主席才能对我这样宽大，也是由于这种改造政策，才促使我今天思想认识的基本转弯。""我一生害人害已〈己〉，做了不少对不起人民的事，对党又那样的猖狂进攻，而党对我还宽大，我怎能不打起精神来做一个新人，跟好人好事反复的〈地〉学习，主动赎罪，抛弃反动的立场，坚决彻底和反动思想一刀两断呢？决不能抱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自暴自弃，决不能再做人民的罪人。"

1962年曾检举了一个企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的犯罪分子，还检举揭发了附属医院×××向束散布的反动言论，在劳动和工作上比以前更积极了，对于领导上分配给他的任务，工作时间做不完，休息时间继续干，有时带病坚持工作，积极研究业务，能主动帮助其他教师作〈做〉科学研究。1965年试制成功了一台多人听诊器，有力地配合了教学的需要。为本院和兄弟单位修理了一批精密电子仪器，给国家节省了不少资金，根据本单位和外单位的反映，在修理仪器中，认真负责，表现较好，最近又为中科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计算两金属胶合剂破坏物理性能方面的问题，在缺少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反复计算，费了不少脑子，现已初步完

成了计算工作。束星北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是老实守法的，在学校一度无人顾及他的情况下，也能遵守纪律，按时上下班，主动学习毛主席著作，未发现破坏言行。1972年10月，束接到曾被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过的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束的学生)的来信后，及时向领导报告，在回信中态度较明朗，观点较正确，有益我国的威望。

三、意见：

根据上述表现，〈我们认为〉束星北开始是不认罪的，但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经过群众的监督和教育，对自己的反革命的罪行有了认识，能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按时汇报思想改造情况，未发现破坏言行，基本上是老实守法的，因此，经群众讨论，院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研究，建议政府摘掉其反革命分子帽子。

中共青岛医学院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

一九七三年三月八日⑩

束星北的实际摘帽时间是1974年9月11日，这一天，与反革命帽子一同摘掉的还有极右派的帽子。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王屋山”和“太行山”，两座大山不可能在这一年搬掉，因为这一年的政治形势还没有根本的改变，组织给他下达的摘帽书还留着尾巴：一旦出现反复或表现不好，帽子还会再戴上。束星北背负的两座大山真正搬掉的时间应该在1979年年底，这一年，他终于被落实了政策，“尾巴”自然也就不会再有了。屈指算起来，他被压在山下的时间是22年。

注释

①李政道与束星北书信，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②同上。

③《一九七二年年终汇报》，第1页，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④同上第2－3页。

⑤翁维权采访录，1997年6月28日。

⑥《思想改造汇报》，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⑦同上。

⑧《申请任务报告》，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⑨林方采访录，1997年6月27日。

⑩《关于对束星北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报告》，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28. “人是不可改变的”

吃早饭的时候，两人突然在客厅里“打”了起来，我当时正在厨房里做饭，突然听到父亲和王淦昌的吼叫声。我赶紧跑到客厅，只见父亲锁着眉头，胸口呼哧呼哧喘得像拉风箱，王淦昌扭向一边的脸憋得通红。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1978年4月6日，束星北来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他是被所长曾荣的吉普车接到所里来的，这天上午，所长曾荣率领着全所人马在所大门口夹道欢迎：鞭炮、锣鼓、彩旗和热烈的欢呼声让束星北喜不自禁，流下了泪水。

历史划了个圆圈，好像又回到了起点。束星北又一次站到了讲台上，开始讲他最拿手的牛顿力学。

修日晨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1978年8月，我刚刚结束了历时半年的科技英语中级班学习，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实际流场预报方法研究"这一课题中去。一天，室领导告诉我，曾所长要我参加"进修班"学习。由于我们这个研究项目当时已进入最后的"攻关"阶段，这最后一个难关攻克了就大功告成。因此，当时我并不想参加这个"进修班"学习。室领导也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他要我自己去向曾所长说明情况。当时曾所长亲切地对我说："成果晚一两年出来没关系，你一定要下决心参加这个'进修班'，这是向束教授学习知识、提高业务水平的好机会，这次我下决心把这个'进修班'搬到李村去办，让一批有条件的业务骨干集中精力去学习，目的是要尽快提高我们所物理海洋学的研究水平。"他要我带着我们的(阶段研究成果)论文报告就直接向束老师报到。就这样，我虽然未参加"进修班"入学选拔考试，带着论文就直接向束老师报到了。当我把论文报告交给他时，他连看一眼也不肯，就把它放在一边，并淡淡地对我说，到了"进修班"，没有他的同意，不得擅自发表(论)文章。我诚恳地希望他能看一看，并能提出批评指导(意见)，他说，现在我没有时间看，再说，你的脑子现在糊里糊涂，讲了也没用，等你在"进修班"学习一段时间之后，脑子清楚了，讲了才有用。就这样，第一次见到束老师心里很委屈，也有些不服气，心想，我写的论文报告你看也不看，怎么就知道我脑子里糊里糊涂？如果我真的像你讲得那样糊涂，我怎么能够冲破传统观点的束缚，提出一个全新的潮流场永久预报方法这一研究内容呢？当时我感到束老师不大好接近，便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从不主动去接近他。



往事如烟兮。1979年重返讲台的束星北，给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学生讲授的仍是四十年前他在浙江大学所讲授的内容。

没过多久，出现了转机。9月19日束老师在所里举行了一次牛顿力学专题讲座，这是我有生以来听的最为精彩的一次高水平讲座，使我真正体会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句名言的深刻含义，束老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子变得无比高大。感到参加即将举办的“进修班”，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非常及时，因为积压在我心中的许多业务上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我虽曾多方面请教而未获满意解答的“老大难”问题，束老师肯定会给我彻底解答的。

1978年11月1日，“进修班”在李村崂山旅馆正式开始，至1979年4月18日第一阶段宣告结束。第一阶段学习的是流体力学。束老师在第一阶段的学习总结中，对我们全体学员进行了批评：“你们动脑筋不够，因为我发现，我未想到的问题，你们也未想到。你们应该比我想得多才对。要变成你们自己的东西，这样教起来才有劲头。”“当某一个问题求得解答时，一定要尽可能地去思考其物理意义，不能满足于公式，李政道就有个脾气，他从不满足于公式，而是想透，因为公式是死的。”……在这一阶段中，我是很累、很累，但收获也是很大、很大。我非常愿意听束老师的讲课，简直使我入了迷，听他的课可以说是一种“学术享受”。束老师能把数学、物理融为一体，可以说是教学中的“一绝”，能有机会听束老师如此精彩的讲课，真是万幸。

……①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这是多么似曾相识的镜头，这组镜头与上一次的镜头相隔了四十多年。往事如烟兮。不同的是，束星北已垂垂老矣。他很像刚从急诊室里跑出来的急症病人：氧气袋、肾上腺素气雾剂和各种各样的小药袋装备在身上。长年得不到医治或保健的肺气肿越来越严重。发作起来，他就像突然给扔到岸边的鱼，瞪凸了眼睛，干张着嘴，于是马上就得喷药，吸氧。

这一年，束星北70岁，对一个70岁的老人而言，他还算是幸运的：他终于活了下来，摘了帽子，还赶上了“科学的春天”。

可是他又是不幸的，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遗憾太多，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

1978年中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中国又一次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流浪”在外的知识分子开始“回笼”，有远见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及早地伸出了手，有些院所甚至还打起了人才争夺战。束星北像一株惊蛰后的植物，吮吸着温温的春雨，潜伏已久的触须悄悄地展开了。

最初，和他想象的一样，一些大院大所向他伸出了手。先是广州暨南大学派人来了解他的情况；几乎同时，厦门大学也向他表示了意愿；其后，北京大学和中科院下属的一家科研机构也派人来了。对束星北而言，一切好像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接下来的事情，是怎样选择一家最适合自己的大学或单位。

期待的日子突然漫长起来，北京大学和暨南大学没了下文，中科院的科研机构直接表示拒绝，厦门大学虽没明确拒绝，但口气有些吞吞吐吐了。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还没意识到，正是他的“过去”把自己挡在了门外(他天真地以为，时间可以泯灭一切，万物复苏了，一切当恢复正常了)。

在令人不安的焦焦躁躁的期待中，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曾荣向他伸出了手。

曾荣有一颗金子一般的心。这是所有同他打过交道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的共同感触。过去以勇猛善战而闻名渤海一带的曾荣是一个公认的好人(组织上则认为他是一代优秀革命干部的代表)。无论是他的同事还是下属，若是有问题，只要向他开口，他一定会鼎力相助。在他担任了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的初期，要求落实政策的人特别多，他专门设了个“上访办”，每周专门拿出几个下午来为人“排忧解难”，有时单位接待不过来，他就将人引到家里。有些经济困难的“上访户”不但解决了长年的问题，还从他那里得到经济帮助，而过后，他从不会再提及。他也绝不会让深受其惠的人有负债的感觉，他认为换上谁都一样。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只不过是在体现党的情感、组织的情感。曾荣的故事很多，只举一例就足以说明他的为人了。70年代初期，右派分子王秉文登门求救。王秉文原先是青岛建工学院的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被遣到了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因受不

了残酷的体力劳动和精神折磨，中途溜了号，跑回东北老家，从此成了“黑户”。几年后，听说上面的政策有所松动，王秉文便从老家跑回来要求“恢复原籍”。自然不会有任何人任何单位理睬这个“黑户”。为了生存，也为了名誉，王秉文成为这个城市最早的上访先驱，因没有户口，他只能一边要着饭，一边上访。他常常和一些上访队伍一同宿在火车站候车室或医院急诊室走廊的长椅上。平时也没人搭理他们，一旦有了什么活动特别是重大的外事活动，自有一些人来驱散他们。比如，西哈努克来访之前，公安局便会通知他的原校保卫科来人找他，专门把他遣送回老家去。后来，学校一个好心的保卫科副科长，给他介绍了曾荣。他说：你只要有勇气敲开这家人的家门，你就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就有安身立命的地方了。走投无路的王秉文鼓足勇气敲开了曾荣的大门(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也无所谓自尊了)，而那个在他看来既威严又强悍的身着海军军装的军官，果真收留了他。他在这个家里断断续续地住了将近两年，直到他恢复了“市籍”才离开这个家。②



劫后余生。束星北和王淦昌坐在束星北家简陋的沙发上感慨万千。(1980年)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前身是国家海洋局海洋科技情报所，属部队编制，几年前提升为综合性海洋研究所后，并没有现成的人才，上面从有关基层单位调集了一批业务骨干，便草草开张。由通讯员、油印员、干事而文书、参谋，一路上来的曾荣，虽然是行伍出身，却是个善于审时度势的聪明人。他清楚，要想使匆匆搭起来的“班子”脱胎换骨，让一批先天不足的业务骨干成为学术带头人，首先要做的，是找到一个或几个“科学教育巨人”。有人推荐了束星北。

最初，束星北无意跟着一个军人出身的所长“出山”。一是这个研究所当时还属部队编制，束星北顾虑它的政治气候，再就是这个研究所的专业多属海洋应用研究，如黄海地质调查、东海大陆架调查、全球大气试验、海浪预报等等，与他的“专业”不对口。

军人出身的曾荣是个天生的心理学家，他从不强迫束星北，而是像老朋友一样，不断来看他，同他聊天，待将心聊热了，就从怀里掏出老白干，让随行上街弄点花生米、猪耳朵等，边喝边聊。当束星北得知，这个对他尊敬有加的所长，每次来看他，总是让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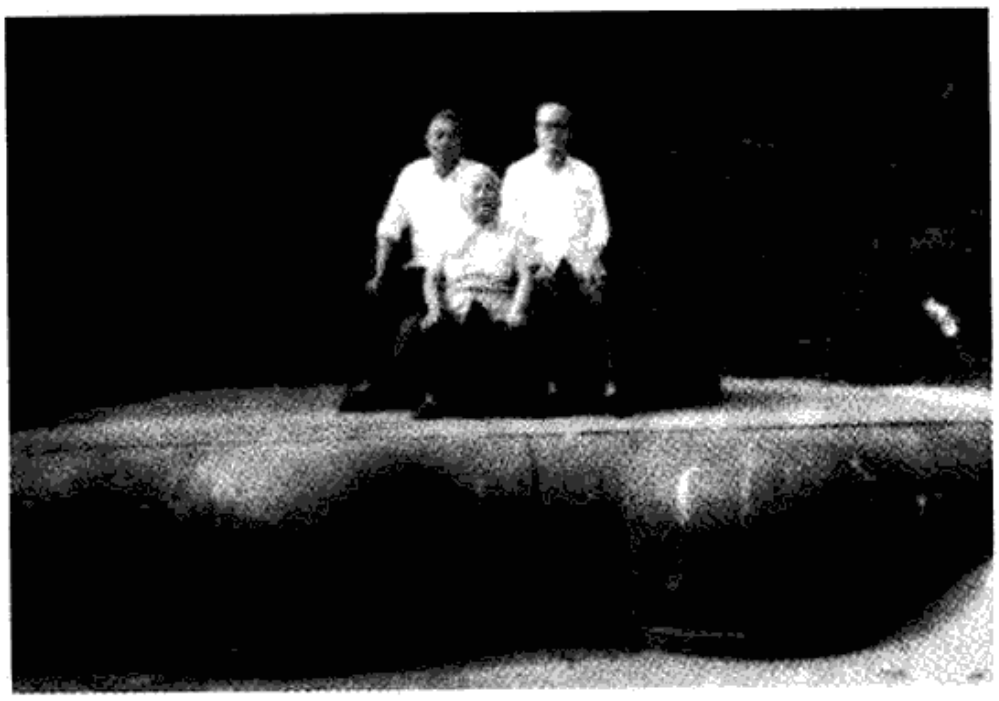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吉普车远远地停在院外时，他已经不可能再做别的选择了。

束星北在人生的最后的日子里，做了两件事：一是凭着他深厚的物理与数学的功底，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为年轻的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打下了一个基础；二是建议开展国内尚无人涉及的以实测为基础的海洋内波的研究。他的建议后来被纳入国家海洋研究规划中。



王淦昌与束星北夫妇在青岛山德国炮台遗址合影。（1980年）

这些显然不是束星北的全部。束星北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他拼命地想抓住点什么。他极需要补课，需要寻找过去的感觉，极需要尽快地缩小或消除与世界隔开了三十年的距离。他要重新修改完成于1960年的《狭义相对论》，这部起笔于1957年被打成极右之后的著作，一些材料需要更新，有的思想观点也需要修正。他还要研究黑潮；③他还希望能够带出一批高水平的学生。④

据其子女称，1972年，李政道给束星北来信后，他的处境大为改观，已经可以公开看一些专业书籍，并通过朋友开始搜集一些较新的资料。他从不外出（曾有很多朋友和同事约他出去，他总是以身体欠佳，多有不便而谢绝），甚至连落实政策、平反昭雪这样的政治大事也无意亲自过问，他几乎马上就斩断了过去的生活圈子，斩断了很多朋友关系，他好像要斩断一切与过去生活有联系的东西。

刘洪宾：

说实话，复出后的束先生让我感到费解，对大多数人来说，平反昭雪、落实政策、解除政治绳索、平抚伤口是头等大事，知识分子被整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解放了，怎么也得给自己讨个说法，这不仅是平衡自己的问题，也是为自己和家庭儿女所考虑。那会儿谁

也不敢预测以后的天空永远都是蓝的。可是束先生却不愿意涉及过去，不愿意涉及一切与过去有关的东西。因束先生是"束星北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很多人特别是我们这些深受其牵连的"成员"，都希望他能够出面，率大家一道来解决平反与昭雪的问题。没想到，他对这事反应很冷谈，他无意"算账"和"复仇"，也无意同我们这些当年的"属下"交往。对自己的政治大事，他表示，一切由组织和家人去办，自己不愿也无力插手。尽管天已经变了，可是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的过程还是非常繁琐忙碌，光为了"束星北反革命集团"的事，山东大学和有关单位的外调人员就来了六七次，每次人家来，都是我出面，束星北从不参加，即使连我每次的调查记录他都懒得看。好像这事与他从不相干，如果说，怕耽搁时间，怕触伤口也就罢了，可是他对待李哲明的态度让人难以理解。

时间好像是1980年的4月，"文革"后的中国第一届核物理、高能物理和天体物理学术会在青岛召开，那次会议规格很高，王淦昌、周培源等著名人士都来了，刚刚从英国回来的方励之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因有不少熟人(也出于渴望对国内外最新信息的了解)，我和青岛一些物理界的人常到会上走动，就在会议报到的当天，我就看到了李哲明，我相信他是没资格来参加这样的会议的，估计和我一样，他也是来拜访师友的，他的到来，勾起了很多人的复杂情绪，山东大学"束星北反革命集团"不少人的落难都与他有关系，甚至连他的



大难不死的束星北与老友王淦昌在青岛山重逢。(1980年)

恩师也未能幸免。他这样的人竟然还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这样的会议上，真是让人匪夷所思。说实话，有几个深受其害的——当然也包括我，一看到他就浑身发抖。我们一起商量怎样面对他，怎样讨个说法时，束先生出现了，这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感觉，按束先生的性子脾气，见到这个当年的"党"的化身，会作何反应是不难想见的。可是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

那一天(好像是会议的第二天)束先生和王淦昌一同出现在会议上(王淦昌在报到的当天

下午就去找了束先生，并在他家住了一夜），参加会议的大都是束先生的熟人朋友，一听说他来了，很多人便到门口去迎接。李哲明是在大门口同束先生相遇的：束先生往里进，他向外出，结果碰了个头对头。当时我们几个"成员"都在场，其他一些人想必对他们的恩恩怨怨也略知一些，自然较为敏感，有意无意地静了下来，看着两个人"历史性"的会面。好像是李哲明先发现了束先生，他迟疑了一下，迎了上去，轻轻地叫了声"束先生"，伸过手去，束先生微笑着接住了他的手，没有惊愕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干脆是没有一点异样的表情，要说有的话，也仅仅是有点陌生感。我们都以为束先生没有认出这个人来。事后，我同束先生说，你知道那人是谁吗？是李哲明哪！束先生听到李哲明这个名字时也没有异样的表情，只是"哦"了一声，"哦"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屑一提哪，还是不愿再触动过去，我没弄明白。束先生从此再也没提及此人此事。⑤

有一个问题便跳了出来：人会不会改变？一个二十几年或更为长久的巨大的全社会的改造工程对一个人的影响多大，它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

1977年春季，青岛医学院发生了一个"政治事件"，主角是人人都认为改造得最为成功也最为彻底的束星北。这个事件，足可以检验一个社会对一个人的改造工程的成果。

何树华

（山东某医院人事处副处长，时为青岛医学院人事处工作人员）：

时间大约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形势的变化尽管还未完全定局，却已经明朗了。这个时候，一个不起眼的小事让所有的人重新认识了束星北。

那一天，部队一家医院托我找束星北帮他们修理医疗仪器，四处找找不到，有人告诉我说他到山大医院保健室修仪器去了，到了那里就看见他和后勤处张科长正在吵吵什么，一些大夫、护士散散地围在一边看热闹。我赶紧上前调解。张科长一看到我以为来了援兵，便拉住我让我评理。

他说束星北堆在门外走廊两旁的书籍家什碍了行人的事，让他搬一搬，他就发火。束星北"摘帽"前夕（李政道与他联系之后）得到组织照顾，给他分了一间小房。小房在尸体标本室的头上。因房屋太小，大约只有七八平方米，搬家时，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只好堆在门外，自然给来取尸体标本的人带来不便。

束星北说，搬可以搬，不过你得给我找个放东西的地方。张科长说，我没有地方给你放东西，我只管你把走廊清理出来。束星北说，你不给我找房我就不搬。张科长看着我说，你不搬不行，告诉你，别以为你摘了帽子就能翻天了，你还得老老实实地接受人民的专政。张科长"文革"前便是个校工，"文革"初期造反起家，曾一度辉煌，进了青岛医学院

的领导班子，但是很快又在组织和派性斗争中被淘汰出局，以后便在社会上闲逛，形势有了变化后，他捅咕捅咕进了后勤，当了科长。

他这话一出，束星北发作了：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们压制了我这么多年，还要再压制我，办不到。现在不是那时候了。张科长见束星北火了，也提高了嗓门，想压住束星北气焰，你是国民党是特务，还能翻了天？束星北一听这话，如同被激怒的狮子，他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起来。束星北的"语言"毒辣、污秽，和市井的街骂无异，束星北这时的模样，完全和被激怒的贩夫走卒一样，满脸溅沫、青筋暴起，几次咆哮着冲上前去撕扯那个人，如果不是我和其他人拉扯着，他的"敌人"，似乎片刻就会被撕得粉碎。

束星北竟有这副"面孔"，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些看惯了"好人形象"的围观者也都目瞪口呆，说实话，束星北给我的印象一直不错，若不是身份的话，我们一定会交上朋友的，可是我对张科长这种人却是反感厌恶的，但那个时候，我只能压事，我拽着束星北胳膊，不断地劝说，不过这个时候，束星北已经感觉不到任何人的存在了。他的街骂很快就变成了"洋骂"，他嘀里咕噜地发出一串串谁也听不懂的叫骂声，我们没人听得懂他骂的是些什么，只是凭着神态断定他仍在"街骂"。

只有马贤成听懂了他的街骂。马贤成是我们医院最著名的寄生虫学专家，那天束星北与张科长相互大骂时，他正好路过。马贤成在美国留学工作多年，他事后回顾这一幕时仍感慨不已。他说束星北那天的"街骂"，竟有一些美国西部城市早期的俚语，这样的俚语，只属铁路工人、码头工人和最下层的贫民区，现在，即使纯正的美国当地人也未必能听得懂了。

张科长造反起家，当属专政者，束星北肯定反感至极，但此人不足以让他如此"发作"。我了解过，两人在这之前，并无过节，显然张科长只不过是个"道具"，是个束星北发泄的对象，他一不小心碰到了磕子上，束星北便将几十年的积怨和悲愤一并喷出。

尽管形势已变，但很多人的观念思想还没转过弯来，他们无法理解束星北的另一副形象，事后院里专门为此开了会，有一个主要负责人说，你们看看，我早说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样的人早晚要现原形的。

事件虽然影响很大，却属于个人间的冲突，上边各打五十大板，便了结了。⑥

"复出"后的束星北马上就"原形毕露"了。熟知他的人们好像又看到了过去那个束星北，那个直言快语、敢说敢做、黑白分明、疾恶如仇的束星北，那个把学术标准和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标准混为一谈的束星北，那个不讲情面不讲方式，也从不顾及人家面子的束星北。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第一批学员们大都领略了老师的"个性"：他常常对那些在他看来脑子简直就跟"猪脑子"一样笨的学员大叫大嚷，当众用粗话来羞辱他们。如果哪个学员上交的作业屡次出现问题时，他们的作业本上就留下先生独特的批语："狗屁不通"、"什么玩艺"、"你的脑袋是用来干什么的"。这还算客气的，也有一些常常被叫到黑板

前，当众用粉笔“枪毙”。⑦

他复出后，很快就被冠上一些头衔：中国海洋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山东省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海洋局学术委员会委员，青岛市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顾问等等。挂上这些头衔后有关学术会议便多了起来，幸好，很多会议他都不参加，只要参加，学术讨论会或项目鉴定会议都会变成名副其实的“战场”。他的眼睛如同精密的卡尺，再严谨再完善的学术文章或成果也得打上点折扣，更不要说有错误有漏洞或不成熟的文章了。他对自己的研究生也是如此，严得令他们生畏，严得让他们心存它虑。有一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竟被他退回了七次。⑧

对于科学名家，他也一样毫不客气，有一个著名的海洋学家出了一本潮汐图，他发现了一些毛病，就大加批驳，电视台来拍电视，用一些书做背景，他发现了这本书，马上就扔到了地上。他说这样不严肃的书只配垫脚，他甚至专门拿出一节课来让学生给这本书挑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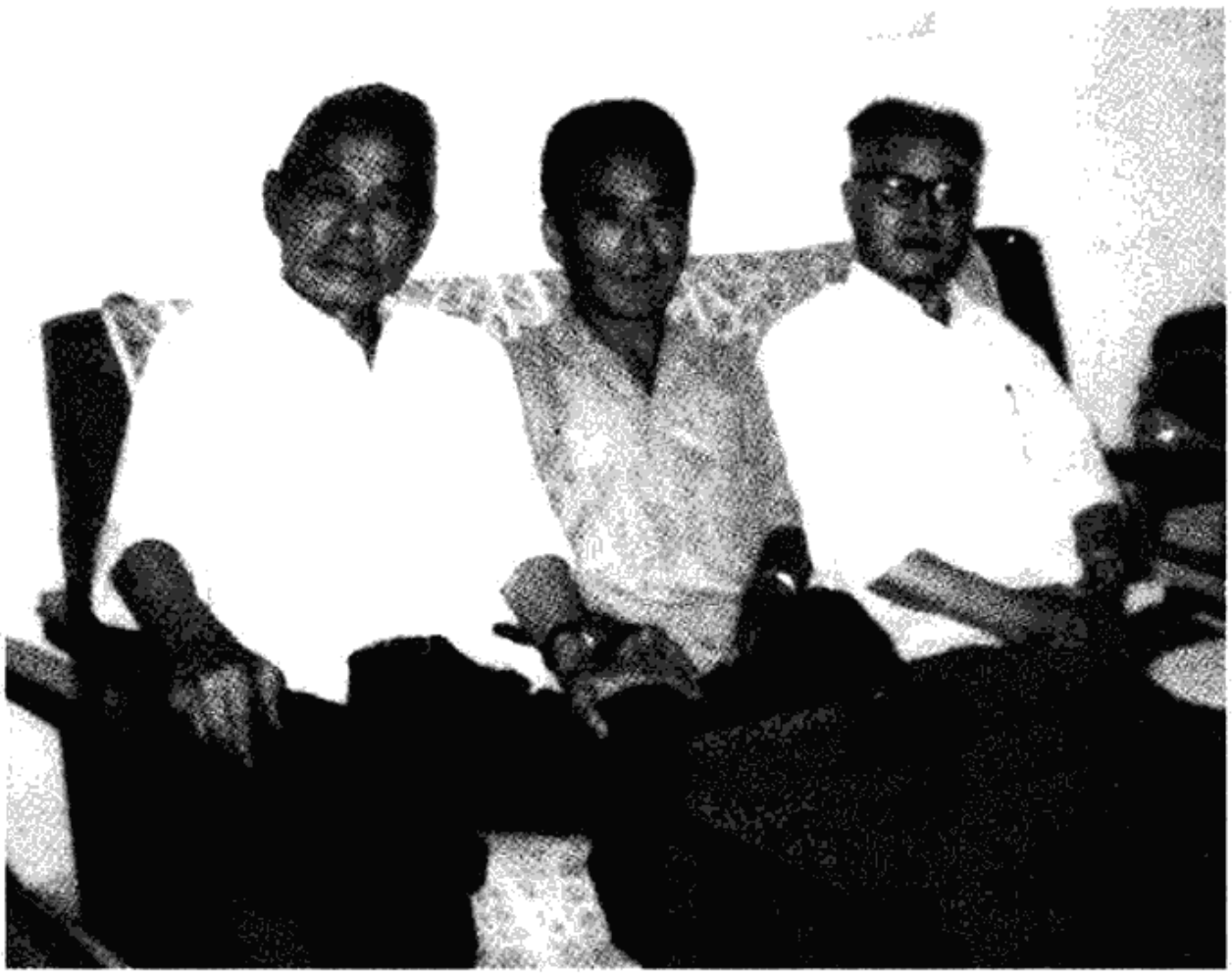
干部任免，按说与他无关，可是在他眼里，领导干部一定要品学兼优，如果不是这样，他一定要“横加干涉”的。弄得一些雄心勃勃的骨干对他恨得不行。有一次所里有意提升一个年轻领导，其人威信很高，品德优秀，得到大家一致的公认。可是束星北却认为他的业务稍逊而坚决反对，而所长曾荣又不愿意驳他的面子，结果这个本该在领导岗位上大展鸿图的优秀青年只好在部门加强业务学习，继续接受组织的考验。

尽管他的环境和地位都与以前大不相同，但他的政治态度变化不大，让人感觉到他与党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几乎不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政治学习，无论多么重要，他都不参加，和业务专业没有关系的外事活动也不介入。束星北是省政协委员，可一年一次的“政治协商会议”，他只参加了一次(中途即告退)。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里，只有他一人有这个“特权”，是曾荣所长给他的。

“三中全会”后，王淦昌和苏步青等科学家相继提出入党申请并得到批准，青岛市和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领导也希望束星北能像他们一样，有关领导本以为他会珍惜这个政治荣誉的，没料到束星北直截了当地表示了拒绝。以后，据说曾荣所长曾亲自出马动员，也没有将束星北说服。对于他的这种表现，有人说是一种冷静，是担心卷入得过深而失去自我；也有人分析说，是他骨子里的问题，他与党总是保持着一定距离，一贯如此。他自己的解释是：他这个人一向不听话，不守纪律，怕开会，因而不能入党，这样两清着，对谁都好！⑨

束星北能有如此状态或形象，这让关注他的老友、同事、学生既诧异又欣慰。在一些人眼里，“复出”之后的束星北，除去时代岁月留下的外表痕迹外，骨子里并没有多少变化，最主要的是，他身上一些优秀的品质还都保存得完好无损，如他的率直性情，他对待人和对生命的热情，对待事业的执着精神等等，几十年的“改造”和“清洗”，甚至连他的“坏脾气”好像也未从根本上触动。特别是在一些浙江大学老校友或学生的眼里，束星北似乎还

是“昨天”的样子。如有一天，王淦昌走进束星北的家，就像到隔壁邻居家串了个门，让人感觉不到岁月的齿痕和历史的烟云。



束星北与王淦昌。左一为束星北，中间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人员。（1980年）

束美新：

那年4月（印象中好像是1980年），王淦昌来青岛参加核物理、高能物理和天体物理会议。来前跟父亲打了招呼，说是来看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全家都非常激动。王淦昌不但是我父亲的挚友，也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历史上多少次关键时刻，都是他帮助了我父亲和我们家渡过了难关。大哥越新曾告诉我一件事：1937年秋天，日本军队在上海乍浦登陆，浙江大学还在沿浙赣铁路内地西迁的途中，王淦昌只身到上海去接他（当时他住在上海奶奶家里）。那时候，他只有8岁，王淦昌带着他经温州、丽水到金华，再由长沙抵湘潭，途经丽水时，遇到日寇飞机轰炸，王淦昌竟扑在他的身上。这个故事，以后，我在王淦昌回忆我父亲的回忆录里也读到过。还有一件事，外人恐怕都不知道，是伯母吴月琴亲口给我讲的。时间大约在40年代初，浙江大学有传言说王淦昌同化学系的一个女助教要好（这之前，王淦昌的妻子儿女已被送回老家），我父亲得知后，也不找王淦昌询问证实，甚至连招呼也没有打，带上两个学生直奔王淦昌的老家江苏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当时，正在打仗，交通吃紧，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弄了辆黄鱼车，冒着敌机轰炸，辗转多日，将王淦昌妻子吴月琴和儿女接到遵义湄潭。吴伯母说，那时候，大学里这样的事情，也只有我父亲做得出。从这两件事中，就完全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是多么的好。

从1954年父亲应邀去京算起，两人已26年没有见面了，这26年，发生了多少事情哪。对于两人的“历史性”的会面，我有过无数的想象。可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两人会面的那个时刻竟是平平常常、波澜不惊。他们甚至连手也没碰一下。在我的印象里，王淦昌推门进来的时候，两人的目光倏地碰了一下，然后就坐了下来，没有寒暄，甚至也没笑一下。感觉着两个人根本就没有隔开过，好像是住在隔壁的邻居，只是随便来串串门。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因有会议，王淦昌在我们家只住了一个晚上。晚上他们就住在海洋研究所的招待所里，翌日早晨，我陪他们登上了青岛山，给他们在德国炮台和山上的亭子前拍了些照片。两个人说说笑笑的，看不出一点历史的阴影和隔膜。令我吃惊的是，两人在一起的所有时间里(会后王淦昌又来了一次)竟没提到过去，一句也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默契。吃早饭的时候，两人突然在客厅里"打"了起来，我当时正在厨房里做饭，突然听到父亲和王淦昌的吼叫声。起初我以为是在争论什么，可是马上就感到味道不对，就听父亲突然粗声大嗓地吼叫起来，接着是王淦昌高声喊叫的声音(王淦昌的声音细一些，但频率很高)。我赶紧跑到客厅，只见父亲锁着眉头，胸口呼哧呼哧喘得像拉风箱，王淦昌扭向一边的脸憋得通红，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便问，不过上了饭桌，两人便又说说笑笑的和好如初了。



束星北在海洋科学考察船上辅导学生。(1980年)

以后，我问父亲为什么和王淦昌"打架"，父亲笑笑说：还是湄潭时争论的老问题。

临分别，王淦昌握着父亲的手说，你还是老样子。父亲说，没办法，人是不会改变的。⑩

不过束星北的变化又是显而易见的，多数人看到的只是束星北的一个"层面"，一个有生命的"原生态"的层面，可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过去"的烙印已深深地烙进了他的肌肤。他已不再是50年代的那个束星北了，"过去"像咒符一样附在他身上，他的抗拒和对"过去"的摆脱无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着"变化"。只是那时候，人们被一种力量控制着，大都感觉不到他的变化，或者即使感觉到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束美新提供的两个"故事"颇

能说明这一点。

80年代初伴着社会体制的变革和新旧交替，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潮汛一样涌动并弥漫着，自然也影响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也影响到束星北的学生特别是年轻学生。他对这种空前的思想潮流不安大于欣然，他虽然也如往常一样，让他们安心研究与学习，设法把他们"控制"、"稳定"在实验室或书本里，但其行为背后已是对思想潮流的戒备和敌意了。他对一个研究生的处理上足可以说明这一点。那个研究生来自海洋学院，在第一海洋研究所所有的同期学生中，他自身条件和科学素养最为优秀，束星北曾在曾荣所长面前大加称赞，说他身上有一股子不将问题"钻透"而绝不罢休的劲头，那是李政道身上才有的"气质"，是个好苗子。可是就因这个"好苗子"在一个公众场合说了句，"如果他们搞不好中国(指当时的中央个别领导人)，那么不妨让卡特帮忙改革嘛！"就被束星北当场拧住胳膊提溜到曾荣所长办公室，要所长立刻开除这个思想糟糕的学生。曾所长了解了情况后，觉得这事仅属思想认识问题，属思想教育范畴。因而便派人做老先生的工作，可是不论谁出马，束星北硬是不给曾荣这个面子，后来曾所长只好将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搬出来。束美新自知父亲的脉搏，她把父亲重新拉回"过去"因言致祸的年代，用了很大的工夫"回忆对比"，"将心比心"，才将父亲说得若有所悟，最终放了那个研究生一马。如果说那个研究生还属外人的话，那么对女儿束美新的"干涉"则更能证明他的"变化"。

束美新：

父亲复出后，很快就将我和丈夫从聊城三线厂调回，我被安排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科室，丈夫安排到所办厂做技工。我当然不想让人另眼相看，说我是靠着父亲的关系或门路，成为科研人员的，于是便拼命地复习高考(当然上大学还有一层圆梦的意思，为我的哥哥，为我自己)。经过近一年没昼没夜、昏天黑地的日子，我终于得到了金榜题名的那一天，我想这对我的父亲来说，是多么大的喜事哪。

在众多的子女中，父亲对我另有一番情怀，恐怕不仅仅是老父疼小女所能概括的。我想有一个例子足能说明这一点。

1969年上面提出了"上山下乡"时，我们家的子女除去我，都有了着落，因而，一些人便将眼睛盯住了我。为了逃避"上山下乡"，我躲到了南京大姐那里，随后五嫂王惠玲找了关系，把我的户口也迁到大姐家，一切都安顿好，自以为这下子保险了，偷偷地回了次家，也有探探风声的意思。还没进家，我便知道，"上山下乡"这一关我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我发现揭发父亲干扰破坏"上山下乡"的大字报，从合江路路口一直贴到我们家门口，甚至连家门、家具和惟一一个破碗橱也未能幸免。虽没有什么内容，几乎都是些口号，可是父亲的名字一律打着血红的大叉，让人心惊肉跳的。那个时候，正是"军宣队"、



"工宣队"当道，若是父亲再被他们戴上对抗"上山下乡"运动的帽子，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们对"五类分子"整治起来是多么凶啊！尽管如此，父亲却从不给我施加压力，因为心虚，我总是怯怯地读他的脸色，可我没有从他那张不着一点表情的脸上读出丁点的埋怨，甚至连征询的意思也没有。母亲告诉我，我走后，医学院、街道办事处和有关部门，多次派人到家来向父亲施加压力，可是一向被认为"老老实实"的父亲却不置一词。

以后想起来，这是多么危险的选择。不要说父亲以前的"底子"，单凭对抗"上山下乡"一条就可能是死罪。无奈之下，我几乎马上就找了个工人结了婚，改变了身份并一同去了三线厂。父亲也因此而解除了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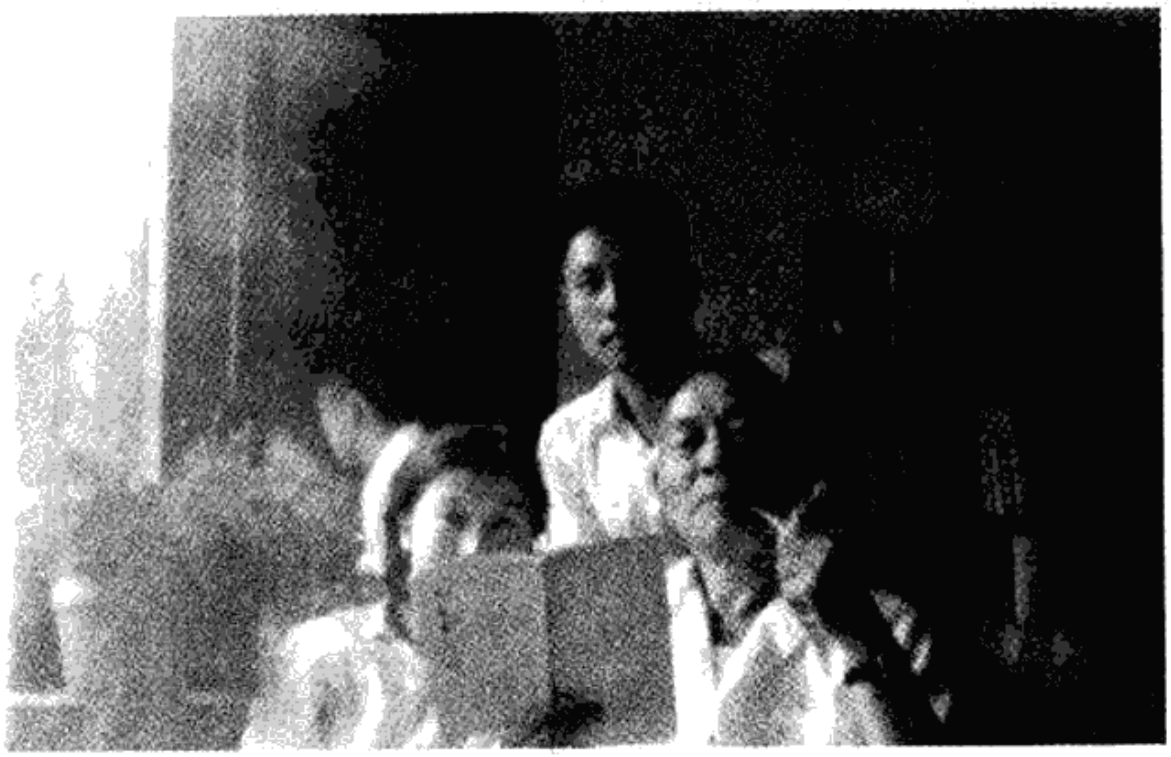
让我料想不到的是，如此疼爱我的父亲听到我考上大学后，并未出现我所期待的惊喜，相反他眉头憋蹙得老高，一脸忧心忡忡的模样。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小心地说，这回您可得好好奖励奖励我了。他用审视的目光盯了我好长时间后说，我看这个大学可以不上。一向将学习不好的子女作为耻辱的父亲竟阻止我上大学。

起初，无论我怎么问他，他也不说理由，只是让我在所里好好干，他说，只要努力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为了阻止我，他用很是鄙视的口吻说了一大堆对大学很不利的话。哥哥嫂嫂们都为我抱不平，他们轮番上阵，希望说服他，可全都碰了钉子。后来还是五嫂套出了他心中的隐情。他的理由是，我上了大学，必然要同他的女婿拉大距离，拉大距离，思想意识必然要发生变化，思想意识一发生变化，家庭的解体就不可避免了。原来他是担心我变成个女陈世美。丈夫出身工人世家，没有什么大本事，可人厚道能干，心灵手巧，喜欢做家务，我们从三线厂回来，因没有房子，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从此一个似乎永远是乱糟糟的家变了模样。丈夫还能陪父亲喝酒，也是他惟一一个酒后一展心扉的听众。

以后，当我重新回顾父亲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在我心目中，如天马行空的父亲能有如此"世俗"的隐情，并非是年事已高的原因，而是"历史"所致，长年累月的改造早就将他从天空拉了下来。我记得大哥为此还发了火，指着父亲说他是封建主义思想。父亲虽不反驳也不为所动。真的，父亲真正不变的大概是这股子永远也不服输的执拗劲。⑪

"人是不会改变的"，这话更像束星北宣言或证明，蕴涵着对"昨天"的抗拒和摆脱，但是"昨天"是无法摆脱或甩掉的东西。它像讨命符一样，粘在脊梁上，它常常在束星北不经意的时候，将它的寒冷渗进骨髓。

细心的女儿发现，复出后父亲睡相不好，很长一个时期仍摆脱不了被千斤巨石压住的感觉，他的心很累很沉重，梦话也很多。父亲的梦话大都是"昨天"的内容，背景要么是山东大学，要么是月子口。有时，父亲鼾声刚起，似进入梦境，突然一个激灵，像给浇了冷水一样，悚然惊起，马上就展纸捉笔，速速地写作。家人以为是灵感来了，惟恐电光石火，转眼即逝。因为他向有在半睡眠状态中思考问题的习惯。可是第二天看那一摞摞写得满满腾腾的"灵感"，全都是"立场"、"方向"的检讨和自我批判。



迟暮之年的束星北和儿子、儿媳在一起。(1979年)

束美新：

在一些人(他的学生或同事)眼里，父亲复出之后，一下子就找到了感觉和位置，就有了状态，就斩断了"过去"，就开始在科学和教育上大展宏图。很多有关他的文章，仍将他当英雄来看，仍在塑造他。从心情上讲，这样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也很让人受用。可事实却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父亲常回到"过去"，有时他突然就焦躁起来，满屋子里乱转，嚷嚷着说他的水桶、拖把和扫帚不见了。我们知道他"入梦"了，便小心地将他唤醒。最典型的是1980年初春发生的一件事。这事足可以说明父亲的晚年并没能够完全从噩梦中逃出来。那天下班回家，远远地看见父亲在楼梯洞门口徘徊，以为是没带钥匙，进不了家门，便赶紧跑过去，这才发现父亲的神态不对，他眉头憋蹙得老高(这是他疑惑不安紧张的一贯神态)，满脸的疑云与不安。他复出后，重新拾回了自信与力量，我们已经开始习惯他的新形象了。而眼前的神态一下子就将我拉回到了"过去"。我小心拿过他的手拍着问他，他不说话，只是嘴向楼上的家努了一努。我以为家出了什么大事，三步两步地上了楼，发现有两个警察在家里。这才松下一口气。原来，几天前我的车子在中山公园门口被偷了，报了案也没期望能够找到，没料到人家找到后竟登门来访，让我去公园派出所取车。

我下楼向父亲说明原因，可是父亲仍是疑惑，无论我怎么解释劝说，他也不回家，直到那两个警察走了后，他才跟我回去。⑫

直到最后，束星北仍挣扎在"昨天"的阴影里，他对斩断"过去"所做的努力，不仅包含着对噩梦的摆脱，也包含着对平庸的憎恨。

翻检束星北的历史，会发现一条贯穿其生命的主线：天才情结。与其相对应的是对平

庸的蔑视与憎恨。这也是一种现象，一种科学家或艺术家所共有的现象。这种现象还可以包揽得更广一些，可以说，所有不甘平凡、为事业奋斗拼搏的人都有这样的品质。只不过，在束星北身上，这样的品质表现得更为强烈更为典型。

一个小小的例子足可以说明这一点。1962年，正是束星北在青岛医学院改造的关键时期，那时候，他已经在自己的努力和张立文书记的帮助下，重拾信心，准备依靠技术改造来大干一场，以期实现摘掉"帽子"、重新回到人民队伍当中的愿望。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将自己多年的成果表交给了组织(据他自称，以前之所以没有上交，是认为他们——有关领导们根本就看不懂)，其中有一篇他写于1957年的未刊文章《光在物质中传播为什么会慢》，他颇感得意，重点推出。由于长期接触不到新鲜资料(那时候，大学图书馆和有关资料室已全部对他关闭)和所处环境所处地位的限制，他的一些思想较世界前沿的学术已有了距离，再出成果，已是凭借老本了。可是他似还不自知，当有人告诉他，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别人已发表在前时，他还不相信："他听到消息后便急于找。先见到1957年以后的，他欣然自得。待别人指给他1954年的资料时，则颓然良失(久)。"⑬

缘着这条线，我们还可以看到，束星北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低下去"的英豪意识，天马行空，千山我独行的特立独行的品行，"一贯地傲上慢下"，"一贯地瞧不起群众"，"一贯地不服从领导、纪律(认为守纪律是没用的人，认为服从组织的是没饭吃的懦夫)"，"喜欢打抱不平"的心态。即使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他的这种情结仍如顽强的植物，从各个石缝中钻出并不断地向上攀缘。

束星北一生都在同"平庸"作战，并设法摆脱它远离它，直到他的晚年，很多同代科学家可以回顾评价检阅自己的人生道路时，他却仍在"一线"上作战。只是一切都为时晚矣。

束星北最终没有抓住时间的尾巴，1983年9月底，一场小小的风寒将这个身心早已千疮百孔的老人击倒了。躺在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床上，束星北才意识到，自己战胜不了那个比他更老的老人。在这之前，他一直认为，时间对于他还很宽容。他一直认为自己身体状况也还可以，腿脚也还灵便，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黑潮"研究已有了研究路径，由他提出的"内波"的研究也提上了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日程。他最自信的是他的精力与记忆力都不亚于当年。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的感觉不谬。1979年航天部试验的中国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慎重起见，国家有关部门在学术界广泛征求有关科学家意见，有人推荐了束星北。洲际导弹是原子弹的运载工具，有了原子弹若没有洲际导弹如同"有弹无枪"。因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后，于60年代后期，又开始了洲际导弹的研制。中国的中、近程导弹试验，一直都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进行。随着导弹射程的增加，落点从西北移向华北，再到东北。而洲际导弹的射程是中远程导弹的2—3倍，陆地不够用，只能向世界公海延伸。这样，中国在避开国际航道的"公海"上开辟试验区，建造了机动性强、测量跟踪和控制功能齐全、设备精良的远洋测量

船，弥补了陆地测控站作用距离不够的缺陷，填补了陆地与海洋测量跟踪站之间的空白。因是在“公海”上试验，中国的洲际导弹试验颇为世界各国所关注，数据舱的接收与打捞时限便显得尤为重要。有人对束星北担当此任提出了异议，最后还是钱学森拍了板。

结果束星北仅以实验室的一台计算机(据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负责人称，上面为这项研究拨款100万元，束星北分文资金未要)、一枝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任务。这一年，束星北73岁，73岁高龄的科学家独自一人，出色完成了重大而复杂的计算任务，这在航天学界颇轰动一时。

最后的时刻，束星北还期望通过一搏，使自己多年的积累有个突破。由于种种已知的原因，上帝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入院前的一个时期里，因手里没有具体项目，工作也无非是指指画画，似觉清闲，他便将自己的研究室搬到阳光下。那个时期，每天一上班，人们就看见束星北独自一个人搬着个小马扎，坐在海洋研究所物理楼前面的操场上，沐浴着阳光，眯缝着眼睛，常常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不解其情的人以为那老头是在“下神”，打发着生命最后的日子，了解他的人却知道，他是在工作，仍在思考着他几十年前的课题，没人打扰他，路过他身边的人都踮起了脚，人们不愿搅了他的好梦。他曾对学生修日晨讲过自己的这种独特的工作方式，他说，一个人坐在阳光下，思考他的相对论，很集中，也很放松，无数的思想和过去的积累会像阳光一样碰来碰去，容易产生爆炸。但他同时也承认，要形成体系很难，也许是终生的遗憾。



重新工作的束星北有一种和时间赛跑的紧迫感。(1979年)

如此撒手尘世，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束星北似有不甘，显然他不愿如此告别人间，他总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没做，诸种遗憾和不甘，尽在弥留之际表现出来。他不断地和他的主治大夫和医院主管领导沟通交流，不断地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历史和想法，感觉着同人家已经了解沟通了之后，便做出了人生的最后一次选择。



一是将自己的遗体无偿捐给青岛医学院，做解剖和医学实验材料之用。

根据临床观察，一般情况下，长期注射肾上腺素，必然对血压和心脏带来不利影响，他患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多年，一直都在注射肾上腺素，可是血压心脏却一直很正常，这事让他感到奇怪，认定是一个医学课题，因而希望医学院将此作为课题来研究，二是将骨骼穿为标本，供教学使用。当时，这事很是轰动了一阵子，束星北的子女们专门写了父亲遗体捐献书和移交书，青岛医学院和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也签定了有关文书。

父亲遗体捐献书

我们的父亲束星北从事科学教育五十多年。其中在青岛医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二十多年。父亲生前曾多次叮嘱我们，他死后，一定要把他的遗体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和教育事业。

早在1974年的春节前夕，他便借我们全家团聚的时候说：我死后遗体不要火化，火化对人对社会都无益，一定要将我的遗体交给青岛医学院，以供科研和教学使用。我一生从事科学教育事业，也算为医学和教育事业做一点最后的贡献。父亲那时正身处逆境，身体素质很差，想到自己随时可能不久于人世才说这番话的。

1979年7月，父亲曾对青岛医学院长期进行解剖学研究的沈福彭教授说："据临床观察，长期注射肾上腺素，必然对血压和心脏带来不利影响，可是我多年来，因患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一直注射肾上腺素，血压心脏却一直很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希望我死后你们将我的尸体解剖观察分析研究。"当时两个人即商定，他们去世后，都将把遗体献给青岛医学院解剖教研室，把骨骼穿成标本，以供教学使用。

1981年，沈福彭教授去世后，家人果真按着他的遗嘱，把他的遗体骨骼穿成了标本，送到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又一次对我们全家说："沈教授的遗愿实现了，等我去世后，你们也要把我的遗体交给青岛医学院，千万不要火化，火化是浪费，对社会无益。现在医学院的尸体标本缺乏。"

就是他在这次患病中，也多次叮嘱我们，如果他病故了，一定要将他的尸体进行解剖，要让有关医生把遗传性哮喘病，肺气肿服用肾上素腺对血压和心脏的关系进行解剖研究，并将遗体穿成骨骼标本，供教学使用。

因此，按照父亲的生前的遗愿，我们全家要求：一、请青岛医学院对他的遗体进行解剖、观察、研究，以便分析出长期注射肾上腺素对血压、心脏的影响。二、将他的遗体送青岛医学院解剖教研室，作为教学尸体直观解剖所用。三、将他的骨骼穿成标本，长期供教学使用。



遵照束星北生前遗嘱，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领导和束星北家属将其遗体捐献给青岛医学院，作为科研和标本所用。图为遗体交接仪式。

束星北教授的妻子　葛楚华

束星北教授的儿子　束越新　束润新　束义新

束星北教授的儿媳　李　勇　王惠玲

束星北教授的女儿　束美新

束星北教授的女婿　林鸿翔

1983年10月30日

束星北教授遗体捐献移交书

束星北教授生前多次表示，逝后要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青岛医学院。其家属子女也尊重束教授的遗愿。因此，经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同意，并报请国家海洋局批准，青岛医学院表示同意接受。现将束星北教授遗体正式移交给青岛医学院，此据。

束星北教授家属子女代表　束越新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代表　陈则实

青岛医学院代表　张之湘

1983年11月3日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根据束星北教授生前遗愿，将他的遗体赠给青岛医学院，为发展祖国教育事业作出贡献。我院对束星北教授这种献身精神表示敬佩，并对其家属致以慰问。

青岛医学院

1983年11月3日⑭

但是有关文书忽略了束星北的另一项捐献：大脑。据知情人(护士、大夫)称，束星北在生命最后的时期，不时地讲到他的大脑，他称自己的大脑超乎寻常的聪明好用，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是，70多岁的人了，脑袋却还跟二三十岁的时候一样饱满清晰活力无限，而且由于积累丰富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想法碰来碰去，闪烁着数不清的智慧的火花，让他备感遗憾的是，这些东西表达不出来了。“他要搞解剖的张大夫一定要解剖他的大脑，如果说大脑是一个小宇宙的话，你们一定会发现，这个宇宙与众不同。你们一定要好好解剖一下，会有发现，也会有一定价值的”。⑮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天才的大脑，它装载了无法估量的丰富无比的智慧和累累学识，如同宇宙，它拥有的是无尽的群星。束星北将自己的“大脑”作为最后的成果呈献出来，不仅仅是聊作未竟之愿和一生残缺的弥补，更是希望人们通过解剖来破译这个独特的“宇宙”。他的天才情节和遗憾至死不泯。可是没有人听得懂他的声音，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行将辞世前的老人的“呓语”，没人会去认真地倾听一个老人的呓语的。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因患慢性气管炎、肺心病，病情恶化，医治无效而撒手尘寰，终年77岁。

注释

①修日晨《束老师，我会努力的》，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60－62页。

②据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宣传处处长杨树珍采访录和曾荣有关档案资料。

③1962年束星北曾对探望他的原浙江大学的学生周志成说，“我现在正在研究海洋动力学，海洋是个大能源，例如著名的黑潮就储藏着巨大的动力，我已经摸索到研究的途径，再花上几年时间就可以搞出成果，我所以不去外地开会，就是为了能做几

年工作，不至于像一些很有才华的科学家猝死于旅馆中……"（周志成《怀念物理学家束星北》，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60－62页。）

④他的一些学生如于良、王景明等曾认为，束星北生命的最后阶段选择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是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以他的水平和经验以及国外关系，应该到高水平的大学去任教或做学问。这样才会带出一批高水平的学生。而"一所"的"学生"，基本来自各科室的业务骨干，因"运动"经历，大都先天不足，束星北难以施展其身。显然束星北也感觉到了这个问题，因而，他曾托人给他物色高水平的学生。周志成在一篇文章中回顾道，束星北曾托他转告许良英帮他物色高水平的学生。周志成问他什么样的学生条件，束星北说："要找像李政道那样的。"然而，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

⑤刘洪宾采访录，1995年6月28日。

⑥何树华采访录，1995年7月2日。我在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中，翻到了张科长的揭发材料（这大概是最后一篇关于束星北的揭发材料了），材料中详细陈述了束星北与他"打架"的过程。全篇附上，亦可证明"故事"实出有据。

关于与束星北吵仗的经过

1977年3月8日上午11时左右，我去保健室碰到束星北，我对束说，有个事商量：我招待所向教工之家新招待所搬家，你是否把门口里边走道上放的东西搬一下，束说你是否把招待所的房子给我一间，把东西放在里头。我说房间少不够用再给你更不够用吧。束说那我不搬。我说是否暂时把不重要的搬到外边，没有人我找人给你搬。这时束就发〈耍〉态度说，房子是我和苏克华的，你们住上人我就把门锁上不准走。我说那样不合适，我说给你二院房子你怎么不去。〈他说〉没修好不去。我说不是修好了〈吗〉。束说没有，不信你去问刘欣汉去。我和束从保健室，到总务科办公室，没有人，束这时就开口骂人说，你妈的屄，不讲理，你们那房子门原来在后面（指教工之家），你们为什么把门改在我这边。就不让你们从这边走。这时我也发火了。我说你锁上门，我就给砸开。束说你敢砸。你们欺压我20多年现在还想欺压我，使我这些年来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不吃这一套。这时束开口就操我祖宗操我娘。我说你怎么骂人。束说〈我〉还要做你。（这时候）张贵兴等来拉仗，同时束骂我，我也骂他，我说束是国民党作风。束说：〈说〉我是国民党〈你〉拿出证明来，这时束向我坐的地方走来，要打我，被张贵兴同志当〈挡〉住。束指着我说，你的底细我知道，但不知束知道我什么底细。他一直嘟嘟哝哝地骂个不停，这时张贵兴同志第二次把束拥出总务科去了。以上是大体经过。当时门口有不少人在看，是谁我没看清，在保健室也有人看见。

张兴盛1977.3.18（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⑦据汤光信采访录，1997年6月1日。

⑧当那个研究生的论文第三次被退回时，他便琢磨是不是先生对他有成见，跑到著名海洋学者赫崇本那里哭诉。赫崇本告诉这个学生说：你怎么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的先生，他这样要求你是你的幸运。结果那篇改了七遍的论文在答辩会上获得极高的评价。出处同上。

⑨据汤光信采访录，1997年6月1日。

⑩据束美新采访录，1997年9月12日。

⑪同上。

⑫同上。

⑬《关于"右派分子束星北一年来被监督劳动情况"的汇报》，1962年7月21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27－2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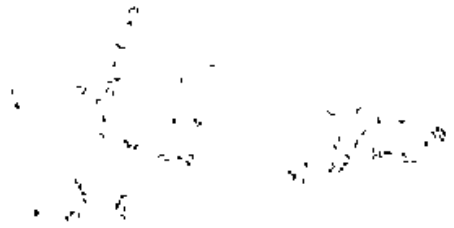
⑭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⑮曹淑芬采访录。曹淑芬时为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护士长。



尾声 永远的故事

同样作为科学家，王淦昌几乎获得了完美的人生：提出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研制原子弹氢弹……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还有比拥有如此丰富的科学经历更为饱满的人生吗？反观束星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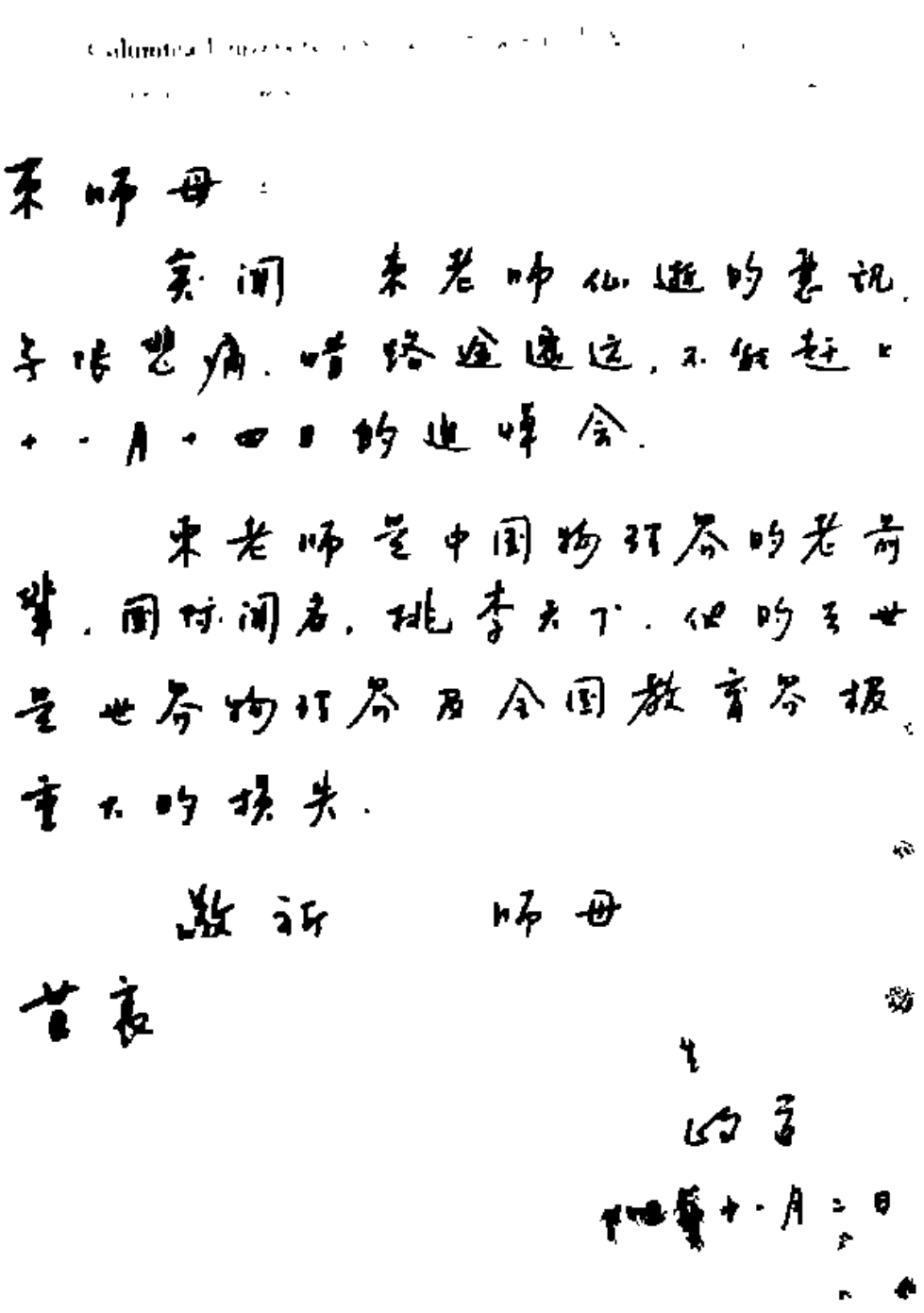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那就是他的归宿。”青岛医学院办公室张主任指着不远处的一副双杠说。

双杠旁边是篮球场，在青岛医学院宿舍楼前面。篮球场是水泥的，篮球架子很是破旧了，球筐的网子，仅剩下两根绳子啷当着。束星北就躺在双杠下面。双杠中间好像还稍有点隆起。



束师母：

惊闻 束老师仙逝的噩讯，
实非意料。唁电途遥远，不能赶上
十一月十四日的追悼会。

束老师是中国物理界的老前
辈，国际闻名，桃李天下。他的逝世
是世界物理界及全国教育界极
重大的损失。

敬祈 节哀

师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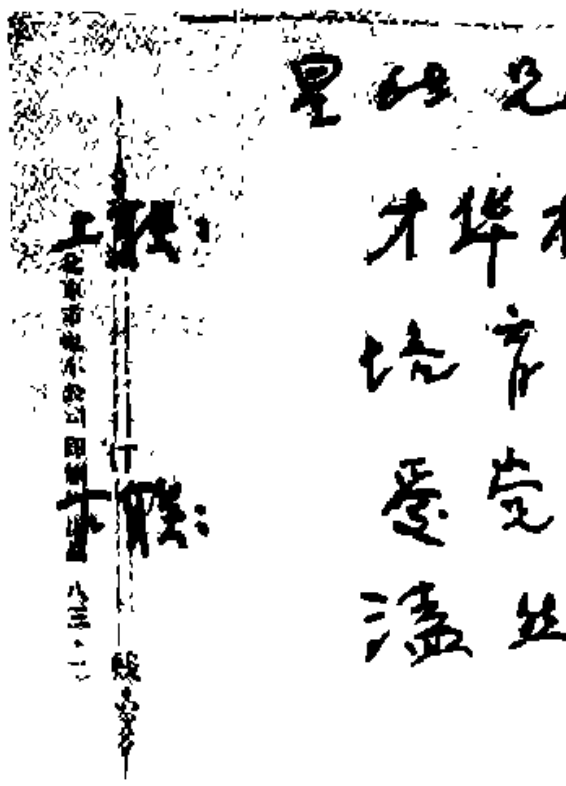
李政道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日

1983年11月2日，李政道发给束星北家属的唁电

1998年，在我的采访行将结束时，想起束星北最后的遗愿，一路寻来，竟找到这里。束星北的遗体移交形式隆重异常，报社、电台、电视台专门作了报道。有一个作家还写了一篇名为“科学家精神永放光芒”的文章，号召人们学习束星北的这种伟大的奉献精神。之后，束星北的遗体被送进了太平间。这期间，对国家而言，正值“百废待兴”，青岛医学院各级领导班子都在“大换血”，以期清理清除“文革”流毒余孽。显然这是各级领导的头等大事，束星北遗体就在青岛医学院领导班子“大换血”的繁忙与骚乱中，被遗忘了。

遗体重新被人记起是在半年之后，这个时候，“大换血”的“运动”已告结束，



王淦昌为挚友束星北书写的挽联。(1983年)

该下去的都下去了，该上来的上来了，各路诸侯都得了“分封”，有人突然想起束星北，遣人去看时发现遗体已腐烂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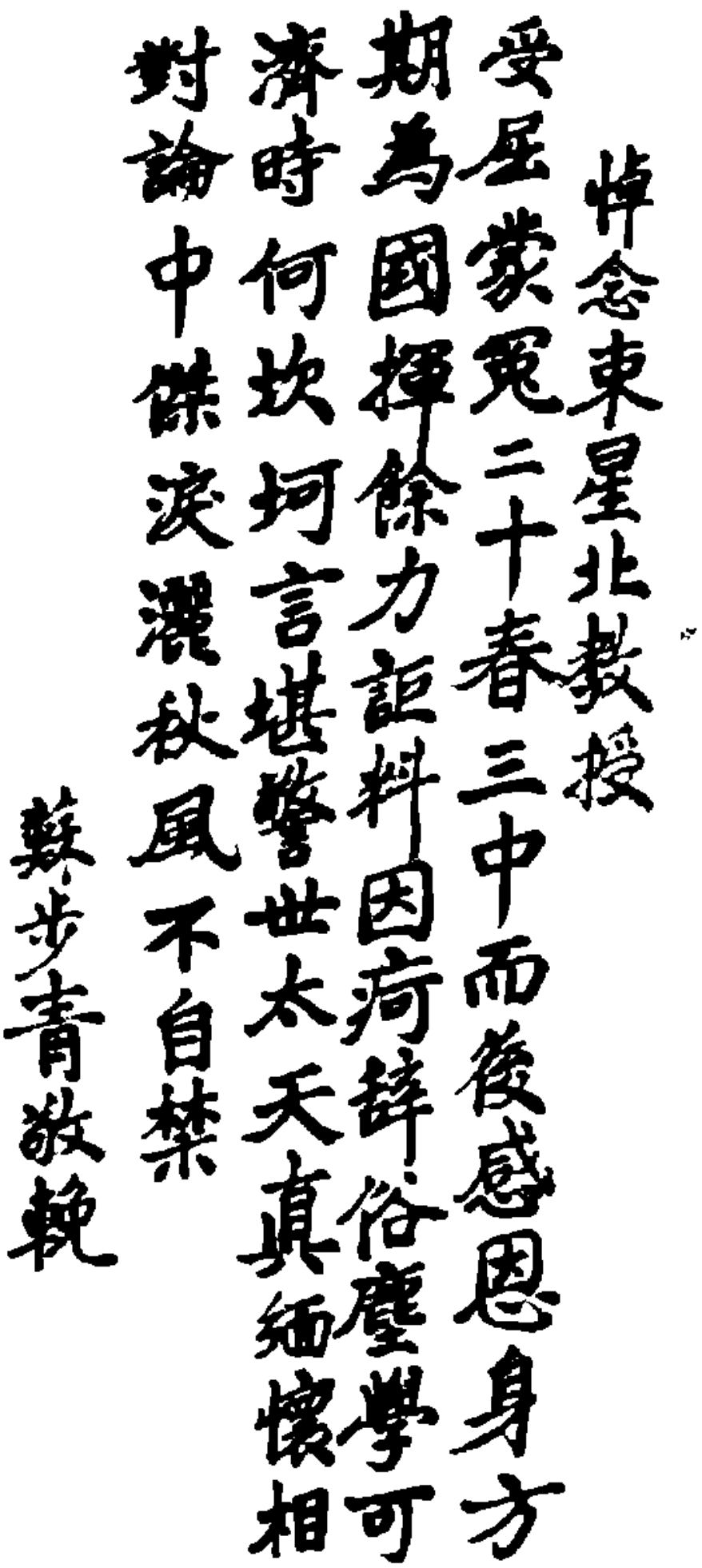
医学院院后是一片荒寂的林子，当初甚是偏僻，附近有人死了孩子，常常就近埋到那里，人们也称其为“舍林子”。有关领导见遗体非但不能解剖，连标本价值也失掉了，便遣了两个学生将其送到医学院院后的“舍林子”里埋掉。去“舍林子”须走医学院的正门，这样一来就得绕一个很大的圈子，两个大学生在处理遗体时，为了省事，打了折扣。他们趁着没有人注意的工夫，就近将束星北的遗体草草地埋葬在学校篮球场旁的双杠下面。

这样，束星北最后仅有的一点遗愿也落空了。

这就是束星北的一生。作为一个科学家，束星北这一生给世界留下了什么?

如果把束星北和王淦昌作个对比的话(这样的对比着实很残酷)，我们会发现，同样作为科学家，王淦昌几乎获得了完美的人生：提出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研制原子弹氢弹、率导核能特别是核聚变能的研制与发展……从这一串科学经历来看，王淦昌始终站在世界前沿科学的制高点上，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还有比拥有如此丰富的科学经历更为饱满的人生吗?

反观束星北呢? 我曾仔细地检阅了束星北的学术成就与成果，在他档案的学术成果表中，水平较高些的是在美国学习期间和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的成果，这个时期的文章大都发表在美国、英国一些高水平的专业杂志上。解放后，他在气象学领域里出了些成果，但由于转行且时间太短，太多的东西还没有展开或深入下去，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过是刚刚跳进河里，湿湿身子，想着往深处游了，却没有机会了。再往后，他在命运的颠踬与缝隙



数学家苏步青为好友束星北书写的挽诗。(19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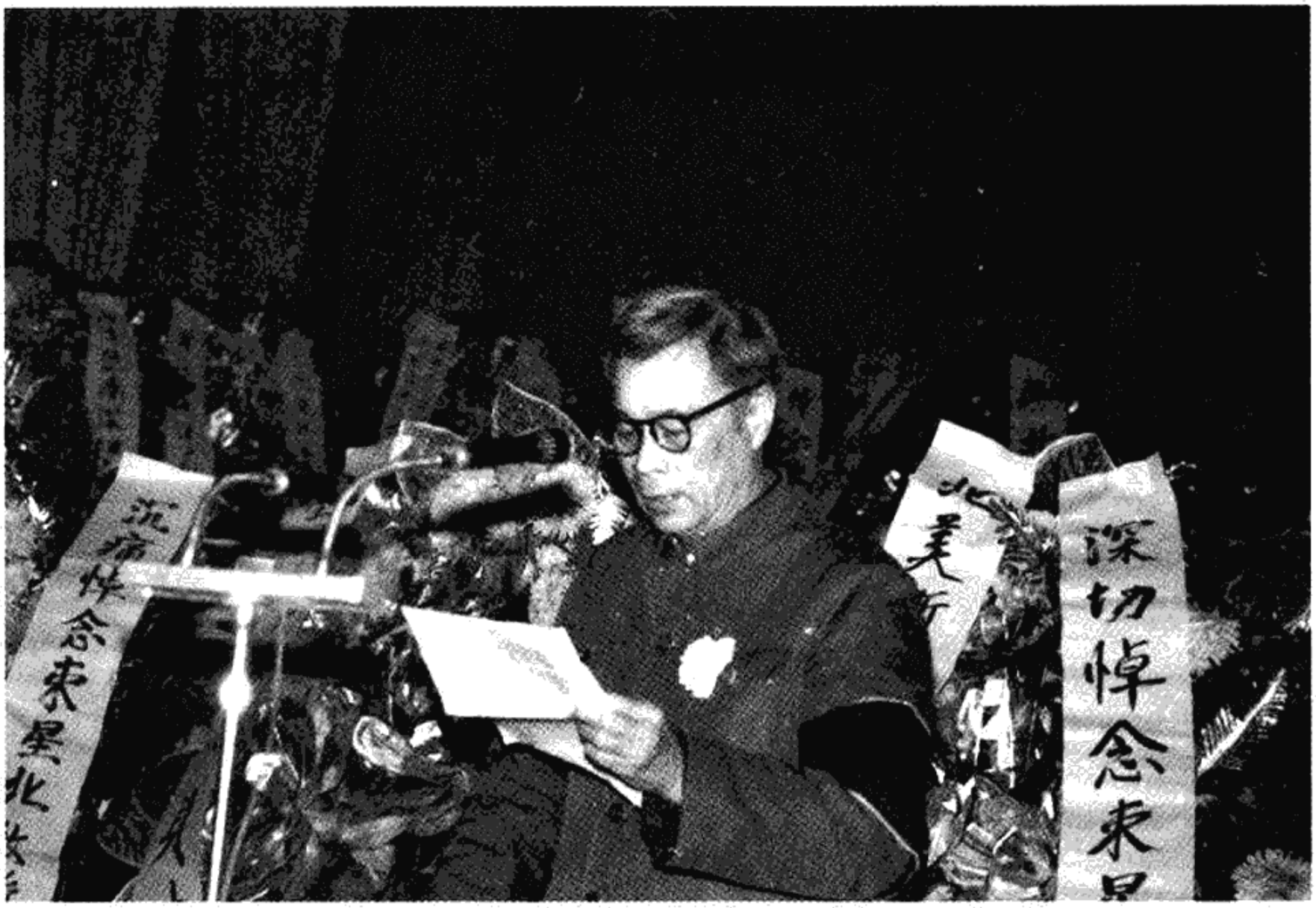
中虽说也出了些成果，可这些成果，在他的眼里无非是些“雕虫小技”。

他这一生中，较大一点系统一点的成果应该是两本书了。两部书一部名为《电磁学讲义》，一部名为《狭义相对论》。《电磁学讲义》写于解放之初，是国家高教部的约稿。书稿完成后，高教部又决定使用苏联的教材，于是束星北的书稿便被束之高阁。据当时一些学者专家(也包括苏联专家)所称，匆匆翻译的苏联教材无论质量水平或内容的丰富程度皆不能同束星北的书稿相比，可是时值全国“一边倒”学苏联之际，也只能如此。再往后，由于主人另样的命运，这部书稿只能在幽闭的壁橱和潮湿的墙角暗度其生。三十多年后，人们再次想起这部应约之作时，发现它已粘连腐烂成一坨了。即使作为遗物的条件也没有了。

另一部是《狭义相对论》。这是一部让束星北颇费周章的专业教科书。它写于1957年束星北被打成“极右”之后，初稿完成的时间大约在1958年赴月子口之前。以后由于书中已叙述过的原因，这本初稿一直躺到80年代初，束星北又重新作了系统的加工、整理和最新材料的补充，才初告蔵事。这部约25万字的学术专著(附插图照片共144幅)，由束星北的老友王淦昌亲自撰写序言，并在序言中对其做出了评价：《狭义相对论》是束星北“几十年教授这门课的结晶，书中有些内容属于他自己的独创，是一般教科书所见不到的……”①

1983年年底，束星北去世不久，

北京一家专事科学著作的出版社编辑闻讯专程赶来索稿，束星北的子女欣然交出手稿。尽管束星北对这部数易其稿的著作似乎并不满意，可他们认为，操持了一生的父亲有这么一本专著问世，也足以弥补点缺憾的。



"天才"在告别平庸的世界后，人们才会试着认识他或尽快地忘掉他。
1983年，在束星北追悼会上，国家海洋局陈忠实副局长致悼词。

可是从此便没了下文。之间，束美新几次询问，对方皆称正在运行中。以后，见总无结果的束美新亲自赴出版社询问情形，才知这部曾被出版社美誉得天花乱坠的著作，一直随着出版社的改革和人事变动而四处飘泊。每每接到手里的编辑经过一番努力后就要将书推上去了，单位领导发生了变动，新领导上任，很多事情就得另起炉灶。于是束星北的著作便开始了新的一轮旅行。终于这家领导决定动真格的了，出版社又在变化中改弦易辙，由于市场化的影响，出版社的出版思路开始往市场上靠拢。在钱或经济效益面前，决定上马的《狭义相对论》被又一次搁浅。束美新再去催问时，对方提到商业赞助、基金款项等等。无奈之下，束美新将在这家出版社搁浅了八年的著作索了回来。

最终这部著作还是由王淦昌出面解决的。1992年，由王淦昌出面将这部著作报请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作为资助项目将出版款项拨予青岛出版

社，并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发行。等这一切工作完成，《狭义相对论》出版面世，已是1996年了。

自1983年到1996年，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滚滚商品大潮的冲击与裹挟下，在万人一径的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有了新的选择，一部从写作到出版历经了39年之久的学术著作注定了自己与时代相悖的命运。



很多人的储藏室里还能找到这样的证书。为表彰束星北50年的辛勤工作，中国物理学会于1982年颁发给束星北的荣誉证书。

这就是一个天才科学家的全部？作为比照，他的至交，王淦昌的影子又一次跳出来：两人的经历、学识、执著和科学素养与敏感性多么相同，可是他们的人生道路又是多么的不同。难道仅仅是因为个性的不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得到或完成的是怎样的一种人生？这样的疑问从我1988年开始接触束星北的故事起就一直困惑并缠绕着我。我走进了他的故事，走进了他的命运，从此就被梦魇深深压住。

他曾是一条多么伟岸壮阔的大河，可是这条大河只有汹涌澎湃的源头，往后却是不断地萎缩干涸；他曾有多么陡峭不凡的品质，它像闪闪发亮的白银一样，可是风霜雨雪之后，却失去了高贵的光泽。

为了追求“真实”与“客观”，我只能忠实地跟在一本本历史档案和一本本采访笔记后面，我不敢奢望他生命里程中的阳光。是的，直到最后，我也没有感觉到阳光落地的声响，以至最后我为自己寻找的写作理由是他在人文科学上的贡献。因为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伴随着束星北不断萎缩的科学与教育学的历程，另一个历程——人文科学的历程和社会科学的历程却无限地丰富膨胀起来。正是束星北的“另一种历程”折射出了我们的民族、社会与历史，折射出“昨天”的故事，也许仍在折射着“今天”。由此而言，束星北的人生也许是完善完整的，他的贡献，也许并不亚于他的至交王淦昌。

我只能如此考虑，否则我的“笔”就没有着落。

注释

①《狭义相对论·序言》，青岛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页。



阁楼上的日子(代后记)

刘海军

通往阁楼的梯子很陡，近似舰船的舱梯，上楼需要把住两边的栏杆引颈向上攀缘，曾是建筑设计师的妻子将梯阶设计成麦穗形，这样梯阶是错开的，等于矮了一半，腿就好迈了。

攀上去折腰穿过一个“甬道”，再拐一道弯便是阁楼，阁楼有个不大的老虎窗，窗棂横横竖竖地栽着防盗钢筋，再挂了窗帘，光线便幽幽的，很符合我的心境。

刚搬来时，海面无垠，正面是一览无余的薛家岛，稍向东一点的栈桥、琴岛也都可收入眼底。可很快，海边上竖起了高楼，挡了些海面。再往后，高楼栽种得像树林了，海面奢侈起来，目光调来调去才可寻到蓝色一线。海面的喧嚣也越加沸腾，不过午夜里，仔细些，还是能听到大海从无疲惫的呼吸。

阁楼原是储藏室，准备写束星北时，便收拾了，把电脑搬上来，从此阁楼便成为我和束星北共同的地方，上去下来，下来上去，日复一日，潮涨潮落。有时并不打开电脑，却也坐上几个小时。

与束先生从“相识”到理解，距离是15年。对认识一个人而言15年似不算长，可对一本书而言，太长了。

初识束星北是1988年初夏。那时，我是青岛一家地方报纸的记者，刚被分工担任科技

口报道，初次采访就听人谈及他的名字。最初只是缘着兴趣，讲他的人也大都由着兴趣说他的传奇，说那些英雄气慨、侠性十足的故事。我意识到自己要面对的是一个超凡脱俗与众不同的“英雄”，也隐约感觉到“英雄”的后面，是一个天才科学家悲怆的命运之歌，可迟迟不得路径。直到1993年的一天，我看到了束星北档案。

厚厚的七大卷案宗(加上散装卷应为八卷)，每一卷约为一个历史时期，如第一卷，浙江大学时期；第二卷(上下)为山东大学时期；第三卷为月子口时期，等等。确切地说，三年前，我就看到了这七大卷档案，那时候，我对连篇的揭发、检举、调查、告密或反省、检讨、悔过材料未曾着意，也没有兴趣，觉得这样的东西过去已披露得太多太滥了，翻了翻就送了回去。想必是积淀与深人的关系，再次翻开它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个人的最为完整而严密的命运的记录，它完整严密得令人窒息，我觉得档案的主人一开始就被送进了特护室，进行严密检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记录在册，他的内心活动和心理心态也要通过各种仪器设备进行观察观测并记录备案。

受到如此特护的“病人”(束星北应该是个病人，他一直就是被当做病人看待的)，不会只安置在特护室接受检查，检查的目的还是要手术治疗。整个七部卷宗便是一个时代对一个人精密的检查与观测过程，漫长而又耐心的手术过程。于是我看到，一个人的思想、意志、尊严等一点一点地被剥离的细腻而严酷的过程。

这是一个人，一个优秀的人不断被阉割扭曲为另类的历史(“另类”是什么，我找不出恰当的语言，实际上，束星北在不断地遭受阉割与扭曲中，并未成为改造者们期望的那样的人，因此，我只好用“另类”)，是一个英雄“落败”的历程，也是个性与命运的悲剧史。

当然我也看到并感觉到了档案主人的顽强和韧性，看到那个被一次次掀下的不屈的天才的头颅，是怎样的一次又一次地昂起。正是这样的对立或对应关系，那个时代才被深深地豁了开来。

显然很少有人愿意再提这段“历史”(有时提及态度意识却变了，或者只是出自道具符号上的意义)，因为它不知被发掘扬筛了多少遍了，可是束星北档案，让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匆匆踏过去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阁楼的日子应是缘着这样的认识开始的。

尽管有了档案，正式动笔还是在三年半之后。就束星北复杂而又丰富的命运历程而言，档案只能是个指向，一个通往榛莽腹地的路标，而我的目标是了解熟知他人生和经历的全部过程。我列了一张人物采访表格，依着他的每一段经历“按图索骥”，只要与他有过关系的人都是我的采访对象(很多人物是由甲而乙由乙而丙生发出来的)，最后这张表格上的人物竟有上百个。束星北的经历复杂、足迹广阔，相知相识遍布天南海北，而我当时工作颇繁忙，采访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或出差公私兼顾一下。一张上百人的人物表，我虽没有全部都见到访到，但绝大部分见到了，访到了。我知道会有很多功夫用不上，可我必须

这样做，否则心里就不踏实。

再者，拿出这么长的时间来“预热”，还是出于对自己的认识。我做事缺少机敏耐心、反应迟钝，特别是相关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如物理学、气象学或解放初期的“运动史”等)几属空白。这都是我进入写作状态前需解决的。我相信，准备工作做得扎实些，可以弥补自身的不足。

自认为万事俱备了，才敢登上阁楼。可阁楼上的日子并不顺利，一年半至两年的预期计划，一拖再拖。有个时期，我不得不停下来，将多年准备的资料全部封存起来，想着永远告别这样的生活。

1997年，我的电脑里，已储存了三十余万字，按着最初的感觉和提纲，似乎接近尾声了，可这个时候，我发现就要落成的大坝出现了渗水。具体地说来，是文本方式出了问题。

按说束星北档案便是文本的方向，可我却将它作成了报告文学样式。这种80年代出现、蔓延开来的文本样式，始于对新闻体制的“反动”，它将被滤下来的尘封或埋葬的新闻(确切地说应该是历史)重新发掘出来，予以文学包装加工而大行其道。这种文本样式很快便蔓延开来，并不可避免地为商业化功利化所侵蚀。我显然为其所疾，就像那个时期诸多的华而不实、任凭主观意志加工绘制的作品样式一样，《束星北档案》成了“文学作品”，而我也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到处都是着意的创作、加工、绘制的痕迹，到处都是“我”的行踪。资料或故事都是真实的，为什么一经加工绘制就虚假了，就可憎了呢？我苦苦思索，终于发现显然根子出在文本样式。

一部束星北档案，便是历史，便是主人的心灵史，为什么要绘制，要创作，将真的做作成假的呢？作为纪实作品或传记，惟一需要做的应是：让历史述说历史，让主人述说主人，它的文本样式，应是真实客观有凭有据的“实证”。换句话说，它应是一个调查报告或一份病理分析书，我所要做的只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看不见的“手”，来导引其径。如果这样的“文本”还要有“文学”的话，那只是作者的人文关怀，是一种始终被按捺抑制的情感之河在悄无声息地流淌。因而，那一个个不着颜色的文字看起来可能是平静的或者是平淡的，可它的的确确又都在滚沸的心河里浸过、煮过。可恨的是，当这个意识清晰时，为时已晚，我只能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大坝的隐患是致命的，不能修补，只能炸掉重来。

很长时间，我不再触碰它，也设法不再想它。这样做似乎还不是因为失败和失败带来的沮丧，最不堪的是，自信心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在认识走近束星北的日子里，时代、国家在那里天翻地覆，很多人都在选择、更新各自的生活方式，我的朋友或亲近的人，几乎无一例外。有选择自然会有变化，身边的神话故事越来越多，我所能做的便是将老虎窗换上厚厚的沙发布窗帘，却堵不住外面一浪高过一浪的喧嚣。我眼前常幻化出非洲大草原上激动人心的镜头：成千上万的角马在迁徙的途中呼啸狂奔。而我却将自己关在阁楼上，承受着“摇摇晃晃的人”、“不做事的逍遥派”的压

力，失败让我给自己找到了退却的台阶。

几千万字的束星北档案及有关资料重新被封存起来，像个小小的坟丘。告别时，我并没想着回来。这一年，我43岁，感觉着，生命中好像还有最后一辆班车。我尝试着做事情，奔跑，恓恓惶惶地奔跑，刀子抵在脊梁上那样奔跑。

这是一种纯粹的旁无所涉的奔跑，只管跑而不会去问为什么要跑，为什么要这样跑。我却在问，一跑就开始问，不停地问。这样一问，就跑不动了，或跑得不成样子了。

好像遗失了什么，好像错过了什么，好像签过的契约你还没有履行，好像被跟踪着，索命似的，让你无法平静，较奔跑之初还要恓惶。心室里，有一只恶作剧的小手，不定什么时候就攥你一下。

这样的感觉也频频地出现在梦里。

梦中，我无数次与束星北相会，无数次走进他的命运，最多的镜头是被追逐着，逃至悬崖、死胡同，眼看着索命的到了跟前，那胡同却通开了，或悬崖前有了吊桥。也有些许劝戒的镜头，劝他收敛锋芒，将阳光一样的思想暂时藏在心底，劝他称病不去月子口水库，劝他"反右"之前就调至北京和王淦昌、竺可桢在一起，劝他不要告发那个想同他一起出逃国外的学生，和他一起出逃……

束星北多舛的命运，可谓处处惊心动魄，可于我而言，最缠心揪心的是他饥肠辘辘的样子；是他将看田大爷的花生连泥带皮一同吞下的样子；是他为了果腹，偷吃了一个地瓜而被揪斗，无力辩解的样子；有些梦里，我都设法给他送食物。印象最清晰的一次是我怀里揣了只烧鸡满月子口水库找他，终在水库南面的山坡上看到穿一身黑色劳保棉衣的他，高大的身影远远地在前面攀缘着，我紧紧地追在后面，不时地摸摸胸口，感觉一下那只散发出温热的烧鸡是否还在。我不断呼唤他，可怎么也叫不应，我惟恐他消失在眼前，一边叫着一边拼命地赶，可双腿像失了筋骨，跌进一个大坑里，感觉着，那是个炸弹坑，四周的黑土都给爆炸的气浪疏松过了，我一次次向上攀爬，可是酥麻无力的腿却不争气，眼看着就上了坑沿了，又滑了下去，这样上去下来，绝望得只有喊叫了，这时一只大手伸了过来，是束星北。一被拽上来，我就掏那只烧鸡给他。我说，我给你带吃的来了。可是那只鸡呢，我胸口那儿怎么突然空了。刚才我还摸过的，一直感到它的温热，怎么就不见了？我各处找着，憋得难受：刚才还在这里呢，怎么就不见了哪？

束星北看着我，目光湿幽幽的，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目光，是行将辞世的父亲的目光。1983年，父亲知道他的死期将至时，他绵绵的手拉住我的手，就是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束星北粗糙的大手在我的后颈摩挲着，又划过我的面颊，我抱住他，放声大泣。

被妻推搡起来，心仍在锥痛，枕头湿了一片，凉凉的，好长时间走不出梦境。

我已无法逃避，如果是一粒种子，它早就扎下了根，你挡不住它的拱动、它的生长。这样一来，我加予自己的所有理由如：选择、人生价值、换一种活法全都失去了意义。重回阁楼不仅是要兑现早已签署的契约，更是使命、责任和爱，也是命运：不可抗拒。



束星北档案

ShuXingBeiDangAn

再次攀上阁楼已是2000年了。计划2002年搁笔的，实际上直到2004年《束星北档案》才告蔵事。这中间，文本的确立耗去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我而言，抛弃轻车熟路的“文学文本”，开创一个将采访录、原始档案、背景资料糅为一体的“实证”文本并非易事。犹如登山，面前没有山径，只能先辟出可供攀登的山径来。这样一来，开凿山径就不仅仅是冒险了，不过当我确信只有这样的文本形式才能贴切准确地表现出束星北的命运和一个时代时，便义无反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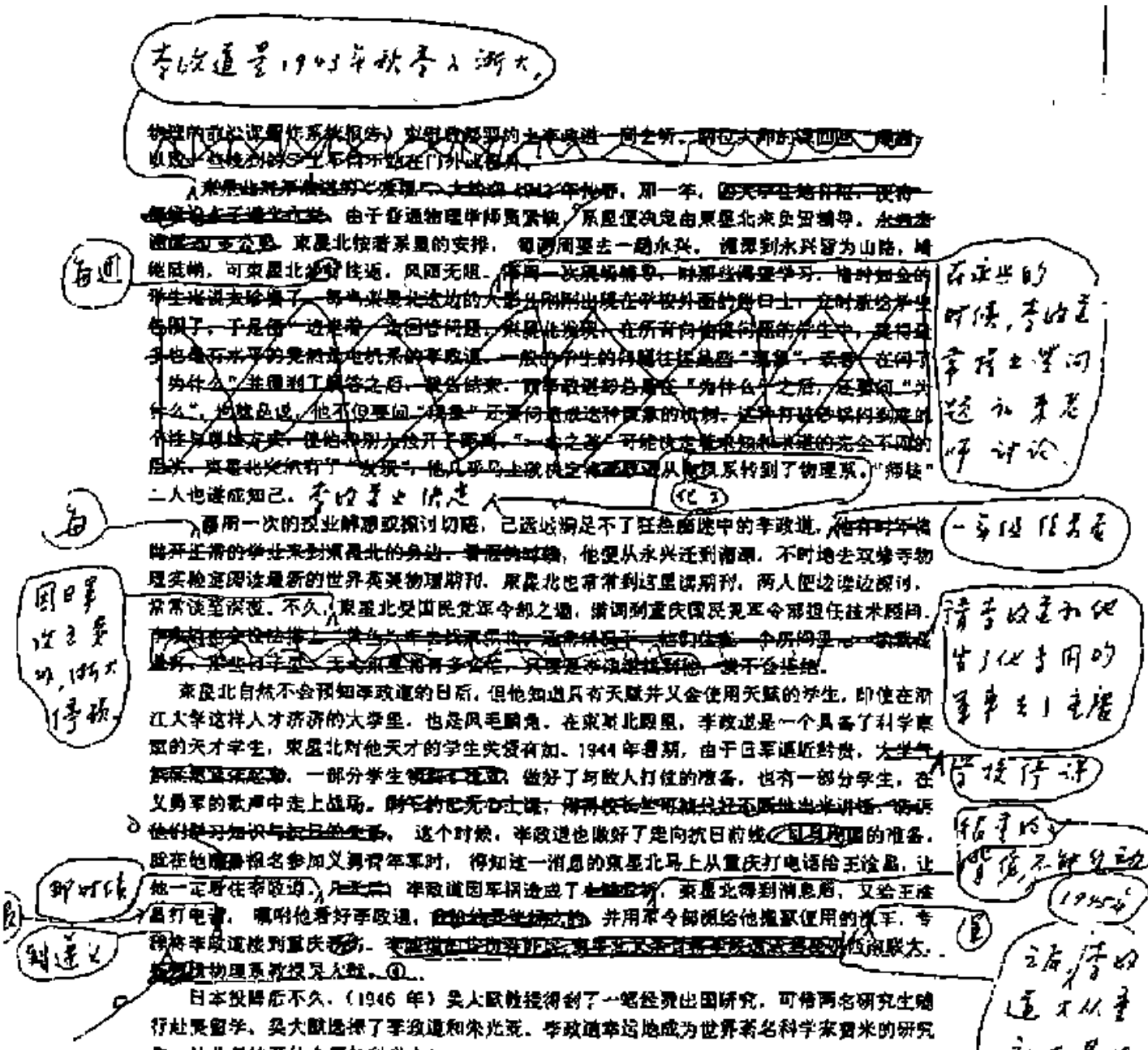
于我而言，《束星北档案》是一个工程，是一个耗时费力的工程，但束星北属于传奇里才有的智者，有这样的智者相伴，生活应该不会寂苦孤独。阁楼上的日子，是一次促膝交谈，伴着认识磨合与理解，智者将他鲜红的伤口展现与你，已感久远的黑白时代也因此而横亘在你的面前。尽管智者走的是一条毁灭的道路，但他带给你不只是忧伤悲戚，更多的却是英雄气概、信念的坚执、丰满的人性、顽强的生命。书写者亦被书写着，在没有英雄和信仰的日子里，平淡索然的生活因日久弥深的“交谈”而日见深邃陡峭。

一件事，一年两年完成，叫做完或做成一件事，可是一件事要用十年八年或更长的时间来做，其本身便成为一种生活，这样的“生活”，一定会对他的人生造成影响或改变。现在我还感觉不到影响改变的尺寸，可我已饱尝了负荷着责任信念的“边缘人”的滋味。

一个“物化”的追求感官满足的时代，是被顺情顺势点燃起来的，它的迅猛之势注定超过我们曾经历过的运动，这样的情形下，个性化的生活本身就是坚守。不曲奉阿谀，扭曲自己，在任何时代都是困难的，因为人注定难以在与时代长期的紧张关系中完整地生存。你要坚守这样的生活，生活自然会不时地裸出它锋利无比的刀刃，让你感到，阁楼的“生活”是弱者对主流生活或生存的逃避，耻辱感会在瞬间爬满周身。有时真的就不知所从了(这样的感觉亦加深了我对主人的理解)。

幸运的是，在我人生最为沮丧的时候，一对在青岛大学工作的夫妇走进了我的生活(他们不愿透露姓名，我只能遵从他们的意愿)，那时，我正经历着生活和事业双重失败，瞻前顾后，我不知如何应对。人在灰暗的时候，很容易夸大自己的失败与沮丧。是他们让我相信，这个充满喧嚣的生活中还有另一种声音，让我相信我所认为的失败的价值所在。他们同我一起进入主人公的命运长河，一同经历着他生命的沉浮，一同倾听他踉跄的步履，更重要的是，他们帮我修复了信心。这期间大约是四年，这是一种怎样的耐心与力量，在他们那里，我看到未见之事的确据。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位绅士，他便是中国科学院办公室主任柳怀祖先生。我与柳先生素不相识，是束星北让我们由相识到相知，正是他的成全与嘉惠，《束星北档案》才有了李政道先生的鉴正和序言。本书的第26章《李政道来了》，约7000余字，李政道先生竟纠正修改了十余处，不但修正了一些以讹传讹的资料的引据错误，恢复了历史的真正面目，也为这一章节增添了色彩。听中科院的知情者称，李政道先生为了本书的序言，几乎用去了圣诞节全部时间，反反复复修改了多次。大师的严谨与境界，让我感受至深，是一生的精神享用。



物理的部分课程作系统报告）为他的教导的土木成进一同去听，那位大师的课四匹，用德语授课，当校外的学生也得不远在门外旁听。

来星北并非被迫的一度辍学，大约在1942年秋季，即一年，因天气生活拮据，没有经费给女子读生方法，由于普通物理学师资紧缺，系里便决定由束星北来负责辅导，永远在浙江大学这样人才济济的大学里，也是风毛麟角。束星北惊奇系里的安排，每周用要去一趟永兴。据那到永兴皆为山路，崎岖陡峭，可束星北都往返，风雨无阻。每周一次课外辅导，时那些得理学习，培养拔尖的学生也没去给学了。每当束星北这边的大部分同学在学校外面的假日上，在时就给学生们了，于是他一边学着，一边回答问题，然后比较说，在所有向他提问题的学生中，我得益最多也最有水平的竟然是电机系的李政道。一般的学生的问题往往是照"课本"，或者，在问了"为什么"并得到了解答之后，便告结束，而李政道却总是在"为什么"之后，还要问"为什么"，追根品底，他不但要问"现象"还要问出这种现象的机制，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个性与思维方式，使他和别人拉开了距离，"一念之差"可能决定能求知和求进的完全不同的结果，束星北兴奋有了"发现"，他几乎马上就决定将李政道从电机系转到了物理系，"师徒"二人也遂成知己。李的学业进步

一学期下来，已经成绩足不了狂热痴迷中的李政道，他有时干脆离开正常的学业来到束星北的身边，看看物理学，他便从永兴迁到湄潭，不时地去双塔寺物理实验室阅读最新的世界英美物理期刊，束星北也常常到这里读期刊，两人便边读边探讨，常常谈至深夜。不久，束星北受国民党军令部之邀，请调到重庆国民党军令部担任技术顾问，

束星北自然不会预知李政道的日后，但他知道只有天赋并又会使用天赋的学生，即使在浙江大学这样人才济济的大学里，也是凤毛麟角。在束星北眼里，李政道是一个具备了科学家型的天才学生，束星北对他天才的学生关爱有加。1944年暑期，由于日军逼近黔贵，大学气氛紧张起来，一部分学生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做好了与敌人打仗的准备，也有一部分学生，在义勇军的歌声中走上战场。时气的已无心上课，得再校长竺可桢只好不断地出来讲话，告诉他们读书知识与救国的关系。这个时候，李政道也做好了走向抗日前线（到昆明）的准备，就在他准备报名参加义勇军军时，得知这一消息的束星北马上从重庆打电话给王淦昌，让他一定劝住李政道。后来，李政道因军训造成了[illegible]，束星北得到消息后，又给王淦昌打电报，嘱咐他看好李政道，[illegible]，并用军令部颁给他搬家使用的汽车，专程将李政道接到重庆来。[illegible]

日本投降后不久，（1946年）吴大猷教授得到了一笔经费出国研究，可带两名研究生随行赴美留学，吴大猷选择了李政道和朱光亚。李政道幸运地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费米的研究生，从此开始了他全新的科学人生。

有一点需要强调，李政道进入西南联大还是二年级的学生，由于他在浙江大学打下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底子，已具备了很好的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学基础，再加上禀赋出众，学校同意他直接上大三或大四的课程，对大二的课程，只需要参加考试，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后，他因为没有文凭（其实因抗战，他甚至连中学和小学也没毕业），不能当正式研究生，只能先当非正式生。但进入研究生院不久，由于他的天才和勤奋，得到了物理系费密（E·Fermi）、泰勒（E·Teller）和扎克雅逊森（Zachariasen）等教授的赏识，很快成了正式研究生。

对于浙江大学那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李政道也是铭念并肯定的，"学校在流亡途中，每到一地，便草草定居，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开实验课。民房条件差，没有水电设备，师生们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利用两只木桶盛上货管来解决实验用水，没有酒精就用木质盛当酒精用，没有电池，就用6条的10匹马力柴油发电机发电；缺乏俭葬体就以酒杯代用，物质

李政道亲自为本书涉及他本人的部分作了认真细致的修改，体现了这位著名科学家严谨的作风。

最后，我还要提到的是作家出版社的袁敏编辑。以前，我从无与出版社编辑打过交道，幸运的是，第一次就遇上一个严谨实干的编辑，她从不许愿夸口，总是默默无声引导着你不断完善着这部书稿，一遍又一遍，有时我真的不胜其烦了，可事后却是幸运的感觉。这部书的完成到出版，显然渗着她的心血和品质，在这里，仅称感谢已不足表达我的心愿了。

正是有了束星北，才有缘结识这么多的朋友和相知。

束星北犹如高贵的雄狮，独步草原，他刚正豪放、正直不阿、疾恶如仇，具有强烈的

批判意识和独立精神(他身上有着强烈的英雄豪气和侠性，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罕见的)，他身上最饱满的部分是他高贵的个性(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最贫瘠的部分)，也是他招致灾难命运坎坷的根源。

我常常设想，如果束星北生活在今天会是怎样的命运？记得束星北的学生于良先生也曾喟叹道：束先生没有任何错，只是早生了七十年。

如果束星北生于今天，他的个性会得以畅行吗？与黑白两色的昨天相比，今天可谓色彩缤纷、极尽张扬，可是我没有感觉到束星北个性得以畅行的氛围。舞台背景着实不同了，可相同故事仍在周而复始地上演。如果再将目光放远，回溯我们的历史源头，就可发现，我们的今天似乎远没有走出我们自己制造的泥沼，我们还没有创造出真正的个性精神得以畅行的舞台来。束星北即使晚生七十年又会怎样？一样的不合时宜，一样会以另样的形式，延续着自己的悲剧。因而，《束星北档案》不仅仅属于昨天。

遗憾的是，束星北已被遗忘了，早早地被遗忘了。早在我采访的中后期，就感觉了这一点，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自己沉重的笔，已经很像掘墓的铁铲和镐头了。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来关注束星北，也不奢望有人因为他而去关注那段历史，但我坚信束星北的存在，坚信他独特的个性声音的永恒，就像从不被我们注意的殿檐下的风铃，它从没停止过自己的歌唱。

束星北用自己悲壮的“歌唱”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放弃了什么，今天仍在失去的、放弃的又是什么！

我们之所以听不到他的“歌唱”，或许是这“歌唱”被太多的嘈杂和喧嚣所遮掩，或许是我们没有时间驻足倾听……

2004年初春